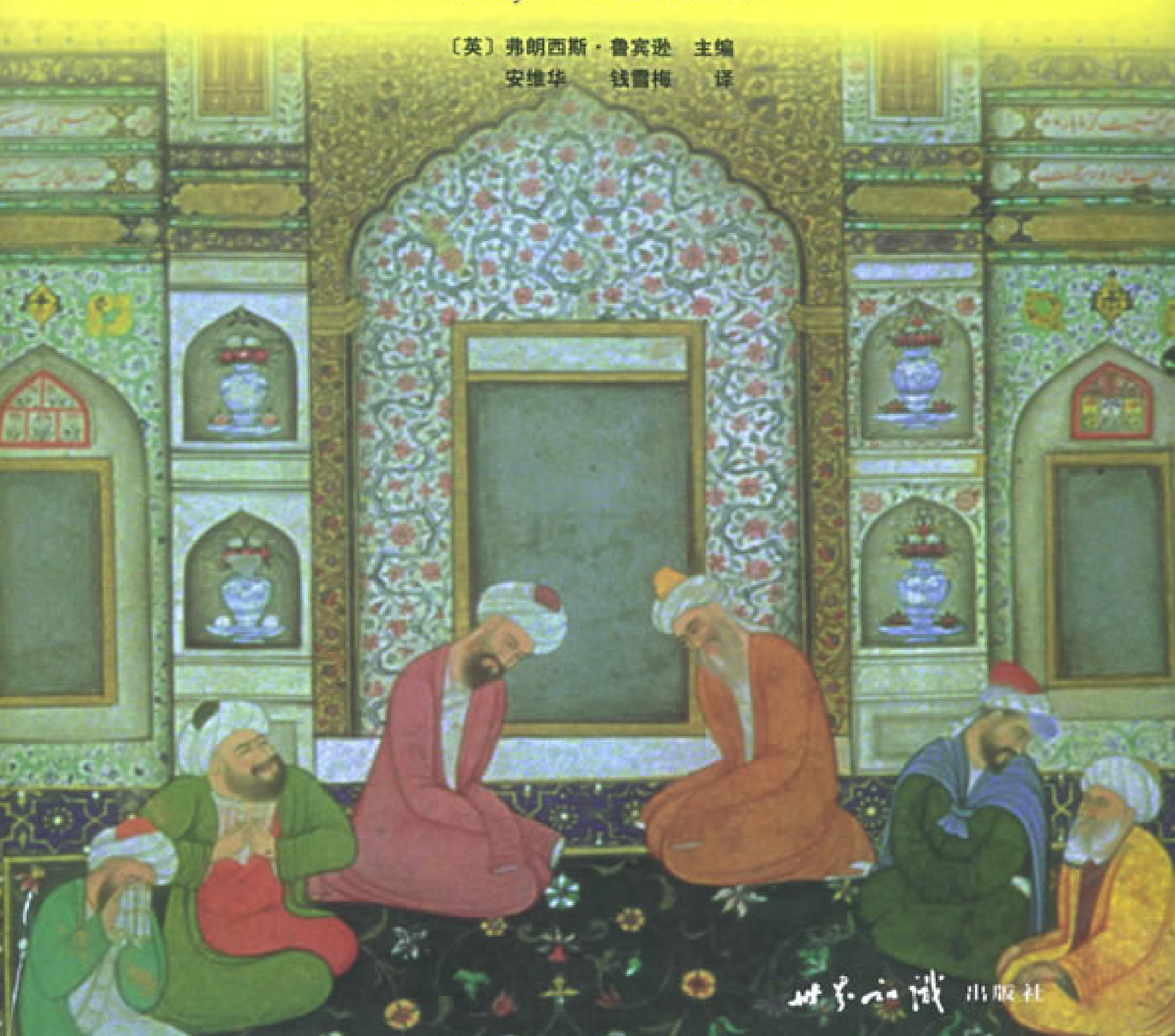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

ISLAMIC WORLD

edited by Francis Robinson



〔英〕弗朗西斯・鲁宾逊 主编

安维华 钱雪梅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在8～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穆斯林世界无论是在地域的扩张还是在创造能力方面都首屈一指。在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漫长的较量过程中，仅仅是到了晚近时期西方世界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如今，穆斯林在世界人口总数中已占到1/5，然而西方对于真实的伊斯兰世界却普遍存在着误解。

弗朗西斯·鲁宾逊和他搭档们致力于消除这些误解，他们打破了西方把伊斯兰理解为单一文化的偏见，驱散了笼罩着伊斯兰世界的重重迷雾，赞颂了它在各个学科领域的种种成就，并且成功地探索了共享同一宗教、文化渊源的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极其复杂的关系。

《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以十分精准的语言表述出对伊斯兰世界极为透彻的理解，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而完整的伊斯兰世界。爬帖入微、旁征博引，全书洋溢着智慧之光，充分展现出学术大家的风范。

- 伊斯兰在世界上的兴起
- 伊斯兰世界体系的出现（1000～1500年）
- 欧洲扩张时期的伊斯兰世界（1000～1800年）
- 西方统治时期的伊斯兰世界（1800年至今）
- 穆斯林社会的经济
- 穆斯林社会的规范
- 穆斯林社会的认知及其传承与发展
- 穆斯林社会的艺术表现

弗朗西斯·鲁宾逊 伦敦大学南亚史教授、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历史系系主任，英国皇家历史学会、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特别会员，英国南亚研究学会的成员，是公认的伊斯兰研究领域学养深厚的专家。已撰写有关本领域的论文五十余篇、专著数部，其中包括《印度穆斯林中的分离主义》、《1500年以后伊斯兰世界的阿特拉斯》等，他是《剑桥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与马尔代夫百科全书》的主编，该书被美国图书协会评选为1989年优秀参考书。

剑桥插图世界历史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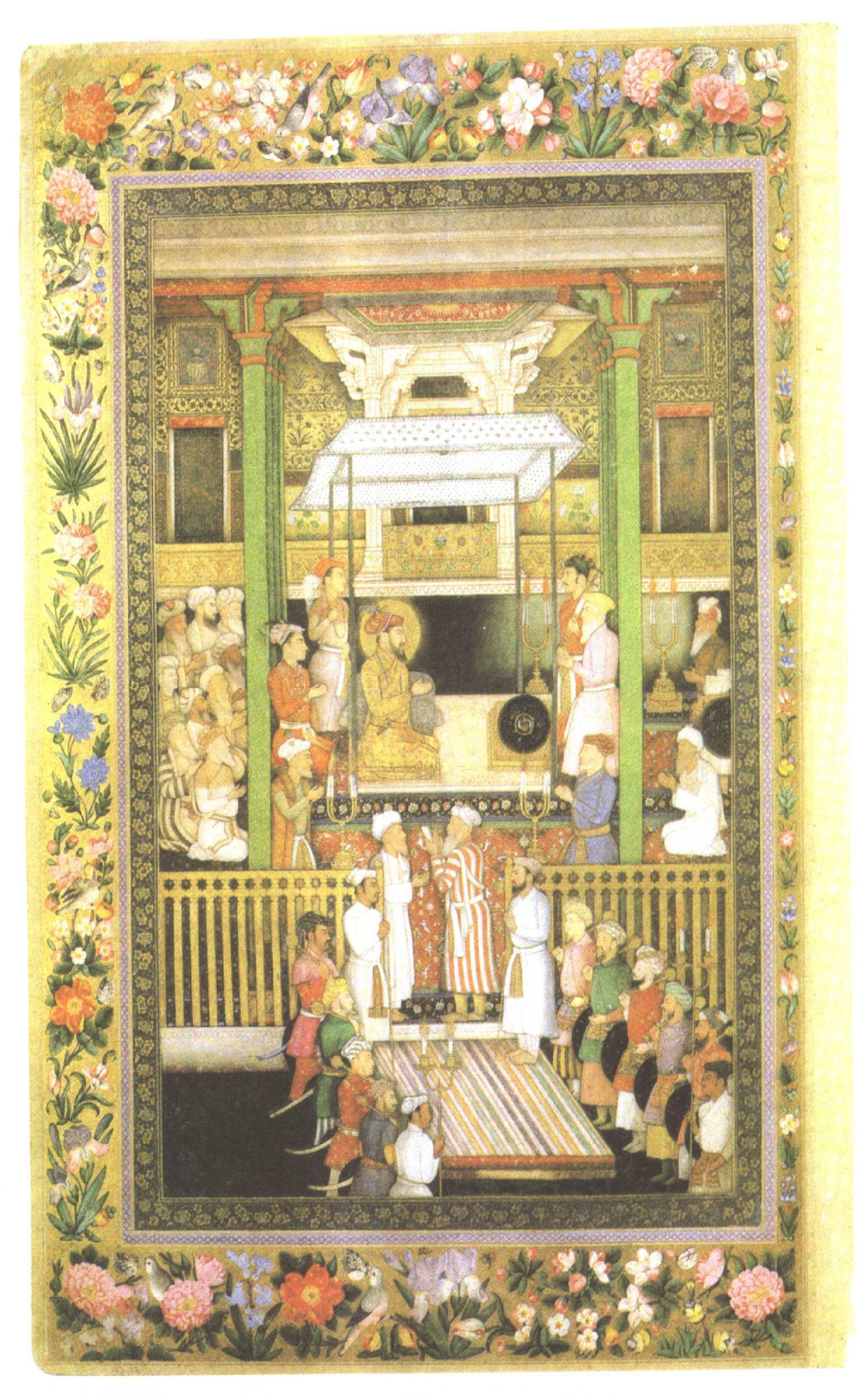
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

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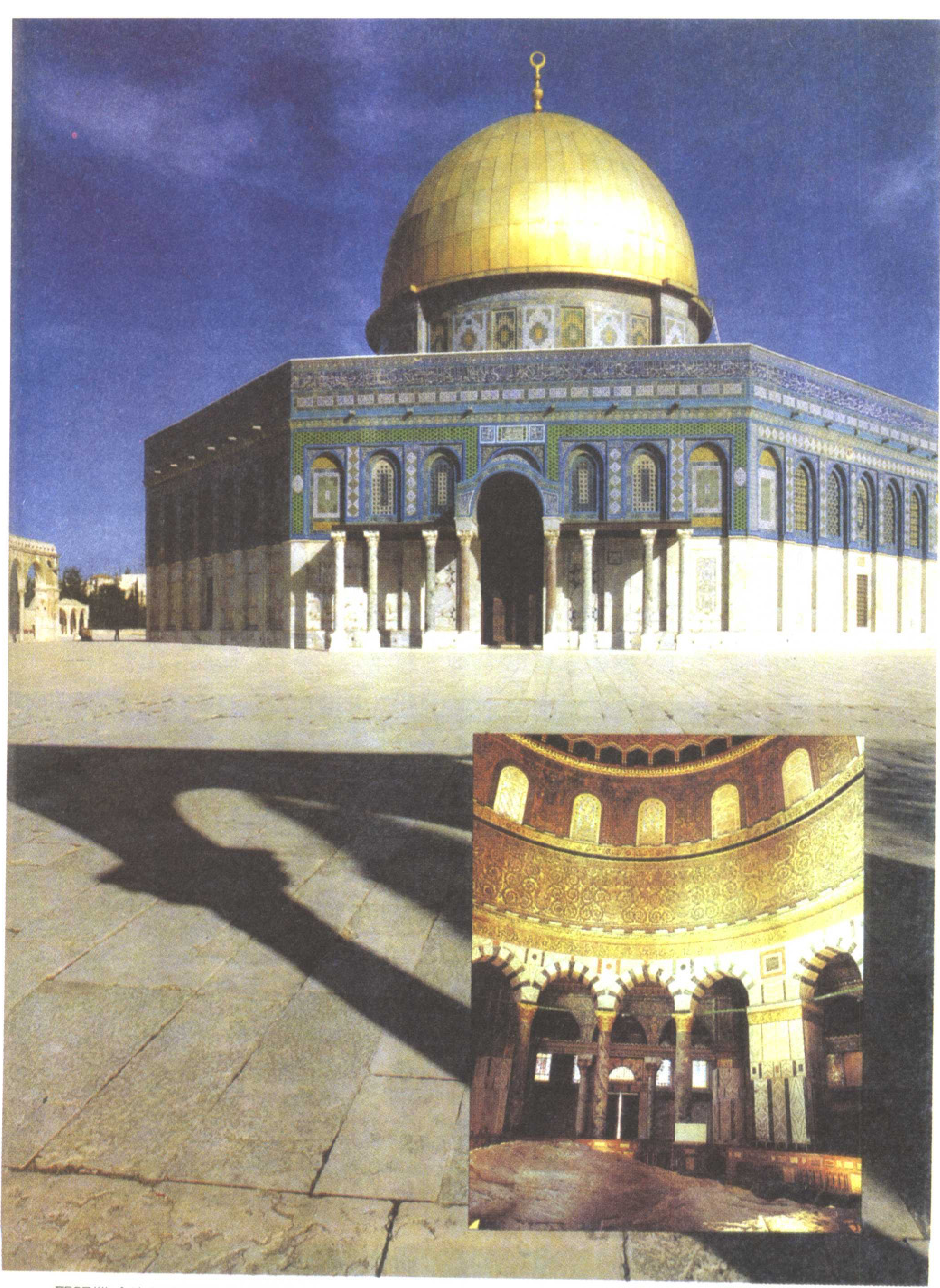
剑桥插图英国戏剧史

剑桥插图德国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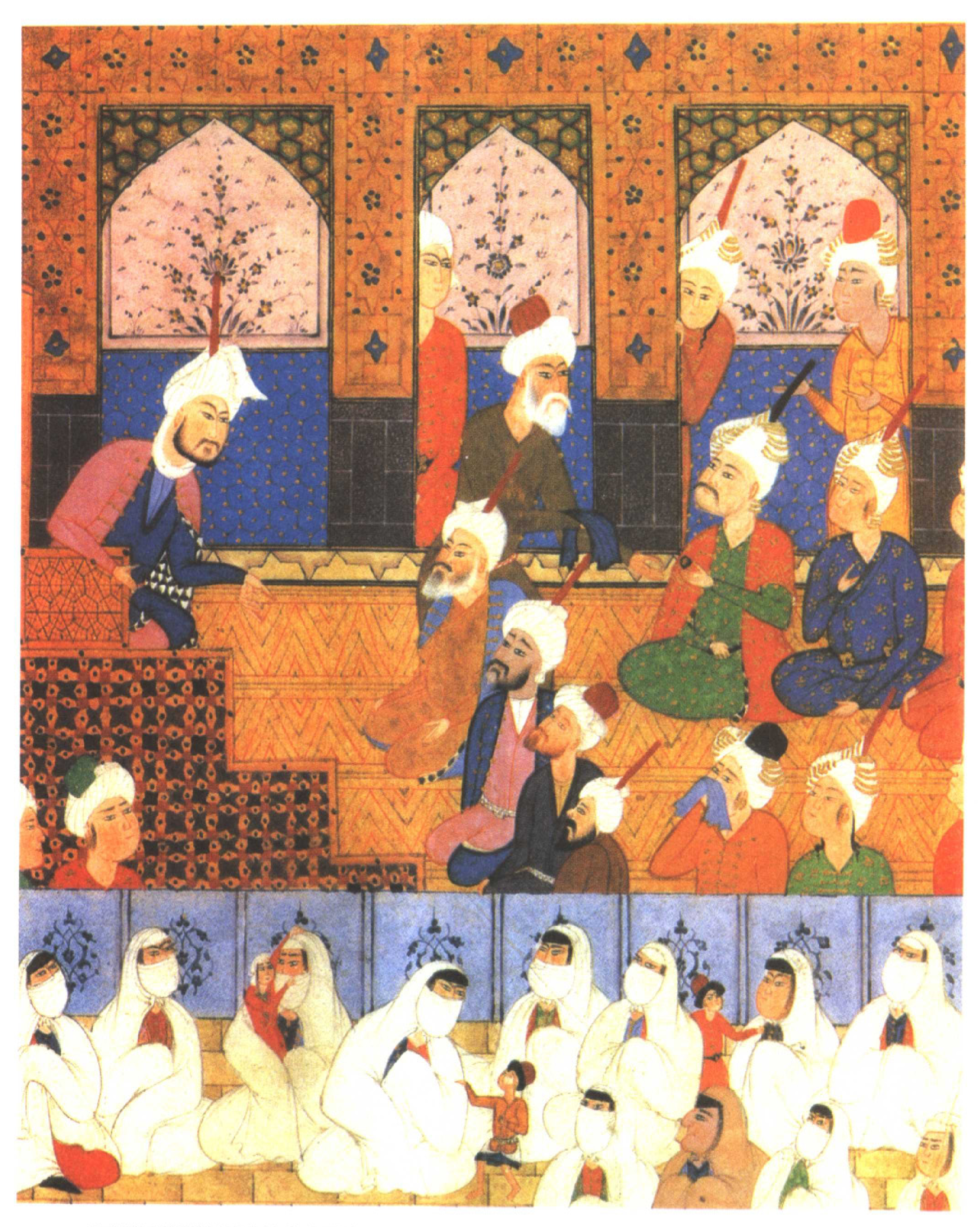
剑桥插图法国史



1640 年莫卧儿皇帝沙杰汗为乌里玛（学者）举行招待宴会



耶路撒冷岩石圆顶清真寺



一位统治者和随从出席清真寺活动



16世纪伊朗的迷人彩饰画描绘了妇女准备野炊的情景

出版说明

作为学术权威的剑桥插图史的系列丛书，《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剑桥插图法国史》、《剑桥插图德国史》、《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等对英、法、德、伊斯兰世界的发展进程都做了全新的阐释，内容涉及政治、经济、艺术、语言、文化及民族蕴育的各种问题。

出版此套剑桥插图史对国内读者了解各国文化发展以及历史影响颇有意义。由于这些作者都是在西方的环境中从事研究，分别是各自领域的专家，看待这些国家也以西方人的视角，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局限性。因此，他们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并不代表我们的认识，甚至有不少观点是我们无法认同的，希望读者在阅读中加以注意。

世界知识出版社

作者简介

前言、导言、结束语　弗朗西斯·罗宾逊教授

伦敦大学皇家豪劳维学院南亚史教授，著有《印度穆斯林中的分离主义：1860~1923年各联合省份的穆斯林政治》（1974年版），《1500年以后伊斯兰世界的阿特拉斯[1]》（1982年版）等。

第一章　帕特丽夏·克劳恩

在剑桥大学讲授伊斯兰史，是该大学贡维勒与凯阿斯[2]学院的教师。著有《麦加的贸易与伊斯兰的兴起》（1987年版），《罗马人的、外省的与伊斯兰的法》（1987年版）等。

第二章　罗伯特·欧文

圣安德鲁斯大学中世纪史讲师，著有《中世纪的中东》（1986年版），《对阿拉伯黑暗时期的比较》（1994年版）。

第三章　斯蒂芬·F.戴尔教授

俄亥俄州立大学伊斯兰与南亚史教授，著有《伊斯兰社会与南亚边疆：1498~1922年马拉巴尔的玛普皮拉斯[3]（The Mappilas of Malabar）》（1980年版），《1600~1750年的印度商人与欧亚贸易》（1994年版）等。

第四章　萨拉赫·安塞利博士

伦敦大学皇家豪劳维学院历史讲师，著有《苏菲圣徒与国家权力（1843~1947年）》（1992年版）。

第五章　K.N.乔德哈利

在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所任讲授欧洲扩张的瓦斯科·达·伽马[4]教授，撰写了数本关于亚洲经济史的著作，其中有《印度洋的贸易与文明：从伊斯兰兴起至1750年的经济史》（1985年版），《欧洲到来之前的亚洲：从伊斯兰

---

① 阿特拉斯是贯穿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山脉名称——译者。

② 贡维勒是该学院1348年建立时的创建者，凯阿斯是1557年该学院的扩建者——译者。

③ 属土著，多为穆斯林——译者。

④ 瓦斯科·达·伽马（1469~1524年）是葡萄牙航海家，首次建立与远东的贸易联系——译者。

兴起至1750年印度洋的经济与文明》(1990年版)。

第六章　巴塞姆·穆萨拉姆博士

在剑桥大学讲授伊斯兰史，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究员，著有《伊斯兰中的性与社会》(1983年版)。

第七章　弗朗西斯·罗宾逊教授

第八章　斯蒂芬·弗瑞伊特

牛津盛安东尼学院研究员，从事伊斯兰艺术与建筑的研究，现在在收集纳赛尔·D.哈里里资料，进行伊斯兰条目的编目。

序

伊斯兰是全球性宗教。在作为伊斯兰发祥地的中东、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中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居住着10亿以上的穆斯林。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印度,而西欧和美国新近才有穆斯林居住。

对许多西方人来说，伊斯兰是代表东方的，是存在于他们自己的文明之外的。对西方来说，提起伊斯兰，往往是疑窦丛生。人们常以好奇、关切、轻蔑或恐惧的心情看待它。伊斯兰是竞争者。从7世纪阿拉伯的征服，中间经过欧洲十字军和奥斯曼土耳其的入侵，直到现在的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恐怖主义，它一直是冲突与战争的焦点。

然而对西方来说，伊斯兰也是启蒙运动的源泉。中世纪作为穆斯林西班牙一部分的托莱多曾经是一个传播的枢纽，通过这个枢纽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评注的希腊和罗马哲学与科学传播到欧洲其他地方。在伊斯兰的庇护下，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等领域的科学成就传到了西方。穆斯林世界在很长时期内是从远东至欧洲的国际贸易中心。诸如灌溉技术这样的农业创新，以及包括糖类、棉花和柑橘在内的一系列珍贵作物，都源于东方。诸如香料、染料、丝绸和锦缎以及其他精致布匹也都来自穆斯林世界。

尽管西方人也许一直认为伊斯兰是“外在物”，但是东方与西方的疆界在迅速地消失。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相互渗透。电子通讯和旅游已将世界变小，不仅如此，在穆斯林世界已有许多人采用了与西方相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人们现在广泛地分享着科学技术和可口可乐、电

伊朗北部陶瓷器涂釉彩绘的技术发达，人们可以在各种陶瓷盘上运用多种色彩逼真清晰地刻画出许多文学主题。现存最早的费尔道西（约930～1020年）的《列王纪》的图画不是出现在各种书中，而是展现在各种盘子和瓷碗上。本图表现的就是传奇故事中著名的波斯王子巴赫拉姆·古尔在弹奏诗琴的女奴阿扎达的催促下，瞄准图中的野驴射箭，依其方向会射中野驴的耳朵和一条后腿。

影与摇滚音乐等流行文化。伊斯兰精神、苏菲主义[①]对西方的精神一直具有深刻的影响，甚至到了今天，它仍然吸引着其他宗教的行家们。在穆斯林和西方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商业上的和政治上的联系。数量众多的穆斯林生[viii]活在西欧和美国，并且正在成为多元文化的一部分。

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关系正在迅速地改变着，介绍伊斯兰文明的历史，它的文化遗产、价值观和成就因而也就显得越发重要。这部冷静的学术性的著作以较短的篇幅描绘出全球范围的伊斯兰世界史。本书第二编中有一部分是关于经济的，探讨了农业与城市——精美手工业品的生产、市场、海港和贸易。第二部分是关于社会规范的，考察了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维持精神控制与经济控制的希斯巴[②]机制。第三部分是关于知识与学问的，强调正确的知识对救世的重要意义，以及它如何促使伊斯兰取得法律、神学、玄学、哲学以及科学上的成就。最后一部分是关于伊斯兰在诗歌、音乐、视觉艺术等领域的艺术表现的，它以此为这本受欢迎的、能帮助我们了解伊斯兰世界的书做个圆满的结束。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教授

伊拉·M. 拉皮多斯

---

① 苏菲主义一词首先由法国东方学者托洛克提出，指对伊斯兰教赋予隐秘奥义，奉行苦行、禁欲、功修方式的神秘主义派别——译者。

② “希斯巴”意指劝善戒恶——译者。

前　言

弗朗西斯·罗宾逊

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使学生和普通读者能够比较容易地了解伊斯兰世 界。前四章概述了伊斯兰历史:从先知穆罕默德7世纪在阿拉伯半岛的兴起,经过阿拉伯哈里发、奥斯曼、萨法维和莫卧儿等巅峰,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伴随西方扩张,伊斯兰遇到的挑战与变革。第5~8章考察的主题是:伊斯兰世界的经济根基、社会安排、知识及其传播、艺术表现。导言探讨伊斯兰与西方相互理解的问题。结束语对伊斯兰世界的一些命题——宗教复兴、它对西方明显的敌视以及妇女地位等进行评估。所有各章都列出参考书目,以利于读者对该问题做进一步的了解。

易于交流是编辑本书的指导原则。因此,在罗马字文稿中引用各种伊斯兰文字的问题上,我们采取尽可能简单的解决办法,尽管这么做也许会出现令学者感到不安的忽略或扭曲。本书一直在使用《伊斯兰百科全书》(第2版)的文字体系,有所修改之处是,省略了所有的发音符号,ain和hamza也被略去,用j代替了*dj*,用q代替了*k*,不过对于在英文中公认的名字的形式,则仍保留原来的用法。本书不可避免地会使用一些阿拉伯词语英语译音,但使用时会加以解释。所有的日期都使用公历。如果想把它转换为伊斯兰历,可以参阅G.S.P.弗里曼-格伦维尔:《伊斯兰历与公历》,伦敦1977年版。

编写此类著作的困难之一是根本不可能了解有哪些学者的著作对这两方面都特别有影响:既可帮助读者形成对伊斯兰历史的图像,又能够提供一些专业的想法和信息材料。需要特别提到下列两部著作:M.G.S.霍奇森:《伊斯兰的奇遇》3卷集,芝加哥1974年版;I.M.拉皮多斯:《伊斯兰社会史》,剑桥1988年版。本书有关伊斯兰世界统治者部分多半借助于E·波斯沃斯:《伊斯兰诸王朝》,爱丁堡1967年版。

我很荣幸地得到以下各位朋友和一起工作的学者的忠告与帮助,他们是:瓦内萨·马丁、阿赫迈德·萨茹汉、菲利士阿·赫克尔、德里克·布伦戴尔、哈米德·加雷浦尔、格雷厄姆·加德纳、克劳迪娅·利别斯金德、维内梯阿·波特、萨拉赫·安萨瑞和巴巴拉·梅特卡夫。我感到荣幸的还有得到了卡尔曼和金有限公司的编辑人员,尤其是米歇尔·法拉姆和凯瑟琳·瑞德勒二位的专业支持。

导　言

☒　自7世纪以来，穆斯林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在这一时期，真主的启示（穆斯林认为它是真主通过先知穆罕默德传达给所有人的）既给穆斯林的生活赋予了意义，又帮助形成了穆斯林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现在世界上有1/5的人认为自己是穆斯林，他们是人类社会中增长最快的人群之一。他们大致生活在一个既长且宽的地带：从北非和西非的大西洋沿岸，经西亚、中亚和南亚，到东南亚海岛。他们的文化在五十多个国家里居主导地位，在其他一些地区，虽居次要地位但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这种情况在印度最为明显，但在西欧、北美、东亚以及南非也存在着。这是不能忽视的一种全球性的"存在"。

世界上数以十亿计的穆斯林分享着曾取得辉煌成就的往昔。在8~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就扩展程度与创造力而言，地球上居主导地位的文明当属伊斯兰文明。它形成于7世纪，当时阿拉伯部落民在阿拉伯半岛脱颖而出，征服了北方两个作为对手的帝国——拜占庭帝国和伊朗萨珊帝国。在这之后，形成了伟大的文化与经济的新连结，因而能够吸收广阔地域（从东方的中国和印度到西方的西班牙和非洲，以及作为其基地的西亚）上的知识与货物。这一新的文明拥有全球城市地区和定居农业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在这一地区存在着宗教和法律上的共同语言。人们可以在共同的"认知框架"内旅行和经商。在其成熟的文化中，人们能够用彼此相通的符号表达自己的想法。出现的第一批著名的中心是8~10世纪阿拉伯世界的大马士革、巴格达和科尔多瓦；第二批是15~17世纪突厥—伊朗世界的伊斯坦布尔、伊斯法罕、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德里。伊斯兰在学术和科学、诗歌与散文、图书艺术、建筑艺术以及精神修炼术等方面都有巨大的成就，这些都是整个人类珍贵的遗产。在被称做公元的年代，大约有一半时间，走在人类进步最前列的是穆斯林。

从19世纪起，这个伊斯兰世界体系却被由资本主义所驱使，以工业革命为动力，因启蒙运动而勉强开化的西方列强压垮了。"领导"的旗帜明显地转移至西方的象征性"运动"是拿破仑1798年对埃及的入侵。此次"运动"之后，



图为13世纪马德里的埃斯科里亚尔[1]修道院中的一本藏书《颂歌集》里描述的情景：一个穆斯林和一个基督徒一起弹奏一种叫"乌德"或"鲁特"的诗琴。中世纪的欧洲深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尤其是通过西班牙传播的那部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音乐方面，阿拉伯世界许多关于音乐理论的著作被翻译成拉丁语和希伯莱语，但是更重要的影响来自于由吟游诗人传播的歌唱和表演艺术。今天依然体现着这一影响的文化传统的是英国的"莫利斯人"或称"摩尔人"的舞蹈。最近的音乐史研究，发现了阿拉伯对一种吉普赛歌舞音乐发展的广泛影响：从歌曲的演出风格到歌曲本身的节奏和音阶，无不体现出阿拉伯痕迹。

西方的军队和资本便横行于穆斯林的土地之上了。到19世纪20年代，只有阿富汗、伊朗、阿拉伯半岛中部以及也门还未受到西方的控制。源自先知的作为穆斯林社团象征性领导的哈里发，此时业已被废除。一时间，人们担心伊斯兰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会落入异教徒手中。多少世纪以来一直与权力携手前进的穆斯林很有理由认为，历史已经抛弃了他们。

20世纪从20年代初现代土耳其的出现，到90年代前苏联各穆斯林共和国的诞生，说明穆斯林世界在稳步地非殖民化。但是对许多国家来说，这像是付出极大代价而得到的胜利[2]。他们多半已经发现，穆斯林统治取代西方的统治是通过西方的价值观实现的，同以前相比，西方的资本和西方的文化对他们的习俗和规范具有更大的腐蚀作用。这一挑战促使全世界穆斯林起而捍卫其人民的伊斯兰未来，对某些人来说，是一种极权主义的伊斯兰未来。不仅是所有的穆斯林都有这种看法，而且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多到足以对他们所在社会的世俗领导人构成重大威胁的程度，在有的情况下，例如在伊

① 埃斯科里亚尔是1563～1584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兴建的皇家住所——译者。

② 原文为pyrrhic victory，指古希腊埃皮勒斯国王在公元前279年以极大牺牲取得对罗马军队的胜利——译者。

朗革命当中，足以驱使他们的拥护者去夺取政权。这些穆斯林在西方通常被叫做“原教旨主义者”，但更准确地说是“伊斯兰主义者”。他们被看做是对现 xii 代西方所珍视的大部分原则（不管是妇女的地位、人权，还是天启教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如此的狂热，一些伊斯兰主义者赖以推进其挑战的手段是如此的猛烈，以致在苏联解体之后，出现了绿色威胁正在取代红色威胁的议论。

历史对当前的问题提供不了什么答案。但是历史可以使我们对这些问题有充分而深刻的理解。考虑到人类当中认为“伊斯兰的过去”是属于“自己的”人的数量，考虑到人类历史长河中“伊斯兰的过去”所取得的成就，也考虑到“伊斯兰的过去”的继承者对当今世界所提出的挑战，对伊斯兰史应当予以关注。

西方对伊斯兰的看法

西方打算研究伊斯兰史的人，首先会被浸淫于西方文化之中已有许多世纪的那些敌视伊斯兰的知识充塞头脑，某些基督教徒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反对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否认基督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否认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还把《古兰经》的权威置于《圣经》之上。同样，某些基督教的统治者也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反对一种信仰所拥有的军队，从732年阿拉伯人挺进到普瓦捷[①]，到1683年奥斯曼围攻维也纳，这支军队在将近1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有进入基督教世界心脏地区的危险。当然，基督教的统治者们11～13世纪在东地中海登陆进行反伊斯兰战争时派出的十字军，也是欧洲历史上最庞大的军队之一。

所以，毫不奇怪，从中世纪初到启蒙运动，欧洲对伊斯兰的看法是充满敌意的。早先，这种看法是根据传闻与幻想形成的。伴随着十字军东征，出现了《古兰经》的第一批拉丁文译文，以及较有见识的态度。但随之而来的是加倍非难穆罕默德的先知地位。在文艺复兴和基督教改革运动中，这些基本的攻击方式依旧存在。

在18世纪和19世纪，旧时对伊斯兰的攻击仍在继续。从事此种攻击的是一些西方传教士，现在他们利用欧洲具有日益增强的支配地位这一有利条件，在穆斯林土地上全面出击。例如，1851年孟买宗教小册子和书籍出版会出版的《穆罕默德的一生》中，即重弹中世纪攻击的许多老调。然而，有关他们的信息同样也被怀有纯世俗忧虑的西方人传播开来，作家夫劳伯特和戴诺瓦 xiii 尔，或者画家英格瑞斯和格柔米的影响就是这样的。殖民官员头脑中装的是

① 普瓦捷是法国西南部城市，732年阿拉伯军队挺进于此，被法兰克人打败——译者。

穆斯林用圣战反对殖民者存在的趋势，他们找到一个惯常用来形容穆斯林的词:“狂热”。

然而，幸运的是，西方对伊斯兰的看法后来开始变得不那么狭隘了。原本打算批判基督教的启蒙运动的学者发现伊斯兰具有理性的品质，而且，认为伊斯兰是曾经将古代知识传播到西方的一种正在开化的力量，伊斯兰的先知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和理性宗教的创立者。这种新的精神由拿破仑体现出来，不管拿破仑动机如何，他确实曾经宣布“我尊重真主、他的使者和《古兰经》”，于是他没遇到多大困难便得以在埃及登陆。不过对许多欧洲人来说，伊斯兰不仅仅是反对基督教战争中的一种武器，它也是外来的充满新奇可能性的游戏场。加兰德1704年翻译的《一千零一夜》[1]便提供了许多这类新奇的东西，其中有哈里发们的富有、妖怪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有创造力才智的人兴致勃勃地在这个新世界里漫游：其中有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莫扎特的《后宫诱逃》以及歌德的《东方诗抄》。其他一些人则愿意自己旅行，了解穆斯林社会如何扩大他们生活的潜力。其中不乏女子，像玛丽·沃特利·蒙塔古、赫丝特·斯坦霍普以及其他许多人，她们发现穆斯林妇女的生活在许多方面比西方妇女受约束的生活要好。

现代学者对伊斯兰的视野就更加开阔了。有证据表明，现代的伊斯兰研究可以追溯到1539年在法兰西学院，1613年在莱顿大学，1634年在剑桥大学第一批阿拉伯语讲座的创办。后来出版了较精确的《古兰经》英译本，如1734年出版了塞勒的英译本，也出版了不再是攻击而是作为历史讲述的有关穆斯林过去的著作，如西蒙·奥克雷撰写的《1708~1718年阿拉伯人的历史》。到18世纪末，不管是文学的还是宗教的，已有大量的文本开始被译成欧洲各种文字，在19世纪，由于宗教学者、圣经考证以及比较语言学都把伊斯兰以及伊斯兰世界的语言纳入自己的视野，伊斯兰研究的范围就更广了。到了20世纪初，出现了一些研究伊斯兰的专家，如像匈牙利伊戈纳兹·戈尔德威厄[2]、荷兰的学者兼管理者斯诺克·赫尔格荣杰、英美人D.B.麦克唐纳和俄罗斯的V.V.巴托尔德，他们所关心的是展示他们想达到学术研究与翻译的最高水准的愿望。迄今为止，处于这一传统的顶峰的是以下三个人所取得的成就：法国人路易斯·马斯戈农大大扩大了对伊斯兰精神领域的理解；英国人汉密尔顿·吉布提供了便于理解伊斯兰历史发展的框架；美国人马歇尔·霍奇森的目标是将伊斯兰史置于更广的世界史的背景之下。所有这三个人都是教徒：马斯戈农是罗马天主教徒；吉布是英国新教教徒；霍奇森是贵格会教徒，他们将他们个人亲身的体验融入到他们的研究中去。 [XV]

遵循这一学术传统的人认为自己是在从事对伊斯兰世界的客观研究。

第8页图：从18世纪起，穆斯林世界就一直是西方人，主要是男人，尽情演绎其性幻想的舞台。艺术家们在这里获得了大量的灵感。比较突出的是东方主义学派画家，后宫、婢妾或女子浴室常常成为他们绘画的主题。这类绘画往往传达一种淫荡的基调，实际上是性的允诺，如同我们在法国艺术家吉恩·莱昂·杰罗姆（1824~1904年）所画的阿拉伯女子《阿尔迈赫》中所看到的那样。

① 原文为“Arabian Nights”，中文旧译《天方夜谭》——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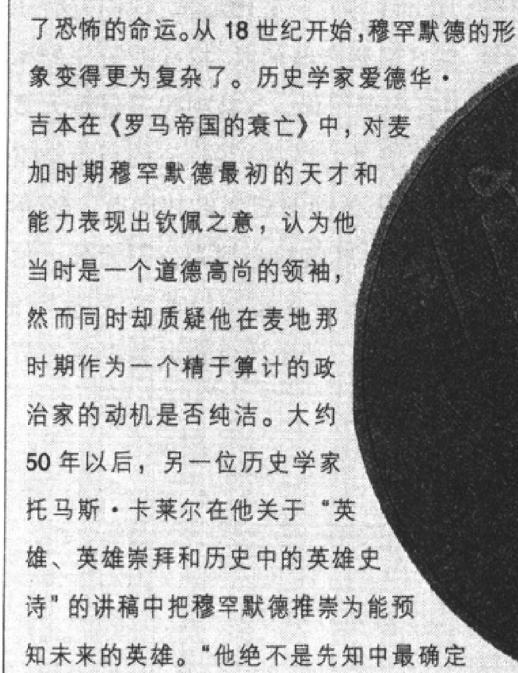
② 又译戈德齐赫——译者。

xiv



西方对穆罕默德的态度

对先知穆罕默德的印象的改变是西方对伊斯兰教态度转变的试金石。在将近1000年的时间里，西方并不认为穆罕默德是真的先知。因此，但丁在《地狱篇》①中为他设定了恐怖的命运。从18世纪开始，穆罕默德的形象变得更为复杂了。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的衰亡》中，对麦加时期穆罕默德最初的天才和能力表现出钦佩之意，认为他当时是一个道德高尚的领袖，然而同时却质疑他在麦地那时期作为一个精于算计的政治家的动机是否纯洁。大约50年以后，另一位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在他关于“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中的英雄史诗”的讲稿中把穆罕默德推崇为能预知未来的英雄。“他绝不是先知中最确定无疑的一位，”卡莱尔宣称，“但是，我的确认为他真的是一个先知……一个伟大的人物：必定是一位诚挚的人。”半个世纪以后，出现了一件对穆罕默德不是“拔高”，但确实是能说明问题的事：维多利亚女王时的实业家托马斯·霍洛韦毫不费力地把这位先知的肖像和人类其他伟大导师的肖像一起挂在他的大学里女子学院的小教堂中。在20世纪，教俗两界对穆罕默德的态度截然不同：世俗力量也许会摒弃穆罕默德和耶稣，因为他们是误导人们宗教激情的催化剂；而研究伊斯兰教的一些罗马天主教徒近来却把穆罕默德看做一位宗教天才，认为如果说他不是一位真正的先知，他们会感到迷茫。



土耳其书法艺术中的“穆罕默德”。穆斯林文化不鼓励描绘宗教人物。

然而近年，尤其是在爱德华·萨义德1978年出版了《东方学》以后，这些学者受到指责，指责他们歪曲了真理，指责他们在实践“东方主义”。具体地说，他们是依据某种一成不变的本质，而不是按照类似西方所经历的那些演变与改革的过程去诠释伊斯兰；他们创造了一个关于伊斯兰“真理”的体系，这个体系在西方学术生活中享有权威，但与伊斯兰现实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实际上创立的是这样一种知识结构，用以说明西方优越于伊斯兰世界，并证明西方将继续居于支配地位。这些指责有一点道理，如果看看政治家和出版物中流行的话语，道理还会多一点。但是将这些指责用在20世纪伊斯兰研究上就有失公允了。将这些指责套在近几十年对这一研究的大多数实践者头上是不怎么公正的，因为他们把从人类学到心理学各学科的所有见识都应用到他们的研究中去了，他们在研究中多半与穆斯林一起工作，他们揭示出作为穆斯林一直存在的、现在仍然存在的许多不同的方式。 xvi

现代西方对伊斯兰的看法仍然包含有以现代形式出现的旧时基督教的攻击，尽管现代穆斯林世界的学者做了种种努力，但是由于老的“东方学专家”的理解在流行话语中经久不衰，这种攻击反而得到强有力的支持。这样，

①《神曲》的第一部——译者。

原来反对伊斯兰的理由集中在性与好色上，现在则变成新的理由——妇女地位低下。对暴力的担忧变成对穆斯林世界人权问题的非难。由于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引出“绿色威胁”的议论，对伊斯兰力量的恐惧又一次浮现。由于伊斯兰主义者想让整个人类的生活都服从于他们对启示的理解，确实激起了世俗西方的强烈反应。由于他们想抹杀启蒙运动的成就，在西方眼里这成了又一种异端邪说。而且，就像萨尔曼·拉什迪《撒旦的诗篇》事件那样，他们有时还试图将他们的标准强加在西方的头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拉什迪对先知率直的描写，虽然在中世纪基督教的攻击中有先例可循，但是现代基督教大多数教士都对此感到悔恨。教会，尤其是罗马天主教会认为，在世俗的与唯物主义的世界里，与不信教的人相比，它与信教的人之间有更多的共同点。60年代初，梵蒂冈第二次宗教会议宣称，“本教会也以尊敬的心情看待穆斯林。他们都崇拜同一个不朽的仁慈的无所不能的上帝——宇宙与地球的缔造者和人类的指引者(Speaker to men)”。自这次会议之后，梵蒂冈发现同穆斯林世界的各种势力进行合作的理由越来越多。

穆斯林对西方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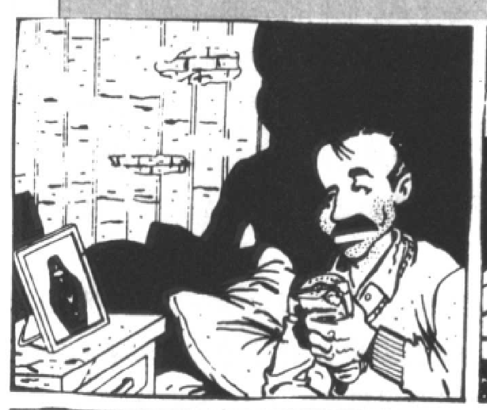
打算探讨伊斯兰史的人需要了解有关穆斯林对西方的一套看法，以及这些看法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如果说相互看法是一枚硬币，那么穆斯林对西方的看法在许多方面像是西方对穆斯林看法的另一面。而且，尤其是在宣布那些公认但不顾及现实的真理时，它包含有以穆斯林的西方学同西方的东方学较量的因素。

大约有1000年穆斯林对欧洲是没什么兴趣的。他们既不想学习欧洲的知识，也不想到欧洲去旅游。他们对欧洲的地理人情只有一些十分模糊的想法。他们确信，欧洲的文明程度要差些，也没有什么能提供给他们。直到穆斯林真的注意起欧洲人时，他们产生了这样一些看法：欧洲人作为基督教徒，是一些书生，上帝向他们启示了知识，但他们对上帝的启示存在着误解；他们是 xvii “卡菲尔”[①]，阿拉伯语的意思是“不信教”或“否认教”，因而他们是异教徒，在演说和官方文件中会这样提及，而且还常伴有诅咒；他们是肮脏的：一位穆斯林在评论中世纪的法兰克人时说，“他们一年至多只洗两次澡，而且还是在冷水里洗，他们的外套从穿上身到烂成碎布从不下水洗”；他们允许妇女令人惊愕地放肆：1482年奥斯曼的亲王杰姆访问尼斯的陪伴曾宣称，“女人们并不体面地穿好衣服，相反地她们却得意地亲吻和拥抱。如果她们玩累了需要休息时，就坐在陌生男人的膝盖上”。从16世纪起，穆斯林，尤其是在比如说奥

① 在伊斯兰教早期，指不信正教的人或多神教徒，后来泛指不信真主、经典、使者的人——译者。

穆斯林眼中的西方妇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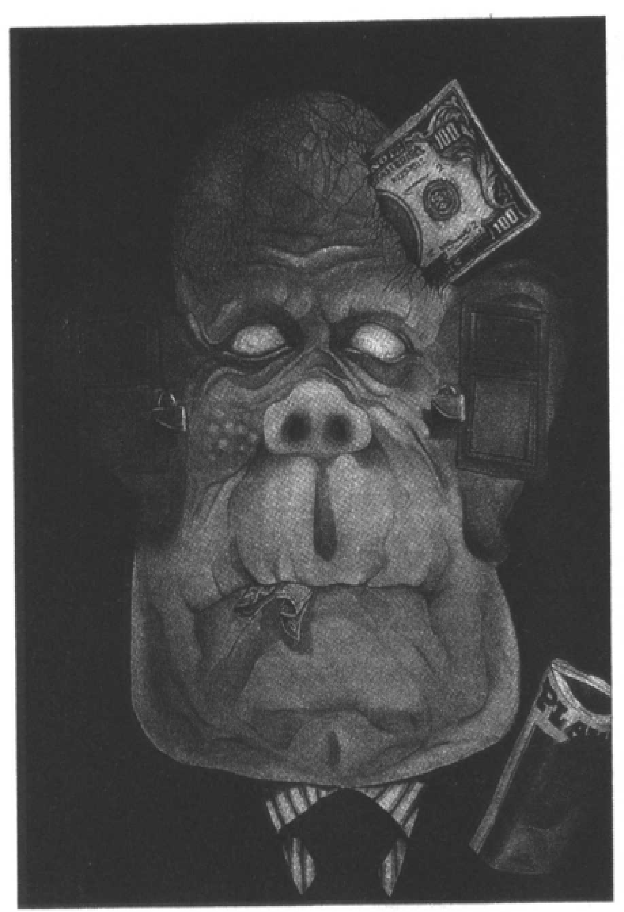
西方没有其他什么比妇女享受的各种权利和自由更能触动穆斯林的东西了。他们的评述表明，他们自己社会的规范通常是多么不同，同时还表明他们在19世纪和20世纪对自己未来发展的关心。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十字军给人们提供了独立进行观察的机会。叙利亚人乌萨玛当时惊诧于法兰克妇女的放纵和淫荡，而更令他吃惊的是，她们的男人在男女关系中竟然"毫无热情与戒备"。17世纪土耳其旅行家尤里亚·切列比则惊讶于社会对妇女公开表现出来的尊重。他描述道，甚至连哈布斯堡皇帝都会给异性让路。"这是最为奇特的景观。在这个国家和异教者的其他地方，女人拥有主要的决定权。"人们都认为，法兰西妇女地位最高。"在那里，男人是女人的奴隶"，一名在巴黎居住过5年(1826～1831年)的埃及人谢赫·里法阿·塔赫塔维宣称，"男人服从女人的命令，无论她们是否美丽"。印度教育改革家赛义德·艾哈迈德·汗则发现了一个新的特点：欧洲妇女的教育程度较高。他注意到，在1869年的巴黎，一个商店里面的普通店员居然会说4种语言。而在伦敦，他还更加惊异地发现，他的女房东的妹妹热衷于阅读宗教辩论的书籍，而且还能够对它们加以精辟的分析和评价。更令他惊奇的是，这家的女仆居然阅读报纸和杂志。然而，主要的反应，至少在穆斯林男子中，一直表现在对欧洲妇女所享有的自由的震惊。如果说在早期这只是评论家感到惊奇的一些笑谈的话，那么在20世纪，欧洲的价值观已开始严重侵蚀穆斯林社会的时候，便成为人们十分关切的事情了。这种自由导致道德堕落和沦丧。"那里的女人为了吸引男人而到了癫狂的地步"，印度伊斯兰主义者毛杜迪（他强调应该实行严格的节制规则）谴责道："与此同时，男人们的性欲则变得越来越贪婪……这一恶疾正在迅速地吞噬西方社会的根基。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从中侥幸存活下来。它摧毁了真主赋予人类用以实现福利和繁荣的脑力和体力。"







西方妇女所享有的自由令穆斯林社会感到震惊和担心，但同时也是穆斯林热衷谈论的话题。在过去两个世纪里，西方有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门，常常身着性感服装在公众场合展现女性的形体；以及她们享有的机会越来越多，等等，都越来越显示出西方文明和穆斯林文明之间的差别。对许多穆斯林，尤其是伊斯兰主义者而言，随着西方价值观侵入公共场合，把妇女隔绝到僻静的地方就成为是否认同于按伊斯兰原则规范社会的焦点。这幅漫画摘自法里德·布迪拉为他的同胞比尤尔斯（即生活在法国的第二代北非人）所创作的连环画《诗琴》，1983年版。它描述了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移民劳工卡迪尔的故事。妇女在他所属的两种文化中的不同地位从图中清晰可见。



穆斯林对西方的反应有两大内容：拒绝西方的功利主义，拒绝西方人对待妇女的态度。图中展示的正是这种厌恶和排斥的表情。本图的作者侯赛因·霍斯罗杰尔迪（1957年出生，毕业于德黑兰大学美术学院）受到了这一最终导致伊朗革命的拒斥精神的熏陶。图中的西方人被刻画成一个对现实世界浑然不顾、置若罔闻，而一门心思只想着钞票和性的人。这幅图的名字叫“地球上的腐化者”。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发动革命以及巩固其成果的正是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人群。

斯曼、萨法维或莫卧儿宫廷这一层次上的穆斯林，对西方的兴趣增加了。他们对其战争的技术尤感兴趣，但是对欧洲的艺术、建筑，乃至宗教同样也有兴趣。但是在清真寺和集市这个层次上的穆斯林对欧洲仍然是漠不关心的。

从19世纪起，穆斯林越来越不得不注意西方。旧有的一些看法依然存在，但也产生一些新的看法。在欧洲列强支持下，传教士们出现在穆斯林的土地上，这意味着仅仅是让基督教徒作为异教徒离开已经不够了；印度北部的穆斯林起而发动进攻，就他们的宗教信仰同传教士进行辩论，并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学说令人难以置信和权威性著作已经腐朽为据，展开现代穆斯林对基督教的批判。但与此同时，占统治地位的精英们发现他们自己不得不赞美西方的军事力量和物质成就。1846年摩洛哥驻法国公使的秘书在参观法国军队检阅后宣称：“事情就这样地进行着，直到一切都已成过去，由于我们看到他们所拥有的压倒一切的力量和优势，使我们的心被怒火所吞噬……与我们伊斯兰的软弱无力相对照，他们是何等的信心十足，他们准备的情况是何等的叫人过目难忘，他们在国家的事务上是何等的游刃有余，他们的法律是何等的严格，他们在战争中是何等的有本领。”但是从赞美转到愤恨以力服人的霸道行径，也仅是一箭之遥。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占领伊斯坦布尔，西方列强每向伊斯兰世界前进一步，都会将苦难更深地铭刻在穆斯林的心灵之中。

在20世纪，穆斯林对西方的看法就更为复杂了。基督教变得更像是盟友而不再是一种威胁；而同完全不信教的人相比，基督教的“异教徒”形象也稍逊一筹了。现在在不同宗教之间进行对话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例如基督教与伊朗的什叶派的神学家即可以像1992年在英国伯明翰那样，走到一起，并且找到大量共同的话题。对西方的赞美已经变得很广泛；世俗的穆斯林领导人为了让国家与社会强大到足以能够自立，一直在照搬西方的方法。极而言之，这可能意味着被迫采用西方的方法。比如，现代土耳其的创立者阿塔图尔克 xix 1927年在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即说过：“先生们，‘费兹’[①]作为愚昧、懒散、狂热、仇恨进步与文明的象征戴在我们民族的头上，必须废除它，以便在此地接受整个文明世界所使用的头饰，并以此表明土耳其民族在精神上和在其他方

① 圆桶形无边毡帽，亦称土耳其帽——译者。

面一样,并非与文明的社会生活背道而驰”。

正像可以预想的那样,一些穆斯林一直在怀疑西方进步的形式是否适合于穆斯林。印度诗人伊克巴尔[①](他简直就是当代的阿塔图尔克)宣称:“西方人已经失去了天国观念,他们追求的是肚子里的烈酒。”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道路都是错误的:“两者的灵魂都是急切而又偏狭的,它们都不了解真主,都在欺骗人类。”“它们一个是靠生产,另一个是靠收税,而人呢,则是夹在这两块石头之间的玻璃。”

20世纪下半叶在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支配下,穆斯林对西方的态度发展成为对西方进步模式的坚决抵制。伊朗革命的理论家阿里·沙里亚提告诫说:“来吧朋友们,让我们离开欧洲吧;让我们停止对欧洲的这种令人生厌的愚蠢的模仿吧。让我们抛掉这个口口声声讲人权,却时时处处践踏人的欧洲吧”。在进行这种抵制的同时,因看到各国穆斯林受到西方的欺负而产生的痛苦也在加深。1964年伊朗议会为了换取2亿美元的贷款而给美国公民以治外法权,阿亚图拉·霍梅尼怒吼道“他们已经把伊朗人降到了不如美国狗的地位”,他喊出了在西方从1882年炮轰亚历山大到1991年发动海湾战争所施加的欺凌下,一直感到无能为力的所有穆斯林的心声。

互动与相互依存

伊斯兰与西方人之间这种老套的、兵戎相见的历史是不幸的,不幸之一即在于鼓励彼此相互隔绝、互不知晓。穆斯林和西方人对他们之间到底有多少共同点,以及他们彼此获益于对方多少,知之甚少。

其实他们拥有共同的宗教之根。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基督教徒信仰一个上帝。《古兰经》里提到的28位先知中,有21位也在基督教的《圣经》中出现。穆斯林像基督教徒一样熟悉雅各[②]、约瑟[③]和约伯。《古兰经》明确地承认亚伯拉罕[④]的手迹、摩西的托拉[⑤]、大卫[⑥]的《诗篇》以及耶稣的福音为真主启示之作。同一位天使,即到圣母玛丽亚那里宣布自己使命的报喜天使吉卜利勒[⑦],也到穆罕默德那里,告诉他,让他背诵《古兰经》。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犹 [xx]

① 伊克巴尔(1873~1938年)是巴基斯坦诗人、哲学家,认为在当时的印度,伊斯兰教徒是单独的民族与文化单位。曾从事伊斯兰教改革运动,1930年任穆斯林联盟主席,著有《伊斯兰宗教思想的重建》等——译者。

② 《圣经·旧约全书》中的称呼,又译雅库布,《古兰经》中称叶尔孤白。是古代先知之一,系先知易卜拉欣之孙。穆斯林经学家认为不宜将雅各与叶尔孤白等同——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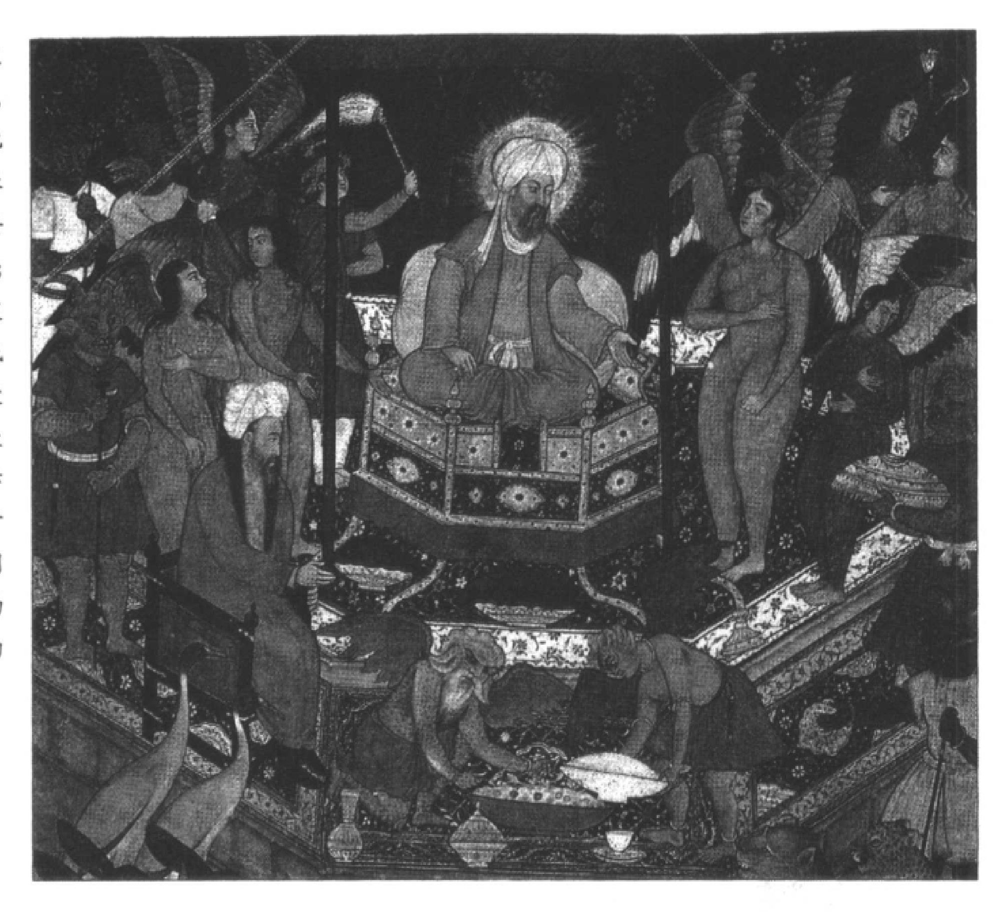
③ 《圣经·旧约全书》中的称呼,先知叶尔孤白之子,中译《古兰经》中称优素福——译者。

④ 《圣经·旧约全书》中的称呼,《古兰经》中称易卜拉欣,是安拉的六大使者之一——译者。

⑤ 《圣经·旧约全书》开头五篇,是犹太教圣经的全部经文——译者。

⑥ 古代以色列国王——译者。

⑦ 又译加百列——译者。



这幅画选自为莫卧儿皇帝阿克巴所制作的零散手稿，它突出了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共同信仰的一些先知。帐篷顶上的波斯诗句写道：“要有雅各的仁慈，约瑟的镇定；要有约翰（浸礼会教派）的虔敬，所罗门的威权。”在帐篷底下，所罗门（苏莱曼）坐着接受臣民的景仰，并听着他左边美丽灵巧的戴胜鸟向他报告示巴女王即将来临的消息。对于穆斯林而言，所罗门是完美国王的象征，他统辖着人类和动物，以及各种自然和超自然的力量。

太教徒都认为亚伯拉罕(易卜拉欣)是接受启示的第一位使者。穆斯林的世系追溯到易卜拉欣的仆妻哈哲尔所生的儿子伊斯玛仪，而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则追溯到亚伯拉罕合法妻子萨拉所生的儿子。穆斯林尊耶稣为先知，尊玛丽亚为耶稣的圣洁母亲；他们承认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义的责任，也预期有审判日以及随之而产生的上天堂或下地狱的结果。主要的区别是穆斯林不承认耶稣是神，认为《古兰经》是完美的口传预言书，认为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由于允许人为的干预而使预言被扭曲。

此外二者在认知方面也有共同的根。人们知之甚少的是，伟大的希腊学术的遗产在伊斯兰世界与在西方一样都得到了爱护。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及其后继的详细阐述者斯多葛派、毕达哥拉斯信徒、新柏拉图主义者等的著作都是穆斯林所求之若渴的，它们对穆斯林神学、玄学以及政治等方面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直至20世纪，柏拉图对伊斯兰政治思想的影响仍然是十分明显的，尽管到现在，伊斯兰某些传统教派在提到亚里士多德时还只是称他为“第一位教师”。穆斯林大大发扬了希腊在数学、天文学、光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欧几里得、阿基米德或托勒密的名字所代表的科学成就对穆斯林，如 xxi 同对任何西方人一样，也引起了回响。同样，穆斯林也发展了格林的医学体系，即使是到了现在，在南亚仍在实施这个体系，它们被称做“尤奈尼提伯”，或希腊医学。

由于穆斯林吸收并珍惜这一古典文明的伟大遗产，因而能够将这一古典文明的伟大遗产所带来的益处以及他们自己所创建的许多成果传播到西方。的确，中世纪的欧洲受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影响是深刻的，尽管要精确地说影响的范围有多大还是一个存在争论的问题。在拜占庭帝国时代这种影响的途径较少，到伊斯兰西西里时期要多些，到伊斯兰西班牙时期便更多了。欧洲十字军征讨后发展起来的地中海贸易网和国际交往也有一定的作用。具有这种影响的主要时间段是从 11 到 13 世纪。在这一时期，在西西里、巴塞罗纳、托莱多和塞维利亚出现了翻译阿拉伯文本的著名中心。这意味着希腊在数学、天文学、光学、占星学、炼金术、自然史、博物学、地理学、医学、哲学、神学和神秘主义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穆斯林对它们的各种诠释，进入了西方世界。谈到对中世纪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有两个穆斯林的名字较为突出：一位是阿维森纳（伊本·西拿），他的新柏拉图主义为基督教神秘主义者所渴求，而专业知识则为从阿奎纳斯到邓斯·斯科塔斯等许多学者所采用；另一位是阿威罗伊（伊本·鲁什德），直到 16 世纪末，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评述一直是进行争论和做学问的原始资料。

伊斯兰世界在物质文化方面对西方也是有影响的。在整个中世纪以及在现代欧洲世界的早期，可以看到穆斯林在纺织、地毯、金属制品、玻璃制

西方世界中的穆斯林：英国中北部设菲尔德小块副业地的主人展示他们的劳动成果。在 1950 和 1960 年代，许多穆斯林移居到英国，现在他们已经站稳了脚跟，并对英国生活的许多领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样，在法国、德国、美国和西方其他社会里，也有许多这样的穆斯林，其总人数超过 2000 万。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以前，沙特阿拉伯的法赫德国王和美国驻海湾部队指挥官诺尔曼·斯瓦茨科普夫将军一起，检阅来自16个国家的地面部队。1990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和占领以及由此引起的对西方石油供应和海湾国家政权的威胁，极大地加强了西方同这一部分穆斯林世界的相互依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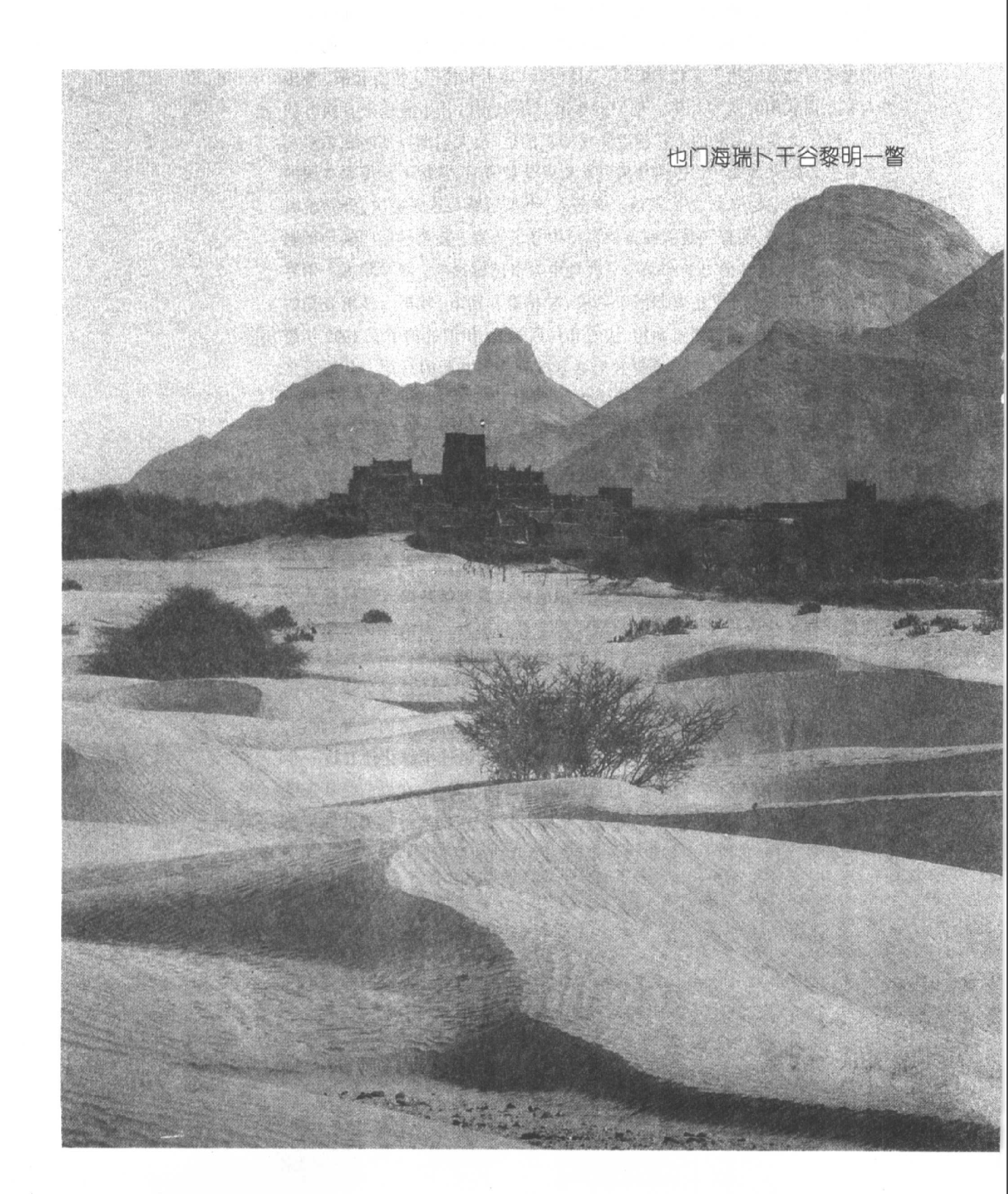
造、袖珍绘画以及装订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丝绸和纸是经穆斯林之手传到西方的。糖类作物、棉花、柑橘也是经穆斯林之手传到西方的。而且，许多与贸易有关的阿拉伯词汇也进入了欧洲的语言，从货栈（英文为magazine，或法文的magazin，阿拉伯语音译为makhazin）到traffic（阿拉伯语音译为tafric，分配之意），例子很多。

西班牙是欧洲受穆斯林影响较大的地区之一，从地名到天主教神秘主义，每样事物的发展都是在穆斯林存在于西班牙的700年间定型的。而且还应当提到，近来学术界也在着手寻找穆斯林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来源以及大学发展中的影响。迄今为止，业已开始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根源中，寻找传统伊斯兰的影响。皮柯·戴拉·米兰多拉在15世纪末作《人的尊严》的演讲时，开篇即称："尊敬的教士们，我读到过：当阿拉伯人阿布达拉被问及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最令他惊奇时……他说没有什么比人更奇妙的了。"

另一方面，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伊斯兰世界也受到西方的渗透和塑造，xxii 同西方所受伊斯兰世界的影响相比，伊斯兰世界受西方的影响要大得多。穆斯林国家的边界多半是西方列强规定的，人民生活在其中的现代国家也是西方列强塑造的。西方列强还把穆斯林各国的经济与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结合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它们建立起全新的生产与交换的世界，这个世界完全遮盖了穆斯林们原来已有的1000多年的世界——由手工生产、集市、穆斯林培育的相互团结以及伊斯兰机构组成的，依赖于穆斯林的世界。穆斯林开始生

存于按照西方模式塑造的新的城市景色之中——有宽阔的街道、前脸装着玻璃的商店、汽车运输的轰鸣，以及郊区的公寓、小屋和贫民窟。他们的生活开始用来自西方的物质文化（圆珠笔、自行车、桌子和椅子）装备起来，很多男人穿上西式的衬衣和长裤。他们的头脑与认识中已开始灌进来自西方的知识。现代民族国家新的学校制度注重知识的传授，人们期许那些知识里边会含有西方强盛的秘密。穆斯林精英阶层接受教育时，常常不是使用本国的语言，而是使用英语、法语或俄语。许多人，不仅是精英这一层次，开始脱离本国治学的传统，而首先是从西方的资料中寻求答案。甚至是那些领导抵制西方文化的人，也从西方的知识中寻找理由为自己做论据。穆罕默德·伊克巴尔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尼采、柏格森和勒南，阿里·沙里亚提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萨特、法农和马西尼翁。伊朗的神学家 1992 年赴 xxiii 伯明翰访问时之所以能够与基督教对话者找到许多共同的话题，其原因之一是他们都已沉浸在西方理性的传统之中。他们不仅知晓希腊古典哲学家，而且了解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也了解像巴塞、蒂里奇和巴尔特曼这样的基督教神学家的著作。

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相互之间不仅深切地关联着，而且越来越相互依赖。有两千多万穆斯林生活在西方，他们认为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应尊重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这非常自然。另一方面，西方在伊斯兰世界也拥有重大的经济利益与战略利益，正像它以战争回应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所表明的那样。这种相互依赖也不只限于穆斯林与西方。中国也有穆斯林社团，其人数与在西方的穆斯林人数一样众多，在希望尊重他们的观点这一点上，也不亚于在西方的情形。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日本在它的驻外机构中约有 100 位训练有素的阿拉伯问题专家，这说明日本对中东重视的程度。而且，在当今这个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媒体与交通的迅速全球化还在进一步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我们全都可以注视着彼此的世界，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这种能力使我们取得下列谅解变得十分关键，即透过偏见的纱幕与文化的差异，抓住我们大家都可以分享的人类共同的思想脉络。



也门海瑞卜干谷黎明一瞥

目　录

序 / 1

前言 / 3

导言 / 4

第一编

第一章　伊斯兰在世界上的兴起 / 2

第二章　伊斯兰世界体系的出现(1000～1500年) / 33

第三章　欧洲扩张时期的伊斯兰世界(1500～1800年) / 64

第四章　西方统治时期的伊斯兰世界(1800年至今) / 92

第二编

第五章　穆斯林社会的经济 / 124

第六章　穆斯林社会的规范 / 161

第七章　穆斯林社会的认知及其传承与发展 / 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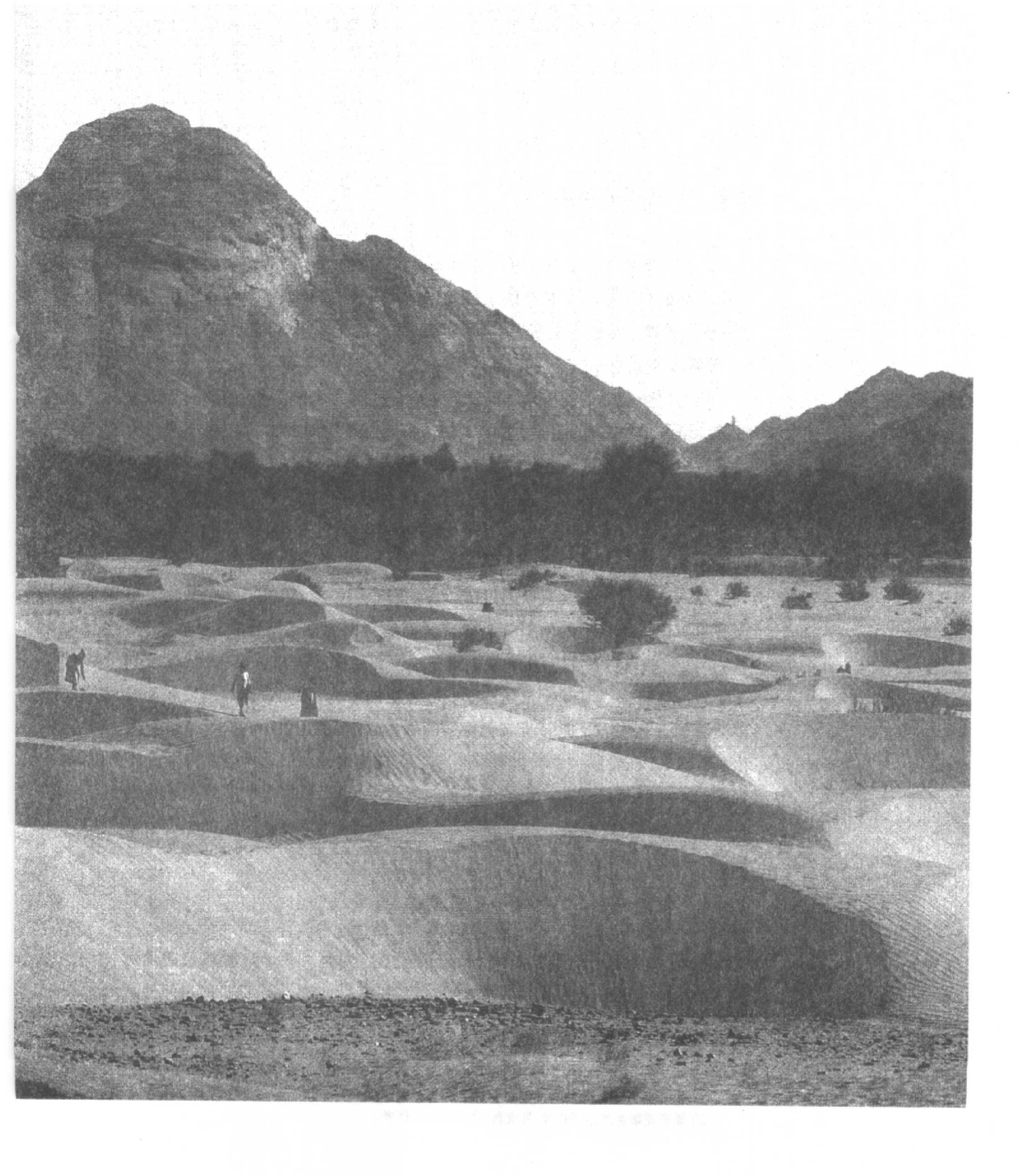
第八章　穆斯林社会的艺术表现 / 243

结束语 / 283

附　录 / 299

译后记 / 325

第一编



第一章　伊斯兰在世界上的兴起

伊斯兰产生前的中东

[2] 在公元600年的时候，可以肯定地说，阿拉伯牧民以一种新宗教的名义征服中东的机会是非常渺茫的，以致没有人会以为这种事情真的会发生。总的说来，伊斯兰出现于世界是一种非预期的发展，它出现的原因仍然鲜为人知，理解起来就更不容易了。

作为伊斯兰摇篮的中东当时被两大帝国所分割：即伊朗[①]的萨珊帝国和希腊－罗马的拜占庭帝国。这两大帝国控制着从中亚到西班牙南部的广大地域。伊朗人与希腊人已做了大约900年的对手，到了这个时候还没有迹象表明它们已打算不再做对手。相反，它们彼此之间出现了新的激烈的竞争。然而这两个大国谁也不能使对方垮台，尽管它们彼此交战频繁，但也并非总是试图毁灭对方。

拜占庭是一个纯基督教的帝国。在萨珊帝国一方，居主导地位的宗教是大多数伊朗人所信奉的琐罗亚斯德教[②]；有些伊朗人信奉基督教、摩尼教、佛教（伊朗东部）；非伊朗人几乎从不信奉琐罗亚斯德教。在伊拉克，犹太教和基督教占优势。当时基督教是西亚发展最快的宗教，萨珊帝国的基督教徒希望萨珊国王有朝一日能够步君士坦丁的后尘，后者正是由于在公元4世纪皈依基督教，才在希腊－罗马世界获得自己正式的地位的。这种希望并不是不合理的。那时基督教在这两大帝国的边界之外也得到了扩展，在阿拉伯半岛正在取得进展，设想整个中东最终都会成为基督教世界，应该说还是合乎情理的。

阿拉伯人

[3] 然而一切这类合理的设想都被中东一个广大而又处于边缘地位的地区的居民——阿拉伯人给摧毁了。这个地区由阿拉伯半岛及其向北部延伸的叙

---

① 今伊朗原称波斯，1935年改国名为伊朗——译者。

② 琐罗亚斯德教亦译祆教、拜火教、波斯教——译者。

利亚沙漠所构成，即后者得以从中延伸的“阿拉比亚”[①]地区。本地区由于干旱成为边缘地区。只有在阿拉伯半岛的南部、阿曼以及稀疏分布的绿洲才能从事农耕，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阿拉伯半岛的中东部地区；其他地区仅适宜游牧：在沙漠深处有植被的地方可以饲养骆驼，在沙漠边缘可以饲养羊和山羊。栖息于本地区的居民多半是贫困的，只有局部的人口是流动的，因而，不适宜于建构复杂的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



公元前一世纪，阿拉伯半岛南部男性殉葬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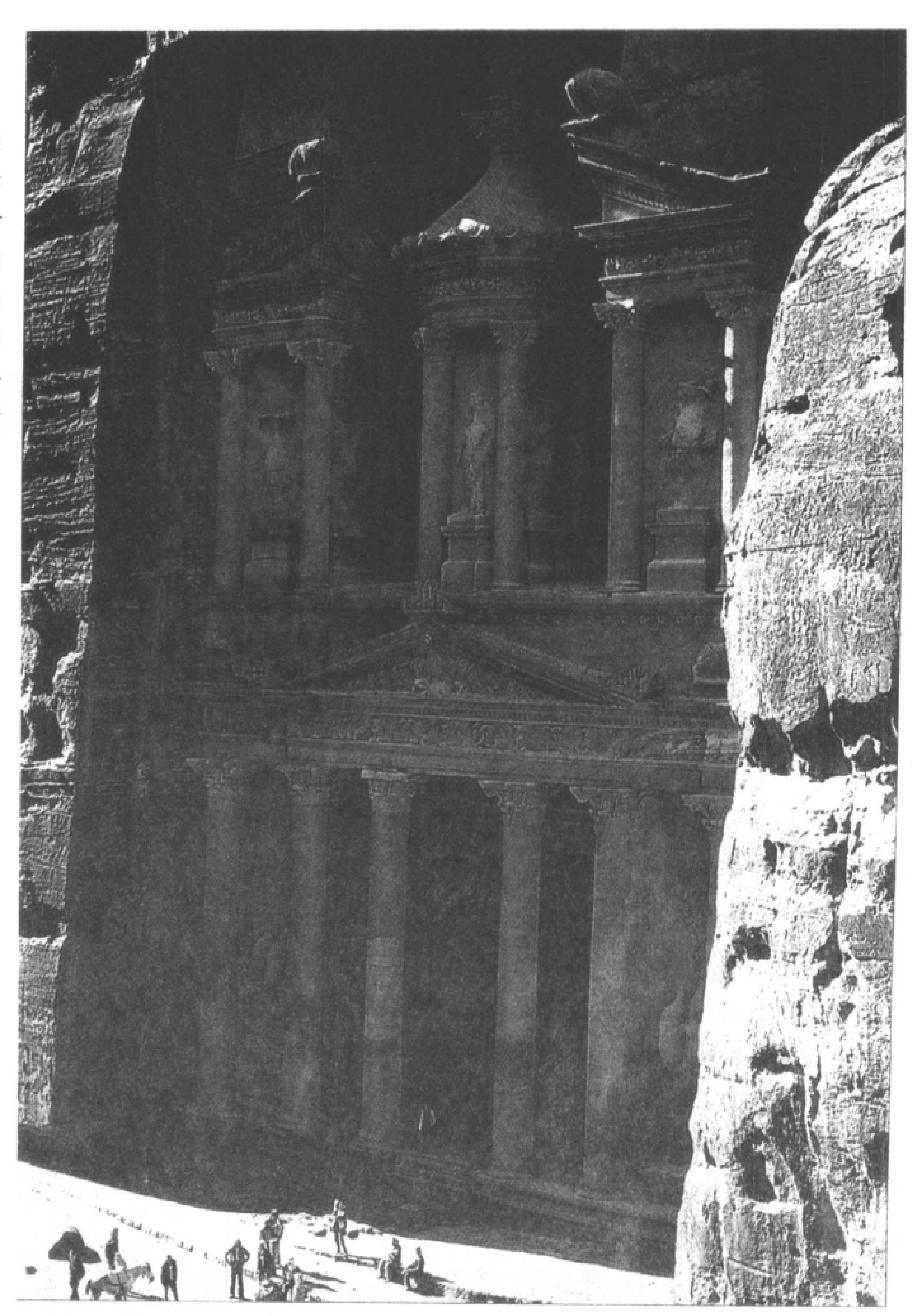
不过也有一些例外。古代阿拉伯半岛南部或许是从公元前大约500年起，曾经形成过几个王国。但是到了公元6世纪，这些王国就都销声匿迹了，这时的阿拉伯半岛南部陷入外国人的控制之下，先是埃塞俄比亚人，后来是伊朗人。在阿拉伯半岛北部，也不时出现过小的王国。佩特拉（今约旦境内）的奈伯特人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06年借助于贸易而崛起，正像商队城市帕尔米拉（今叙利亚境内）所经历过的那样。后者在公元273年泽诺比娅反叛之后被罗马人镇压。拜占庭人和萨珊人为了获得兵源，对公元6世纪统治叙利亚沙漠的加萨尼人和拉赫米德人国王采取维护的态度。作为拜占庭帝国和萨珊帝国臣民生活的阿拉伯人也大有人在：其中有一位阿拉伯人走从军之路获得高升，成为公元244～249年在位的罗马皇帝菲利普（阿拉伯人）[②]。但对大多数阿拉伯人来说，无国属于常态。

所有的阿拉伯人，不管是定居的，还是游牧的，都组织在被视为血缘集团的单位——部落之中。他们是从部落那里，而不是从国家那里得到安全的。男子的生命由他的男性亲属保护，他的男性亲属有责任在该男子遇到麻烦时支持他，如果该男子被杀害或被打伤，那么他的男性亲属有责任为他复仇或为他索赔，这样别人会在伤害他的问题上考虑再三；该男子也有责任为他的男性亲属做同样的事情。女子的生命由她的女性亲属保护，然而该女子并没有相对应的责任，因而是一个受赡养者。大多数部落都有不属于部落民的被保护人，如奴隶、自由民、手工业者、行商等，他们常常来自阿拉伯半岛以外的地区，不管他们具有什么样的血统，都不被看做是阿拉伯人，因为他们要依靠别人的保护。

部落民对他们保卫自身和自己家属的能力感到非常自豪，他们经常在诗歌中夸耀自己的力量，愉悦自己人，同时警告潜在的掠夺者。受到赞扬的还有打败别的部落民的能力，在抢夺别的部落的骆驼、劫持他们的妇女、杀掉他们的男人、割开依附于他们的奴隶的鼻子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这种能力。受别人支配是可耻的，正如一首诗中所说的那样：“会降临到一个人头

① 旧译阿拉比亚，现在一般译为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半岛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广义指狭义阿拉伯半岛加上其向北延伸的叙利亚沙漠部分，本书译作阿拉比亚时一般是指广义阿拉伯半岛——译者。

② “菲利普（阿拉伯人）”即“菲利普（M·尤利乌斯·菲利普斯）”——译者。



阿拉伯半岛北部时常出现一些小王国。图中是现代约旦境内佩特拉从公元前4世纪一直存续到公元106年的奈伯特人王国，它以贸易为本。从现存依然十分壮观的石庙和石墓中，仍清晰可见当年的富庶；此石凿建筑即人们所说的“国库”。

上、而且在这之后任何福祉都不会再来的最大的邪恶，是他们弯下了脖子”，“乌凯尔人是塔伊姆人的奴隶，而塔伊姆人也是奴隶自身；如果有什么人说，‘离开饮水槽’，他们于是就离开”，别人会嘲笑他们。一个人如果只是一味屈从而不能自立，便会被当作“奴隶”赶走，而不管他们是不是非自由人、部落社会中的弱者，还是国家的平民。

阿拉伯骆驼饲养人的存在在大约公元前1000年的《圣经》里便可首先得到证实；从公元前8世纪起，在亚述的记载中把他们称做阿拉伯人，以后还常常以阿拉伯人或其他的称呼提到他们。在很多地方对他们的描绘是一以贯之

的同一形象。他们是掠夺成性的，正如《圣经》在提到大约公元前1000年的情景时所说的："每逢以色列人播种之后，米甸人……就上来攻打他们……毁坏地产……他们总是带着[4]家畜和帐篷上来，多如蝗虫；他们来的人和骆驼多得难计其数。"① 一位罗马的指挥官在大约1350年以后说过："萨拉森人②无论是作为朋友还是敌人，我们对他们从未感到称心合意过。他们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损耗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无论是什么东西。他们像是贪婪的鸢，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从高处看见了可以捕食的动物，便突然猛扑过去，将它抓住，然后……迅速飞走。"他们没有统治者，萨尔贡二世（公元前722～705年在位）③指出："稀疏的阿拉伯人住在沙漠之中，既不知道监工，也不知道官员。"那位罗马指挥官还谈到："全都一样的是，大家都是地位平等的勇士，半裸体……在许多方面要借助于快马和纤弱的骆驼。"在穆斯林征服各地后收集的部落诗歌中，阿拉伯人对自己有类似的描绘，有一首诗夸耀说"在我们的骆驼鞍上，在我们的身后，我们带着他们的女俘虏，也带着夺来的骆驼"；另一首附和道"为了给我们的被杀者复仇，我们杀死他们同等多的人，带走不计其数的带上脚镣的囚犯"，这两首诗都提到了对其他部落的掠夺。还有一首诗提到掠夺帝国的臣民："希马西没有保住他的尊严，他倒像是肥沃新月地带的当地人，一旦受到奴役便耐着性子忍受。"阿拉伯人不像是一种新的世界宗教的传播者。

定居在内盖夫内萨纳的阿拉伯人已完全"拜占庭化"，但从他们的名字很容易知道他们所属的种族。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所有的铭文和文件史料都是用希腊文撰写的。图中所示即摘自6世纪的一名基督徒伊本·沙特为保护两位圣徒而写的诉状。这些阿拉伯[5]人也仰慕拉丁文化，他们采用了诸如"弗莱维厄斯·乌拜"之类的名字，甚至还试图阅读维吉尔④的拉丁文原作，在内萨纳出土的一部名为《埃涅伊德》⑤诗稿中的拉丁—希腊词汇表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推测，假如是这部分阿拉伯人领导伊斯兰教的征服战争，那么晚近的古代文明是否还能像从前一样被较多地延续下来。

实际上，尽管他们具有战斗精神和机动性，但他们也不像是能够征服世界的人，原因是他们人数不多，而且明显地不能维持大规模的政治组织。他们几乎不能像匈奴人、突厥人、阿瓦尔人以及中亚其他部落民那样使拜占庭人和伊朗人感到惊恐，那些人都有非常著名的政治组织史与征服史。阿拉伯人仅仅是掠夺者：到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在阿拉比亚呆了大约1600年，没有进行过大的征服，所以设想他们不会进行大的征服应该说还是合理的。

然而在公元7世纪30年代他们突然开始同时侵犯拜占庭帝国和萨珊帝国，使前者受到严重破坏，使后者被摧毁，他们声称真主已将真理启示给了他们。他们的新信仰不仅保存下来，而且得到传播，并迅速形成新的制度、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简言之，形成了新的文明。到了公元800年尘埃落定时，

① 圣经引文译文见《旧约》士师记第六章。文中提到的"米甸人"亦译"米德杨人"、"米堤亚人"，系指古代居住在亚喀巴湾东部地区的闪米特游民，公元前11世纪为希伯来人征服——译者。

② 是公元最初3个世纪古典作家对西奈地区阿拉伯人的称呼，中古时成为基督徒对中东地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泛称——译者。

③ 亚述极盛时期的国王——译者。

④ 古罗马诗人——译者。

⑤ 维吉尔作的叙事诗——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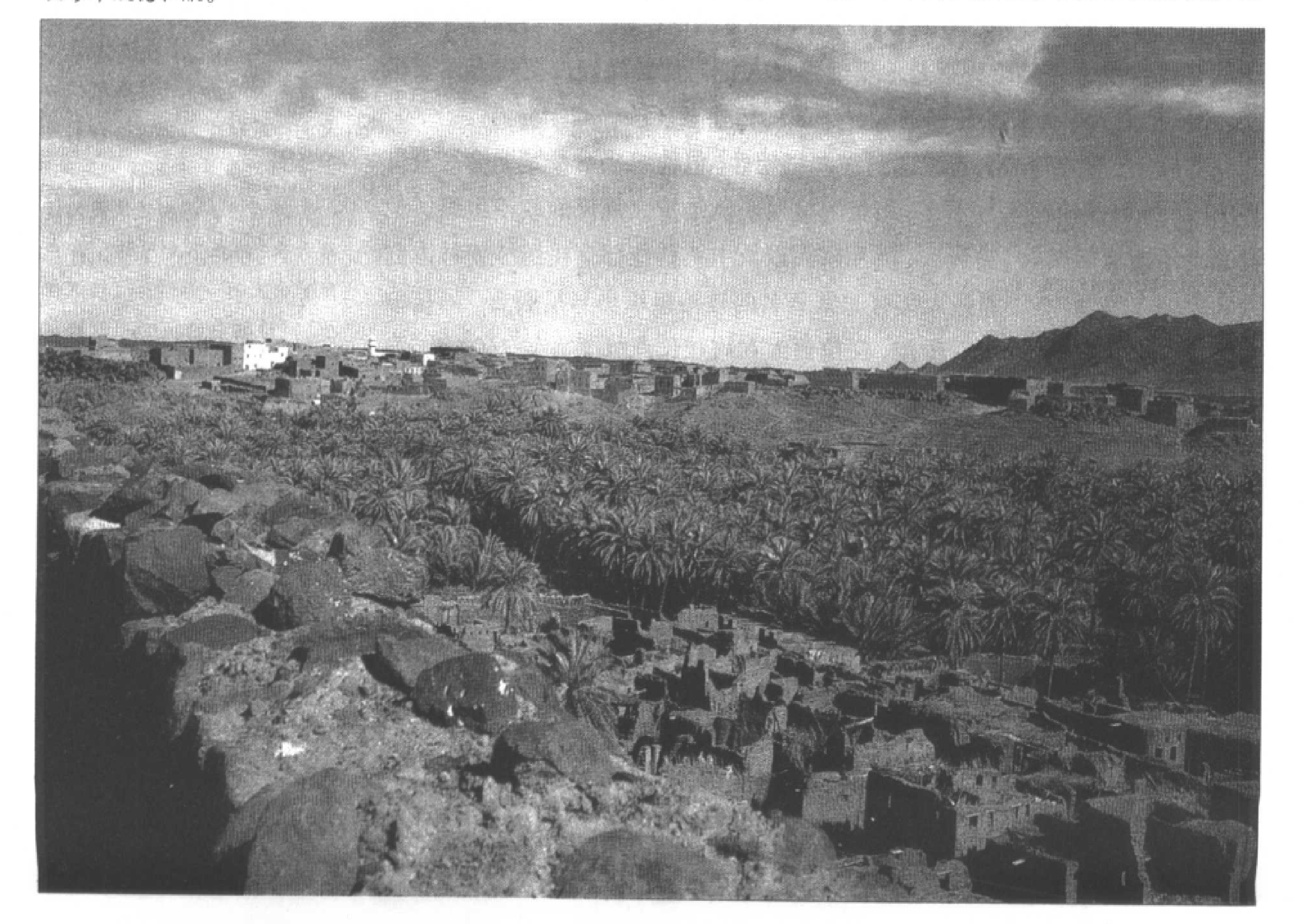
中东已经面目全非了。

伊斯兰的兴起

先知

先知是所有这些变化的催化剂。依照传统,先知的历史是由弟子们讲述出来的。穆罕默德大约在公元570年生于阿拉伯半岛西部商业城市麦加,这是他所属的古莱什部落居住的地方。据说这也是朝觐之地(那里有知名的克尔白圣寺)。穆罕默德6岁成为孤儿,由祖父和伯父抚养成人,从事商业活动,后与赫蒂彻结婚。赫蒂彻是一个寡妇,穆罕默德曾作为代理人受雇于她,她给他生了好几个孩子。穆罕默德大约在40岁的时候,获得了一种体验,这改变了他后来的生活。有一种说法是,在一个他前往潜修冥想的山洞里,他被来自虚空的说话声惊住了:“穆罕默德,你是真主的使者。”他感到惶恐,在他想跳下山去的时候,说话者说出了自己的名字:“穆罕默德,我是吉卜利勒,你是真主的使者,背诵吧!”他茫然地回问:“我背诵什么?”于是吉卜利勒紧拥住他,几乎使他透不过气来,然后命令他背诵经文,这就是《古兰经》第96章开头的部分。起先,他认为自己已陷入狂乱,但是没多久,他认为他所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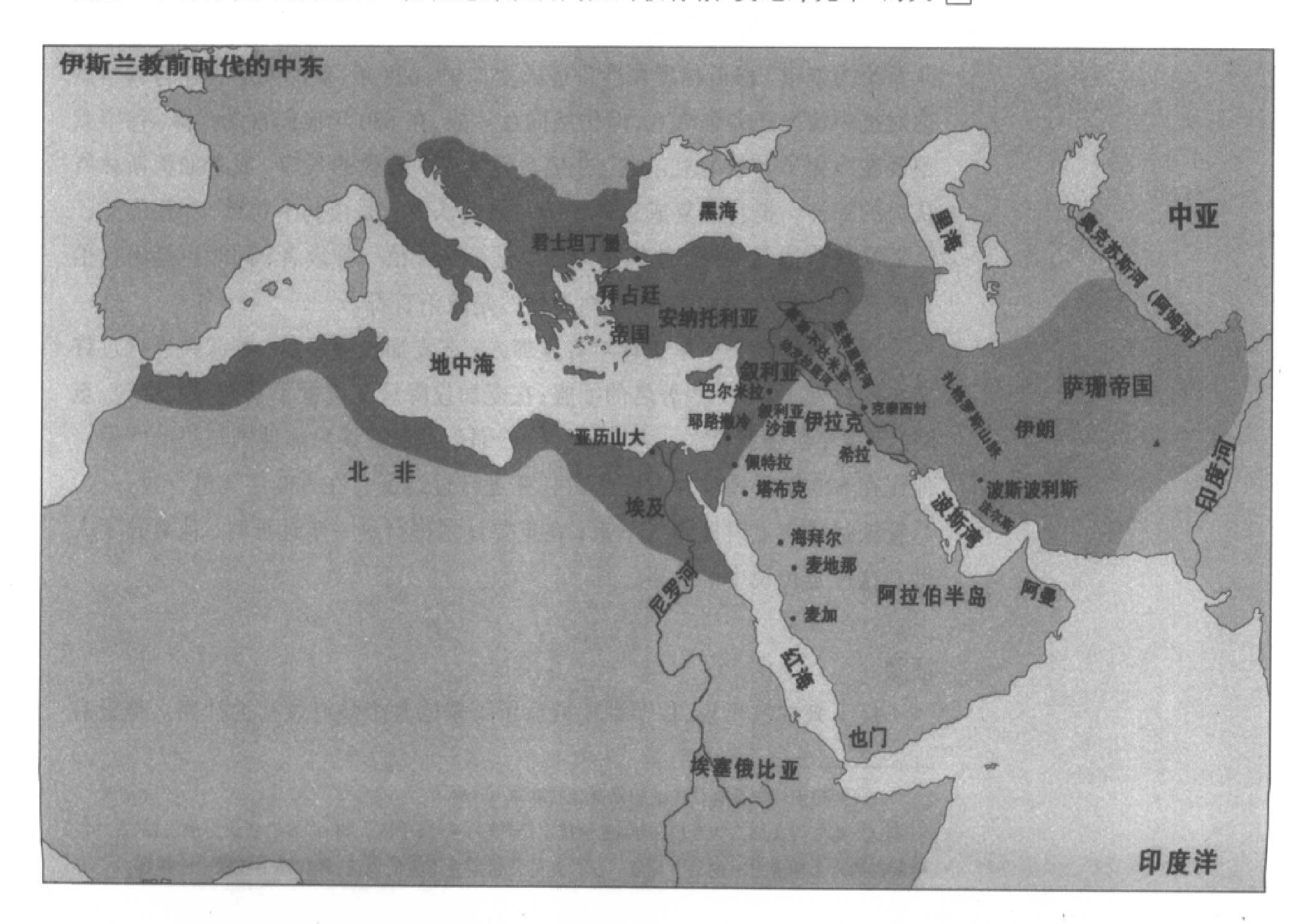
海拜尔,沙漠中的一块绿洲,位于麦地那以北约95英里处。尽管麦加一向以其土地贫瘠著称,但前伊斯兰时代的麦地那(旧称雅斯里卜)可能有点像本图所示的这种景象。在伊斯兰教兴起以前,海拜尔曾是犹太人聚居的地方。628年被穆罕默德征服。



到的幻象来自上苍。从那以后吉卜利勒定期地向他传授《古兰经》的各章节，直至他去世。

穆罕默德开始传教，先是传向朋友和亲属，然后才较为公开。他博得一些人的皈依，但也招致麦加多数人的反对——他们属于异教，反对他的一神教启示。异教徒进行刁难，让他的弟子们做起事来举步维艰，以致他不得不派一些人到埃塞俄比亚去，同时在阿拉伯半岛寻找能够建立自己社团的地方。最后，他和来自雅斯里卜的一些阿拉伯部落民不期而遇。雅斯里卜是在麦加以北大约200英里的一个农业定居区，混居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因长期失和而分道扬镳。这些阿拉伯部落民很熟悉他们邻居犹太人的一神教，他们认为穆罕默德的启示明白易懂，于是邀请他到雅斯里卜来，希望他能恢复本绿洲的秩序。经过漫长的谈判之后，他和他的弟子们于622年离开了麦加。后来这就被定为穆斯林历法的起点。雅斯里卜也改名为更为闻名的麦地那，即先知之城。

这一迁徙（希吉来）是一个转折点，因为穆斯林从此有了自己的社团组织。过去在麦加时，他们遵照与异教徒一样的规则生活，也和异教徒一样属于部落的成员，但是现在，穆罕默德在迁徙后不久所起草的文件中宣布：“他们是一个排斥他人的社团。”他在这部众所周知的被称做“麦地那宪章”的文



件中，确定了新社团（称作乌玛[1]）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外人之间的关系，规定“你们无论因何事发生歧义争端，都要服从真主和使者穆罕默德的判断裁决”。换句话说，他起着仲裁者的作用。伊斯兰诞生于无国家的环境，它不可能只是简单地将信徒组织到社团中来进行礼拜，它还必须保护他们。乌玛必须同时既是会聚的人群，又是国家；而这个胚胎国家便是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建的国家。

随后的一些年份，对内外敌人采取暴力行动占了主导地位，新的社团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不得不这样做。内部的敌人主要是犹太人。起初，穆罕默德与麦地那犹太人的关系还算是密切的：穆斯林朝着耶路撒冷的方向祈祷，那也是犹太教中心圣殿的所在地，犹太人也与“麦地那宪章”规定的信徒乌玛“在一起”建立乌玛，或是在“麦地那宪章”规定的信徒乌玛的旁边建立乌玛，“麦地那宪章”规定，他们也要与信徒并肩战斗。但是据说在希吉来（迁徙）的第二年，穆罕默德因为改变祈祷的方向而与犹太人决裂，这一年他将祈祷的方向改为麦加，伊斯兰从此就有了自己的中心圣殿。由于麦加控制在异教徒手中，穆罕默德必须征服它。他在试图这样做的同时，驱逐了犹太人。624年他在白德尔赢得对麦加人首战的胜利，于是赶走了一个犹太人部落；625年麦加人在伍侯德打败了穆罕默德，于是他又赶走了另一个犹太人部落；当 [8] 627年麦加人攻打麦地那时，他破坏了最后一个犹太人部落，男子被杀，妇女儿童沦为奴隶。穆斯林现在准备进入麦加了。628年，麦加人尽管在与穆罕默德对抗中情况还差强人意，但仍然同意休战，在630年他们自动投降。穆罕默德现在净化了异教的克尔白，并把它创建成一神教的圣寺，或者如穆斯林所认为的那样，把它恢复成这种样子：他们认为它是由易卜拉欣[2]和他的儿子易斯马仪建造起来的，他们认为后者是第一位信一神教者，同时也是阿拉伯人的祖先。进入麦加之后，麦地那依然是政治首都。

军事活动也不单单是针对着麦加人：在麦加投降以前，曾派兵进行过许多小的讨伐，也有一些著名的征服；在麦加投降后又进行了其他一些征讨。至632年穆罕默德辞世时，大部分阿拉伯部落都在商谈参加他的乌玛的问题。他还在629年派兵对拜占庭的叙利亚进行过远征，在630年又进行过一次，尽管抵达塔布克时即停了下来；在正要计划进行进一步远征时，他离开了人世。这便是传说中的故事。

征服

接下来的故事说，穆罕默德死后留下来的是个没有领袖的社团。他没有

[1] 阿拉伯语穆斯林社团或穆斯林公社之意——译者。

[2] 此处英文原文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旧约圣经》中的人物。许多学者认为他就是《古兰经》中所讲的六大使者之一的易卜拉欣。所以此处依伊斯兰学者的说法，译作易卜拉欣——译者。

留下在世的子嗣，也没有指定继承人，甚至也没有明示替代他的应是何种类型的领导：是国王、教士、法官，还是有政务会的政府。由于穆斯林接受了艾布·伯克尔作为具有哈里发头衔（真主使者的继承者或真主的代理人）的社团领袖（伊玛目），所以实际上选择了君主制，但这并不是王权制。艾布·伯克尔是与穆罕默德一起迁徙到麦地那的，也是古莱什部落的成员。

艾布·伯克尔（632~634年在位）是以派兵对拜占庭叙利亚进行先知穆罕默德曾经计划进行的远征而开始他的统治的。这样做是有胆识的，因为穆罕默德的政治组织正在开始解体；许多部落认为，在穆罕默德去世后，它们乌玛成员的地位也就终止了，其他部落以树起自己的先知进行抵制，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在今利雅得以南哈尼发绿洲中较为活跃的穆赛利迈。但是艾布·伯克尔成功地镇压了这些反叛，扩大并巩固了麦地那在阿拉伯半岛的统治。活动在伊拉克沙漠边缘的一个部落的首领听说了这一切，于是参加了麦地那的风险事业：633年穆斯林司令官哈立德·本·瓦利德被派往伊拉克，他会同部落首领进行袭击，经劝说，希拉城投了降。数量很少、组织也不稳定的穆斯林现在在两个超级大国的边缘开始了战争行动。

如果两个超级大国近来彼此没有处于战争状态，如果它们对新的对手有所了解，那它们或许会摧垮穆斯林的军队。629年穆罕默德派兵对叙利亚进行第一次远征时，萨珊人刚刚同意从叙利亚撤军，于是拜占庭人得以在以后的15年对叙利亚进行控制。即使如此，穆罕默德的远征还是被打败了；634 [9] 年萨珊人在伊拉克也打败了阿拉伯人。然而阿拉伯袭击者如此肆无忌惮地扰乱，终于给拜占庭人和萨珊人拉响了紧急警报，阿拉伯人重整旗鼓有目的的返回战场使他们感到吃惊。634年哈立德·本·瓦利德率领他的军队跨越叙利亚沙漠，以便与在拜占庭一侧的阿拉伯人会合，这是经过协调，可以将阿拉伯的机动性用于劫掠的一个范例。在这之后，通过634年在艾季纳代因、637年在雅穆克河的决定性战役，一步步地把叙利亚从拜占庭人手里夺了过来。

与此同时，麦地那的领导于637年集合了一支新的部队，用于征讨伊拉克。该军在卡迪西雅击溃萨珊人，于是将他们赶出伊拉克。由于萨珊首都忒息丰在伊拉克境内，伊朗人便失去了它的中央方位，而阿拉伯人却如此意外地得到了它。耶兹迪格德国王接着于642年又集合了一支军队，在扎格罗斯山的尼哈旺德与穆斯林作战；但是又被打败了。在这之后，穆斯林只遇到零星的抵抗，这当然难以阻止他们在伊朗挺进。

他们由于在大约639~641年占领了杰济拉（现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北部），并且推进到埃及，而在叙利亚继续得到成功，642年他们攻克了埃及。 [10] 656年当内战爆发、军事风险事业宣告中断的时候，他们在西部方向已扩展到北非，在东部方向扩展到呼罗珊。他们仅仅用了20年的时间即把两个超级

伊朗高原是一片极不适合阿拉伯人居住的地区，阿拉伯人没有在该地区大规模定居，这正是伊朗之所以没有“阿拉伯化”的原因之一。这幅图中呈现的是伊朗西南角的法尔斯(或称帕尔斯)山区，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珊王朝相继在那里兴起。希腊人称阿契美尼亚人为“波斯人”，因为他们来自帕尔斯，自那以后，由波斯人统治的国家就以波斯而闻名于世。然而，现在它的正式名称是伊朗，伊朗是一个古老的词汇，意指亚利安人。现代伊朗人仅用波斯语或法尔西[①]一词指代他们的语言。



大国弄得摇摇欲坠了。

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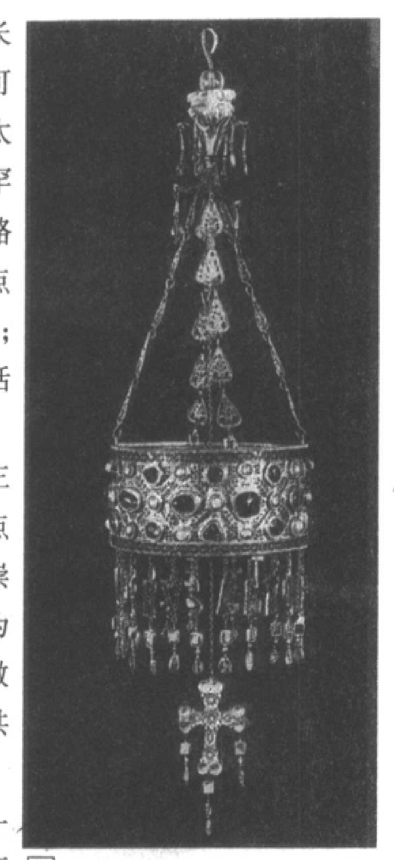
我们能够弄懂所有这一切的意思吗？穆罕默德显然是一位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然而他是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伊斯兰关于他的传说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关大约公元800年以前伊斯兰的惟一重要的文字资料是《古兰经》，现代伊斯兰学者一般认为它是穆罕默德本人口述教义的汇集。但是《古兰经》向我们阐述有关摩西(穆萨)、易卜拉欣及其他先知的内容较阐述穆罕默德的为多。这隐喻着，缺少关于穆罕默德的传说，很难弄懂那个时代的事件，这些传说永远都声称知道各种事件个中的含义，然而出现这些传说的时间只能追溯到大约公元800年。关于穆罕默德的标准传记是伊本·希沙姆(卒于833年)出版的伊本·伊沙克(卒于767年)的著作。后者的祖父是穆罕默德去世后被带入伊拉克的基督教战争囚徒。但是逃脱拘禁的基督教徒们早至7世纪30年代即开始写有关伊斯兰的东西：他们以及其他的迹象说明，伊本·伊沙克向我们所展现的穆罕默德，是希吉来(迁徙)之后的大约第4代人，而不是穆罕默德在世的那代人的看法。

① 英文为“Farsi”或“Farsee”，原指祆教经典上的波斯语，或萨珊王朝时代的波斯语。

特别是，伊斯兰较接近犹太教的时间可能比伊斯兰传说所承认的要长些。被归功于穆罕默德本人的以麦加取代耶路撒冷作为朝拜方向这一点，可能在他去世后才得以很好地实现，尽管同麦加人作战的结果干脆利落，犹太人之被消灭在麦加投降时达于顶点，这都带有改写教义的味道。如果在穆罕默德时代，耶路撒冷仍然是主要的圣所，那么穆罕默德决定征服的会是耶路撒冷而不是麦加（尽管他可能很清楚征服麦加也是重要的）。依传统的观点看来，征服麦加是他生涯中的顶点，而随后的大征服多少有些附属的性质；但是如果他实际宣讲征服巴勒斯坦，那么早期穆斯林接管叙利亚（广义包括巴勒斯坦）的决定便相对好理解些。

不管这件事情会是怎样，穆罕默德宣讲的一神教带有犹太人因反对三位一体而表现出来的不妥协性，他把它描述为他的人民祖传的信仰。这一点得到了普遍的赞同。他的一神教超越了部落的界限，呼唤阿拉伯人联合成崇拜同一真主、遵守同一法律和进行同一圣战的单一的共同体。阿拉伯人作为一个古代民族，拥有在部落社会中异乎寻常的文化同质。穆罕默德的一神教使宗教与他们内含的统一性结合起来，同时也向他们提供了政治组织和共同的目标。他宣讲的成果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

发生了什么让阿拉伯人接受了他启示[1]的事情？或许他们始终拥有以一神教的名义融合在一起的潜力，只不过需要穆罕默德作为催化剂。但似乎更可能的是，他们之所以接受穆罕默德的启示是超级大国的压力日益增大的结果。由于拜占庭和萨珊与印度的贸易都需要沿阿拉伯半岛海岸航行，两个超级大国都有控制其侧翼的兴趣。拜占庭人多半经过他们的附庸埃塞俄比亚和加萨尼人[2]间接摆布这些部落，但是萨珊人对阿拉伯半岛东部实行直接控制，并最终也对半岛的南部和中部实行直接控制。源自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造成作出政治回应的可能。然而一位宣讲者会使该半岛走向觉醒，则是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的。



11

对于阿拉伯人而言，王冠象征着非伊斯兰的王位，因而应该予以摈弃。相传曾有一位西班牙征服者的儿子雷塞斯温特（653～672年在位），娶了西哥特末代国王的遗孀为妻。她自愿立他为王，并坚持认为“除非加冕，否则国王就没有合法的王权”。尽管他一开始表示反对，认为“那不符合我们的宗教”，但很快妥协；可是，当他加冕和戴王冠的消息传开以后，他被人们指责皈依了基督教而后被杀害。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入乡随俗是多么危险，以及穆斯林（即便是在像西班牙这样一个偏远的行省）在抵御和自卫方面做得多么成功。

征服的社会

对穆斯林来说，征服是一种令人惊异且振奋的经历。一位诗人不无怀疑地惊呼：“哦，人们，你没见到波斯是怎样毁灭、它的居民是怎样受到羞辱的吗？他们已经变成放牧你的羊群的奴隶，仿佛他们的王国是一个梦。”后来的一位作者解释说：“我们同他一起出征……打着赤脚，光着身子，没有装备、没有力气、没有武器或者粮食，反对的是具有最强大的王权的国家、最显而易见的大国、最大数量的人、最稠密的人口，以及臣服其他国家的最巨大的

① 根据教义，启示是真主通过穆罕默德降示的——译者。

② 古代居住在阿拉伯半岛西北部的居民——译者。

能力，波斯与拜占庭……真主让我们战胜他们，准许我们夺取他们的国家并在他们的土地上定居，准许我们夺取他们的家园和他们的财产，除了真理我们别无力量或力气。"对他们的牺牲者来说，所经历的显而易见是不怎么令人振奋的。"阿拉伯人变得富裕和兴旺，并在他们从拜占庭人那里夺得、供人们劫掠的土地上扩张……基督教徒陷于绝望之中；其中有些人说：'上帝为什么允许这一切发生？'"基督教的回答是，因为他们有罪，上帝正在惩罚基督教徒。但是正像穆斯林所认为的那样，真主正在帮助穆斯林，因为伊斯兰是正确的。这一推断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以致即使是基督教徒也难以抵制。

第一次内战（656～661年）

但是巨大的意外收获也产生了一些问题。首先是他们怎样分配这些战利品？如果这个穆斯林国家想要继续存在下去，中央政府就要稳固地控制这些新得到的资源。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634～644年在位）成功地实行了一项决定：所有用武力夺得的土地都要交归国家所有，而不是在征服者中间分配。征服者被告知要集体呆在兵营中（最终为要塞城市），他们在兵营中的收

公元680年，先知的外孙侯赛因从麦加出发，向伍麦叶王朝的统治发起挑战。他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率领着一小队人马（总共不超过100人）。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队伍受到耶济德军队的围攻，侯赛因被一个名叫谢姆尔的伍麦叶士兵杀死。伊斯兰教历每年1月10日（阿术拉）举行活动纪念他的殉难，是什叶派伊斯兰的核心仪式。这是20世纪初，大不里士画家赛义德·侯赛因绘制的一幅纪念卡尔巴拉之战的画，挂在咖啡馆中。骑在马背上的中心人物为伊玛目侯赛因。



人来自被征服的土地，政府采取支付薪俸的形式对他们的军事服务给予报酬。政府禁止他们从事农业活动。这是一项有远见的决定：如没有这一决定，阿拉伯人会消散在被征服民族的地主与农民之中，后者会很快地将他们同 [12] 化。但这也使部落民成为这个国家的被赡养者，而且没有多久他们就激烈地抱怨起国家对金钱的管理了。分配不公和乱用战利品（来自被征服土地的收入）是后一个世纪通行的对政府的谴责。对这些资源的争执因下述事实而激化：有权势的部落头领和富有的麦加人的皈依损害了原先多半是下层人、早些日子因加入穆罕默德的斗争而升入领导层的人的地位。这些头领的部落追随者也强化了对这些要塞城市资源的争夺。已定居在伊拉克与埃及的老战士被夹在反应迟钝的政府与满心渴望的新来者之间，他们来到麦地那，向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644～656年在位）诉说，发现他反应迟钝，于是杀了他，发动了第一次内战。

奥斯曼之死表明麦地那不能继续成为穆斯林疆域的首都。现在阿拉伯的人力和财政收入集中于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而且在内战中进行角逐的三方所代表的中心全都在阿拉伯半岛之外。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阿里的基地位于作为伊拉克两个要塞城市之一的库法；脱勒哈和祖白尔两个 [13] 早期的皈依者，得到先知穆罕默德最年轻的遗孀阿伊莎的支持，他们的基地在伊拉克第二个要塞城市巴士拉；后来的皈依者穆阿维叶是叙利亚的总督，他和奥斯曼一样都出自麦加伍麦叶家族。（埃及未能产生一位候补者）。脱勒哈和祖白尔很快被阿里消灭，后来阿里于657年在隋芬与穆阿维叶开战。叙利亚人宣称已赢得这场战争，但据伊拉克人说，当他们停下来要求仲裁时，他们正在被打败。不管这一仗情况会如何，争执仍继续存在，直到661年阿里被哈瓦利吉（意为去参加圣战的人）派杀害。据说在他接受仲裁要求的时候，他原来的追随者脱离了他。同年穆阿维叶被尊为整个穆斯林共同体的哈里发。于是将首都迁往叙利亚（大马士革）。

尽管穆斯林在相互交战，但是无论是拜占庭人还是伊朗人都没有认真地尝试一下重新进行征服，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内战中也没有这样做。以这一观点看来，穆斯林们捱过了他们可能是命中注定的不受损失的冲突。但是这些冲突，尤其是第一次冲突给穆斯林自身留下深刻的印记：对第一次内战的态度成为穆斯林所有主要派别自我界定的重要因素。

早期的伍麦叶王朝（661～683年）

穆阿维叶（661～680年在位）必须为征服者设计出新的政治组织。已经允许被征服民族作为半自主的顺民（在穆斯林保护下的非穆斯林）生活，作为对他们纳税的回报。统治他们出人意料的容易，但是统治部落民便是另外一件事了。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阿拉伯人继续铸造拜占庭和萨珊王朝类型的钱币。因此，钱币正面的左边绘有胡斯饶二世(590～628年)的头像，反面则是琐罗亚斯德教（袄教）的火庙及侍卫。假如没有用巴拉维语标明“耶济德元年”(估计是从680年到683年在位的耶济德一世)，人们或许会以为它是萨珊王朝的钱币。但是，阿卜杜勒·麦利克哈里发(685～705年在位）曾用多种方法尝试过重新设计钱币，正是他提出了传统的式样，如图右边所示。这种硬币没有图案，只有文字，而且文字是用阿拉伯文，而不是用巴拉维语或希腊语书写的。它所传达的是明确的伊斯兰教的信息：它声明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他曾以正道和真教的使命委托他的使者，以便他使真教胜过一切宗教，即使以物配主者不愿意”（《古兰经》第九章第33节）。在50年的征服过程中，穆斯林重新制定了贸易媒质。他们改变了中东，中东也改变了他们。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通过对他们的间接统治，让他们置身于政治之外，尽管仍需利用他们充当兵源。穆阿维叶将帝国分作几个大省，委任他的男性亲属当省督。这些省督由于为数不多且又与哈里发家族有密切联系，因而可超越部落竞争。为了评估和征收税款，他们依靠当地的文书官员，这些人继续管理中央与省的官僚机构，于是将部落民排除在财政管理之外。为了解决部落民自身当中的法律与秩序问题，他们依靠部落头领，这些头领在战时指挥部落民，在平时对部落民负责：如果部落民举止不端，头领须受处罚。头领们因其在部落民与政府之间的中人作用而获得优厚的赏金。然而他们只给予一个头领家族直接的政治权力：穆阿维叶通过与卡尔卜部落头领的女儿结婚并让该家族在叙利亚政府中占有大的份额，藉此与该部落结盟，该部落是古达阿这个叙利亚主要部落联盟中的主导部落。于是，他的权力在这个部落，并通过该部落在整个古达阿部落联盟有了依靠。他的间接统治制度在整个穆斯林疆域运转得十分有效，以致一旦内战烟消云散，他永远都无需在叙利亚境外使用古达阿的力量。

穆阿维叶临终时指定其子耶济德(680～683年在位）做他的继承人。这是一个很不受欢迎的做法。哈里发的人选应该通过选举产生，不管是像最初两任那样非正式地选举哈里发，还是像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那样通过秘密选举会议（舒拉）正式选举，任何人都不能垄断它。选举曾在麦地那进行得很顺利，但是现在阿拉伯人拥有的是一个过度分裂的帝国。世袭继承具有在哈里发去世时自动移交权力的有利条件，势在必行。

这突出了征服后发展的艰辛。征服是令人惊叹的事件，部落民也许一直在期望着解决他们可能会有的每一个问题：结果相反，他们无情地破坏了这个社会的每一项特征，一个他们根据所带来的富有、所导致的社会与政治的分层进行评价的社会，也无情地破坏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要想存在下去需要采取帝国的形式。部落民在欧麦尔时期允许国家接管被征服的土地的时候，已经不知不觉地同意放弃了自由。现在他们不得不知趣地接受了世袭的哈里发国家。在100年的时间里，他们像拜占庭帝国和萨珊帝国的臣民一样，被彻底地排除在参与政治决定的进程之外，对这两个帝国他们十足地憎恨。

他们大叫大嚷地抗议。他们宣称,伍麦叶王朝"使真主的仆人变成奴隶,把真主的财产变成富人轮流获取的某种东西;把真主的宗教变成一项腐败的事业",谴责穆阿维叶及其继承者把哈里发国家变成像伊朗人和拜占庭人那样的纯粹的帝王统治。他们也造了反。特别苦涩的是,让一个较晚、且较勉强皈依伊斯兰的家族控制全部权力和财富,这些东西本来是真主对阿拉伯人遵循穆罕默德的奖赏。许多人都认为,如果伍麦叶王朝是被诸如阿里后裔等其他人所取代,一切都还会是不错的。但是伍麦叶王朝所主持的变革由征服所产 [15] 生,而不是由他们的品格所产生。

伍麦叶王朝是一个十分成功的王朝。他们维持穆斯林的统一达 100 年,对伊斯兰文明的诞生助了一臂之力,而且使伊斯兰的边界大为扩展:在内战结束后,穆阿维叶在北非进行战争;到 711 年阿拉伯人已经征服西班牙;他们继续挥戈进入法国,直到最后于 732 年在普瓦捷终止前进。伍麦叶王朝也在印度,尤其是在中亚进行征服。在该王朝垮台不久,穆斯林于 751 年在中亚塔拉斯遭遇并打败了中国人[①]。然而这一切都未能挽救伍麦叶越来越独裁的统治。他们作为不虔诚的、有世俗思想的、令人极其厌恶的人被载入历史。 [16]

第二次内战(683~69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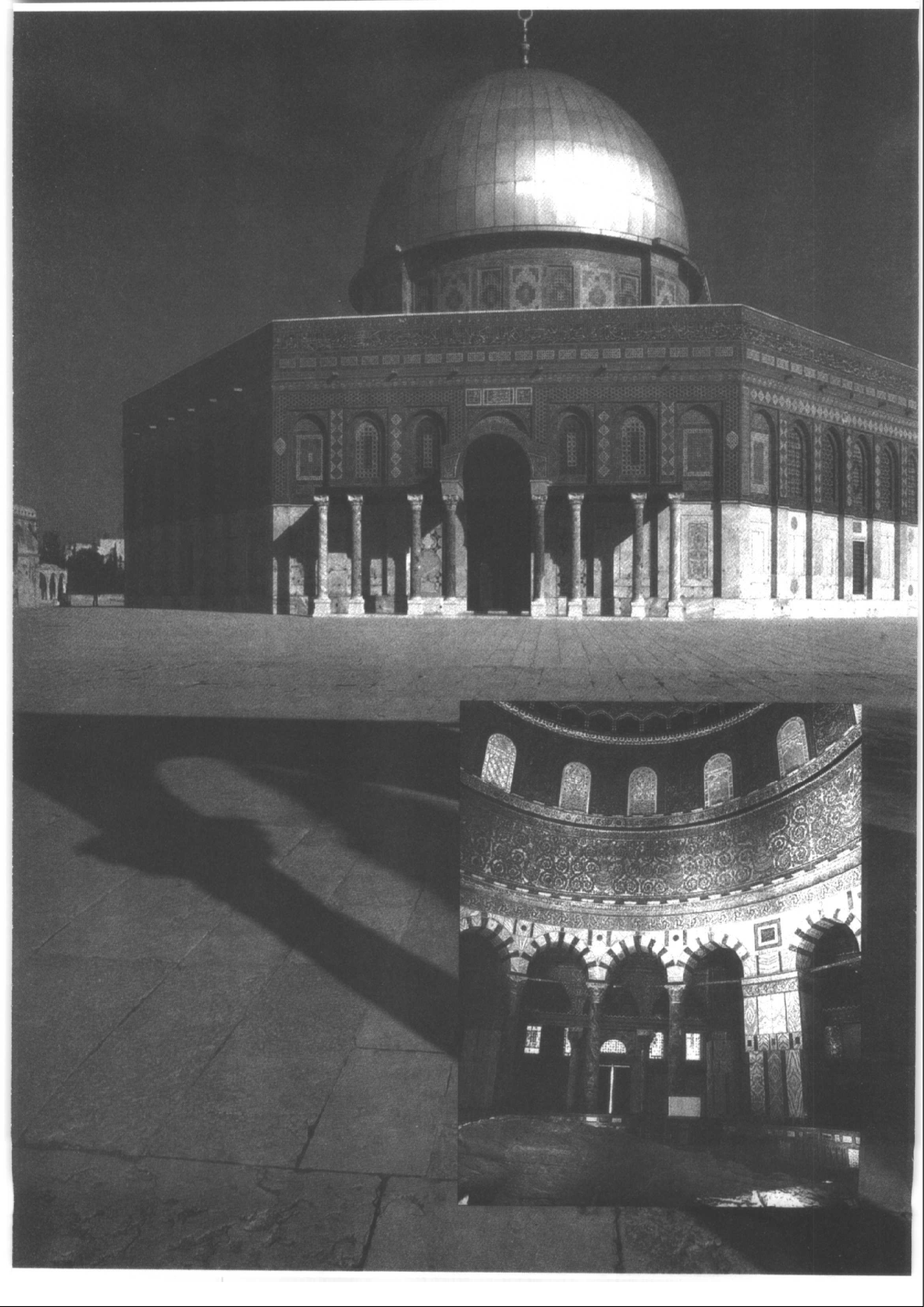
耶济德一世于 683 年过早地去世,恰好产生了他父亲希望通过指定他作他的继承者而避开的影响:内战再次爆发。

对伍麦叶王朝的挑战主要来自第一次内战对阵者的儿子伊本·祖白尔,他希望在麦加统治穆斯林世界。这并非实际可行,如果他取胜了,无疑会成为挂名首脑,而真正的统治者会是他在伊拉克的代理官员。

伊本·祖白尔从未控制过叙利亚和埃及,它们落入麦尔旺一世(684~685 年在位)手中,他是叙利亚部落联盟古达阿挑选的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但是伊本·祖白尔确实建立了对伊拉克的控制,不久巴士拉落入他的手中,尽管哈瓦利吉派在他们自己的"哈里发"的领导下,在阿拉伯半岛和伊朗西部横冲直撞,直到内战结束。库法人在 680 年未能支持阿里儿子侯赛因试图进行的反抗,结果侯赛因及其亲属在卡尔巴拉被惨杀,现在他们又追随穆赫塔尔的反抗活动,穆赫塔尔声称是马赫迪的使者[②]。他打破惯例,从库法招募大量非阿拉伯的奴隶和自由民,以这些追随者补充其阿拉伯军队。但是,他于 687 年败在伊本·祖白尔弟弟手下,在 691 年以前伊拉克仍处于祖白尔家族的统治之下。麦尔旺一世的儿子与继承者阿卜杜勒·麦利克(685~705 年在位)于 691 年重新征服了伊拉克,692 年打败并杀死了伊本·祖白尔本人,

① 指中国唐朝军队——译者。

② 穆赫塔尔声称是穆罕默德·伊本·哈乃菲亚(阿里与哈乌拉的第三子)的使者,并宣称受到启示,传播马赫迪即将再世的教义——译者。



于是攻击麦加圣寺也就成为必要的了。这一行动进一步玷污了伍麦叶王朝的形象：在伊斯兰中神圣与权力是共生的，现在则毫无希望地互相争斗起来。

后期的伍麦叶王朝(684～750年)

伍麦叶王朝后期在社会与文化发展上都是硕果累累的，新的后部落时期秩序和非同一般的伊斯兰文化开始出现。

皈依

第二次内战之后，自由的非阿拉伯人开始大规模地皈依。当时在穆斯林共同体中非阿拉伯人的数量肯定已开始超过阿拉伯人，不过到这时为止他们主要是通过奴役进来的。阿拉伯人在扩张中俘获的大量战俘被卖为奴隶，多半卖给本地人，于是他们分散到穆斯林住户中去，在住户家里学习阿拉伯语，接受了伊斯兰，许多人恢复了自由。在本时期结束以前，奴役兴许一直是吸纳新信徒的主要机制，不过被征服的人们也开始自愿地皈依。

从阿卜杜勒·麦利克时起，我们就听说有些村民搬进了要塞城市，他们会皈依，以期加入享有特权的征服者的行列。由于被打败的非阿拉伯人交纳征服者赖以生存的税款，他们的伊斯兰化便削弱了阿拉伯社会的财政基础 [17] 与种族基础。当局不但不鼓励(更不要说强迫)他们皈依，而且常常把他们送回他们的村庄，拒绝承认他们的皈依。对被承认的皈依者(马瓦里[①])不存在财政上的歧视，但是伍麦叶王朝对承认采取的政策是专断的，造成许多苦难，不仅在非阿拉伯人中是这样，正在起而反对伍麦叶王朝的宗教领袖所在的穆斯林社会内部也是如此。

由于穆斯林像非穆斯林失去土地那么快地获得土地，不得不对税负予以分配以便将它落在土地上，而不问土地所有者的信仰如何。到伍麦叶时期结束，这件事基本完成。到那时前部落民正在使自己确信交纳土地税不丢脸，只有非穆斯林为其受保护地位交纳人头税才使身份下降，但是“承认税的人也就承认了羞耻”的看法不易根除。当世界供他们获取的时候，部落民转为纳税者却标志着他们作为自由代理人的荣耀时代的终结。但是这却使伊斯兰得以在农村自由扩展。

穆斯林社会

在伍麦叶王朝后期，穆斯林社会不再具有占领军的性质。起初，要塞城市里所有的部落民都是士兵，所有被征服的人都是臣民。但是过了一些年以

第16页图：耶路撒冷岩石圆顶清真寺（阿克萨清真寺）建成于692年，是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纪念物，由伍麦叶王朝哈里发阿卜杜勒·麦利克建造。它矗立于耶路撒冷原犹太教圣殿堂残存的墙基上，这等于声称“犹太教现已被伊斯兰教替代”，这也触及了基督教，在铭文中它同基督教进行了争论。它有两条八边形的走廊，把一块石头围在中央，据传统的说法这就是穆罕默德夜里出发开始其登霄旅行的地方，但同时又可能与阿卜杜勒·麦利克时代的易卜拉欣密切相关。有资料称，阿卜杜勒·麦利克意图用该清真寺取代克尔白，作为所有穆斯林朝觐的核心圣地，但绝大多数现代学者认为这并不可信。

① 意为平民、保护民，指被阿拉伯征服地区的非阿拉伯穆斯林——译者。

后，士兵们不愿意离开他们战争根据地内的舒适生活，这些根据地是为镇压叛乱和边远的异教徒而设的，从阿卜杜勒·麦利克时起，新的职业军人从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中招募。主要军队是在叙利亚招募的，它的士兵被派往有麻烦的地区，并向各省提供警卫部队。在北非、杰济拉－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呼罗珊也有地方边防部队，他们与叙利亚合作保卫本省。在埃及和伊拉克，地方部队作用不大。

在各地，军队的职业化与文明的、种族混合的穆斯林社会的出现相伴随。有些阿拉伯人放弃了他们的军事占领，变成了农民："你们将成为土地的耕种者"，"你们将跟着牛尾巴走，而且厌恶圣战"，据说先知穆罕默德曾经这样预言，尽管不久有越来越多的传说称赞他也赞美农业的优点。但是他们大部分仍然呆在要塞城市，同先前的俘虏在一起从事商业和手工业，城里现在还出现了新型的宗教领导人——学者(乌里玛)。



作为西亚的统治者，阿拉伯征服者能够采撷与挑选现有的各种艺术风格。伍麦叶王子在叙利亚沙漠建造的宫殿兼有拜占庭和伊朗的艺术。这尊在(巴勒斯坦)希尔巴特马夫加尔地区出土的塑像呈现了哈里发(可能是瓦利德二世，公元743～744年在位)作为萨珊王朝君主的形象。大马士革清真大寺（见第144页）中镶嵌的图案则表明吸收了拜占庭的风格。阿拉伯人擅长于把各种独立的文化元素糅合到一起加以吸收，这对于伊斯兰文明的形成十分重要。

学者(乌里玛)是非官职人员，他们以伊斯兰价值保卫者自居，总是探讨过去。"穆斯林应不应该交纳土地税？""妇女可不可以参战？""允许不允许节制生育？"(所有这些问题都在被归入伊斯兰法的大型文献中进行了讨论)。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考查据认为是先知穆罕默德、第一批哈里发及其他年高德劭的人对这些问题发表的言论，因为他们的看法是权威性的。记载过去的人物，特别是先知穆罕默德言论的文字类型，是大家都知道的"哈迪斯"[①]，这个词也用于圣训的每一条，常被译为"口传教义"。哈迪斯是乌里玛独特的表达手段，与其他知识界人士有所不同，例如与大约也在此时出现的凯拉姆[②]实践者即不相同，凯拉姆粗略地说就是成体系的神学，另外与9世纪出现的哲学家也不相同。传统主义在伊斯兰学中居于中心地位，高于所有的伊斯兰法。

如果惟一权威的看法是过去人物的看法，那么，为使后来学者确信不疑，过去人物便会被墨守成规地加以利用，这样会产生副作用，使早期伊斯兰史难以被阐明。先知穆罕默德和第一批哈里发是特别具有权威性的人物，根据记载，他们对实际存在的每一件事都说了一些话；其中包括这样的情况，他们并非对每一件事都发表了言论，但那些言论都被是冠以他们之名。天真的读者也许会推断，伊斯兰文明的整体是在麦地那，是在从迁徙到第一次内战之间的30年中被设计出来的。这显然是极不可能的，然而如何将这归因于早期权威的无数口传教义加以整理，并确定日期，还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教派的形成

伍麦叶王朝后期的特征是在许多问题上进行激烈的辩论，其中最突出的

① 中文译作圣训——译者。

② 本意是谈话、演说，此处是指7世纪末、8世纪初开始出现的一种经院哲学，它是一种以《古兰经》为立论依据的神学辩论术——译者。

圣　训(哈迪斯)

伊本·欧麦尔传给纳菲，纳菲传给阿尤布，阿尤布传给马迈尔，马迈尔传给阿卜杜·拉扎克：

先知(愿安拉保佑他，赐与他和平)禁止携带《古兰经》到敌人的土地上旅行，以防止它落入敌人手中。

圣训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权威的传系，它确保其内容的权威性，另一部分是圣训正文本身。圣训通常是简短的，即使不像上述这条圣训那么简短。只有当它们被公认为具有权威性，并且没有经过任何改动，或者未被《古兰经》或其他圣训废止时，它们才具有约束力。只有学者(乌里玛)——或更加确切地说，只有法理学家(费卡哈)——才能决定哪些法律可以以它们为依据。这种圣训被广为接受，尽管现代的历史学家可能怀疑它的本真性，因为先知在这里把《古兰经》当作一本实实在在的经书，尽管《古兰经》是在他死后才把他所传的启示收集成册的。如果有人想利用圣训来重构历史，那么他就需要判定，圣训是何时开始流传的，这是不易说清的，何况在大约公元800年的时候，有这么多的圣训存在。

是过去与现在哈里发的地位，尤其是第一次内战中的哈里发的地位的问题。什叶派，或阿里派(什阿)成员认为先知穆罕默德指定阿里为他的继承人，这意味着前三位哈里发都是篡位者，只有阿里的后裔才有权提出对哈里发职位的要求。但是哈瓦利吉派认为前两位哈里发具有合法性，但奥斯曼、阿里及所有后来的哈里发全都弄错了。还有其他人认为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和奥斯曼都是合法的，最后一位完全是被错误地谋杀了：这些人是奥斯曼人。稍后，逊尼派将阿里列入奥斯曼人所提出的进行正确指导的哈里发名单，他们拒绝支持第一次内战某一派，认为随后所有的哈里发在下列意义上都是合法的：穆斯林共同体需要它的统治者，即使他们未能受到必要的正确的指导，而且



伍麦叶王朝希尔巴特马夫加尔沙漠宫殿遗址出土的灰泥头像。传统的伊斯兰教法律反对描绘人和动物，想必这一禁忌有由来甚久的根源，因为在岩石圆顶清真寺和大马士革清真大寺中，都刻意地回避了这种表现形式；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改革后的钱币也去掉了头像。但很显然，只有在宗教的场合才禁止和谴责画像，因为伍麦叶时期的世俗艺术并没有禁止这样做。事实上，尽管传统的禁忌也影响了世俗的艺术，但对人和动物的描绘及其画像从未在伊斯兰艺术中消失过。

20

哈希姆家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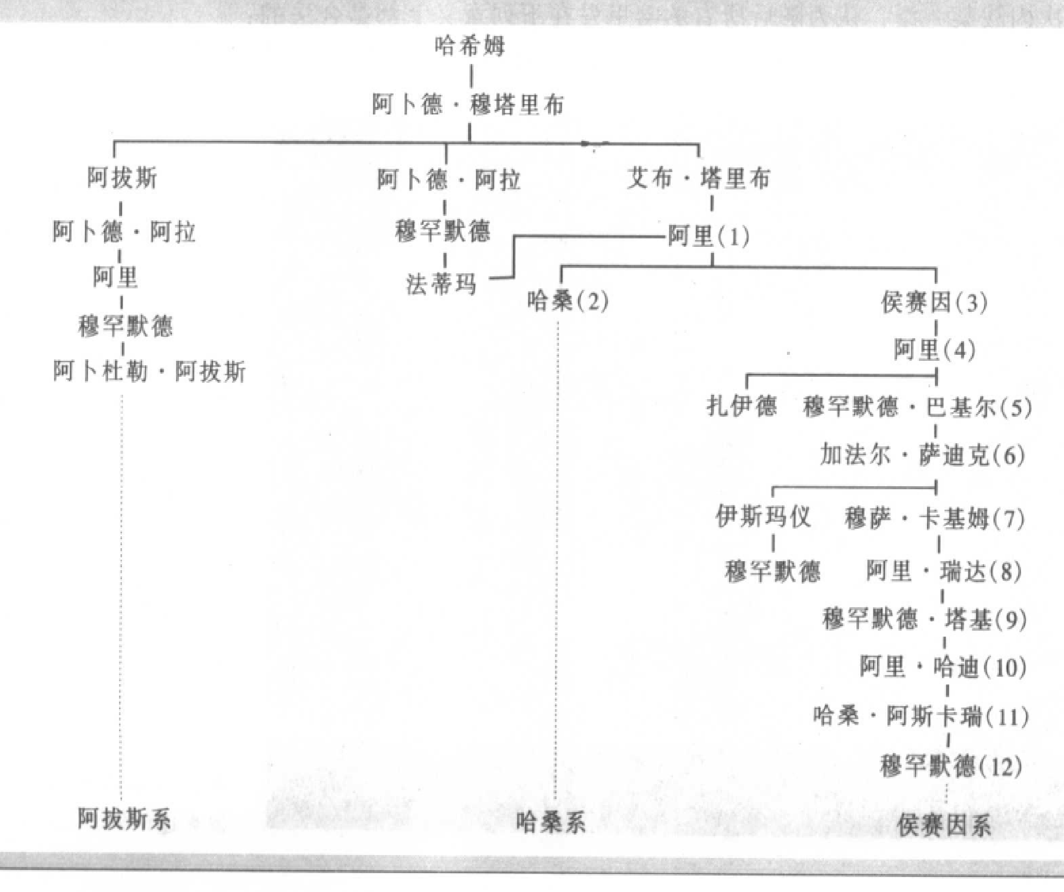
哈希姆家族是“先知家族”。虽然穆罕默德没有子嗣，但是他的血脉通过其堂兄弟阿卜德·阿拉·伊本·阿拔斯和阿里·伊本·阿比·塔里布传承下来。阿里娶了先知的女儿法蒂玛，他们生了两个儿子：哈桑和侯赛因，到今天，他们的后裔人数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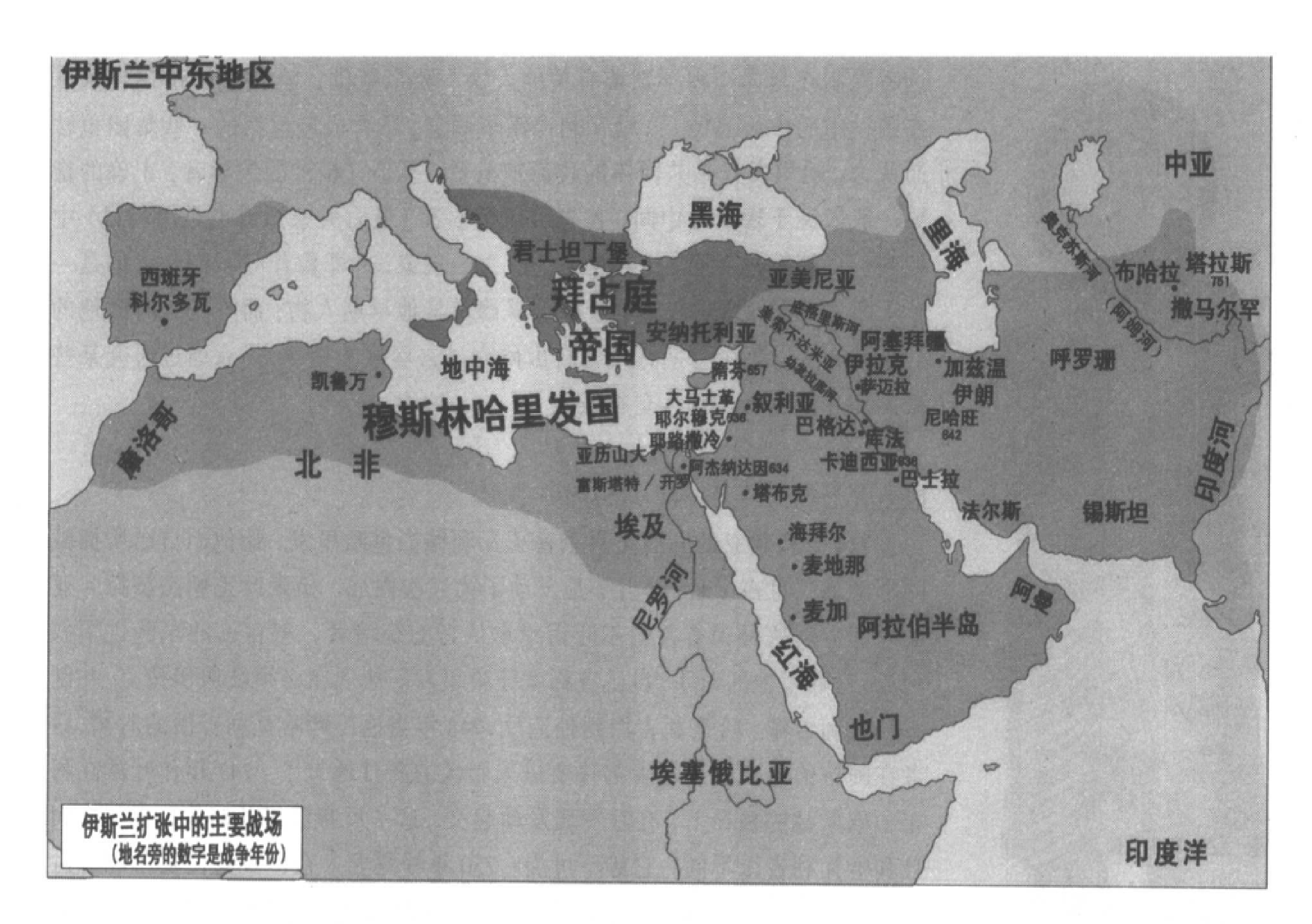
哈希姆家族是早期派别形成的焦点，但只是在阿拔斯王国初期才开始形成传统的什叶派，其部分动因是作为对阿拔斯人夺取哈里发政权的回应。传统的什叶派只关心哈希姆家族的阿里支系。他们认为，阿里及其后裔拥有掌握政权的特殊权力和指导社团宗教事务的特殊能力；在他们看来，真正的伊玛目必须是阿里和法蒂玛的后裔。但是，在其他问题上他们的看法就不一致了。

伊玛目派或称十二伊玛目派（分布于今天伊朗和其他地方）承认十二伊玛目（他们的名字见下图右列），但是认为第12位伊玛目自873年开始已经隐遁：他将在世界末日以弥赛亚（马赫迪）的身份重新现身。第十二伊玛目是所有指导之源泉，但在他隐遁期间，该穆斯林共同体和逊尼派一样，由宗教学者进行管理。

所谓的极端主义者（除了叙利亚的阿拉维派和德鲁兹派、伊朗的阿赫利里哈克等）更加强调他们的伊玛目在救世中的核心作用，而不太重视法律的重要性。他们中绝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伊玛目是神圣的。但是栽德派则否认伊玛目的这种核心作用，认为他们不过是高级管理者和学者。栽德派得名于栽德·本·阿里，他于740年在库法（今属伊拉克）组织领导了一次不成功的武装起义。栽德派没有固定的伊玛目世系，主张无论是阿里和法蒂玛的子孙，还是哈桑和侯赛因的后裔，只要学识渊博而且能够起义夺取政权，就可以成为伊玛目。该派现在只存在于也门地区。

伊斯玛仪派最初也是极端主义者，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他们的伊玛目奉若神明。他们形成于9世纪晚期，宣称穆罕默德·伊本·伊斯玛仪是最后一位伊玛目和弥赛亚，他将很快复临，取消伊斯兰法律的表面含义。该派最初是由于相信第七伊玛目伊斯玛仪会很快重现人世而团结在一起的，后来由于法蒂玛王朝的建立者自称是伊斯玛仪现世（公元约900年）而分裂，后来分裂为其他一些派别。伊斯玛仪派当时存在于叙利亚和也门地区，但主要是在印度，许多人又从那里迁至东非地区，现分散在世界各地。其中一个支系的领导人是阿迦·汗。





从那以后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哈里发。

这个赖以形成派别的问题看上去好像是难以理解的，但是哈里发职位，或者如在宗教讨论中所说的伊玛目的职位，对救世[①]来说还是很关键的。首先，没有合法的领导者，人们就会认为救世的共同体不存在。因而，选择某些人的伊玛目，就是选择了人们相信救世赖以存在的集团。其次，伊玛目被看作是指导者。《古兰经》中说："这等人，是真主引导的人，你应当效法他们走正道。"（第6章第90节）[②]那么，真主都引导过谁呢？回答这个问题还得选择某一个共同体。这一讨论是关于过去的，因为阿拉伯人总是根据他们的祖先来界定集团，而且不自觉地也让最初几位哈里发扮演祖先的角色，乌玛的血统在伊玛目那里出现了分叉，于是阿拉伯人依靠挑出他们的伊玛目，以认同他们自己派别的归属。但这一讨论也对现在的统治者有影响。如果伍麦叶王 19 朝掌握共同体的领导权，而且也不是合法的哈里发，那么到哪里去寻找指导呢？什叶派断言它集中于公社的领导层：只需改变一下人员就行。（他们把候

① 救世是基督教术语，但有的学者认为也适用于伊斯兰。参见马哈茂德·阿·阿尤布《启示与救世——走近伊斯兰的历史观》——译者。

② 《古兰经》中文译文据马坚先生译本，引自麦地那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印制厂伊斯兰历1407年版，下同——译者。



伍麦叶王朝晚期希尔巴特马夫加尔宫殿出土的这尊女像可能是一个年轻的女奴。从阿拔斯时代起，穆斯林世界就开始盛行女奴，她们担当古希腊“妾”①和日本的艺妓的角色。其中许多是有才艺的歌女，一些人甚至受过很好的教育。在9～10世纪，当一个年轻的男子陷入情网时，其情欲的对象往往就是一位女奴。

选者限制在与先知穆罕默德有关的人这一狭窄范围，意在强调伊玛目制度在救世中的中心地位。）哈瓦利吉派不同意，结合成逊尼派的一些集团也转[21]而认为，哈里发只是共同体的政治护卫者，不是它精神的领导者：正确的指导一般散见于穆斯林中间，首先可以在学者（最后大家知道也是伊玛目）中找到。尽管表述不同，指导是一个过去的现象，并非像什叶派所断言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现象：它集中于穆罕默德及其他早期人物，而不是此时此地的一个什么人。每个穆斯林可以自由研究过去珍藏的指导，只有通过研究某些穆斯林才能变得比别人更权威。

伍麦叶王朝的衰落（744～750年）

744年叙利亚的一股士兵杀害了瓦利德二世哈里发，让他们自己所拥戴的耶济德三世占了最高位，于是发动了第三次内战。伍麦叶王朝杰济拉－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省督麦尔旺拒绝承认新的统治者，率自己的军队进军叙利亚，打败了他的对手，自己宣称就任哈里发。他现在必须征服伊拉克，并制服哈瓦利吉派。哈瓦利吉派到处造反，748年当他压垮哈瓦利吉派的时候，后者在阿拉伯半岛的追随者都快要进入肥沃的新月地带了。747年什叶派在阿布·穆斯林的领导下，在呼罗珊发动起义，这一反叛经过长时间的策划，而且和哈瓦利吉派不同，它势不可当；750年呼罗珊人在伊拉克使麦尔旺二世受到致命的挫折。他们着手让哈希姆家族（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一个成员登上最高地位；与许多人曾经预期的相反，他们没有挑选阿里分支的成员，[22]反而从阿拔斯分支挑选，据说后者一直在背后支持呼罗珊造反。

阿拔斯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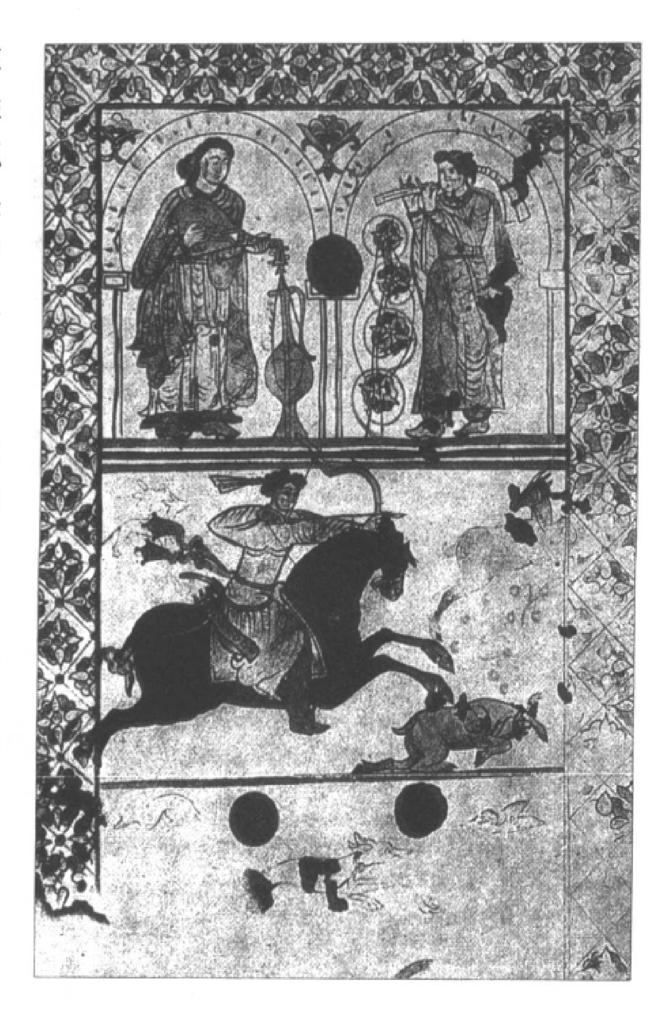
阿拔斯王朝的困难选择

阿拔斯王朝最初几年用来平定帝国和消灭阿布·穆斯林以及他所领导的这场革命的其他缔造者。一旦控制了局面，他们必须面对源于他们自身的问题：不再有把帝国聚拢在一起的杰出人物。再有，必须设计新的政治组织，而且这一次这个组织必须公然采取帝国的形式。中东被征服以前种族、社会与文化的多样性现在在穆斯林社会内部表现出来，帝国的统一必须依赖于类同的精英，他们要与在文化上，尤其是在伊斯兰文化上属于异类的群众脱离：这样伊斯兰现在必须让这一十足的帝国组织类型合法化，而它恰恰是最初几位哈里发曾打算予以摧毁的。

呼罗珊的革命者为阿拔斯帝国提供了军事精英与政治精英，这些革命

① 通常为受过教育的女奴——译者。

者取代了叙利亚人而成为帝国的军队。大部分驻扎在伊拉克，阿拔斯人将它作为他们的中心，其余的前往帝国各处的要塞，阿拔斯人担任主要地方长官的职位。管理精英由在伊拉克的官僚组成，其中有许多是伊朗人，而且不管他们的种族来源如何，全都受过有关萨珊王朝管理国家本领方面的培训。但是阿拔斯人到哪里寻找他们宗教的领导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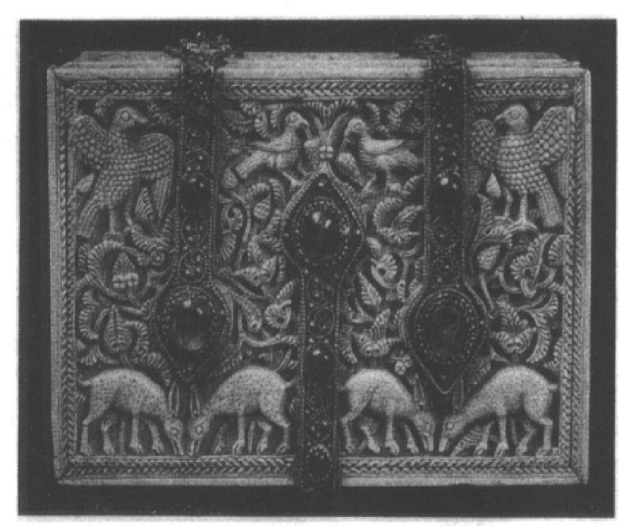


这幅出自伍麦叶王朝晚期西海尔堡宫殿（今叙利亚）的壁画，描绘了伊朗骑师的狩猎活动。初期穆斯林世界的弓箭手绝大多数都是步兵，但是，人们也非常赞赏能够在移动的马背上射箭的能力，而这正是伊朗骑师得以闻名遐迩的原因所在。不过，在穆尔台绥姆哈里发（832～842年在位）以后引进的突厥士兵比伊朗士兵声誉更高，因为他们在骑术和箭术的结合上更加高明。

在伍麦叶时期出现的这些宗教学者并不完全反对合作。他们大都欣赏能使乌玛保持统一和有秩序的统治者，而且全都趋向禁止造反。但是他们所护卫的宗教遗产不能用来使阿拔斯的事业合法化。现在需要为学者们精心阐明，先知穆罕默德和最初几位哈里发在麦地那部落社会为理想的政府做了示范的伊斯兰意象。理想的统治者是像其他任何人一样的穆斯林，而不是一个独裁者；他以真理的名义进行统治，就是说不费力地进行统治，而不是靠强迫；他所有的成年男性臣民都要参与军事冒险事业和政治决策，这是一种协商的政府；惟一的等级是诗人与荣誉等级，因为没有固定的社会等级制度或世袭的贵族。这一想像有助于冠冕堂皇地使现代平等主义和大众参与政治合法化，但是它正好与阿拔斯人创建的帝国组织相反，不过它是过去工业化前庞大的国家组织得以保持聚拢的惟一途径。

于是，学者们不能为阿拔斯帝国提供充分的伊斯兰的合法性。实际上，他们把他们的统治者看作是从事必要的但却是肮脏勾当的奴仆，这些勾当违背了伊斯兰准则，因而人们出于对道德污染的担心，应该规避他们：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说的，“最好的统治者是与学者们常来往的统治者，但是最坏的学者是与国王们常来往的学者”。阿拔斯人可以通过建清真寺、为朝觐提供方便条件、进行圣战以及（尽管他们是一些作风严厉的人但还是）对学者摆出屈尊俯就的样子，以增强其道德的名望。但是他们不能像最初几位哈里发那样，享有可以代表穆斯林共同体的名望。尽管学者们更喜欢阿拔斯人而不是伍麦叶人，但他们也通过赞同哈里发制度已不复存在，含蓄地谴责他们是纯粹的国王，许多人援引先知穆罕默德的话作为格言：“我死后哈里发制度将会持续30年”。阿拔斯人要么承认他们是奴仆，要么试图以打算重新塑造其遗产的宗教领导人取代这些学者。由于这些学者在使伊斯兰意象变得不那么虔诚和异端这方面较为突出，所以阿巴斯人在较长时期内选择了前者。

23



按照巴格达的标准，初期穆斯林西班牙（安达卢斯）是一个相当无趣、偏远的地方。伊拉克的穆斯林认为它是落后、与世隔绝的，一个名叫伊本·哈兹木（卒于1064年）的西班牙叛逆思想家也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大都市环境中可能将更有作为，并抱怨道："我惟一的不幸是，我出生在西方；假如我出生在东方，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声名远扬。"然而，穆斯林西班牙的文化与西哥特先人的文化相比，要复杂得多，在11世纪，它已经不再是一种外乡人对伊斯兰文化的模仿。图中所示精美的象牙盒产自1100年前后的科尔多瓦，1126年，穆斯林西班牙最著名的哲学家伊本·鲁什德（阿威罗伊）在那里诞生。

舒乌比耶[1]

阿拔斯帝国将首都迁往伊拉克，阿拔斯帝国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754～775年在位）建设了巴格达，恢复伊拉克官僚机构的帝国地位，给予萨珊传统以新的优势地位，帝国机构成为萨珊传统的载体。在曼苏尔统治时期，著名作家、由琐罗亚斯德教皈依伊斯兰的伊本·穆卡发被杀，他翻译了大量巴拉维文著作，实际上这些著作全都与国王们以及管理国家的本领有关。他对印度宫廷科学和希腊宫廷哲学与科学以及凯拉姆都很有兴趣。宗教学者们以怀疑态度看待这些发展，因为凯拉姆和哲学无需用他们自己所诠释的"哈迪斯"，而且还因为他们对外国的认知存在很深的猜疑。他们和在宫廷中很活跃的受过教育的俗人，在给文化定调上相互竞争，他们的竞争在舒乌比耶争论中表现出来。

舒乌比耶（非阿拉伯各民族的信徒，复数为舒乌比斯）总的倡导非阿拉伯文化，尤其是伊朗人的文化。他们是极好的穆斯林（尽管他们的敌人不相信），也喜欢阿拉伯语，但他们感到不满的是，把伊斯兰认同为一种与阿拉伯文化以外的任何文化都不相容的宗教。文化首先在阿拉伯半岛以外地区得到繁荣：他们指出，"地球上所有的国王都属于我们，不管他们是法老、尼姆罗德人[2]、阿马莱基特人[3]、波斯还是拜占庭的皇帝"，"所有的先知，除了呼德、撒立哈、易斯马仪和穆罕默德以外，都是非阿拉伯人"。舒乌比斯沉迷于阿拉伯半岛部落生活那些过分渲染的描写：吃蜥蜴、抢劫及其他方面，他们因阿拉伯征服者以令人震惊的傲慢对待被征服者而迁怒、排斥一位精干的朝臣，借机报宿怨。但他们的论点是：伊斯兰应该是能与任何有价值的文化和谐共存的宗教信仰，而不管这种文化的来源如何。宗教学者用据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声明予以连珠炮般的回击："真主选择了阿拉伯人……没有信徒会憎恨阿拉伯人……爱阿拉伯人是本宗教信仰的一部分……爱阿拉伯人，因为我是阿拉伯人，因为《古兰经》是阿拉伯文的，因为天国的语言是阿拉伯文"。

尽管这一争论延续了若干个世纪，但很快就变得明了的是：舒乌比斯已经失败。伊朗文化的某些内容确实被纳入伊斯兰主流，但是伊斯兰并未变成同某些人喜欢的任何文化结合在一起的宗教，在这一定义方面，乌里玛也没有失去他们近乎垄断的地位。一则故事说到了这一点：当在哈伦·拉希德

[1] 复数音译为"舒乌比斯"，为防止发生混淆，按音译出——译者。

[2] 在《旧约》中亚述被称为尼姆罗德的土地——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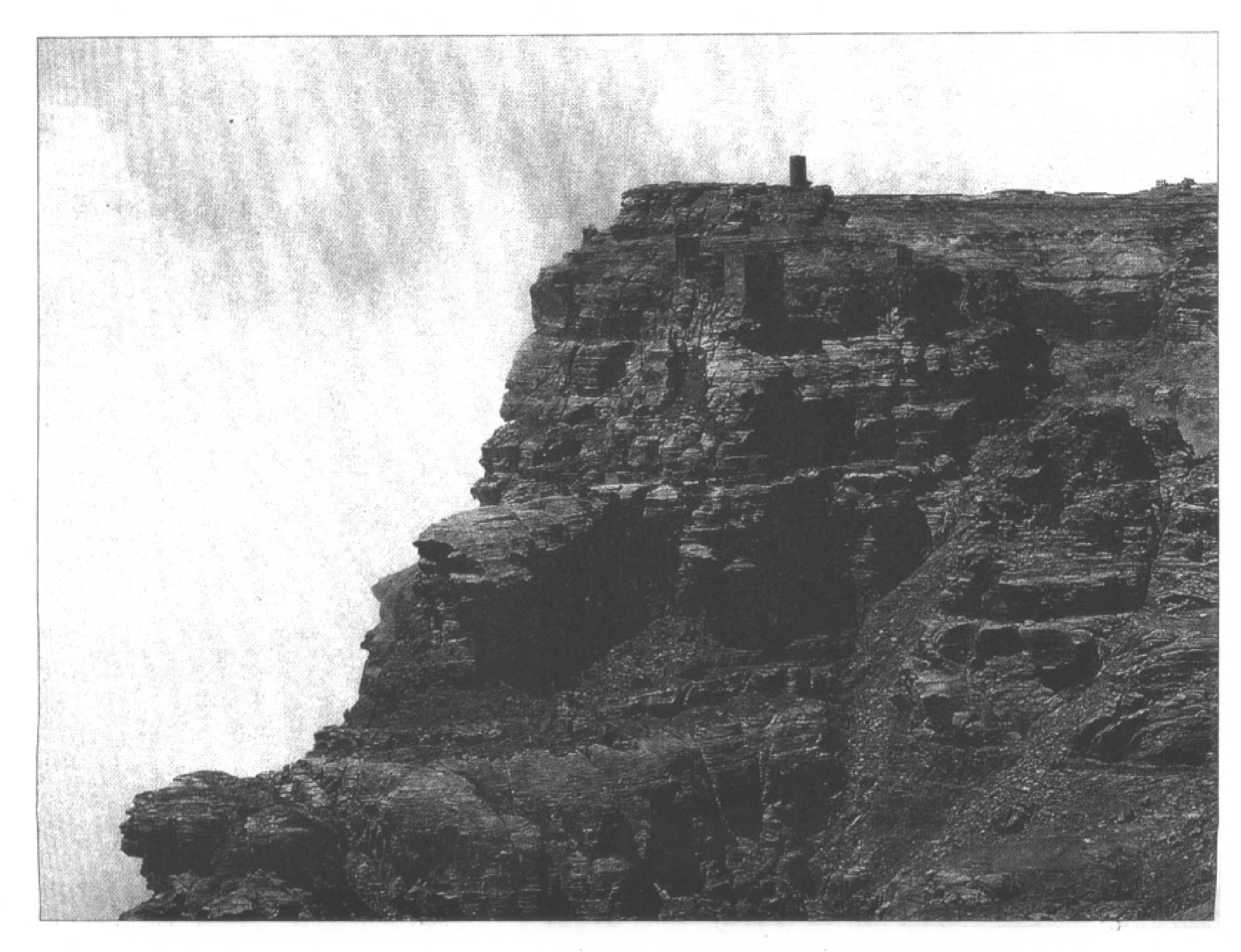
[3] 古代巴勒斯坦南部一游牧部落——译者。

(786~809年在位)宫廷的一个学者说到骆驼的时候,一位伊朗大臣反驳说,这个话题没有价值;哈伦于是大声喊道:"是这些骆驼把你们从家里接来,又从宫廷把你们接走,给你们带来荣誉;即使是现在它们已经死了很久,这是用它们的皮制成的鞭子,这些你们伊朗人应该感觉得到。"这生动地说明了舒乌比斯面临的问题。伊斯兰文明之所以存在,之所以盖上了不可磨灭的阿拉伯印记,是由于征服: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直至今日,伊斯兰文化仍保留着阿拉伯认同上的意义。今日的阿拉伯人大多是被征服前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居民的阿拉伯化后裔,但是任何下面这类看法都会深深地伤害他们的感情:即认为伊斯兰文化只是将征服前通行于各地的文化加以阿拉伯化的发展。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伊斯兰文化不是凭空发明的,它必定起源于阿拉伯半岛。

马蒙(813~833年在位)

如果舒乌比斯能够获胜,会对哈里发有利,但是他们太急于求成了,以致未能赢得乌里玛批准公开予以支持,不过马蒙不在此列。他是试图赶走乌里玛的惟一哈里发,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与舒乌比斯、凯拉姆实践者、什叶派以及原初逊尼派学者的其他敌人结盟。

也门高原的考卡班。西亚地区零星分布着内向的山区社群,他们采取不同版本的伊斯兰教,这使他们与低地的邻居隔绝开来。因此自9世纪以来,也门高原居民一直是什叶派中的栽德支派和伊斯马仪支派(后者比例相对较小),而阿曼的高原居民则自8世纪以来一直是哈瓦利吉派易巴德的分支;而这两个地区的低地居民都是逊尼派穆斯林。在叙利亚,非基督徒的高地居民有伊斯马仪派、阿拉维派和德鲁兹派。



26

伍麦叶时代的科尔多瓦

10世纪的科尔多瓦是伍麦叶西班牙的首都，无论巴格达的穆斯林怎么看，当时的科尔多瓦在财富和文化艺术方面都是伊斯兰世界，乃至基督教西方世界中的主要城市。它坐落于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阿拉伯语称安达卢斯）的瓜达尔基维尔河（阿拉伯语称卡比尔干谷）北岸，有一片富饶的腹地，公元771年被来自西哥特的穆斯林占领。那里原先居住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只要不反抗穆斯林统治者都会得到宽容。

公元756年，伍麦叶王朝的一位王子阿卜杜·拉赫曼·伊本·穆阿维叶逃脱了阿拔斯人对其家族的残杀，控制了安达卢西亚，定都科尔多瓦。8世纪末年，阿卜杜·拉赫曼开始建造科尔多瓦清真大寺，该清真寺大到足够容纳科尔多瓦全城的居民同时在此礼拜，他称之为西方的克尔白。同时他还建造了其他许多公共建筑，包括一些清真寺、宫殿、花园、桥梁、浴室和喷泉等。他的花园里种植着叙利亚的果树，阿卜杜·拉赫曼还专门为其中的一株棕榈树写了一首诗歌：

在鲁塞法我见到一棵棕榈树；

这里有西方罕有的风景，

我说：你的寂寞，恰似我远离家乡的孤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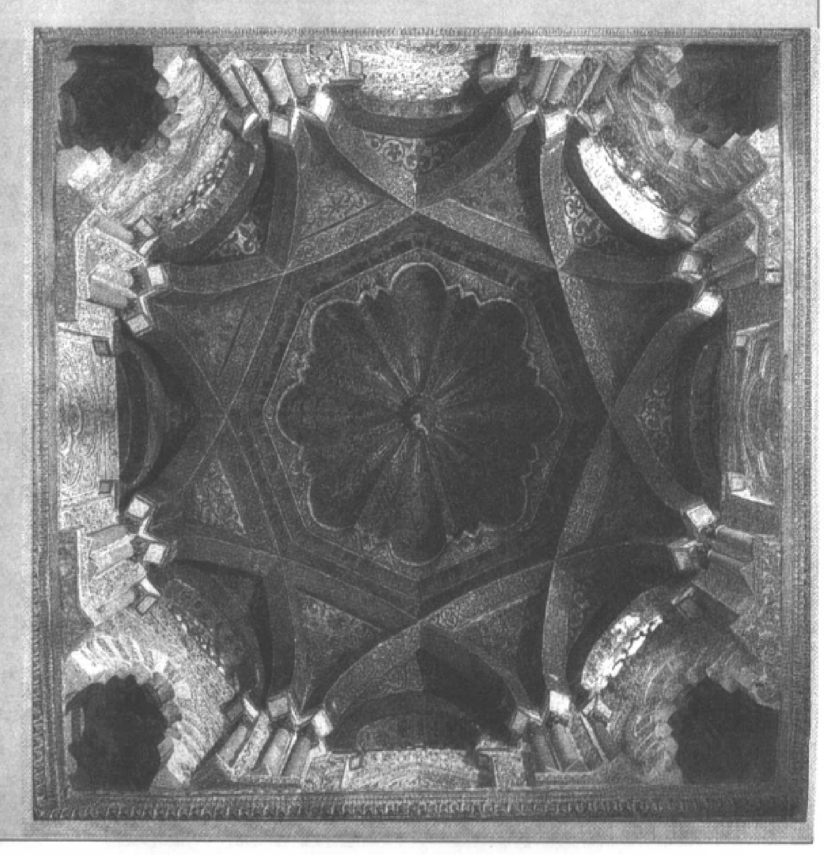
你思念那里的孩子和我们所热爱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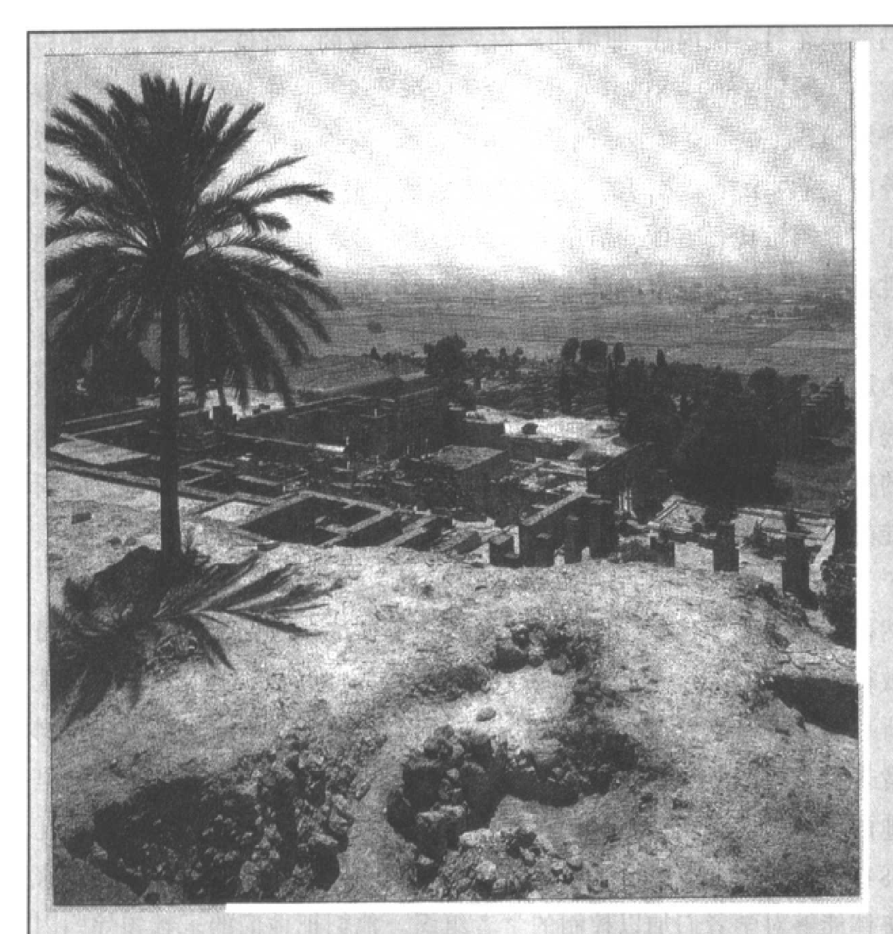
你没能在家乡的土地上长大。

像你一样，我也必须呼吸这异国的空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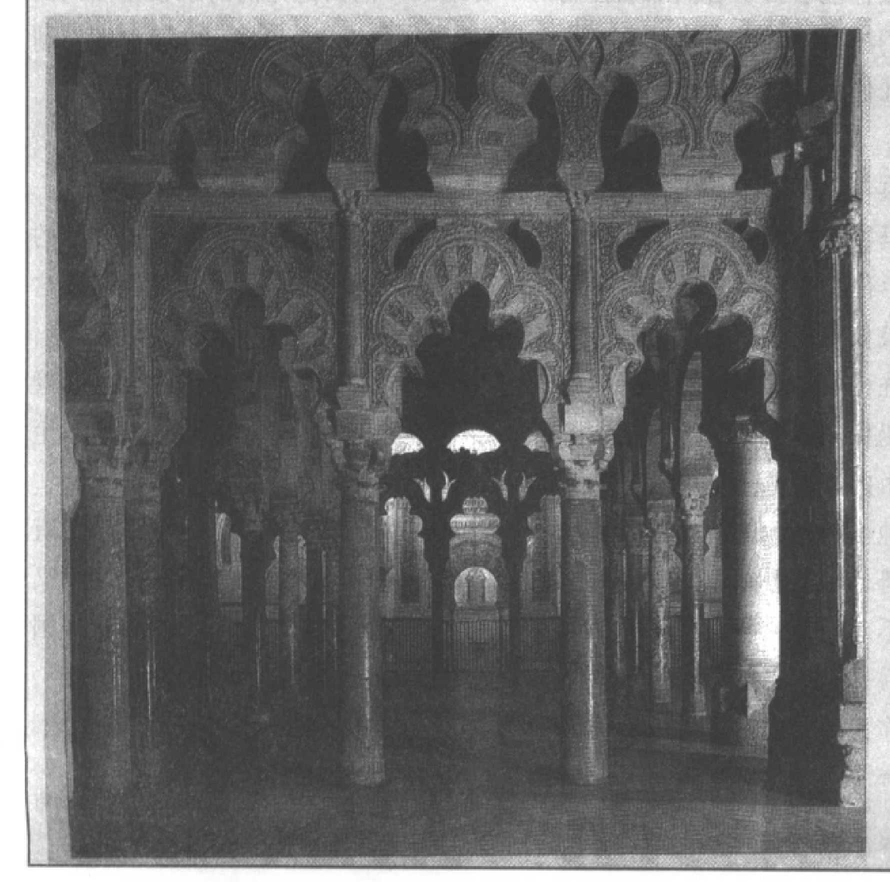
在拉赫曼三世（912~961年在位）统治下，科尔多瓦达到其鼎盛时期。他统治时期，西班牙伊斯兰的疆域也达到了极限：每年5月都会发起对基督世界边疆的战争。他拥有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他的财富在伊斯兰世界无人能比，公元929年，他自称为哈里发。这一辉煌盛世一直持续到拉赫曼的合法后继者哈凯姆二世和篡位者曼苏尔时期，直到1013年，科尔多瓦在柏柏尔人的进攻中沦陷。

科尔多瓦常常受到阿拉伯历史学家的赞颂。在这座大城市里，市民生活非常惬意，他们拥有流动的河水，干净、明亮的铺有路面的街道。它是一个知识文化中心，号称拥有70家图书馆。哈凯姆二世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集合了来自伊斯兰东方各地的饱学之士，他的图书馆藏书40万册，堪称伊斯兰世界最大的图书馆之一。确实，科尔多瓦一直以它的书籍和市民对图书艺术的热爱而久负盛名。妇女们是著名的誊写者，许多人专门在书市里誊抄《古兰经》。她们也扮演着教师、图书管理员、医生和律师等角色。科尔多瓦的学术研究涵盖范围极广，包括从对正统伊斯兰教的研究到希腊人建立的各种科学的研究。艺术和手工艺也十分发达：水晶饰品的生产主要是面向本地市场，而珠宝和象牙雕刻则广泛出口到其他国家。在它的文化繁荣中，也有非穆斯林的功劳，基督徒主要从事政府工作和艺术工作，犹太人主要从事学术研究，犹太文化在哈里发的统治下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复兴。今天有两处景观仍然标志和见证着伍麦叶时代科尔多瓦的辉煌：宰赫拉宫遗址和科尔多瓦清真大寺；前者是拉赫曼三世在城外建造的、用他最心爱的妻子的名字命名的宫殿建筑群，后者则是倾倒中世纪欧洲的建筑杰作，也是穆斯林世界四大奇观之一。





阿卜杜·拉赫曼三世新首都宰赫拉宫遗址，位于科尔多瓦西北约2英里处。1910年开始发掘，一直持续至今。这是哈里发的宫殿，政府所在地，据编年史家记载，它可以容纳2万人。现存的相关资料中，有关于10世纪时在此地接见许多外国使臣的详尽报道。这些使臣中，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鄂图大帝派遣的1名特使和拜占庭皇帝的2名特使，他们带来了丰厚的礼物，其中包括狄奥斯科里得斯的《植物论》一书（希腊文）。



科尔多瓦清真大寺，是伍麦叶西班牙繁荣昌盛的最重要的代表，它长195码，宽140码（一码为0.914米）。图示哈凯姆二世专用礼拜室的圆形屋顶，这个礼拜室即后来人们常说的威拉威斯克萨小教堂[①]。这里和米哈拉布[②]的镶嵌图案是应哈凯姆的要求，奈塞弗勒斯二世福凯斯皇帝差遣了一名拜占庭工匠进行指导，并送来3500多磅金色立方体镶嵌砖修建而成的。当时哈里发的意图是想超过大马士革清真大寺。

从哈姆二世的礼拜室看米哈拉布，它是这座大清真寺的极致。到达米哈拉布的跟前要穿过由多重圆形突出部组成的非凡的系列，它们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弓形结构，这代表着与阿卜杜·拉赫曼一世建造的清真寺有所不同，是一种新的审美艺术。米哈拉布的装饰十分豪华精致；它在边缘上书写着的文字提到了哈凯姆二世，还包含有引自《古兰经》的诗文。

① 是后来建成的第一个基督教私人祈祷处——译者。

② 阿拉伯语音译，意为“壁龛”，位于清真寺正殿纵深处墙正中间，指示麦加方向——译者。

马蒙是在另一次内战，即第四次内战之后掌权的。哈伦·拉希德曾指定让他的儿子阿敏（809～813年在位）做他的继承人，并任命另一个儿子马蒙掌管呼罗珊，条件是他要继承阿敏。在这之前，阿拔斯王子还没有当过呼罗珊总督的，这两个兄弟之间的不和很快发展成公开的战争。马蒙打赢了，但是由于其兄阿敏代表着他的前辈苦心经营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力机构，而他的取胜使得他统治所需要的这一特殊组织威信扫地，于是他开始不顾一切 25 地寻找替代者。他在呼罗珊驻扎下来，同当地统治者与贵族结盟：这些人开始成为新的精英。816年他将他的继承人阿里·里达称做伊玛目什叶派的第八伊玛目，并将阿拔斯王朝的颜色由黑色改为绿色，他以此作为他开创新的秩序的标志。伊拉克以反叛作为回应，谴责称里达为第八伊玛目是琐罗亚斯德教徒的阴谋。伊拉克人推举了另一个阿拔斯君王。其他省份也陷入混乱，马蒙于818年屈服，取消阿里的继承人地位，并返回伊拉克。

然而他继续偏好什叶派教义，最后试图宣称他自己拥有什叶派伊玛目的宗教权威。他在833年去世前不久下令进行审问（米哈奈[①]）：凡在他的地区里的所有的乌里玛都要签字接受关于《古兰经》的教义，对这一教义凯拉姆实践者表示赞同，但学者不愿意接受。如果接受这一教义，就等于承认哈里发和他的宫廷神学家比他们更了解什么是伊斯兰。这种审问持续到穆塔瓦基勒（847～861年在位）统治时期，但从未获得过成功。哈里发的问题是没有作为集体能够对学者们加以控制的学者组织。他们把他们的宗教领导归因于他们的追随者的非正式的赞同；这种赞同来自下面，不能用在哈里发控制下的任何手段从他们那里夺走。

奴隶兵

28 马蒙的继承者穆尔台绥姆（833～842年在位）开始实验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他从中亚的突厥人中招募他的精锐部队，这些人以骑马射箭闻名。这些人被奴役的时间很长，为的是掌握他们本土的技艺，他们被带到伊拉克，安置在穆尔台绥姆的新首都萨马拉，并皈依伊斯兰。然后他们被解放（尽管后来仍保持奴隶的状态），被用于当兵、当长官和当总督。他们终于将中东生来自由的穆斯林从中央政府里撵走了。

他们与当地的奴隶（更不用说兵营里的奴隶了）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有钱有势，不会被强制。但是由于他们是外来人而不是中东的穆斯林，因而又可以不对当地利益与公众理想承担责任。他们作为奴隶，而不是自由的外国雇佣兵，是统治者（或是其军官）的私人侍从：他占有他们以及他们的财产，或者作为他们的前主人，可对他们提出特殊的要求。他们服务于他，把他当

① 意为“甄别”、“审问”，指833～848年阿拔斯王朝为推行穆尔太齐赖派教义而推行的异端审判——译者。

作他们私下的主人,忠实于他,而不是忠于他不能代表的共同体。

当招募不到突厥人的时候,便从斯拉夫人、非洲人等其他人中招募奴隶士兵(马穆鲁克)。后来,从14世纪起,奥斯曼人甚至在他们自己的巴尔干农民中招募奴隶士兵,尽管这是不符合伊斯兰法的,奥斯曼人也给他们以官僚机构中的高级职位。

阿拔斯帝国的解体

尽管在穆尔台绥姆的控制下,新的军队很有能力,但不能阻止阿拔斯帝国的分裂。事实上,阿拔斯人从未统治过整个穆斯林世界,因为就在他们接管西班牙期间,在伍麦叶王朝一位亲王的领导下,西班牙分离出去了。今摩洛哥的大部分不久也在伊德里斯王朝(公元789~926年)的阿里朝领导下脱离出去。哈伦·拉希德给予北非其余地区总督以自主权,换取他们每年纳贡,于是建立了阿格拉布王朝[1](800~909年)。不久,在马蒙回到伊拉克以后,他同意在呼罗珊建立新的世袭王朝——塔希尔王朝(821~873年),最后这两个王朝至少确实是与巴格达进行了合作,但以后阿拔斯哈里发国便宣告解体了。

861年突厥士兵在萨马拉谋杀了穆塔瓦基勒,开启了一个一直持续到945年的混乱时期,其中只有短时间的秩序恢复。第二代突厥士兵伊本·图伦868年在埃及富庶省份宣布自己独立。大约在同时,锡斯坦(伊朗西南部)城市帮派的平民领袖铜匠亚库布征服了锡斯坦,推翻了呼罗珊的塔希尔王朝,在开始征服伊拉克时于876年被打败;他于879年去世,他的兄弟不久被萨曼王朝赶走,萨曼王朝在哈里发的首肯下统治呼罗珊和河中地区[2],直至1005年。869~883年在伊拉克南部发生大规模的造反,当地长期使用非洲奴隶,用于整治盐碱化的土地以利耕种,办法是去掉土壤中含有的可在市场销售的硝酸钾。他们的造反难以平息,原因是他们集中于沼泽地区,传奇式的突厥骑兵全无用武之地。哈里发的哥哥穆瓦法克将他们镇压下去,他打败了铜匠亚库布,升为摄政王。 29

穆瓦法克开创的恢复过程由其继承者们持续下去,905年重获埃及。但是908年巴格达的官僚们把未成年人穆格台迪尔推上了王位,他成年后的惟一技能是当一个挥霍者,王朝的衰微已不可逆转。不久,他又失去了埃及,先是归于奴隶出身的士兵之手,继而归于法蒂玛王朝(969~1171年)。法蒂玛王朝领导激进的什叶派(即大家都知道的伊斯玛仪支派)运动,于909年征服了北非。在整个肥沃的新月地带,半自治的统治者和军阀也已出现。945年来自里海沿岸的伊朗雇佣兵布韦希人征服了伊拉克,他们统治伊拉克和伊朗

---

① 9世纪统治北非易弗里基亚(迦太基附近,原为罗马一行省的名称)的王朝——译者。

② 指阿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译者。

西部达数百年，将哈里发降为傀儡。1055年巴格达为塞尔柱人所占领，他们是来自中亚的突厥侵略者的领头人，从那时起到1918年伊斯兰中心地带（有不同程度的断裂）便处于突厥人的统治之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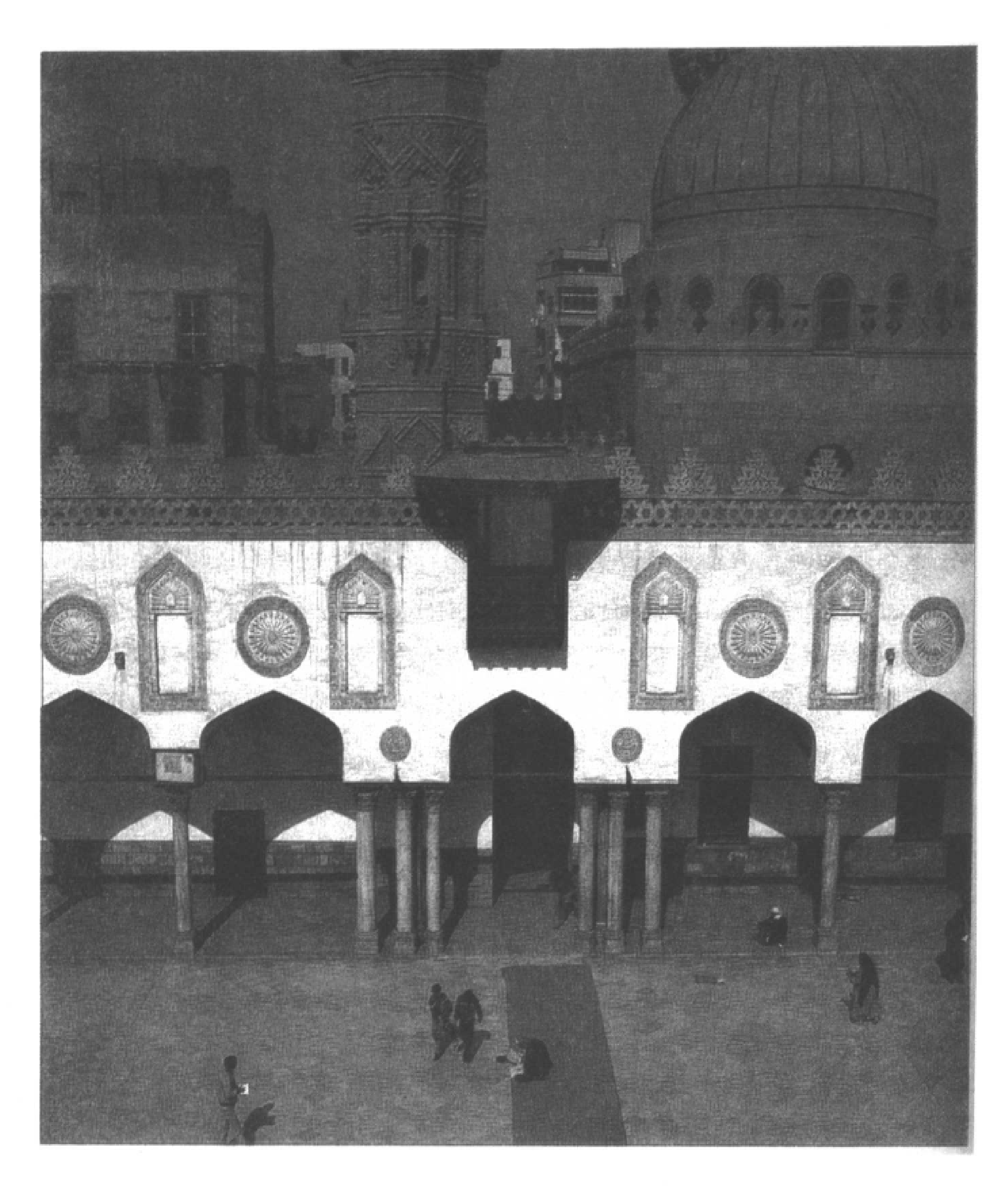
第10和第11世纪

伊朗的苏醒

在突厥人侵以前的两个世纪，许多穆斯林担心伊斯兰时代正在走向终结。拜占庭人969年再次征服了叙利亚北部的一些地方，使穆斯林第一次感受到土地失于异教徒的滋味，逐渐产生怕失去得更多的担心。伊朗人看来也要回来，因为从塔希尔王朝以后，他们再次统治了伊朗。同时代的人对下述情况感到伤心："伊斯兰的衰弱与消失……拜占庭人战胜了穆斯林，朝觐受到破坏，圣战的缺乏，道路之不安全和被破坏，群雄割据。"诸如此类的寓言盛行："某个人将会站出来，恢复琐罗亚斯德教的主导地位……结束阿拉伯人的权力。"尽管十字军在拜占庭人之后接踵而至，但是东地中海仍属于穆斯林，而伊朗换的新颜仍然在伊斯兰之内，而不是在伊斯兰之外。

琐罗亚斯德教作为小的宗教成绩欠佳，复兴的机会也很渺茫。在里海地区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反伊斯兰的意向，布韦希人及其他冒险家即来自该地区：有一个叫阿斯法尔（卒于931年）的人，破坏清真寺，禁止祈祷，还将一报告祷告时刻的人从加兹温清真寺尖塔上扔了下来。另一个里海人马尔达维奇（卒于935年）据传说皈依了伊斯玛仪主义。但是这些激进主义者不久便销声匿迹了，因为尽管布韦希人也是什叶派，而伊朗人却不会成套地搬用未确定的伊斯兰形式。

逊尼派不这样认为。他们已经察觉了9世纪马蒙指定阿里后裔为继承者背后的琐罗亚斯德教阴谋，也察觉了10世纪伊斯玛仪主义兴起背后的另[30]一个阴谋。他们视伊斯玛仪主义为被征服的各族人，特别是伊朗人编造的伊斯兰产生前信仰的大杂烩，目的在于从内部破坏伊斯兰。伊斯玛仪主义实际上是对征服前中东已得到很好验证的宗教观念重新进行伊斯兰的论证而已；然而当时的伊斯兰本身即可以类似地表示出它的特性。但是伊斯玛仪派的看法与逊尼派伊斯兰概念是如此的不同，因而学者们根本不能设想它会是伊斯兰的。尤其是伊斯玛仪派期望救星能带来新的没有法律和仪式的伊斯兰，"没有仪式"在宗教上的含义是，所做的事对所有的人来说都简单明了。为了表明创立这种新伊斯兰的急迫性，尚武的阿拉伯半岛伊斯玛仪派于930年屠杀了朝觐者，并从麦加的克尔白劫走了神圣的黑石。占星术家预言伊朗的帝王统治和伊朗宗教将会恢复，伊斯玛仪派预言"外来"的伊斯兰将会终结，十分明显，对敌对的观察者来说，伊斯玛仪主义确实是伊朗遗产乔



开罗爱资哈尔清真寺的主庭院。法蒂玛人是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运动的领导者，该运动致力于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征服和复兴。909年他们征服北非，969年又征服了埃及，在1171年被萨拉丁平定之前，他们一直保持着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其最著名和古老的遗产是开罗清真寺和爱资哈尔大学，建成于970～972年间，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弘扬伊斯玛仪主义的荣耀；1286年，人们以弘扬逊尼主义荣耀的名义，重新予以开放。爱资哈尔也成为逊尼学派最著名的中心，至今依然如此。

装改变后的复兴。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伊斯玛仪主义的确在伊朗有崇奉者，但是当时它的崇奉者分布的范围异常广阔。例如，为法蒂玛王朝征服北非与埃及的军队是柏柏尔人部落民。尽管存在着连续性，但是在宗教上并不是伊朗 31 让他们恢复原有的地位的。

它也没有恢复伊朗帝国的认同。据传阿斯法尔和马尔达维奇都计划恢复伊朗帝国，945年占领巴格达的布韦希人实际复活了旧帝国“王中之王”的称号，在大部分穆斯林听来，这是一种亵渎。然而他们并没有废除哈里发制度，也没有在地理上或是制度上恢复萨珊王朝。直到现在，没有任何哈里发国，或哈里发国疆域里的任何国家把自己看做是伊朗帝国的伊斯兰化翻版。

伊朗确实回到从前状态的是在语言和文化方面。叙利亚、埃及和伊拉克皈依伊斯兰教者采用了阿拉伯语，最终也被看做阿拉伯人，但在伊朗，即使是阿拉伯人也说波斯语，到10世纪波斯语已开始用阿拉伯字母书写，并作为与阿拉伯文同等的较高的文化媒介使用。1010年当费尔道西完成了他的不朽

的《列王纪》的时候，伊朗人有了自己的民族史诗，该史诗记录了有关伊朗过去的神话与历史，并确信：不管有没有政治组织，伊朗人都仍然是他自己。伊朗语言与文化的复兴发轫于萨曼王朝时期，是在逊尼派和突厥人支持下进行的，突厥人也属逊尼派，他们想把伊朗文化远道送往安纳托利亚。

文化的兴盛

第10和第11世纪尽管在政治上很混乱，但文化却格外辉煌。伊斯兰哲学与科学方面最负盛名的人物都出在这两个世纪：例如哲学家兼医生伊本·西拿（阿维森纳，980～1037年）、数学家兼物理学家伊本·海伊撒姆（阿勒哈臻，卒于1039年）以及最伟大的宗教思想家之一安萨里（卒于1111年）等。当西方化的穆斯林赞美伊斯兰文明较中世纪欧洲的文明深奥精致的时候，正是这一时代光芒四射的文化掩藏于他们的心田。对其他生活方式的开放是并不多见的：博学的比鲁尼（卒于1046年）考察了印度异教的本质，诗人们考察了下层社会的生活，伊斯玛仪派思想家考察了著名传说中动物的生活（在这些传说中，动物们不能容忍人类，但能容忍他们自己反对人类）。伊斯兰神秘主义（苏非主义）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获得主导的地位。读者们将会在下一章看到对所有这些问题更为详尽的论述。

第二章　伊斯兰世界体系的出现(1000～1500年)

11世纪初,伊拉克巴士拉城法官马沃尔迪出版了一本政治理论著作,书 [32] 名为《素丹律例》(在中世纪出版伊斯兰著作的方式是在清真寺里读稿)。该书描述穆斯林共同体是如何由它所选出的伊玛目或哈里发进行统治的，这些伊玛目或哈里发授权给他所选定的官员。哈里发及其下属须保护逊尼派的正统性，实施伊斯兰法，从事圣战。马沃尔迪的论述与当时的现实不怎么相称：开罗什叶派法蒂玛哈里发对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领导穆斯林共同体的要求持有异议,科尔多瓦逊尼派伍麦叶哈里发也予以无言的漠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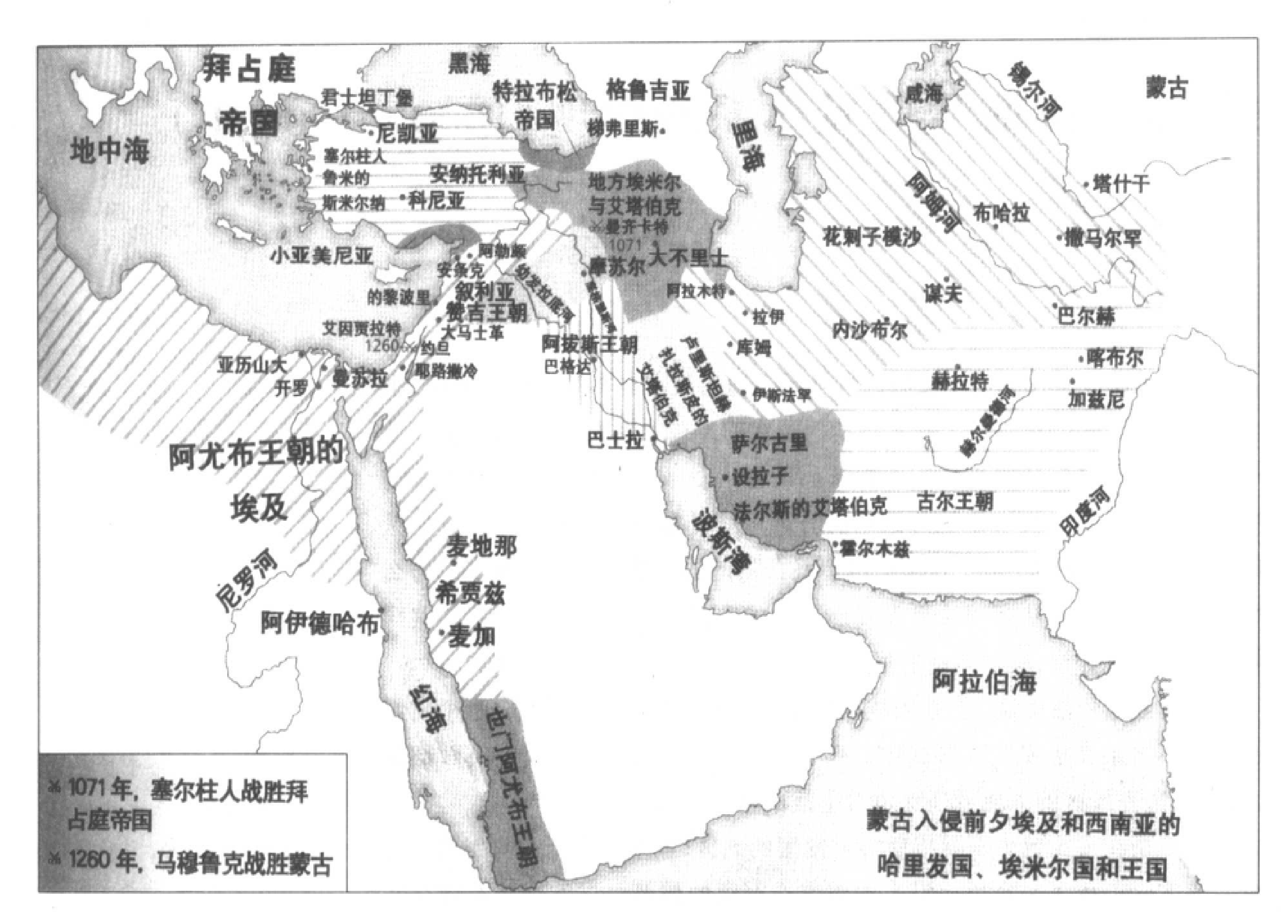
尽管立论依然虔诚,但是阿拔斯哈里发制度已经变成世袭的,哈里发们也早已不再亲自指挥军队对抗拜占庭了。只有阿拉伯人，当时的突厥部落民,以及边界地区的志愿者还保留着圣战的精神气质。

即使是在正式效忠于阿拔斯哈里发国的地区,也不存在统一与一致。哈里发们实际上成了来自里海沿岸的布韦希军阀的傀儡，尽管这些军阀在宗教上确信什叶派教义,但是他们不敢将这一信仰加在巴格达人的头上。布韦希人自称以哈里发的名义管理哈里发的土地,但在7世纪初他们对呼罗珊的控制受到伽色尼王朝的争夺，这是一个源于马穆鲁克（奴隶士兵）的王朝(977～1186年)，其首都在阿富汗东部的加兹尼。在伊朗和伊拉克其他边缘 [33]



君王们以给予臣民受赐长袍的荣誉来表达他们对于臣属的喜爱，这已经成为一种习俗。这些昂贵的长袍也经常作为外交礼物。图中，伽色尼素丹马哈茂德[①](998～1030年在位）正当着众人穿上阿拔斯哈里发赏赐的荣誉之袍。马哈茂德是一个逊尼派穆斯林王公，他慎重地把哈里发的名字刻在所辖疆域流通的钱币上，以此表示对哈里发的臣服。此画出现于拉西德丁(伊朗境内一蒙古伊儿汗国的高官)的《世界历史》一书(完稿于14世纪初）中。这幅在1306～1307年间于大不里士完成的特殊手稿中的插图，体现出中国绘画技艺和风格的影响。

① 又译马默德——译者。



地区，布韦希人的处境也与此相似，被迫向地方政权交出权力。

当时一个流行的说法是："预言和哈里发职位属于阿拉伯人，而帝王统治属于波斯人。" 费尔道西的《列王纪》被呈献和赠送给加兹尼的马哈茂德（998～1030年在位），该书吸收了伊斯兰产生前萨珊的政治传统，同《素丹律例》相比，具有更为现实主义的眼光。费尔道西把国王们表现为易犯错误的人，而君主制度则是必要的罪恶，因为它提供了某些保护，不受外国的侵略。费尔道西和其他波斯人的著述提供了在中世纪伊斯兰君主的意识形态与宗教仪式的影响下，统治与合法性的诸种模式。费尔道西的诗句也提供了在伊斯兰心脏地区种族关系紧张的迹象：波斯的英雄先是同有一千年历史的恶魔似的阿拉伯食人生番扎哈克打仗，继而同都兰人打仗，他们是费尔道西历史里突厥人的先民。奇怪的是，尽管费尔道西对都兰人的描写不怎么友善，但是突厥人几乎同波斯人一样喜爱他的史诗。

法蒂玛王朝

14世纪北非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1]写道："要知道，这是所有伊斯兰人民共同持有的看法……到世界末日，肯定会有出身先知穆罕默德家

① 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阿拉伯政治家和学者，主要活动于马格里布与埃及——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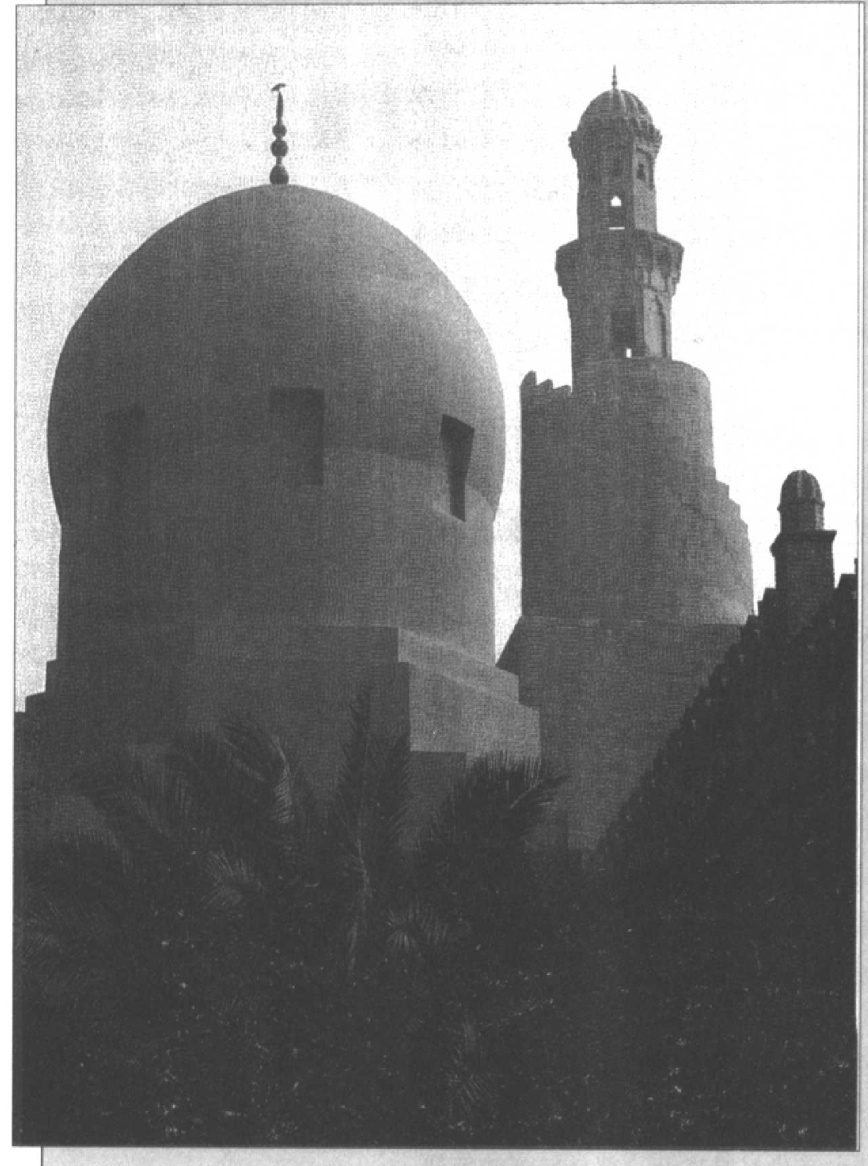
族的一个人现身，他将支持本信仰，并使正义得到伸张。穆斯林们将追随着 [34] 他，他将在整个伊斯兰范围内行使统治权。他将被称做‘马赫迪’。”在北非，10世纪法蒂玛王朝早期的哈里发们被他们的追随者看做是神指导的人物，注定要在世界上推进伊斯兰正义。然而到11世纪，这种末世论降了温，法蒂玛哈里发国也成了与邻国没有多少区别的地域政权了。11世纪中叶波斯什叶派留学埃及的学生纳绥尔·霍斯鲁说的话，可使人逼真地想像法蒂玛宫廷的卖弄奢华：“御座的周围是金格子的栏杆，其美妙壮观之处难以尽述。御座的后边是银子做的台阶。我看到一棵像是橘树的树，其枝、叶、果实皆用糖做成，那里还有1000个小雕像、小塑像，也都用糖制成。”同意识形态相比，商业与农业的繁荣以及大群各色各样的军队对哈里发国的幸存起了更大的作用。

反复无常、偏执古怪的法蒂玛哈里发哈基姆(996~1021年在位)在埃及向他的某些臣民施舍大量钱财，而又将另一些人处死。他迫害犹太人和基督教徒，颁布法令禁止养狗、下棋和商店在日落后开门营业。他让制鞋者停止制作女鞋，并打算禁止妇女到公共澡塘洗澡。如在澡塘发现她们，则用砖活活地将她们围砌在里头。法蒂玛王朝正是凭借这种制度使他们得以持续繁荣和使领土得以扩张。埃及、昔兰尼加、希贾兹、叙利亚(北边远至大马士革)都由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委派的总督管理。的黎波里塔尼亚和突尼斯的统治者像西西里的阿拉伯统治者所做的那样，都宣称自己是哈里发的仆人。法蒂玛王朝打算利用伊拉克布韦希王朝解体这一良机。1010年库法的总督反叛巴格达，支持法蒂玛哈里发国。别的地区的王子们和军事冒险家们也照方抓药。1058年突厥军官白萨席里甚至迫使巴格达和阿拔斯哈里发承认法蒂玛哈里发穆斯坦绥尔(1036~1094年在位)的最高权力。这标志着中世纪什叶主义的政治高潮。

法蒂玛王朝同阿拔斯哈里发国进行口诛剑伐的战争。的确，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派遣传教师传经布道、搅乱阿拔斯臣民的人心，而不仅仅是让他们自己改变信仰。这样，“七伊玛目派”什叶主义仍只是埃及一部分精英的信仰，逊尼派穆斯林、科普特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人数超过了什叶派。尽管法蒂玛王朝向东方伊斯兰派遣间谍与传教师，但成果寥寥。11世纪末逊尼派伊斯兰复兴，这是由于在前一个世纪皈依逊尼派伊斯兰的乌古斯突厥人从河中地区进入了近东。法蒂玛王朝在伊拉克的成功被误解了。白萨席里被迫离开了巴格达，依种族分开的人群在埃及进行搏杀。北非受法蒂玛各路诸侯的支配，西西里处于诺曼底人控制之下，叙利亚沿海的大部分地区受拜占庭、后来是十字军参加者的控制。

35

伊本·赫勒敦



阿卜杜·拉赫曼·伊本·穆罕默德·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不仅是用阿拉伯语写作的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而且还被证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哲学家。在完成多卷本的世界历史著作《殷鉴之书》①时，他撰写了该书的长篇理论性前言，名为《绪论》。在《绪论》中，他提出了自己关于王朝和文明周期性兴衰更替的理论。根据他的思想，每个文明都有一个前定的生命周期。当一种文明衰落时，社会团结的纽带就会削弱，而且要受来自边疆地区强健的游牧民的挑战。这些游牧民的社会纽带强大有力，一旦成功，他们将建立一个新的政权，但这一政权也将受到历史衰落法则的支配。

伊本·赫勒敦在1375年弃政从文，此后的3年时间里，他隐居在阿尔及利亚西部一个偏远的地区，专心撰写他的巨著。他发现自己关于游牧民和新政权形成的理论在历史上有许多唾手可得的论据，不仅可以从伊斯兰教初期征服中，而且也可从他所处时代的北非历史事件中找到有力的证明，本地区柏柏尔人的穆拉比特王朝、穆瓦希德王朝②和马林王朝的交接更替和此起彼伏在他形成自己理论观点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他的历史观同时也受到了1340年代黑死病灾难的影响，那场灾难夺走了他的父母、许多老师和朋友的生命。这一经历使得他持一种从根本而言是悲观的态度："伊斯兰教历8世纪（公元14世纪）中期，"他写道，"东方和西方的文明都遭遇了一场灾难，这一灾难摧毁了各个民族国家，不计其数的人失去生命。它吞噬了文明中的许多美好事物并将它们连根铲除。它压垮了那些已经老迈的气数已尽的王朝。它削弱了它们的力量，遏制了它们的影响。"

虽然伊本·赫勒敦是在马格里布开始写作他的《绪论》的，但该书却是1382年以后在开罗完成的。和许多来自北非及其他地区的人一样，他也被马穆鲁克王朝素丹为宗教学者提供庇护所吸引。尽管埃及本土学者对他抱有一种忌妒的敌意，但伊本·赫勒敦依然来到本图中开罗的阿米尔·萨尔基特米希斯经学院，以及其他一些宗教机构讲学。他惊讶于这些大城市里令人眼花缭乱的手工艺品、服务业和娱乐设施，但是他倾向于把这些奢侈生活看做是一种文化颓废的征兆。

① 全名为《阿拉伯人、波斯人、柏柏尔人历史殷鉴和原委》——译者。

② 中世纪柏柏尔人在北非及西班牙南部建立的伊斯兰王朝（1147~1269年），西班牙语称"阿尔穆哈德王朝"（Almohades）——译者。

西班牙与马格里布

摩洛哥从来不是法蒂玛王朝的一部分。在11世纪初该地区被柏柏尔的 [36] 3个部落联盟——扎纳塔、麦紊木达和桑哈贾分割。每一个部落联盟都分散在广阔的地域，但桑哈贾在阿特拉斯山脉与塞内加尔河和尼日尔河之间的撒哈拉沙漠占据支配地位。桑哈贾人名义上是穆斯林，但许多人崇拜"隐约发光的山"，迷信地想去抚慰潜藏在树木与岩石中的神灵。桑哈贾人伊本·亚辛(卒于1059年)曾在科尔多瓦跟随马立克·伊本·艾奈斯(卒于795年)学习马立克教法，他被桑哈贾头领请去，让他告诉部落民他们哪些事做得不对。伊本·亚辛和他的追随者本着马立克教法学派切实、严格地崇奉《古兰经》和逊奈(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的宗旨，宣讲执法时不能触犯宗教法，不准征收《古兰经》里未准征收的税款，不准雇用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担任高级管理职务。伊本·亚辛及其穆拉比特运动的追随者用剑强迫实行其正统主张。"穆拉比特"来自意为"驻防军"的阿拉伯字音，指驻扎在设防的道堂中的圣战志愿者。穆拉比特人在祈祷时如同打仗一样训练有素。伊本·赫勒敦在回顾他们的成就时评论说："在马格里布，有许多部落在数量上或在团队感情(阿萨比亚)上与他们不相上下，或者超过他们。然而他们由于知道拥有正确的精神修炼，也愿意赴死……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他们，所以他们的宗教组织的力量双倍于他们的团队感情。"

那么，很自然，西班牙的穆斯林王子们求助于穆拉比特人，让他们帮助抵挡基督教的再次征服。11世纪初科尔多瓦的伍麦叶哈里发国开始经受派别冲突的严重伤害，同折磨法蒂玛哈里发国的派别冲突种类相同。1013年大群反叛的柏柏尔人劫掠了科尔多瓦。安达卢西亚诗人伊本·舒海伊德痛悼该城壮观景象之被毁：

> 一个正在死去的女巫，
> 但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 是一个美貌的姑娘。
> 她一直向她的男人们串演淫妇，
> 然而这又是一位多么秀丽的淫妇！

在傀儡哈里发们的统治下，内乱期间哈里发国假装尚在支撑的局面虽维持于一时，但1031年希沙姆三世去世后，这种做法便被放弃了。实际进行统治的是"太伊发"(派别或"朋党"的国王)，即在塞维利亚、格拉纳达、萨拉戈萨或其他地方的地区王朝，它们相互之间接连不断地进行战争。这些帝王的名字是从阿拔斯哈里发们那里找来的，难怪一位诗人抱怨说："在安达卢西亚这块地方，令我烦恼的事情之一是穆塔迪德和穆塔米德一类的名字：是

一些不相称的王族的名字，像是一只猫，而它趾高气扬的说话样子却像一头狮子。”这些小诸侯单独控制的资源太少，无法保护其臣民不受基督教徒利用穆斯林内乱之机日益频繁的入侵。有的“太伊发国王”与其说担心基督教徒的敌意，不如说担心穆拉比特人的支持，但是塞维利亚的统治者穆塔米德宣布，他宁愿在北非当一个骆驼放牧人，也不愿在基督教徒统治下当一个猪倌。他写信给穆拉比特的军官优素福・伊本・塔什芬：“[莱昂王国的阿方索六世] 已经到我们这里来，要求提供布道坛、清真寺尖塔、米哈拉布和清真寺，所以他们有可能在这些建筑里竖起十字架，也可能让修道士进行管理。”他要求穆拉比特人给予支持。1086年阿方索夺取托莱多之后，伊本・塔什芬率领的一支军队，对要求帮助的呼吁较晚才做出回应，并进入西班牙，在扎拉卡战役中打败了基督教徒。然而尽管取得了胜利，他们对圣战也进行了宣传，但是穆拉比特人更为成功的是将这些“太伊发”公国并入自己的帝国，而不是抵制基督教的推进。穆拉比特人的热情终于消失了，做出了有利于其王朝对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和对北非统治的妥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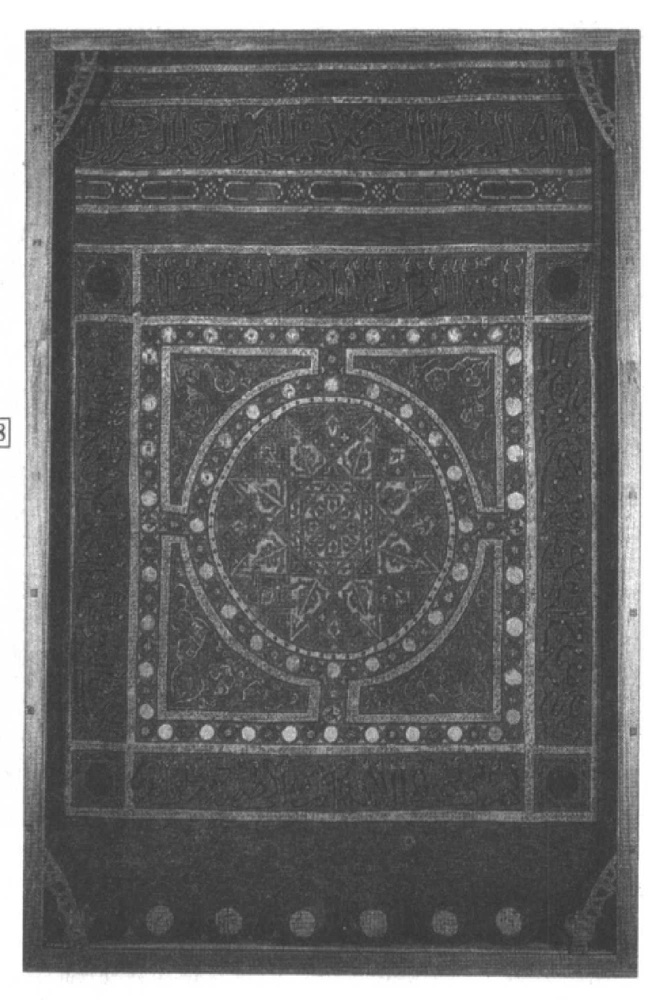
在12世纪穆拉比特人被另一个王朝所取代，后者与前者相似，其权力也起源于在北非柏柏尔人中发生的宗教复兴运动。穆瓦希德王朝的名字来源于穆瓦希德，即“断言‘真主是惟一的’的人”。该王朝主要从麦素木达柏柏尔人中招募追随者。其创立者伊本・突麦尔特是安萨里（1056～1111年）神秘教义的苦行热衷者。有关伊本・突麦尔特传经布道的各种故事到处流传。人们认为他有不可思议的能力，能通过观沙预卜吉凶，能起死回生，但是敌视他的善辩者指责他在墓地的下面藏有同谋。1125年他自称马赫迪，“信仰马赫迪是一项宗教义务，谁如果怀疑马赫迪，谁就不是信徒……可以想像他是不会犯错误的。他并不想经受竞争、或反对、或抵制、或反驳、或争辩，他……的这些话是真诚的。他将把压迫者与冒名顶替者分隔开，他要征服这个世界，既包括东方也包括西方，并要以正义填满它，正如它一直被非正义填满那样，他的统治将一直持续到世界的末日。”在突麦尔特助手阿卜杜・穆敏的统帅下，穆瓦希德人攻打穆拉比特王朝在北非的属地，1151年摩洛哥获胜。1157年他们跨入西班牙，占领了阿尔梅利亚和格拉纳达。1195年他们在阿拉尔科斯打败了基督教徒，但是在阻止基督教徒在该半岛获益上，他们也不比穆拉比特王朝更为成功。1212年他们在托洛萨的拉斯纳瓦斯战役中被击败之后，穆瓦希德人撤出西班牙，他们的属地逐渐被扎纳塔柏柏尔人的王朝——马林王朝占去。

突厥人的光临

在东方，逊尼派信仰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乌古斯突厥人的大

量流动，以及河中地区乌古斯最重要的氏族塞尔柱人先是对伽色尼王朝后是对布韦希王朝的胜利。伽色尼帝国的版图在极盛时期包括今伊朗的大部分、呼罗珊、阿富汗、印度的西北地区以及巴基斯坦。1016～1037年伽色尼帝国也握有河中地区，但是他们对这个地区的控制从来就得不到保证，而且严重依赖于受雇的骑兵辅助部队。至少从9世纪起，阿姆河两岸一直是招募突厥雇佣兵和马穆鲁克的主要场所，9世纪波斯小品文作者查希慈[①]写道，突厥人“对 38 技艺或商业，医药、几何学、水果栽培、建筑、挖水渠或收税均无兴趣，他们关心的仅仅是劫掠、追猎、马术，与敌对头领进行小规模的冲突，获得战利品，以及入侵别的国家”。

直到11世纪突厥人才在穆斯林心脏地区的政府与战争中取得支配的地位，广义地说，这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帝国被肢解以前，他们都一直未曾放弃的地位。1025年伽色尼王朝统治者马哈茂德邀请塞尔柱人作为在呼罗珊的雇佣兵为他效劳，但是他们在1036年造反，1038年夺取了呼罗珊的主要城市内沙布尔的属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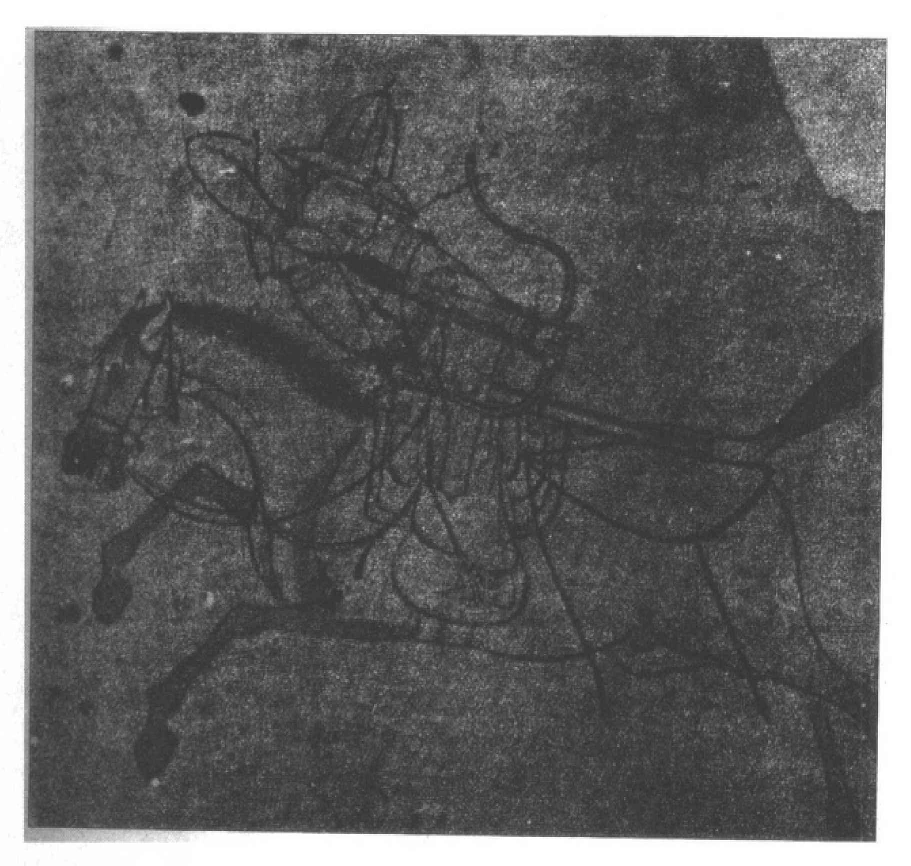


图中展示的穆斯林战旗，以前一直被认为是基督徒在1212年托洛萨的拉斯纳瓦斯战役中从穆瓦希德人手中缴获的，但事实上似乎是在稍晚时期针对西班牙穆斯林的战斗中截获的。上面的铭文祈求庇佑先知，还引用了《古兰经》经文。安达卢西亚以其高品质的丝绸编织技巧而闻名于世。

突厥人在同伽色尼王朝进行的战争中，以及在后来同法蒂玛王朝、拜占庭人及其他人进行的战争中，宁愿持续地打一些小仗，而不愿进行对阵战。据传说，在他们同加兹尼的马苏德打仗期间，在一次集会上，他们得出结论说：“我们是草原的居民，很能耐受酷暑严寒，但他和他们的军队则不能，只要受一会儿这样的苦难，便不得不打道回府。”塞尔柱部族分享着对突厥人当中游牧民的领导，到11世纪中期，塞尔柱部族已经征服伽色尼王朝在河中地区、呼罗珊和伊朗的地域。1050年图格鲁勒·贝克[②]从巴格达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那里得到素丹的头衔；他是正式使用这一头衔的第一位穆斯林统治者。后来在1055年他把什叶派的布韦希人赶出了巴格达，在这之后，哈里发们发现他们有了较多的灵活性。不仅是他们新的保护人逊尼派穆斯林，他们自己也很少访问巴格达，他们宁愿先是在内沙布尔，后来是伊斯法罕进行统治，实际上常常在移动的军营里进行统治。从长远看，未开化的突厥游牧民流入中东是有好处的。突厥骑兵巡逻给商人提供了安全保障，部落经济也可生产能与城市进行交易的鲜肉、兽皮与纺织品。塞尔柱素丹散加尔(1118～

① 查希慈(约776～869年)有时也被看做阿拉伯著作家——译者。

② 贝克，或伯克，原为官名，后成为荣誉头衔——译者。



突厥骑兵弓箭手是佯作撤退和射回马箭的能手：他们从马鞍上向后发箭。图中的射手用的是一种复合反弯弓，用多层角质物、动物筋和木头制成。突厥人喜爱的这种弓，比中世纪著名的英格兰长弓射程还远。

1157年）的敕令说“好处来自他们（游牧民）的物品与货物，这些东西是定居39 人民繁荣、满足与收益之所以能够增进的一个原因”。

塞尔柱人到10世纪末已皈依伊斯兰，也许是云游突厥草原的苏菲派传教士从中起了作用。这些苏菲派苦行者以逊尼派为主，逊尼派伊斯兰的强大明显是塞尔柱得胜及其向西移民的结果，这种移民是通过乌古斯其他突厥人的伊斯兰地域进行的。

塞尔柱人自我估价中的重要之点是，他们认为自己作为优秀的种族注定要统治世界。塞尔柱血统的创立者与部落齐名，具有传奇色彩，他抱有一种预言家的梦想：向整个世界尿出烈火。11世纪词典编辑者喀什噶尔的马赫穆德在一本突厥语词典的前言中说：“我已经看到，真主已促使帝国的太阳从突厥人的房子里升起。”

尽管这个“优秀的种族”是突厥族，但他们的官僚与朝臣说的却是波斯语。波斯大臣中较杰出的是尼扎木·穆尔克（1018～1092年），他是素丹阿勒坡·阿尔斯兰（1063～1072年在位）和素丹马立克·沙（1072～1092年在位）的大臣。在11世纪80年代末尼扎木·穆尔克撰写了《政府之书》，书中描写了塞尔柱素丹国的行政机关和前波斯王朝浮华的宫廷仪式，对训练小侍从和宫殿仆人提出忠告，建议雇佣各种族的马穆鲁克，以与突厥武士保持平衡，赞成向国家雇员包出税收。尼扎木·穆尔克对阿拔斯哈里发国的论述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即将它作为没有政治重要性的机构加以论述。此外，他的

关于良好管理的社会的蓝图没有给正统的护卫者和特许的伊斯兰法的诠释者——乌里玛分配任何角色。

乌里玛

一般来说，素丹们向乌里玛提供的是保护，而不是权力。乌里玛反过来向素丹们提供的是合法性。1067年尼扎木·穆尔克在巴格达建立了第一所麦德莱赛，麦德莱赛是传授研究和宣传逊尼派版本的伊斯兰法的学院，好象已首次出现于伽色尼王朝的呼罗珊。但在塞尔柱时代，这一机构已扩大至伊朗，乃至更西的地方。人们常说伊斯兰没有教士。如果认为教士是指介于人民与真主之间、因被授予圣命才能被分辨出的人的教职，那么说伊斯兰没有教士是对的。但是如果从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教士”一词，那么中世纪伊斯兰是有教士的。有很大数量的人附属于清真寺，因从事服务而得到他们的一些俸禄。伊玛目是穆斯林集体礼拜时的领拜人，海推布是布道者，穆格里诵读《古兰经》，穆安津按时呼唤信徒做礼拜，穆夫提发布依法进行的修正，等等。从11世纪以后麦德莱赛的增多，使伊斯兰教士队伍随着教授、声乐教师、图书管理员的加入“带头巾的男人”行列而大为扩充。在塞尔柱及其后继国的统治下，《古兰经》与伊斯兰法专家——乌里玛的威信明显上升。但是，由于大多数麦德莱赛是素丹、埃米尔及其他政治家建立的，苛刻的宗教法学家认为受雇于其中的乌里玛会有损于自己的名声。

在宽容的什叶派布韦希王朝统治时期，个人主义的学者曾研究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哲学与文学，追求一种思辨的方式，它被心胸比较偏狭的同信一种宗教的人谴责为“非伊斯兰”。塞尔柱的胜利有力地减缓了这一人本主义的复兴。总的说来，具有宗教根基和形式上很窄的课程内容的麦德莱赛成了认知中心。除了给逊尼派乌里玛提供教授的职务以外，麦德莱赛的训练也有利于同什叶派宣传进行斗争。尼扎木·穆尔克的《政府之书》有几章勾勒了什叶派宗派主义者所造成的政治威胁。神学-哲学家安萨里曾影响过柏柏尔马赫迪伊本·突麦尔特，1091年被任命为巴格达尼采米亚经学院首席教授，他写了几篇驳斥伊斯玛仪派什叶主义的论文。但他也写了非常受大众欢迎的《宗教学科的复兴》，他在书中详细地阐述了认为苏菲派神秘主义与逊尼派正统观念存在有一致性的传统论点。在其后的一些世纪，安萨里的学说以及早期苏菲派（如祝奈德和哈拉智）的学说受到大众更广泛的欢迎，这主要归因于济贫院的建立与苏菲派大教团的形成。

40



图格鲁勒·贝克做礼拜。图格鲁勒·贝克和他的兄弟查格里·贝克一起，是取得针对西亚塞尔柱人的胜利的主要谋划者之一，并且还成功地把他们转变成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发起者和卫士。

苏菲派

“罕卡”[①]和“札维亚”[②]这些捐赠资产，最初用作云游各地的苏菲派临时休息之地，但也给俗人增加了对已选择宗教生活的人提供保护和加以控制的机会。来自西班牙的阿拉伯朝觐者伊本·朱拜尔曾于12世纪末访问叙利亚，[41] 关于大马士革，他写道：“苏菲派的修道场所“里巴特”[③]在这里称为‘罕卡’，数量很多……苏菲派这类组织的数量在这些地方真正堪称是最多的，由于真主向他们提供的物品多于生活之所需，消除了对谋生需要的挂念，因而他们得以专心为真主效劳。”

早期的“罕卡”并不是按照派别组织起来的，单个的靠基金建立(或维持)的机构也不是留给特定的教团的，但是在组成“塔里格”[④](字义是道路、方法)之后就变成这样的了。这是些按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苏菲派教团，通常都有从教主到信众的师承系传谱，还有固定的加入教团的仪式。这一师承系传谱通常都可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阿里，乃至先知本人。在13世纪的某个时候，“塔里格”似乎已经开始出现，但是它们通常被指认的创建者似乎在它们的创建中没有起任何作用。例如，卡迪里教团即取名于阿卜杜勒·卡迪尔·吉拉尼，后者是12世纪的苦修者和宣道者，但是在14世纪之前还没有该教团成立的明显迹象。与此类似的是，尽管艾哈迈德·里法伊生活于12世纪，但里法伊教团到很晚的时候才出现，它以大声祈祷闻名，被称为“高声歌唱的苦行者”。

苏哈拉瓦迪耶教团是13世纪30年代由艾布·哈夫斯·欧麦尔·苏哈拉瓦迪[⑤](1145～1234年)在巴格达建立的，它也许是苏菲派的第一个“塔里格”。13世纪稍后时期艾布·哈桑·沙兹里的门徒们在亚历山大建立了沙兹里教团，随后它的分支在北非展开。在广布于印度的库布拉维教团的始祖可追溯到奈季姆丁·库布拉(1145～1220年)。与此相类似，印度契斯提教团也将其精神承传系追溯到穆尔因丁·穆罕默德·契斯提(卒于1236年)。

苏菲派集团在社会与文化上的重要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苏菲派作为传教士来到异教徒的地域。从13世纪起，苏菲派在把伊斯兰的边界推进到孟加拉方面起了主导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塑造成的种族集团是今日穆斯

① 原意为“家”，苏菲派的修道堂——译者。

② 原意为“角落”，中文译作“道堂”，是穆斯林礼拜、静修之地和讲授宗教知识的讲堂——译者。

③ 即札维亚——译者。

④ 除道路、方法外，还有“教田”的意思——译者。

⑤ 一说该教团于12世纪产生，由迪亚丁·艾布·纳吉布·苏哈拉瓦迪(1097～1168年)奠基，其侄子艾布·哈夫斯·欧麦尔·苏哈拉瓦迪予以发展和完善——译者。

林世界最大的种族集团之一。云游四方的苦行者教团中,隶属关系松散的教团,如阿赫默德·伊本·易卜拉欣·亚萨维(卒于1166年)去世后形成的亚萨维教团,在促使中亚的突厥和蒙古的异教徒皈依伊斯兰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奥斯曼帝国不仅有一些最杰出的诗人附属于毛拉维教团,或"旋转的德尔维什",而且毛拉维教团的长老(苏菲派导师)也充当过奥斯曼某些素丹的宗教与政治顾问。广布于中亚的纳格什班迪耶教团有时也会施加政治影响:例如,15世纪末纳格什班迪耶教团的胡瓦加·阿赫拉尔曾是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主要政治家。比克塔什教团[①]苦行者虽有一些不符合公认标准的东西,但仍然引起奥斯曼素丹们的注意;比克塔什教团的巴巴(苏菲派导师)实际上成了近卫军团的随军教士。苏菲派卷入政治方面最为突出者要数阿塞拜疆的萨法维王朝时期。14世纪萨法维王朝的长老们属逊尼派苏菲,是阿尔达比勒圣地的守护者。15世纪他们成为高加索反基督教徒圣战首批领导人,后来是什叶派运动尚武的、马赫迪主义的领导人。(萨法维人从逊尼主义转 [42] 为什叶主义表明,在中世纪二者之间的区别并非像今天那么泾渭分明。)

严格的乌里玛,尤其是遵循严格的罕百里(罕百勒教法学派)的乌里玛,像伊本·泰米叶、伊本·嘎伊姆·昭兹叶等,开展运动反对提高苏菲派某些教主地位的要求,反对朝觐圣墓以求圣徒向真主代祷,反对在神秘的集会上跳舞、唱歌和吟诵情诗。伊本·泰米叶特别攻击里法伊教团苏菲的"奇迹",谴责他们在举行赤脚通过火焰仪式前,在脚上涂抹了用青蛙油脂和橘皮制作的防护油膏。即使如此,伊本·泰米叶和伊本·嘎伊姆·昭兹叶并不反对所有形式的苏菲主义,两人都是卡迪里教团的成员。尽管有些苏菲派教团有地区或种族的诉求,但其他教团则广布于伊斯兰地域:例如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都能找到卡迪里教团的分支。逊尼派穆斯林占压倒多数,尽管比如在比克塔什教团的仪式与习俗中有什叶派的特征,但是苏菲主义扩大流行的总效果是有助于逊尼派走向复兴的。

拜占庭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在第11和12世纪,逊尼派伊斯兰获得了法蒂玛王朝在叙利亚,拜占庭在亚美尼亚和安纳托利亚所失去的土地。在这两个地区走在前面的是突厥的冒险家和战争团伙,塞尔柱素丹对他们的控制有限。塞尔柱对伊朗心脏地带的征服为乌古斯突厥人新的迁移开了路。这些游牧部落在伊斯兰世界的分布很不均匀,大部分往西涌向阿塞拜疆和安纳托利亚的良好牧场。在那里他们发现自己处于战争地带的边缘,居于"加齐"的地域之中,"加齐"是对异

---

① 又译"比克特西教团",或"拜克塔什教团"等——译者。

教徒或基督教徒进行军事劫掠的穆斯林志愿者，他们的期望是要么获得战利品，要么作为殉难者而死。在拜占庭帝国边缘加人“加齐”行列的突厥部落也喜欢把自己说成是“加齐”，尽管他们的前来更像是移民而不是圣战中的劫掠。

“加齐”与部落民的劫掠激起拜占庭皇帝罗曼四世·狄奥根东征的举动，他集合起一支庞大的军队，从君士坦丁堡东进，以求打击塞尔柱人。罗曼四世是一个有才能的军事家，他曾让皇帝通过军事手段明确地解决了边界的问题。但是他的战争行动被误解了，因为突厥素丹阿尔普·阿尔斯兰正计划对叙利亚的法蒂玛王朝进攻，不曾鼓励突厥人对拜占庭属地的袭击。但是，1071年拜占庭军队前进中与塞尔柱人在凡湖附近的曼齐卡特遭遇，据传说罗曼四世·狄奥根曾宣布：“如果这一野蛮人真的希望和平，让他到我的军营来，正式交出他在雷伊的宫殿，以作为安全的抵押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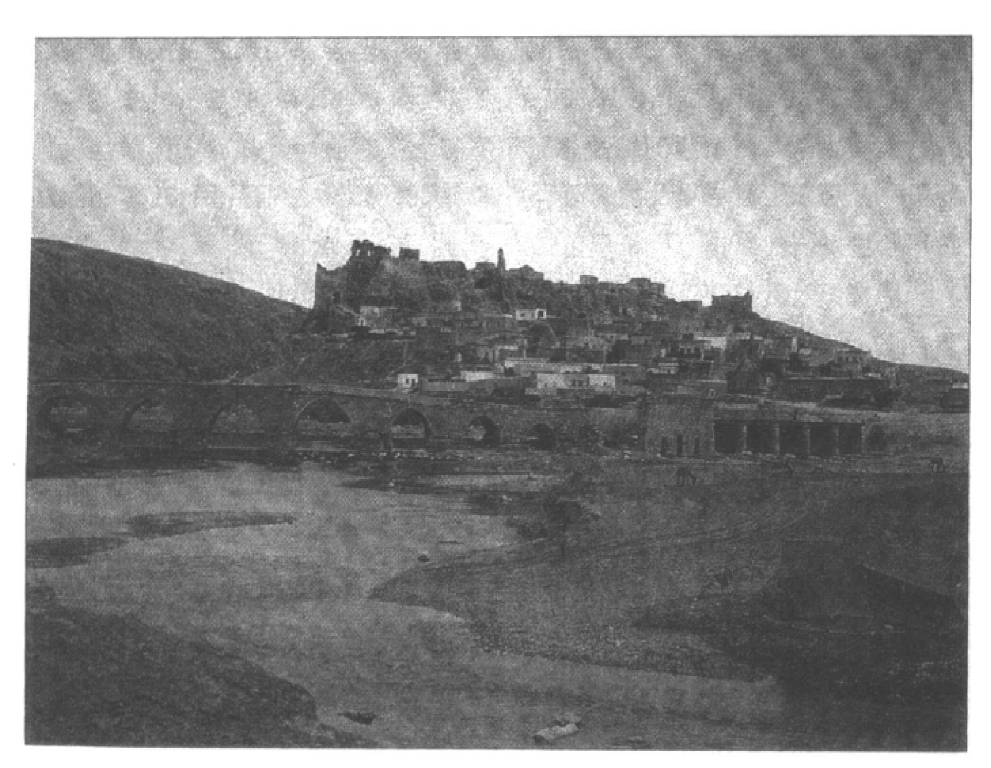
[43] 曼齐卡特遭遇战并不是阿勒坡·阿尔斯兰所寻求的，据说在战争之前他已经穿上裹尸布。拜占庭的失利以及帝国接着发生的内战，为更多的突厥部落与战争团伙进入安纳托利亚清除了所有尚存的障碍。尽管阿勒坡·阿尔斯兰在曼齐卡特战役之后在边界地区小有所得，但是并未表现出对征服安纳托利亚感兴趣。相反，在前拜占庭地域建立了两个突厥王朝。作为塞尔柱人对手的一支在科尼亚建立了素丹国，而具有“加齐”世系的丹尼什门兹王朝对安纳托利亚中部和东部的控制则超过1个多世纪。安纳托利亚的突厥化以及希腊文化的相应衰落是中世纪所发生的最重要人口与文化变化之一。

突厥人前进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导致了第一次十字军的东征。拜占庭皇帝阿列克塞一世·科姆尼纳斯（1081～1118年）是又一个尚武的皇帝，他写信给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击退突厥侵犯方面寻求西方的支持——或许是一支较小的容易控制的外国雇佣军。然而，抵达君士坦丁堡的第一次十字军的领导者们并不想从拜占庭皇帝那里得到什么指示或忠告。而且他们怀有比在安纳托利亚帮助拜占庭更大的野心。在对塞尔柱人和丹尼什门兹人的战争中轻易地获胜之后，十字军涌向叙利亚，以夺取耶路撒冷为目标。当他们到达叙利亚北部时，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些国家拼凑起来的、由敌对的王子和总督控制的军队。塞尔柱素丹长子与突厥部落传统不相容，塞尔柱素丹马立克·沙1092年去世后，素丹国一直因塞尔柱男性亲属之间失和而动摇。在叙利亚，城市的总督们不能协调对十字军的抵抗。十字军在1097年拿下了安条克之后，便进入了巴勒斯坦，并于1099年从法蒂玛王朝手中夺取了耶路撒冷。

13世纪摩苏尔历史学家伊本·艾西尔[1]将十字军置于更广阔的背景

---

[1] 伊本·艾西尔（1160～1234年），伊斯兰史学家，著有《历史大全》——译者。



12世纪,这座位于叙利亚的舍扎尔堡是阿拉伯巴努·蒙齐德氏族的居住地。其最著名的代表乌萨玛·伊本·蒙齐德撰写了一部引人入胜的传记,其中记录了他与十字军的遭遇(并不总是敌对),以及他作为一个猎人和诗人所取得的成功。这座城堡位于穆斯林同十字军国家斗争的前线。

之下:

"法兰克人帝国的首次出现,他们权力的增长,他们对伊斯兰地域的入侵和占领,都发生在伊斯兰教历478年(公元1085～1086年),这一年他们夺取了托莱多以及安达卢西亚土地上其他地方……然后他们在伊斯兰教历484年(公元1091～1092年)袭击了西西里岛并予以征服……然后又甚至强行闯入非洲沿海,夺取了几个地方,不过又被夺了回去。后来他们就征服其他一些地方,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当伊斯兰教历490年(公元1096～1097年)来临之时,他们又侵略了叙利亚的土地"。

即使是当十字军在叙利亚—巴勒斯坦沿海建立起一串公国的时候,夺取耶路撒冷在一开始也未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巴格达卡迪(法官)哈拉维徒劳地闯入哈里发的宫廷,并且训斥他:"当你的叙利亚兄弟们除了骆驼鞍子和秃鹫的肚子之外而别无居所的时候,你怎么敢在自鸣得意的安全的遮蔽下沉睡,像花园里的花卉一样轻浮地过日子?"无论是阿拔斯的哈里发们还是塞尔柱的素丹们,对进行反对十字军的圣战都没有太大的兴趣。对十字军如何做出回应,便留给与十字军国家接邻的穆斯林来定夺了。12世纪40年代在曼苏尔和阿勒颇的赞吉王朝的领导下,才开始有效地宣讲和执行圣战。 [44]

赞吉于1127年被素丹马哈茂德任命为曼苏尔的"阿塔伯克"(总督),他是一位精力过人的突厥官员。他嗜酒,但在其他方面极为简朴,他在其军中维护严酷的纪律:当士兵穿过农田时,"阿塔伯克的士兵看上去像是在两根绳子之间行军"。尽管在抗击十字军国家的赞吉王朝军队中,以生而自由的

突厥人和马穆鲁克突厥人居多，但是赞吉王朝也招募相当数量的库尔德武士。12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法蒂玛哈里发国日渐式微，赞吉的儿子与继承人、大马士革与阿勒颇的统治者努尔丁与十字军的耶路撒冷王国对埃及进行争夺。努尔丁派往埃及的高级官员多半是库尔德人，而且，1171年制服法蒂玛哈里发国的萨拉丁也是库尔德人，属阿尤布氏族。

萨拉丁及其男性亲属宣称以努尔丁的名义统治埃及，但这只是一种伪装：1174年努尔丁去世时，萨拉丁离开埃及，继而占领了大马士革和叙利亚其他城市。对许多叙利亚人来说，萨拉丁是篡夺者。但是，他和他的继承者试图通过对十字军国家进行圣战，证明他们在叙利亚和埃及的统治是正当的。萨拉丁或许是中世纪素丹中最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他受到法兰克人和穆斯林的称赞。即使是穆瓦希德王朝的忠实臣民伊本·朱拜尔，也情不[45]自禁地论及萨拉丁"在世界事务与地区事务中值得纪念的功绩，他在对真主的敌人所进行的圣战中的热情。由于在这块地方（大马士革）以北没有属于伊斯兰的土地……真主出于恻隐之心把这位素丹给了这里的穆斯林，他从不退到休息的地方去，不能长时间地容忍舒适，也不会停止以马鞍作他的会议室"。

1187年萨拉丁在赫汀战役中打败了耶路撒冷王国，并继续从基督教徒手中夺回耶路撒冷。尽管取得了这一胜利，但是萨拉丁及其盟友在反击第三次十字军（1189～1192年）时不得不做出代价昂贵的、流血的努力，13世纪初对它们的回忆可能已经减弱了圣战的热情。直到1291年，埃及和叙利亚的素丹阿什拉夫·哈利勒（1290～1293年在位）才将十字军的最后一个港口夺了回来。

塞尔柱后继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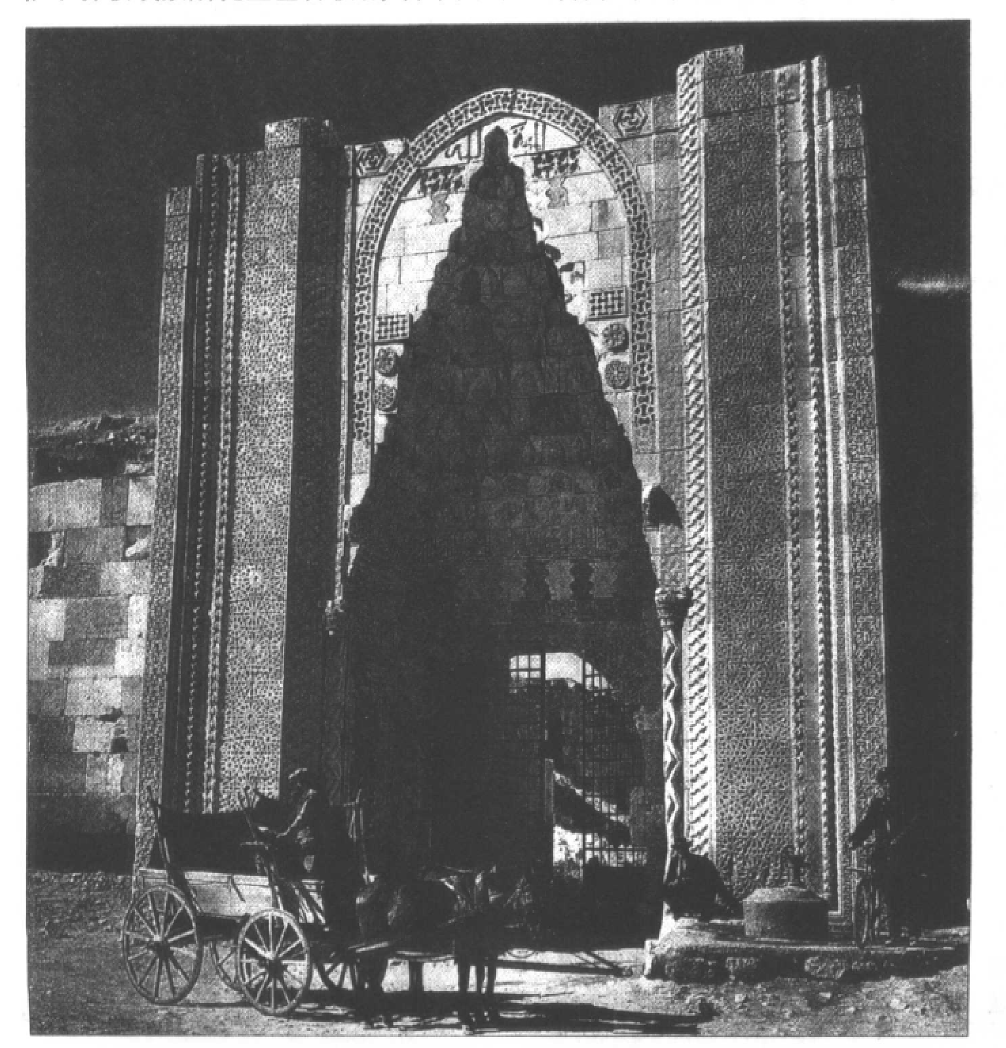
在这一叙利亚反十字军东征过程中，伊朗和伊拉克的塞尔柱素丹只起了很小的作用。他们较为关注的是东方。从12世纪中叶起，呼罗珊逐渐脱离了塞尔柱的控制，原因是塞尔柱政府不能阻止不守秩序的乌古斯部落民更多的流入。这些乌古斯突厥人对伊斯兰心脏地区塞尔柱突厥政权的瓦解负有主要责任。更多的突厥人可在赞吉王朝以及其他小的政权那里找到军人的职业，这些小的政权是先前服务于塞尔柱素丹们的总督和士兵建立的。

东边花剌子模诸沙的帝国是塞尔柱最大的后继国。1148年花剌子模突厥将军艾特西兹脱离河中地区塞尔柱人独立，从1193年起花剌子模人着手用骑马弓箭手的军队征服呼罗珊，这些弓箭手是从另一个突厥部落集团基普察克招募的。花剌子模沙阿拉丁·穆罕默德（1200～1220年在位）统治的帝国从伊拉克边境延伸到突厥斯坦，而且跨过加兹尼以及印度的一部分。花

剌子模诸沙像科尼亚的小塞尔柱王朝、赞吉王朝、阿尤布王朝以及后来的马穆鲁克王朝一样，从伊朗大塞尔柱王朝那里借鉴称呼和礼仪。然而，尽管他们很华丽，地域也很广大，但他们的政权仍然不巩固，这一点令人难以理解：如同在伊朗和河中地区取代它的蒙古政权一样，花剌子模帝国是掠夺性的，得不到臣民的忠诚拥戴。特别是，花剌子模沙与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的冲突，以及粗暴地对待乌里玛与苏菲派，都促使为其提供了大部分民政管理和城镇人口的波斯人的疏离。而且，统治者的家庭式管理也不适应于统治偌大的一个帝国，于是当蒙古人进攻时，它就迅速地土崩瓦解了。

蒙古人

在贝加尔湖与阿尔泰山之间地区的蒙古部落统一以前，蒙古人一直过着游牧生活，同乌古斯突厥人和基普察克突厥人最初所从事的营生基本上是一样的。[46] 与他们相似，大部分蒙古人是萨满(黄)教徒，尽管有一些人已经皈依了佛教或聂斯托里基督教。蒙古帝国的开创者铁木真可能诞生于1167年[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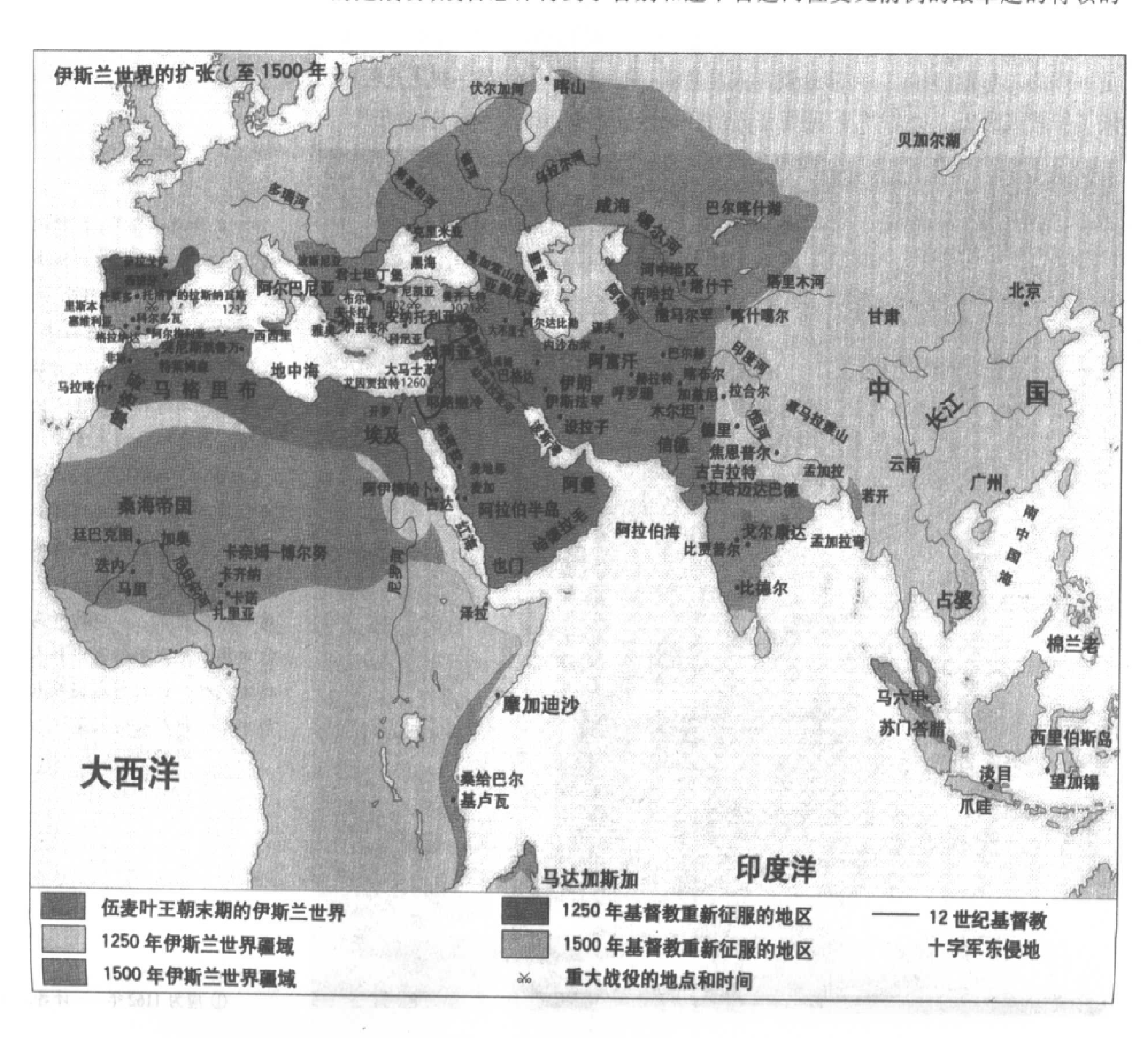


在穆斯林世界，城镇之间往往路途遥远，中间隔着荒凉和危险的村野。因此，统治者和地方贵族建造商栈，以使商人、学者或朝觐者等过往者和他们的驮畜能安全过夜。图中所示的是素丹汗(土耳其语“商栈”之意)宏伟的大门，它是13世纪由阿拉丁·卡伊古巴德在科尼亚城外建造的，表明了进入这一建筑的庄重性。入口的蜂窝状的筒拱是典型的塞尔柱人建筑风格，让人想起突厥人的中亚先祖居住的帐篷。

① 应为1162年——译者。

据传说，刚诞生的铁木真拳头里紧握着有某种预兆的血块。终其一生，他很好地扮演了“天之骄子”的角色。铁木真开始时是一个很小的战争团伙的领袖，在对外交往与战斗中无情而又奸诈。连战连胜之后，到1206年他迫使草原上所有的蒙古部落都统一在他的号令之下。在同年举行的一个大会上众人推举他为“成吉思汗”。1218年花剌子模屠杀了蒙古保护下的商人，于是为蒙古人发动战争提供了借口。花剌子模分散于各要塞城市的军队进行了毫无效果的抵抗。花剌子模沙躲到里海的一个岛上，后来就死在那里。他擅长于穆斯林法方面的知识，而不是打仗的能力。

河中地区与呼罗珊一再地受到攻击，它们的城市屡遭洗劫。蒙古人在西亚以及其他地方所取得的军事上的胜利，归因于骑马的武士的机动性与良好的装备，归因于他们精心的计划，也归因于他们对后勤的关注。他们的兴起靠的是战功，成吉思汗得到了哲别和速不台这两位史无前例的最卓越的将领的



效劳。20世纪人们仍在仔细研究他们经历过的战役。蒙古人也利用大规模的暴行恐吓和威慑他们的对手。对于波斯的城市,成吉思汗曾经下令:"所有的城市必须铲平,这样世界会再次变成一个大草原,蒙古的母亲们将养育自由而快乐的儿童。"

根据伊本·艾西尔的记载,蒙古人"在刚好一年的时间里夺得了最多的人口和地球上最美丽、开化得最好的部分,这些地方的特点是在文明与温文尔雅上要胜别处一筹。在尚未遭到他们蹂躏的国家,人人都在消磨担心他们也会来到这里的黑暗时光"。1221年对尼沙普尔的劫掠是特别残忍的。蒙古人将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头颅分别堆成金字塔形,然后继续搜寻狗和猫。他们对清真寺和《古兰经》的亵渎几乎已成为仪式。根据在蒙古供职的波斯历 48 史学家朱威因尼记载,在呼罗珊和伊拉克"每个城镇和每个村庄都已遭受数次的抢劫与屠杀,而且此种混乱状态历时达数年之久,这样一来,在复兴之前即使存在着生育与增殖,但也达不到以前人口数的十分之一"。其他感到震惊的观察家强调知识的损失同屠杀造成的损失一样多。像撒马尔罕和内沙布尔这样的地方曾经是穆斯林正统派与学者的大中心,但是蒙古人到处架起烧书的大篝火。

蒙古人对近东的影响,从它对穆斯林文化与经济的短期效应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伊朗陶瓷的生产在1219年以后有大约40年几乎完全停了下来。叙利亚主要制陶中心幼发拉底河沿岸的拉卡城1258年被蒙古人洗劫,在这之后放弃了制陶。13世纪60年代以后也不再是金属制品的重要中心了。

穆斯林历史学家宣称,成吉思汗恍惚中与魔鬼通了话(14世纪关于突厥—蒙古征服者帖木儿也有与此类似的传说)。相比之下,反对蒙古人的穆斯林的王子们则被认为是犹疑不决的、懒惰的人。成吉思汗1227年去世后,蒙古军队有时对伊朗北部进行突然袭击,1243年蒙古将领拜朱在科斯戴[①]战役中打败了科尼亚塞尔柱素丹的军队。在此以后,该素丹国便成了蒙古的附庸国。然而完全征服伊朗和伊拉克是从13世纪50年代才开始的。

1253年蒙哥大汗派出由他的弟弟旭烈兀统率的一支侵略军。旭烈兀的首要使命是夺取伊朗北部伊斯玛仪派的"阿萨辛"支派[②]的城堡,特别是在阿拉木特的总部。(或许"阿萨辛",或者是"食大麻叶者"是敌人对他们的称呼。这些敌人宣称,他们像是受欺骗的食大麻叶的下等人)。阿拉木特于1256年陷落。最后一位大长老被蒙古军队踢死,城堡里宏伟端庄的图书馆也被摧毁了。这一块地域上的政权萎缩了,他们教义中的颠覆性诉求也减弱了。1271年马穆鲁克素丹拜伯尔斯夺取了他们在叙利亚北部最后剩余的一些中心。

---

① 今土耳其埃尔津詹附近——译者。

② 阿萨辛意为"暗杀者",是西方对伊斯玛仪派的尼扎里耶支派的称谓——译者。

旭烈兀在破坏了中东伊斯玛仪什叶主义中心之后，又向逊尼主义首都巴格达挺进。巴格达遭到洗劫，它最后一位哈里发也被处决了。旭烈兀是否被授权建立自己的公国，人们不得而知，但是他对某些地域提出的要求引起他男性亲属的争议，于是他不得不与在南俄建立金帐汗国的蒙古可汗们在高加索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尽管旭烈兀随身带了一些中国和回纥的官僚，但是他和他的继承者们在书写方面最后还是主要靠波斯人。正如蒙古朝廷里一位中国大臣所看到的："这个帝国是在马背上被征服的，然而要在马背上进行管理[49]则是不可能的。"在被征服后的大约几十年里，波斯的官僚、学者与信奉同一宗教的阿拉伯人被分隔开；其效果是强化了伊朗境内文化的伊朗性质。

旭烈兀在1265年去世。他或许是一个佛教徒，但肯定不是穆斯林，他的葬礼的特点是用人殉葬。旭烈兀的儿子帖古迭尔·艾哈迈德在1282~1284年任伊尔汗（在中国的蒙古最高汗的代表），尽管他皈依了伊斯兰，但是他的蒙古追随者大多数不欢迎他的这一行动。在伊朗的蒙古人仅是到加赞伊尔汗[①]（1295~1304年在位）统治时才转到逊尼派伊斯兰这方面来。中世纪的伊朗多半是逊尼派的地盘——这并不是说，在这一时期能很容易地将逊尼派和什叶派区分开。蒙古其他地方，南俄金帐汗国别儿哥汗[②]在13世纪60年代成为穆斯林，但只是到了14世纪初在乌兹别克汗的强制下，此地的皈依者才有所增加。同样，河中地区察哈台汗国某些居主导地位的蒙古人尽管在13世纪60年代已经皈依，但也只是到了14世纪伊斯兰才在这些武士精英中推广开来。在蒙古人及从属于他们的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方面，亚萨维苦行者起了重要的作用。

蒙古的领导人们一再鼓吹是真主授权给他们，让他们征服与统治世界。"天上一个太阳，地上一个君王。"正像阿八哈伊尔汗1269年写给拜伯尔斯的信中所说的：

"当阿八哈国王从东方出发的时候，他会征服整个世界。无论谁要反对他，都会被杀掉。即使你们是上了天，或是入了地，都休想从我们这里得到安全。你们最好的政策就是与我们和好。你们是被带到锡瓦斯（土耳其东部）的马穆鲁克。你们怎么能反叛地球上的国王们呢？"

马穆鲁克人

然而马穆鲁克一再地打败蒙古人，使他们未能征服叙利亚与埃及。1260年他们在巴勒斯坦北部的艾因扎鲁特战役中第一次战胜蒙古人之后，在50年中马穆鲁克一般能成功地守住沿幼发拉底河与他们对阵的前线。这一时期

① 又译"合赞汗"或"加赞汗"——译者。

② 金帐汗国的第二位可汗（1257~1266年在位）——译者。

的大部分时间里马穆鲁克也能成功地对十字军作战。确实，是反对埃及的法国的十字军，1249年诱使马穆鲁克军官谋杀了阿尤布王朝最后一位素丹突兰沙（他也是阿尤布王朝给人印象最浅的素丹之一），并接管埃及，他们从1260年起接管了叙利亚。马穆鲁克素丹们采用圣战的意识形态以证明他们篡夺政权是正当的，正像萨拉丁在夺取大马士革时所做的那样。令人瞩目的是，穆斯林中间互相搏杀，这一时期有多少个政权强调他们作为圣战领导者的作用，其中有穆拉比特王朝、穆瓦希德 [51] 王朝、古尔王朝和安纳托利亚的贝伊[1]们。

马穆鲁克在军事技能、战术以及装备等方面同蒙古人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叙利亚历史学家阿布·沙马说过，“蒙古人是被与他们自己同类的一伙害人虫打败的”。年轻的突厥奴隶先是由阿尤布王朝引进，继而在1250～1517年又由马穆鲁克素丹们引进，他们不仅在军事技能上接受了良好的训练，而且在伊斯兰教义方面接受了透彻的指引，他们还学会了读写阿拉伯文。这样马穆鲁克们便受到行政管理和战争的训练，伊斯兰化的马穆鲁克们大多表现出皈依的热情。马穆鲁克素丹们与埃米尔们在建立与资助宗教学校与道堂方面遵循塞尔柱与阿尤布王朝的传统。他们还对平民精英实施另一种恩赐：王室办事处与迪旺（税务局）大量扩充，大埃米尔们给自己招募了阿拉伯秘书和财政官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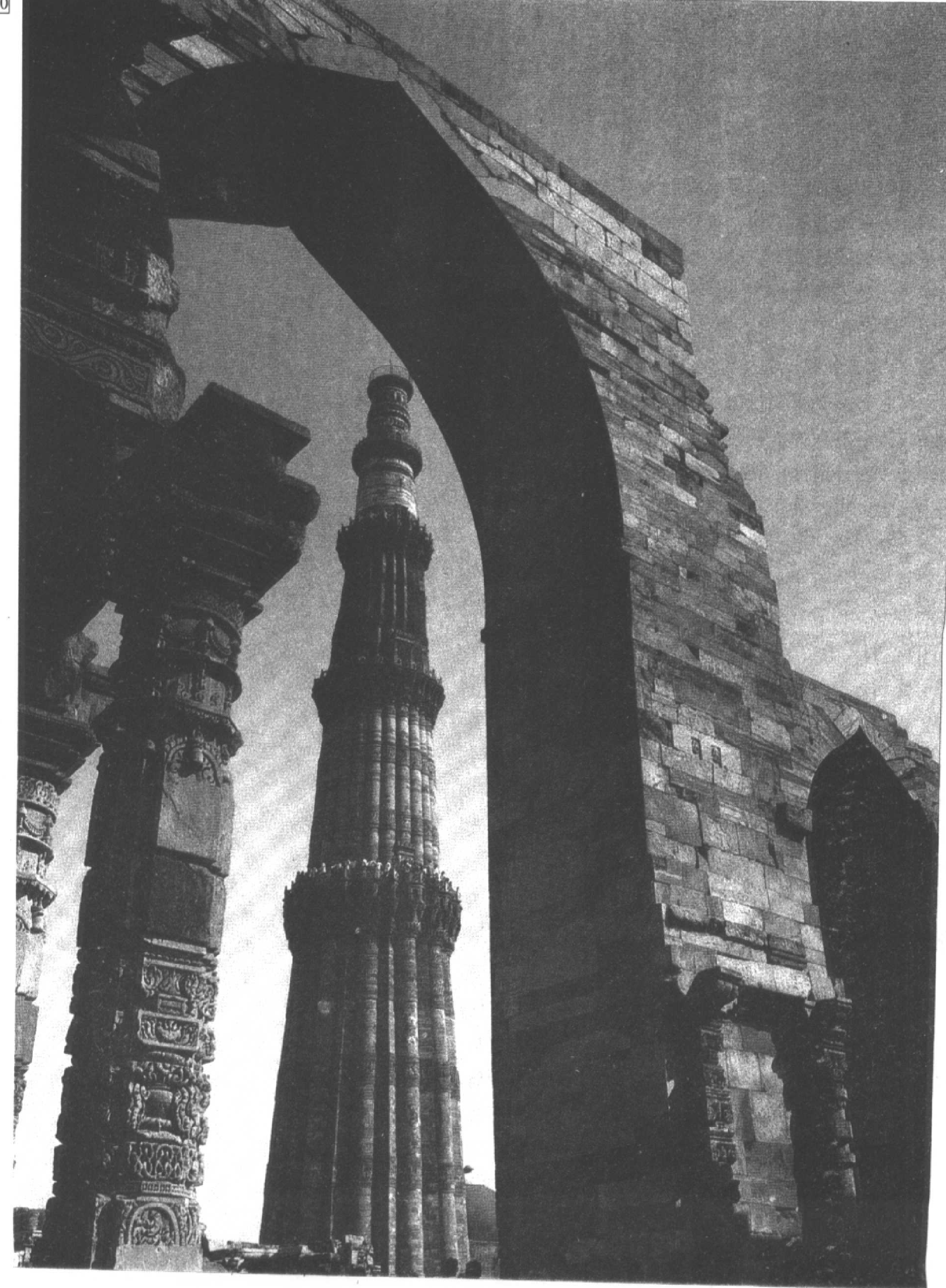
尽管法律禁止人们将过多的开支用于衣着，但正如本图中的君主及其侍臣的着装所表现的那样，马穆鲁克人的衣着精致而奢华。在埃及，奢侈纺织品（提拉兹）的生产为统治者所垄断。

南亚与东亚的伊斯兰

1261年，拜伯尔斯把巴格达阿拔斯王朝最后一任哈里发的一名亲属扶上开罗哈里发的宝座。在这之后，各国素丹们都在宣扬他们对保护阿拔斯哈里发国和圣城麦加与麦地那的虔诚。实际上，开罗的管辖权在该素丹国之外只是零零星星得到一些承认，因而13世纪波斯的历史学家尤兹贾尼认为在蒙古征服巴格达之后，德里素丹国是伊斯兰的中心。印度北部的古尔王朝像 [52] 在叙利亚的阿尤布王朝一样，一直强调他们在进行圣战，尽管对他们来说只

[1] 地方长官的官名，有时也作为对尊贵人物的尊称——译者。

50





土库曼派大约在1470~1480年画的这幅波斯彩饰画说明了伊斯兰世界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图中描述的是一名中国新娘在远嫁给一位蛮夷新郎（可能是突厥男子）的路上。伊斯兰世界特别推崇中国生产的白底蓝花的陶器（如图中新娘的嫁妆所示），而且广为模仿。

是对信德异教徒的战争。正如在埃及萨利赫·阿尤布过早地去世，使马穆鲁克夺取了政权一样，在印度，古尔的马哈茂德1206年被刺，也让马穆鲁克的一个名叫库特布丁的军官当上了素丹。1206~1555年有几个突厥和阿富汗王朝统治德里，尽管有马穆鲁克渊源的素丹为数不多，但是他们都广泛地使用奴隶士兵。在德里素丹们的统治下，穆斯林拥有的地域大为扩展，到1535年已囊括了次大陆的大部分。但是马穆鲁克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还属于外来的少数，他们进行统治时要与苏菲派顾问们磋商。苏菲派，尤其是契斯提教团和苏哈拉瓦迪耶教团，不仅在宫廷行使权力，而且也是次大陆相当部分的居民皈依伊斯兰的主要推动者。

即使是在突厥的征服与苏菲派的传经布道促进印度伊斯兰的发展以前，具有相当规模的阿拉伯与波斯商人的社会群体已经在沿海城市打下了根基。实际上，在1498年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以前，印度与东非之间的阿拉伯海曾是一个穆斯林湖。伊斯兰从印度港口沿着商路向东扩展：来自古吉拉特的穆斯林商人在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进行交易。15世纪初马六甲的统治者皈依了伊斯兰，苏门答腊人也逐渐地跟着皈依。印度和马六甲海峡的港口是驶往香料群岛[①]与中国商路的补给站。

具有先进文明与大型城市的中国对穆斯林世界的重要性不论如何强调

第52页图：从德里库瓦特伊斯兰（意为“伊斯兰的威力”）清真寺的拱门看库特布塔。这一巨大的尖塔是由奴隶素丹王朝的库特布·丁·艾伯克在1199年建造，它是一座胜利之塔，标志着伊斯兰教在印度至高无上的地位。

① 指印尼的摩鹿加群岛——译者。



中国发达的文明在穆斯林世界颇有影响。穆斯林同中国的联系和交往远比它同基督教世界的联系重要。截至蒙古人征服穆斯林以前，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皈依者的活动往往限于中国的一些港口城市。随后，他们遍布全中国。本图是北京的牛街清真寺，建造于1362年。请注意它体现出来的阿拉伯书法和中国装潢风格的结合。

都不过分。穆斯林世界与中国在商业上与认知上的广泛接触，使穆斯林世界同基督教世界的接触相形见绌。中国出口到穆斯林世界的主要商品是丝绸与 [53] 陶瓷。据说早在9世纪云集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即有10万多人。在13世纪50年代以前，在广州各港口可以看到最大量的穆斯林，阿拉伯、波斯以及中国的皈依者。在这之后，1252~1279年蒙古的征服也把许多穆斯林官员、士兵和商人带到中国的北方，尽管蒙古人元代统治者自己从未成为穆斯林。中国文化的声誉在这样一些事情上得到了反映：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试图模仿中国的陶瓷与纺织品，采用诸如莲花、云带、龙、风等图案。玉石雕刻、烟火、染色、漆器与造纸等中国工艺技术的杰出对穆斯林来说是很明显的。正如11世纪波斯学者塔利比所说的那样："阿拉伯人常常把每件精致、仔细制造的容器称为'中国货'，不管它是否真正来自中国，因为制作精美的东西是中国的特长。"

帖木儿的崛起

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对中国事务的了解，通过蒙古政权以及后来帖木儿及其继承者在中东的政权，以及他们的中国和中国化的顾问、技术专家和工匠，而逐渐增多。1337年蒙古在伊朗的统治者阿布·赛义德去世后，相互竞争的一些势力为控制伊尔汗国而搏杀，蒙古的军阀们利用一些傀儡可汗作为他们实现地区野心的陪衬。当14世纪蒙古权力在突厥—波斯的心脏地区复兴时，它的中心进一步东移到河中地区。察哈台汗国(因成吉思汗次子察哈台而得名)在河中地区和突厥斯坦骑墙观望。喜欢传统的察哈台人在皈依伊斯兰方面比伊尔汗国蒙古人要来得慢些。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即使是在皈依之后，仍

然依恋于他们草原先民那些非伊斯兰的习惯。虔诚的穆斯林批评察哈台汗国的埃米尔们对成吉思汗法令的尊崇高于对伊斯兰圣法的尊崇。

征服察哈台汗国的帖木儿(帖木儿兰[1],1336～1405年)早年的生活记载甚少,但也像成吉思汗的早年故事一样,很令人惊奇,尽管也很令人怀疑。帖木儿没有可以自豪的高贵世系,因为他出身于较小的部落。相反,他和他的赞扬者强调他是如何靠自己的能力而取得成功的。他把自己描述为天之骄子,即突厥语里所说的"金人"。只有他那由天神注定的命运,以及他给他的军队带来的胜利与战利品,才能在他的功业中体现这一点。帖木儿认为"就穆斯林为其信仰进行战斗来说,战争中的掠夺如同婴儿吸吮母亲的奶一样的合法",他的察哈台汗国的追随者乐于接受这一看法。他作为有胆量的偷羊者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偷牲畜的贼慢慢地扩大成为一支军队,到1370年他控制了整个察哈台汗国。他把大权旁落的可汗丢在御座上,而他自己则握有"埃米尔"那样的实权。帖木儿尽管是突厥人,但他忠诚于蒙古的理念。

帖木儿然后挥师远征突厥斯坦、俄罗斯、伊朗、高加索和伊拉克。他像蒙古人那样,大量施暴以恐吓敌人和臣民。伊斯法罕1387年造反之后对该城所进行的大屠杀尤为惊人。察哈台人将他们所能找到的所有的人都砍了头,并用他们的头颅堆成尖塔。帖木儿的编年史家和胆小的阿谀者尼扎木丁·沙米在评论屠杀时,引用了中世纪乌里玛中一种流行的说法:"宁要国王们一百年的残暴与压迫,不要两天的动乱与大众造反。"1398年帖木儿及其军队跨过兴都库什山脉,打败了德里素丹国的军队,洗劫了德里。1400年侵入叙利亚,并夺取了阿勒颇。防守大马士革的马穆鲁克未经战斗即告瓦解,帖木儿的军队1401年1月洗劫了该城。帖木儿向他们开征贡税,当贵族们迟迟不肯纳贡时,帖木儿训斥道:"我是真主派来惩罚你们的工具,因为除了我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纠正你们罪恶的办法。你们是邪恶的,但是我比你们更邪恶,所以要闭上你们的嘴!"1402年帖木儿将矛头指向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的统治者们,安卡拉一役他打败了奥斯曼素丹罗马神"朱庇特"巴耶济德一世(1389～1402年在位)。帖木儿对中国也怀有不良企图,1405年他在向中国进军途中去世。

56

尽管帖木儿进行的战争实际上使13世纪蒙古帝国的很大一部分被重组,但是在他死后这一帝国被4个儿子解体,在帖木儿的继承者中,大部分人宁愿加深他们对伊斯兰的了解,也不想让突厥—蒙古武士文化永垂千古。例如1429年,帖木儿的儿子、河中地区与呼罗珊的统治者沙哈鲁,曾就布哈拉所收集的圣训的抄本以及宗教学者伊本·哈加尔与麦格里奇的著作问题,写信给埃及的马穆鲁克素丹。作为伊斯兰文化首府,15世纪帖木儿王

① 意为"瘸子帖木儿",是帖木儿的绰号——译者。

54

帖木儿的成就

历史上很少有人像帖木儿那样，热衷于夸耀个人的成就，热衷于杀戮。他孜孜不倦地力求实现蒙古统治世界的理想；而且相信只有自己，作为蒙古权力的代表，才被赋予了统治世界的权力。于是他效忠伊斯兰；他在乌里玛和苏菲派中都有强大的支持者。而且，根据同样的信念，他支持城市的富有阶级防止发生地方动乱。他特别小心翼翼地保护贸易、惩罚腐败的商业活动。另一方面，他在对付敌人时却是冷酷无情的：抗拒其强权的城市遭到“大屠杀”，反对者会被扔下悬崖或被焚烧，年轻的女子被收做奴隶，她们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他用头盖骨堆成许多塔，以警示战败者；1387年在伊斯法罕大屠杀以后，用7万颗头颅垒成了这样一座塔。如果说帖木儿是一个军事天才，那他的子孙们则在其他许多方面表现出了同样的天才，其中像他的儿子兀鲁伯在科学方面，莫卧儿皇帝巴卑尔在写作方面，以及巴卑尔的孙子阿克巴在统治方面等等都表现出异禀。帖木儿的成就和风格如此令人敬畏，以致在他死后仍能引起许多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想像。莫卧儿时期绘画的一个主题是帖木儿及其继承人的肖像画，这些画往往把当代统治者同帖木儿的超凡气质之间的联系清晰地勾画出来。今天在中亚地区，由于乌兹别克人和其他人搜寻过去强有力人物的形象，以促进对于新国家的认同，对他的纪念正在复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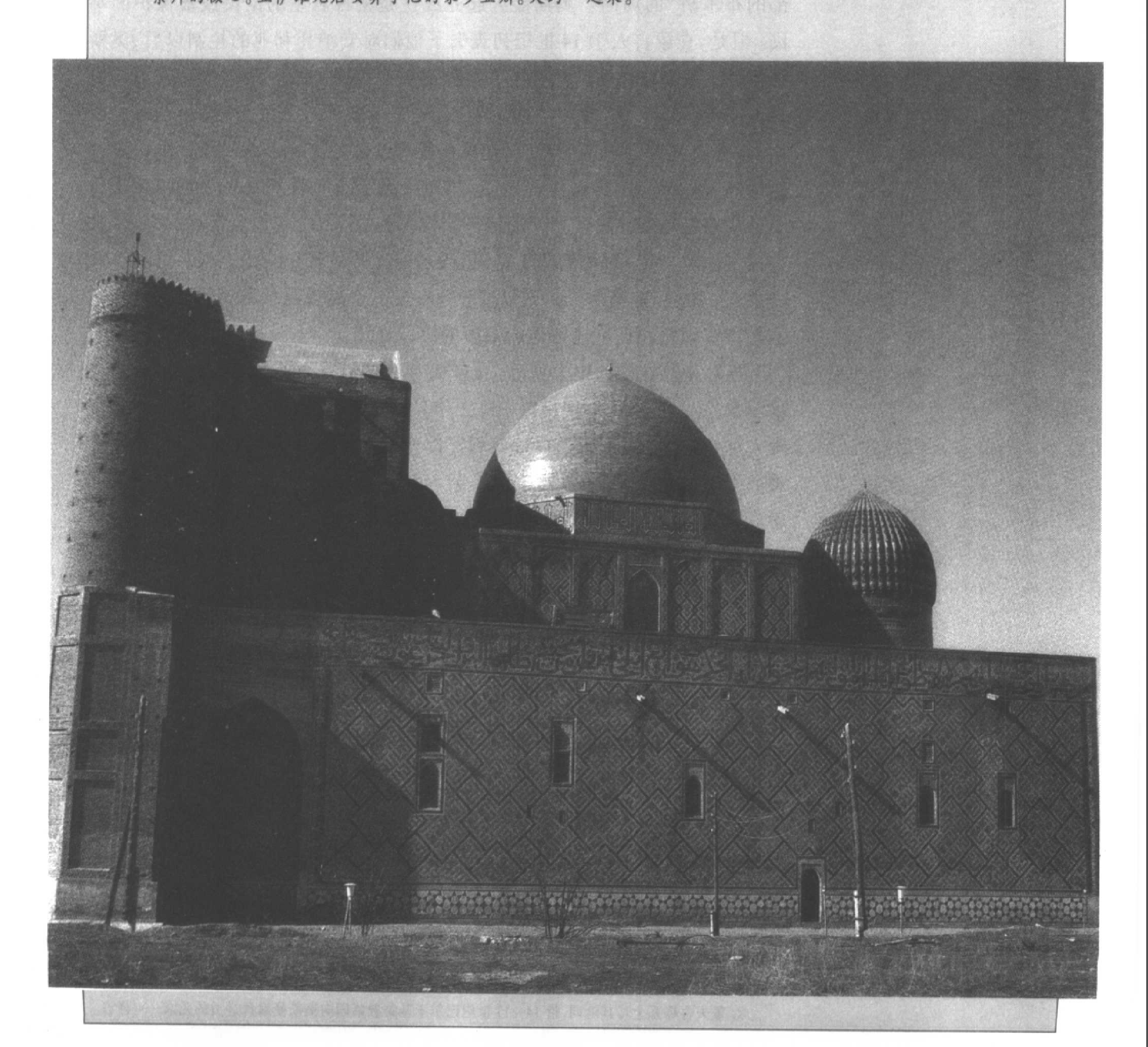


1941年，苏联考古委员会的科学家们在撒马尔罕打开了帖木儿的陵墓。M·M·格拉西莫夫才华出众地重塑了与帖木儿在世时相像的具有蒙古人特征的面庞。



15世纪的昆仑山（软玉石的主要产地）属于帖木儿帝国统辖范围，在此与明朝中国有着很长的边界线。玉器是穆斯林中亚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但是帖木儿的精英们似乎已经掀起了玉器热，这一时期有无数精美的酒水容器流传下来。本图所示的这类杯子可能在察哈台将领的饮酒仪式中使用过，因为未完全伊斯兰化的察哈台蒙古人依然坚持古老的蒙古传统：豪饮。西班牙派往帖木儿帝国的一名使者克拉维乔提到：“能放开喝酒并且酒量最大的人被称为英雄。”

帖木儿终生都认真地听取苏菲派谢赫及其追随者们的善意谏言。在中亚游牧民中，12 世纪苏菲派导师和诗人谢赫·艾哈迈德·亚萨维的陵墓始终是崇拜的核心。亚萨维死后安葬于他的家乡亚斯。大约 1397 年，帖木儿在朝拜这个地方以后建立了这座金碧辉煌的陵墓纪念这位谢赫。他希望通过这种建陵的虔诚，能够把自己同民众对这位圣人的纪念联系起来。



朝的撒马尔罕与布哈拉可与开罗相媲美。在帖木儿王朝的庇护下,用突厥语写作的文学作品地位得到提高，与马穆鲁克地域和奥斯曼地域内的发展状况并驾齐驱。

奥斯曼人的兴起

奥斯曼贝伊辖区的起源是十分模糊不清的。一个以奥斯曼家族为最重要氏族的突厥部落集团，于14世纪初作为放牧者与袭击者出现于小亚西北部的布尔萨[①]的周围。奥斯曼人起先或许是蒙古君主的臣民或被保护的平民。但是,在蒙古人于14世纪初丧失了他们对安纳托利亚的控制以后,奥斯曼年代史编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回溯奥斯曼人是如何在宗教的激励下袭击拜占庭的城镇与乡村的。1326年奥斯曼人夺取了布尔萨,1331年再取尼西亚[②]。拜占庭帝国内部的冲突,使奥斯曼人及其他突厥部落民得以乘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而1354年的地震又使加利波利无法防备奥斯曼的占领。与小亚众穆斯林贝伊辖区相邻的地方同样受到强有力的攻击。素丹们寻求“法特瓦”(法律判定)对他们的支持,以满足使这些战事合法化之需。巴耶济德一世在1402年被帖木儿打败以前，曾一度并吞过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帖 57 木儿将安纳托利亚重建为他的帝国的缓冲地带。

巴耶济德在监禁中去世后,接踵而来的是他的儿子之间的内战,只是在穆罕默德一世统治时期(1413~1421年),该帝国才重新得到先前的边界。突厥人继续在巴尔干扩张，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在位）经过艰难的围困战之后，才拿下君士坦丁堡。夺取了君士坦丁堡，并改名为伊斯兰堡(“充满伊斯兰”之意)或伊斯坦布尔,被看做是自7世纪以来一直流传的启示预言的实现,因为阿拉伯人曾于668年首先包围过该城。奥斯曼新首都介于欧亚两洲之间的位置,会被看做素丹们对这两大洲雄心大志的象征。拥有了该城，鼓舞着穆罕默德二世及其继承者们设想，他们不仅是加齐[③]们的后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亚历山大和恺撒的继承者。

穆罕默德二世也是知名的立法者。奥斯曼人像其他某些穆斯林王朝一样,很少注意宗教法的时效和限制性条件。他们不仅创始立法，而且他们颁布与实施的立法有很大一部分公然与依传统解释的伊斯兰法相抵触。他们 59 批准了王位继承人为保障继承可以杀死兄弟的《杀兄弟法》。“戴夫舍梅”[④],即被征集的基督教儿童，须先迫使他们皈依伊斯兰，然后才能在宫殿里或是

① 原文误为小亚东北部——译者。

② 古代小亚西北部小城——译者。

③ 伊斯兰进行圣战、抗击异教徒的英雄——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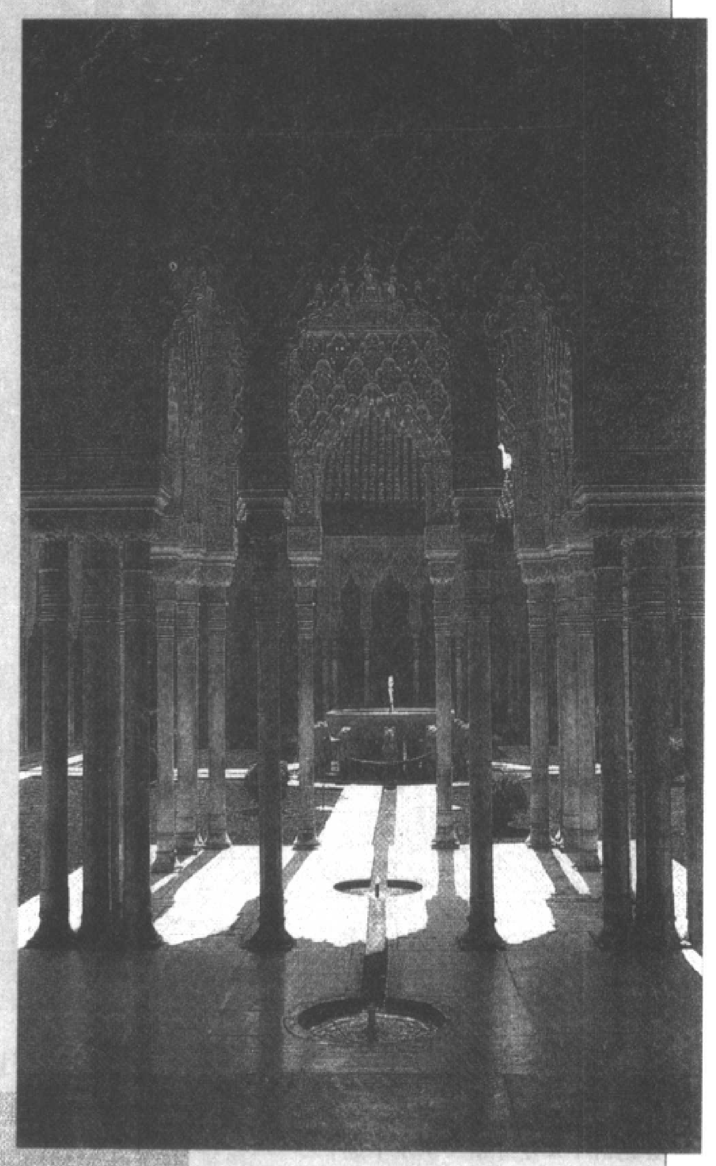
④ 戴夫舍梅系土耳其语词,指14~17世纪巴尔干基督教诸国向奥斯曼素丹进贡的儿童——译者。

58

阿尔罕布拉宫殿

穆斯林在西班牙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统治以后最终被基督教军队击败。在那个时期，格拉纳达王国的伊斯兰文化呈现出最后的繁荣和辉煌，这一景象几乎可以同大约300年前伍麦叶黄金时代的文化繁荣相媲美。这次繁荣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阿尔罕布拉宫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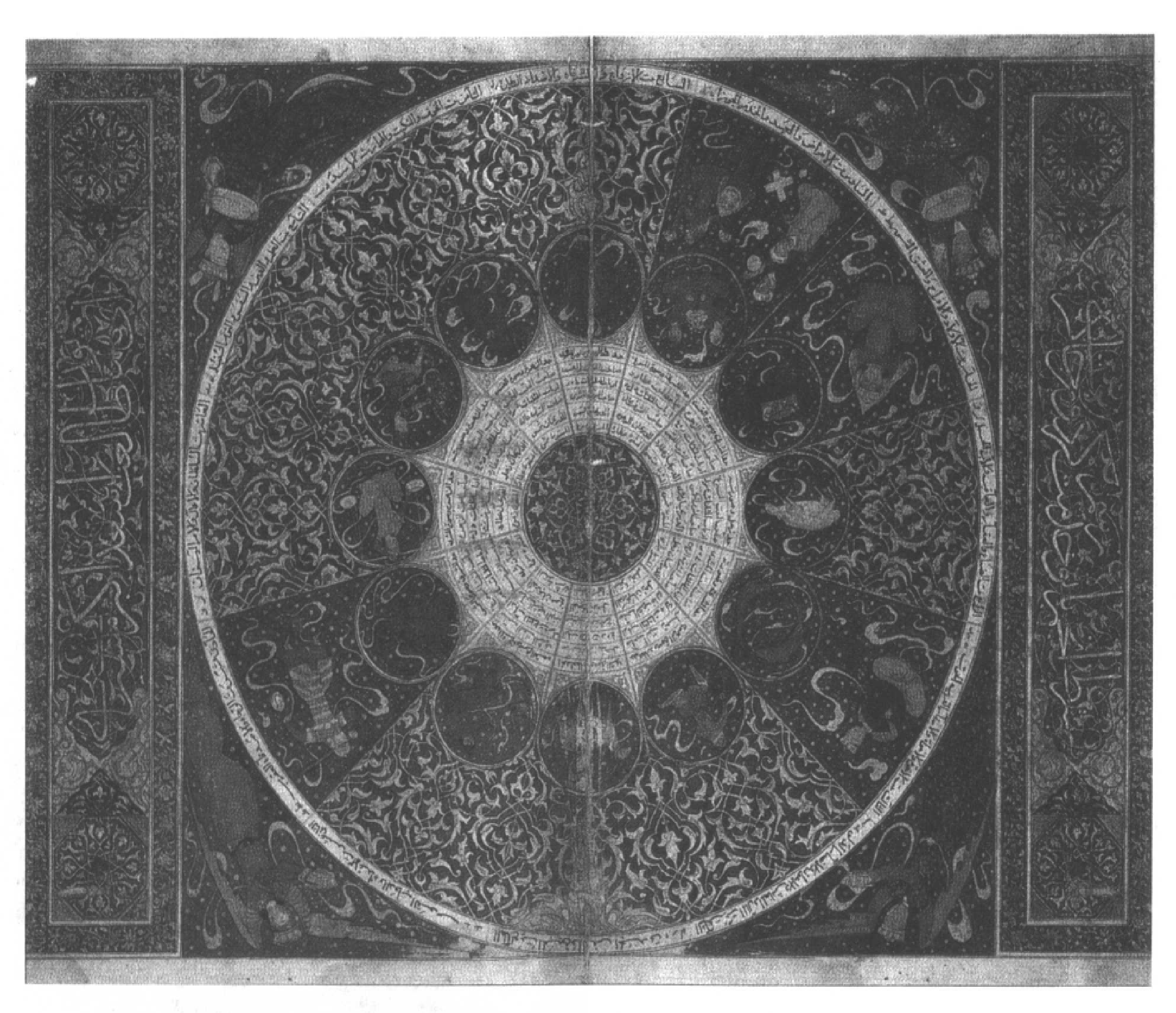
就像10~11世纪科尔多瓦的伍麦叶哈里发们喜欢居住在城外宰赫拉宫里一样，14世纪格拉纳达的纳绥尔统治者们最后也把他们的皇宫搬到了一座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小山上。和众多的伊斯兰宫殿相似（其中包括阿拔斯的萨迈拉和马穆鲁克的开罗），阿尔罕布拉宫殿不是一个孤立的王宫，而是由围墙内的几个宫殿组成的。尽管曾经一度有7个宫殿环绕在萨比卡山顶上的围墙里，但今天基本保持完好的却只剩下两个宫殿建筑群：即聚集在爱神木院和狮子院周围的建筑群。



阿尔罕布拉宫殿得名于阿拉伯语 al-Hamra，原意为“红宫”。它极富神秘色彩，以至于基督徒纷纷仿造它的风格，就像(西班牙)塞维利亚省的阿尔卡萨尔那样。而且，直到20世纪，人们还在赞颂它使参观者进入一个神奇的魔幻世界的能力，1920~1930年代，许多电影院都以它的名字命名。



狮子院周围的建筑群系1370年代为穆罕默德五世修建，各建筑物内装饰有大量的几何形图案、植物图案和书法图案。一些书法铭文引自《古兰经》，而其他一些则是侍臣伊本·扎姆拉克所作的诗句，内容主要是赞扬穆罕默德五世的慷慨和纪念1369年他在阿尔赫西拉斯战胜基督徒（其实这胜利本身是微不足道的）。



1411年在伊朗设拉子为帖木儿的孙子伊斯干达尔素丹绘制的十二星宫图。伊斯干达尔素丹生于1384年，他的生日分别用波斯语、维吾尔语和汉语标示出来。帖木儿王朝的王子们都是天文学家和星相学家的庇护神，尤其是伊斯干达尔素丹和兀鲁伯。这幅十二星宫图预示了伊斯干达尔素丹的成就和幸福，虽然难免受到亲属的嫉妒和算计。事实上，这位王子在几年以后即被沙哈鲁[③]弄瞎了双眼并被处死。

在近卫军团里服务，这违背了传统上给予基督教徒的受保护的地位。还有，奥斯曼“卡迪”[①]们有权进行传统上并不认可的调查与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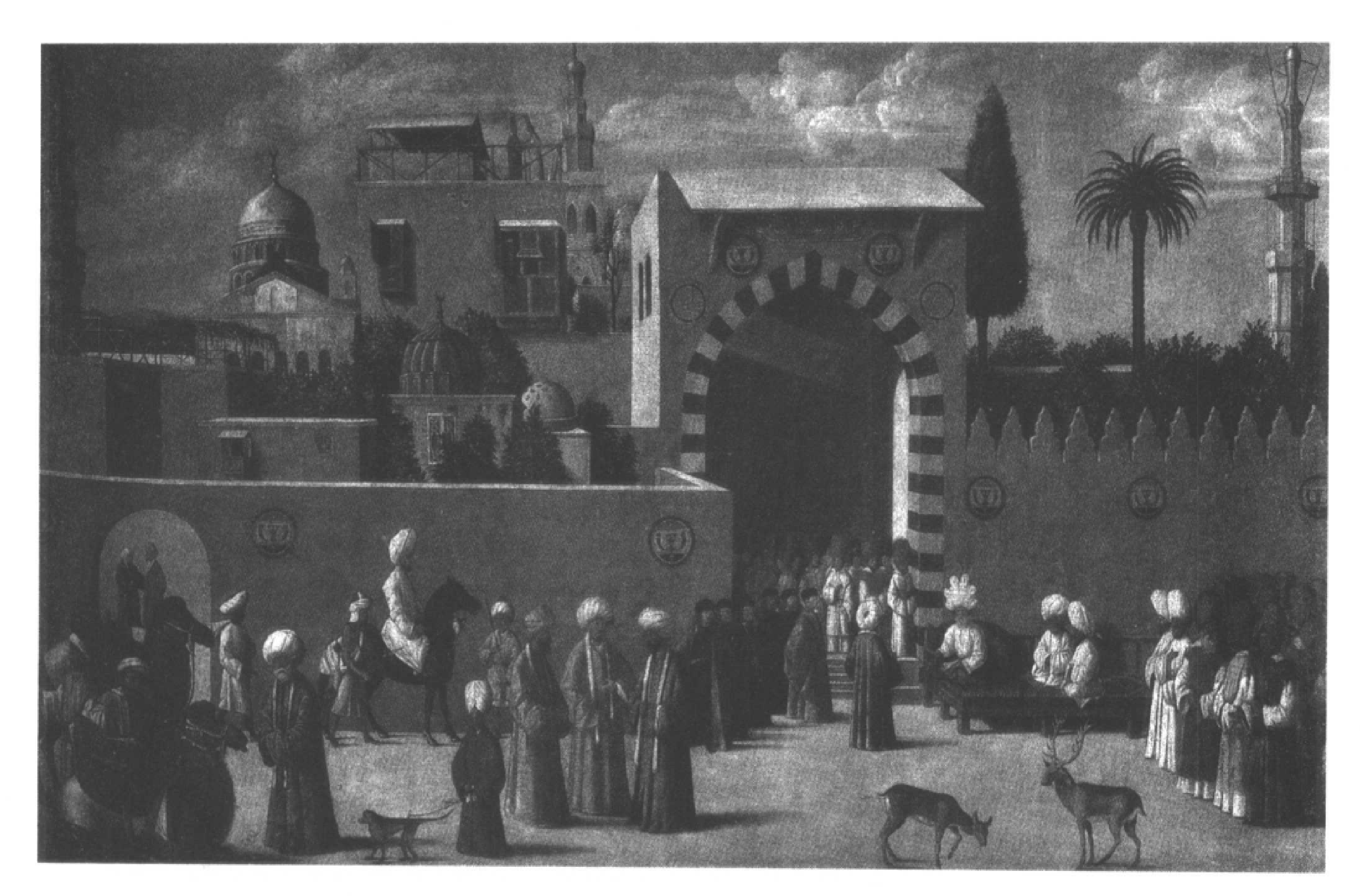
奥斯曼夺得加利波利和君士坦丁堡，其中包含有船舶修造厂，于是自法蒂玛王朝衰落以来，穆斯林的船队首次在东地中海居于主导地位。15世纪奥斯曼在巴尔干和爱琴海的成功——包括在较早时候征服的保加利亚和马其顿，再加上希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阿尔巴尼亚，这些成功可以被看做是对穆斯林在西班牙失去最后一个立足点的一种补偿。

自1230年起一直由奈斯尔王朝统治的格拉纳达，曾经作为基督教王国卡斯提尔的附庸国而幸存。但是1469年卡斯提尔与阿拉贡的联合以及西方火炮技术的改进，使它的生存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奈斯尔王朝曾向马林人[②]、

① 伊斯兰教法官，简称教法官——译者。

② 马林王朝，13世纪从摩洛哥东部兴起，首都非斯——译者。

③ 沙哈鲁，1405～1447年在位——译者。



马穆鲁克王朝同威尼斯、热那亚之间的香料和丝绸贸易非常重要。图中展示的是15世纪末威尼斯特使团在大马士革被接见的场景。这些威尼斯人在马穆鲁克叙利亚的行政首都保持着一个"芳达克"[3]或商业聚居地。大马士革省督坐在一个低矮的台上，只有他一人头戴着形状奇特的帽子，这顶角状的帽子象征着他的高位。请注意观察图中墙上清晰的马穆鲁克彩色纹章。

马穆鲁克人和奥斯曼人求助，但都徒劳无益。1492年奈斯尔王朝最后一个统治者波阿波迪尔向菲尔迪南德和伊萨培拉交出格拉纳达城。尽管最初曾宣 60 布实行宽容的政策，但仍有许多穆斯林移往北非，那些在地中海盆地穆斯林地域中兴旺发达的犹太人也是这样。

西非的伊斯兰

格拉纳达的丧失使整个穆斯林世界陷入恐怖的震颤之中，但是伊斯兰不仅在巴尔干而且在亚洲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继续得到扩展。在东非，如同印度一样，在诸如艾德哈卜[1]、泽拉[2]、摩加迪沙以及基尔瓦这些港口都有穆斯林社会群体存在。然而在内地，尽管从基尔瓦组织了圣战，但是人们对伊斯兰仍几乎一无所知。再往东北非看，在苏丹北部，伊斯兰化或多或少是和阿拉伯征服同义的。尽管11世纪西非的塔克鲁尔穆斯林政权、穆拉比特王朝

① 上埃及的红海港口——译者。

② 原文为Zaylan，应为Za yla(或Sanlac)，见本书第5章插图"500～1500年的商路与中心"，"Zaylan"曾是荷兰对斯里兰卡的称谓——译者。

③ 指旅馆及其他商业场所——译者。

及其他的穆斯林政权零零星星地想对异教进行圣战，但是总起来说，伊斯兰在诸如塞内加尔和马里这样的国家取得成功应归因于其他因素。柏柏尔商人对伊斯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扩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的商队带着盐向南走，穿越撒哈拉沙漠，然后再带着香料、染料和奴隶回到北方。廷巴克图（建于 1100 年）是马格里布与黑非洲之间的补给站，也是一个拥有自己经学院的宗教与学术中心。16 世纪旅行家利奥·阿弗里卡纳斯曾访问过廷巴克图，他提到："这里形形色色的手稿和写成的书被带出巴巴里[①]，卖掉它们是为了换钱而不是换任何其他的物品。"

穆斯林商人和政治顾问在非洲的各黄金帝国享有威望。阿拉伯文作品对这些人的才能备加称赞。非洲有些国王宣布他们皈依了伊斯兰，目的是为了给他们的统治加上能证明其合法的意识形态，但是他们对伊斯兰的各种规则往往漫不经心。穆斯林的意识形态常和统治者彻头彻尾的异教迷信硬被连在一起。在臣民中，性别的分隔很少得到遵守，不完全的着装以及给予妇女的自由使阿拉伯旅行者感到震惊。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多数王国中，伊斯兰还仅仅是精英们的宗教。1324 年当马里的统治者曼萨·穆萨在麦加朝觐的时候，他慷慨地散发黄金，这和他的旅行一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回到马里时得到大量的随从，他们是阿拉伯和柏柏尔的顾问和仆人。但是他的松迪亚塔[②]臣民大部分仍然是异教徒。即使是当君主公开宣布成为穆斯林的时候，他和与他信仰同一宗教的人的关系会变得难以处理。西非桑海的穆斯林统治者松尼·阿里（1464～1492 年）声称，他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秃鹫，还可以让他的军队隐形。当廷巴克图的乌里玛批评他的统治中有异教因素时，他们受到残酷的迫害。

埃及的学者哲拉鲁丁·苏尤蒂（1445～1505 年）在他的《埃及史》中夸口说，他的一些书已传播到叙利亚、希贾兹、也门、印度、马格里布和塔克鲁尔。61 这既表明马穆鲁克埃及学者的威望，也表明伊斯兰世界认知的内聚性。但也不是一切都好。苏尤蒂在他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列举了 15 世纪折磨伊斯兰世界的大灾祸，主要是格拉纳达被基督教徒夺走；其次是松尼·阿里在桑海人中的出现，他对优秀穆斯林的迫害比得上帖木儿；第三，真正杰出的学者（苏尤蒂轻松自在地将自己除外）的消失。在苏尤蒂看来，伊斯兰世界处于灾难之中，急需精神与认知的更新。他不像伊本·赫勒敦对经济史与社会史那么有兴趣，所以未能列出也许是中世纪末期折磨阿拉伯世界的最大灾难——从 14 世纪 30 年代以后摧毁性的瘟疫流行的复发。他对马穆鲁克人以及奥斯曼人 16 世纪初占领他们的土地没有什么兴趣。他也未能预见伊朗萨法维王朝统治者尚武的什叶主义的复活，以及葡萄牙在东方海上冒险事业所带来的

① 指北非（不包括埃及）伊斯兰各国——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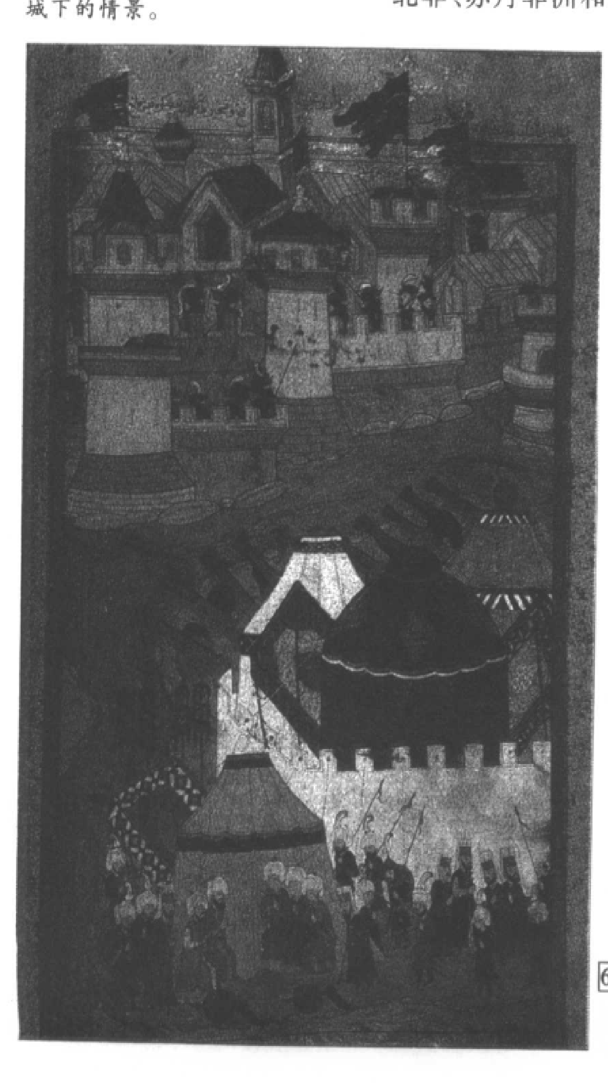
② 又名马里—贾塔，马里帝国创建者——译者。

威胁。看来这确实是正确的:在苏尤蒂去世后,在开罗再也找不到多少杰出的学者。但是,16世纪在奥斯曼、萨法维和莫卧儿王朝的庇护下,伊斯兰文明在别的地方兴盛起来。

第三章　欧洲扩张时期的伊斯兰世界（1500～1800年）

兴与衰

在16～17世纪，穆斯林各大帝国的军队是需要认真对付的重要力量。奥斯曼军队在若干年里被证明是世界上最有效的战争机器。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1529年苏莱曼大帝的军队兵临维也纳城下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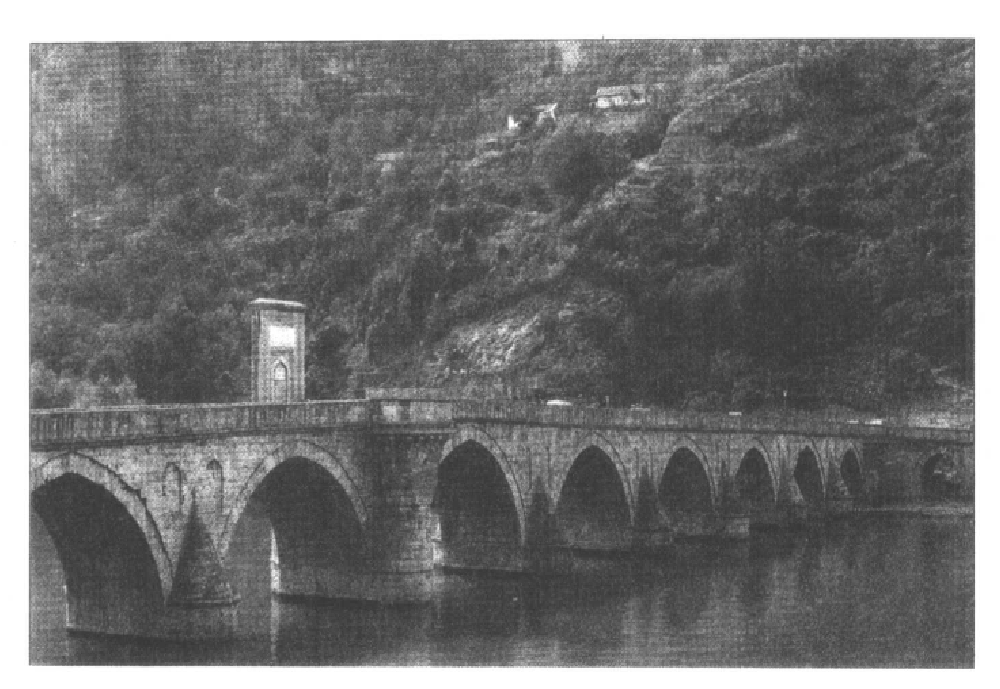
[62] 第16、17、18世纪的伊斯兰世界由两大地区组成。一个是包括近东、印度和中亚在内的土地接邻地区。16世纪初，突厥－蒙古势力在这一地区建立了4个国家——奥斯曼、萨法维王朝、莫卧儿帝国和西突厥斯坦的乌兹别克，它们的首都分别是伊斯坦布尔、伊斯法罕、亚格拉和布哈拉。第二个地区包括北非、苏丹非洲和东南亚。在这些地方，说阿拉伯语的商人、乌里玛或苏非派通常要么是建立王朝，要么是让当地的精英皈依伊斯兰。这两个地区尽管存在着文化与政治上的差异，但是被一个共同的伊斯兰学者团体连接起来，也由于赴麦加朝觐而连接起来，随着安全与运输的改进，前往朝觐的穆斯林也多了起来。

1500年穆斯林看来好像势如破竹，因为奥斯曼军队渗入东欧，其他穆斯林在非洲和东南亚建立了国家，在这些地方伊斯兰化也已广泛地蔓延开来。仅是奥斯曼、萨法维和莫卧儿宏伟的首都似乎就足以显示出这些政权的强制性权力和财富，也显示出伊斯兰文明在艺术上和在建筑上辉煌的创造力。但是到1800年伊斯兰世界很大一部分已进入面临经济、政治与文化挑战的时期，这一挑战来自穆斯林国家不能与之匹敌的欧洲。突厥－蒙古各国要么已经垮台，要么处于衰落之中。东南亚独立的穆斯林国家要么已经销声匿迹，要么成为欧洲列强的附庸，非洲的穆斯林国家也遭受了类似的命运。许多人为这些国家军事与政治的崩溃，以及为应对西方经济、军事与技术挑战而出谋划策。他们通常迫切要求营造更有生机更纯正的穆斯林社会，在某些情况下继之以[63]宗教的改革与复兴，但是乌里玛，或官吏、政治理论家，都不能减缓欧洲在伊斯兰世界扩张的步伐。

突厥－蒙古帝国

奥斯曼、萨法维、乌兹别克和莫卧儿4国的兴起体现了突厥军事政治影响前所未有的扩大。所有4个国家的统治家族所说的方言都与突厥语有关，而且都依靠突厥的或突厥－蒙古的部落或军事部队获得政权。虽然，在文化上突厥的胜利是无声无息的。奇异的宫廷方言——奥斯曼突厥语演化成奥斯曼精英的帝国行政、历史与文学的语言，正如察哈台突厥语，或老的乌兹别克语在乌兹别克突厥斯坦的演化一样。但是，阿拉伯语不仅仍旧是整个地区宗教与神学用语，而且是奥斯曼帝国阿拉伯各省口语、文学、历史与商业的用语。波斯语作为伊朗和印度莫卧儿多数受教育的穆斯林的第一语言，作为萨法维王朝和莫卧儿帝国主要行政及文学用语，也是伊斯坦布尔、安纳托利亚、伊朗、突厥斯坦和印度北部最受尊敬的混合语。在本时期之初，它还是这样的一种语言：奥斯曼土耳其人、伊朗人、乌兹别克人和印度穆斯林如果想成为统治精英中有教养的一员，那么他们必须充分地了解这种语言，以便能够写作诗篇。因而，奥斯曼的官僚知识分子穆斯塔法·阿里总结他在1596～1597年的文学成果时说过：他"必须用波斯语和土耳其语写出4卷有说服力的诗篇"。

这四国对突厥存在共有的认同，它们将伊斯兰哈乃斐(哈尼法教法学派)的教法律例传给奥斯曼、乌兹别克和莫卧儿的大部分精英。但萨法维王朝与此相反，它统帅一个富于战斗精神、热中于传经布道的什叶派苏非教团，并在伊朗高原的大部分地区推行什叶派宗教信仰，结果同奥斯曼人和乌兹别克人发生激烈冲突。萨法维王朝统治者威胁着奥斯曼安纳托利亚边境，因为最初他们突厥部落的支持者大部分即定居于这一地区。他们继续在这一地区招募追随者，这一地区很多居民信奉什叶派，或持亲什叶派的信仰，他们自然被奥斯曼当局视为潜在的第五纵队。具有进攻性的什叶派伊斯兰也给伊朗北部呼罗珊地区萨法维人与乌兹别克人之间的持久战争赋予了宗教性质。这一冲突是伊朗与图兰之间历史性对抗的重演，这一对抗是伊朗帝王统治的神话主题之一。由于有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分界，乌兹别克境内的突厥部落于是认为他们奴役数以千计在呼罗珊抓到的伊朗穆斯林是正当的。然而宗教上的区别对总的来说是友好的萨法维－莫卧儿关系没有什么影响，它们军事对抗的主要目标在于控制阿富汗中南部具有战略意义和富有的坎大哈农业与商业中心。莫卧儿的帝王们有负于萨法维王朝，这不仅是由于他们在16世纪中叶恢复了莫卧儿政权，而且还由于早期的莫卧儿统治者没有把宗教的认同与对王朝的忠诚联系起来，这是由于他们考虑到：他们既要用伊朗什叶派穆斯 [64] 林，又要用印度人，而且还统治着非穆斯林居多的人口，当然这种考虑是可



到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萨法维王朝和莫卧儿帝国已经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相对稳定的、低关税商业区。这座德里纳河上的大桥位于波斯尼亚—塞尔维亚边境的维谢格腊特，是波斯尼亚一个农民的儿子穆罕默德·索科鲁修建的，他在1565年成为政府重臣，管理着奥斯曼帝国，直至1579年去世。伊沃·安德里奇在《德里纳河上的大桥》这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最伟大的小说中赞颂了这座大桥300年的历史，安德里奇为此而获得了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

以理解的。

这四国之间不管有什么政治与宗教上的分歧，四国统治者都着力促进商业的发展。他们直接通过提供集市、商队旅馆、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或者间接通过加强这些大片地区的安全，鼓励贸易的发展。正如法国胡格诺教徒珠宝商吉恩·查尔丁17世纪末在奥斯曼本土、伊朗以及莫卧儿印度旅行之后所准确评述的那样："在东方，商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特别是由于他们的存在，跨越亚洲尤其是在伊朗境内的道路竟是如此的安全"。这些条件也鼓励了朝觐者、诗人和历史学家，以及乌里玛和苏菲派在这些国家之间放心走动。商人一般只需交纳较低的关税，其税率不超过进口或出口货物的3%。这样，到16世纪末，奥斯曼、萨法维和莫卧儿等帝国，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乌兹别克突厥斯坦，已变成广阔、接邻而又相对稳定的低税商业地带。新大陆白银的流入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这些白银是欧洲用来支付购买亚洲产品的，特别是土耳其和伊朗的丝绸以及印度的织品、靛青和香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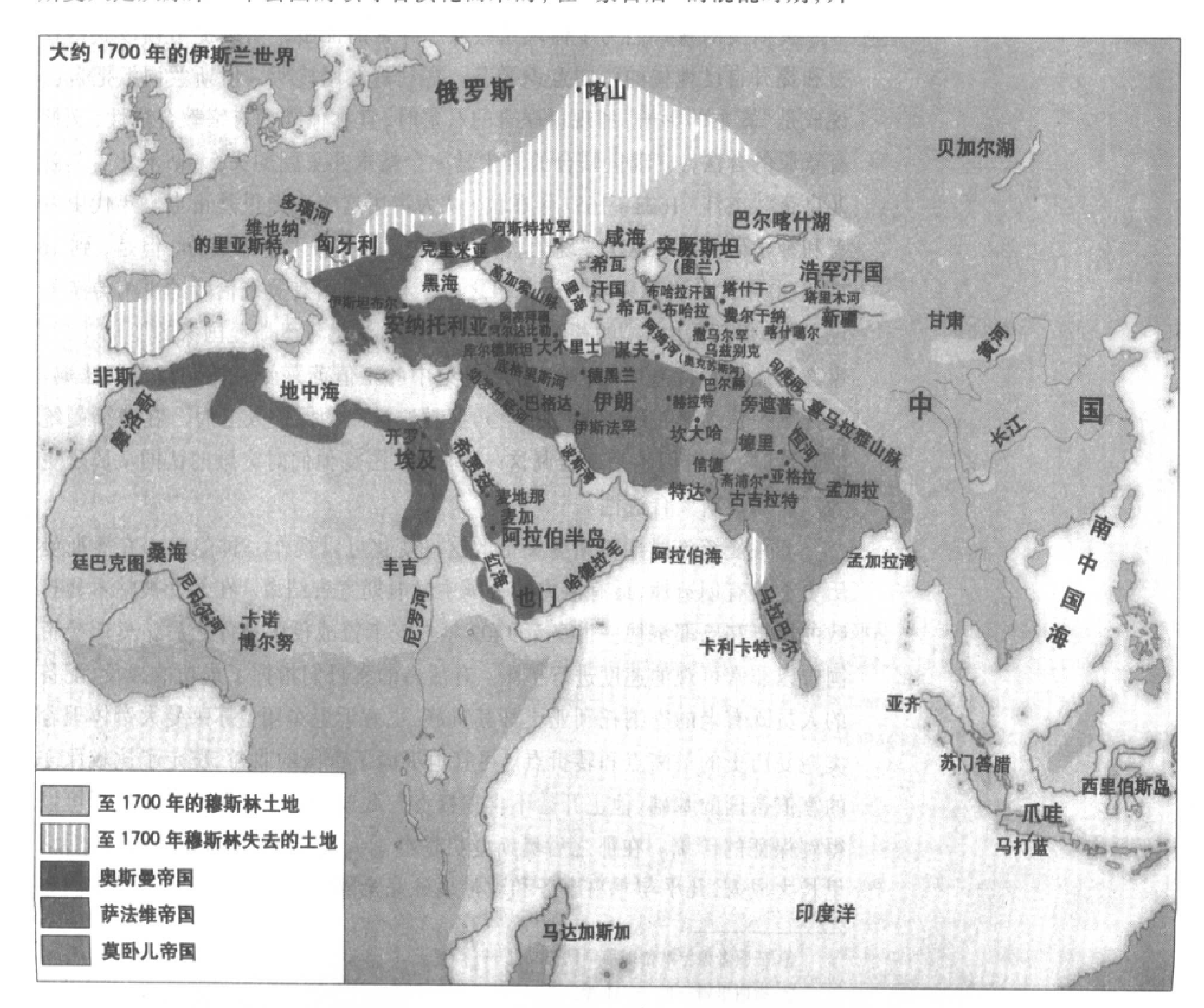
进入奥斯曼一些省份和伊朗的白银有很大一部分最终转到莫卧儿印度，在4个突厥－蒙古国家中，它的经济规模首屈一指。它的非常富庶的肥沃新月地带，即从阿拉伯海北部延伸到旁遮普，再到孟加拉湾的印度河－恒河三角洲，有助于支撑它多半生活在农村的人口，据估计1600年它的人口有6000万到1亿。它生产许多出口到本地区和出口到欧洲的经济作物与棉织品。这些销售给莫卧儿也给南亚其他国家带来大量的现金盈余。相反，奥斯曼、萨法维和乌兹别克各国的经济都是比较脆弱的。它们的农业资源少得多，这意味着他们的人口也较少。到16世纪末，三国人口加起来可能还不到莫卧儿帝国人口的一半，其中奥斯曼疆域内人口为2200万，萨法维伊朗可能有600万到800万，在乌兹别克图兰人口不超过500万。

65

萨法维王朝主要依靠闻名的丝绸业赚取外汇，尽管伊朗高原的游牧民也饲养许多马匹。乌兹别克一些汗国占人口比例更大些的游牧民则将更多的马匹销往中国、俄国和印度，这些耐劳的牲畜是乌兹别克主要出口产品。奥斯曼的素丹们能调动的比萨法维或乌兹别克的统治者们能调动的资源要多得多。他们的收入来自近东肥沃的新月地带的农业，诸如生产织品的久负盛名的布尔萨丝绸业等制造业，以及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财富。为了鼓励商业，还建立了精细的商业综合企业，最有名的是伊斯坦布尔的贝德斯坦及其有顶棚的巴扎。不过，到16世纪中叶，证明这些资源不足以应付建设伊斯坦布尔日渐增多的支出、持续的军事活动以及来自印度的进口。

奥斯曼帝国

四个突厥－蒙古国家中，最古老和持续时间最久的当属奥斯曼帝国，奥斯曼人是从原来一个公国的领导者演化而来的，在“蒙古后”的混乱时期，拜



占庭帝国东部安纳托利亚边境地区出现有许多这样的突厥的、反异教徒的公国。在1453年夺取了君士坦丁堡以后，奥斯曼的帝王征服者穆罕默德[①]（1444～1446年，1451～1481年在位）、巴耶济德二世（1481～1512年在位）、谢里姆[②]（1512～1520年在位）以及苏莱曼大帝（1520～1566年在位）征服了肥沃的新月地带、埃及以及希贾兹，于是控制了麦加与麦地那、也门，以及北非（直到摩洛哥）。在苏莱曼统治时期，他们让基督教徒离开了爱琴海，并于16世纪中期两次试图夺取通往西地中海的要地马耳他。1571年虽曾在勒班陀败于威尼斯人手下，但他们的权力并未严重受损。他们在巴尔干甚至还取得了惊人的进展。1521年他们夺取了贝尔格莱德。1529年他们包围了维也纳的首都萨尔斯堡。到16世纪40年代，他们控制了一个大的新月形地带：西起的里雅斯特，经过视野所及的维也纳壁垒，东到克里米亚。在苏莱曼辞世时，他们已经建立起在那个时期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也是可以证明的军事上最强大的帝国。

[66] 奥斯曼的素丹们为了体现这些异乎寻常的征服，明确提出赖以获得权力和提升自己地位的帝国意识形态。赛利姆在用波斯－伊斯兰词汇把自己说成是“真主的影子”和现世联合的君主时，宣称他既拥有宗教合法性，又拥有草原的合法性。现世联合的君主是一个帖木儿王朝的头衔，帖木儿－莫卧儿皇帝沙杰汗（1628～1657年在位）认为占用这个头衔很是正当。年代史编者和神学研究者也认为“现世联合的君主”具有救世主的成分，但是，到16世纪50年代，当苏莱曼年近花甲之时，开始使用有关统治者的更为传统的定义，即伊朗语中的“帕德沙”（国王）。这一演化与奥斯曼国家的变化并行，也许是后者直接造成的，因为16世纪中叶正值苏莱曼主持制订王朝法典、并开始被认为是正统的逊尼派哈乃斐教法学派的保护人之时。在奥斯曼统治衰落时，素丹们越来越强调这一作用，试图将他们对突厥的认同从属于更为广泛的伊斯兰合法性。

苏莱曼统治时期奥斯曼头衔的这一变化可以视作一种隐喻：在奥斯曼历史上最有创造性、最有活力的帝国主义时期宣告结束。在经受被帖木儿打[67]败的挫折和巴耶济德一世皇帝1402年在安卡拉战役中被俘之后，奥斯曼帝国曾以非常可观的速度进行扩张。有活力的素丹们指挥了成功的战役，配备的人员既有老的安纳托利亚土耳其贵族，也有近卫军团。苏莱曼大帝体现着奥斯曼历史的最高点和转折点。尽管他巩固了帝国的收益，奠定了比较保守的官僚帝国的基础。他也开始不再积极参与政府，到1595年这几乎成了可以得到保证的传统。在那之后奥斯曼男性继承人主要限于在精心建造的后宫里长大成人，几乎与军事事务和政治事务完全隔绝。萨法维王朝的君主们在

① 征服者穆罕默德即穆罕默德二世——译者。

② 指谢里姆一世——译者。



苏莱曼清真大寺建筑群,修建于1550~1557年。它象征着苏莱曼大帝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的权势和信心。它扼守伊斯坦布尔旧城和金角湾,是奥斯曼伟大建筑师息南的杰作,其成就仅次于埃迪尔内的赛利姆清真寺。它包括几所背诵《古兰经》和学习圣训的经学院,4座麦德莱赛,1所医学院和医院,以及苏莱曼及其爱妻哈塞基·胡瑞姆(俄罗斯人)的陵墓。

17世纪采用这种习惯,但是莫卧儿统治者从不热心效仿。

结果,即使是有知识而又有生气的人,在继位时也毫无经验可言。挑选基于他们是否长寿,而不是经过由战功所决定的那种严酷的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过程。奥斯曼王朝领导活力的衰退由于同时出现的戴夫舍梅的得势与派别化而加剧,戴夫舍梅指征集来自非穆斯林居民的奴隶精英。在16世纪末,近卫军团这一官僚的等价物同土耳其贵族相比,占了上风。然而他们的得势并未使素丹们的作用恢复元气:相反,他们把王室的权力消散于派别的勾心斗角之中。个别的官员,比如像格兰德·维泽尔·迈赫默德·寇坡茹卢(1656~1661年在职),有时恢复集中化的控制,但是总起来说,王朝的权力与活力在恶化,行政效率在下降。[68]

从苏莱曼统治时起,奥斯曼国家中央失去了推动力与方向,这就提出一个问题:这个帝国当时如何能够幸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比萨法维王朝和莫卧儿帝国的寿命长了150多年。它的耐久常常归因于它强大的官僚机构与军队,它们的惯性力是不可小觑的。然而,在16和17世纪,奥斯曼政权还得益



苏莱曼大帝的画像。苏莱曼一世统治时期（1520～1566年），是奥斯曼帝国最具活力和推行扩张主义的鼎盛时代。苏莱曼大帝亲自指挥了许多重大的战役并取得胜利，而且在治国方面也成就非凡：他奠定了官僚国家的基础，使统治者逐渐摆脱了政府繁忙的日常事务。作为历史上著名的"卡努尼"，即法律制定者，他制定了一部王朝法典，以涵盖沙里亚没有提供多少指导的生活领域。这幅由梅尔基奥尔·洛里克斯在1559年制作的版画传神地表达出这位奥斯曼素丹的权力和威严。

于周边主要国家（伊朗、俄罗斯、匈牙利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衰微。萨法维王朝只是在阿拔斯国王大帝（1587～1629年在位）统治时才对奥斯曼帝国构成较为严重的威胁，当时他们重新征服了伊朗西部高原，暂时占领了巴格达和美索不达米亚大片地区。以莫斯科为首都的俄罗斯十分衰弱。匈牙利和南部斯拉夫的疆域都是一些脆弱的封建实体。17世纪末18世纪初，欧洲现代初期俄罗斯、奥地利－匈牙利、西班牙和法国等国君主制度的巩固，使奥斯曼人开始面对较难对付的对手。从那时起，他们几乎总是居于守势，逐渐放弃早些年征服的地盘，移交给哈布斯堡家族和俄罗斯的君主。到18世纪末，奥斯曼人与欧洲列强之间的权力平衡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明白无误的，其标志是1774年签订的俄罗斯－奥斯曼库楚克－开纳吉条约。依据此条约，奥斯曼人首次割让土地给欧洲强国，还默许俄罗斯可以以基督教少数居民的名义对奥斯曼的一些省进行干涉。

在奥斯曼帝国政治与军事衰败的中期，它还得益于渗透于各处、颇有效率的伊勒米耶[①]机构，它是由通晓伊斯兰的人组成的大的骨架结构。不同于乌里玛演化为独立团体的萨法维国家，也不同于宗教阶层仍保留很大权力的莫卧儿帝国，奥斯曼统治者使乌里玛进入国家机构。他们建立一种等级制的宗教系统，用以69培训宗教学者或统治阶层其他潜在成员。征服者穆罕默德[②]建立的8所宗教学校，训练宗教工作人员、教师、宗教法官和杰出的抄写人员，可以说是这一系统发展的顶峰。宗教法官是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民事官员，因为他们既实施宗教法，又实施奥斯曼帝国法典。他们难以尽数的行政职责包括监督当地市场，评估与征收税款。宗教法官在穆斯林居多的省份有效地进行地方管理，在中央控制减弱时行使更多的权力，有时成为事实上的地方总督。

这一系统也培养和雇佣了奥斯曼许多大作家和大思想家。百科全书编纂者塔斯可坡茹卢·载德·艾赫麦特·胡萨木丁·伊芬迪（卒于1553年）便是其中之一。他汇编了乌里玛、科学家、数学家和苏非派的传记，以及宗教学和世俗科学概要。但是，伊勒米耶的广泛影响阻碍了科学、哲学甚至是神学的实验，这是在16世纪末即已表明的一种趋势。例如，1580年奥斯曼最高宗教官员伊斯兰长老反对在伊斯坦布尔建设新的天文台，此台意在纠正15世纪帖木儿王朝统治者乌鲁夫·贝戈撒马尔罕天文台的数据表。于是，近卫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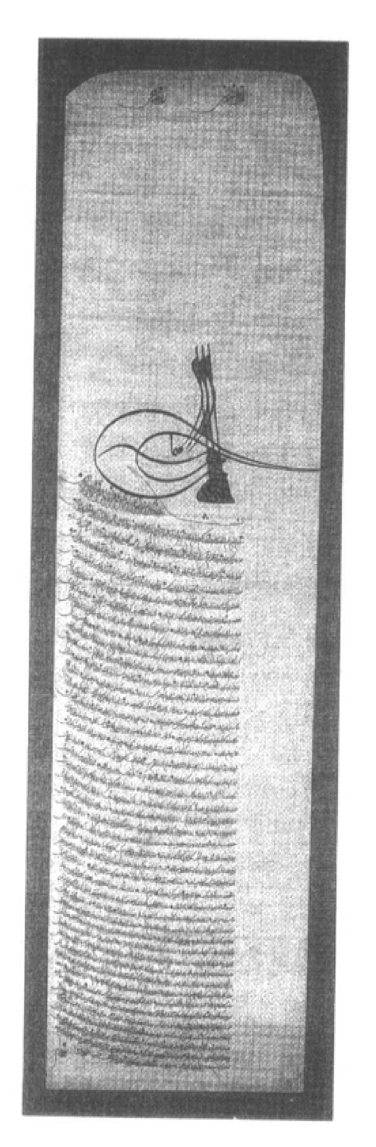
① 中文有的称伊斯兰长老委员会，有的称伊斯兰委员会——译者。

② 即穆罕默德二世（约1430～1481年）——译者。

团受命将这已建起一半的建筑夷为平地。它的被毁成为现代早期所有4个伊斯兰帝国缺少数学、科学以及技术进步的象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莫卧儿印度拉其普特的一个朝臣在乌鲁夫·贝戈的天文学家的鼓励下，在斋浦尔和德里建设了天文台。

奥斯曼人不仅建立了国家控制的宗教系统，而且严密监督，有时迫害伊斯兰最受大众欢迎的形式——苏菲派。他们镇压虔诚、神秘的伊斯兰的较为邋遢的代表卡兰答尔，后者在早期奥斯曼安纳托利亚是有影响的，在1496年一个卡兰答尔试图刺杀巴耶济德二世之后，这种镇压不足为奇。素丹们鼓励较为"正统的"，或者至少是像比克塔什教团这样的可以接受的教团。16世纪这一教团与近卫军团联系密切，实际上是作为他们的教士活动。像莫卧儿统治者保护契斯提教团那样，比克塔什教团也愿意吸收非穆斯林的习俗。结果显而易见，他们使安纳托利亚东部游牧民和南欧基督教的农学家都皈依了他们。16世纪中期对一比克塔什教团苦行者的描述提供了同正统乌里玛的鲜明对照：

> 没有胡须，心灵也受到挫伤，
> 手里握着戟，羊皮围裙围在他的腰间；
> 装扮着铃铛和羽毛：写着爱的本本带在他腰里边，腰上系着绳子，上面坠有圆盘形的周边刻有凹槽的石头，
> 头上歪顶着他的水罐，
> 他敞着怀，而且没有裹上衬衫；
> 狂烈，粗野，赤裸，头秃；
> 赤脚，也不戴帽；
> 他的母鹿样的眼睛带着眼药水的痕迹。



71　到16世纪晚期，奥斯曼政府机构已经超过土耳其贵族而居于上风，人们往往认为正是这一点使帝国得以存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是素丹穆拉德三世（1574～1595年在位）颁布的一道"费尔曼"（诏令），文件的顶端以图格拉体写着素丹穆拉德三世的名字和头衔（每一位素丹都有他自己精美的图格拉书写体）。这份文件正文部分是用当时奥斯曼政府机构中常用的复杂的迪瓦尼体书写的。

比克塔什教团更拘谨也更理智的是苏菲派毛拉维教团，他们稳重、庄严、虔诚的舞蹈使他们获得"旋转的苦行者"的称呼。这一教团13世纪由说波斯语的诗人哲拉鲁丁·鲁米创立，他们吸引受良好教育的城市信徒，其中许多人是政府官员。毛拉维教团帮助在奥斯曼一些省里保存波斯文学知识，因为他们想领会鲁米虔诚的诗歌。

萨法维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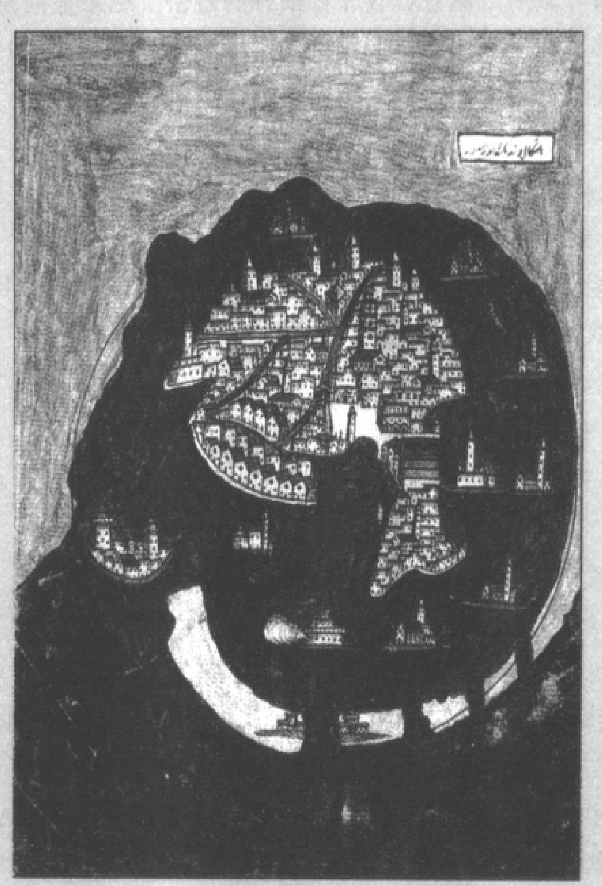
奥斯曼怀疑受民众欢迎的或异端的苏菲主义，有一部分原因是它在东方的对手伊朗萨法维王朝的兴起。萨法维人是在13和14世纪蒙古统治伊朗时期，在阿塞拜疆一座小城阿尔达比勒开始获得作为一个苏菲教团的领导者的声望的。起初，萨法维人由主张折中主义的准救世主宗教教义的长老领导，甚至还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关系，在15世纪越来越倾向于什叶派信仰。在15世纪稍后时期，他们在阿塞拜疆和安纳托利亚东部粗鲁的突厥部落中，寻求

70

皮利·赖伊斯：奥斯曼海军将领和地图绘制家

绘图学在16世纪形成时期是奥斯曼帝国欣欣向荣的一门科学，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征服战争鼓励人们去探险和绘制地图。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是船员卡迈勒·赖伊斯的侄子皮利·赖伊斯（约于1470年出生），他从1490年代起和他的叔叔一起效力于奥斯曼地中海舰队，后来在1499~1502年间的奥斯曼—威尼斯系列战争中成为一名指挥官。1516~1517年，皮利·赖伊斯所在的舰队攻克了亚历山大，他利用在开罗逗留的时间绘制了一幅尼罗河三角洲的地图。1547年，他被任命为印度总司令，负责指挥舰队应付葡萄牙舰队在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水域的挑战。在波斯湾海战中失败以后，他得到了宫廷的宽恕，后被召回埃及，1554年被处死。

皮利·赖伊斯的作品有三件保存至今：两幅地图的残片和他的主要航海著述《海军志》[1]。他最早绘制的一幅大型世界地图，在1517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埃及时呈献给了素丹赛利姆。在这幅地图中，他参考了阿拉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图表和地图，其中包括哥伦布绘制的一幅地图。这幅完整的地图（可惜没能保存下来）显然包括了印度、中国和哥伦布发现的美洲地区的轮廓。他在《海军志》中写道："中国和印度的海是此前奥斯曼帝国从未见过和知晓的，我一直使用有关这些海的地图，当已故素丹赛利姆在埃及时，我呈献给了他（愿他安息和永住天堂）。"第二幅地图完成于1528~1529年，展现了北大西洋以及北美洲的海岸线。不过，《海军志》这本书代表着皮利·赖伊斯最伟大的成就。它集大成地收录了关于地中海和波斯湾的各种航海图表，以及许多航行指令，描述了葡萄牙人的发现，有关航海罗盘的技术信息，风向，还有他自己制作的许多图表。这本书1521年完成初稿（其中部分是用诗韵体写成的），皮利·赖伊斯后来在做了一些修改以后呈送给苏莱曼大帝。皮利·赖伊斯的地图和《海军志》证明了当时精密的地图绘制技术和成熟的航海技术，同时也表明了当时地中海地区两大宗教共同体（人们常错误地认为这两个共同体是泾渭分明的封闭的武装集团）之间知识传播交流的速度和程度。赖伊斯对于葡萄牙和哥伦布地图复本的了解和运用，表明了这种传播的速度，同时也证明伊斯兰教—基督教交界地区在交换某些知识方面是可以疏通的。然而，这种知识渗透的能力取决于每一个文明的偏好。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地图绘制技术和医药在边界上是可以通行的，而印刷和天文学则难以透过帝国文明的森严壁垒，这表明了近代初期伊斯兰世界深厚的保守主义。



奥斯曼帝国的征服战争，尤其是15世纪末16世纪初，奥斯曼帝国海军力量的扩张，刺激了地图绘制科学的发展。这幅图选自皮利·赖伊斯的《海军志》一书，描绘了威尼斯及泻湖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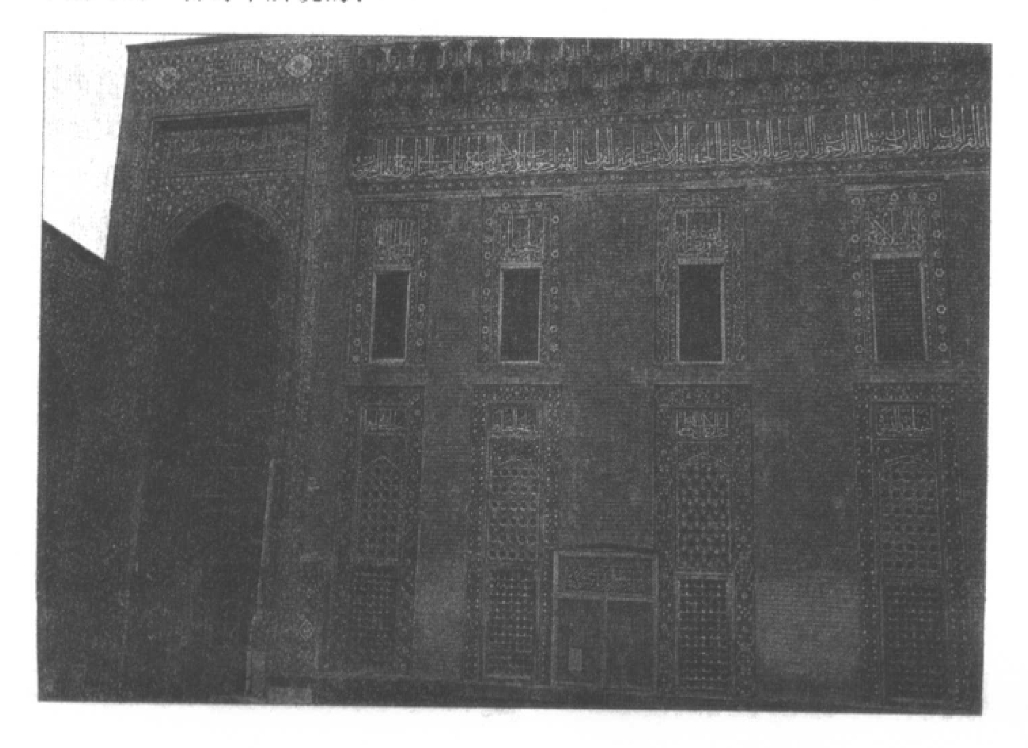
---

① 原书名为 *Kitab - i bahriye*，作者此处译为 *The Book of Seafaring*，但"bahriye"是"海军"之意，不只是"航海"之意——中文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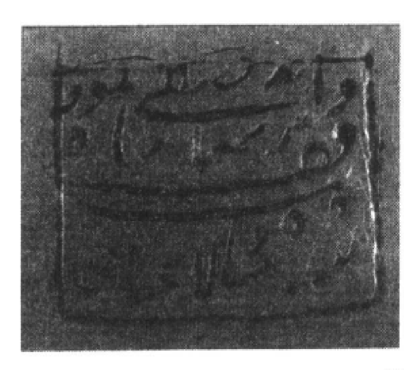
对他们宗教主张的支持,形成对奥斯曼的安纳托利亚东部边境的威胁。当时萨法维人在维护自己利益不受以游牧民为主的逊尼派政权“白羊王朝”与“黑羊王朝”的侵犯过程中,也变成军事化的了,后两个王朝从15世纪50年代起控制着伊朗西部。到1500年,萨法维人已演化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易司马仪一世国王(1501～1514年在位)夺取了大不里士,建立了萨法维王朝,大不里士成为新国家的第一个首都。

16世纪初萨法维国家的出现以及两个世纪之后它的突然解体,很像伊本·赫勒敦15世纪在解释北非国家历史周期时所提出的模式。赫勒敦假设:北非王朝典型地依赖于游牧社会的紧密结合以及军事上的勇猛。他认为:当部落被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宗教领袖联合起来时就会成为特别令人生畏的力量,穆罕默德在公元7世纪在希贾兹曾经完成过这样的联合。按照他的理论,这些王朝总是在三四代中衰败,因为当他们在城市地区建立官僚政权时,使他们得以掌权的真正特性便退化了。在那种环境下,他们的凶猛和社会的紧密结合全都在衰退,直至也被另一个部落联盟推翻。

萨法维的长老们就是赫勒敦所设想的那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他们能够把一些本来彼此并无联系的部落联合起来。他们用苏菲派和什叶派双重意识形态向追随者呼吁,同时行使苏菲派长老的职能,常常对门徒的精神生活进行权威主义的控制,而且还充当第七伊玛目的后裔,这几乎是神圣的形象,他可以把自己描绘成依什叶派观点来看是伊斯兰社团的惟一合法的领导者。易司马仪一世国王卓有成效地乞灵于这一意识形态以联合阿塞拜疆与安纳托利亚东部的突厥部落,否则这些部落不可能结合在一起。正如他在他早期写的一首诗中所说的: 72



萨菲丁(1252/3～1334年)陵墓,位于东阿塞拜疆的阿尔达比勒,由太美普斯一世国王(1524～1576年在位)建造。萨菲丁是苏菲派萨法维教团的创始人。



1612年，萨法维王朝国王中最伟大的国王阿拔斯一世，把大约1215件中国瓷器和6块玉捐赠给这座位于阿尔达比勒的家族陵墓。所有这些物件上都刻有阿拔斯国王的个人印章，以标识出其来源。图为其中一块玉上的刻章，上面写着："阿拔斯，圣王（即阿里）的奴仆，捐赠给萨菲丁沙陵墓。"

"从永生以前起，沙[①]就是我们的素丹我们的辟尔（宗教领袖）我们的穆尔西德（导师），我们的灵魂……我们是所有伊玛目的真诚奴仆。成为殉难者和抗击异教徒的英雄是我们的象征。"

这些部落因戴着与众不同的头饰而被称做"奎泽尔巴什"，或"红头"。易司马仪一世利用这种联盟在他当政的第一个10年征服了伊朗北部高原，这些部落民大多显然把他看成半个神仙。1510年由于在西突厥斯坦的默夫[②]打败并杀死昔班尼·汗·乌兹别克，而得以为这些成功的战事脱帽致意。

易司马仪一世国王在这些年中通过强行向大众推广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支派的教义而改变了伊朗宗教的景象。他这样做靠的是迫害和处死逊尼派、利用国家资助发展什叶派圣陵、机构与宗教艺术，以及从叙利亚和伊拉克引进什叶派学者（一直生活在逊尼派占多数的伊朗、受过良好教育的什叶派乌里玛不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萨法维王朝迫害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苏菲派教团，因为对于宣称宗教一贯正确的苏菲派王朝来说，这些教团代表着潜在的另类意识形态。结果相当数量的苏菲派人士以及半苏菲派诗人因当局迫害或取消资助而被迫迁出伊朗，通常到莫卧儿印度。就像萨法维王朝诗人考萨里对萨法维王朝的伊朗所描写的那样："在这片疆土上讲话不再有市场……现在我应当前往印度斯坦。"这一文学潮如此汹涌，以致现代伊朗作家称之为"印度商队"。它促成与众不同的印度－波斯文学流派——即众所周知的"印度风格"的产生。

73

1514年易司马仪一世国王被奥斯曼人打败，萨法维王朝对其追随者"奎泽尔巴什"的影响受到严重破坏。奥斯曼人曾派遣军队到他们的东部边境，这使因萨法维王朝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征募越来越多的部落所造成的社会与政治创伤雪上加霜。不仅仅是这些部落对伊朗国王是神圣的、不可战胜的设想破灭了，就连易司马仪一世国王本人随后也基本退出对萨法维国家的指导。他的继承者在16世纪面对"奎泽尔巴什"的独立时常常不得不为保持控制而苦斗。在1587年阿拔斯国王登上王位之前，这些部落已经控制了大部分省级政权，有的时候部落还篡夺了萨法维家族本身的权力。

萨法维人常寻求加强其权力的途径，只是在阿拔斯国王统治时期（1587～1629年）他们才有条不紊地奉行一种政策，使戴夫舍梅等级获得在奥斯曼帝国的权力。阿拔斯减少了"奎泽尔巴什"部落民的军事与政治权力，因为他用奴隶军队和官僚（其中许多人是格鲁吉亚的奴隶）取代了他们。也许，作为一种必然结果，他也加快了他的家庭地位的变化，从神圣的苏菲派和部落联盟的什叶派领袖变成传统的伊朗官僚国家的专制君主。根据伊本·赫

① 是对伊朗国王的称呼，有时亦译作"汗"——译者。

② 亦作谋夫、木鹿，今土库曼斯坦马里附近——译者。



勒敦历史纲要的说法，这些政策启动了一个进程，即切断萨法维王朝与其部落支持者之间的联系，并由此预先决定了王朝最终垮台的过程。

这幅由科尔内留斯·勒布鲁因于1704年创作的版画描绘了“世界典范”广场，它是伊斯法罕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萨法维王朝阿拔斯一世将伊斯法罕作为他的国家的首都和经济中心。图中广场的右边是鲁特福拉清真寺，萨法维建筑的杰作之一；左边是阿里卡普宫，既可以从这里进入王宫，也可进入观赏各种庆典仪式的亭台。远处是集市的入口，集市面积超过11平方英里。该广场夜间是艺人、说书者、妓女和圣徒常去的地方。而白天，正如图中所见的那样，是一个贸易集散地。

阿拔斯国王实行伊朗式重商主义政策，作为他扭转萨法维王朝命运的尝试的一部分，以鼓励他的相对贫穷的国家的发展。他限制通货的外流，并对本国工业予以支持。特别是，他把伊朗幼稚的丝绸业发展成高赢利的国家企业，强制性地指派有影响的亚美尼亚商人作为他销售伊朗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的代理人。阿拔斯如此成功地改善了国家的军事结构并促使经济兴旺，这使他得以重新获得16世纪被奥斯曼占去的土地，并扩大或巩固了萨法维王朝在各领域的控制。17世纪伊斯法罕的重建是对他的活力与远见的纪念，该城是他的新首都和他的国家的经济中心。像奥斯曼的伊斯坦布尔，该城也包含有宗教建筑与王室建筑优美的总体效果，以及精心建造的集市与商队旅馆。另外还有为受保护的亚美尼亚商人社区而单独设立郊区，它把伊朗同亚欧两洲的市场连接起来。

74

但是在阿拔斯国王统治时期出现了导致萨法维王朝后来于1722年垮台的两个趋势。一是他引进来的，即奥斯曼通过将潜在继承人限定于后宫以结束继承战的政策，结果在萨法维伊朗产生了与奥斯曼帝国相同的效果。这一政策增加了后宫的影响，而忽视了潜在的新统治者的军事政治智慧与经验。与此同时，阿拔斯国王失去了对伊朗什叶派乌里玛的控制，这些乌里玛是他的前辈通过从伊拉克和叙利亚邀请什叶派学者引进来的。乌里玛公开断言，早期什叶派教义的逻辑含义是：只有作为阿里后裔的伊玛目们才懂得《古兰

经》的意思，因而只有他们才能合法地领导由乌里玛本身所代表的伊斯兰共同体。到1722年他们实际上已经夺得该王朝的宗教权力，他们宣称他们集体体现伊玛目在地球上的代表（20世纪80年代伊朗一些什叶派乌里玛也公开为阿亚图拉霍梅尼这样宣称过）。



萨法维王朝晚期的一个特征是维护乌里玛的权威而弱化了国王的权威。毛拉穆罕默德·巴奇尔·马吉里西（1627~1698年）是这一时期最强有力的宗教领袖。他一生写了60余部书，1687年被任命为伊斯法罕“伊斯兰教长老”，1694年被任命为毛拉首领。1694年在他主持新国王侯赛因素丹的加冕典礼以后，国王问他想得到什么奖赏，马吉里西要求颁布禁止饮酒、禁止放鸽子，并且把苏菲派全部从伊斯法罕清除出去的敕令。

回顾一下可以看出，伊朗什叶派乌里玛在17世纪可能提供了某种稳定。至少他们上述越来越多的宣称是同伊朗政权的停滞时期以及阿拔斯国王去世后政权的衰落相伴随的。至17世纪末，即使是欧洲漫不经心的观察者也会了解，这个政权是非常脆弱的。任由军队衰弱下去，阿拔斯国王的严厉措施被后宫教育出来的自我放纵的亲王抛在一旁，他们的铺张浪费耗去了伊朗为数不多的收入。当1722年阿富汗人起而反对萨法维王朝派驻坎大哈的格鲁吉亚人省督时看到，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抵挡 [75] 他们衣着混杂的部落军队，在散乱的战斗之后，他们占领了伊斯法罕。然而，这些人不能驾御偌大的一个官僚帝国。几年之后他们在伊朗留下了权力真空，这一真空主要被老的奎泽尔巴什贵族在18世纪予以填补。首先是阿富沙尔部落严酷的纳迪尔·沙夺取了萨法维王朝的残留部分。他在1739年入侵印度并洗劫德里时，进行了无情的战争，给颓废的莫卧儿帝国以致命的一击。后来在18世纪末另一个奎泽尔巴什部落卡扎尔人控制了伊朗高原的大部分，建立了在伊斯兰时期统治伊朗的诸多突厥部落王朝中的最后一个王朝。他们将首都迁往不太重要的城市德黑兰，因为德黑兰的位置距离他们在厄尔布尔士山脉南坡的冬季牧场较近。

乌兹别克人

在乌兹别克图兰或莫卧儿印度都没有类似什叶派乌里玛挑战萨法维合法性那样的情况。乌兹别克的可汗们和莫卧儿的帝王们拥有纯洁的蒙古血统与帖木儿血统，这是奥斯曼年代史编者所赞美的血统。乌兹别克联盟的创建者昔班尼·汗·乌兹别克（1500~1510年在位）是真正的蒙古人，尽管其追随者大部分是突厥人。从一开始乌兹别克的可汗们就是作为氏族联盟的领袖进行统治的。昔班尼后裔阿卜杜·阿拉·汗二世（1583~1598年在位）试图将这一联盟改造成伊朗式的帝国政权，但最后未能成功。他的继承者，[76] 17世纪和18世纪初的贾尼德王朝[1]中没有人当真想要模仿他。尽管乌兹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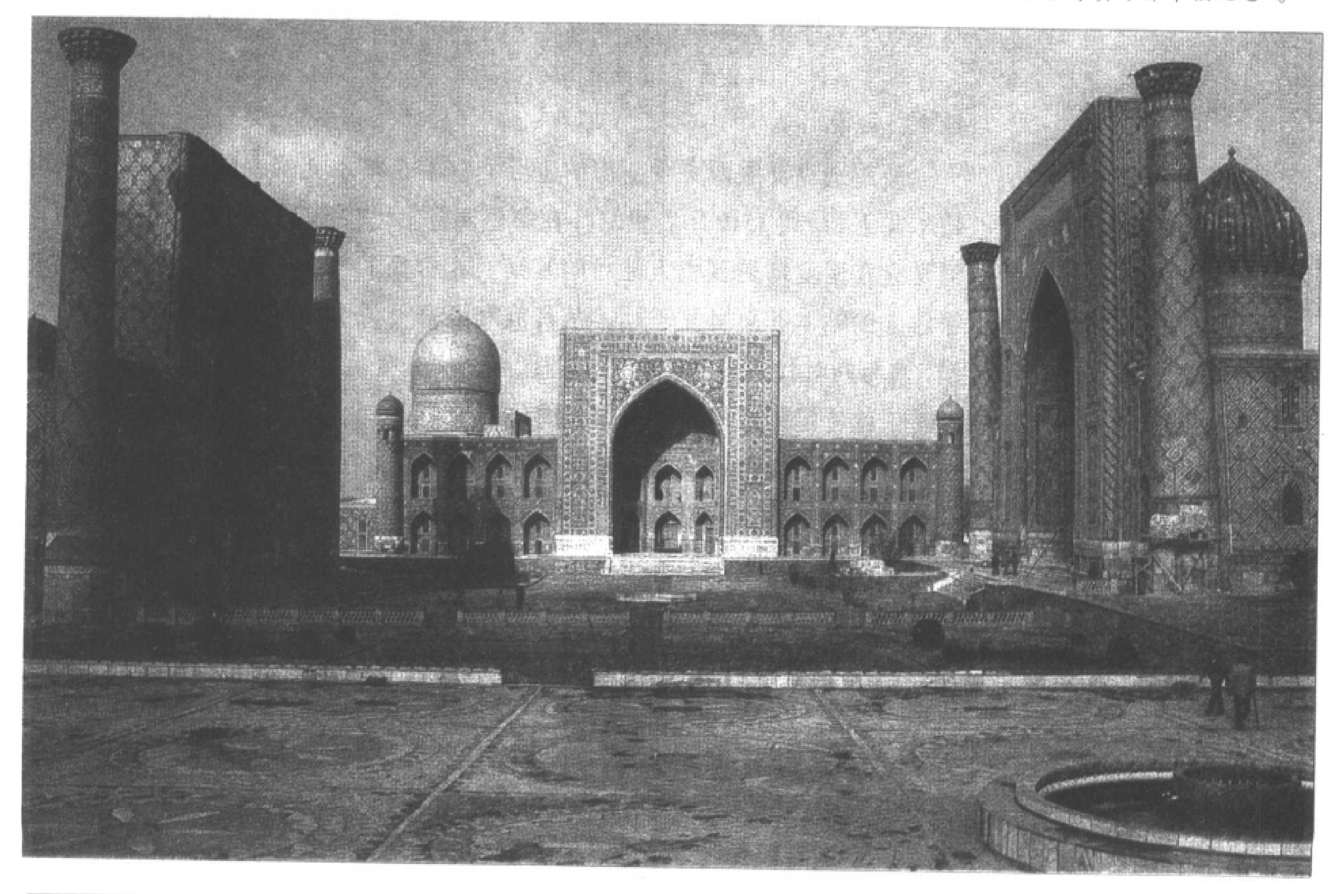
① 阿斯特拉罕的穆斯林王朝，1599年建立——译者。

克的可汗们处于政治上分裂、军事上相对软弱的境地，但仍然同萨法维王朝角逐，以图控制富庶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呼罗珊省。当莫卧儿统治者试图收复兴都库什山脉以北的祖居地时，乌兹别克的可汗也与莫卧儿统治者发生摩擦。这些乌兹别克可汗们在3个多世纪里在西突厥斯坦，主要是在城市与内地，进行分散控制，其中有布哈拉、塔什干、撒马尔罕和希瓦，沿阿姆河与泽拉夫尚河肥沃的冲积地以及肥沃的费尔干纳谷地。

在布哈拉的"最高"的可汗统治着这些"城市国家"的最重要的部分。其他还有建于1512年的独立的希瓦王朝，以及1700年建于费尔干纳谷地的独立的浩罕王朝。布哈拉也成为本地区的神学中心，它的宗教学校以培养逊尼派保守的哈乃斐（即哈尼法教法学派）乌里玛闻名。这些城市国家因得到伊朗、南亚与中国等远邻的保护而得以复兴，直到19世纪下半期遭到俄国军队的蹂躏。俄国势力在16世纪中叶兼并了伏尔加河中下游的喀山汗国与阿斯特拉罕汗国，1783年征服了克里米亚汗国。在中国的新疆，在乌兹别克费尔干纳边界以东，成吉思汗孙子后裔的察哈台汗国统治一直维持到16世纪中叶瓦解时为止，那时它在东北部受蒙古人的威胁，在南部被野心勃勃的苏菲派纳格什班迪耶教团的门第所取代。

苏菲派纳格什班迪耶教团16世纪在中亚的政治崛起，突出了苏菲派作

从16世纪到19世纪，乌兹别克的城邦汗国终于呈现了严格的逊尼正统派的特征。麦德莱赛是这一时期的典型建筑，希瓦[1]、浩罕、撒马尔罕，特别是布哈拉，更是学者们的中心。图中展现的是撒马尔罕的雷吉斯坦大广场，左边是兀鲁伯麦德莱赛，右边是什尔达尔麦德莱赛，正对面的是提拉卡拉麦德莱赛，这标志着那个时代的精神。英国政治家和旅行家寇松宣称，"我对东方一无所知，只有在厚实的简朴和尊贵雄伟中接近它"。



① 即花剌子模——译者。

为传教者对本地区突厥－蒙古居民所起的枢纽作用。3个教团，即纳格什班迪耶教团、库布林耶教团[1]和卡迪里教团，在把异教徒或半伊斯兰化部落拉到伊斯兰城市文化中来这方面特别有影响。苏菲派与部落民联系紧密这一点也有助于解释苏菲派长老为什么会卷入政治，有的长老本人甚至会成为统治者。这种联系比较典型的是纳格什班迪耶教团长老胡瓦加·乌拜伊德·阿拉·阿赫拉尔（卒于1490年）及其直系后裔与宗教传人，同西突厥斯坦乌兹别克前辈的统治者帖木儿王朝之间的联盟。在南亚帖木儿王朝，即莫卧儿王朝统治下，这一联盟在印度北部尤为牢固，那时纳格什班迪耶教团所崇奉的苏菲主义成为某种贵族的崇拜。

18与19世纪纳格什班迪耶教团在政治上卷入了伊斯兰世界广大而又分散的地区，在这些地区穆斯林政治权力已经削弱，或者实际上从未存在过，比如他们在高加索领导对俄国的抵抗的时候就是这样。其他的长老较早的时候在喀什噶尔恢复了纳格什班迪耶教团的影响。在东边更远的地方，中国甘肃省穆斯林受到纳格什班迪耶教团广泛传播的改革主义宣教的鼓舞，终于在19世纪末起而造反，反对满族统治。纳格什班迪耶教团的长老还扩展到奥斯曼的疆域，但效果不如在伊斯兰世界边缘地区那么显著。他们为纳格什班迪耶教团的继续存在奠定了根基，它在现代土耳其国，以及在今日土耳其和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库尔德人中间，仍然难以捉摸却广泛地存留着。 [77]

帖木儿莫卧儿人

乌兹别克征服西突厥斯坦的主要牺牲者是帖木儿倔强的后裔所建立的帖木儿王朝。到1510年昔班尼汗在那里实际上已根除了帖木儿王朝的势力，但是它在南亚却得到引人注目的复兴。札希鲁丁·穆罕默德·巴布尔1526年建立的帖木儿莫卧儿王朝，从种族和语言上说主要是突厥的。在其他方面，则与同时代的突厥人有明显的区别。奥斯曼人、萨法维人和乌兹别克人都是依赖特定的部落而掌握政权的，莫卧儿人与此不同，它的军队是由支离破碎的部落集团组成的。他们缺乏一致的种族或社会认同，其部分原因是帖木儿14世纪在为西突厥斯坦的霸权而战时削弱了或者破坏了部落的内聚力。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支持者不具有像伊朗的"奎泽尔巴什"或像奥斯曼骑兵那样的部落内聚力与独立性，莫卧儿统治者从未觉得有必要为平衡或削弱部落势力，而设立奴隶军队或奴隶官僚。帖木儿莫卧儿人也避免让后宫变成藏有潜在后嗣的政治机构。莫卧儿的亲王们通过在有经验的行政官员、省督和军事领导人中的公开竞争获得王位。当奥斯曼和萨法维的统治者仍然主要局限于宫廷里的时候，莫卧儿17世纪末的统治者奥朗则布已是一位不屈不挠的精悍将军，也许他的那些品质缩短了而不是延长了该王朝的

[1] 又译库布拉维教团——译者。

寿命。

无论是巴布尔还是他的儿子与继承者胡马雍都没有控制过恒河－朱木拿河盆地印度帝国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心。巴布尔派兵驻防过，但是在他于1530年去世以前，从未平定过具有战略意义的富庶的恒河河谷的大部分地区。胡马雍1540年被阿富汗军队打败，不得不逃亡伊朗。至1556年他去世之前的那一年，始终再没有获得过王冠。他尽管逃亡了，但对莫卧儿印度还是产生了长期性影响，因为在他返回的时候有大批的伊朗人伴随他归来，这是该王朝一直存在的移民模式。是巴布尔的孙子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把初生的莫卧儿国家变成了莫卧儿帝国。阿克巴在位的30年间通过他对印度北部与西北部持续出征而获得成功。他的成功还得益于:他把本世系中一直独立存在的土生土长的亲属吸收到莫卧儿政权中来；同时，他对先辈们开创 [79] 的土地收入制度做了仔细调查并加以详尽的说明。这为王室收入,也为军事采邑提供了经济的基础,是莫卧儿政权的主要资源。

阿克巴把新生的帖木儿国家转变成为莫卧儿帝国。由于意识到自己只有同印度人合作才能实现统治，他限制乌里玛的影响，实行宗教宽容，喜欢同有各种信仰的人进行宗教讨论。所以毫不奇怪，一些人盼望他早死。比如有人把他的统治比做“指导的阳光为谬误所掩盖”的时代。对阿克巴晚年的同情性研究表明，各种人道主义曾经盛行于这个莫卧儿帝国的宫廷中。

在集中地描绘阿克巴有意炫耀的宗教宽容与务实政治的历史记载中，常常忽略了他是在经过几十年的征战才把莫卧儿国家稳定下来的。他的最重要的征服是对阿格拉以西拉贾斯坦沙漠中那些拉其普特[①]国家的征服，因为这里的印度武士种姓统帅着印度北部最精良的军队。莫卧儿的将军们用拉其普特军队战士数以千计的颅骨（他们先前因抵抗阿克巴征战而被杀死）搭起堡垒，这是帖木儿王朝的恐吓战术。他们的残酷做法使拉其普特其他的王朝屈服，有的还向莫卧儿后宫奉献了他们的女儿。阿克巴征服的一大特色是他虽与拉其普特的公主们通婚，但不强迫她们皈依伊斯兰。他以此安抚了拉其普特的头领们，这些头领因而常常在自己的疆域内给莫卧儿专门划出一些军事采邑。阿克巴的政策成功地把拉其普特的头领变成了效忠莫卧儿的勤王者，从16世纪末起，拉其普特的队伍在帝国的各种势力中代表着某种最难对付而又是最可靠的因素。



阿克巴在处理与拉其普特的关系时精明地承认了在这样的帝国中的政治现实：80%～90%的居民不是穆斯林，其中以印度教徒为主，但也有耆那教徒、泛灵论者、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莫卧 [80] 儿是一个突厥－蒙古要塞国家，它控制着城市中心以及印度河－恒河肥沃的新月这一农业的核心地带。莫卧儿的帝王们面对印度教与穆斯林统治者的种种令人不解的变化只能保持脆弱的最高权位，这些统治者，如像印度中西部的拉其普特人、阿富汗人以及马拉塔人，在农村都有很深的根基。在南亚大多数居民

① 拉其普特是印度古代的种姓，由皇族组成——译者。

78

巴布尔:中亚文艺复兴的君王

札希鲁丁·穆罕默德·巴布尔(1483~1530年)于1526年建立了印度帖木儿莫卧儿帝国,但是他的名望多半来自他的著述,而不是他的军事开拓。他的自传(即Baburnama)和诗歌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使我们能够透视近代初期一位穆斯林君王的个性和生活,这涉及中亚、阿富汗以及印度伊斯兰文化和社会。在他的作品中有一些对各种性格迥异的人物的描述,很难想像传统的穆斯林历史作品中会出现这类人物,因为它们往往倾向于把穆斯林说成是千人一面的。如果说他像所有的自传作者一样,也以赞赏的眼光描绘自己的话,那么不同的是,他也深刻地揭露了他所处社会的一些弊端,就像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本韦努托·切利尼所做的那样。他宣称,意大利的有教养的暴力同样也十分典型地存在于中亚地区,而他自己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艺复兴运动之臣",就像梅迪西斯或卡斯蒂廖内的理想化的朝臣那样。在他的传记作品中,一会儿描绘军事征战或杀敌的场面,一会儿又转向对于突厥语或波斯语韵律学很有见地的讨论。他的所有作品都用一种朴素平实的风格,坦率地、实事求是地观察人和自然。

他这样描述一位小伙伴:

> 在素丹阿卜赛义德·米尔扎御前的年轻武士中,佩带着一把弯刀的朱尔伦·阿鲁浑显得格外惹人注目,之后他在每次采取行动的场合,都表现得与众不同。他的勇敢是无可挑剔的,但是在理解力方面肯定十分欠缺。他是一个虔敬的正统的信徒,从来不会忘却规定的赞念,他还常常反反复复地做规定之外的念功。他酷爱下棋,十分着迷;如果一个人用一只手下棋,他则用两只手。他下棋不是靠棋艺,而是随心所欲。他贪婪而又吝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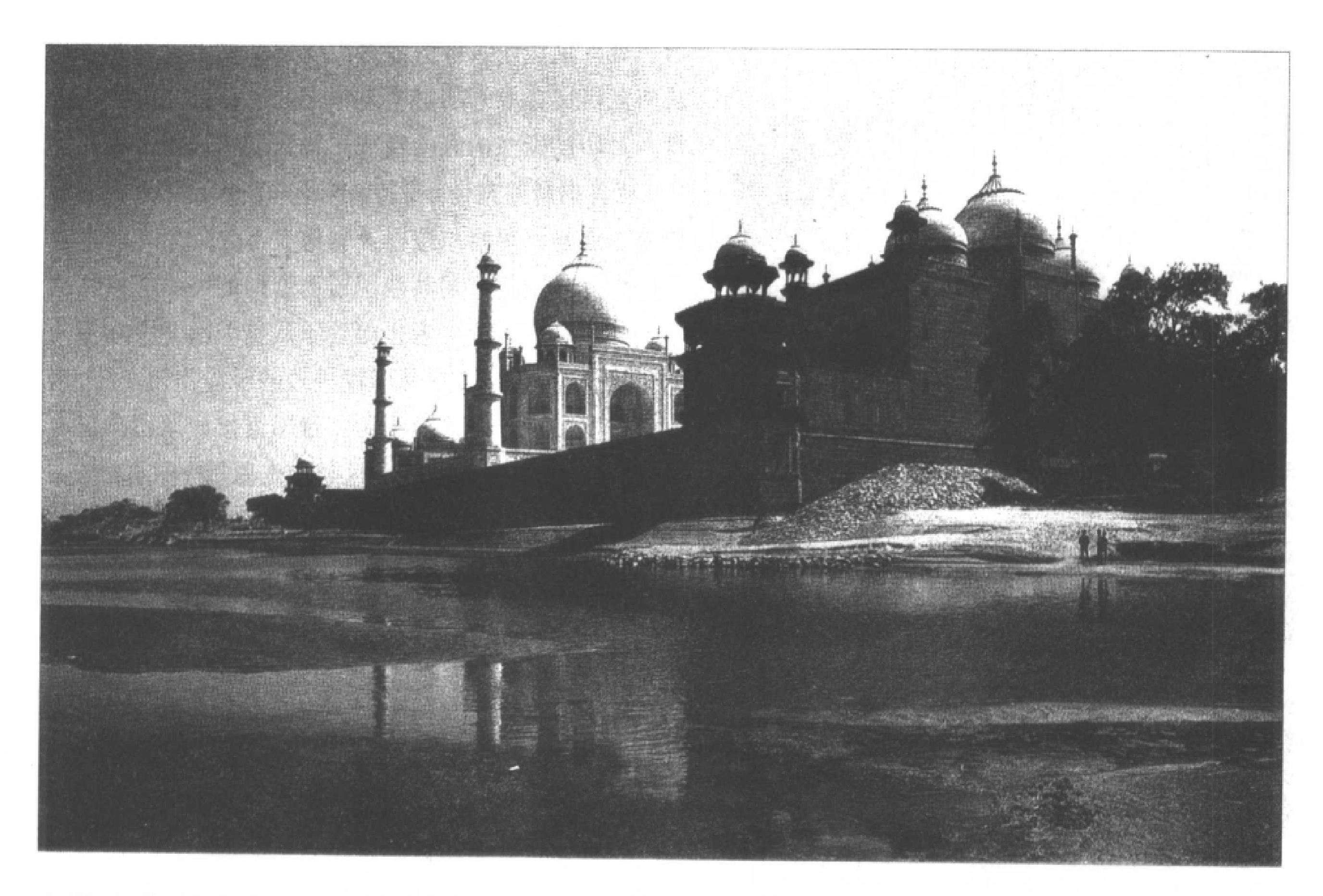
再如下面,巴布尔描述自己在19岁时写的一首诗如何得到叔叔塔什干蒙古汗赞赏的情景:

> 我用一种普通的韵律写了一首四行诗,但却不知它的好坏,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学习过这么多诗歌用语。这位塔什干蒙古汗脾气好,而且也写诗,尽管这些诗中颂诗的要素有些不足。我把我的作品拿给他看,也把心中的疑惑告诉了他,但他并没有给我一个能消除疑惑的十分清晰的回答。他对诗歌语言的研究看来有些不足。

仅仅透过一个年轻的帖木儿穆斯林分析一位好脾气的蒙古汗诗文的想法,便改变了我们对于伊斯兰世界的印象,这一印象以前受到东方主义假说的太多影响。巴布尔的自传和他在个性与特质方面所做的尝试,向我们展现了伊斯兰文化的活力和创造性。



巴布尔花了30年的时间试图努力建成一个可与其祖先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帝国相提并论的强盛帝国。自从19世纪初他的《自传》被翻译成英语以后,他赢得了许多西方人的钦佩。"真高兴知道了巴布尔!"小说家E·M·福斯特说道,"他拥有我们希望从朋友那里得到的一切。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他的活力和抱负;他能够行动、观察和记忆;虽然他有些过于相信自己的感觉,但他依然认识到了它们的功用,由此去实现全部的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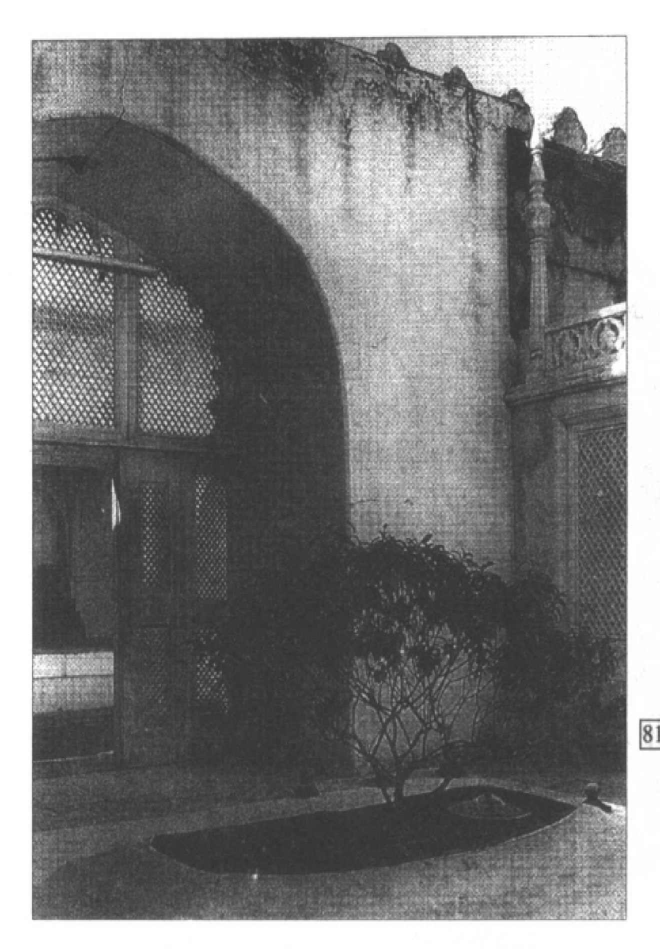
泰姬·玛哈尔陵(即泰姬陵，1632～1654年修建)是爱情的象征。莫卧儿帝国皇帝沙杰汗为纪念他深爱的妻子蒙泰姬·玛哈尔(在1631年分娩第15个孩子时去世)而修建了这一陵墓。泰姬陵同时也是莫卧儿帝国从整个伊斯兰东方世界调用能工巧匠的能力的一首颂歌：制图者和书法家来自设拉子，工程管理人员来自坎大哈，尖顶饰工人来自撒马尔罕，负责圆顶建筑的是来自奥斯曼土耳其的工匠，石工则由来自布哈拉的匠人承担。这些人同来自木尔坦的穆斯林泥水匠和印度教镶嵌工人，以及来自克什米尔的印度教园林专家一起工作。

的眼里，莫卧儿王朝所具有的这种帖木儿王朝的身份并不能让他们的统治具有合法性，即使是他们的伊斯兰信仰也不足以让阿富汗的一些部落氏族担当除临时服务以外的其他义务。

阿克巴回应这些现实，在整个帝国遏制乌里玛的影响，同时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他对公众的政策看来也好像是出自深刻的非宗派的精神。阿克巴折中主义的虔诚常常表现于他与苏非派的交往之中，也常常表现在他在他的新宫殿里主持的宗教讨论之中，这座新宫殿建于法塔赫布尔锡克瑞，其所以建于此，是为了纪念他对苏非派契斯提教团的崇敬。他的儿子查罕杰皇帝[①]骄傲地谈及他的父亲："他与每种种族、每种教义以及每种派别中的好人好事联系在一起……在他无以匹敌的统治下的宽阔天地里，各种宗教信仰的经师可各得其所。这种情况与其他王国的做法不同，比如在波斯，只有什叶派的地位；在土耳其、(非莫卧儿)印度和图兰，则只有逊尼派的地位。"阿克巴在混乱的童年时代没受过多少教育，他至多算个半文盲，这也许促使他怀有比较宽容的宗教倾向。

法塔赫布尔锡克瑞在阿格拉的正西，撇开同苏非派的渊源不谈，它仅仅是莫卧儿统治者与贵族从信德的特达到东边的孟加拉所建的几处建筑群中

① 查罕杰·努鲁丁·穆罕默德(1569～1627年)，莫卧儿王朝皇帝，1605～1627年在位。



同奥朗则布的先辈们相比，没有其他什么东西比这简陋的露天坟墓更能代表奥朗则布④权力的个性。它位于德干高原地区奥兰加巴德附近的库尔达巴德。早期的莫卧儿人死后一般都安葬在显示权势与权威的坟墓建筑群中，而奥朗则布朴素的土墓则更受到虔敬的穆斯林民众的喜爱。早期的莫卧儿人都是艺术的大赞助者，而奥朗则布则庇护乌里玛和从事征战。他在遗嘱中要求在去世当天，把出售自己抄誊的《古兰经》所得的305卢比分发给献身宗教的信徒。

的一处。这些建筑群的数量与规模反映出莫卧儿王朝从南亚臣民搜取来的财富是惊人的。莫卧儿的收入大量来自印度庞大的农业经济。特殊的建筑通常靠瓦克夫（慈善捐赠的基金）支持，这些资金来自邻近村庄的收入。泰姬・玛哈尔陵以及其他大部分陵墓与清真寺都是如此，现代早期其他伊斯兰帝国的类似建筑物也不例外。莫卧儿统治者也得益于从整个欧亚大陆流入的货币，他们用以支付从印度进口的经济作物产品，多半是印度品种繁多的棉织品。帝国直接榨取所得仅占外贸收入很小的百分比，关税与法定税税率只有2%～4%，但是由于货币流量增大造成的高层次的货币化使帝国间接获益不少。这些财富，尤其是农业税收供给了帝国军队，主要是骑兵与炮兵。莫卧儿的官员有的被确定为扎吉尔达尔（意为地方或土地的所有者①），这些地[81]方的农业收入支持骑兵队伍；有的被确定为伊克塔（土地授予②），他们负责供给萨法维国王的士兵；有的被确定为提马尔③，供应奥斯曼素丹们的骑兵。

尽管莫卧儿帝国以泰姬陵为象征，十分富有，显赫壮观，但是仍然在奥朗则布1707年去世之后的1/4世纪中宣告解体。莫卧儿帝国的坍塌与欧洲施加压力无关，比1722年萨法维国家的消失要复杂得多。奥朗则布本人须负很大的责任，他当政的时间同他的曾祖父一样长。帝国坍塌要部分归因于帝国这位皇帝严厉的个性和苦行的伊斯兰。他越来越钟情于作为正统逊尼派的统治，可能已经激怒了某些拉其普特头领，而国家财政与行政管理的恶化，则可直接归因于奥朗则布对马哈拉施特拉丛林与山地中的马拉塔人进行的20年严酷的、不成功的、耗尽资财的战争。他由于要亲自指挥莫卧儿军队，很少呆在首都，因而不能密切监督行政事务。

莫卧儿帝国体系的最终坍塌同奥朗则布长期执政也有关系，因为他的继承者巴哈杜尔・沙继承王位时已垂垂老矣，到1712年去世，仅执政5年，未能巩固对这个国家的统治。当马拉塔人和旁遮普地区新的分裂势力锡克人威胁莫卧儿帝国心脏的时候，帝国再次陷入使国势衰弱的冲突之中。于是，当萨法维王朝的后继者纳迪尔・沙・阿富沙尔1739年进入印度之时，只

① 即世袭领地所有者——译者。
② 即封建采邑的名称——译者。
③ 奥斯曼骑兵的采地——译者。
④ 奥朗则布1658～1707年在位——译者。

见到莫卧儿的地方军队。他劫掠了德里、占领了莫卧儿的国库之后，莫卧儿统治者无法供养一支新的军队，尽管莫卧儿政府仍在德里－阿格拉地区苦撑，这个帝国实际上已经灭亡。但是，无论是当地的势力还是莫卧儿省督们都不能填补这一权力真空：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插了进来。该公司到1764年已控制了孟加拉，在下一个世纪，既吞并了莫卧儿的也吞并了非莫卧儿的南亚地盘。

非洲与东南亚的伊斯兰

摩洛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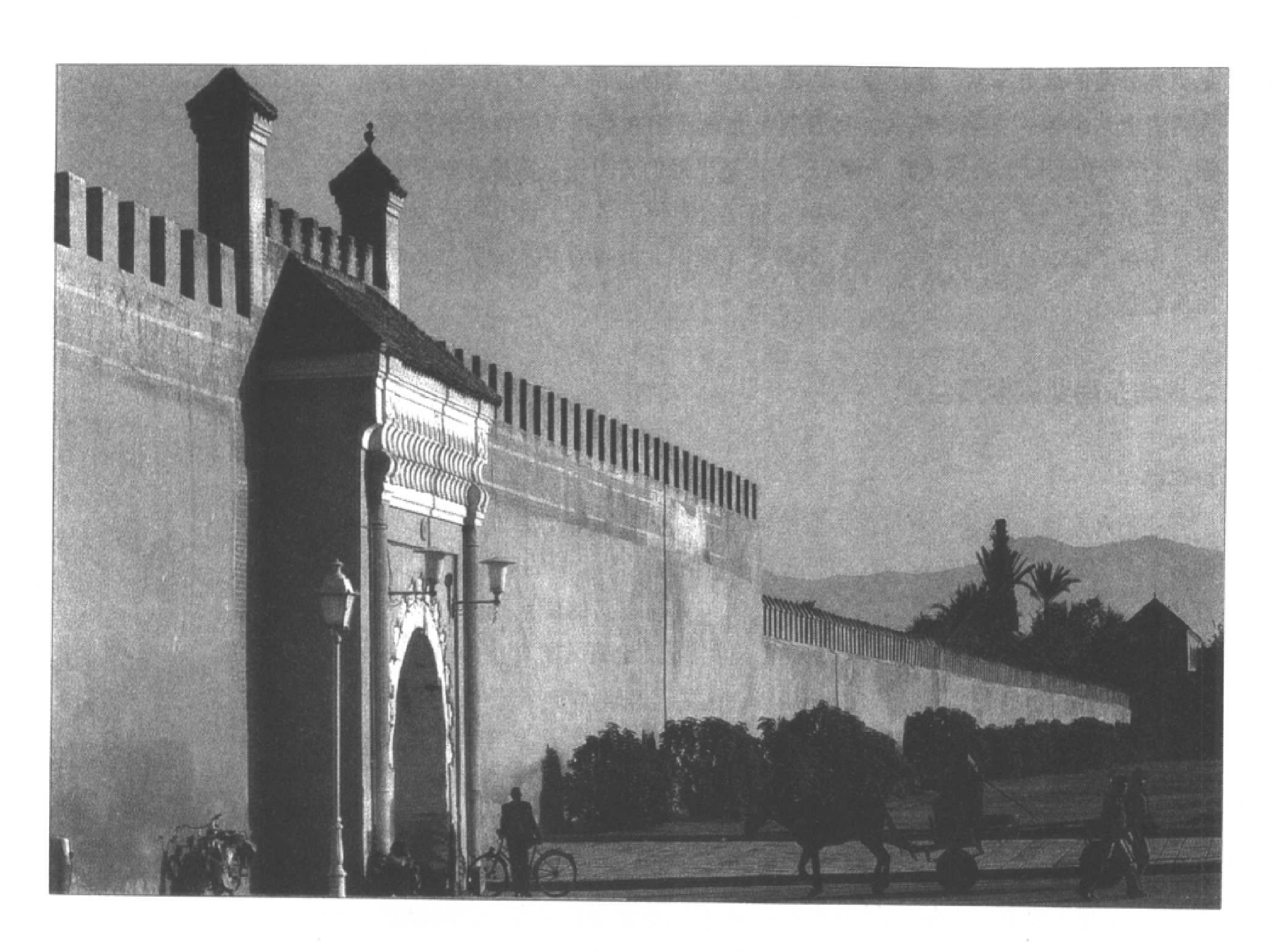
非洲和东南亚一些说阿拉伯语或受阿拉伯影响的王朝与居民是与这些突厥－蒙古帝国同时存在的。就早期欧洲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对抗来说，最重要的国家当属摩洛哥、马六甲海峡的马来与苏门答腊的诸素丹国以及亚齐。摩洛哥已进入较早的北非王国的行列，但在15世纪陷入旷日持久的经济与政治危机，并受到葡萄牙扩张的威胁。从15世纪末起，萨阿德王朝复兴了这个国家，萨阿德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属穆罕默德长孙哈桑世系。他们乞灵于他们神圣的世系，最初还利用苏非派的支持，因而在反葡萄牙的战争中获得成功。1550年萨阿德王朝统治者谢赫进入了非斯，自称哈里发与马赫迪。显然，他的胜利以及他的宗教主张导致了奥斯曼1557年对他的暗［82］杀，因为如果不对他加以制约，他会向东扩张，打入奥斯曼的地盘。萨阿德王朝依赖柏柏尔人部落组建其主要的军队，但到1600年他们已建立起一支现代军队。其中包括有令人生畏的炮兵以及欧洲的装备，1591年曾被用来征服桑海人的苏丹国，桑海人集中于撒哈拉以南尼日尔河中游。

撒哈拉以南非洲

桑海是这一时期一些小的素丹国或撒哈拉以南国家中较为典型的一个，在当地精英以皈依伊斯兰作为对穆斯林商人与乌里玛的回应时，它们至少在名义上成为伊斯兰国家。他们引进说阿拉伯语的穆斯林教育专家与宗教专家，以使他们的政权合法化，并帮助管理他们的政权。博尔诺和卡诺这两个中心的苏丹国家是这一时期另外的例子。在今日苏丹境内的丰吉[①]是东非一个类似的例子。与上埃及彻底伊斯兰化的努比亚社会以及阿拉伯半岛的直接商业交往吸引了这些地区很多的乌里玛和苏非派。廷巴克图是这种跨撒哈拉交往的例证。它作为绿洲市场城市，14世纪一直是马里伊斯兰研究的传播点。进入18世纪虽然政治命运摇摆不定，但仍具有它的文化意义。［83］

在商人、乌里玛和苏非派的宣讲下伊斯兰继续向苏丹以南传播。16世纪

① 又译芬吉——译者。



1500年至1800年间，两个王朝先后完整地建成了摩洛哥国家：一个是在马拉喀什建立的一直持续到17世纪中期的萨阿德王朝，另一个则是随后在梅克内斯进行统治的阿拉维王朝。皇权体现在雄伟的宫殿建筑之中，比如本图所示马拉喀什的巴迪宫的围墙。另外还有穆莱·伊斯玛仪（1672～1727年在位）在梅克内斯的宫殿。

伊斯兰在西非的存在日益扩大的一个最显著的表现是异乎寻常的圣战浪潮。这些战争逐渐与建立穆斯林主导的国家的广泛运动结合在一起。许多这样的改革运动，正如它们常常被描绘的那样，起始时是以伊斯兰语言表达的政治与社会抗议。非洲人朝觐期间在麦加和麦地那学习时，吸收了关于圣战和关于纯粹的伊斯兰国家的思想。塞内冈比亚的圣战导致17世纪90年代在顿杜建立穆斯林居主导的国家，这是一个可做各种解释的例子。但是对奥斯曼·丹·福迪奥[①]（1754～1817年）来说，在这些圣战与阿拉伯半岛圣训研习学校的讲授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联系，他是在18世纪70年代在豪萨兰德开始其军事使命的。丹·福迪奥师从加波瑞尔·伊本·乌玛尔，后者在麦加和麦地那研习之后返回非洲，宣讲对个人严格约束的伊斯兰和建立神权政治国家。那时阿拉伯半岛的瓦哈卜运动声名远播，丹·福迪奥的圣战多半是这一运动中的苏丹变种。

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1703～1787年）宣讲极端拘谨的教义，反对阿拉伯半岛民间的伊斯兰，也拒绝苏非派的信仰与习俗。在年幼

① 即奥斯曼·伊本·福迪，弗拉尼学者、改革家，家乡在尼日利亚西北的马拉塔——译者。



廷巴克图[2]。勒内·卡耶作于1828年，当时它的辉煌已成记忆。在16世纪，它是西非最大的城市，桑海帝国的首都，以商贸之繁荣可与当时的伦敦相比而自豪。它还是一个伟大的学术中心。它的重要性主要是由于地理位置之故：位于尼日尔河的大转弯处，尼日尔河由此最远流向撒哈拉沙漠。在这里，热带大草原的苏丹人农耕世界与沙漠中游牧民的牧歌世界相交汇。在南面是尼日尔河中部冲积平原富庶的内地，还有通向西非某些最富庶的地区的商路，在北边则是干燥的不毛之地，同时也是商队通向埃及和马格里布地区的要道。

的伊本·沙特与阿卜杜勒·瓦哈卜联手[1]后，呈现传统的伊本·赫勒敦式部落联盟面目的运动受到了预言使命的激励。1773年沙特－瓦哈卜联盟将利雅得定为首都。1803年该联盟夺取麦加，1805年夺取麦地那。继穆斯林世界的恐怖之后，又破坏坟墓与圣陵，其中包括先知穆罕默德的陵墓。但是这一侵略性的政权没有维持多久：1818年它被奥斯曼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摧毁。瓦哈卜运动刺激了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改革主义运动或者给类似的原教旨主义和极端拘谨的表现打上它的印记。这种现象在南亚与东南亚也有，这些地方的穆斯林正在对欧洲与本地的对手所带来的商业与政治错位作出回应。 84

东南亚

东南亚是伊斯兰世界经历过欧洲侵略性扩张的第二个地区。葡萄牙和西班牙于16世纪到达了这一地区，他们的意识形态与中世纪基督教十字军的意识形态类似。葡萄牙攻击阿拉伯半岛南部与印度西海岸(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曾到过马拉巴尔的卡利卡特)，以及东南亚，尤其是马六甲周围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的穆斯林社团。到1565年，西班牙通过他们在南美的基地抵达菲律宾。这两个伊比利亚政权很快就了解到，他们打算垄断的香料贸易主要控制在穆斯林商人手中，这些商人在这一地区已存在有若干世纪之

① 伊本·沙特生于1800年，那时沙特家族首领是他的父亲阿卜杜·阿齐兹，已与阿卜杜勒·瓦哈卜结盟。1803年阿卜杜·阿齐兹遇刺身亡，伊本·沙特始即位，时年仅3岁——译者。

② 一译通布图——译者。



公元1500年至1800年间，伊斯兰挺进东南亚，其中有一部分是通过商人以及与印度西海岸、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南部港口的贸易联系进行的。苏门答腊北部的亚齐是一个著名的穆斯林大本营，它与穆斯林世界的其他部分都有着密切的学术和外交上的联系。在这幅制作于1596年的荷兰版画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从麦加来的使节（衣着整齐的高贵人士）和西爪哇的万丹国的统治者。

久，产生了大量的穆斯林人口与国家。当西班牙军队抵达今马尼拉城的地方时发现，一个早期的穆斯林公国正在这一群岛迅速扩大。如果没有西班牙的干预，菲律宾人或许会成为以穆斯林为主的群体，并建立一个或多个的素丹国。

86

三个世纪的战争与殖民化将穆斯林影响强制性地限制在西南部的棉兰老省。但是在这一时期，乃至到20世纪初，穆斯林进行反对西班牙的圣战，这些圣战虽是分散的，却是持续进行的防卫战。这些圣战与亚齐先是反对葡萄牙然后是反对荷兰的斗争类似，那场斗争在从19世纪80年代初起延续了30多年的荷兰征服战争中达于顶点。无论是在菲律宾还是在亚齐的争夺都留下了宗教战斗精神的传统，它仍然是这些地区伊斯兰文化的一个特色。亚齐最终并入正式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而棉兰老的穆斯林在20世纪末仍在菲律宾南部为建立自己的国家而坚持进行零星的战斗。

皈依

东南亚伊斯兰定居的历史以及本土穆斯林社会的增长同非洲伊斯兰是类似的。伊斯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所取得的进展或许可以提供解读东南亚稀缺的资料的洞察力或模式。这两个地区有两个基本点是清晰可见的：一是伊斯兰最初是沿着商路、通过穆斯林商人而得到传播的；二是这些商人大多是阿拉伯人或是说阿拉伯语的。在东南亚，这类商人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或是波斯湾，或是来自古吉拉特或马拉巴尔阿拉伯化的商人社团。一般可以从盛行于穆斯林东南亚和印度沿岸的沙斐仪教法律例上看出他们的来源。这

哈德拉毛赛义德人:圣地商人的流散

16世纪，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作为商人从阿拉伯半岛南部地区（即哈德拉毛地区）沿着印度洋商路向外扩散。他们移居到东非、南亚和东南亚的濒海通商贸易城镇，有些在那里永久居住下来。这些阿拉伯商人中有许多也是赛义德，也就是说，他们自称是先知的女婿——阿里通过艾哈迈德·本·伊萨·穆哈吉尔（据说此人在10世纪时从巴士拉移居到哈德拉毛地区）延续下来的子孙。作为赛义德，他们对家乡的阿拉伯部落有着相当的精神影响力；一赛义德家族是特定部落里世袭的宗教仲裁人，因而对印度洋沿岸的穆斯林社会也施加类似的影响。其中一些家族如蒂比的阿达鲁斯家族、泰里姆的阿拉维家族、杜安和希赫尔的巴法基赫家族等，都成为印度洋沿岸一些港口城镇当地乌里玛的领袖。在马拉巴尔海岸的香料贸易中心卡利卡特，几乎所有主要的乌里玛都声称有赛义德身份，他们被称为"坦戈尔斯"；在苏门答腊北部穆斯林聚居区的主要城市亚齐，则被称为"桐库"，这两个词都是赞扬相当高的宗教地位和成就的荣誉称号。

绝大多数赛义德都仅仅是商人，但即使那些没有宗教职务的赛义德在非洲和亚洲穆斯林中也享有特殊的尊贵地位。哈德拉毛地区赛义德的例子说明了商业同伊斯兰教的传播之间的紧密关系。在非洲廷巴克图小城，这一点十分明显。他们试图将阐明基于《古兰经》和《逊奈》的正统信仰与教授阿拉伯语联系起来。他们的流散在各自的家谱或族谱中都有明确清晰的记载，就像卡利卡特的阿拉维人的宗谱一样，它写明一个阿拉维人定居在卡利卡特，而同宗其他人则迁移到亚齐或其他港口。这些精心保存下来的家系图证明，在近代初期的穆斯林世界，存在一种重要的族亲或血亲网络，这一关系网的存在能够而且确实已经有效地服务于商业和宗教的目的。



一教法学派在开罗、非洲东海岸、阿拉伯半岛以及波斯湾是居主导地位的教法学派。将伊斯兰传入东南亚的穆斯林有一些可能是古吉拉特或马来亚的印度人，但是他们的"伊斯兰"语言通常是阿拉伯语，而不是在莫卧儿心脏地带所说的波斯语或突厥语。

东南亚皈依的过程是渐进的，但比苏丹非洲的文献记载要少得多。尽管苏非派常常被认为是皈依的主要动因，但是实际上可能早至7世纪即已开始的伊斯兰化无疑更为复杂。首先非常可能的是，乌里玛、商人与苏非派三者一般并不是不同的个体。以阿拉伯半岛南部哈德拉毛的商人来说，他们都是赛义德（穆罕默德堂弟与女婿阿里的后裔），作为个人，可以集以上三种身份于一身。哈德拉毛赛义德的例子特别重要，因为在现代的初期，他们广布于印度洋地区，从东非到菲律宾。

哈德拉毛赛义德家族的商人仅凭圣裔这一条，常常会成为东非、印度沿海与东南亚的乌里玛。当地的穆斯林认为，把这一宗教权力授予他们同授予摩洛哥萨阿德王朝是一样的。哈德拉毛商业的职业并没有冲淡他们的宗教地位，甚至还会增强它。阿拉维世系也发展成为一苏非派教团，尽管其影响与组织都很有限。哈德拉毛的赛义德家族组成一个重要的网络，它既与哈德拉毛本身——严格的极其拘谨的伊斯兰紧密联系在一起，也与希贾兹紧密联系在一起。1500年以后，许多人成了印度西南部与东南亚社团的政治甚至是军事的领导人。他们的后裔在20世纪初亚齐－荷兰战争的后期领导了亚齐的军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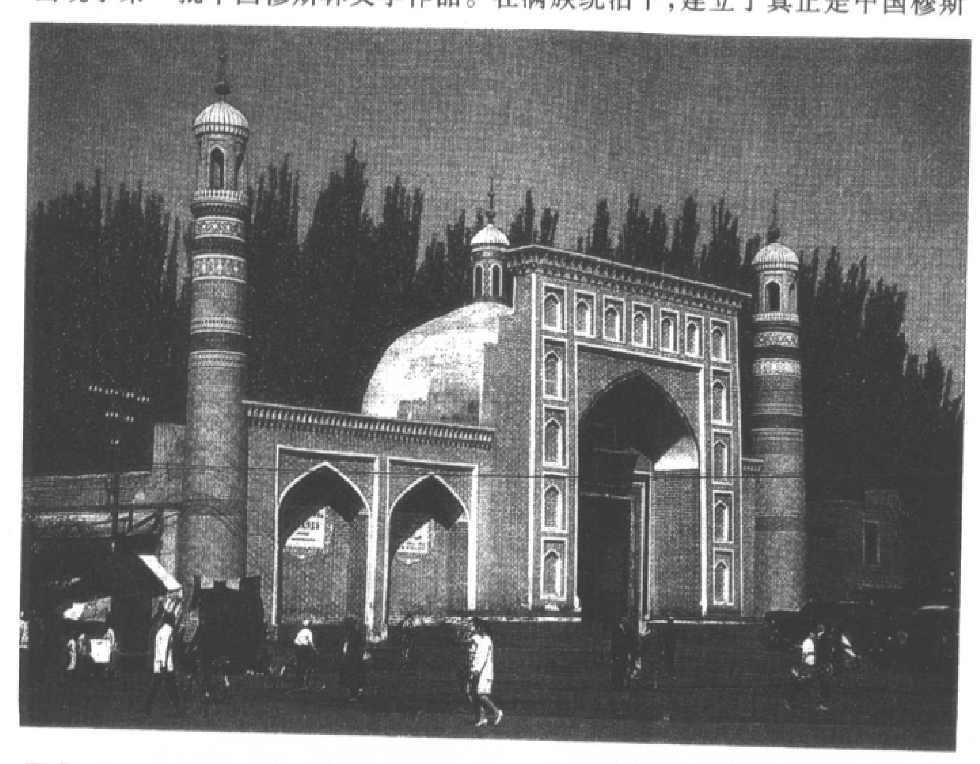
穆斯林大规模商业拓居安置之后，东南亚皈依伊斯兰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最明显的是富有的相对平等的社会对社会较低的等级或阶层，尤其是对港口城市的较低等级或阶层的吸引力。伊斯兰兴许向当地君主发出政治呼吁，这些君主也许看到伊斯兰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效用，同在基督教时代早期，印度教对其先辈们的效应一样，它可以证明独立的要求是正当的、扩张是合法的。统治者们也许已经看到，伊斯兰认同提供了一种明确表述的意识形态，借助于它，可以保卫他们不受欧洲侵略气焰日盛的商业与殖民列强的侵犯。这一意识形态可以使他们与印度洋周围其他穆斯林国家结成同盟，甚至可能与伟大的奥斯曼帝国结成同盟。基于这一原因，亚齐的素丹们在他们与葡萄牙对抗期间主动效忠于奥斯曼统治者。

尽管葡萄牙早期于1511年在马六甲取得了胜利，1522年到达帕赛附近，但是仍有几个穆斯林国家在16世纪成功地抵抗了葡萄牙的袭击。同时，穆斯林社团在中爪哇原印度人地区迅速发展。亚齐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是葡萄牙及欧洲其他列强的首要对手。亚齐成为所有非欧洲商人的抵制中心，并承担了保卫本地区伊斯兰的主要责任。它的素丹们保护伊斯兰的礼拜与教育。他们也和希贾兹以及印度洋其他穆斯林国家和社团保持密切联系，其中包括

马拉巴尔海岸先是被葡萄牙,后来又被荷兰与英国军队攻击的那些穆斯林国家和社团。同马打蓝的爪哇王国不同,亚齐的素丹们与宗教阶层合作,而爪哇的穆斯林统治者同乌里玛以及苏菲派的关系是模棱两可的,常常还是敌对的。尽管这两个国家到18世纪末都不再是独立的国家。荷兰于17世纪60年代占领了亚齐,后来马塔兰的素丹们在那个国家由于依靠荷兰支持其统治,而开始使独立受到损害。到19世纪,已经没有什么独立的穆斯林政权继续存在。尽管如此衰落,但伊斯兰已不可逆转地渗入东南亚,在苏门答腊、爪哇、马来亚,远至泰国、婆罗洲以及菲律宾的南部扎下了根。

中国

中国是伊斯兰主要通过商人和苏菲派渗入的另一地区。他们沿着中国西北的商道丝绸之路走,或者到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口。现在中国的穆斯林有两个不同的集团:新疆自治区以突厥为主的部落;回族,皈依伊斯兰的人的后裔或是穆斯林与中国人通婚者的后裔。在现代社会初期,即明朝的后半期和清王朝的前100年,新疆重新被纳入中国的行政控制之下[①]。不过,在中国西部存在着皈依了伊斯兰,或者受到穆斯林商人影响的回族。在明朝(1368~1644年)时期和在清王朝(1644~1911年)统治下,中国伊斯兰得以呈现繁荣,首先是由于得到明朝怀柔政策的鼓励。在这一时期建起许多清真寺,在晚明时期出现了第一批中国穆斯林文学作品。在满族统治下,建立了真正是中国穆斯 [88]



喀什清真寺(位于新疆喀什的艾提卡尔清真大寺)。位于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塔里木盆地,16~17世纪,喀什是察哈台汗国的首府。在这一时期,可汗们发现自己日益受到和卓们领导的苏菲派教团的反对。1678年,喀什的最后一位察哈台可汗被一位和卓推翻,到这时该地区的绿洲城市(还有叶尔羌、和田和阿克苏)在它们和卓们的领导下,彼此正在作为城市国家对手进行着对抗。1758~1759年,满族人把这一地区纳入清朝的版图。

①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无法抹杀的历史事实——译者。

林的文学传统。在这一发展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刘智,南京生人,从17世纪50年代到18世纪20年代,他写了一些关于伊斯兰哲学与伊斯兰法以及穆罕默德的著作。不过与东南亚不同,伊斯兰从未威胁过中国文化的完整性或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欧洲在印度洋和中亚建立起霸权之前,在中国固有的土地上的伊斯兰,仍主要是穆斯林商业影响高点上的文化产物。

应对与改革

18世纪末穆斯林国家日益增长的政治危险是以1798年拿破仑人侵埃及为标志的。这个时期穆斯林学者全神贯注于他们所认定的伊斯兰社会道德与精神危机。有的时候,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直接指向活跃的本土文化和顽固的本地精英,比如奥斯曼·丹·费迪奥[①]的圣战,或印度尼西亚米南加保地区1803年开始的净化宗教的“帕特里运动”,就是这样。但在许多情况下,将改革的需要与麦加和麦地那的教义传授直接联系起来,比如像18世纪上半叶在希贾兹讲授教义的谢赫·阿布·塔希尔·穆罕默德·库尔迪和塔吉·丁·哈纳菲,便是两个例子,他们批评苏菲派的教义及与其相关的圣徒崇拜,主张完全依据《古兰经》和圣训塑造社会。德里的沙·瓦里·阿拉[②]是一个体现许多知识分子趋向的人。他早年的生涯成为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的乌里玛与赴希贾兹朝觐和就读这二者的密切关联的例证。

沙·瓦里·阿拉生于1703年,他的父亲是莫卧儿重要的法律学者,是千年复兴者纳格什班迪耶教团的成员,他追随17世纪初印度长老艾哈迈德·希尔信迪。沙·瓦里·阿拉在印度接受传统的波斯-伊斯兰教育之后,在麦地那向库尔迪、在麦加向哈纳菲学习圣训他是当代的阿卜杜·瓦哈卜。他吸取麦地那对先知榜样的注视,也吸取苏菲主义对基于圣训的道德与法律制度的遵从。然而瓦里·阿拉非同寻常之处或许在于,在应对正在演化的社会条件、在解释法律的时候,强调伊智提哈德(创制)的重要性。尽管他在相信传统的统治者可以让衰败中的穆斯林国家恢复政治活力这一点上,堪称这一时期大部分穆斯林思想家的一个典型。在他当时的处境下,他邀请阿富汗人入侵印度北部,以便挡住莫卧儿心脏地区的非穆斯林统治,尽管他作为一位文雅的知识分子,也许一直憎恶阿富汗的统治。

在18世纪动乱的世界,许多乌里玛都做出了非凡的努力以恢复他们社团的活力。沙·瓦里·阿拉的智能与穆斯林大国的惰性以及伊斯兰世界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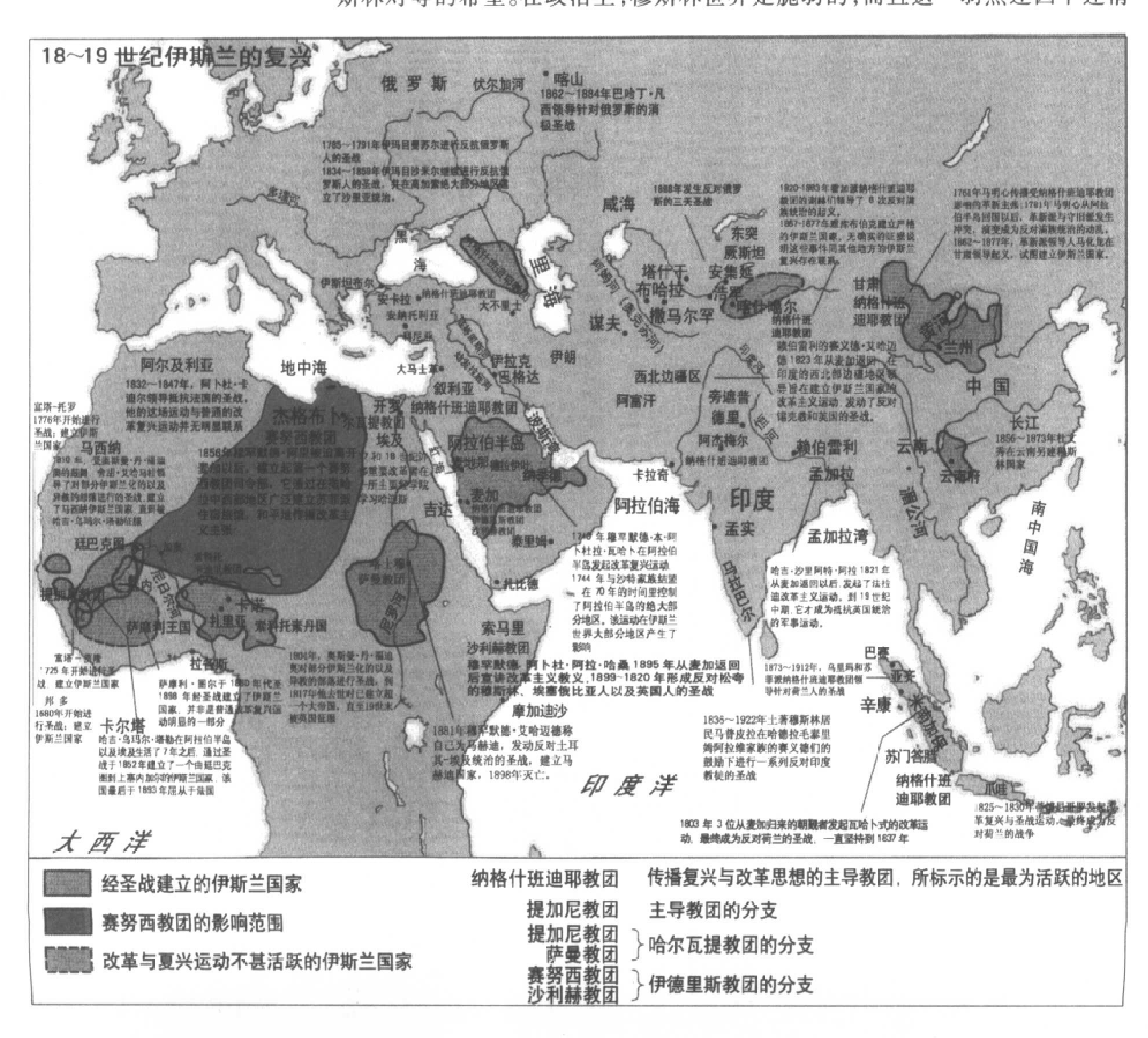
① 西非富拉尼人伊斯兰教领袖,19世纪初发动圣战,征服一些小王国,建立了以索科托为中心的富拉尼帝国。

② 沙·瓦利·阿拉(1703~1762年)又译瓦利·阿拉沙,或瓦利·阿拉,旧译瓦里·乌拉,近代印度伊斯兰教改革家和哲学家——译者。

术上与科学上的相对衰落，形成明显的反差。有些乌里玛的努力产生了结果,这归因于宗教改革的制度化。在印度北部瓦里·阿拉的思想有助于形成穆斯林对殖民统治的回应。瓦里·阿拉的生涯表明,超出政治边界的阿拉伯原文本的传统已把伊斯兰世界边远地区的乌里玛联结起来。学者共享的世界说明:18世纪穆斯林怎么可能具有共同的宗教关切,尽管除此之外他们具有文化、语言与政治上的诸多差异。

第四章　西方统治时期的伊斯兰世界（1800年至今）

[90]　到1800年穆斯林统治者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内部问题，很难应对来自西方的日益紧迫的挑战。欧洲经前两个世纪的发展，首先使基督教世界成为穆斯林世界的对手，继而又将它进一步推向前进，实际了结了穆斯林能与非穆斯林对等的希望。在政治上，穆斯林世界是脆弱的，而且这一弱点还因下述情



况而加重：19世纪和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穆斯林被收编到欧洲列强所得到的帝国中去。同其他许多非欧洲人相似，穆斯林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西方帝国主义控制下逃生，以及如何在依旧被西方支配的世界中转化为现代自立。

除了对穆斯林政治自主的威胁之外，自1800年以来，穆斯林还一直到处遭遇西方帝国主义－现代化主要副产品的纠缠。日益扩张和日益现代化的国家的影响是深刻的，不管这个国家是欧洲殖民国家，还是对技术更为先进的西方作出回应的穆斯林国家。它为许多穆斯林引进了新的需求与机会，这些穆斯林在奋力实现新的政府制度与生产制度方面已经被别人赶上。技术与通讯的进步使穆斯林得以更加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而且正好是在这个时候，与强大西方的互动以及由这种不期而遇所产生的变革，说明双方已拥有共同的新经验。人员流动的增多(到麦加朝觐的穆斯林人数的稳定增长可以说明)，再加上思想交流的增多、新的印刷技术以及识字率的提高，意味着穆斯林相互之间能够用新的、比过去容易的方式保持接触。

欧洲扩张前夕的穆斯林世界

西方的扩张最终使穆斯林世界陷入混乱。但是即使是在欧洲开始热心地插进来之前，已有迹象表明，穆斯林正起而应付欧洲对穆斯林认同的挑战。尽管有些穆斯林默默地承认他们政治上的不幸是“真主的审判”，但其他穆斯林则着手寻找“消除困扰他们的邪恶”的途径。结果，与伊斯兰政治脆弱形成直接对照，18和19世纪成为宗教活力日益增长的时期，宗教改革与复兴的浪潮突出地表明了这种活力。宗教领袖、乌里玛，还有苏非派，他们抓住运动兴起的主动权，强调改革外在的宗教习俗，也强调内在的更新。他们寻求确定观察世界的新方法，这首先涉及伊斯兰的净化。在某些方面，瓦哈卜派的教义是最有声有色的；在另一些方面，改革后的苏非派团体主导着这一方法，但多半是混合的影响在起作用。 [91]

在阿拉伯半岛伊斯兰复兴常常受知识分子运动的影响，有学问的人的联络网与运动连在一起。由于进出伊斯兰圣地的穆斯林稳定增长，所以不必惊疑，其他地方的改革运动摹仿着阿拉伯半岛的发展，当然也结合了他们自己的思想。特别是与麦地那圣训学校有联系的乌里玛影响着访问学者和朝觐者，后者把改革者的思想随身带回家。同样这些穆斯林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18世纪中叶在阿拉伯半岛东部纳季德的净化与更新运动的影响，这一运动的领导者是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1703～1787年)。在今印度尼西亚的境内，3名曾见到过瓦哈卜派占领麦加的朝觐者于1803年在苏门答腊岛发起改革运动。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帕特里运动，它导致本地米南加保 [92]

社会更大规模的伊斯兰化，但是与许多其他运动一样，它与日益扩张的西方列强——在这里是荷兰，发生了纠葛，并进行圣战，这一圣战坚持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①]。

在他们已经了解的世界看上去像是在解体的时候，改革者的主要教训之一是：重要的在于行动。穆斯林不会再静等变革的发生。而是以变革的发生为己任，如果需要，就为信仰去战斗。于是在这一时期发生许多为追寻改革者描绘的对未来的想像而进行的圣战。这样，在欧洲帝国主义开始扩张之地，许多这样的运动便被卷入为复兴而单独进行的斗争。沙利赫教团是伊德里斯教团的重要分支，由穆罕默德·阿卜杜·阿拉·哈桑（1864～1920年）领导，英国给他贴上诽谤性标签——“疯狂的毛拉”，沙利赫教团在索马里地区宣讲它的极端拘谨的改革主义教义。到1900年索马里进行的圣战反对两种外国人：埃塞俄比亚人和英国人，也反对被它认为是“松松垮垮”的当地穆斯林。非洲其他苏非派团体也建立了类似的抵抗外国控制的结构。

尽管圣战有许多人身的对抗，但它并非单纯是在肉体上同异教徒打仗的问题：正如可以产生伊斯兰派系的内战也是重要的，这些派系可以抵抗西方越来越多的侵犯。伊斯兰改革者谴责说，当代伊斯兰所面临的困境，有很大一部分是穆斯林统治者早先为迁就地方宗教习俗而做出的让步所造成的，伊斯兰改革者强调伊斯兰生活与社会应更为纯洁。他们寻求回到所谓的第一指导法则《古兰经》与圣训上去，并认为十分重要的是以先知穆罕默德作为纠正行为的最好榜样。例如，19世纪20年代东孟加拉兴起法拉迪运动[②]，在领导人哈吉·沙里阿特·阿拉（1781～1840年）赴圣地朝觐后，制订了典型的改革纲领，强调以先知为榜样，谴责与沙里亚抵触的宗教习俗。总起来说，这一更新全面抨击向“真主是惟一的”进行挑战的民间宗教。具体而言，这涉及对与苏非派传统联系在一起的，诸如崇拜圣墓等据认为是可疑习俗的攻击，从更近于哲学的层次上说，它拒绝伊本·阿拉比的“存在单一”论，而后者在吸引新的半伊斯兰化成员加入本教信仰的过程中又一直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对苏非主义的这一攻击并未阻止某些苏非派转而卷入改革：亚洲的纳格什班迪耶教团，非洲的哈尔瓦提教团与伊德里斯教团净化了他们许多引起改革者讨厌的习俗与信条，作为更广泛的尝试的一部分：树立其能够抵制基督教西方这一先头部队的精神防御教派的形象。

欧洲的接管

93 1798年拿破仑法国的军队占领埃及以后，催促伊斯兰改革的信息更加

① 经1822～1837年帕特里战争，荷兰征服了米南加保地区——译者。

② 即神圣义务运动，是一伊斯兰教派——译者。



1798年，法国镇压开罗的穆斯林起义。在法国人到达埃及的4个半月之后的10月21至22日，开罗居民被法国人的财政政策以及他们对伊斯兰教习俗的干预所激怒，揭竿而起。起义由于领导者没能赢得开罗全体居民的支持而失败。“在当夜的头班过后，”起义的目击者贾巴尔蒂写道，“法国人像洪水一样倾泻而入，进入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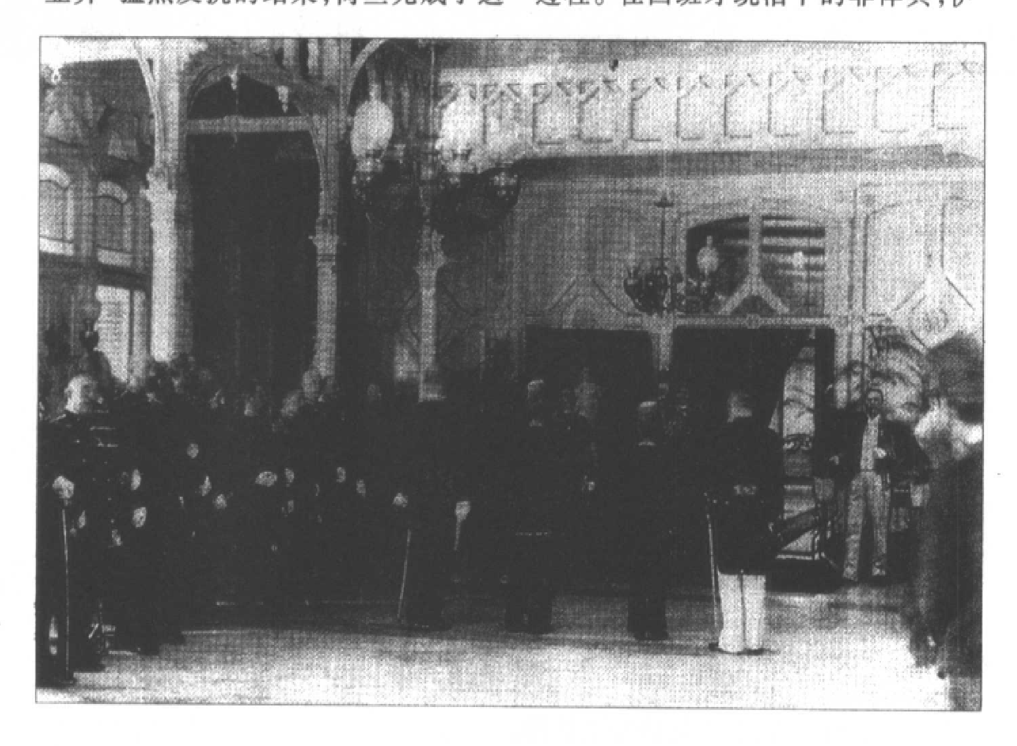
密集了。在埃及被占领后，随着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陷入欧洲的控制，穆斯林的独立一步步地被粉碎。从西非到东南亚的东部边缘，从中亚的大草原到印度半岛末端，欧洲列强到处夺取穆斯林管辖的领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穆斯林世界大部分已落入欧洲列强各种类型与程度的殖民控制之中。

欧洲内部的大竞争支撑着，并向前驱赶着帝国的机器。法国早先试图占领埃及的主要目标是剥夺英国在东方的霸权，在帝国的竞赛中夺得先手。法国借助于这一事实：由于埃及的马穆鲁克统治者试图同他们有名无实的土耳其主人分离，奥斯曼当局陷入衰微。法国像跟随他们进入穆斯林疆土的欧洲其他列强一样，认识到需要对他们居民的宗教感情给予特别的关注。因此法国很快地发表声明：“长老们、教法官们、教长们、城镇的官员们：告诉你们的国民，法国是真诚穆斯林的朋友。”这清楚地表明，拿破仑想通过吸引包括乌里玛在内的当地领导人合作以稳定他的占领。法国行动的目标针对的是马穆鲁克的暴政，而不是伊斯兰信仰。 94

欧洲这一特殊回合的卷入是短命的：到1801年法国军队向英国远征军

投降时，这一占领宣告结束。然而到19世纪中叶，被称做欧洲"病夫"的奥斯曼帝国持续衰落，这意味着以如何定夺中东潜在的权力真空为内涵的"东方问题"依然主导着欧洲对该地区的感觉。埃及一旦在1869年成为苏伊士运河之家，它的重要性也就增加了。在它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1805～1848年在位）当政期间，它实际上已与伊斯坦布尔分离。但是1882年英国的干涉阻挡了埃及获得正在到手的完全独立，而且在理论上恢复了奥斯曼的权力。埃及实际上陷入了英国的控制，尽管1914年以前英国没有成为正式的保护国，但是它显示出与此种安排有关的大部分特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整个北非都已陷入欧洲某种形式的控制之中，法国已在1830～1890年间征服了阿尔及利亚，1881年将突尼斯变为被保护国，1912年占领了摩洛哥。意大利1912年开始征服利比亚。到20世纪第二个10年奥斯曼帝国只剩下阿拉伯亚洲、安纳托利亚以及爱琴海一些岛屿，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失去了在欧洲的残余部分。

1800年对穆斯林世界偏远地区与欧洲列强的关系来说，同样也是个转[95]折点。在东南亚岛屿，伊斯兰已对大部分人产生影响，一些穆斯林国家在先前的一些世纪里已经对欧洲列强（先是葡萄牙，后是荷兰）开展了斗争，但在19世纪欧洲巩固了掌握在手中的政治权力。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在爪哇活动了将近200年，它卷入岛上内部事务也已有100多年。现在荷兰政府想直接进行控制，并在程度与范围上扩大它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权力。随着1912年亚齐[①]猛烈反抗的结束，荷兰完成了这一过程。在西班牙统治下的菲律宾，伊



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荷兰人认为苏门答腊北部的亚齐素丹国是它在该岛实现帝国主义野心的主要威胁。到1820年代，该地区生产的胡椒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从1873年到1912年，荷兰几乎没有间断过对亚齐人的战争，这也成为亚齐人的圣战。荷兰只是在采纳了其东方主义者斯诺克·赫尔格荣杰的建议（即乌里玛吃硬不吃软）以后，才开始逐渐在战争中占据上风。图中展现的是亚齐人战争后期的主要军事首领潘格里玛·波莱姆·穆罕默德·达乌德（1857～1940年），1903年向亚齐总督范·赫茨兹投降的场景。后来在荷兰统治下达乌德成为一个主要的官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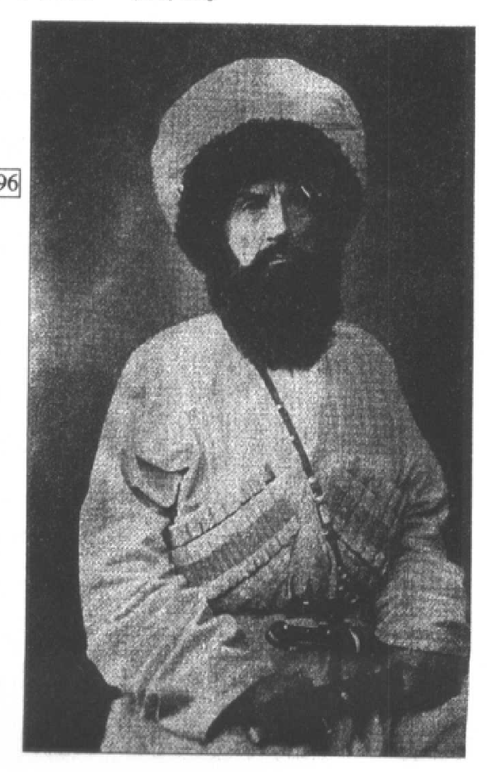
① 亚齐是16世纪在苏门答腊北部建立的素丹国——译者。

斯兰仍主要限于南方的棉兰老岛,1898年美国赢得美西战争胜利,权力转到美国手中后,情况没有多少变化。与此同时,英国通过1874年邦咯条约,加紧卷入马来半岛各国,这个过程在1819年斯泰姆福特·拉弗尔斯登陆新加坡时即已开始,1914年制造出一个被保护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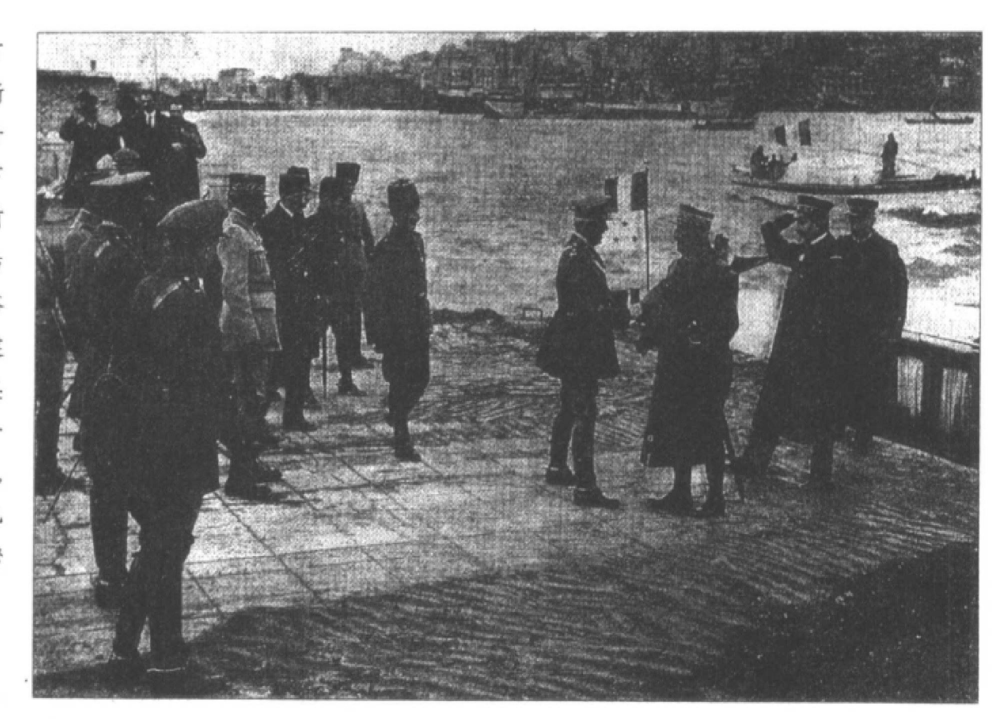
英国对马来亚的兴趣,如同英国许多帝国政策一样,要受它在印度所下赌注的影响,19世纪英国在印度投下的赌注稳定上升。到1800年,莫卧儿帝国由于宫廷的朋党滋长,对各省的控制权已经旁落,帝国实际已经解体。英国利用莫卧儿衰落之机,把它以东印度公司为形式的商业利益与战略利益转为寻求政治控制之类的东西。它先在孟加拉下手,然后逐渐扩及莫卧儿其他各省。软弱无能的莫卧儿皇帝1765年将孟加拉的收入管理权交给了英国,英国还得到了其他的奖赏,那是东印度公司以财政及军事需求形式通过"慢慢消耗"得到的。1818年英国被认为是最高掌权者,到19世纪中叶,它统治了印度的大部分。1857年起义敲响了印度本国统治的丧钟。起义士兵以及其他心怀不满的集团得到莫卧儿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的支持,这后来成为英国终结莫卧儿所有仅存的权力和将这位皇帝放逐到缅甸的最后托辞。东印度公司被取消,从1858年起英王国政府对它的印度帝国进行直接管理。

像在中东一样,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竞争影响了英国在印度权力的巩固,这一次英国所担心的对其地位的威胁要么来自法国,要么来自俄国,或者来自法俄双方。俄罗斯正在向东推进自己的帝国扩张,在18世纪征服了克里米亚吉拉汗国、哈萨克斯坦和达吉斯坦以后,进入了高加索和中亚穆斯林主导的疆域。在高加索,它于19世纪初征服了北阿塞拜疆,到1864年已占领整个地区。1854~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沙皇更加紧向中亚挺进。1868年布哈拉的埃米尔被迫签订一项条约,埃米尔保留有对内的权力,但他管辖的地盘成了俄国的保护地。其他穆斯林地盘也有类似的命运,比如希瓦在1873年也是这样。希瓦和布哈拉在 96 1920年被纳入苏维埃体系以前都仍然是被保护地。进入20世纪,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失去了其他一些穆斯林地盘。这样,中亚有12个世纪之久的伊斯兰文明的重要中心便同时落入俄国殖民主义手中,就像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沦为欧洲其他列强的殖民主义入侵的牺牲品一样。

伊玛目沙米尔(1796~1871年)画像。在高加索地区有两次著名的抵抗俄罗斯扩张的宗教改革运动,这两次运动都得到了特别是达吉斯坦人民的支持。第一次运动是由伊玛目曼苏尔(卒于1794年)领导的,他发起了1785~1791年反抗俄罗斯人的圣战。第二次则是由伊玛目沙米尔(纳格什班迪耶教团的一位导师)领导,他1834~1859年间在高加索实行了沙里亚,并抵制沙俄的强权。只是在俄罗斯摧毁了其军队赖以隐身的森林以后,他才被打败。



19世纪晚期欧洲国家为在非洲的直接利害关系而开始进行更为激烈的竞争。尽管欧洲入侵穆斯林非洲部分地区的时间可以回溯到15世纪,但只是在1884年柏林西非会议之后在那里的权力争夺才激化起来,在这次会议上大国实际瓜分了非洲大陆。到1900年英国和法国成了主要外国"股东":法国所占的土地是英国在西非所占土地的3倍,而英国统治的人口是法国殖民地人口的两倍。在东非,



1918年11月22日，东方部队最高指挥官弗朗歇·德斯佩雷将军在伊斯坦布尔前素丹王宫——托普卡珀宫的城墙下登陆。大英帝国威尔逊将军前往迎接，站在威尔逊将军身后的是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凯末尔后来领导了建立现代土耳其国家的斗争。奥斯曼帝国的战败意味着最后一个强大的穆斯林国家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欧洲人可以肆无忌惮地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穆斯林世界的心脏地区。

英国和德国瓜分赃物,有些残羹进入意大利囊中。这一政治独立的丧失恰与伊斯兰在非洲撒哈拉和赤道之间的地带的持续扩张同时发生。这些地方的欧洲统治者鼓励非洲人像皈依基督教那么踊跃地皈依伊斯兰。在西非,穆斯林“抵达”了海岸线,而在东非他们则越来越向内地挤压。不管是哪种方式,随着欧洲帝国的增长和20世纪步速的加快,穆斯林的总数增长得很快。

到20世纪初,世界的权力已稳固地掌握在欧洲的手中。尽管如此,1918 [97] 年奥斯曼帝国直接战败仍然极大地冲击了穆斯林的自尊心。确实,穆斯林最不济的运气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绘制中东新地图的政治协定。土耳其没有如协约国所期望的那样，继续保持中立，而是于1914年10月加入了轴心国。在战争进行期间,英国、法国、意大利和俄国签订了秘密协议:协约国如取得胜利,将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剩余领土。这一安排由于英国好像在做出与协议相抵触的承诺而变得复杂起来。英国又与法国签订了赛克斯－皮科协定,英国看来好像是为取得对反土耳其的支持，允诺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允诺犹太人建立民族之家。

令土耳其蒙羞的战败,使其他地方的穆斯林担心起奥斯曼素丹将接受的战后安排的性质,他那时还是很大一部分穆斯林世界的哈里发,或者精神领袖。结果,巴黎和会、1920年色佛尔条约和1923年的洛桑条约做出的政治解决办法既不能安抚穆斯林的担忧,也不能满足当地阿拉伯人的期望。奥斯曼的权力收缩到土耳其的边界以内，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被分成一些政治单位,或被新建立的国联指定英法进行委任统治。最后一个穆斯林大帝国就这样被相当随便地埋葬了。

欧洲挑战的性质

从政治层面来说，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欧洲的挑战是难以战胜的。但是这一挑战的性质比单纯的穆斯林政治权力的丧失与缩小要深刻得多。如同许多穆斯林所指出的，无论仍旧是独立的地方，还是经历过“失败的创伤”与“受异教列强统治”的地方，穆斯林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在物质上、技术上以及在智力发展与政治发展方面落后于欧洲。伊斯兰直接受到西方哲学与科学理论的挑战，这促使穆斯林思考：他们的信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与看来是新的、孪生的理性与唯物主义“宗教”调和起来。同样，穆斯林社会无庸置疑的确定事实是，它受到欧洲霸权实力的威胁。似乎是未受益于安拉指引的欧洲反而以现代国家作为成功的首要武器上升到不容否认的高峰。穆斯林可以看到运转中的这个现代国家（如果受到它的殖民统治，便可以直接地看到它；如果他们在外交上与它们打交道并与它们做生意，便可以间接地看到它），他们承认它有令人敬畏的效率。现代国家没有多少时间用于上帝：人们宣布它的合法存在，它给人们建立一个不再与神的启示有任何关联的政治结构。确实，人民的主权构成对伊斯兰的直接威胁，因为它对真主的主权提出挑战。由于现代国家也是民族－国家，因而现在能够将人民结合在一起的理由是世俗民族主义而不是宗教共同体。

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将西方统治的特征同他们在自身文化中已经辨识 [98] 出来的那些构成衰落与冷漠的因素加以比照。他们开始就他们自己与他们的宗教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宗教与现代世界之间尤其是与来自西方的理念之间的关系，提出新的理念。这导致改革的发展，通过这一改革，穆斯林寻求利用西方自身的力量、它的理性与效率，弘扬穆斯林自身的才智，并武装他们以重新确立他们的自主性。这些知识分子被称做改革主义者，或其更激进的形式——现代主义者，他们面对西方殖民统治，在到处寻求维护自身文化的认同与完整。



著名的埃及改革家谢赫穆罕默德·阿卜笃（前排中间）和他的朋友 1885 年留影于贝鲁特。谢赫穆罕默德·阿卜笃的思想对穆斯林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宣称自己生活的目标是“把（人们的）思想从模仿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在获得宗教认知方面回归它最初的本原，并用人类理性的尺度予以衡量，真主创造人类理性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宗教中的极端或伪造；同时还要证明，据此来看，必须把宗教看做是科学的朋友，它推动人类去发现生存的秘密，号召人类尊重既存的真理并在精神生活和行为中信赖这些真理”。

这一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在中东云游四方的活动家加马尔丁·阿富汗尼（1839～1897 年）使这一探索得以协调一致。阿富汗尼认为：西方“不仅是伊斯兰的敌人和征服者，而且也是为了获得新的实力可加以效仿的样板，这种新的实力会导致自由以及强大共同体的再生”。像其他现代主义思想家一样，他也乞灵于《古兰经》的经文，借以强调穆斯林对他们自己的将来负有责任：

政治漫画

在西方，漫画是政治和社会评论的重要载体。这一形式是随着新闻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在穆斯林世界，它出现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已经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在埃及已出现漫画150幅、中亚160幅、伊朗370幅，而印度仅用乌尔都语所作的漫画就有700多幅，甚至在中国，到1930年代也出现了大约100幅。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风格和模式的影响。比如，1870年代到1930年代间在穆斯林印度居于主导地位的讽刺性杂志《阿瓦德赫的笨拙》就直接得名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一份幽默杂志《笨拙》。但同时它们也受到了各国本土固有的一些模式的影响。如青年土耳其党时期伊斯坦布尔的一份讽刺性杂志《皮影戏》，就是受到了土耳其乡村木偶影子戏这一传统的启发。在20世纪晚期，

本图中，《毛拉纳斯茹丁》(1909年)抨击布哈拉埃米尔和他的首席法官心甘情愿地支持俄罗斯资本家从布哈拉国家(图中那只羊)身上“剪羊毛”。《毛拉纳斯茹丁》是由来自第比利斯的一群阿塞拜疆知识分子出版的一份活泼的、不拘泥于传统的周刊；其刊名来自突厥民间传说中的一位以诙谐、智慧著称的杰出人物。这份杂志抨击各种形式的保守主义，各种欺诈的言行，以及那些准备同沙俄妥协的人。



“真主确实没有改变一个民族的条件，假如那个民族不改变自己条件的话。”穆斯林必须使自己从保守的乌里玛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这些乌里玛禁止探求现代科学技术，而这暴露出他们是真正的“伊斯兰的敌人”。

99 开罗的爱资哈尔成为现代主义运动的才智中心。它的校长穆罕默德·阿卜笃(1849～1905年)曾经是阿富汗尼的学生，他在纯宗教的层次上发展了阿富汗尼的思想。阿卜笃被广泛地认为是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另一位奠基者，他希望提倡一种对沙里亚的进步的解释，强调基于理性的个人解释。他强烈拥护伊智提哈德（创制），或换句话说，是在伊斯兰道德规范的框架内自由探讨此时此地什么是最适合的。这种态度使穆斯林如果渴望现代科学技术进步，便能够接受它是真主启示的一部分，也能够将伊斯兰与现代欧洲的思想调和起来。

阿卜笃和他在开罗的圈子产生了一些思想，它们的传播远远超出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范围。例如在爱资哈尔学习的印度尼西亚人便具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在国内从进口的书籍中吸取新的教义，由于穆斯林出版业迅速扩大，这些书籍得以流传。1912年他们成立了穆罕默德协会，通过建立学校和诊疗所宣传他们改革的信息。这些改革思想的广泛吸引力在伊斯兰教联盟中也得到了反映，该联盟也建立于1912年，这是印度尼西亚在建立大众现代政治组织方面的第一次尝试。在马来群岛，改革主义思想通过诸如《伊玛目》等

漫画已经非常普及，成为对生活各个领域（或亲切地、或诙谐地、或者粗鲁地）进行评论的源泉。例如在阿拉伯世界，它们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成为知识分子阶层抵制政府宣传的载体。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及其对画报宣传的不宽容，令人们担心这一传统的未来命运。应该指出的是，漫画之所以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中幸存下来，是由于十二伊玛目派什叶主义采取了图画宣传方式的结果；它绝不会成为逊尼派穆斯林世界传统未来的路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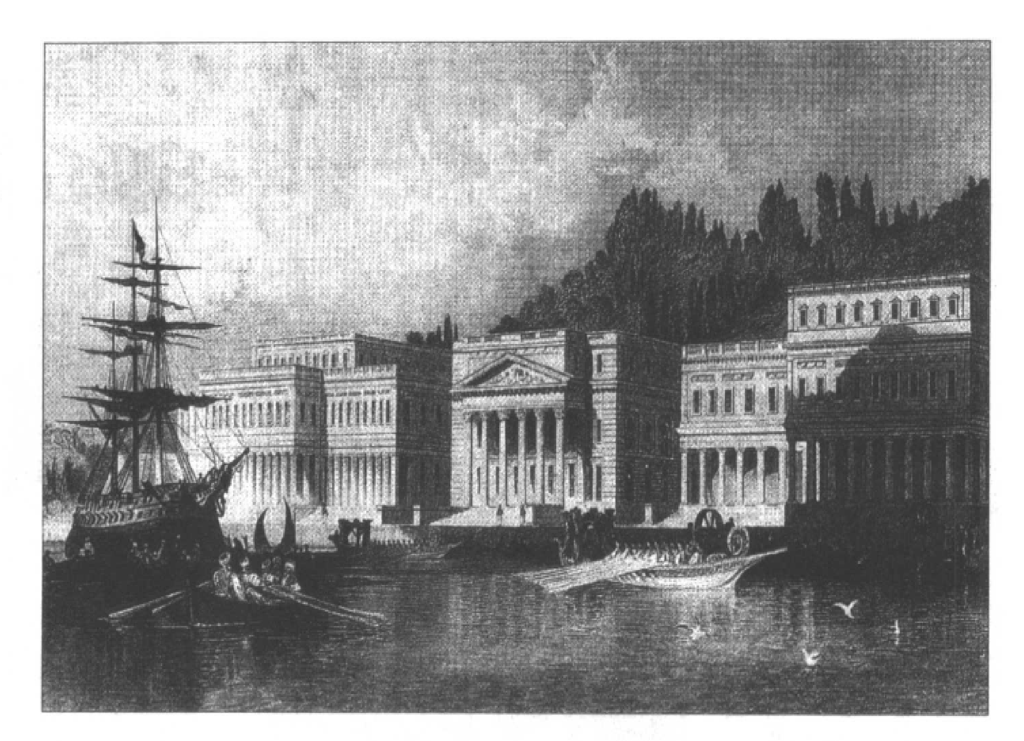
聪颖的扎吉雅是阿拉伯世界最成功的连环漫画杂志《光荣》里的智慧之泉。这份周刊主要是面向少儿读者，自1979年以来在阿布扎比出版，在除了叙利亚以外的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可以买到。女童扎吉雅评论的内容涉及政治、科学、常识甚至宗教。把女子和少年视为某种权威之源，这在阿拉伯穆斯林环境下算是革命性的。



这幅漫画摘自《中东》（1982年）——一份在伦敦出版的阿拉伯语报纸。它表明了穆斯林对于西方媒介偏向以色列的态度。

报纸宣传而受到大众欢迎，该报于1906年创刊，是当时“伊斯兰沉静的马来亚舞台的引人注目的突发事件”。马来亚改革主义者在著述中强调马来亚穆斯林教育与现代性的重要意义，强调在他们的生活中需要摆脱非伊斯兰的习俗。 [100]

这一时期最激进的宗教学者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印度尼西亚人，而是一位不依赖爱资哈尔的发展而独立地达到其知识分子地位的印度穆斯林。赛义德·阿赫默德·汗（1817～1898年）的家庭曾为莫卧儿服务，他本人是英国统治当局忠实的雇员。他认为伊斯兰完全能与现代科学兼容。英国以他的政治服务与教育服务的成绩授予他爵位。赛义德·阿赫默德向印度北方穆斯林发出强烈呼吁，那里穆斯林政治权力的衰落一直是最严重的。为了让穆斯林学习西方的知识而又不割断其宗教之根，他于1877年在阿利迦尔建立了穆罕默德盎格鲁－东方学院。这一现代主义思想中心所取得的成果是，在英国建立的新制度中，穆斯林在谋求职位时，能够成功地与非穆斯林竞争。他们随后进行的政治活动涵盖了对穆斯林开放的所有方面，尤其是与穆斯林分离主义政治有联系的领域。许多人是1906年建立的全印穆斯林联盟的坚决支持者，该联盟是为了在印度人居多数的印度社会中保护穆斯林的权利，即使有时这会涉及支持英国当局在印度政治生活中要担当被认为是中立仲裁者的角色。巴基斯坦运动在独立酝酿时期得到发展，参加运动的包含有各种类型的穆斯林，但思想的发展受诗人穆罕默德·伊克巴尔（1878～1938年）的影响



多尔马巴赫杰宫。

作为19世纪奥斯曼帝国改革进程的标志之一，素丹从俯瞰金角湾的托普卡珀宫搬迁到这座新的、至少在外在形式上属欧式风格的宫殿，它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延伸有310码。这座多尔马巴赫杰宫由来自亚美尼亚著名建筑世家（在19世纪下半叶，这一家族为素丹做了许多工作）的尼科戈斯·巴尔延设计，其内部装饰则是巴黎歌剧院的设计者、法国装饰家塞尚的杰作。1856年阿卜杜勒·麦吉德一世迁入这座王宫。

较深，他根据现代经验，雄心勃勃地试图对穆斯林的原则进行再思考。伊克巴尔理想地论证说，所有的穆斯林都归属于一个祖国，那就是伊斯兰。在现实中单个国家的吸引力要求穆斯林在伊斯兰与现代国家之间找到折中办法。于是他向印度穆斯林提出以单独国家作为他们追寻的现实目标：

> 现在兄弟关系已这样地被切碎
> 它取代了共同体
> 国家已被赋予头等重要的地位
> 在人的忠诚与建设性的工作里。

穆斯林世界需要进行其中可能会包含有西方提供的某些内容的改革，承认这一点的并不仅限于宗教思想家和宗教诗人。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很快地意识到：沿着现代主义路线进行“改革”提供了牵制西方的实际手段。马哈穆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和阿卜杜勒·麦吉德（1839～1861年在位）采取了范围广泛的措施以详细检查国家机构和使其现代化。他们尤其希望加强中央政权对各省的控制，更有效率和更正规地征税。他们知道军队中的改革早就应该进行，1826年违背自己心愿解散了传统军事制度的主要代表近卫军团，代之以现代的普鲁士训练的军队。在控制住反对派以后，全面兴盛的“坦齐马特”现在可能会出现了，“坦齐马特”是1840～1870年间实行的各种改革措施的总称。以法国模式为基础的新法典清楚地表明了奥斯曼寻求变成世俗国家的程度：该国不再求助于沙里亚的指导权威。

101

在埃及，事实上独立的穆罕默德总督建立了自己强大的中央政府，“新秩

序"为埃及在随后100年间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框架。穆罕默德·阿里粉碎了乌里玛和传统的军事精英马穆鲁克的权力，使由此释放出的资源得到有益的利用，走上了与他名义上的奥斯曼封建君主相同的道路。开罗是从东方的伊斯兰城市单独发展起来的西方式城市，兼有东西方城市特点，现在成为这种东西结合方式的有力象征：新的思想，往往是法国的思想，正在进入这个国家，而旧的信念也在并行不悖地发展。由于乌里玛原先曾控制着国家的法律机构和教育机构，现在成为反对行政机关革新的一大势力。关于埃及未来的辩论也反映在出版物中，这些出版物像在土耳其一样，迅速增多，但比在奥斯曼统治下能更自由地就穆斯林所面临的努力对付现代化进程的种种问题发表意见。

奥斯曼和埃及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为其他穆斯林统治者提供了可以效 [102] 法的模式。在邻近的卡扎尔王朝统治的伊朗，在纳绥尔丁(1848~1896年在位)统治期间开始启动现代化。他和他的继任者通过军事与官僚改革，谋求建立起能够驾驭乌里玛、部落和商人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对一些人来说(如乌里玛)，这些改革已走得太远，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如伊朗受西方教育的激进分子)，又都没有达到所要求的程度。20世纪头10年伊朗国王似乎在牺牲伊朗的利益，为英国和俄国人所利用，这些不同的反对派集团携手联合，将民主宪法强加于君主制度。然而这部宪法没有达到乌里玛之期望，于是他们不再予以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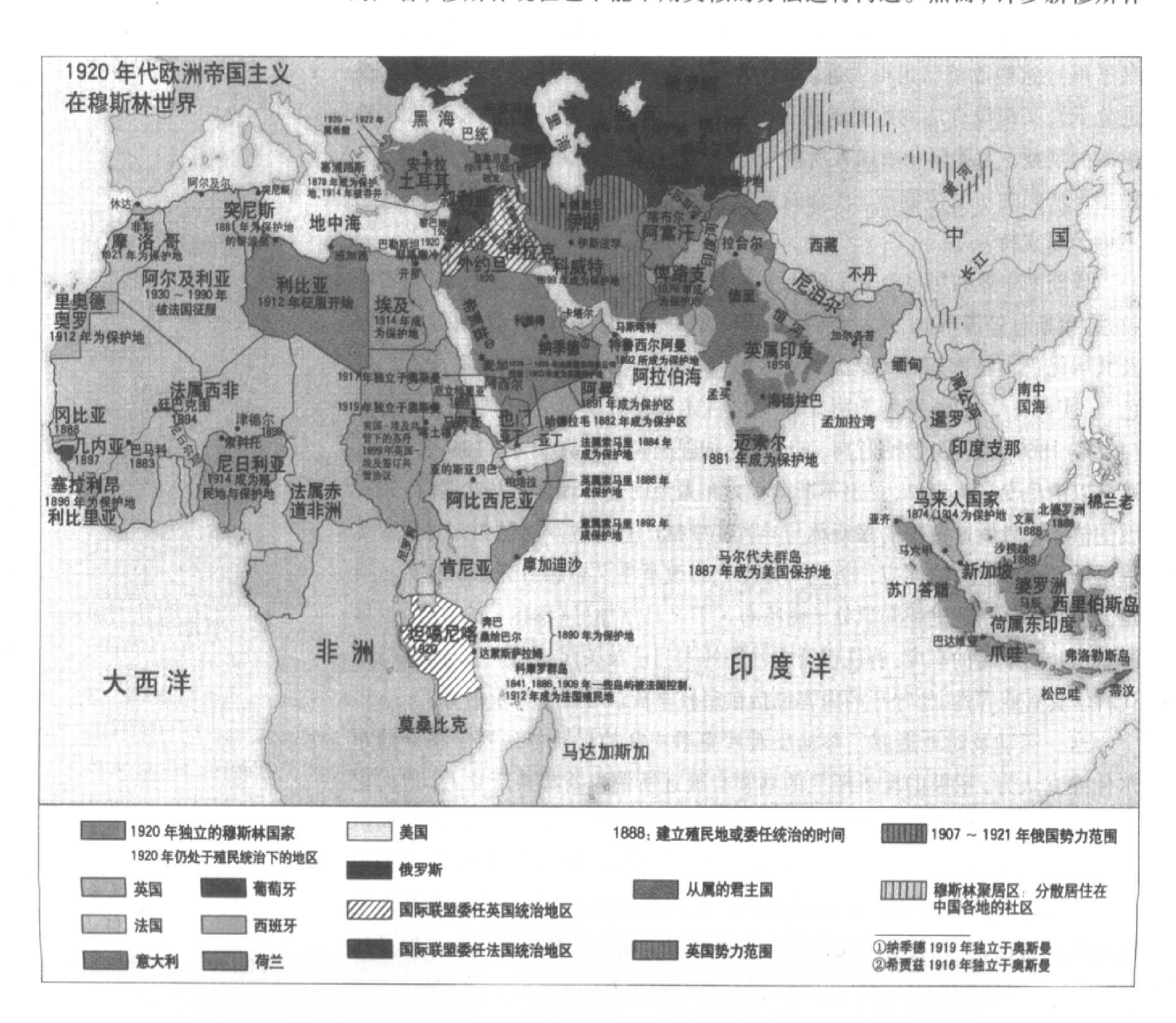
伊朗的中亚邻居也经受了现代主义改革的影响。对当代欧洲人来说，布哈拉是"穆斯林停滞不前"的一个例子：1911年一位旅行者写道，他"在这个国家及其居民仍与帖木儿时代毫无二致之时"，欣喜地看到"这个国家所有的特色"。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在艾米尔·纳绥尔·阿拉(1827~1860年在位)统治时期，当时开始加强国家的中央权力。1868年以后，西方以沙皇专制为借口，提出不断向权力和繁荣前进的理念。与此同时，东正教堂忙于在俄罗斯帝国的穆斯林与异教徒中推广基督教。是鞑靼人对这些挑战给予了最强有力的回应，也主要是他们将改革主义思想引进穆斯林突厥斯坦。起主导作用的鞑靼知识分子谢哈布·丁·马尔加尼(1818~1889年)以穆罕默德·阿卜笃的态度，否认伊智提哈德的大门已被关闭，宣称《古兰经》与现代科学具有兼容性，他呼吁的内容包括在宗教学校学习科学与俄语等。

这一运动及时地造就了参加反对沙皇君主制的穆斯林。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认为，积极的反伊斯兰的纲领会疏远所谓穆斯林共产党人，他们正在把马克思与《古兰经》结合起来，以赢得大量的支持。因此起初他们在同伊斯兰打交道时实行谨慎与容忍的政策。在乌里玛当中的"新清真寺"集团拥护改革并极力主张与布尔什维克政权合作。他们在著述中指出伊斯兰与共产主义的共同特征，并以社会主义的眼光重新解释伊斯兰许多传统信念。但是到

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维埃政府改变了它的看法。为了实现它更为彻底的控103制，它取缔穆斯林机构。像米尔·萨尔坦·加里耶夫（1880～1928年？）这样的穆斯林共产党人，以民族穆斯林眼光看待共产主义，号召抵制俄罗斯的干涉，于是被诬蔑为地方民族主义危险的鼓吹者。那种新式学校也成了国家长期而血腥的反伊斯兰运动的主要目标，伊斯兰在苏联尚存的东西均已转入地下。

穆斯林民族－国家的出现

西方政治控制与理性观念的共同影响为20世纪穆斯林民族－国家的出现创作了脚本。西方列强在建设自己帝国的时候，往往会为民族主义活动提供框架。在与西方的互动中，为寻求摆脱从属地位的穆斯林建立了新的一套基本原则与政治词汇。为了在民族－国家是至高无上的世界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穆斯林现在也不能不用类似的方法进行沟通。然而，许多新穆斯林





本图明显地展现了现代土耳其创立者阿塔图尔克想要灌输给土耳其人民的大量强烈的西方倾向。图中阿塔图尔克从安卡拉到达伊斯坦布尔，开始他在多尔马巴赫杰王宫夏天的生活。他和他的随行人员都依照严格的西方礼仪，军队的制服模仿西方式样，妇女不仅同行而且不戴面纱。

国家出现的问题是，如何在相互对立的各种民族认同方案中进行平衡。大体上，它们的统治者拒绝宗教，而趋向世俗的选择：种族、语言，或者仅仅是 104 国家自身的机构成了确定新国家性质和使这些新国家团结在一起的约束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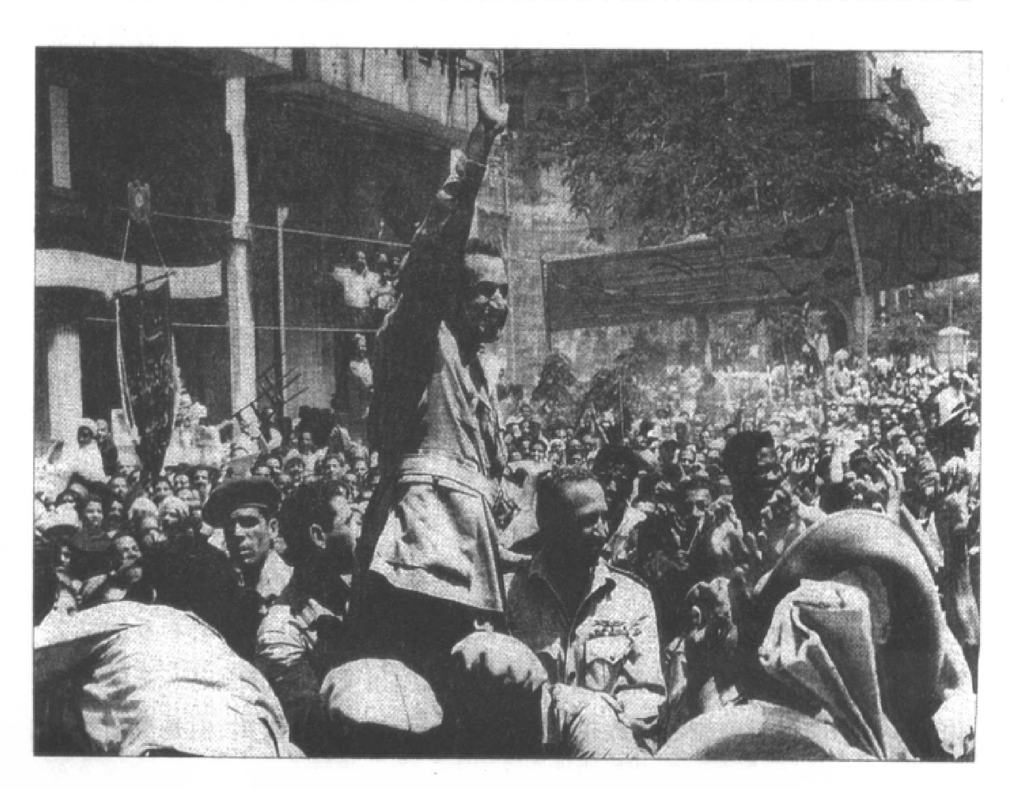
奥斯曼国家在19世纪即已开始建立世俗的框架。青年土耳其党人一旦在1908年拒绝了伊斯兰的选择，它也曾面临采取哪种认同的问题：是一个超种族社团的奥斯曼的认同，还是一种新的土耳其认同?随着1918年以后奥斯曼帝国失去其残留部分，朝着建立土耳其民族－国家发展，这一难题得到解决。在穆斯塔法·凯末尔（1881～1938年），即后来众所周知的阿塔图尔克（土耳其人之父）的领导下，新的土耳其政府推行范围广泛的改革纲领，目的在于将本国转变成为沿西方路线行进的现代世俗的民族－国家。经过15年（1923～1938年），一大批世俗主义法律改变了公众的生活。1923年土耳其成为共和国；1924年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土耳其政府实施了以欧洲为模式的成文宪法，以新法典取代了伊斯兰的法律制度；伊斯兰不再是国教。西方化还意味着禁止颁布教令，废除“费兹”帽，实行家庭姓氏，用罗马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尽管大众的压力终于迫使政府及时地从严格的世俗化后退，允许伊斯兰逐渐地重新进入公共场所，但是土耳其仍然设法保持主要是在反对它的伊斯兰的过去时铸就的这种世俗的认同。

在19世纪一直存在着阿拉伯臣民对奥斯曼土耳其统治日益激烈的对抗。这种日益增长的政治自觉是与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叙利亚的文艺复兴联系在一起的，叙利亚一些新建立的社团研究阿拉伯历史、文学与文化。尽管早期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先锋大部分是基督教徒，但是奥斯曼统

105 治的痛苦经历必然会让许多穆斯林阿拉伯人看到，政治解放之路寓于民族主义活动之中，即使这会涉及抹煞奥斯曼哈里发这一精神领袖统治其宗教版图心脏地带的权利。阿布杜·哈米德二世的专制增强了人们的民族主义意识，尽管1908年即发生了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但是应当说，阿拉伯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变得更有声色、更有组织。

1916～1917年的阿拉伯起义在奥斯曼倒台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它燃起了建立一个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希望，但在大战结束时这一愿望仍未实现。尽管如哈希姆家族国王费萨尔（是叙利亚临时国王，后来成为伊拉克国王）等一些阿拉伯领导人坚持说："我们在成为穆斯林以前是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在成为先知以前也是阿拉伯人"，但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安排所建立的政治舞台决定了未来独立中东的轮廓。埃及1922年在法律上说是独立的，但是1936年的英埃协定强调了埃及的半殖民地的地位。直到1952年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中校夺取了政权，埃及才取得真正的独立。这一"自由军官组织"的革命导致英国于1954年撤出苏伊士运河地区。两年后埃及经受住西方的攻击，这一攻击是在埃及决定转向苏联集团购买美国拒绝提供的武器和将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之后发生的。埃及的自信心影响到它的阿拉伯邻国。1956年约旦国王侯赛因解除了指挥其军队的英国军官格鲁布的职务，1958年军队领导的政变推倒了伊拉克哈希姆家族的统治者，也引人注目地终止了英国1932年正式撤走后仍持续存在的对伊拉克的干预。其间法国已于1946年准许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

巴勒斯坦独立的问题因犹太人移入而变得较为复杂。英国越来越看重它



1956年6月，纳赛尔在驱车通过塞德港时，对向他欢呼的人民挥手致意。纳赛尔出生在一个邮政职员家庭，从军后一路升迁。1949年他参与建立了自由军官运动组织，该组织领导了1952年埃及革命，从此结束了英国帝国主义在埃及的统治。1956年，他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把一系列反帝国主义的行动推向高潮。这些使他成为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领袖。

在阿拉伯社团与犹太社团之间仲裁者的作用。由于犹太定居者已增加到占人口的大约1/3,1939年阿拉伯的抗议在说服英国规定犹太移民最高限度方面取得成功。大屠杀的惨状发生后,对英国产生了强烈的道义上的压力,要它改变这一决定,政治局势日益紧张,最终导致英国于1948年将阿拉伯与犹太人分治巴勒斯坦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1948~1949年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进行的战争使它获得了独立的以色列国的政治前途。战争也造成数以十万计的难民,他们多半是穆斯林巴勒斯坦难民,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而犹太国却几乎就存在于他们的中间,这促使阿拉伯国家将矛头集中地对准他们新的以色列邻居。 106

在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发展到高峰,它成了在这一时期获得政权的激进阿拉伯政党的信条。但它们仍然未能解决如何将阿拉伯统一与伊斯兰或与相互对抗的各种国家认同调和起来这一中心问题。从1958年到1961年,埃及与叙利亚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联),稍后加入其中的还有也门。它的创建被广泛地认为是走向阿拉伯更大联合的第一步,然而权力的不均衡和国家利益的对立导致了它的解体。阿联是以叙利亚的一次军事政变而宣告终结的,这次政变因不满埃及的主导而引起。约旦和伊拉克这两个哈希姆家族的君主国对阿联感到惊恐,于是组成自己的联盟——阿拉伯联邦,但是伊拉克君主制的垮台使这一建立联盟的尝试夭折,因为新的伊拉克共和国立即宣布它同埃及紧密结盟。尽管叙利亚与伊拉克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军政权全都为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让路,但稍后与埃及联合的计划也泡了汤。“纳赛尔主义”以及阿拉伯社会主义的盛行引起亲西方的保守的阿拉伯国家的敌视。由于埃及的巴勒斯坦政策的失败,其中包括1967年同以色列六天战争的失利、西奈的丧失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关闭,使“1956年时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英雄在1967年变成它的牺牲品”。

通过对以色列做出反应仍可激发民族主义感情,但是从阿拉伯的角度来看1967年的战争,这场灾难凸显了穆斯林阿拉伯世界的分歧。政治发展揭示出,阿拉伯世界已经变得何等的支离破碎,实际上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华丽辞藻距离阿拉伯不统一的现实又有多么远。事实上,相互对立的国家利益已把阿拉伯民族主义变成单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上保持阿拉伯团结的一个口号。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声称,伊斯兰乌玛从属于阿拉伯民族。米切尔·阿弗拉克(1910~1989年)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共同创建者之一,也是该党的思想家,出身于信仰希腊正教的家庭,对他来说民族早于伊斯兰。他认为,阿拉伯认同是能够克服教派分歧与种族分歧的共同特性。而在实际上,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两个分隔开的政权都把国家优先原则置于任何泛阿拉伯感情之上,而且终于受到强大的阿拉维军事 107

利益集团的控制。

沿非洲北部海岸西行，阿拉伯统一的呼声更为微弱。这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突尼斯与摩洛哥的民族主义感情抬头，法国受经济困难以及它在印度支那作战的困扰，未能恢复它先前的殖民地位。到 1954 年，突尼斯和摩洛哥这两国都公开反抗，法国遂做出让步。1953 年流亡的摩洛哥素丹以及独立党的领袖回国，摩洛哥于 1956 年获得完全独立。同年突尼斯成为独立的共和国，哈比卜·布尔吉巴为第一任总统，继续执行 1934 年建立的民族主义的新宪政党世俗纲领。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发现他们的地位不太容易改变。尽管做了一些改革，让他们在法国议会里有代表，在本地有更大的发言权，但法国殖民者的影响持续存在，于是与法国完全决裂的想法在穆斯林中间获得了支持。问题的症结是殖民者及其同盟者的实力：只是在戴高乐执掌政权之后，法国舆论为阿尔及利亚独立做准备的棘手过程才算开始。法国当局不得不粉碎一次潜在的军事反叛，而且在 1962 年最后达成协议时，独立所获得的代价也是高昂的，数以十万计的穆斯林被杀和逃亡。本·贝拉建立起来的阿尔及利亚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给予穆斯林的仅仅是口惠而已。后来在布迈丁领导下，阿尔及利亚经历了按西方发展模式大规模进行的快速的工业化。

1954～1962 年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是穆斯林世界最惨烈和血腥的非殖民化斗争。所以毫不奇怪，它孕育了弗朗兹·法农所写的《地球上悲惨的人》一书，这本书分析了暴力在实现历史变迁中的作用，成为研究 1960～1970 年代革命变迁历史最有影响的著作。这一局势在 1957 年阿尔及利亚南部发现重要油田以后更加恶化：控制这块土地的诱惑力大大增加。图中展现的是 1957 年法国空降部队士兵在袭击阿尔及尔之后对市民进行搜身检查。

108

在阿拉伯半岛，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沙特家族已设法把奥斯曼势力逐出半岛的北部与东部。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的瓦哈卜派伊赫万（兄弟会）军队稳扎稳打，扩展地盘。1926 年 1 月伊本·沙特（1880～1953 年）宣布为希贾兹国王，到 20 年代末已基本奠定了新国家的雏形。1932 年建立了由希贾兹王国和纳季德王国组成的沙特阿拉伯，与它在中东的大多数穆斯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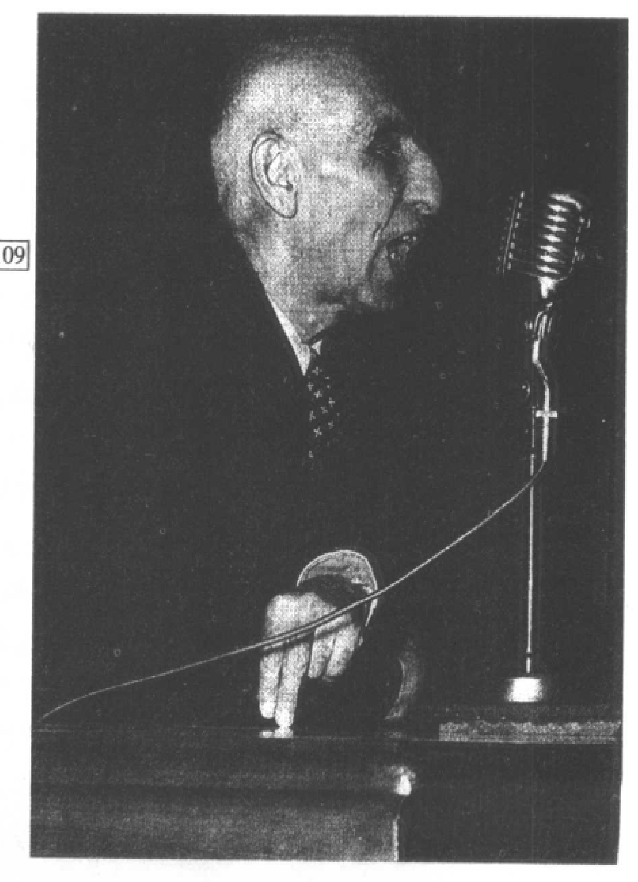


搭档相反,以沙里亚作为它的法律制度的基础,但它也在圣法的框架内从事有选择的现代化。确实,伊赫万的宗教理想主义以及他们反对诸如机动车和电话等西方现代性的象征,对这个新国家极为不利,1929年新国家打败了他们试图进行的反叛。尽管国王建立了协商委员会,但是这个委员会从未真正行使过权力,最终成为一个被阉割的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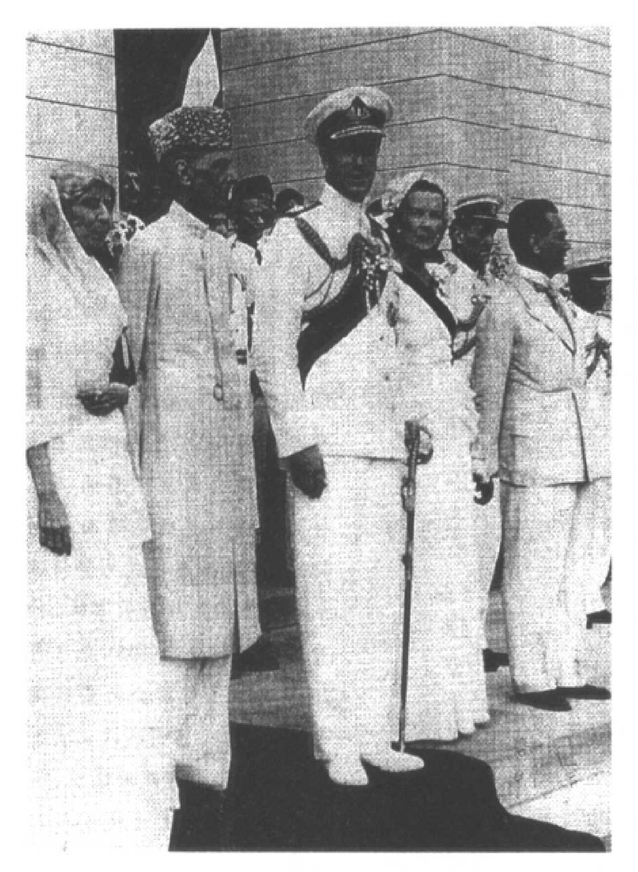
1951年7月,伊朗总理摩萨台博士要求伊朗国会在对英伊石油公司国有化的辩论中进行信任投票。为了给伊朗的现代化筹集更多的资金来源,1951年初巴列维国王试图推动国会就英伊石油公司特许权重新进行迅速而有利的谈判。这一事件成为伊朗独立和涉及国王权力的事件。作为回应,国会在1951年3月20号通过了对该公司实行国有化的议案。5月,以正直著称的摩萨台成为政府总理,下令将国会的国有化政策付诸实施。

阿拉伯半岛沿海地带在进入20世纪时已成为英国的一些保护国。在它们走向完全独立的时候,英国的支持使它们得以建立和保持保守的政权,它们像它们的沙特邻居一样,寻求建立政治上为西方所接受的现代国家。1961年科威特独立,到1971年英国从海湾其余地方完全撤出,在这些地方建立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单独建立的阿曼、卡塔尔和巴林。只是在英国已于1968年离开的亚丁,当地的统治者们被民族主义者废黜,后者建立了亲苏的也门人民共和国(或称南也门)。

在伊朗,现代民族-国家是严格遵循世俗道路而出现的,它贬低穆斯林认同而崇尚它在伊斯兰之前的过去。阿塔图尔克的同时代人礼萨·汗(1878~1942年)是哥萨克旅的上校,于1921年掌握了政权,1925年自立为国王,建立了巴列维王朝,该王朝深以伊朗的波斯遗产的荣耀为傲。他的统治本质上属于军事独裁,不容许有反对派,这是由于他借助于暴增的石油收入,开始适当地集中了国家的权力,并为世俗的伊朗建立起现代的基础设施。尽管这些改革大获全胜,但是大多数人并未感到受益。1941年英国和苏联因他同情纳粹而迫使他逊位,礼萨·汗把一个不稳定的过于集权的国家遗留给他的小儿子。这场战争也增强了对西方控制伊朗石油资源问题上的民族主义感情。1951年伊朗首相摩萨台博士为加强伊朗的统一与独立将石油工业国有化。但是由于[109]国际抵制伊朗石油的影响,摩萨台支持者的广泛联合解体了,不久在外国的支持下,摩萨台被推翻。国王从国外归来,使伊朗与西方结成甚至比以前更为稳定的联盟。现代世俗国家的进军非常残酷,现在它又进入接邻的阿富汗,这个在20世纪60年代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查希尔·汗国王遵循早些时候阿富汗的统治者阿曼·阿拉·汗(1919~1929年在位)的榜样,现在实施包含行政、教育和社会改革等内容的发展计划,虽然冒犯了保守的和宗教的信念,但改革的效果仍然有限。



巴基斯坦从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大批穆斯林民族-国家中脱颖而出,因为它有意将自己建成印度次



1947年8月15日，巴基斯坦建国日，几乎是一手创立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和印度总督蒙巴顿勋爵一起站在卡拉奇制宪议会大厦外面。站在真纳右边的是他的妹妹法蒂玛，在蒙巴顿左边的是他的妻子埃德温娜夫人。真纳在当天的议会演说中强调，宗教在巴基斯坦国将是一桩私人事务。然而不到一年，民众普遍的反抗就迫使巴基斯坦领导人不得不改弦更张。伊斯兰教在公共生活中应当发挥的确切的作用成为自那以来巴基斯坦政治话语的重要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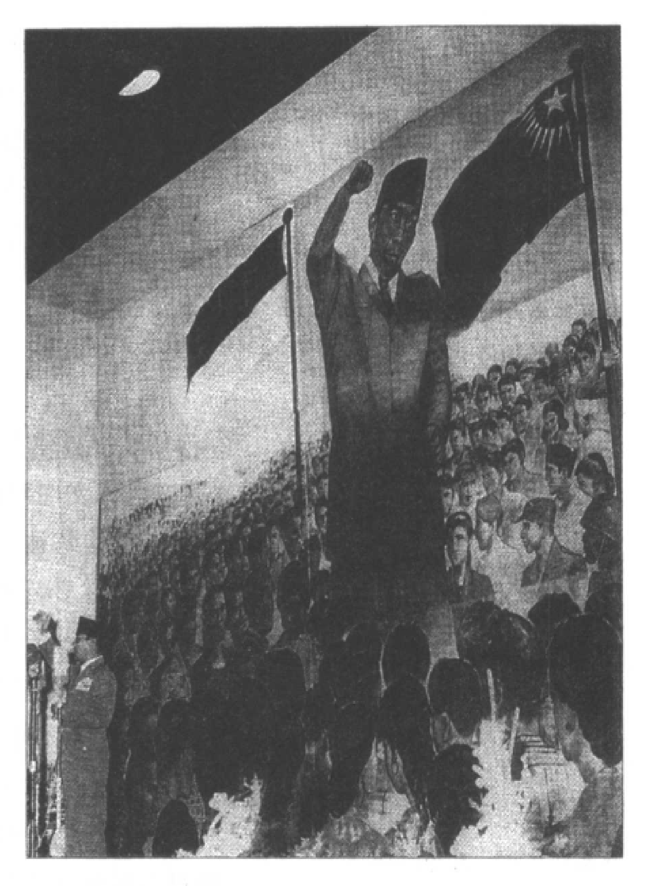
大陆穆斯林之家。由于印度独立逼近，越来越多的穆斯林担心产生在印度人占主导地位的印度共和国中永居少数的后果，于是支持穆斯林联盟的运动，以单独建立某种类型的穆斯林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环境提高了穆斯林联盟的地位，在穆斯林居多数的省份获得了至关重要的支持。这些地区尽管被印度共和国隔开1000多英里，但构成了1947年新“伊斯兰国家”领土的基础。宗教的诉求肯定有助于穆罕默德·阿里·真纳（1876～1948年）赢得足够的支持，以实现印度一些穆斯林政治分治的前途，但是巴基斯坦较早的统治者将巴基斯坦设想为现代世俗国家。最后于1956年颁布的巴基斯坦第一部宪法主要赋予宗教象征性的作用。阿尤布·汗将军的现代化政策将伊斯兰进一步推向后台，在1958～1963年间，巴基斯坦从它的国名中去掉了“伊斯兰”标签，虽然这只是暂时的。当1971年巴基斯坦的东部在一次独立战争中分离出去，变为孟加拉国的时候，强有力地揭示出伊斯兰不能把这个国家聚拢在一起。共同的宗教似乎不能克服种族区分、语言与文化上的分歧，或者弥补东巴基斯坦与西巴基斯坦之间政治与经济权力的不均衡。

马来西亚在独立时，障碍伊斯兰获得决定国家性质可能性的因素主要是种族分歧。宗教分野紧随种族界限这一事实意味着，在整个20世纪，特殊的“马来”种族要求的力量不断地阻遏伊斯兰改革主义的影响。由于马来穆斯林认为他们的多数地位受到日益增长的非穆斯林，首先是华人的威胁，因而该半岛大多数居民政治认同的主要来源是种族区分而不是宗教。担当独立运动领导的是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同非马来人相比，它主要关心的是保护马来社团的利益。巫统对伊斯兰的承诺仍然是有限的，而且它反对建立伊斯兰国家，宁愿选择将各社团聚拢在一起这一目标。

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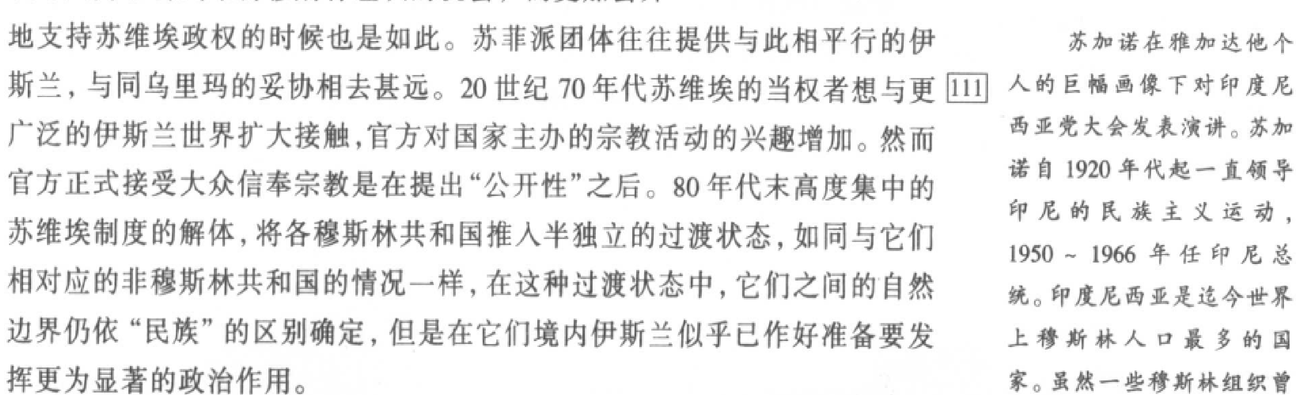
在临近的印度尼西亚，主导的政党也自觉是世俗的。它没有马来西亚那样的种族分歧，它们虽然不必面对同样的种族分歧，却必须处理在穆斯林大多数人口中存在的多种相互竞争的伊斯兰教派问题。世俗的集团领导了1945～1949年赶走荷兰人的斗争，在独立时浮现的领导层尽力避免那种把法学化了的伊斯兰教强加于国家头上的做法。该国第一任总统苏加诺（1901～1970年）自称是诚信的民族主义者、诚信的穆斯林、诚信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像阿塔图尔克一样，极力主张伊斯兰应当仍然是私人的宗教。苏加诺和他的继任者苏哈托都很担心和很谨慎看待伊斯兰，试图维持宗教集团的政治活动

在印度尼西亚受到严格控制的这一世俗国家的现状。结果，国家设法控制了穆斯林的政治雄心，而农村的乌里玛、改革者以及现代主义者继续向印度尼西亚穆斯林介绍各种伊斯兰主张与实践。



苏加诺在雅加达他个人的巨幅画像下对印度尼西亚党大会发表演讲。苏加诺自1920年代起一直领导印尼的民族主义运动，1950～1966年任印尼总统。印度尼西亚是迄今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虽然一些穆斯林组织曾经卷入各种暴力活动（比如1965年军事政变后对数万名共产主义者的屠杀，以及1970年代晚期的恐怖主义活动），但是印尼的伊斯兰仍然是以其温和及宽容态度著称于世的。

并非所有的穆斯林都必须分别获得独立，才能开始自身也是民族－国家的思考。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打破了中亚穆斯林可能一直抱有的实现真正自决的任何梦想。斯大林坚持中央的利益优先于地方利益，同后者日益增长的摆脱苏维埃控制的愿望发生冲突。苏维埃体系为防止泛伊斯兰、泛突厥民族运动的发展，基于种族与语言的相似性将中亚分成一些单独的共和国。这些穆斯林社会按苏维埃的主张发展，强调经济开发、土地改革以及大众教育与识字运动。但是伴随着提升国家文化而来的是，在公开与私下里尽力削弱伊斯兰。苏联居优先地位的是世俗化以及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同化，即使是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官方放宽对宗教与文化的政策，官方伊斯兰的领导人为了得到维持穆斯林组织的机会，而更加公开地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时候也是如此。苏非派团体往往提供与此相平行的伊斯兰，与同乌里玛的妥协相去甚远。20世纪70年代苏维埃的当权者想与更广泛的伊斯兰世界扩大接触，官方对国家主办的宗教活动的兴趣增加。然而官方正式接受大众信奉宗教是在提出“公开性”之后。80年代末高度集中的苏维埃制度的解体，将各穆斯林共和国推入半独立的过渡状态，如同与它们相对应的非穆斯林共和国的情况一样，在这种过渡状态中，它们之间的自然边界仍依“民族”的区别确定，但是在它们境内伊斯兰似乎已作好准备要发挥更为显著的政治作用。



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也形成了自己作为南斯拉夫联邦国家组成部分的“民族”认同。这是斯拉夫、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等族裔的穆斯林，他们是在奥斯曼统治巴尔干的500年间皈依伊斯兰的。他们曾被确认为波斯尼亚占有土地的贵族，他们与阶级和宗教，而不是与民族联系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大多数穆斯林依然是他们所从属的更大的共同体的成员，他们同后者已完全一体化了。1961年铁托的共产主义政府对“种族意义上的穆斯林”实行新的官方的分类，希望能借此防止出现任何会形成独特的穆斯林社团的趋势。然而，波斯尼亚的某些穆斯林逐渐达到他们新限定的政治认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认同1972年因得到政府的认可而受到鼓励，政府承认波斯尼亚穆斯林代表着南斯拉夫多民族国家中一个具有自己单独特性

的民族。然而没有多久，作为对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在其他地方为争夺战利品而打仗的回应，较强的波斯尼亚认同意识（这也涉及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和信奉希腊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便瓦解了。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南斯拉夫自身的解体，波斯尼亚各部分之间任何挥之不去的协作意识，都被流血对抗取代了，于是巩固了它作为穆斯林社团的单独的“民族”认同。

图为1993年12月，伊斯兰会议组织在喀土穆举行会议时苏丹妇女军团显示其军容。1980年代，在哈桑·图拉比博士领导的穆斯林兄弟会温和派的压力下，苏丹政府急剧地转向了伊斯兰主义：实行《古兰经》规定的惩戒措施，绝对禁止酒精饮品，以惹人注目地将成千上万瓶啤酒、葡萄酒和酒精倒入尼罗河作为开端。伊斯兰主义对于妇女参与许多领域的公共生活没有什么异议，但前提是她们在行动时不能伤害伊斯兰情感。在20世纪末，组建这类的妇女战斗团已经成为伊斯兰主义某些方面主张的一大特色。

伊斯兰主义

穆斯林世界使自身适应西方世俗的进步观的程度，在20世纪末由于穆斯林回应西方文明对他们的挑战而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那些所谓的原教旨主义，而常常被冲淡。富于战斗性的伊斯兰在各处都已建立起它的政治形象。例如在许多新独立的、穆斯林占压倒多数的撒哈拉以南国家，伊斯兰已成为重要的、统一的力量。在其他一些国家，如在多宗教的尼日利亚，它一直是一种分裂的力量。该国在20世纪80年代，穆斯林自觉的增强以及石油繁荣所促使的社会失范，使强有力的北方各省穆斯林复兴运动的“原教旨主义”性质益显，它们要求实行沙里亚。

但原教旨主义标签并不只适用于伊斯兰教，它也不是一种特别新鲜的现象。激进的或保守的学派都可能是原教旨主义；经常地，任何穆斯林思想只要挑战了那些西方假定的进步观念，它就会被不恰当地用以指称为原教旨主义。一个更好的、能够更准确地涵盖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特色的词是伊斯兰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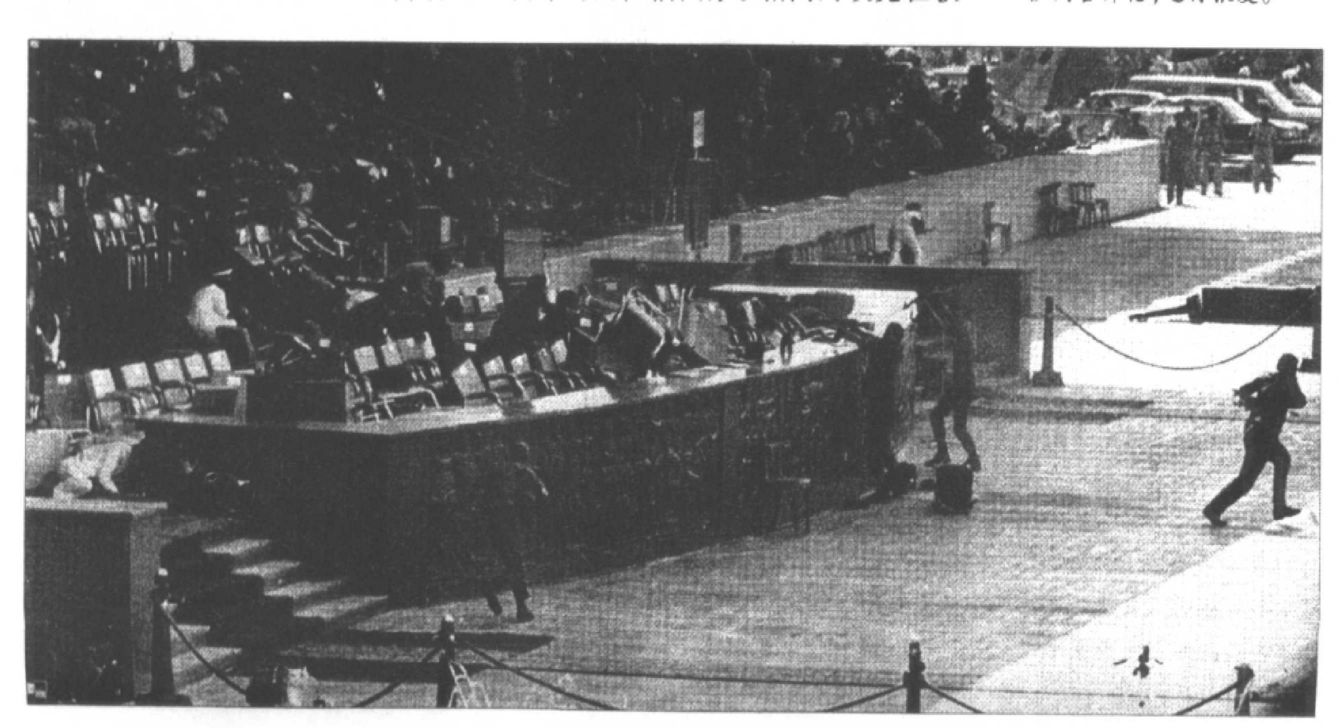


112

义。其核心是行动主义概念——建立新的宗教－政治秩序,同时仍然保留传统的宗教习惯。因此它要求对原始教义重新加以解释,而不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再肯定。伊斯兰主义肯定是20世纪的现象;它绝不是在政治真空中发展起来的。对抗西方思想的迫切需要,许多穆斯林社会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促使一些穆斯林要求建立伊斯兰制度,这是一种同奠基于物欲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相反的制度(nizam)。因此伊斯兰主义并不表示要回到过去。过去传统的伊斯兰对政府的看法局限于建立与维护适宜的条件以实现伊斯兰的繁荣。相反,伊斯兰主义者通常认为,像西方那样,政府应当运用现代化国家增强的控制权,对人民负起更大的责任。这一区别表明了后者在伊斯兰与国家的关系上持有明显是现时代的看法。

穆斯林兄弟会是中东主要的伊斯兰主义势力,1928年在埃及建立,它是由“民族心脏中新的灵魂”哈桑·班纳(1906～1949年)建立的。穆斯林兄弟会不同意传统的对现代化的保守观念,它对现代化既不接受也不拒绝,而是重新加以解释,以使它能够适合某种伊斯兰的模式。“官方伊斯兰”的领导人乃是“教士中的鹦鹉”,他们远离现实。复兴主义伊斯兰是克服社会与经济的不公正的一种手段,这种不公正是国家的“世俗”控制者所强加的。班纳本人 113 如同许多伊斯兰主义运动领导人一样,并不是乌里玛,而是省城伊斯梅利亚一位薪金微薄的学校教师;他的支持者属类似的中低阶层背景,而且往往是移入城市不久的移民,这些移民刺激了中东诸如开罗等城市的迅速增长。1948年末,埃及政府因穆斯林兄弟会卷入了对首相诺克拉西的暗杀而解散了该组织。不久班纳本人也被暗杀。穆斯林兄弟会被解散导致许多“兄弟”移居国外,这些人把他们的主张传播到了接邻的阿拉伯国家。相同的政党在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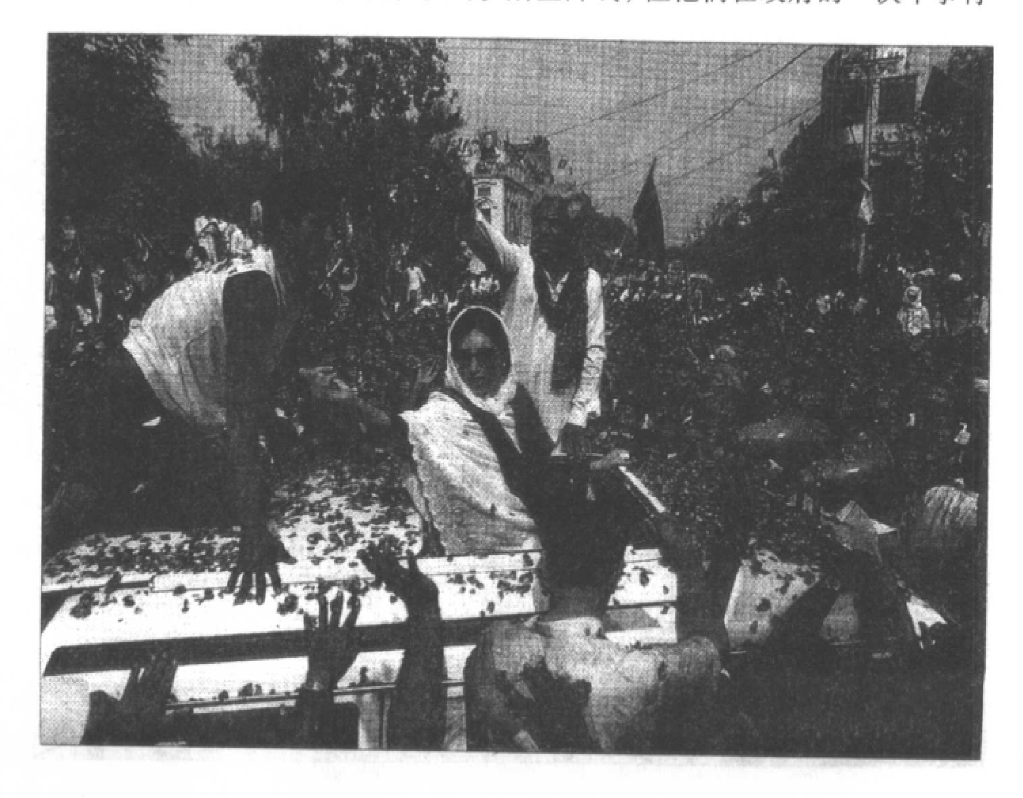
没有什么能比1981年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遇刺更加生动地说明伊斯兰主义这种针对穆斯林国家世俗领导人的挑战的性质。当时,萨达特总统正在检阅举行纪念反以色列十月战争仪式的军队。由于1978年与以色列达成的戴维营协议,没有提出为巴勒斯坦人所接受的解决办法,加上政府的经济政策使埃及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整个势力的威胁,这些激起了伊斯兰主义者中日益畅言无忌的反对。而萨达特又答以强硬的高压政策:抓捕了1500多名反对者,在军队中清洗支持或同情穆斯林兄弟会的200名军官。于是,在哈立德·伊斯兰布利中尉(他的兄弟此前被政府抓捕)的率领下,伊斯兰主义者便向检阅台开枪,进行报复。



利亚和也门扩大了力量，在巴勒斯坦和外约旦也得到了积极的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尽管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反英动乱中进行了活动，但还是在 1954 年遭到新的自由军官政权的再次镇压，从此消失于政坛至少有 10 年之久。1965 年在第二次宣称有推翻纳赛尔的阴谋之后，穆斯林兄弟会再次被清除：它的领导人赛义德・库特布也在被当局处决的成员之列。

20 世纪 70 年代穆斯林兄弟会逐渐重新在较为有利的环境中出现，当时纳赛尔的继任者安瓦尔・萨达特（1918～1981 年）想让他的政权的形象具有更多的伊斯兰色彩，利用伊斯兰的象征，以获得对他反共和反纳赛尔追随者的支持。这种改变同 1967 年埃及败于以色列密切相关，这次失败招致对世俗民族主义的强烈不满，也成了再次清除伊斯兰的催化剂。尽管萨达特鼓励穆斯林兄弟会温和的领导人，但是较极端的成员仍然保持着武装暴动的压力。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这两翼势力已经走到一起，他们共同反对政府同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1981 年 9 月萨达特转向对付反对派，集中对付伊斯兰武装人员和同情反对派的军官。一个月之后，他被穆斯林兄弟会一个分支（赎罪与迁徙组织）的军事支持者暗杀。在胡斯尼・穆巴拉克领导下，穆斯林兄弟会继续迫切要求实现埃及社会的伊斯兰化。1984 年和 1987 年的选举展示了他们的政治影响：伊斯兰已成为反对政权的主要"震源"，武装人员加紧对政府的直接袭击，也较间接地加紧对西方的象征（常常是旅游者）的袭击。

在叙利亚，20 世纪 70 年代末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里哈菲兹・阿萨德一派夺取了政权，穆斯林兄弟会沿着类似的途径，在 80 年代与其他穆斯林政党的势力结合，组成反对阿萨德政权的伊斯兰阵线，但他们在政府的一次军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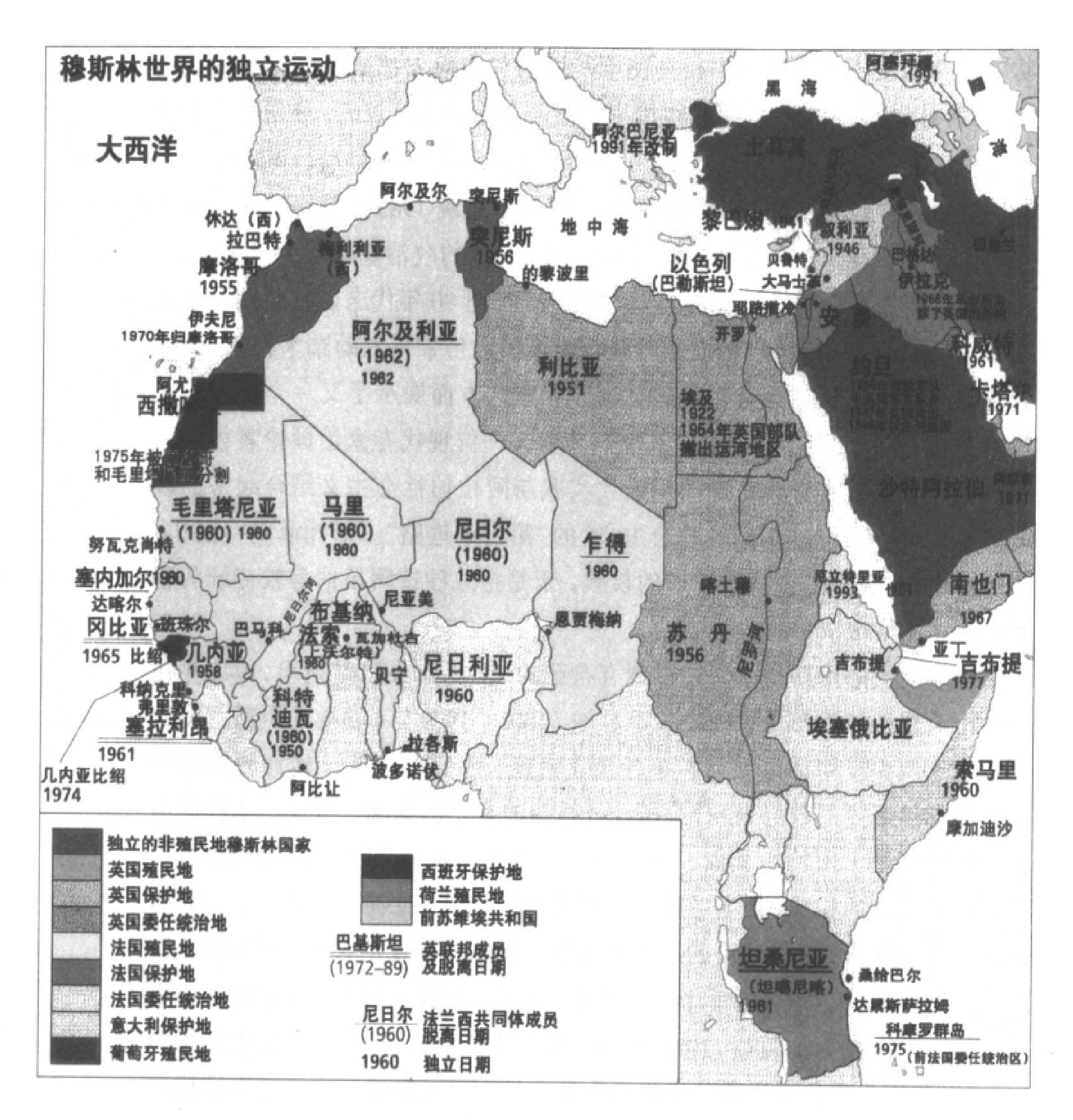
贝娜齐尔・布托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参加竞选。伊斯兰主义在这一上升时期的一个悖论是：一方面伊斯兰主义总体上是反对妇女成为政治领袖的，但另一方面穆斯林国家在这一时期却又产生了女总理。贝・布托于 1989 年率先登上这一职位，随后孟加拉的卡莉达・齐亚和土耳其的坦苏・奇莱尔也入主政府。

动中被残酷镇压，这次军事行动使哈马城的很多地方都遭到破坏。在北也门，穆斯林兄弟会在1988年赢得国家协商委员会的1/4议席。穆斯林兄弟会另一个大的活动中心是苏丹，它在1956年独立以后开展运动，谋求制订以《古兰经》和训奈为基础的永久性宪法。尼迈里总统1983年的行动在这场消耗战中起了一些作用。尼迈里面对经济危机和他的政治基础受到严重侵蚀，宣布完全实施伊斯兰法。在阿尔及利亚，20世纪80年代末面临伊斯兰主义者决定性的挑战，1991年他们通过赢得同该国世俗领导人的选举较量，而打破政治平衡，尽管这只是暂时的。利比亚在这方面展示了又一个变种，在1969年推翻伊德里斯国王的军事政变之后，一位现代专家治国论者穆阿玛尔·卡扎菲上校实行将正确的伊斯兰实践与阿拉伯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政策，提出十分革命的“伊斯兰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卡扎菲坚持以《古兰经》为惟一法源，否认哈迪斯的权威，于是招致沙特阿拉伯等较传统的穆斯林国家的憎恨。 115

印度次大陆伊斯兰主义的浮现有自己的“版本”。在巴基斯坦，1941年建立的由毛拉纳·阿布尔·阿拉·毛杜迪(1903~1979年)领导的伊斯兰促进会改变了原先反对印度穆斯林单独建立民族-国家的主张，转而呼吁建设一个拥有伊斯兰的政府、银行业和经济机构的真正的伊斯兰社会。毛杜迪与埃及的赛义德·库特布类似，以极权主义眼光谴责西方政治主权概念否认了真主对尘世的权威，伊斯兰促进会还像穆斯林兄弟会那样，从迅速扩大的城市中获得支持，这些城市的居民通常是以前来自印度的移民，对新巴基斯坦国大失所望。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1926~1979年)是巴基斯坦民粹主义的人民党的领袖，1973年他宣布巴基斯坦是“伊斯兰社会主义共和国”，以此作为避免同伊斯兰主义亲近的途径，然而对他的政策的不满招致了转向宗教-政治选择这一趋势的抬头。这一反对派主要支持在1977年夺取政权之后的齐亚·哈克将军(1924~1988年)。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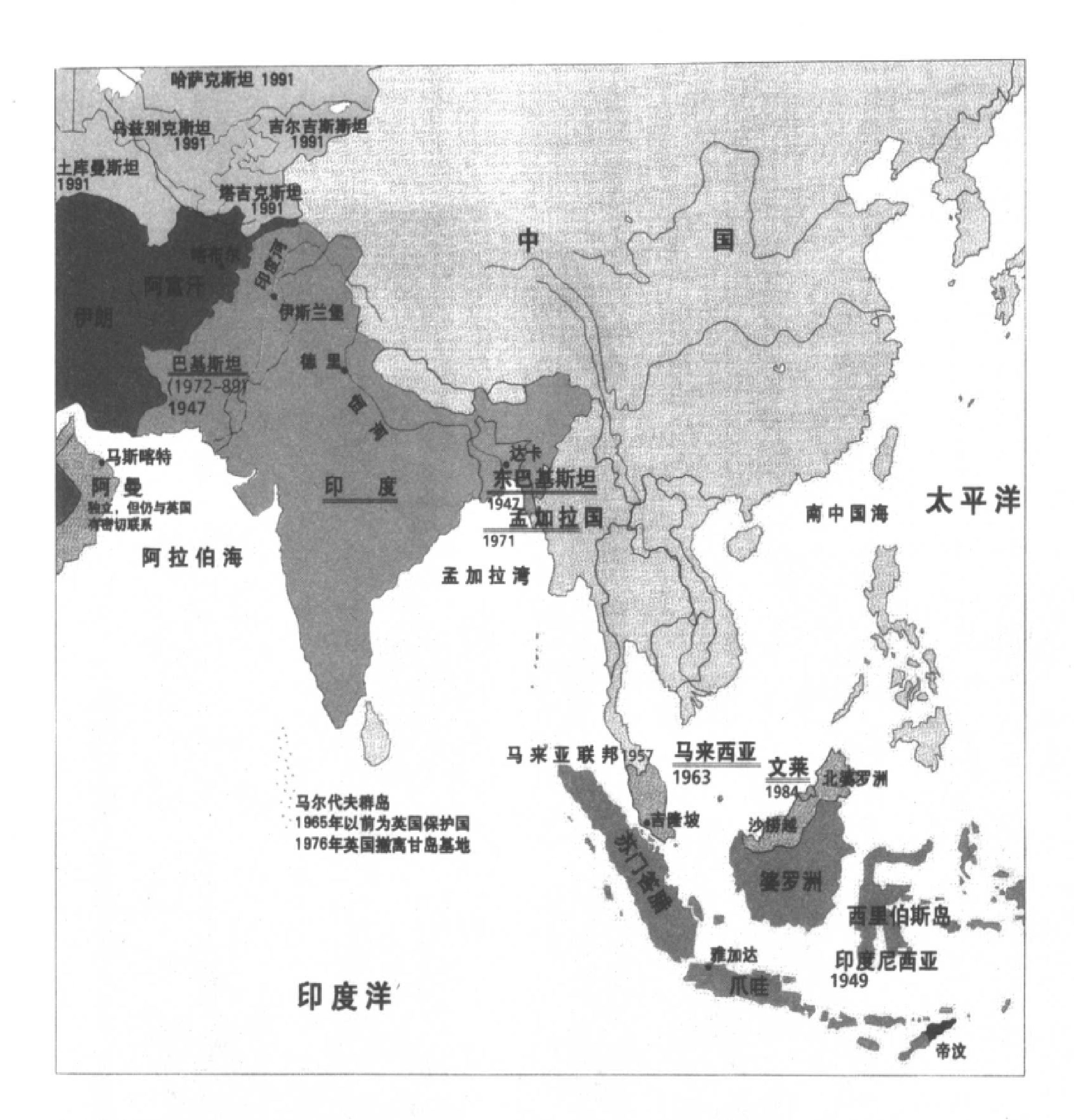
齐亚·哈克受伊斯兰促进会的强烈影响，他着手推进伊斯兰化，确认沙里亚为国家最高的法。而且，他自己持有强烈的宗教观点，不隐瞒将这些政策植根于伊斯兰的政治动机：他坚定地相信，为了铸就国家外在的统一，巴基斯坦的政治制度不能不伊斯兰化。在当时的情况下，完成这一任务并不很难，1979年以后他支持阿富汗圣战者抵抗苏联支持的喀布尔政府，这使他能够获得西方大量的支持。尽管这一时期在伊斯兰化方面做了一些尝试，但是像伊斯兰促进会这样的宗教—政治党派在选举上获得的成功仍然是有限的。不过，普遍的宗教感情的力量使其后继政府(其中包括世界上第一位穆斯林女总理贝娜齐尔·布托领导的政府)相信，寻求改进伊斯兰现状隐藏着危险。

到20世纪70年代末，所有的穆斯林社会，不管是穆斯林居多数，还是居



少数，都已有了伊斯兰的一翼。到处都有这样的穆斯林，他们为纯洁他们受到西方化污染的社团、为沿着更自觉的伊斯兰路线重建他们的社团而奋斗。即使是在沙特阿拉伯这一以其统治者的保守主义闻名的国家，到20世纪90年代也已出现伊斯兰反对派运动，并对现存秩序构成主要的挑战。但是世俗西方的模制品最惊人地被打破的是在伊朗。它的1978～1979年的革命似乎是给穆斯林拒绝西方式样的现代化做了一个总结。革命后伊朗国家与伊斯兰主义之间的一致意味着伊朗已被看做是伊斯兰主义网络的首要推动者，这一网络成为每个地方穆斯林政治的一个因素，尽管存在着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差别，情况依然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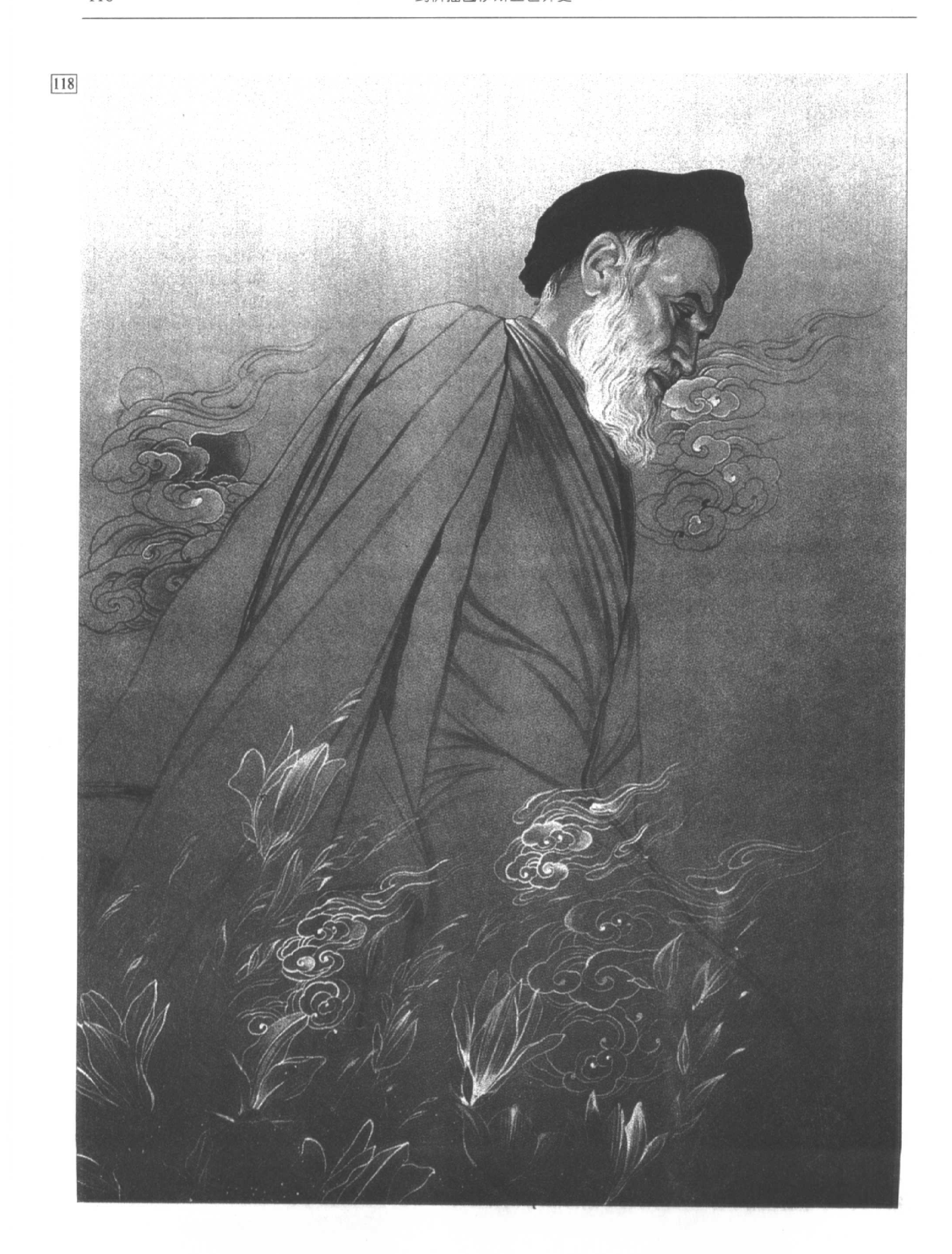
伊朗革命是两种力量的结合体，一方面是反对国王政权的世俗的左翼反对派，另一方面是其宗教学说决定了新伊朗国家的性质的什叶派教职人员。对伊朗国王世俗化政策不断进行抨击的是阿亚图拉霍梅尼（1902～1989年），他长期拒绝许多乌里玛同事们清净无为的立场，他用吸引人的语言谴



责巴列维政权:“所有那些出自那个没受过教育的兵(指礼萨·汗)的头脑的白痴般的语言都是不中用的……只有真主的法……将继续存在并能历久弥新。”1963年他号召伊朗人起义,结果被放逐到伊拉克,但他反对的声音并未止息,借助于录音磁带和电话,在伊朗仍然可以听到他的声音。

对伊朗国王的不满因现代化的亢进而增长。尽管石油收入状况恶化,但经济形势仍促使城市像“雨后春笋般迅速增长”,导致对国王政权幻想完全破灭的伊朗人的数量越来越多。现在一些受西方教育的伊朗人在阿里·沙里亚提博士(1933~1977年)著述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沙里亚提用伊斯兰中心的象征与原则,表达激进的被国王政权公然践踏的社会正义的主题。到1979年,国王逃离伊朗,霍梅尼胜利归来。在这之后,乌里玛因其世俗对手在政治上靠边失势而得以完全控制局面。霍梅尼关于政府的目的是实施真主的法的观点,意味着沙里亚成为国家的法,而且规定了“只有宗教学家一人……掌管政府事务”。公众拥护所阐明的穆斯林行为规范意味着强制妇

118



女戴蒙头巾及贯彻实施其他作为规矩象征的措施。1980~1988年同伊拉克进行的流血战争使全国在政治上联合起来,但因为付出了巨大的人力与物力的代价,也使完成统治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

霍梅尼的去世使伊朗当局能够对外部世界变得较为灵活,但是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抱有类似目标的运动与穆斯林来说,德黑兰政府仍然是巨大的鼓舞。伊朗政府决定支持霍梅尼发出的判处《撒旦的诗篇》的作者死刑的教令,为原则上反对萨尔曼·拉什迪小说的穆斯林提供了指引。尤为特殊的是,为获得受尊崇的政治形象,特别是在动荡的中东政治舞台,它支持伊斯兰主义集团。像真主党这样好斗的组织在黎巴嫩报纸的大字标题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伊朗亦能够利用巴勒斯坦人中世俗主义者与穆斯林活动分子之间的不和。伊斯兰圣战者组织和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是伊朗显而易见的支持对象,从1987年以后巴勒斯坦青年的因提法达(起义)中可以看出伊朗支持的程度。伊朗革命在这里提供实际的与道义上的支持,一如它对远至北美、英国、南斯拉夫、尼日利亚、印度和菲律宾等地的伊斯兰主义者所做过的那样。

119

第118页图:阿亚图拉·霍梅尼领导了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同时也控制着经历了1979年到1989年(霍梅尼去世)革命政权头10年的许多人的思想。这幅由年轻的艺术家穆斯塔法·吉达尔齐创作的图画生动地展现了霍梅尼凌驾于一切世俗力量之上的气势。什叶派伊斯兰有突出的画肖像画的传统,这也被有力地加以利用,以服务于革命的目的。

伊斯兰——当代世界的存在

对穆斯林世界来说,自1800年以来的两个世纪与先前时代有重大断裂。先前作为它的一大特征的庞大帝国此时从地图上消失。先前曾统治过这么多非穆斯林的穆斯林,多半反而发现自己正处于非穆斯林的统治之下。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衰落,穆斯林重新获得相当多的政治上的独立,然而其结果却是一个个单独国家的拼凑物,每个国家都试图在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求得平衡,并取得不同的成就。对有些国家来说,伊斯兰与政治生活难解难分地缠绕在一起。对另一些国家而言,它们的公民,或者也许是其中的某些人,只是碰巧才成为穆斯林的,国家也试图在宗教的问题上保持中立。世袭君主、民主政治、神权政治、专政、军事统治、激进的革命,这一切伊斯兰世界自1800年以来都经历过了。

所以现代穆斯林世界最显著的事情毫无疑问是它的多样性。有关的统计肯定了这一点:今天10亿穆斯林中,只大约有1/4生活在中东。印度尼西亚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穆斯林人口,生活在南亚的穆斯林也多于生活在整个中东的穆斯林;甚至前苏联穆斯林公民数也比中东除土耳其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多。的确,穆斯林现在经常代表着由毗邻而居的不同民族所组成的富丽"镶嵌品"的一种要素。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非殖民化以及移民的模式,欧洲现在拥有很多的穆斯林人口,他们是组成西方社会结构中永久性成分的社团。诸如英国的穆斯林议会、北美伊斯兰协会反映了这些国家穆斯林各群体日益增长的要求,他们由于已经在他们新的家园扎下了根,在诸如伊斯兰教

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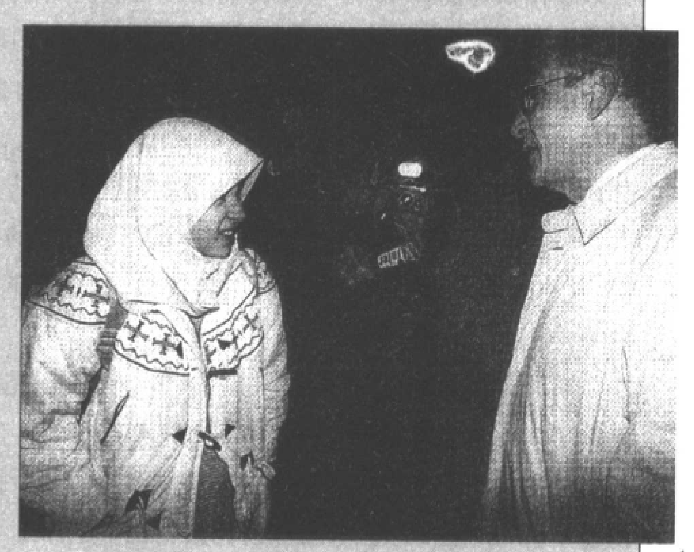
西方的伊斯兰

基督教西方耗费了1000多年的时间，先是试图阻止伊斯兰在欧洲的扩张，继而又试图把穆斯林逐出欧洲，而在19～20世纪，它竟然一直在帮助伊斯兰确立在西方的存在，这是历史的讽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穆斯林前往英国、法国和德国，在缺少劳动力的经济中寻找工作。他们来到美国和加拿大这一渴望吸引世界最优秀人才与专家到自己这边来的社会。只有在巴尔干地区，在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前南斯拉夫各国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存在，才是早先穆斯林征服的结果。巴尔干的这些穆斯林民众大体上是皈依伊斯兰教而成为穆斯林的。事实上，无论伊斯兰教在哪里存在下来，它常常都能从客居社会赢得许多信徒。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美国：自1971年以来，美国的穆斯林人数已经增长了5倍。美国许多黑人把皈依伊斯兰教作为他们重新找回失去了的非洲认同的一种方式，这一信仰的发展与他们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中一个突出的成就是1930年"伊斯兰民族"[①]的建立，伊利贾·穆罕默德（卒于1975年）和马尔科姆·艾克斯（卒于1965年）曾是组织的领袖。目前，在路易斯·法拉汉的领导下，这个组织攻击白人种族主义，寻求黑人的单独发展。

近年来穆斯林在西方立足的地方，他们的存在引发了他们所属社会的一些重要问题。在前南斯拉夫，穆斯林自1972年起被认为是一个单独的民族，1980年代穆斯林政治认同的出现是得以统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政治团结受到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英国和法国，穆斯林要求社会尊重他们的身份，不管是扩大亵渎法适用范围以适用于非基督教的宗教，还是穆斯林女生应获准在学校戴蒙头巾，都是关系到这些社会的价值观及其未来发展走向的重大问题。而且这类事情的重要性不仅仅限于这些社会。穆斯林把西方国家对他们这些信仰同一宗教的人的尊重视为这些国家能否在世界上对他们普遍予以尊重的一种标尺。

西方世界的穆斯林人口统计

国家	穆斯林人数（万）	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欧洲		
阿尔巴尼亚	227.5	70%
比利时	25	2.5%
保加利亚	120	13%
法国	200～350	4.4%～6.1%
德国	170	2.1%
希腊	12	1.2%
意大利	15	0.3%
荷兰	35	2.3%
西班牙	30	0.8%
英国	150	2.7%
前南斯拉夫	450	21.1%
（波斯尼亚）	200	
（科索沃）	200	
（其他地区）	50	
美洲		
阿根廷	37	1.1%
巴西	50	0.3%
加拿大	35	1.3%
圭亚那	13	13%
苏里南	15	30%
美国	600	2.4%



在欧洲，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当信教的穆斯林在某一由国家控制的领域内活动时，在多大程度上许可他们坚持自己的选择。这一问题的一个表现形式是，法国关于穆斯林女生能否在学校戴蒙头巾的一场争论。这是1993年在法国东部楠图阿的艾格萨维尔—比善特高级中学，校长吉恩·德梅斯托禁止该校穆斯林女学生福齐娅·奥乌吉利戴着蒙头巾进校。

① 1975年伊利贾逝世后，该组织更名为"美国穆斯林传教会"——译者。

育等问题上已经变得更加坚定,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国家与社区的互动。

毫不奇怪,在大众对伊斯兰与穆斯林社会的感知方面,中东继续居于主导的地位。除了伊斯兰教在这里产生与发展这一事实之外,阿拉伯语,这一伊斯兰与《古兰经》的语言,作为神圣的礼拜语言,仍保有其在感情上的支撑 121 作用,尽管普遍都能获得使用本国语言的宗教指导。此外,以西方的观点看来,中东是欧洲首先遭遇伊斯兰的地方。中东的石油财富由于似乎是把穆斯林的重心空前稳定地固定在这里,因而不成比例地增加了它的重要性。但是20世纪末泛伊斯兰精神的重新高涨,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的出现(这些组织反映了中东与世界其他地方穆斯林之间变化了的关系),可以比得上对穆斯林的认同与对伊斯兰的信念的重新强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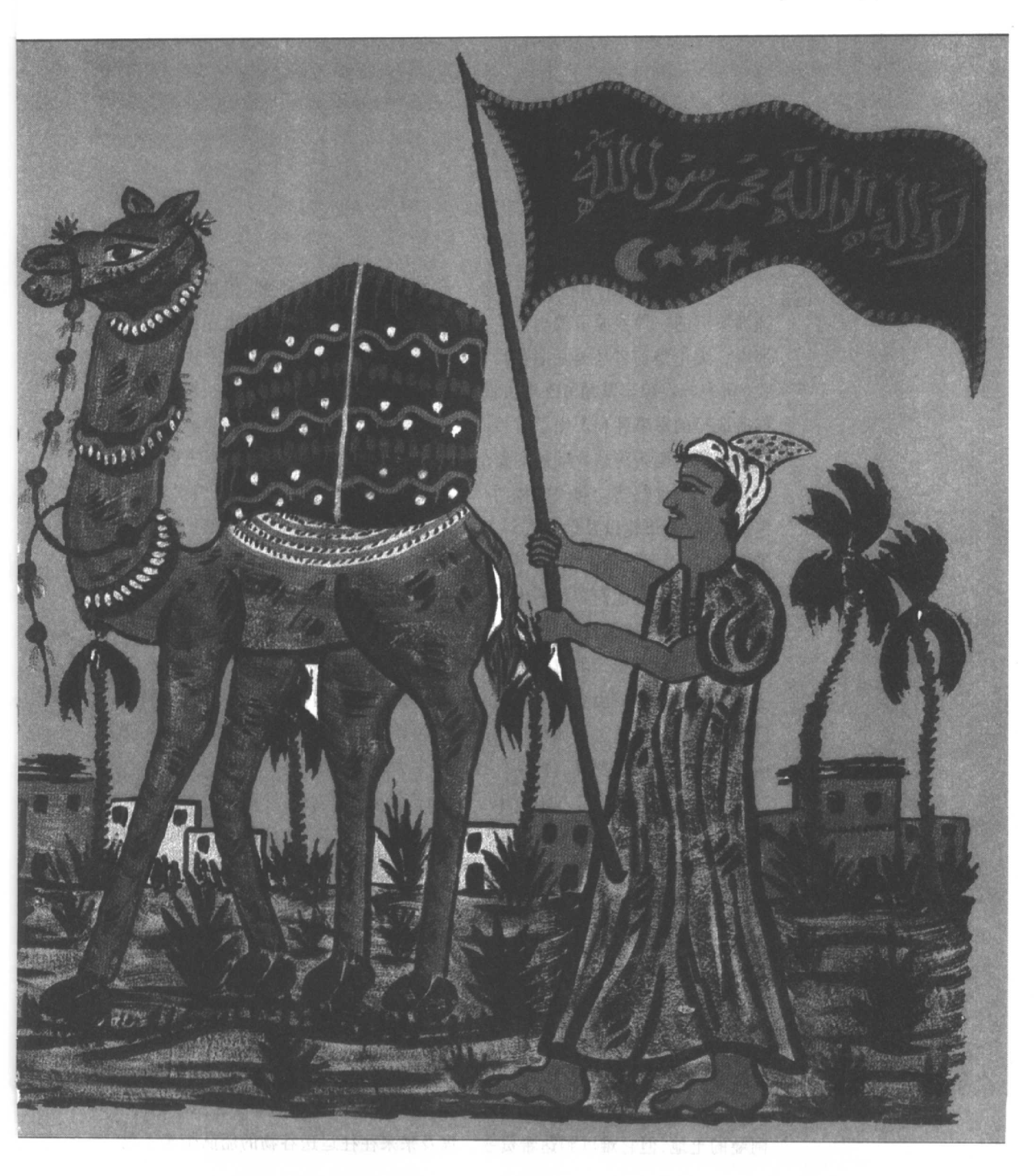
伊斯兰教世界联盟(1962年建立的宗教组织)和伊斯兰会议组织[1969年作为永久性政治组织由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1964~1975年在位)创立]都把总部设在中东的心脏地区。但是它们的成员国恰好环绕着穆斯林世界而延伸开来:伊斯兰会议组织拥有40多个成员国[①],其主要官员来自四面八方,远至马来西亚和塞内加尔。甚至在泛伊斯兰合作派生的意义上说,欧佩克也起一定的作用,70年代中期它的13个成员中有11个是有影响的穆斯林国家,其中包括非阿拉伯的尼日利亚、加蓬和印度尼西亚。与此类似的是,德黑兰当局借助于伊朗的石油资源,也得以建立国际伊斯兰组织,它一直同沙特阿拉伯发起的对应组织直接进行角逐。

然而,尽管表达泛伊斯兰感情已证明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维持稳固的共同阵线一直是十分困难的。即使是在同以色列的关系上,中东的一些政治势力在埃及的倡导下,近些年来愿意考虑采取妥协的解决办法,纯宗教的团结已经难以维持。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指向反西方的伊拉克,这场战争使穆斯林世界进一步分裂成不同的国家,它们分别站在分界线对立的两侧。像最近其他紧张时期所已经表明的那样,海湾危机暴露出穆斯林世界内部依然存在的分歧,尽管显而易见地存在着将穆斯林世界联结在一起的团结。这种差异与联合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情况而产生的巨大痛苦中变得很明显,由于内战使他们的国家分裂,波斯尼亚穆斯林除了万里迢迢撤到像马来西亚这样遥远的穆斯林国家的新家以外,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从文化上看,这两个社会属相隔的两个世界。不过,它们的穆斯林遗产把它们连接了起来。

① 至2003年成员国已增至57个——译者。

这是一幅来自埃及乡村的壁画。在埃及西部和南部地区，村民们请人在自家房屋的外墙上画上这样的图画，以纪念他们的麦加朝觐之行。

第二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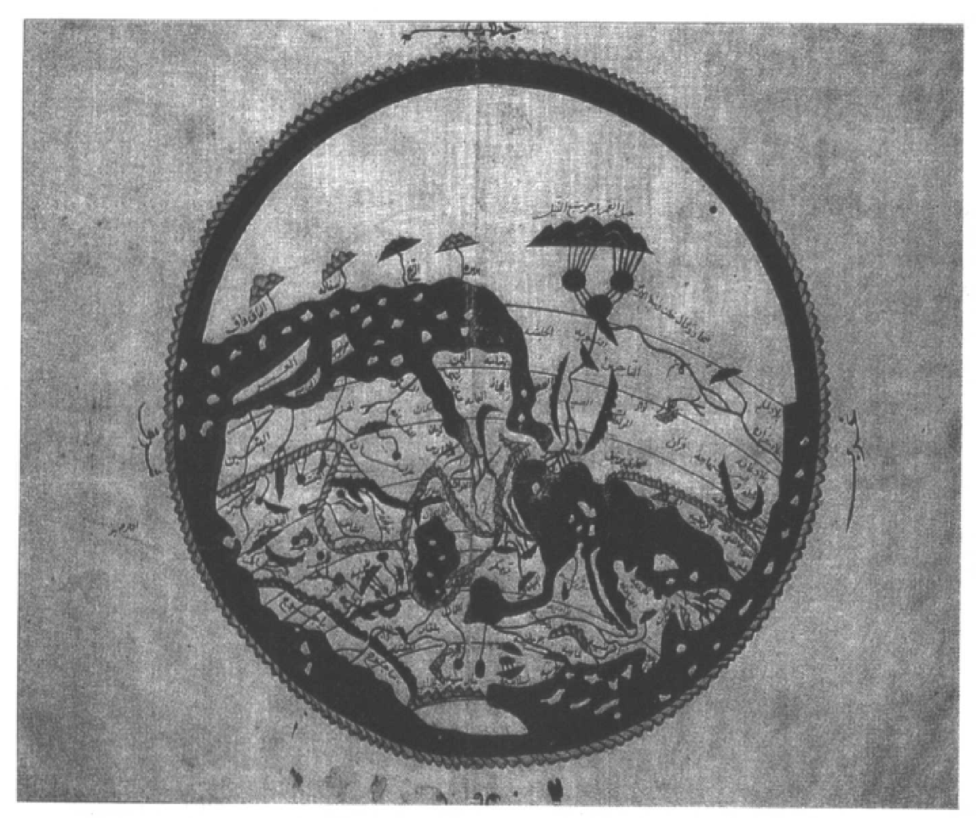


第五章　穆斯林社会的经济

跨洋经济

[124] 在一般人的想像中，伊斯兰是公元7世纪兴起于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绿洲城市的一种沙漠宗教。当然，先知穆罕默德的两个姐妹城市麦加和麦地那中，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实际上都不属于沙漠或是贝都因的游牧生活方式。伍麦叶在穆罕默德632年去世后的10年里，在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和伊朗所取得的军事胜利产生了直接而切实的影响，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经红海与经波斯湾这两条跨越大陆的商路的联为一体。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在伊斯兰第一个世纪建立起来的穆斯林世界体系的经济根基，靠三个因素支撑：定居农业、城市化以及远途贸易。游牧与游牧经济为早期阿拉伯的扩张提供了背景，在伊斯兰城市化的发展中它们并没有被完全边缘化。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没有放弃他们游牧的生活方式；沙漠和骆驼继续预示着伊斯兰的某些方面，而且肯定继续预示着伊斯兰运动的发展脉络。人们如果深思一下8世纪在科尔多瓦根据纯阿拉伯几何学建造的大清真寺恢弘的米哈拉布，必定会了解伊斯兰世界的历史根基在伍麦叶和阿拔斯时期即已十分牢固。不过那些已移居到新老城镇过上城市生活的政治领导人及其阿拉伯的追随者，不久就恢复了古代世界因罗马与波斯的衰落而失去的经济统一。

伊斯兰作为社会与文化结构，它的传播除了靠宗教与精神上的活力之外，还要以独特物质生活为载体，后者通过衣食、建筑、物体和制品而表现出来的。这些物质自然包含在伊斯兰的经济基础结构之中。从对空间的感觉与控制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二者之间的一致性。阿拉伯历史上最著名的航海家艾哈迈德·伊本·马吉德·纳吉迪15世纪下半叶在他的科学论文中写道，红海是世界上所有海中最危险的海，而人们在红海的航行比在地球上任何其他海洋上都要多。按照伊本·马吉德的说法，人们之所以使用红海是由于附近有真主古代的居所，是由于先知的朝觐，也由于希贾兹的居民和每年朝觐[125]商队的信士们需要得到食品与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阿拉伯半岛红海海岸线中部的希贾兹几乎全部是荒芜之地。西南信风将雨和农业的繁荣带给了也门、阿曼的土地，但它难以到达希贾兹。埃及来来往往运送谷物的船队带来了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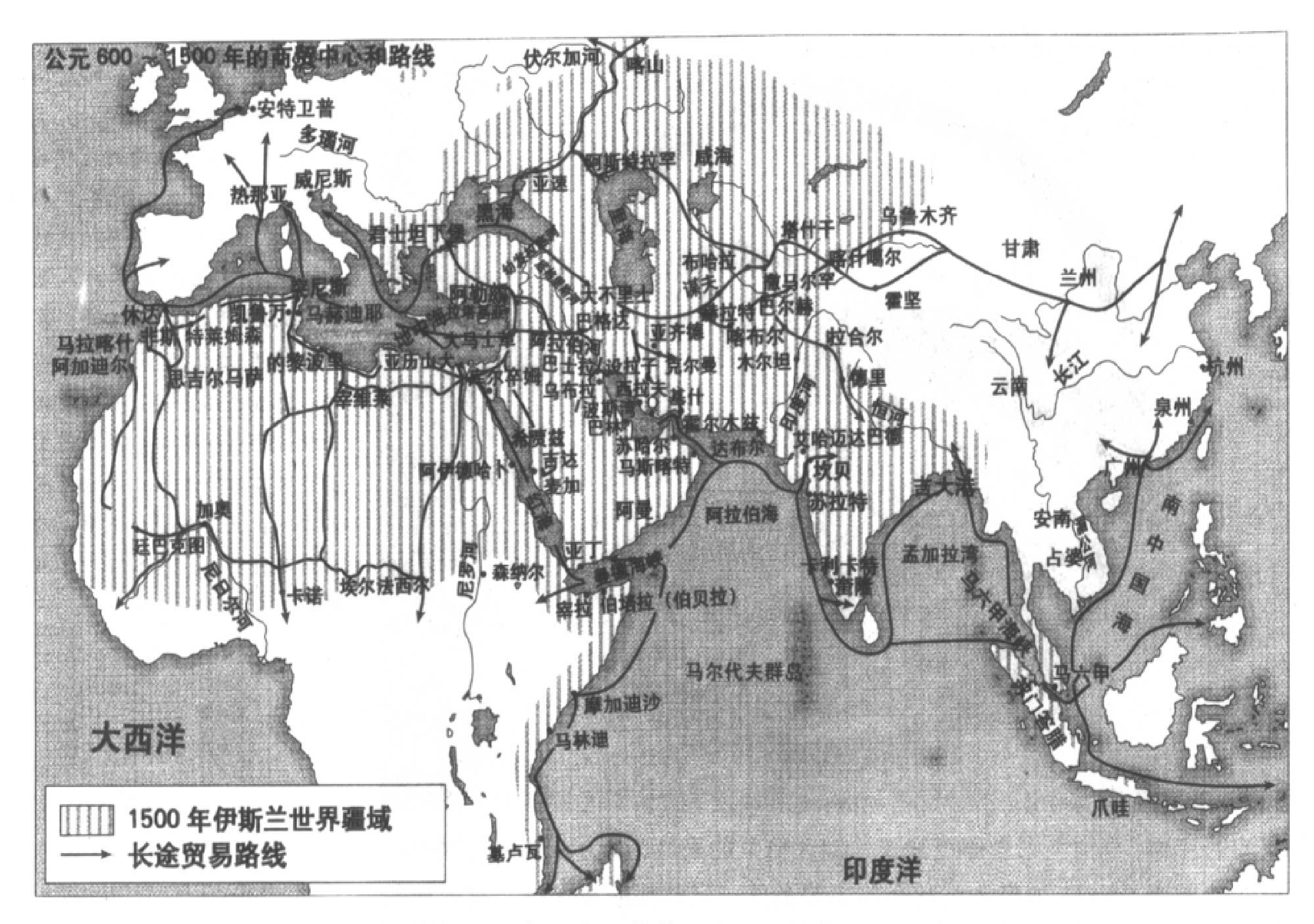
伊斯兰世界体系的辽阔疆域和穿越其中的商贸网促成了作为一个研究主题的地理的出现。阿拉卜·易德里西(1100～1166年)是最早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已知世界的人之一,他出生于休达(摩洛哥),在科尔多瓦接受教育和从事研究。他成年以后绝大多数时间都效力于巴勒莫的西西里国王罗哲尔二世。这幅世界地图来自于他在罗哲尔资助下出版的一本百科全书,这本百科全书的书名是:《罗哲尔书》。①

罗河的礼物,再加上来自印度洋其他地区船只的来往,成为在精神帝国中心创造伊斯兰“奇迹”的经济与社会的必要条件。只要穆斯林保持着对麦加和麦地那的忠诚,朝觐者就不能不从周围四个切点会聚于红海。每年多得惊人的朝觐者的旅行和健康要借助于能够运送数以百计乘客的海船、骆驼商队、商号以及贸易集市。阿拉伯人一直是以掌管沙漠景观见长的。对他们来说,学习如何对海洋空间进行类似的掌管,则是在政治与经济扩张中获得的一门新的技能。

红海的历史重要性无疑是由于它本身的地理、全球的气候(如季风所表明的那样)以及伊斯兰的社会习俗这三者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伊本·马吉德的著作无可争辩地表明,同红海与波斯湾联系在一起的航海与贸易还只是一个大得多的结构中的一部分,这个大结构不仅包括穿行于纳季德沙丘和叙利亚－伊拉克沙漠多石荒地的商队,也包括跨越印度洋与地中海的航行。在历史上,穆斯林世界是一种既是西方的也是东方的文明。它对拜占庭与罗马的地中海经济与社会的吸收,同它对波斯帝国经济与社会的吸收同样地多。巴士拉是阿拉伯半岛之外最早的伊斯兰城市之一,它的建立不仅是通过游牧的扩张,而且还因为它是一个既服务于沙漠放牧草地又服务于美索不达米亚丰饶的沟渠水浇地的港口。 126

阿拉伯对波斯湾、红海和东地中海进行控制,使哈里发得以支配巴林、阿曼以航海为生的人以及埃及科普特造船工的海事技艺。不久一个穆斯林船队出现于地中海,对强大的航海大国拜占庭构成挑战。到674年君士坦丁

① 原文为 Kiab al-Rujari,或可译为《渴望游历世界者的乐趣》——译者。



堡的海上屏障已为阿拉伯所包围，尽管在 1453 年以前，该城成功地抵挡了穆斯林所有的攻击。当大约于 660 年大马士革成为新建立的阿拉伯帝国的首都的时候，存在着明显的有利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经济转移，使巴士拉和伊拉克的其他城市获益。当 762 年阿拔斯哈里发曼苏尔建立巴格达时，波斯湾的贸易得到了更大的促进。到此时，哈里发国家已涵盖了印度的海运省份信德、伊朗的大部分、伊拉克、叙利亚、埃及以及远至大西洋沿岸的摩洛哥的北非地区。穆斯林对安达卢西亚以及伊比利亚大部分地区的征服，使他们靠近了基督教和法兰克人的欧洲，这无论是在社会观念方面还是在技术交流方面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在伍麦叶哈里发国时期，对新征服各省的统治者来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建立统一的土地税制，然后是改革混乱的流通体制与币制。正如 14 世纪摩洛哥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所提醒我们的那样，阿拉伯早期的统治者从不会忘记出自伊朗模范国王阿奴什尔旺（胡斯饶一世，531 ~ 579 年）著名的格言：王室的权力靠军队，军队靠钱，钱来自税，税来自耕耘，耕耘来自公平、官吏以及政治劝告的本领。在穆斯林世界扩大了的市场中，经济生产与消费的增长有可能实现三方面的平行发展。首先，被征服人民的伊斯兰化建立起部分同质的宗教、道德与法律制度。其次，军队与行政机关的阿拉伯化有助于通过招募本地新加入者或通过收编草原军人而打破种族与民族的壁垒。最后，

通过采用阿拉伯语为通讯、教育、文字表达和政府的通用语言，完成了闪米特化过程。对穆斯林征服者来说，对臣民进行语言上的控制是一非同寻常的胜利，即使是对哈里发国中迄今为止文化特性最强的伊朗人来说，情况也是这样。

穆斯林统一在地理与商业上的意义对同时代的作家们来说也是存在的。穆卡达西也许是阿拉伯最有洞察力和最有思想的地理学家，对伊斯兰世界有很丰富的第一手知识，他在公元980年说，太阳向着我们版图的尽头移动，然后进入环绕我们的海洋大西洋。在东方，如同阿拉伯地理学家对印度洋所描写的那样，阿拉伯半岛为"中国海"所包围。他们把地中海称做罗马海。在阿拉伯人的心目中，是中国，而不是印度或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因为穆斯林造船工、水手、航海家、商人和地理学家知道，能够在苏伊士和巴士拉这些登陆码头上岸的同一个海也向远处延伸，远至中国，它为到太平洋提供了海上大道，正如地中海是通往大西洋的大道那样。的确，到巴格达建城的时候，阿拉伯的商人与水手已经有了半个世纪航行到中国和印度的经验。数量可观的阿拉伯与伊朗侨商与中华帝国港口城市广州通商，并侨居在广州。每年不仅是阿拉伯商人，而且还有来自法兰克欧洲的商人，要从苏伊士、吉达和巴士拉向东驶往印度。这种从中国到西欧的跨洋和跨大陆的贸易在古代即已开始了。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城的希腊人已经知道跨越印度洋的海路。穆斯林了解红海航行对船只的毁灭性的风险。长长的不间断的分叉 128 延伸至远海的珊瑚礁阻隔着海岸线。找到穿越这些珊瑚礁和浅滩的安全通道，掌握本地突然刮起暴风和大风的风向，使船只、人员与货物安全地抵达港口，既需要勇敢，也需要有非同寻常的航海技能。波斯湾的风险比航海要小一些，但也有它的危险之处：缺少安全海港；缺乏饮水；通往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两条水道——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河口有大片的沼泽地。商队贸易，不管是从亚丁经陡峭的坡地到也门谷地，还是经叙利亚沙漠抵达地中海港口，都需要精心计划，以确保饮水与食品的供应，和得到游牧部落的支持，这些部落负责保护商队以获得金钱的报偿。尽管有这些风险与困难，这一地区的海上贸易仍然川流不息了2000年，作为海上贸易补充的是，具有同样风险的穿越几乎是无水的沙漠的商队行旅。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多少年以来，文明的伟大产品——丝绸、瓷器、香料、熏香、良种马以及各种精美物品，加上日常生活较普通的必需品——粮食、燃料、木材和食用油，使城镇不仅能够生活，而且还能不受纯地理与纯经济的支配而存在。

各种商品随着商旅队远涉万水千山，中国的瓷器是其中贵重的商品之一。穆斯林陶工受到中国技术和风格的影响。这件9世纪产自伊拉克的碗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中国的影响：低脚、流畅的侧面以及外翻的边缘。上面蓝色装饰图案是阿拉伯单字"祈福"。

18世纪前的海上贸易

罗马自然史学家和地理学普林尼抱怨说,罗马帝国因进口奢侈品,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半岛每年要通过贸易从帝国拿走至少1亿塞斯特斯[①]。他对古代乳香和没药(生长在阿拉伯半岛南部和埃塞俄比亚山区的两种香料)贸易的长篇描述说明,长途贸易中的一个单项物品如何能够在整个帝国的宗教与社会生活中产生不可或缺的作用。熏香是人们所追求的稀缺的商品(在印度和中国举行宗教仪式很少有不烧香的),它支撑着在印度洋和地中海的海上贸易。在7世纪伊斯兰教产生的时候,阿拉伯半岛过境贸易包含有欧洲、亚洲和非洲三个大陆之间贵金属的流动,这种流动是活跃的、一直得到确认的。古莱什部落(即先知所属的部落)骆驼的主人懂得怎样经营既向东方流动也向西方流动的金银。来自西班牙、意大利和北非从事跨越撒哈拉沙漠黄金交易的钱商,在古代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和埃及城市的商店里会聚,同与印度和中国进行交易的钱商做生意。

在伊斯兰教产生以后的几百年中,经过巴士拉、吉达和苏伊士的商业交通因商队之路而发展起来,这个商队之路或许在古代即已存在,尽管像佩特拉、杰拉什这样的古代沙漠商业中心早已成为废墟。货物在红海北端的库尔卒姆从船上卸下来,然后用骆驼运往富斯塔特(古时的开罗)和亚历山大。在[130]波斯湾,深水停泊的海船要么在乌布拉卸货,要么在巴士拉卸货,然后装上河船。尽管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镇吸收了大量来自印度、爪哇、苏门答腊和中国的货物,但是销往地中海市场的货物还要从北边的幼发拉底河由骆驼商继续运往阿勒颇和大马士革。每当商业季节来临,亚历山大和叙利亚的安条克、拉塔基亚、的黎波里、俾布罗斯、西顿、提尔和阿克便挤满了属于希腊、意大利商人的船只和穆斯林北非的船只。但是,阿拉伯半岛加上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是世界体系的核心,这个世界体系是经济的也是精神的。北非与东非,安纳托利亚、印度和中亚的一部分在历史上是重要的,但属于边缘地区,而东南亚的岛屿只是到了15世纪才并入穆斯林世界,即使是在那时候,皈依仍然是不完全的。

尽管地中海贸易已大致被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所瓜分,但是在印度洋,阿拉伯与波斯的船长们迅速确立了自己作为海路商业运输者的地位。布祖尔格·伊本·沙赫瑞亚尔(900~953年)记载了他们在中国南海的海事业绩,他对这些航行的记叙常常是作为奇异的故事来讲述的,显示了7世纪末以来阿拉伯贸易不同寻常的面貌:穆斯林的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驶出红海的曼德海峡,一路驶往中国,两三年后归来之时,带着丝绸、瓷器、玉石及其他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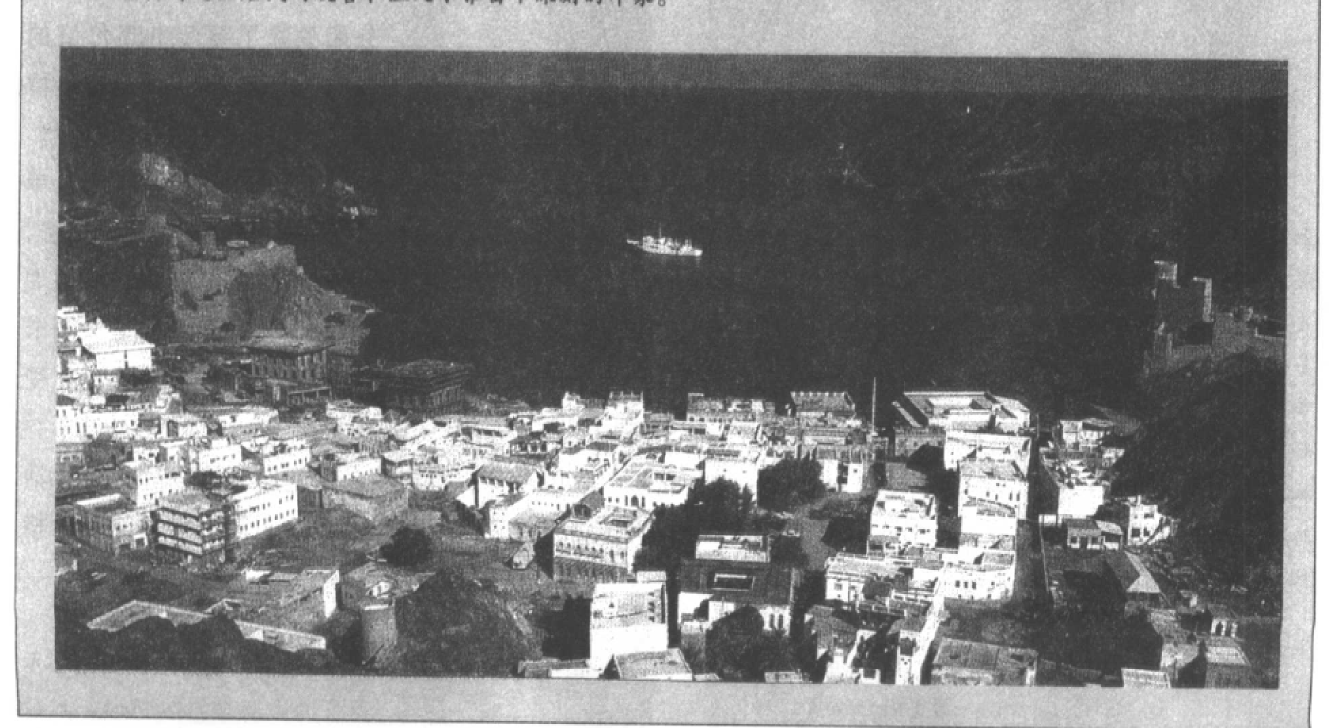
① 古代罗马的货币单位——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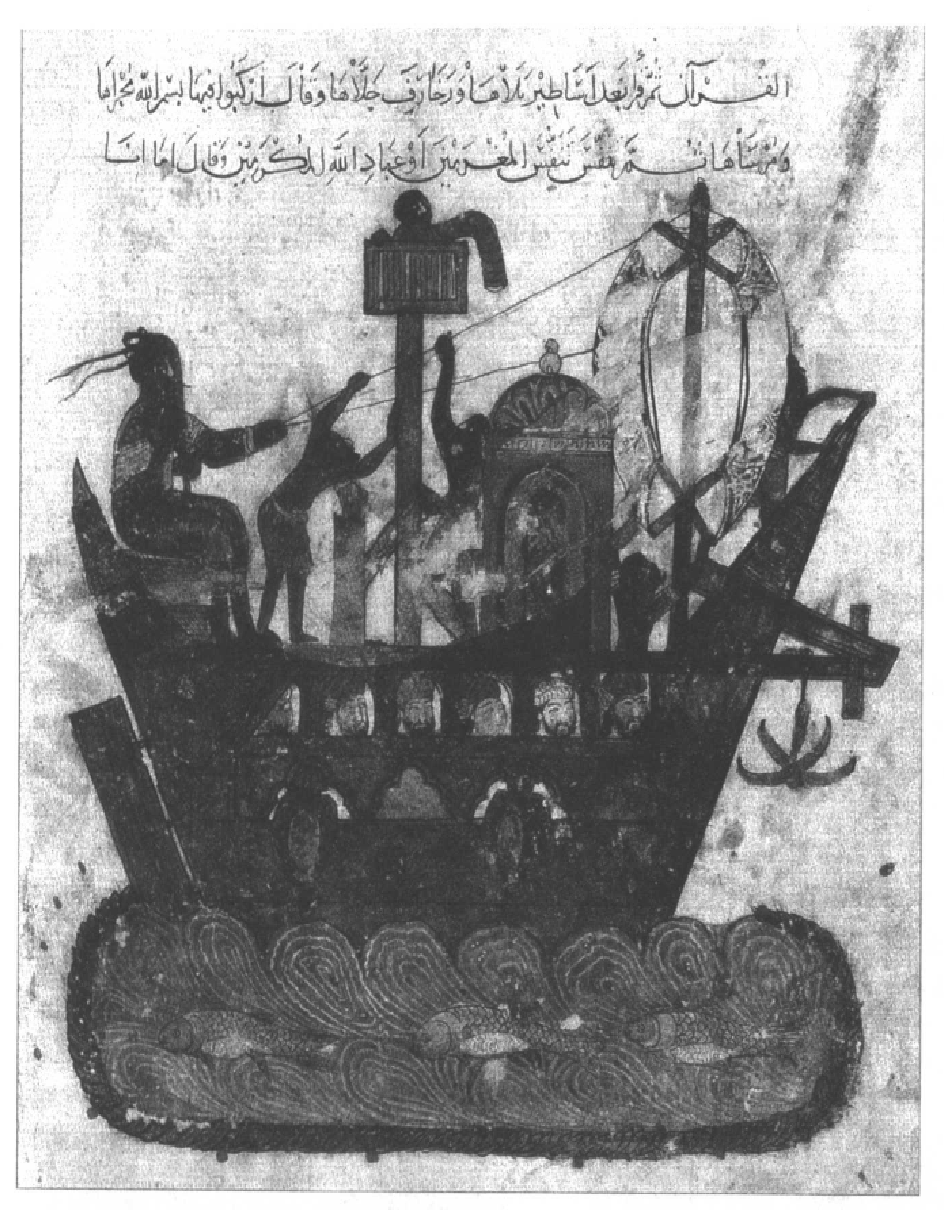
海　港

从伊斯兰教扩张初期开始，海港就在穆斯林经济和文明的生存和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红海的这个吉达港是通向麦加的海上大门，由于麦加朝觐（哈吉，hajj，虔诚的穆斯林从埃及、非洲、印度，以及后来的马来群岛等地区赶往麦加朝觐）而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虽然历经沧桑变幻，吉达依然是朝觐者和商人向往的中心。每年随着埃及、伊朗和印度船只的到达，当地的和外国的商人积极从事着各种商品的大量交易，比如来自达米埃塔的亚麻、古吉拉特的棉纺织品、豪华的伊朗毯，以及其他许多来自非洲、东南亚和欧洲的商品。由于在17世纪中叶阿拉伯军事领袖移居到伊拉克，巴士拉逐渐被建成穆斯林世界第二大重要港口。

首先，巴士拉是一个军事要塞，扼守着进入沙漠商路和贝都因人草场的入口。由于它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河口、紧邻宽阔海域，它很快便吸引了许多同阿曼、也门及印度做生意的商人。在10世纪，巴士拉的船队队长和来自临近的伊朗港口撒拉威的船队队长远航到马六甲海峡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巽他海峡，甚至到达了中国南部口岸。在地中海地区，亚历山大作为一个商贸港口，随着罗马海域和印度海域的扩大和经济联系的增强而复兴。穆斯林海港一般首先而且主要是自然形成的城市，很少有统治者的人为干预。然而，众所周知，国际商人需要一种特殊的保护形式，以确保他们个人的人身安全和货物的安全。这在当时是通过向贸易征收极低的关税、同时在海上运输中实行严格的法律等手段来达成的。这些港口一般由国家高级官员及其下属官员监管，主要管理造船修船、货物仓库以及商品的买卖。这些港口城市有一套复杂而成熟的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一种稳定的通货、银行机构和标准化的称量设备等。

马斯喀特海港是阿拉伯半岛仅次于亚丁的第二大天然优良港口。商人们来往于此地，参加印度洋的贸易商网。1507年被阿尔布克尔克征服和焚烧后，它依然在葡萄牙的统治下持续了150年，至今仍然可以看到葡萄牙人在港口建立的一些炮台，即本图中左边的马拉尼和右边的贾拉尼。来到这个港口游览的游客大多抱怨这里天气炎热，早在15世纪，就曾有一个伊朗人说，这里的空气就像烤箱里的热气，人们可以从海水中捞出烤熟了的鱼。而与此同时，游人们也会对这里居民的友善和温文尔雅留下深刻的印象。





穆斯林世界人们的水上商路从地中海直到中国海。8~16世纪，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控制着印度洋的贸易航线。12世纪哈利里的麦嘎麦[②]的这幅图展示了一艘船从阿曼驶往大港口巴士拉。请注意图中的船员很显然是印度人，而乘客则是阿拉伯人。

贵货物。这些货物在中东市场上有很高的价值，值得他们做如此漫长而又危险的旅行。有一些穆斯林商人在东南亚港口装上远东的货物，以减少风险。大约在916年阿拉伯历史地理学者麦斯欧迪[①]访问了许多濒临印度洋的国家，他记述道，来自西方，来自西拉夫和阿曼的船只，在马来亚群岛称做卡拉赫巴尔的港口与来自远东的船只相会合。他还描述了已在印度洋港口结婚和定居的来自阿曼、西拉夫、巴士拉和巴格达的穆斯林商人。

单纯靠从阿拉伯半岛向中国航行，不仅意味着在季风刮来时要在安全停泊地点延长停靠时间，而且对货物混装和利润空间都有很大的限制。印度洋和地中海的大部分船只除了要装上高价值的精致货物以外，为了使船稳定，还需要装上重的压舱货。随着城市中心的增长，消费水准提高，中东市场经营也变得较为复杂，于是单纯靠航行去中国和通过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回来的这种往返贸易的做法，逐渐为商业中心的贸易方式所代替。富斯塔特、吉达、亚丁、苏哈尔和西拉夫的富商不再直接同广州和杭州做生意，而是在马拉巴尔海岸的奎隆、卡利卡特驻留，或在柔佛、苏门答腊、爪哇和安南驻留。不过他们的跨洋贸易也要受到波斯湾和红海沿岸地区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影响。

[131] 868年和883年，在伊拉克南部阿拉伯河沼泽附近糖料作物种植园干活的非洲奴隶举行武装暴动，使巴士拉的商业交通严重受阻。到10世纪初巴格

① 全名为艾卜·哈桑·阿里·麦斯欧迪，卒于956年——译者。

② 哈利里(1054~1122年)，诗人兼哲学家。“麦嘎麦”是阿拉伯散文的一种形式，见本书第八章第3节——译者。

达和阿拔斯帝国面临社会认同危机，它表现在宗教争端与内部流血冲突的增多。969年北非法蒂玛王朝攻克埃及，并自立为伊斯兰的精神领导。这使阿拔斯哈里发国被进一步削弱。红海商路开始引起印度洋大商人的注意和经济偏爱，这些大商人把亚丁、吉达、艾德哈卜、库尔卒姆、亚历山大和开罗的实力提升到新的水平。他们的权势持续到威尼斯人同埃及经商的时期，直到1498年葡萄牙人来到卡利卡特。但是，波斯湾的主要港口继续服务于商队贸易，后者涵盖了从沿海到特兰索克塞尼亚绿洲城市的广大地区。[132]

仅仅是靠经由红海与波斯湾而实现船运与航海的日益专业化，意味着主要分销中心已从这两个海域外移。而且，无论是巴士拉还是吉达，它们作为港口，有好几个不利条件。众所周知的海上和本地风的时机不允许来自印度洋另一侧的船只在本地区停留太长的时间。没有哪个船长或船主愿意错过季风。当时阿拉伯河航道较为艰难。对大型深海船舶来说，在西拉夫和亚丁卸货比较合适。逐渐地，在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出现了其他一些贸易中心。在西拉夫之后还有基什、霍尔木兹以及阿曼的苏哈尔。巴林在海湾阿拉伯一侧沿海经营地方贸易。亚丁的商业交通得到哈德拉毛的赖苏特、非洲之角的两个港口泽拉和柏培拉，以及从非洲之角往南，诸如沿海的摩加迪沙、基卢瓦、马林迪等港口的支持。

了解天空日月星辰的变幻是穆斯林商人在海洋航行中确定路线能力的关键和核心。他们用来作为指南的一个主要工具是星盘（如图所示）。这一天体平面图是在伊朗萨法维时期由两名来自亚兹德的工匠制造的。前方凸出的挂钩上刻着《古兰经》第36章第38－40节的经文："太阳疾行，至一定所，那是万能的、全知的主所预定的；月亮，我为它预定星宿，直到它再变成像干枯的椰枣枝一样。太阳不得追及月亮，黑夜也不得超越白昼，各在一个轨道上浮游着。"

从10世纪中叶到15世纪，伊斯兰在印度洋和中国南海的贸易被重建为三片，分别以亚丁和霍尔木兹、坎贝和卡利卡特、马六甲和广州为基础。在亚丁和霍尔木兹地区，到10世纪80年代麦格迪西[①]时代，麦加、吉达、苏哈尔和巴林都已是经营一系列货物（既有本地产品，又有进口货物）的大商城；在15世纪，两个大的东方城市——印度的坎贝和东南亚的马六甲的商业活动依赖于亚丁和霍尔木兹商业中心的贸易。红海与波斯湾许多小一些的城镇也同样的繁荣兴盛。船载的货物除椰枣、干鲜果品、皮革、咖啡、霍尔木兹的岩盐以及鱼干等大宗重货以外，还有有乳香、没药、从玫瑰花瓣中提取的香水（玫瑰油）、纯种马、金丝锦缎、丝绸、精美地毯、质地好的剑和防身武器等进口奢侈品。地中海、印度、东非、东南亚和中国等进口货物的地区用它们自己出口收入支付进口这些名贵产品的费用，它们出口的产品有：欧洲的金银、精制的毛制品和金属器皿；东非的黄金、象牙、木材和食品；印度的棉织品、宝石、小麦、大米和糖；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香料群岛[②]的香料、黑胡椒粉、檀、龟甲和黄金；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和樟

① 麦格迪西（约945～990年），阿拔斯王朝旅行家、地理学家，著有《各地知识的最佳分类》（又译《国家知识大全》）——译者。

② 即摩鹿加群岛，因盛产丁香等香料得名，今称马鲁古群岛——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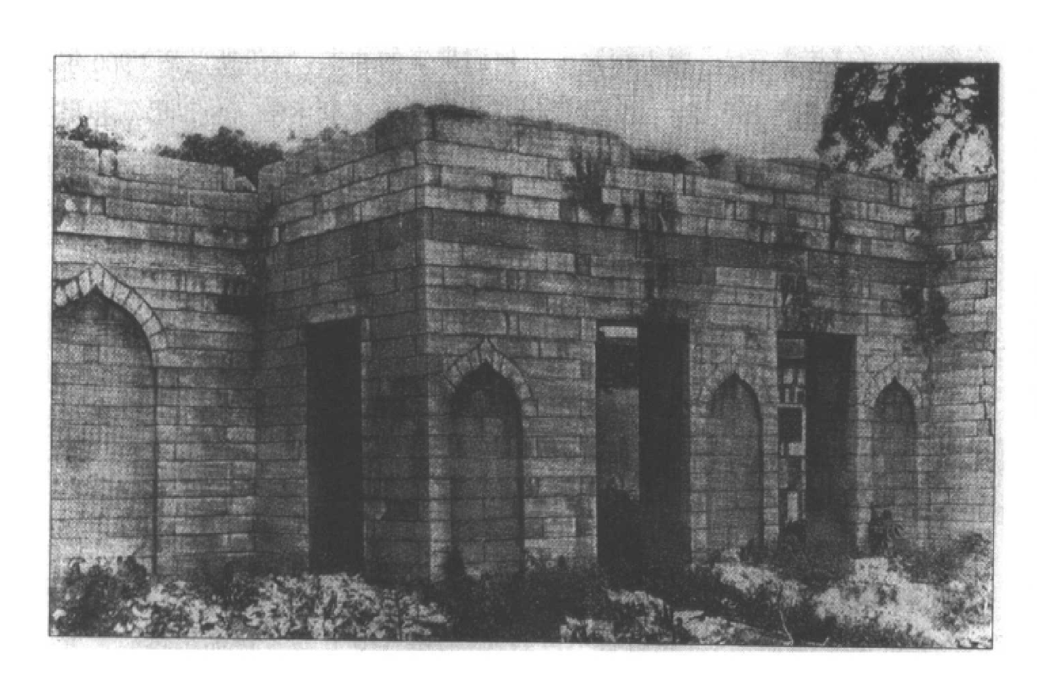
10～11世纪伊朗的狮形熏香器。当时金属制品是穆斯林最重要的财产之一，无论是家用还是出外随身携带，都是如此。因此它们是昂贵的商品，就像香料本身一样。

精美的毛毯也是重要的商品：这一片马穆鲁克毛毯生产于15世纪。15～17世纪，开罗的手工作坊生产效率非常高，它们生产的毛毯不仅向穆斯林世界其他地区出口，还远销到欧洲地区。马穆鲁克时代的毛毯以其几何图形的设计而闻名。

18世纪产自印度的波形花纹剑。波形花纹原是流行于大马士革的一种钢装饰形式。

脑。中东出口数量的构成明显地取决于出口地区内外的经济专业化。埃及的[133]亚麻织工和印度的棉织工向穆斯林市场供应大量精美的和普通的布匹。从15世纪30年代到18世纪30年代印度艾哈迈达巴德丝绸生产者每年都要受托为麦加圣寺的克尔白制造锦缎遮盖物；中东几乎所有丝织中心都为获得这项殊荣而进行竞争。

一批先是从突尼斯移居开罗，而后又移居西印度洋各主要港口的地中海商人所写的商务报告，即大家都知道的开罗吉尼扎(geniza)记录，揭示了海上贸易的范围和它对穆斯林世界城市生活的影响。这些报告和其他资料常常提到一个叫做“卡里姆”的商务协会或商务组织。“卡里姆”到底是什么还不能确定，虽然它也许一直是某种商业护航队。商人们不断遇到印度洋上有组织的海盗团队的抢劫，以及政治当局和占统治地位的精英们的勒索，后者将商人们的财富视作合法侵吞的对象。如果“卡里姆”是一年一度护送对印度进行贸易的护航队，那么加入者会看到他们的政治保护和航行保护比自我保护要好。到14世纪中叶，埃及的“卡里姆”商人已经成为有势力的集团，印度洋的香料贸易大部分掌握在他们手中。埃及阿尤布王朝以及也门的优惠政策使印度洋贸易稳定地流向红海和富斯塔特。13世纪末一位高级文职人员引述一份约为1280年的政策文件时说：“已经颁布了一份文件，愿真主赞扬素丹受到赞扬的命令……他慷慨地欢迎来到他的辖区的人，他们像是来



中国东南海岸泉州的一个清真寺。建于1310年，可能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其建筑风格类似于印度伊斯兰教建筑。在建造这座清真寺时，阿伯和印度穆斯林经由东南亚同中国进行的商贸往来已有500多年。

到了伊甸园……他们来自伊拉克、波斯、小亚、希贾兹、印度与中国。不管来自上述各国的人是何种人，是尊贵的商人、办大事的人，还是小商人……要让他到这个国家来，这个国家的居民既不需要供应食品，也不需要贮藏食品……不管是谁带来了商品，诸如卡里姆商人进口的香料和其他商品，都不会征收不公平的关税，也不会向他们提出任何难以承担的要求。” 134

到1429年，当埃及马穆鲁克素丹白尔斯贝垄断了整个王国的胡椒粉的贸易的时候，在亚洲和欧洲的每一个商业城市——在卡利卡特、坎贝、马六甲和广州，在威尼斯、热那亚、塞维利亚、法兰克福和安特卫普，都知道印度和埃及的统治者从东方的香料中获取了大宗的财富。确实，1433年中国从广州出发的一支庞大的船队抵达也门，并首次要求允许在吉达进行朝觐集市的交易。然而这是中国船队最后一次驶离中国，因为当时明朝为使中国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不鼓励海外贸易。

葡萄牙、英国与荷兰

注意到在地中海和印度洋的香料贸易中可以赢利的人中，有宫廷顾问以及大西洋边缘欧洲的一个小国的舰队司令们。葡萄牙对穆斯林的经济冲击和贸易始于1415年征服摩洛哥商队城市休达。在15世纪其余的时间里，葡萄牙探险者沿着非洲西海岸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直到巴托洛梅乌·迪亚士1487~1488年绕过好望角，瓦斯科·达·伽马于1498年在卡利卡特海港抛锚。葡萄牙船装备着新式武器，架设在舷窗的重炮在船体的任何一侧快速移动，它可以立即开火：由于黑色火药革命被西方用以掌控巨大的海洋空间，这对红海及波斯湾的穆斯林商人产生了致命影响。哈德拉毛现代编年史 135



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①]的画像。在这一年(伊斯兰教历900年,公元1502/1503年),一位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沿海的当代编年史家写道,"法兰克人的船只在海上出现,朝着印度、霍尔木兹和其他地方的方向航行。他们劫掠了7艘船,杀死了那些在船板上的人,还有一些人成为囚犯。这是他们的第一个行动。求真主降祸于他们。"作为葡萄牙主要的航海战略家和印度总督,阿尔布克尔克是这一暴力行动的积极支持者。他在马斯喀特已经投降后还烧毁了这个小镇,而他曾经许诺要宽恕它。马斯喀特美丽的清真寺、陵墓和其他泥石建筑都遭到了毁坏。

作者记录了"法兰克人"海上探险者给他们带来的冲击:"(伊斯兰历)900年(公元1502~1503年)初,他们首先出现于印度的卡利卡特、马拉巴尔和果阿,同年他们也首次出现于阿拉伯半岛沿海希赫尔附近的胡斯恩古拉伯。"

不久,葡萄牙人看到,除非对主要商业中心和主要港口进行控制,否则在跨洋商业的结构下,不能指望垄断香料贸易。为了阻止穆斯林船运业靠近印度,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是尤为重要的。葡萄牙人宣布对阿拉伯半岛的商人进行持久战,到1507年它可以自由出入亚丁湾和阿曼湾,1515年征服了霍尔木兹。他们在印度的海运国家,以新建的首都果阿为基地,通过控制霍尔木兹和对曼德海峡进行年度的海上封锁,实施其垄断政策。

在16世纪期间,情况开始有所改变。在印度的葡萄牙官员和居民发现,与亚洲进行海上贸易有利可图;如果里斯本制订的政策干预了他们自身的贸易,他们就不会严格地遵循这种政策。其次,奥斯曼在苏莱曼大帝统帅下,于1517年征服了埃及,1534年攻克了巴格达,这使土耳其令人望而生畏的军事力量与海军力量得以接近红海与波斯湾。土耳其海军皮利·赖伊斯将军1522年的著名远征,是试图取得对印度洋西部海湾控制的多次尝试的第一次。再次,印度和马来的商人也开始以重炮和有效的作战能力武装自己的船只。坎贝和苏门答腊港口城市亚齐重新开展他们同红海的香料贸易,尽管少不了和葡萄牙人打仗。到该世纪末,不仅胡椒粉和香料再次流向中东而出现在亚历山大和贝鲁特,而且,在印度洋的葡萄牙帝国也要面临日益上升的海上强国英国与荷兰的挑战。

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分别成立与1600年和1602年,其背景是与西班牙及其盟友葡萄牙王国的战争。英、荷两家公司与葡萄牙东印度公司之间活跃的战争具有解除对亚洲的控制,特别是解除对穆斯林通过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控制的作用,尽管与此同时,远比葡萄牙人更有效能地将欧亚跨洋贸易转向了经过好望角的海路。1622年英国与波斯联军占领了霍尔木兹,摧毁了葡萄牙人对海湾长达一世纪之久的控制。由于葡萄牙的舰队在印度洋被荷兰的舰队无情地击败,阿曼的统治者于1649~1650年包围了马斯喀特,迫使葡萄牙的驻军投降。风水又转了回来:现在轮到葡萄牙在马斯喀特的教堂变成清真寺了。

136 印度洋琉西塔尼亚人[②]帝国的衰落,重新推动了中东商业中心贸易的发展,它再次转向了东方,转向印度的苏拉特、爪哇的万丹国,甚至转向广州。从印度港口和苏门答腊与爪哇的穆斯林城市到圣地的朝觐交通恢复了先前的规模。在西边,埃及与希贾兹的粮食贸易继续进行,从意大利、荷兰、英国和德国进口的欧洲货物运到穆哈,然后由国际商人中最有冒险精神的集团——亚

① 卒于1515年,葡属印度总督——译者注。

② 琉西塔尼亚是古罗马的一个省名,相当于现今葡萄牙的大部和西班牙西部的一部分——译者。

美尼亚人将它们分销到印度洋的其他地方。他们在伊斯法罕郊区的新加尔法进行经营，专门从事跨陆地的商队贸易和地方船只的货运。北欧的一些公司也开始主导穆哈和戈姆卜茹恩的海上贸易，这两个地方业已分别取代亚丁和霍尔木兹的商业中心贸易。到1700年，阿拉伯人最终失去了红海与波斯湾的跨洋贸易，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绕过好望角的海路可以把大批亚洲货物运往欧洲。不过中东贸易在从伊朗里海省份进口咖啡、生丝，以及在分销通用西班牙语的美洲国家的白银（从16世纪中叶起，这一贸易已开始东移）等方面找到新的获利的来源。

18世纪是西亚发生巨大经济与政治变革的时期。伊朗萨法维王朝的倾覆，在印度西部、中亚、伊朗、与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接邻区等大部分地方部落、游牧民政治的苏醒，破坏了商队贸易和一般的经济生活。英国与荷兰在西印度洋的海上统治，使穆斯林商人哪怕是在亚洲地区内部贸易中的参与和所占的份额衰减。 137

跨地域贸易

最能说明宗教、城市化、定居农业和游牧生活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的，

在土地贫瘠的西亚和中亚地区，骆驼是道路之王，而在南亚，驮运货物的牲口常常还拉着有轮的小车，其中特别典型的是牛车。这幅18世纪由孟加拉人穆尔希达巴德绘制的图画描绘了这种场景。



还是海上贸易和跨地域贸易之间存在的共生关系。这源于穆斯林世界介于印度洋、地中海和大西洋三个海洋之间的地理位置。从伊斯兰兴起到18世纪，跨地域贸易基于三个因素。首先，经营海上贸易的沿海城市能成为经济消费与生产中心的很少，这些中心一般都在离海岸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因此将港口的货物分销到消费地区需要跨越地域。在有水运的地方，如在印度、伊拉克和埃及，大的河流是首要的运输线，公路居于第二位。但是对伊斯兰其他大多数地区而言，没有多少选择，只能靠陆路运输货物。其次，供应精美货物和低价值大宗货物的生产中心散见于内地。纺织品、陶器和贵金属，以及大量的原料，需要远距离（从中国的长城到君士坦丁堡）的运输。例如，也门拉达境内的阿玛尔亚清真寺和经堂有一些在北古吉拉特[①]雕刻的石柱，它们是作为压舱货物出口到亚丁，然后用骆驼和骡子经山隘运输至清真寺的。第三个因素是轮式车辆的弃用。在罗马时代末期，轮式车辆在近东和中东实际上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驮畜，主要是骆驼，但也有骡子、驴和牛。骆驼是既有效率又划算的驮运工具。可能是用骆驼商队进行长途陆路运输的经济考虑，加上维护适宜轮式车辆运输的道路要有所花费，导致了马车和运货车辆的让位，这些车辆曾一度主导着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技术。

骆驼是穆斯林世界许多地区一道常见的风景，因此它们也是艺术作品的主题之一，就像这只产自莫卧儿伊朗的盘子所展现的一样。纺织品、陶器和贵重的金属制品需要远距离的运输。同样，谷物、食品和主要的原材料（如原木、石块、用于房顶的瓦片、铁、铅、锡和铜、各种晒制干品、靛蓝染料和红杉、兽皮和毛皮，等等）都需要从各个分散的内陆生产中心地区收集到一起。

至少有一位旅行者提到贫瘠的山峦、荒凉的石路和驮畜默默前行的沉闷景象，与草盛水丰、车辆众多的景象明显不同。1677年在印度西海岸苏拉特英国工厂当医生的约翰·弗瑞尔访问了波斯。他坐船到戈姆卜茹恩，然后沿着古老的商队道路，穿过沙漠到达伊斯法罕。回到印度，他被邀请访问距离苏拉特约50英里的一位生病的同事。走的是公路，是骑马去的，不过有马车随行。伊朗沙漠景象与西古吉拉特繁忙的农业与工业景象的对照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港口到内地市场、城镇与乡村的公路运输在两地都存在。但是弗瑞尔说，在伊朗的公路上没有大车、四轮马车或运货马车。在印度这里，牛与骆驼的商队拥塞于途。8匹、12匹和12匹一组的小牛套上轭，拉着货物装得很高的重车。在伊朗，商队的商人面临的主要危险来自藏匿于山隘的强盗；在印度，则是一帮隶属于地方诸侯，乃至隶属于中央政府的非正规骑兵出没于公路。

138

从17世纪起，欧洲对穆斯林世界商队之路的描述增多。如果将这些叙述与早年穆斯林作家（如伊本·朱拜尔，写于1183~1185年；伊本·白图泰，卒于1368/1369年）的叙述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商队贸易是伊斯兰文明化与城市化生活不可缺少的附属品。政府当局以及富有的个人都在经常路过的商道沿途修建公路、商队客店、蓄水池、有顶棚的市场，栽种树木。而且，商队有数

① 古吉拉特邦位于印度西部——译者。

以千计的驮畜，有货主，还有安全旅行的普通人，商队需要沿途居民有组织的服务。沙漠和草原游牧社区为旅客提供食品，为牲畜提供饲料，首要的是提供不受抢劫的安全保障，他们反过来也需要商队携带的某些货物。

穆斯林的四个主要城市起着中东、非洲、印度和中亚跨地域贸易中心的作用，它们是：麦加、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开罗。在土耳其 1453 年征服君士坦丁堡以后，还要把它也包括在内，君士坦丁堡一直是以基辅、撒马尔罕以及亚洲绿洲城市喀什噶尔、吐鲁番和乌鲁木齐为起点的北路的终点。当然除了这 4 个大都市以外还有其他一些著名的商队城市。地处穆斯林世界边缘的北非存在过一些商队城市，它们从伍麦叶和阿拔斯时代起一直吸引阿拉伯移民，并且见证了当地柏柏尔部落的皈依。一直在沙漠中寻找避难所的哈瓦利吉反对派，757 年在西撒哈拉的边缘建立了西吉勒马赛[①]。在马格里布的中部，在鲁斯塔米茨王朝统治下，大约在 776 年塔赫特的声名鹊起，鲁斯塔米茨王朝统治者是从伊朗移入的。在 9 世纪和 10 世纪塔赫特、扎维拉和西吉勒马赛是在撒哈拉组成大三角商队贸易的 3 个端点，它们接待来自巴士拉、库法和呼罗珊的商人。正如编年史家伊本·萨格希尔所写的那样，穆斯林和犹太人都认为在塔赫特有利可图，也都跟它做生意，原因是它较富，宗教领袖对臣民的所作所为值得称赞，再有就是生命和财产都较安全。结果，通往苏丹以及所有撒哈拉以东和撒哈拉以西国家的道路都忙于交换各种货物。来自非洲大沙漠以外地区的黄金与奴隶在非斯、特莱姆森、凯鲁万、的黎波里的市场进行交易。一些比较长的商队道路将亚历山大市场与同苏丹进行贸易 [139] 的城镇连接起来。的黎波里、马赫迪耶、凯鲁万、特莱姆森、休达和非斯全都是穆斯林古典城市传统的一部分，它们的经济生活大部分要依赖于非洲不同经验的结合。队商将印度洋马尔代夫岛的纺织品、珍贵贝壳，印度坎贝的玻璃念珠，以及青铜物品，带回到今加纳境内的奥达胡斯特以及尼日尔的城镇。这些物品从史前时期起即散布于印度洋至非洲大西洋沿岸，这表明跨地域商队贸易具有海路贸易可能并不具备的稳定性。

组织朝觐

沿地中海南岸行进并从乍得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北非各商队之路，会聚于兼营基督教贸易与穆斯林贸易的两大枢纽——亚历山大和开罗。开罗和大马士革、巴格达一起分享一年组织三次赴麦加朝觐的商队旅行的殊荣。访问麦加并在克尔白绕行做功是每个穆斯林均须虔诚履行的义务。如此众多的人员活动，无论是对队商来说，还是对游牧部落来说，都是十分有利可图的；

① 西撒哈拉古代商队的终点站，已成为废墟——译者。

140



但是人们对早期穆斯林时代来自大马士革和开罗的朝觐队商知之甚少。文件有较清楚记载的是一条始自阿拔斯朝巴格达的道路，即以第五位哈里发哈伦·拉希德(786~809年在位)妻子之名命名的"祖白达大道"。这条道路延伸近900英里，穿越伊拉克沙漠，跨过内夫得沙漠，最后抵达麦地那和麦加。每隔15英里左右，或每距离一天的路程，都会有人工修建的蓄水池、商队客店和饮食店。沙漠时断时续的降雨可使草得以生长，使游牧经济得以繁荣。如果加以控制，还可向经过干旱地带的旅行者持续供应存水。这是"祖白达大道"的水利技师应用已有1500多年历史的技术才得以实现的。

"祖白达大道"可能主要是在哈伦·拉希德之前的马赫迪统治时期修建的。根据历史学家塔百里[1]的说法，马赫迪下令对从卡迪西亚至祖巴拉的延长线做重大改进，在每一站都要提供蓄水池和水井。哈伦·拉希德和祖白达都曾步行朝觐，他们肯定已经知道库法-麦加道路的实际情况。根据历史学家亚库比的说法，祖白达以伊斯兰的名义倡导和促进实施了一些公共工程，她想超过她那著名的丈夫无论是在重大的事情上还是在琐细的事情上所取得的业绩。对祖白达虔诚的沙漠道路工程贡献最突出的是伊本·朱拜尔[2]，他于1184年参加了巴格达的商队。随着朝觐越来越靠近重要站点萨拉比亚的蓄水池，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干渴难忍的朝觐者为得到水而拼命地搏斗，混乱中有7个人被挤死。

第138页图：每年聚集起来前往麦加的朝觐车队是一道伟大的风景，而且也是前现代的穆斯林世界里一次伟大的经历和体验。这些朝觐车队可能由一支乐队带领前行，就像这幅来自哈利里的麦嘎麦的图画所表明的那样。朝觐者的数量非常庞大。"在广袤的平原上你可以看到一群群怪异和痛苦的人聚集到一起，"伊本·朱拜尔这样描述1184年的朝觐状况，"那些没有亲眼见到这一伊拉克队伍的人错过了这个世界上的奇迹之一。"

参加像朝觐这种既定的、每年都要进行的活动的人数非常之多。16世纪下半叶，一个伴随开罗至麦加朝觐商队而行的英国商人估计，总数大约有20万人。很明显，如此大规模的集结需要大量的组织工作，不仅要穿过沙漠供应食品和水，而且要在旅行者当中维护法律与秩序。每年三次朝觐商队都要由高级军官和大批的军队作前导。那位英国商人所属的商队也随队带了6门炮，以便用于回击游牧者袭击和庆祝安全进入麦加。商队一旦进入真正的沙漠，部落头领便作为保护者予以接管，贝都因随之来到队商驻扎的站点，讨价还价，用他们的畜产品交换纺织品及其他进口产品。

141

跨大陆商队贸易

为中东朝觐商队供应必需品的商人和交易者也经营赴印度、中亚和中国的跨大陆的贸易。商队向本地市场供应来自印度、波斯湾和红海主要海港的海上运输货物，也分销这些货物。与此类似的是，一些大的沙漠城市，像伊

① 塔百里(839~923年)，伊斯兰教历史学家，生于波斯塔百里斯坦，著有《古兰经注释全解》、《历代先知和帝王史》——译者。

② 伊本·朱拜尔(1145~1217年)，安达卢西亚穆斯林旅行家、历史学家，著有《伊本·朱拜尔游记》(又译《朝觐途记》)——译者。

朗的伊斯法罕、亚兹德和克尔曼,跨奥克萨尼亚草原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都与印度城镇进行跨地域的贸易。早期穆斯林的资料提到,信德的戴布尔和拉哈瑞、西旁遮普的木尔坦是穆斯林跨地域商人要去的最重要的地方。这些城市以出口粗细棉纺织品见长,木尔坦也经营大量的金融与银行业务,是汇票市场,也是自中亚进口的贵金属的市场。后来加入这一行列的还有伊斯兰印度的3个特大型城市:拉合尔、德里和阿格拉。

土库曼、乌兹别克和中国的商人每年都要来到印度市场,他们带着精美瓷器、中国锦缎、玉器、高级纸张等奢侈品,特别是纯种马。在土耳其素丹统治的700年中,以大量骑兵为基础的土耳其游牧战争模式引入印度,莫卧儿时期也需要战马。中亚牲畜饲养者供应的牲畜强健,足以承载穿盔带甲的人,而伊朗马和阿拉伯马则用于骑术表演和显示威严。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上,中东和印度一直能够进口中国和中亚的货物,这证明,单是距离并不会妨碍此类交易的良好组织和赢利。穿越戈壁沙漠或伊朗的盐碱沙漠需要使用特殊的驮运牲畜,商队主人也要规定行进纪律。在戈壁路上和喜马拉雅山脉关隘役使的中亚双峰驼耐劳,且易于驾驭,这对于能够较顺利地两年打一个来回的旅行来说,是很必要的。比距离问题更令人烦恼的是保护跨地域商人的问题。

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非洲,跨大陆的商队之路都有中央集权政府未能进行有效控制的地段,或者要穿过部落放牧的地段:进行抢劫和大规模有组织的袭击的可能性是一种真正的危险。在边远地区,过夜旅馆(人们有不同的称呼:khans, sarais, wakelahs)盖得像是堡垒,有高墙和设防工事。大门也许会关闭,以保护旅客,防止小偷盗窃他们的财物。工事坚固,足以抵挡游牧劫掠者的突然袭击。经常清除有组织的强盗可对路上的商队提供某种保护,货主也会雇佣当兵的保护他们。在莫卧儿帝国,一支有200辆车的商队一般为每辆运载贵重货物的货车配备两个兵。中央政府也经常动用机动骑兵征服有时受到地方头领保护的歹徒和强盗。17世纪70年代一位叫吉恩-巴普梯斯特·塔维尔尼尔的法国珠宝商从苏拉特到阿格拉旅行,看见莫卧儿在一次成功的搜捕之后,将几个被抓住的强盗乃至地方头领弄到城墙上示众。这种严厉执法的情况既表明莫卧儿帝国能够保护它的臣民,也表明它支持让商人平安通过公共道路这一伊斯兰的、确实已经普遍通行的原则。

[142]

伊斯兰世界的都市生活

后来的阿拉伯历史学家注意到,在伊斯兰确立之后持续存在着一个矛盾现象:贝都因一方面分散地存在,另一方面又在融入定居的社会。伍麦叶王朝和早期的哈里发们率领他们的部落追随者进入大马士革和亚历山大之后,仍然保持着对闲散的沙漠生活方式的眷恋,尽管同时也对城市文明的舒适与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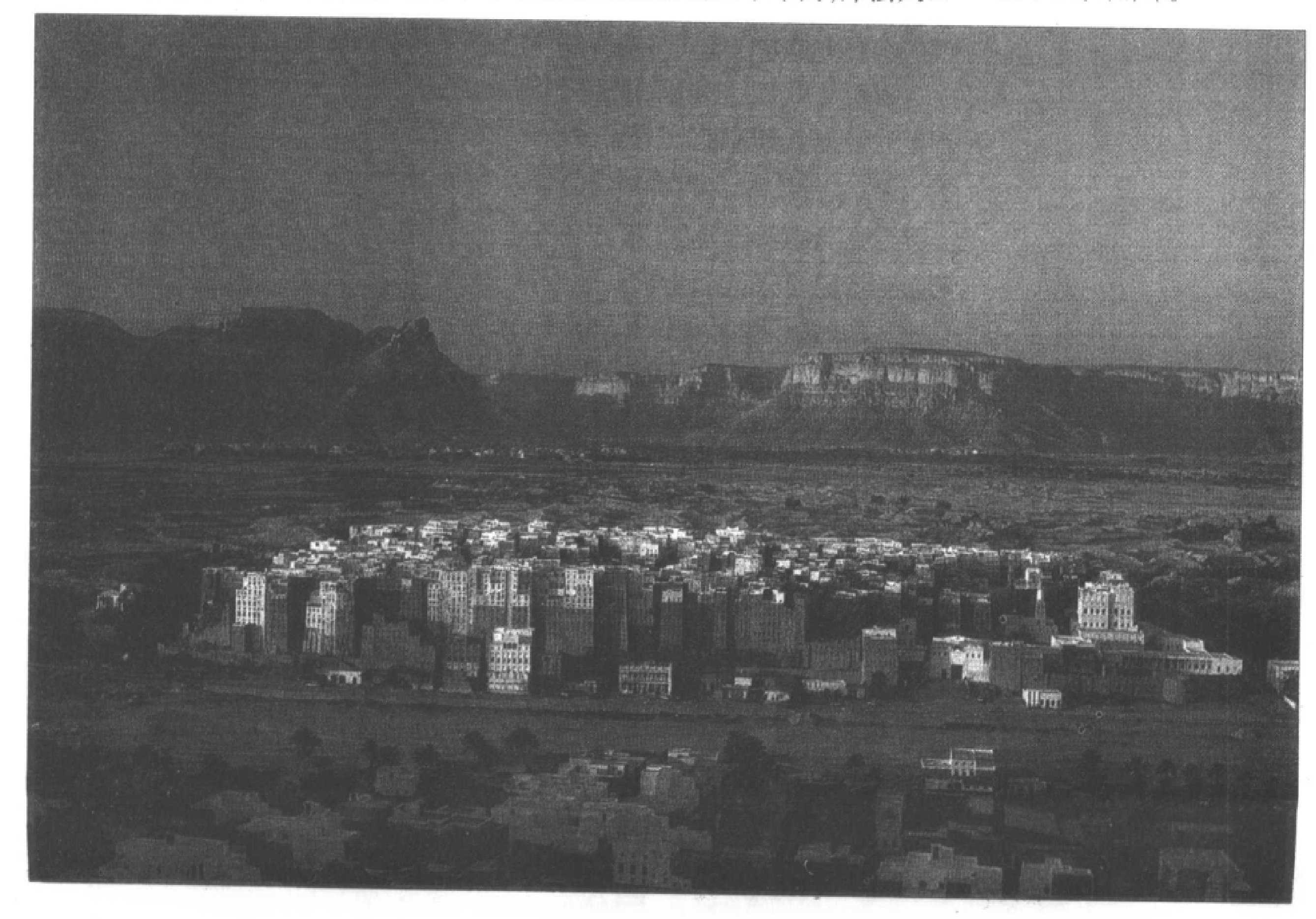
值表现出明显的偏好。阿拉伯新来者们由于对游牧出身的记忆逐渐淡化，对城市奢华的尝试日多，在炫耀消费和展示个人财富的其他举动上会超过皈依的穆斯林。到叙利亚地理学家穆卡达西描述伊斯兰城市时(980年)，受过教育的穆斯林几乎都已忘掉游牧继续存在的现实，他们将贝都因视为与伊斯兰历史的真实意义相悖的因素。认为游牧民对定居人口发动的袭击与他们在军事上所取得的胜利，与毁灭同义。伊本·赫勒敦的看法是这类观点的最极端代表，他宣称，从11世纪到14世纪，不管沙漠阿拉伯人在哪里定居，繁荣的穆斯林城市都要变成废墟。

伊斯兰文明作为一种宗教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仍然集中于城市，然而城市只有吸收农村地区的剩余产品才能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职能。食品、工业原料和燃料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运到城里来的。但是由于城市生产和销售工业制成品，这就使城镇市场成为远来的商贾和来自穷乡僻壤的农民和游牧民天然的汇聚地。游牧对伊斯兰城市经济的贡献就数量来说也许是小的，但就它是负重牲畜的惟一来源来说，它又是必不可少的。

当代历史学家们指出，许多伊斯兰重要城市(库法、巴士拉和开罗)都是在临时的军事要塞里找到其发端的。这些早期定居者的目的是想将阿拉伯部落武士与被征服地界的土著居民分隔开，让这些外驻队伍在万一突然发生任何暴动时能够处于警戒状态。在伊拉克被征服后的几十年间，库法人口

143

希巴姆是也门哈德拉毛干河一个古老的有城墙围绕的城市。这条干河是一个位于1000英尺深峡谷中的开阔的沙砾平原；按照一个旅游者的说法，它是“天堂中一个被遗忘的部分，在等待着末日审判”。出于防御的目的，希巴姆的高楼都紧紧地聚集在一起，而没有窗户的低矮房屋则构成了这个城市的外部屏障。



已增至10万人，而巴士拉人口则几乎是这个数的一倍。这两个处于沙漠与水系边缘的全新城市的迅速增长，凸显了这样的事实：尽管阿拉伯人公开承认他们更喜欢不设防的国家，但他们对城市生活并不生疏。无论是麦加还是麦地那，在伊斯兰教产生前都是重要的城市中心，而且古代穿过也门和希贾兹高原的商队之路的存在暗示着有一长串类似的城镇，它们成为穆斯林国家重要的宗教与经济中心。拉达、吉布拉、萨那、图拉和希巴姆横跨在从亚丁到塔伊夫、麦加和麦地那的商路上，然后到达纳季德西部锡尔汉谷地的绿洲城镇，与通往地中海东部港口的干道相接。

穆斯林城市依其经济专业化、文化教育作用与行政职能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根据穆卡达西的分类，巴格达、开罗和大马士革等首都城市可比作王室一级；省城属大臣一级；普通城市和村庄分别为骑兵和步兵一级。法理学家、语言学家和一般人对阿拉伯语中“都会”的解释是不同的。对伊斯兰城市所下的法律与宗教上的定义是，它是一个有大量居民，有法庭，有政治官员的地方，而且它有足以能够支付其内部开支的收入。所使用的语言是区分两个地区城市（如巴士拉、拉卡和阿拉兼）的界点。但是公众使用都会这个词是指任一重要的大城市。穆盖达西小心翼翼地保留他自己的定义：穆斯林世界的首府城市须有最高统治者的住处、国家各部门的处所和授予地方长官的封地。如果将他的分类与他对所访问的城镇的其他描写加以比较，便可清楚地看出，他的理论并不是纯粹的凭空创造，而是来源于实际的经验。

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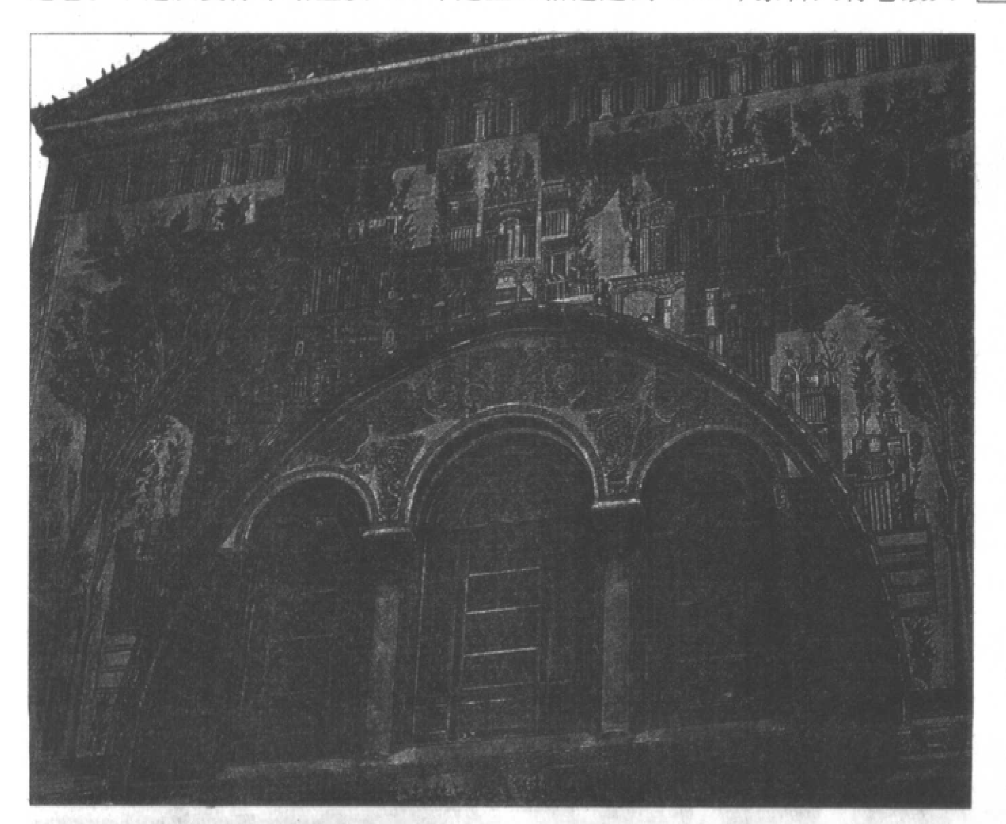
穆斯林历史上的城市化有两个明显特征。第一，伊斯兰的宗教与文化表现最后都集中于城市，尽管农民与贝都因都公开表示信仰与城里人一样的宗教。第二，与西欧、印度和中国的城市相比，社会构成呈现非同寻常的多样性与异质性。确实，驻军定居者从各不相同的方向扩展到城镇，其中不仅有属于阿拉伯不同的部落民的部分，也有属于基督教徒、犹太人、突厥人、波斯人和印度人的部分。这种分隔有经济上、社会上和政治上的效果。大马士革、开罗和巴格达这三大城市的历史经验便是例证。大马士革是一个古老的阿拉米语[①]城市，后来变成希腊的拓居地，当穆斯林在早期扩张阶段征服它的时候，它是一个拜占庭的城市。它被理想地建立在叙利亚西部沙漠与肥沃的山谷之间，吸引着紧靠内地的绿洲的居住者，北部与西部较高的谷地的居民，以及移人的游牧民，后者原来呆的地方远至与幼发拉底河和阿拉伯半岛中部相邻的沙漠。按照稍后时期的传统，伊斯兰教产生前麦加的商队主人要定期访问大马士革，在拜占庭时代，大马士革已具有广泛的经济影响。伊斯兰征服者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在基督教堂占优势的城市里找一个穆斯林信徒礼拜的地方。据说在瓦利德哈里发统治时期开始建设大清真寺（709～715年），它不仅耗去该省7年的全部税收，而且加进了一些配套的项目（沟渠、有顶棚的市场和新的

① 阿拉米语是古代西亚通用的语言——译者。

郊区）。尽管749～750年阿拔斯革命及随后巴格达被建为阿拔斯哈里发的首都，大马士革失去了它的首要的政治作用，但它仍然是研习伊斯兰的文化中心，而且发展成为很可观的工业城市，能生产精美锦缎、薄细棉布、著名的镶嵌波形花纹的剑与盔甲等。具有拜占庭风格镶嵌图案、拥有庞大柱廊的祈祷大厅，会和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一起，向所有雄心勃勃的穆斯林统治者发出这样的信号：这里有实施政治控制所必需的某些城市的象征。 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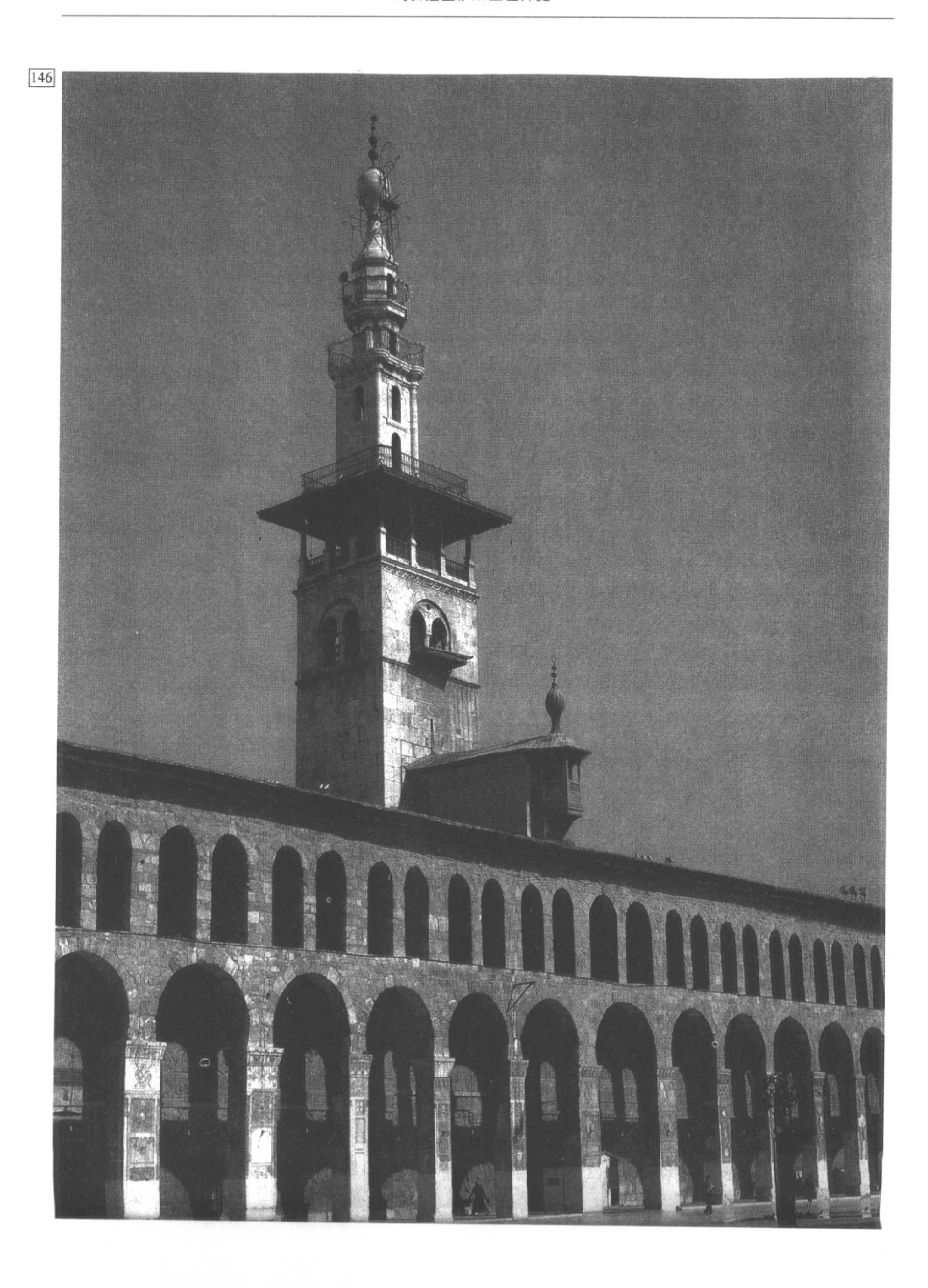
开罗缺少这样的象征设施，不过从10世纪起它在穆斯林世界的影响要比任何其他重要城市都要大。641年阿拉伯入侵者在阿穆尔统率下在科普梯克城附近建立了军营。该城即大家都知道的富斯塔特，它控制着到北非各城镇的道路，也是沿红海出发抵达苏伊士港和阿伊德哈卜港的商队之路的起点。开罗真正扩大是在10世纪末突尼斯的法蒂玛王朝在埃及建立其统治的时候。毗邻富斯塔特的新城噶西尔的建设，爱资哈尔清真寺及与此相关联的经文学校的建设，是改变中东力量均势的两个标志，后者已成为有影响的经文教育中心。跨洋贸易逐渐从波斯湾转到红海，给开罗和亚历山大都带来了繁荣，这在为商旅建造的奢华住房上得到了反映。开罗港口区布拉克在14世纪初商业高峰期曾有几百家代理市场。虽经疫病流行、火灾和军事灾难，开罗的人口仍然很多，直到14世纪30年代疫病的大范围流行，人口才急剧减少。

尽管巴格达素有“和平之城”的称号，但这些不期而至的灾难并没有放过它。不过从曼苏尔哈里发766年建立巴格达起到1258年蒙古人将它毁灭 147



大马士革大寺的镶嵌图案描绘的是各种建筑物和田园诗歌般的风光；本图是中心门廊上面的镶嵌图案。现在还不知道这些图案的目的是什么——或许代表天国，或许代表伊斯兰对世界的统治。无论其目的是什么，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公元8世纪的城市图景。

146



时止，在这将近500年的时间里，这个著名的圆形城市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都是伊斯兰精神与物质中心的标志。巴格达作为经济、文化与政治首都，所面临的惟一挑战来自穆尔台绥姆哈里发836年在巴格达以北建立的萨迈拉，当时的穆尔台绥姆哈里发因对突厥雇佣兵在巴格达街道持续不断地制造骚乱感到厌烦，才在萨迈拉建立新首都的。然而萨迈拉作为首都的作用只延续到889年，在这之后行政部门又迁回巴格达。阿拔斯哈里发的权力是与巴格达的文化与经济声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有众多的清真寺与宗教学校，其繁忙程度可与制造精美纺织品与金丝锦缎的工匠区相比。这两个城市及远郊的市场与商号关注着商队的商业需求，这些商队有北边从阿勒颇到摩苏尔的商队、东边来自呼罗珊的商队，以及来自麦地那跨越大沙漠的商队。

巴格达圆城已经被人们描绘为“与世隔绝的思想宝地”。本图例是根据阿拉伯经典作家的描述而制作的。中心位置是哈里发的“金门宫”及其“绿色的穹顶”。哈里发的儿子们住在第一层，政府各部门分布在第二层。这幅城市图例确立了一条核心价值观，即：先知的继承者是真主在地球上王国的领导者。

从安达卢亚到印度，无论伊斯兰扩展到哪里，其城市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即使是在大马士革、开罗或是巴格达，大部分私人住房都是用晒干的砖砌成的，这种疏松的砖使这些城市在外国旅行者看来，老是像快要坍塌的样子。只有一些与权力有关的建筑，像清真寺、宫殿、要塞和城墙等，才会用窑烧的砖或是切割的石头砌成以使它们得到永存。但是，在也门，以及在伊朗的许多地方，富人的城镇住房都是用坚固的砖石结构建造的。穆斯林建筑师与施工人员的技艺表明自己的风格因材料不同而各异，但都能和干旱的环境与气候很好地结为一体。建筑物简朴的几何线条，白色灰泥所营造的艺术主题，内部木质顶篷华美的绘画，正像清真寺入口处的《古兰经》铭文一样，让人有清楚明白的伊斯兰的感觉。尽管公共建筑是精心计划和精心施工完成的，但是城市的其他建筑则全无计划可言。巴格达最初的圆形内城算是个例外。其他大部分伊斯兰城镇的特征是，街道狭窄、弯曲，两侧高挑建筑彼此间隔极小。主要街道排列着商店，街道常设有顶棚，以防夏天烈日曝晒和冬天雨淋。城堡宫殿周围的空地，以及聚礼用的清真寺周围的空地，用于公共娱乐、宗教行列仪式和马术表演，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密集、单一的都市景观的不足。

社会环境也决非没有特色。工匠作坊和手工业行会坐落于市场与聚礼清真寺周围。大部分劳动者都组织到各种行会之中。长期学徒的身份以及内部规章将城市手工业者与服务人员，如铁匠、金银器工匠、鞋匠、家具工匠、木匠、造纸工、装订工、写字工、印刷工、屠夫、面包工、制革工等，全都加以仔细的区分。尽管手工业行会维护其成员的经济利益，但是当局不会听任城市市场完全不受控制。城市长官、警察头目和法官代表中央管理机构。但是还有其他负责监督市场的官员，负责留意市场不要有贪图暴利而损害消费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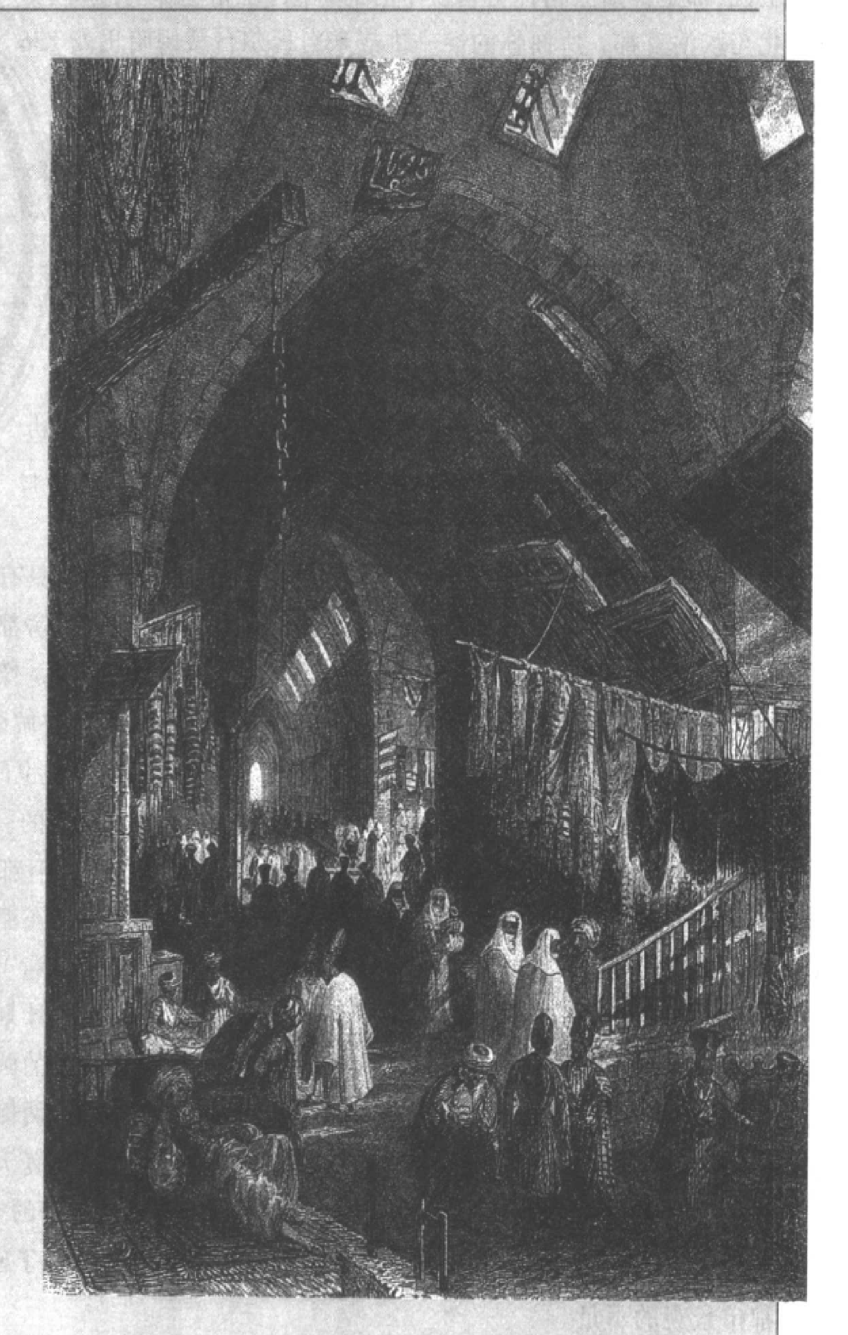
149

第144页图：大马士革大寺。709～715年间由伍麦叶王朝哈里发瓦利德一世修建，是穆斯林世界现存最早的大清真寺。设计建造该寺的目的是为全城所有穆斯林提供礼拜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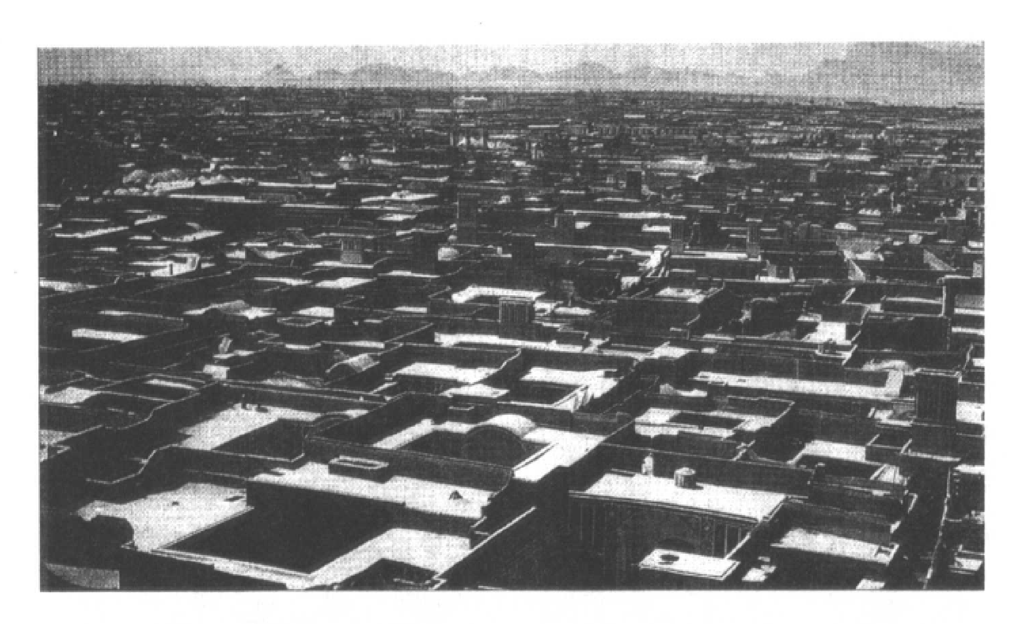
148

集 市

没有一个城市能够离开市场而存在。伊斯兰城市也不例外。从公元7世纪至10世纪，阿拉伯人和皈依的穆斯林从古代伊朗人、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继承了他们活跃而繁荣的城市传统，但同时又赋予它一种特殊的活力。这种市场（阿拉伯语为 suq，波斯语则称 qayasriya）成为穆斯林城市发展的组成部分。穆斯林市场的最突出特征是它们往往同居住区相分离。由于穆斯林社会非常强调个人隐私，所以私人的住房——无论是富丽堂皇的宽敞豪宅，还是穷人大片的租房街区——都用一道道单调的外墙完全包围起来。与之相反，集市和它拥有的大量商店和摊位，则需要对所有的顾客和供货商开放。因此，市场就被集中到某几条街道或道路两旁，通常是用黏土建成圆形的屋顶，以保护顾客和店家不受酷日和冬雨的侵扰。每一条街道都专门从事一种或一类商品的贸易。因此，巴士拉、大马士革、开罗和巴格达都有专门的集市从事香料、食品、丝绵织品、皮革制品、金属制品、珠宝、货币兑换和香水等的交易。在这些商店后面，往往有一个封闭的院落，在集市的右角方向上，有一栋楼用作仓库或商旅车队和游商的临时住所。集市受到官员的严格监督管理，官员的职责是确保商人按标准计量，同时保证货物的品质和公平交易。在物品稀缺时期，对价格也有所规定，以防止食品零售商和谷物商贩牟取暴利，损害消费者。除了进行零售活动以外，集市还经常成为人们聚会的场所。集市里往往有许多小饭馆和饭店，许多在家中缺乏相应厨房设施的人便在这里购买食物和饭菜。在开罗，大约有1.2万家餐馆和饭店专门从事这项生意，即为公众准备餐饭。在出现咖啡和烟草以后，咖啡馆成为16世纪以来穆斯林集市的又一共同特征。



19世纪伊斯坦布尔有顶篷的集市。当时，这个集市有4000多家商店，2000多个作坊和500多个小摊位，还有一些清真寺、喷泉和仓库。中心地区称贝德斯腾，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对这个城市的征服。这一区域有一个门的上方刻有一只庄严的鸟。根据17世纪作家尤里亚·切列比的描述，这只鸟的涵义是："收获和贸易像一只野鸟，如果它能够被礼貌和善良所驯服，那么在贝德斯腾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完全设计成圆形的巴格达城是个例外。绝大多数穆斯林城镇都有仔细规划的公共建筑物和由拥挤的房屋紧紧包围的空地，就像在伊朗从亚兹德的许多屋顶上都可以看到的这种图景一样。这是一个由狭窄弯曲的街道、单调的高墙和死胡同所组成的世界。它常常被分成许多小区，每一个小区里居住着同质性的社团，维系社团成员的纽带是共同的宗教、族裔或职业。这些小区自己就可能拥有行政管理单位，并且有自己的大门，晚上关闭。

利益的行为，不要有假货或劣货。穆斯林城市从起始到现在的漫长、绵延不断的历史证明，时断时续的社会动乱、饥荒及其他人口灾难从来没有影响它的经济根基或组织。

农村经济

农民和游牧民对伊斯兰城市的成就所做的贡献并不算小。农民常常引起贪婪的收税官和游牧领主不怀好意的注意，然而城市一直依赖农村的剩余产品，依赖他们供应小麦、大麦、小米、甘蔗、食用油、菜园与果园产品、椰枣、奶制品和牲畜。专业化的生产者、商人和部落民将棉花、羊毛、染料、皮革、木料、木柴、未加工金属、制造玻璃制品用的硅沙，以及其他许多半成品运往城市。这种城乡贸易通过市场交易和农民与商人间自愿签订合同自由进行，尽管存在着农民受政治压迫的迹象。这种交易能够给农民提供足以使其家庭人丁兴旺、并可扩大其资本存量的收入。这是因为，与印度洋其他地方以及地中海的农民经济一样，在具有农村气息的中东，劳动力的供应也要 [150] 依赖于种地家庭人口的多少。

农艺学吸收了定居农业的长期的经验，主张使用小块或中等大小的土地、以挽畜拉犁、应用灌溉与肥料。美索不达米亚、埃及、部分叙利亚以及伊朗的农业技术在穆罕默德之前的几千年里已经有所发展。的确，在穆斯林入侵者的心目中，这些生产地区的声名具有传奇色彩，以致有些部落头领甚至向从事征服的哈里发欧麦尔建议，属于被征服者的所有的土地都应重新分配给阿拉伯人。这一建议遭到拒绝，理由是这一政策对未来穆斯林国家的惩罚会像对现在的所有者与耕种者的惩罚一样多。于是，早期阿拉伯的土地税与土地管理仍然以萨珊、拜占庭和科普特人的制度为基础。



在穆斯林世界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农业技术迅速发展，稻米、棉花、甘蔗和柑橘等许多新的农作物广泛传播。从这幅取自普塞多－盖伦的作品《防患集》（阿拉伯语，1199年版）的图画中，我们可以看到耕种、收获、打谷和筛糠等工作，另外还有劳动者们午餐送达的喜人场景（图中左上角）。

由于中东主要国家的收入以及单个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均主要来自耕地的经济剩余，于是在估计作物年收成和计算农民应交的租税方面形成了一种精确的评定制度。经济剩余的价值用现金衡量，或者以一定份额的口粮作实物租金。由于农业的专业化或者由于需求，而使农产品市场活跃起来。凡是存在活跃的农产品市场的地方，以货币形式评估税金并不难。下面是美索不达米亚高效率农业经济的一个例证。在征服了伊拉克之后，欧麦尔的代理人立即进行了土地调查，这一调查对不同类型的土地和不同种类的作物做了区分。凡是可以用幼发拉底河水灌溉的地方，密集种植小麦的地块每杰瑞卜（jarib）[①]计量单位的税金评估为1.3迪拉姆，如果种植稀疏，只有2/3迪拉姆；平均小麦生产一计量单位要交1迪拉姆。在果园或菜园种植较有价值的经济作物者要按高得多的税率交纳。种植椰枣的税率是每杰瑞卜10迪拉姆，因为椰枣是最值钱的商品作物。

农业的多样性

出自穆斯林世界其他地方——埃及、也门和伊朗的有关农业的论文揭示，农民种植的谷物、甘蔗、棉花、油菜籽、蔬菜和水果不仅能自给，而且根据对有竞争力市场的价格变动的计算，还有盈余。恰如7至11世纪古典时期阿拉伯在北非、西班牙、西西里、伊朗和印度的扩张与军事征服创造了一个扩大的市场，并带去了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法律制度那样，他们也传播了作物与农

① 意为袋——译者。

业技术。先是将甘蔗、苦味柑橘、茄子、瓜和各品种大米从印度和东南亚引进中东新耕作地区,然后又推广至北非与西班牙。的确,突尼斯与摩洛哥的“盖斯巴赫”经济是一种穆斯林方式的延伸,这种方式是把椰枣种植与蔬菜水果的栽培结合起来,另外再加上田园诗般的畜牧业。在古典时期,北非是小麦、大麦和橄榄油的重要产地。在阿拉伯征服之后,可耕地的耕作变得比较混杂了,而且,游牧生活以及牲畜的季节性迁移也依主要阿拉伯与柏柏尔部落集团相对力量的不同而有不同程度的扩大。在撒哈拉沙漠边缘河谷的椰枣种植园开始由输入的非洲半奴隶经管。

灌溉

穆斯林较早的一些世纪里,作物传播与农艺革新背后的基本因素是灌溉,以及与其他作物栽培技术协同发展的提水技术。印度北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河谷的集约农业将一年几种作物的轮种结为一体。冬季作物有小麦、大麦、各种小扁豆和油菜籽,紧随其后的是大米、小米、玉米(发现美洲后引进)、棉花、甘蔗、靛青、茄子、甜椒和瓜。如果气候允许,还可在收获夏季作物之后和播种冬季作物之前,栽种大米和新鲜蔬菜等第三季的作物。无论是冬季还是夏季作物的轮作,要想成功,须管理好水资源。在印度的部分地区以及也门,6月至9月西南信风可带来充足的降雨,夏季栽种没有什么问 [152] 题。但另一方面,对冬季作物来说,亚洲季风干旱区,则大都没有充足的降雨,而在植株生长的这一关键阶段灌溉是必需的。尽管小麦和大麦都是旱地作物,也可密集种植,且用工少于种植大米和甘蔗,但是适时供水是种植中的决定因素。在冬季少雨地区,解决缺水问题的办法是打井、建水库,或修水渠,将山中含水层的水引出来,供人工灌溉。西亚与地中海的问题正好与印度洋的问题相反。这些地区秋冬季雨量丰沛,但夏季格外干旱、炎热。在北非、西班牙和西西里,要想成功地栽种夏季作物,需要建设在夏季能提供充足用水的灌溉工程。

水利技术

由于阿拉伯人逐渐熟悉利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印度河和尼罗河河水的水利技术,于是能够把这一技术与他们自己的以沙漠干河谷灌溉为基础的技术结合起来。在地中海新征服区引进人工灌溉,使一些农业生产已经衰落、或者从不具备复种的便利条件的土地重新得到令人惊异的开发。粮食或商品作物生产的中心问题是保存和分配季节来水。安装把水从某一地水准平面提升到另一地水准平面的装置,和修建通往田地的水渠同等重要。在采用各种方法进行集约耕种的同时,滑轮、各种传动装置以及悬臂梁的使用也取得了进展。在同一时期,土木工程也发展了,有了为控制流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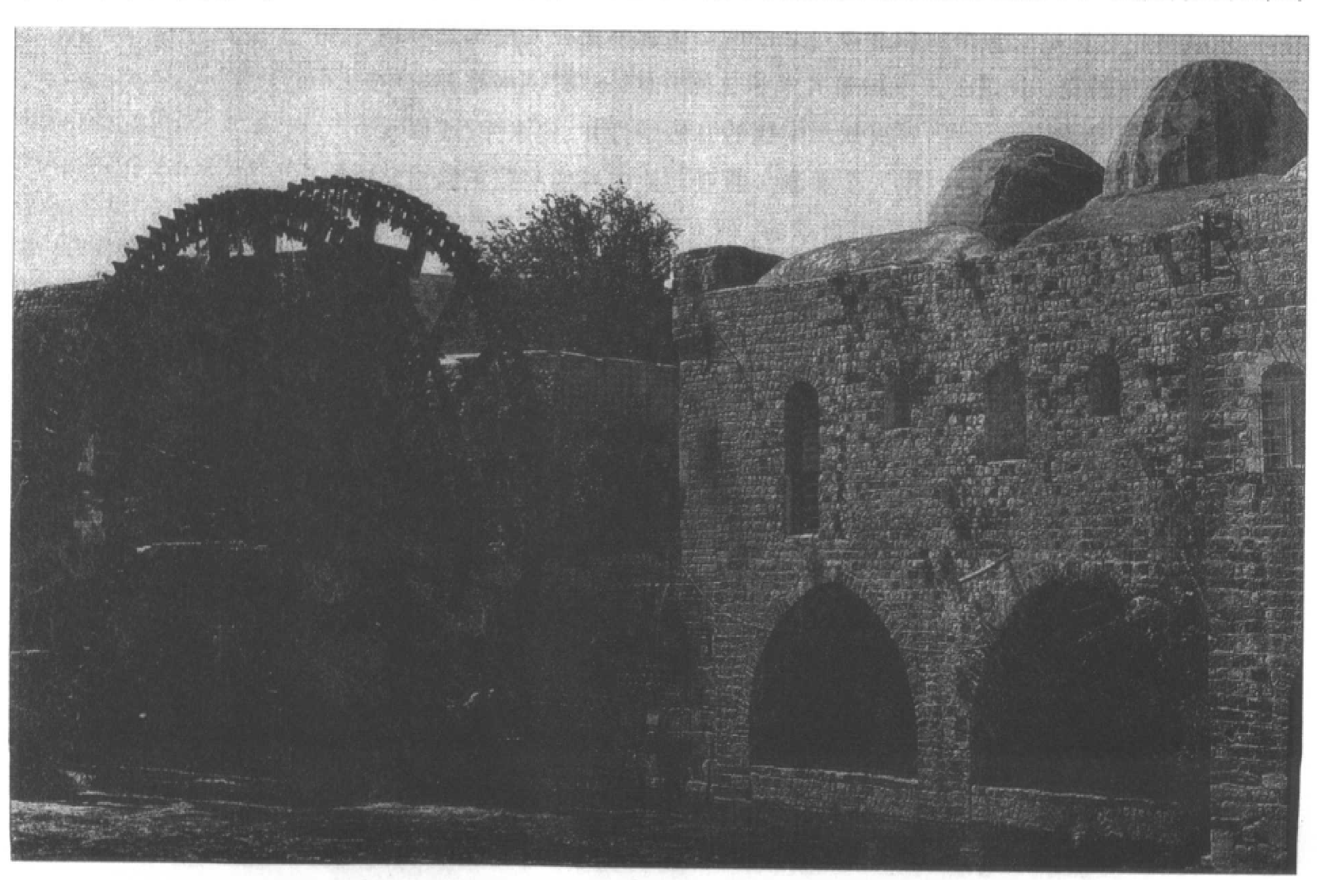
速度和数量而修建的、有不同水平面的石砌设施。与分配稀缺用水有关的社会权利方面的复杂制度，使财产所有权变得复杂了，这种复杂性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西欧都是见不到的。衡量可耕地的价值不仅要看它天然的肥沃程度，而且要看它用水是否便利。习惯法规定了容许种植谷物或椰枣地块用水的数量。根据椰枣种植园树的投影的标准长度，开关安装在水管上的阀门，或者，类似阀门，用椰枣树叶的梗做成计量杆，插入水管，以控制水流。

用砖石衬砌的井，除了深度以外，没有什么别的工程上的问题，在地下水位较低的地区，其深度可达到近150英尺。但是，从这么深的井里提水是很费人力和畜力的。在印度，需要饲养一种特殊的牛，这种牛有力气在水源地的坡道上干活；由于爬坡，牛要增加拉力。用大皮桶装水，然后倒进石砌的蓄水池，再经石铺的渠道流入田地。在阿拉伯半岛中部绿洲菜园或果园，或是与幼发拉底河交界的沙漠，种植椰枣、石榴、蔬菜、柠檬和柑橘的半设防的村庄也要靠井水灌溉，他们是用骆驼，而不是用牛拉水。在提升距离不太高的地方，将挽畜套到伊斯兰最著名水利装置“诺瑞阿”（水车）上。它由两个接合在一起、由齿轮传动的轮子组成。第一个大的轮子安装一些陶罐，垂直地放入水中，它的小齿轮与另一个小些的大轮子的小齿轮相啮合，轮子靠骆驼、驴或牛转动。在大些的轮子旋转时，陶罐灌满了水，然后把它倒进装水的大容器中，或倒入储水池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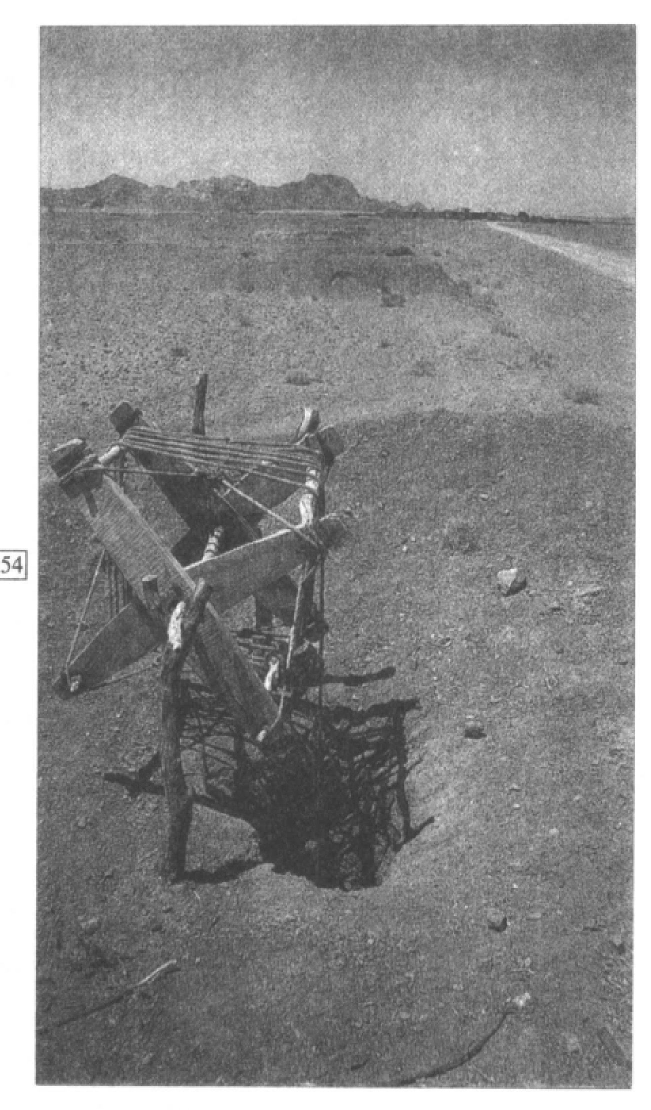
[153]

叙利亚奥龙特斯河上哈马城的一个库水车（“诺瑞阿”）。从罗马时代晚期开始，这种水车常见于从伊朗到西班牙的广阔地区。由于掌握了水利技术并对水源进行管理，穆斯林开辟了新的耕地。

大的“诺瑞阿”也可以用于快速流动的溪流和河流中。在叙利亚北部的



奥龙特斯村庄，轮子直径达 30 英尺的大“诺瑞阿”现在仍然存在。不过像维特茹维斯在公元 1 世纪所说的，在罗马时代，已有类似的水车在转动。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和尼罗河，有类似的装置在运转，这些水流转动着大轮子有槽的轮辋。这一技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些河水的自然特点，无论是这些河水的水位还是流速，都存在着季节性的变动。底格里斯河与尼罗河每年的泛滥非常险峻，农艺学工程师在穆罕默德之前近 1000 年就已经认识到它们的潜力：他们修建了精细的辅助渠道系统，以便将灌溉用水引到离河流有一定距离的地方。阿拔斯哈里发国时期形成的著名的纳哈尔旺水渠，在萨迈拉附近从底格里斯河提取水源，然后与 154 一较小的渠道网连接，使一大片冲积平原得以耕种，否则它们仍旧是荒地。在富斯塔特与开罗之间的小岛，著名的尼罗计水器记录了河面水位的上升。在水位达到 16 臂高时，农民可以肯定，他们会得到足够的用水，可以成功地耕种土地。如果达到 20 臂高，那么过了耕种期以后，地还会被水浸泡。如果水量低于 16 臂，则不能满足正常收成所需。开罗金融市场把尼罗计水器在河水泛滥期间每天的记录几乎看成是埃及当期经济前景的指示器，而埃及又是希贾兹和中东大部地区传统的“面包篮”。



伊朗塔巴斯附近一个正在维修的坎儿井（qanat）。这是伊朗、北非和西班牙的一种特殊灌溉技术，它通过被称为“暗渠”的地下管道采用地下水。一般是在有含水土层的山上打一口母井，然后通过暗挖的管道把水引向需要的地方。水道经过的路径可以通过一路上间隔开挖下去的一座座竖井，而从地面上把它标示出来。本图中，这种由挖竖井而形成的一系列小土堆可以看出去很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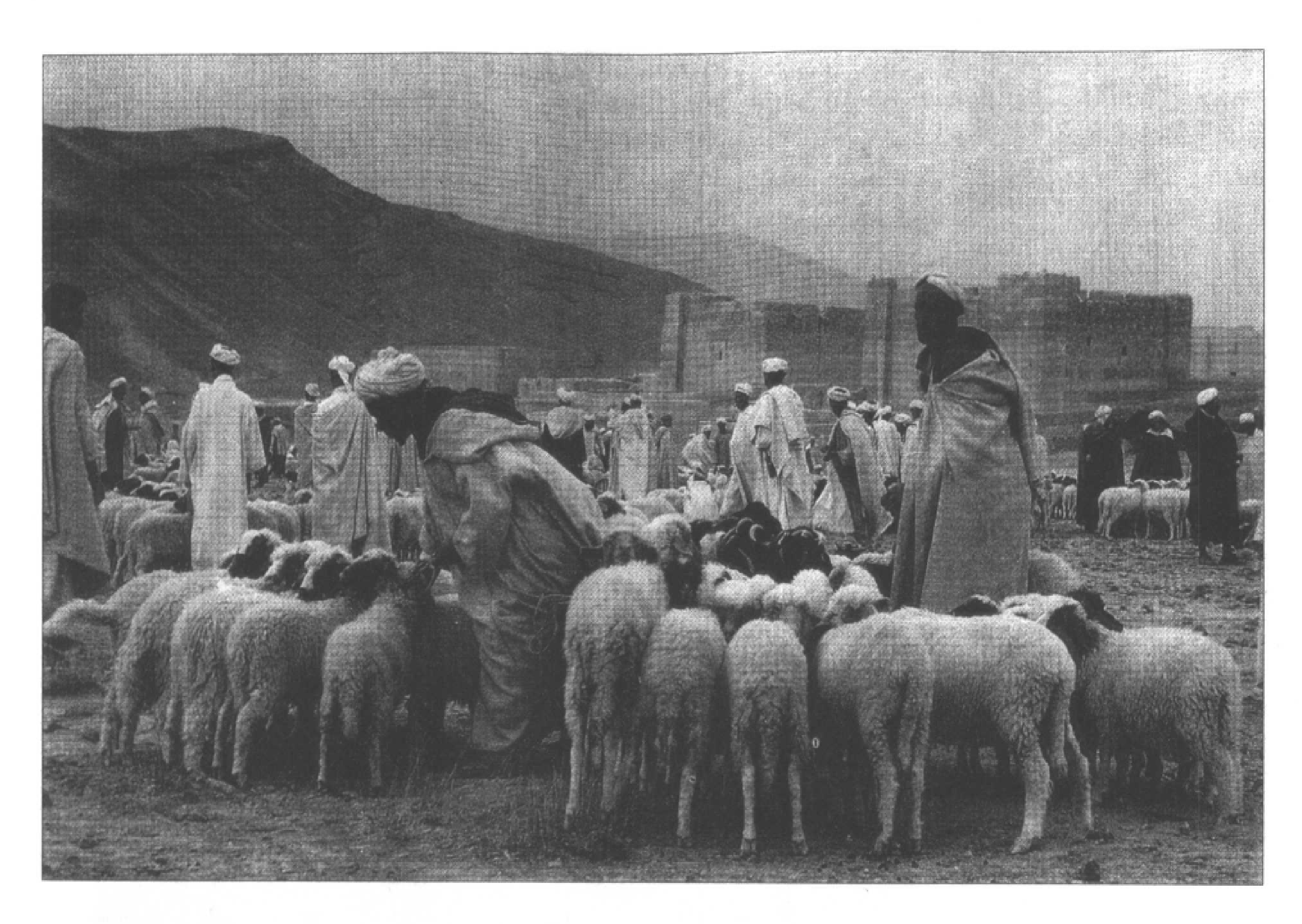
尽管无论是美索不达米亚还是尼罗河谷都不能避开洪水泛滥的风险，甚至也不能避开水源短缺的风险，但是它们的农业却比伊朗大部分地区、阿曼、阿富汗以及处于撒哈拉沙漠边缘的北非的部分地区要幸运些。在后面这些地方，对水的管理靠在地下修建管道（坎儿井），从坐落在山里的天然蓄水池引水。从山中蓄水层这一源头开始，挖一系列用陶土管衬砌的地下管道，这些管道彼此用类似水井那样的通风井相连。伊朗和北非的一些地下管道长达 40 英里。工程师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正确测定水流的落差与水力。他们借助于玻璃做的平液管进行这类测定。沿着通风井钻许多洞，并注满水以测试水的流速。这一水利系统使许多城镇与村庄得以经营椰枣种植园，经营日益繁荣的农业，使它们工业中心与商业贸易中心的作用得到补充。

游牧和以畜牧为基础的社会和经济制度

这些绿洲定居者的生产能力使他们持续地面临着一种风险，即来自生活在沙漠边缘或腹地尚武的游牧部落的钱财勒索与索求。有两个干旱环境生态学因素促成游牧经济的存在。第一，粮食生产和灌溉农业除了需要牲畜提供奶制品、毛与皮革以外，还需要它们的牵引力。第二，少雨的气候无法支撑定居农耕中牲畜的饲养，也无法支撑定居农耕中的耕地。然而，在边际耕地上饲 155 养牲畜却是可能的，因为冬春两季的降雨可使有营养的草和其他植株在短时间内得以旺盛成长。从史前时期起，在欧亚大陆的草原、在中东与北非的沙漠，游牧即与定居农业平行发展。由于沙漠阿拉伯人在伊斯兰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很大，所以总体上游牧在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即使有时是矛盾的功能。尽管大家公认游牧民所做的经济贡献对定居人口的福祉来说是有益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游牧民内在的军事活动能力仍使人们产生了疑虑。在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强盛的时候，能够轻易地遏制住边界上或边界以内尚武的游牧部落。而在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比较软弱的时候，则易于受到游牧民的袭击。沙漠边缘的村庄和椰枣种植园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也得不到充分的保护，于是居民们不得不与主要部落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后者提供保护，但作为回报，要向它们定期交纳农产品。

牧民的经济与社会同伊斯兰的关系包括许多各不相同的形式，并且经历了许多世纪的演化。先知穆罕默德所在的古莱什部落在麦加有强大的根基，好像一直在参与组织跨越沙漠到地中海港口的商队贸易。但是他的直接继承者在伊斯兰扩张中所采用的政治与军事的方式大体上是贝都因式的。部落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主要与在沙漠的放牧权利等级有关，它根据迁移日程、饮水情况以及与灌溉绿洲的村民的固定协议划定。经济收益如何分配最终取决于军事实力和骑马作战的能力。经常进行的劫掠性远征可以检测部落勇士的作战技能与伏击技能。完成劫掠使命所取得的成就的大小，以获得战利品骆驼的数量与质量来衡量。专门有饲养纯种骆驼的贝都因，他们完全生活在沙漠中，这些骆驼享有与著名的阿拉伯纯种马的饲养者同等独特的声誉。将这些牲畜卖给商人的情况是鲜见的，外人得到的骆驼要么是抢来的，要么是同原所有者交换礼物而得到的。不过，游牧民，不管是阿拉伯人、突厥人还是柏柏尔人所饲养的大量的骆驼、马、驴和羊，属于非纯种牲畜，可以卖给农民、专业运输者和城市市民以换取现金。

大的部落联盟每年都要穿过沙漠访问大马士革、库法、巴格达和阿曼的各城市，购买纺织品、粮食、咖啡、糖、茶、工具和武器等货物，补充这些物品的库存。从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脉到安纳托利亚、扎格罗斯和阿富汗的帕米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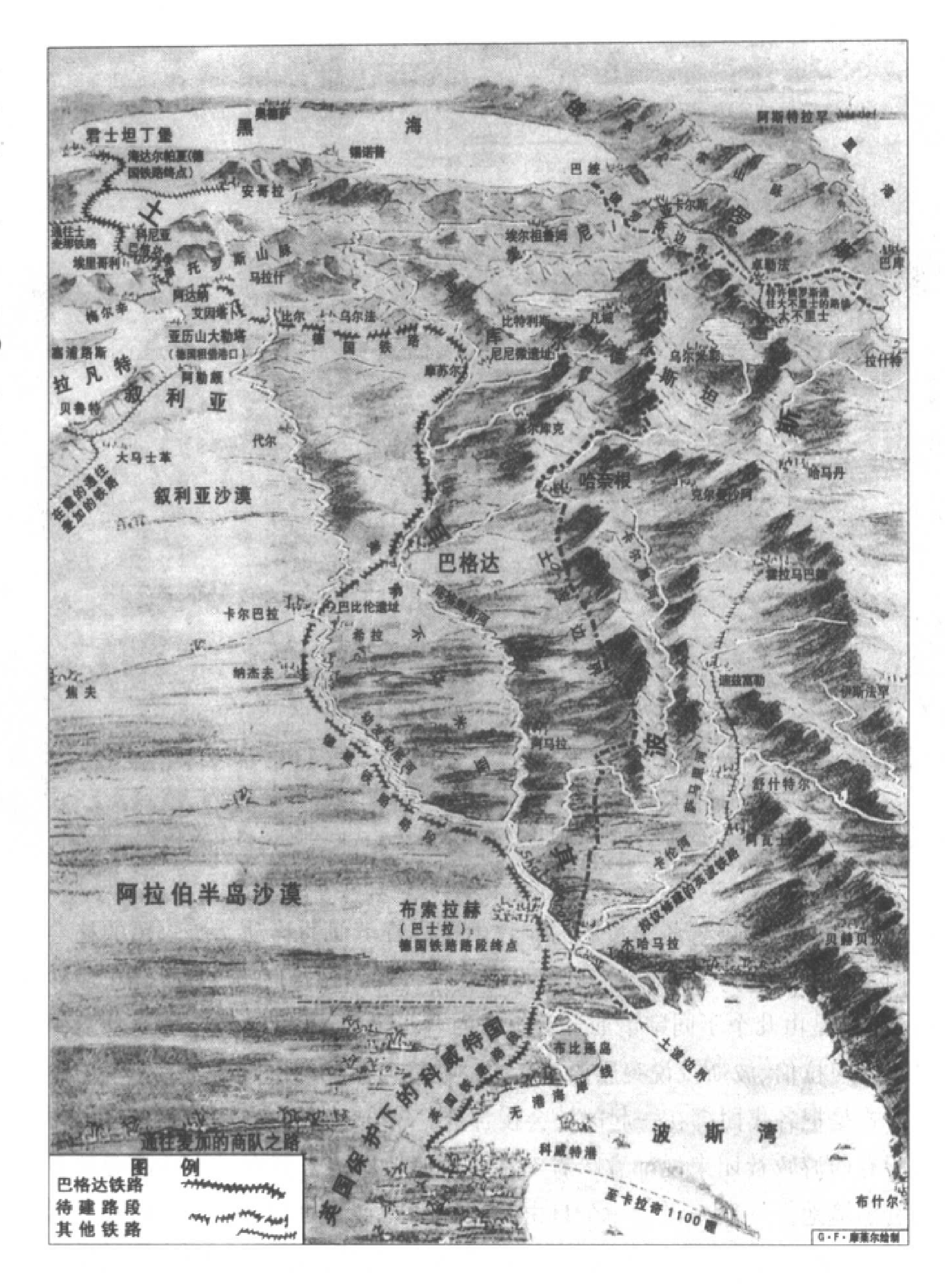
来自名为阿伊特哈迪德的柏柏尔部落的牧羊人把他们的羊群赶往摩洛哥上阿特拉斯山区伊米勒希市场。

牲畜也在夏季牧场与冬季牧场的轮牧中进行着类似的移动。游牧民的社会结构一直是易变的。19世纪到20世纪大的贝都因部落联盟，如鲁瓦拉或沙玛尔，都是由几个不同宗谱的部落组成的。在伊朗，巴克蒂亚瑞和盖什盖伊 [156] 可包容阿拉伯、波斯及说突厥语的集团。牲群与牧群的所有制以及流动的生活方式是把各集团绑在一起的社会接合剂。战争、自然灾害和动物疫病流行对所有的游牧社团来说都意味着灾难，会使他们陷入替农民干活的劳动者的贫困境地。一般来说，一个自由的游牧民同农村的与之相对应的农民相比，是富裕得多的个体。使游牧民与农民相比处于令人羡慕地位的，一是牲畜的货币价值，二是不交固定的租税。

现代的发展与石油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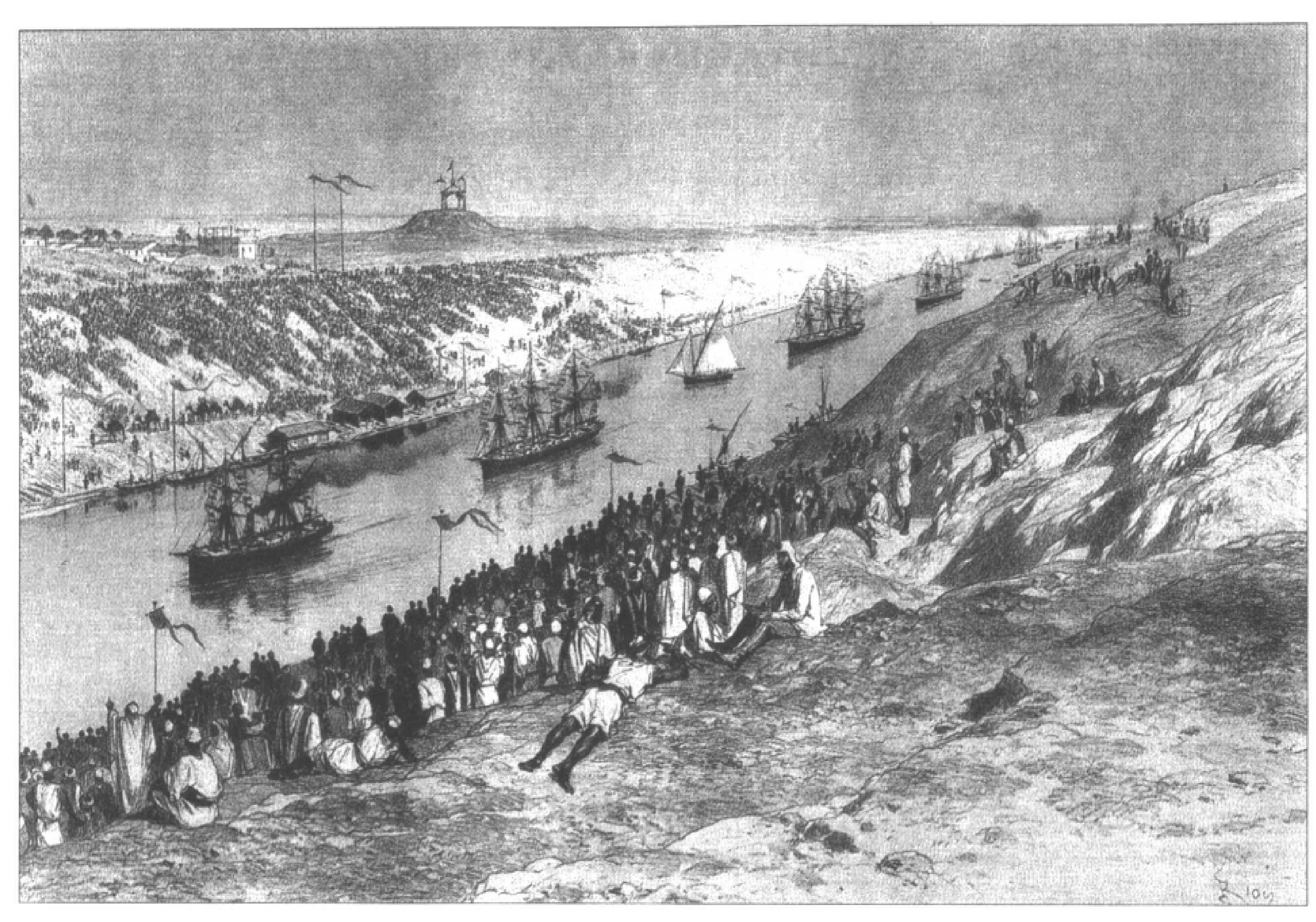
16和17世纪欧洲人向印度洋的扩张迅速改变了跨洋贸易的结构。英国在阿拉伯海称霸，以及随后英帝国在印度次大陆的立足，不仅是对穆斯林政治权力的严重打击（从萨拉丁的时代起，穆斯林政治权力在苏伊士以东一直未受到挑战），而且是对它经济独立的打击。由于开凿了苏伊士运河，使古代的贸易渠道在1869年以后得以重新打通。但是英国占领亚丁（从1839起）和 [157]

1913 年发布的一幅图显示了巴格达铁路的规划范围。英国人和德国人在奥斯曼帝国的铁路发展上面投入了巨额资金。在 1888 年维也纳—伊斯坦布尔一线工程竣工以后，欧洲资本对这一投资尤感兴趣。据估计，1899 年至 1909 年间，进入奥斯曼帝国经营铁路的各公司在资本方面获得了年均 5%的回报率。



埃及(从 1882 年起)，随后又在实际上控制了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这就为西方在经济上控制穆斯林世界重新打开了大门，同时也走上了动乱和革命变革之路，这些动乱和革命变革几乎一直持续到现在。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在伊朗、伊拉克、海湾国家和北非部分地区发现石油，给地区经济又注入了另外的动因，导致 60 年代和 70 年代意义深远的变革。今天，中东许多穆斯林国家的居民享有的生活水平和繁荣程度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在他们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像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各成员、阿曼、利比亚等由石油消费者变为生产国，资源上的这种转变，不仅为提高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准提供了机会，而且也为重新建构经济与社会提供了机

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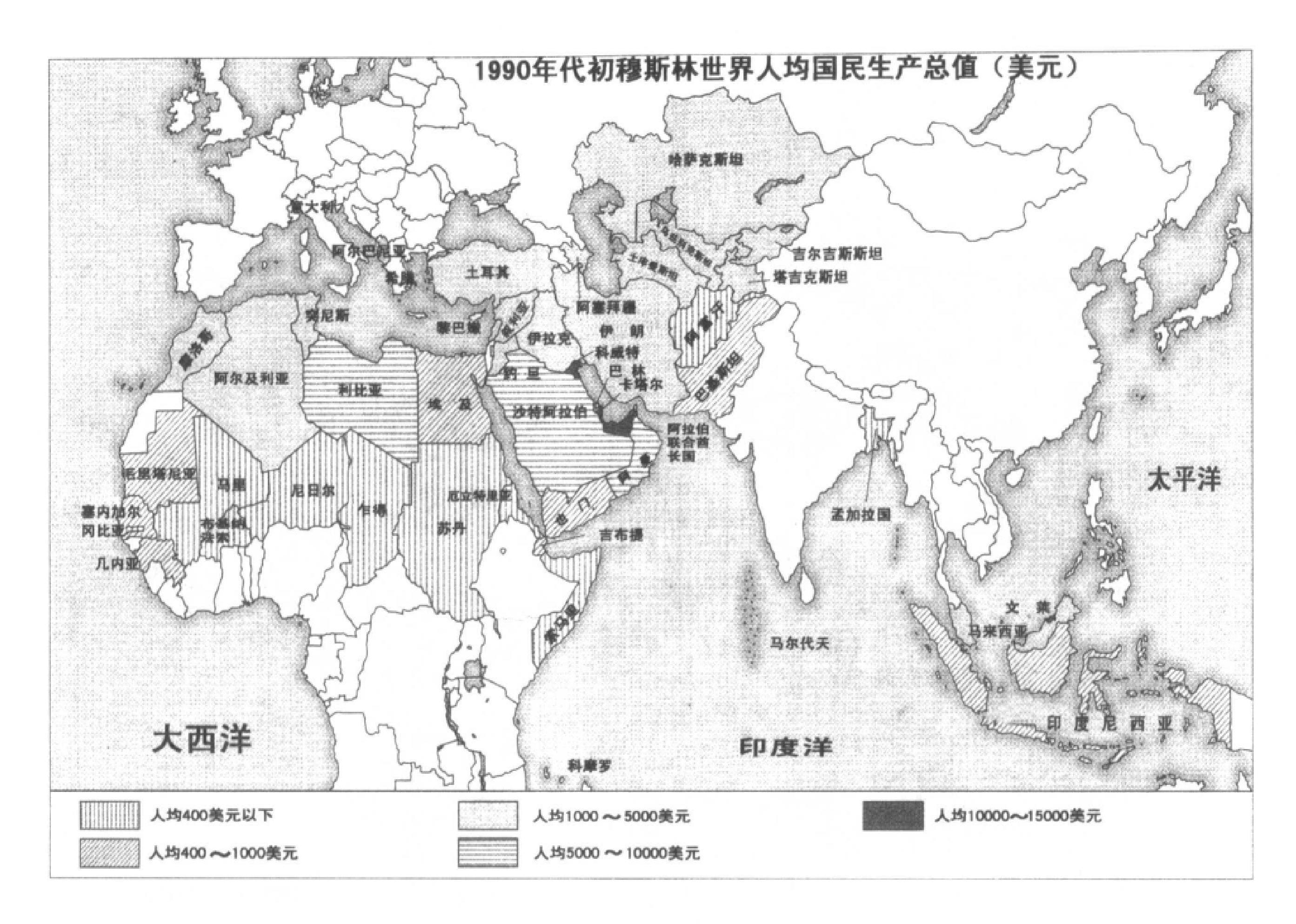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典礼上的船只行进仪式。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强化了欧洲对穆斯林世界的经济压力。所以毫不奇怪，在1956年，英国和埃及为了这条航道的控制权而诉诸战争。英国视苏伊士运河为维护其在运河以东地区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生命线，而埃及则视之为殖民控制的一个标志。

会。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石油繁荣所产生的变革的压力，在不同的国家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结果，但对所有国家来说共同的要素是，认识到经济的现代化对传统的社会行为方式也构成了挑战。因而对作为宗教和社会制度的伊斯兰的作用需要重新加以解释，这一点已得到普遍的承认。如果说，这些穆斯林石油富国面临的是由日益增多的财富而产生的调整问题，那么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埃及、突尼斯和摩洛哥，他们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向他们社会中较穷人群的贫困开战，这种贫穷是因人口迅速增长和技术进步迟缓所造成的。

未能赶上欧洲

1500～1800年这一时期被看做是衰退和停滞时期之一，尽管缺少能够证实这一假设的精确的统计资料。穆斯林国家以及印度与中国未能赶上西欧的经济增长率或许是其中的原因，推动西欧经济起飞的是迅速的技术改造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生产的变革。到16世纪50年代，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处于以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为中心的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控制之下。[159]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尽管奥斯曼帝国建立的统治阿拉伯各省的行政机构仍能保持原样，但实际上埃及在19世纪20年代已经独立，伊拉克南部也一直难以控制。自然，伊朗仍在土耳其势力范围之外，而北非则在政治上和经



济上逐渐陷入欧洲霸权的藩篱。大量欧洲居民，主要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有选择地移入和定居于北非的某些地区，而与此同时，西方资本流入中东其他地区，引进了现代银行与金融机构，修建了铁路，工业得到适度的发展。这样看来，在 1800～1914 年这一时期，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好像主要是来自外部。

人口与经济的相互盘绕

历经许多世纪由于灾祸频仍以及破坏性战争所造成的人口灾难之后，中东的人口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开始增长。能够说明中东经济状况好于古代世界其他地区的，莫过于它在古典时代的人口密度。有人提出，本地区在公元 2 世纪有大约 4000 万到 4500 万人口，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 1/5。1346～1348 年的瘟疫大流行以及随后的灾难使中东人口减少了大约 1/3。在 1830 年前后北非与中东的人口总数可能还不到 3500 万。到 1914 年估计这一数字上升到 6800 万，1930 年为 7900 万，后者占世界人口总数的 4%略多一点。在不同地区，人口的增长率有所不同。埃及由于耕地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多。北非在 1870 年以后，随着农业的发展，人口也持续增长。由于欧洲经济的工业化，整个 19 世纪外部对中东经济作物的需求猛增。这一时期农业产量的上升可归因于人口、财政的集中化以及流通的现代化等内部因素的作用，以及出口

[160]

需求的增加。

中东人口以及对外贸易的增长是可观的，但是与之相伴随的是传统工业的衰退，后者无法与欧洲的机器生产竞争。与此类似的是，19世上半叶英属印度手工棉纺织业遭受了严重而持久的衰退。印度次大陆由世界上重要的工业国之一变成基本上是生产和输出农产品与工业原料的国家。

在埃及的一些地区，以及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谷物经济中，农业的扩展是靠增加耕地和劳动力，应用现有技术实现的。没有什么因素能够鼓励富有的地主与大农场主投资于费钱的农艺技术革新。但是在其他一些地区，有特别销路的农产品（如柑橘、丝、烟草、油菜籽等）的生产，需要有大量的投资用以改进技术与灌溉。

传统与变革

在稍后一个时期，中东的许多地方，基于农民耕作、手工业、游牧和城市化市场的传统经济生产的基本形式仍继续存在。对外经济交往的变化不仅表现在进出口货值与商品构成上的持续扩大，而且也表现在贸易的对象以及不同社会集团对贸易的控制上。16世纪和17世纪，西方反对奥斯曼帝国海军对东地中海的控制，这使穆斯林与西欧之间的贸易量大为减少。但同时也门的咖啡和伊朗里海省份的丝又给中东注入了新的经济力量。在3个多世纪里，美洲白银通过红海和波斯湾流入，这使亚洲其他地方增加了资金的 [161] 流动。中东主要的出口市场看来一直是印度、东南亚和中国。但是18世纪是欧洲商人重新加强与拉凡特[①]贸易的时期。欧洲从中东进口传统产品葡萄干、生丝、羊毛、染料、毛皮和皮革的数量增多。欧洲对埃及、叙利亚以及红海出口的玻璃、瓷器、毛织品和金属制品也大为增加。到20世纪初，同西方工业国的贸易成为中东不同类型经济中的重要部门，尽管对美索不达米亚的部分地区、伊朗和阿富汗来说，印度次大陆仍然是大的、重要的市场。新的贸易的扩展使沿海城市获益，但使商队道路上旧的城镇枢纽受损。相对于布尔萨、阿勒颇、巴格达和伊斯法罕来说，斯米尔纳（伊兹米尔）、贝鲁特、亚历山大和巴士拉获得了新的经济上的重要地位。欧洲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的商号补充了西方银行家的金融活动，后者为建造苏伊士运河和修建巴格达－希贾兹铁路这样的大型企业提供了资金。

石油

从20世纪20年代起，先是在伊朗和伊拉克，然后是在北非和波斯湾发现和开发了石油。这强化了欧商对中东经济的影响与控制。开发与提取石油的框架是由少数英、美、法联合股份公司规定的，同时也是商业与政治的租 [162] 让制度所规定的，这种租让权是西方石油公司从拥有未来油田用地所有权的国家那里获得的。一般给予60～70年的租让权，它涵盖了伊朗、伊拉克、沙

1990 年代初期穆斯林世界的石油储量和产量

	占世界石油储量的百分比	1993 年的石油产量（万桶/日）
阿尔及利亚	0.92%	75
阿塞拜疆	0.13%	24
文莱	0.14%	16.5
埃及	0.62%	88
印度尼西亚	0.58%	132.3
伊朗	9.30%	354
伊拉克	10.01%	43.6
哈萨克斯坦	8.56%	54
科威特	9.66%	187.3
利比亚	2.28%	136.7
马来西亚	0.37%	64.9
尼日利亚	1.79%	189.6
阿曼	0.45%	77.5
卡塔尔	0.37%	42.8
沙特阿拉伯	26.06%	816.1
叙利亚	0.17%	53.1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9.82%	218.9
也门	0.40%	45

小产油国：阿尔巴尼亚、巴林、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苏丹、塔吉克斯坦、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欧佩克成员：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利比亚、尼日利亚、卡塔尔、沙特阿拉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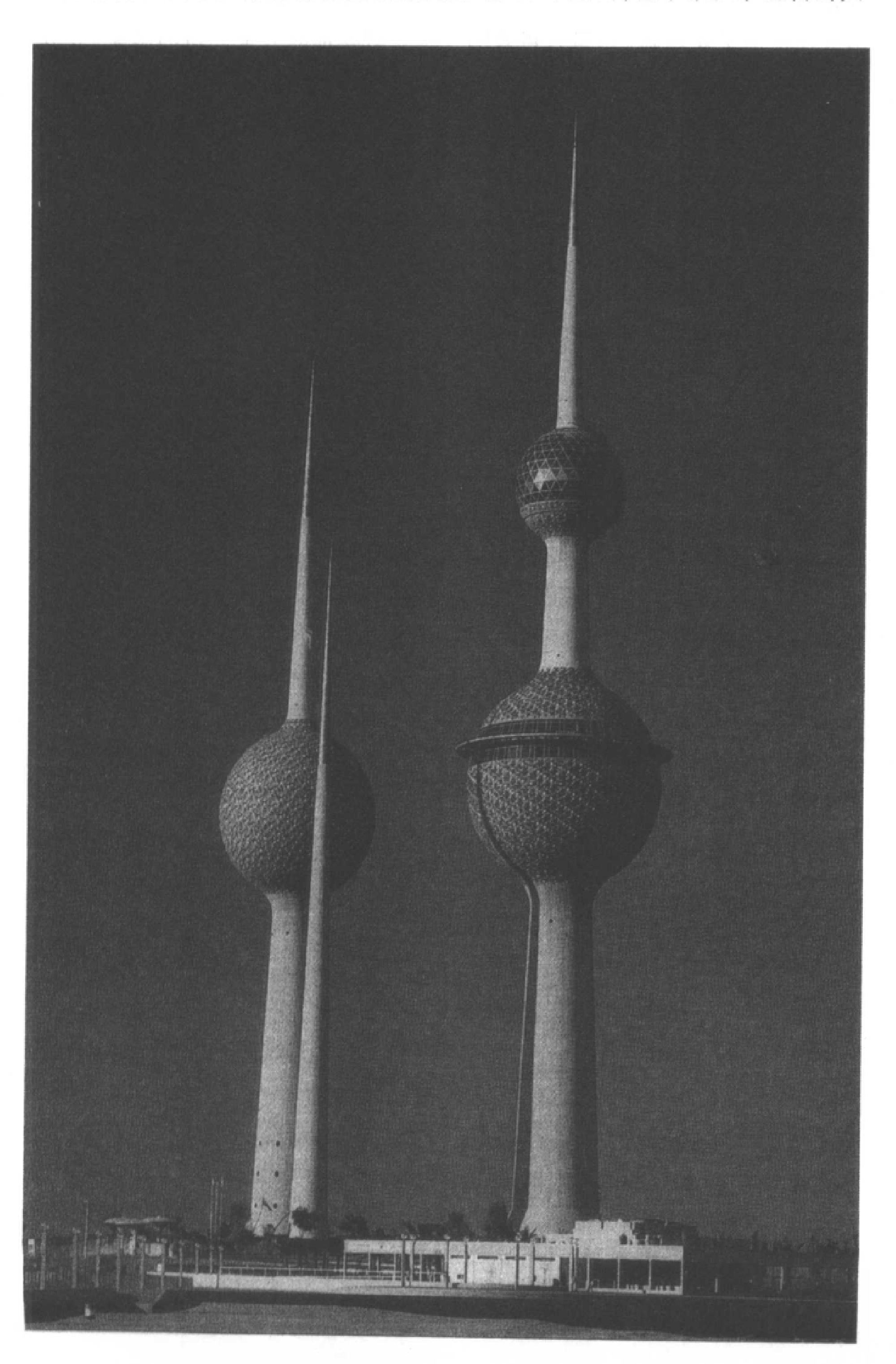


特阿拉伯的大片地区，以及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马斯喀特和阿曼的全部领土。作为对这种优惠的商业权利的回报，石油公司须向东道国政府交纳矿区[163]使用费和税，须雇佣当地人在油田干活，须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向所在国国内市场供应石油产品。由于开采和技术操作的成本低廉，这种安排对外国公司十分有利；这种安排一直持续到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到了这时，中东石油生产的经济学同穆斯林国家对西方，尤其是对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政治依赖联系起来了，因而不难理解，石油生产者为何会以改变外国石油公司的地位

① 指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译者。

的要求，作为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整体与世界其他部分力量平衡的先导。中东油田的成本优势，足以弥补工业燃料消费方面以油替代煤的技术变革所需的花费。由于世界石油产品需求增多，握有世界石油储备总量50%以上的阿拉伯和伊朗油田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也得到增强。

首先利用形势变迁的有利条件的是伊朗。1951年它将巨大的阿巴丹油田国有化了，于是与英国发生政治危机。在10年之内，在中东从事经营的大



若论从石油生产中获得的收益，科威特当数海湾国家之首。曾经以珍珠采集和海上贸易为主的科威特经济已经为石油业所主宰，到1960年代末，70%的工作人员受雇于政府。位于海湾之滨的科威特塔（如图所示）建于1970年代，它们展现了富油经济气冲云霄的自信。海湾富油国的财富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经济进行着一定程度的再循环，其途径除了移民工人的汇款以外，还有各种基金（包括从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到伊斯兰发展银行）提供的赠款、投资和贷款等。

部分外国石油公司被迫分出很大一部分纯石油收入给民族政府。1961年建立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973年阿以战争之后，发生了购买力的大转移,从石油消费国转到石油生产国。对说阿拉伯语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包括阿布扎比、迪拜在内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和阿曼等海湾国家,以及阿尔及利亚)来说,实际资源的转移也会以较好的住房、教育和医疗设施以及提供服务设施的形式,给大众带来较高的生活水平。为了改善这些国家经济的工业基础，已进行可观的投资。对其他有大量人口的国家（伊拉克、伊朗、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来说，经济收益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它们也享受了石油繁荣所带来的洪福。现在，世界石油需求仍然低于潜在的供应水平，穆斯林石油生产者的经济前景不像80年代那样令人乐观。然而中东的石油史表明,本地区仍然拥有成为世界最为注目之地的非凡能力。

第六章　穆斯林社会的规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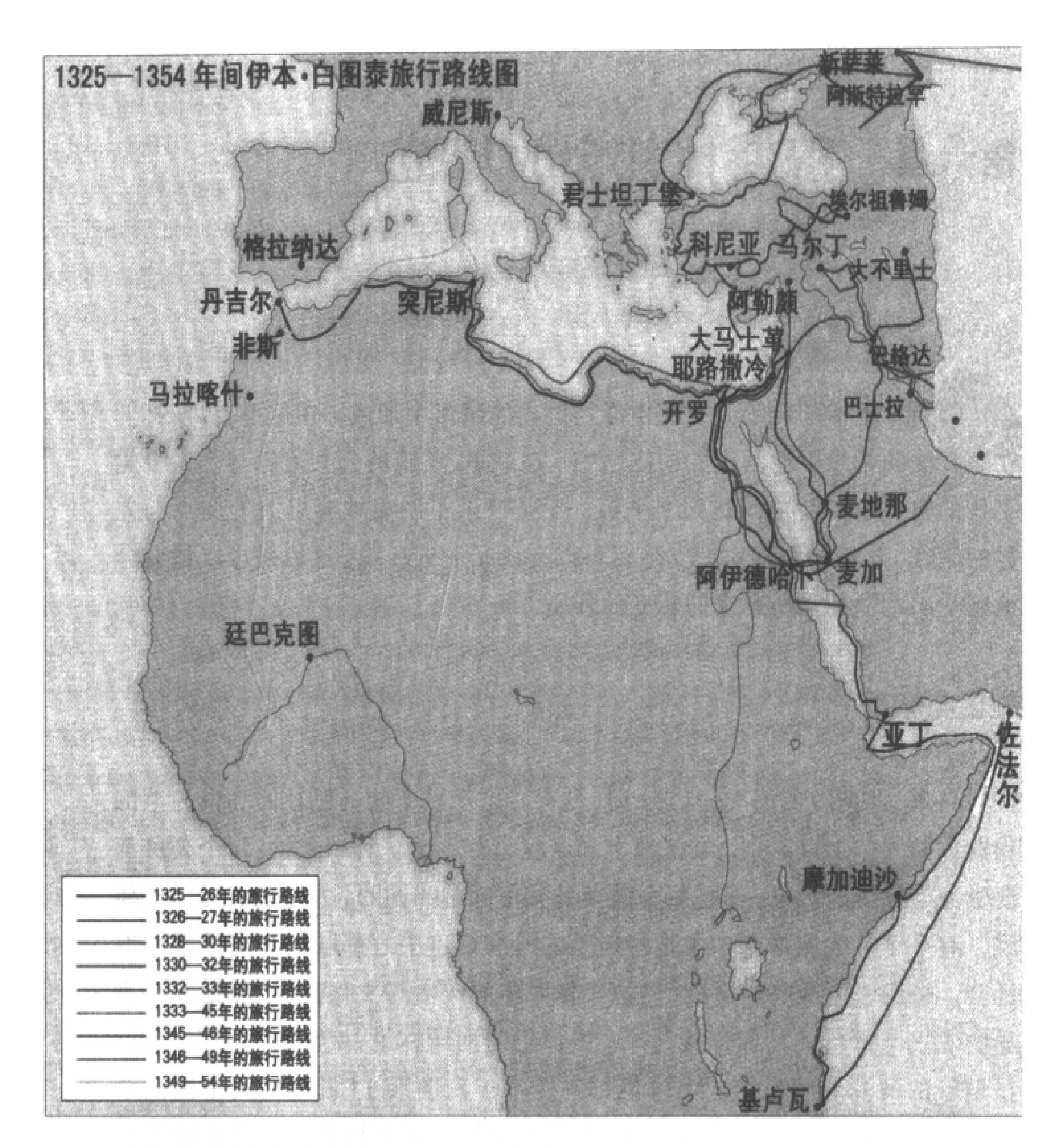
穆斯林生活的传统方式在伊斯兰世界的城市中形成。在这里，穆斯林们 [164] 在宗教法的指导下生活于共同体之中。在这里，实施的公共道德与个人自觉工作的自由这二者之间达到了平衡，于是产生了明显地容忍人的弱点与差异的制度。这就是我们对妇女生活可以有所了解的环境。这也是可以最充分地感受到欧洲列强所带来的转变的环境。

社区与城市

乌玛，即阿拉伯语"公社"一词，没有对每个城市的公民社团和世界范围穆斯林共同体加以区别。在法律上和制度上存在着这种一致性：每个公民都要受城市社团的约束，而且每个穆斯林城市都是共同的，人们确实可以这样说，有一个从大西洋到中国把伊斯兰的所有都市中心都联结起来的世界性社会。这是一种凝聚的途径，它抛开各大陆的政治与文化分界，而把各路奇异的农民与部落的社团连接起来。中世纪的穆斯林说，城市有两个聚焦点：星期五的清真寺和市场。当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 14 世纪访问中国一个城市的穆斯林区的时候，他发现，它的市场安排得竟同穆斯林核心地带城市一样。

参加星期五在中心清真寺的祈祷是一个城市内社团团结的显著表现。就像整个穆斯林社会赴麦加朝觐(哈吉)所表明的那样。无疑，这对在穆斯林世界旅行是无比巨大的促进。恰如访问清真寺也许会做成一笔生意，哈吉也成了商业交流以及职业进取的机会。一年一度庞大的哈吉商队从大马士革和开罗、从远至摩洛哥的城市非斯出发，驮着货物。像 16 世纪利奥·阿弗里卡纳斯那种拮据者的朝觐，要么靠提供文书服务，要么靠投机生意，走完他的路程才能指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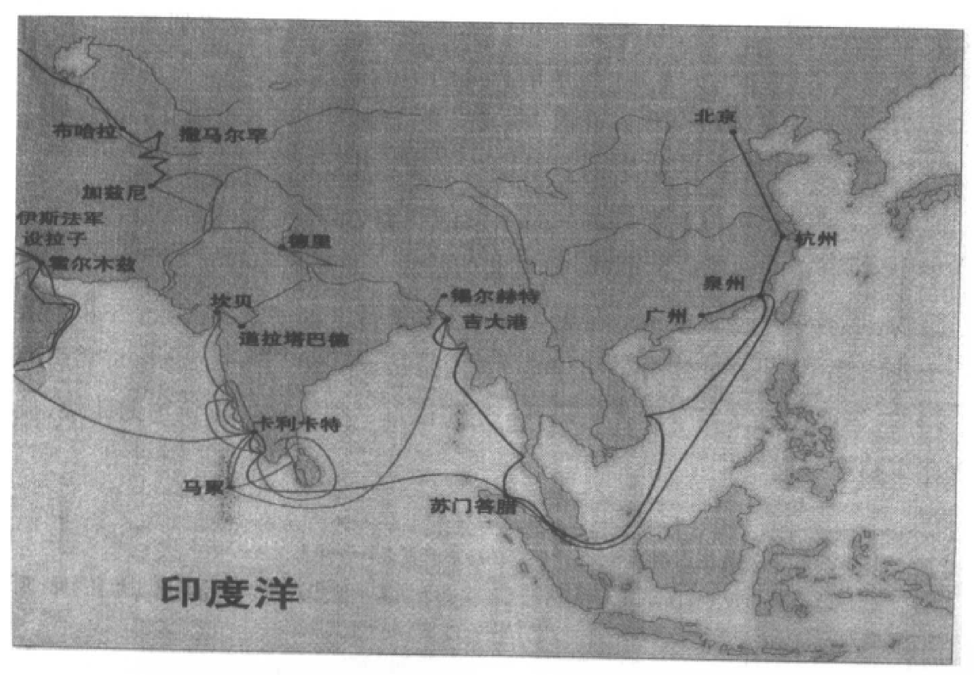
对穆斯林旅游者的叙述给中世纪穆斯林城市提供了一幅生动的画面。他们的成员都是受过高深教育的乌里玛（伊斯兰学者），而且立刻能打动读者的是，他们在精英的圈子里走动是那么的容易和受到信任，以致他们可以从科尔多瓦到非斯，从非斯到开罗，从开罗到大马士革，等等，他们以阿拉伯语作为宗教与法，科学与学问的共同媒介。他们不管走到哪里，都能指望得



到尊重、款待以及任用。

[165] 例如，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他1332年生于突尼斯，但是有几年断断续续地在非斯就职于马林王朝，先是当“阿拉马”(统治者的官方签署)的誊抄官，后来成为阿布·伊沙克素丹的文学圈子里的正式成员。1362年他进入西班牙格拉纳达宫廷供职，而20年以后(至少是像许多插曲那样)他又出现在马穆鲁克首都开罗，学生云集在爱资哈尔麦德莱赛(经学院)，听他讲课，他被任命为开罗马立克教法学派大卡迪(法官)。

或许伊本·白图泰(1304～1377年)是个最好的例子，他出身于丹吉尔，游历了30年，东到中国，西到西班牙和尼日尔，最后定居在非斯，在那里撰写了他的游记。我们得知，他是那样地迎合印度的素丹，以致他当上了德里的大法官，后来又成为素丹派往中国的大使。但是，如果说伊本·白图泰从家里出来走了7000英里竟没遇到一点文化障碍，有些言过其实，除非仅仅把这理解为他的被认可和得到升迁没有遇到障碍。



位于阿特拉斯山麓丘陵谷地中的非斯城，这个谷地有丰富的水源。

依传统把伊斯兰社会描绘成都市，这已经是老生长谈了。中东的历史是它的城镇的历史，这些城镇商业与学术、工业与艺术、政府与宗教都很繁荣。它的内地很少有以农村权力为基础的土地贵族。权力的基础是城镇。部落头领常常组织由沙漠与山区男人组成的军队，并率领他们去夺取城市。但是他们一旦执掌了权力，他们的利益也就寓于稳定而繁荣的都市生活之中了。

这些城市中有许多，如巴格达、开罗、凯鲁万，真正是穆斯林建立的，其他的城市也是穆斯林将它们扩大和使它们变富的。他们不是要将罗马、拜占庭和萨珊王朝的遗产毁灭，而是抱有让它们相形见绌的想法。先知穆罕默德归真（公元632年）60年之后，他们通过在耶路撒冷最神圣的地方之一建立"磐石上的圆顶寺"①，表明他们已来到世界舞台，这个城市当时被广泛地描绘成世界静点所在地。20年之后有了大马士革伍麦叶清真寺，今天它仍然是世界最壮观的建筑之一。再过50年，即762年巴格达也进行了营建，这是第一个有整体计划的穆斯林首都。

在北非，人们选上了凯鲁万这块地方，并着手建设后来发展成为最经典的阿拉伯清真寺。在东边，埃及640年以来穆斯林主要定居地富斯塔特发展成大城市，后来969年由于法蒂玛王朝在弗斯塔德附近建立卡希拉，即开罗，原富斯塔特城进一步扩大。在西边，于8世纪征服西班牙之后，逃离巴格达权力斗争的王子难民伊德里斯·伊本·阿布杜·阿拉突然来到偎依在阿特拉斯山脉边缘、与通往西班牙的道路并行、水源又比较充足的谷地。788～789年在这里建立了非斯城。

从非斯较低的山丘上往下看，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的住房随着缓坡里谷地的地势排列着，这些住房的平屋顶构成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立方体。非斯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座城市明显地不是为了外观效果而营建的。它因缺少深景、宽路、滨水区、房屋的立面而引人注目。利奥·阿弗里卡纳斯认为，这个筑垒的城墙和人群值得一提，他1526年在《非洲描述》一书中写道："这就是我们的世界，看看这个城市是多么大，人多么稠密，筑垒与城墙是多么得好。"为欧洲所知的来自非洲的利奥，准确地说是哈桑·瓦赞（卒于1550年），出生于格拉纳达，但在非斯长大。非斯城不仅集中了大量的建筑物，而且聚集了许多人。他们的家，不管是富人家还是穷人家，并非分散于花园之中，也并非半分散于坡地上，而是挤成一团，有三面墙是与邻居共用的，第四面墙又完全同大街隔开。先知说过："穆民确如建筑物的砖块，彼此牢结在一起"②。

166

① 即圆顶寺，亦称岩石清真寺，音译也称萨赫莱清真寺——译者。

② 穆斯塔发·本·穆罕默德艾玛热编：《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译者。



俯瞰非斯城，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城市首先是一个“人口聚集区”。要想生活在这样一群稠密的房屋中，尊重个人的隐私应该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关于通道、围墙、水供应和牲畜饲养等问题的争吵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正如安萨里（参见本章第2节）指出的那样，穆斯林有充分的智慧来管理这种社区并处理与之相关的各种问题。

在大街上，除了大门以外，泥墙绵延不断，且无装饰。从门进去，是弯曲狭窄的小径，在大街上看不见的小径的尽头，显示出风格各异的幽闭的空间。宅院的中央是庭院，三面是走廊，中间有喷泉或水池。庭院铺了地面，柱子支撑的走廊也许会镶嵌着彩陶，并有雕刻或拉毛粉饰的柱头。这是意想不到的幽雅之地和私人生活的庇护所。 168

与这些房子开放的院子相对应的是城市中心对公众开放的公共场所。这就是清真寺。从空中鸟瞰非斯的卡拉维因清真寺，它仿佛是在这个城市迷宫的心脏出现的，宽阔的、安排好的空旷地。非斯有几十座清真寺，但是这里如同穆斯林其他城市一样，在杰米清真寺与地方清真寺之间存在着差别。伊本·赫勒敦写道：“城市的清真寺有两种：大的宽阔的清真寺供节日祈祷，其他小的清真寺限于一部分居民，或是城市的一角使用，不供普遍参加的祈祷使用。”“马斯吉德杰米”，即大的、宽阔的清真寺，是整个城市礼拜的中心。它必须有足够大的空间，以便能够容纳前来聚集的每一个人。一天鸣响5次，呼唤穆斯林做礼拜，这是城市的脉动。在城市的循环系统中，清真寺确实就是心脏。作为社区中心的集合点，它起着与罗马城镇广场或欧洲市场相同的作用，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伊斯兰城市，批准社区聚会的是宗教主导，而不是政治权威或法人团体的权威。

清真寺远不仅仅是礼拜的场所。卡拉维因清真寺直到20世纪依然是非斯最重要的教育机构。它类似开罗的爱资哈尔，也是本城市的学院。从地方《古兰经》学校脱颖而出的学生精英在这里接受高等教育。在这里他们跻身于环绕其所选择的教授的圈子，进入研习伊斯兰学问的王国。由于学生们吸收了他们的教授对《古兰经》与圣训所作的解释，由于他们钻研了伊斯兰科 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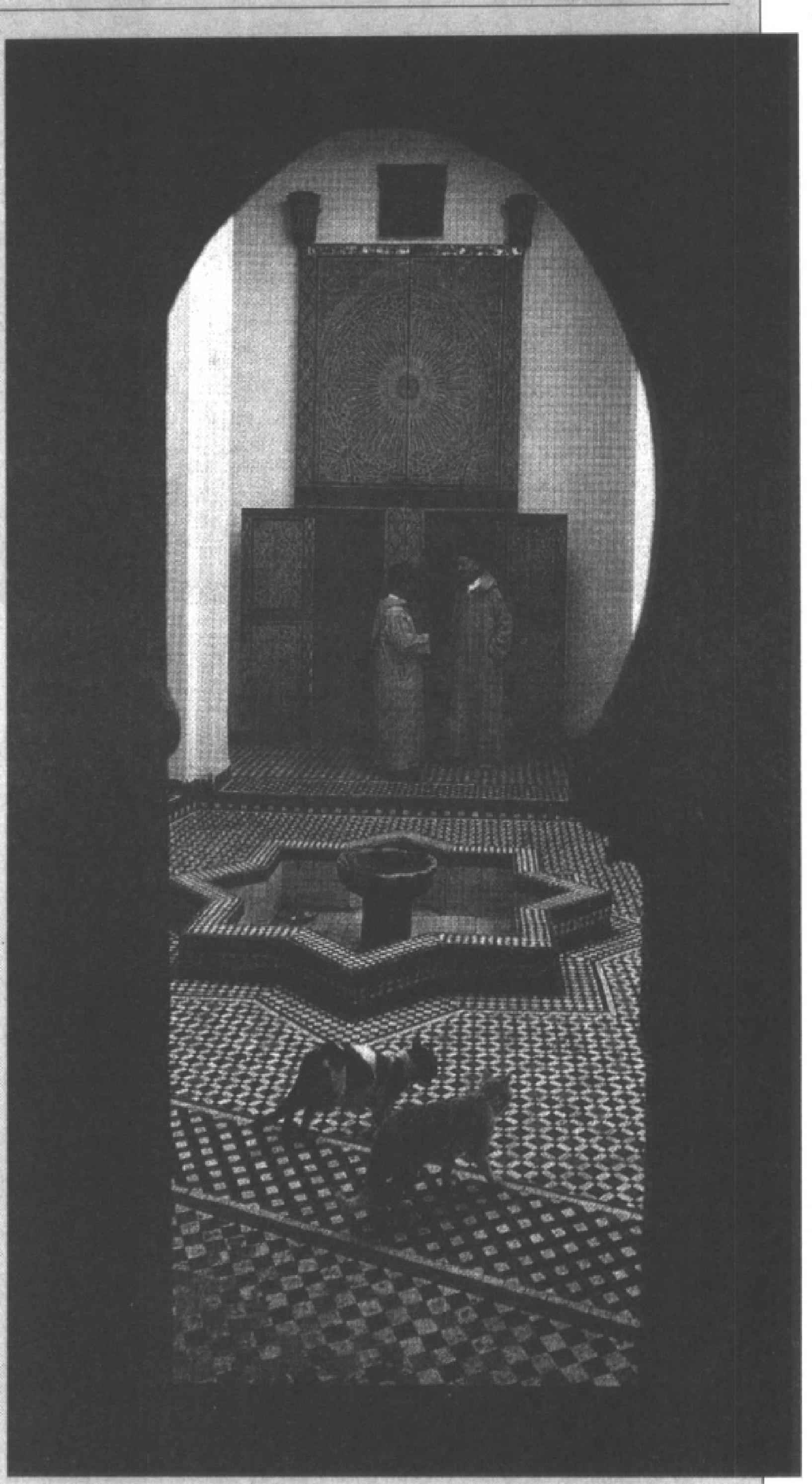
169

房 屋

由于前伊斯兰教时代各种文化、各地的气候、地理环境、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等因素的千差万别，穆斯林世界各地的房屋也是各不相同。然而，他们的房屋在本质上受到了穆斯林世界广泛存在的两大关注的深刻影响：家庭所拥有的免受邻居和政府干扰（在不炫耀不道德行为的前提下）的权利，以及伊斯兰教法律和穆斯林对妇女态度偏好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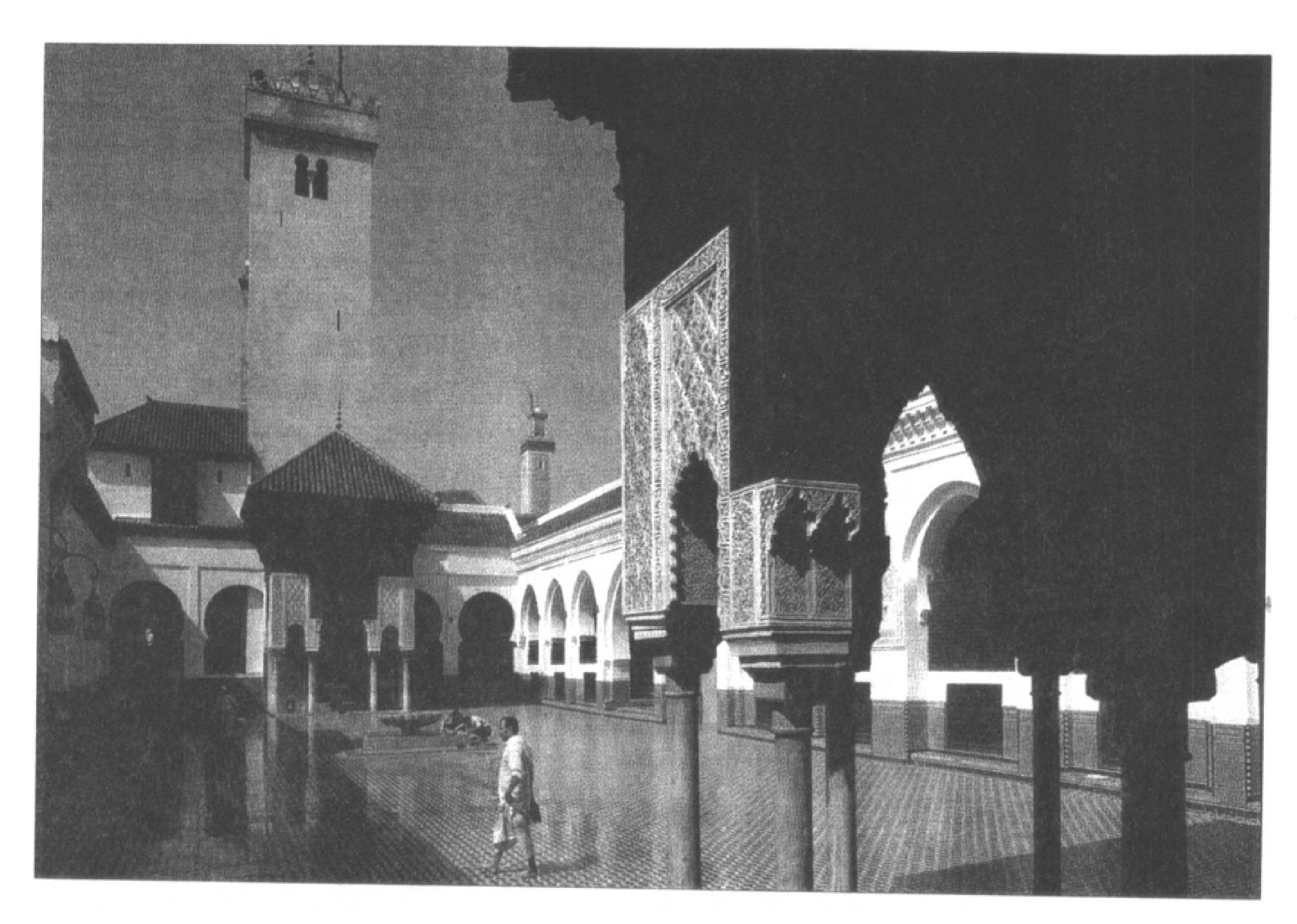
从外表很难猜出非斯房屋的内容。高高的单调的围墙挡住了外面的世界。如果在底层的围墙上开了窗户，那么这些窗户也是比较小的，装了格栅的，同时高得足以防止任何一个路人偷窥。高一层的窗户可能会稍大一些，但是千万不能俯瞰到邻居家的庭院。外在的东西不能对房屋内部的生活有任何显示。而且，智者曾经告诉男人要把他们的女人隐藏起来，以防止邻人窥探的目光；要把他们的珠宝藏匿起来，以防止官员贪婪的刺探。事实上，穆斯林的房屋一般都是内向的。人们花很多精力和钱财购买精美的砖瓦、木材和灰泥用于室内修饰。一家人围绕着一个庭院或几个庭院生活，在庭院里有绿树和繁茂的植物，绿荫下可以乘凉；还有流进水池和喷泉的水——非斯有足够充足的水源供应。

《古兰经》劝诫人们，"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到他人的家去，直到你们请求许可，并向主人祝安"[①]。但是即使当一个穆斯林确实进入了人家的房屋，他也几乎不可能进入男主人客厅以外的其他房间。这个客厅可能用屏风同女人的闺阁（Harem，与 haram 有关，haram 意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隔离开来，女人或许可以透过屏风看到男人们的聚会，或者只能在很远的地方遥望一眼。如果房屋的男主人有一个以上的妻子，那么在闺阁中会为每一个妻子用家具布置出自己独立的、同样大小的房间。通常，房屋的建筑本身就典型地反映出了伊斯兰教的要求。



住宅的中心是庭院。注意本图中用瓷砖铺成的地面，水池及喷泉设施。

① 《古兰经》，第 24 章，第 27 节——译者。



位于非斯城旧城中心的卡拉维因清真大寺的庭院。该清真寺始建于859年（穆拉比特王朝统治时期）①，在10世纪、12世纪和17世纪几经扩建而成，是该城最优秀的学生为准备进入乌里玛行列而接受教育的地方。直至12世纪，它一直是非斯城主要的教育中心。

学和阿拉伯艺术，首先是由于他们对伊斯兰法的要点进行了讨论，所以他们靠近了穆斯林社会有学问和具有巨大影响的决策人物乌里玛的地位。

大部分麦德莱赛坐落在卡拉维因清真寺周围，除了该城西头著名的、受优待的布依南尼亚麦德莱赛以外，非斯麦德莱赛的学生宿舍也比教学机构多。他们都有祈祷大厅，有的甚至还有尖塔，但是这些建筑基本上是另一些设施的对应物，即坐落在清真寺周围来访商人客栈的对应物。利奥·阿弗里卡纳斯估计，这些商人客栈差不多有200家，持续不断的商人潮涌向这些客栈，其所以如此，得益于该城市位于两条重要商路的交叉处：从突尼斯和埃及通往西班牙和大西洋沿岸的东西向长路，以及从廷巴克图王国和上尼日尔到地中海的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商路。他们将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奢侈品带到非斯，其中有来自印度的宝石和檀香木，来自中亚的毛皮，来自也门的熏香，来自海湾的珍珠，来自伊朗的藏红、靓青和地毯，以及来自西非的黄金。他们也把非斯的产品丝绸、线、织品、马具和鞋等运往外地。

卡拉维因清真寺外面的地区是“盖伊萨瑞耶”，即该城的商业中心。这里在狭窄的街道和死胡同中有珠宝店，货物齐全的鞋与皮货市场、香料市场和织品市场。这里还有“丰达克”，即供各种交易的货栈，采取由批发商向零售 171

① 始建于伊德里斯王朝，在穆拉比特王朝时期进行了扩建——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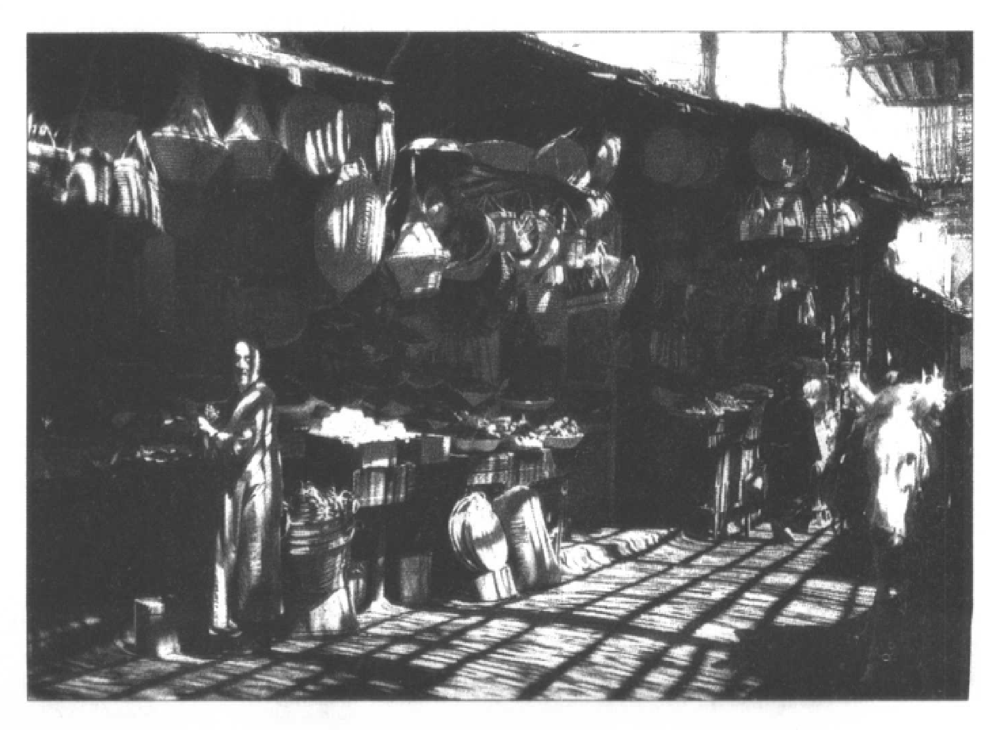
商拍卖的方式销售货物。非斯本地市场销售食品与基本日用品，但“盖伊萨瑞耶”是长途贸易有声望的中心。

无疑，决定该城市位置的是泉水从地面涌出并奔向非斯谷地的这种景观。非斯的发展与繁荣肯定要归于近便、清澈而又丰沛的山泉河水。非斯的技师们利用地势，并通过复杂的水渠系统引导供应，将水送到每一个清真寺、麦德莱赛和“丰达克”，送到街道喷泉和公共澡堂，以及重要住户。甚至还有多余的供水和足够的落差，使冲洗阴沟系统得以有效运转。

但是使水成为该城生命线的还在于它给工农业所提供的机会。对中世纪任何一个城市来说，接近良好的牧场与可耕地是明显的必要条件。在更远的地方，山区牧场提供肉类，橄榄树林提供油，沿海平原提供谷物。增长的要素存在于那些地方。但是为创造财富以实现增长，非斯转向了工业。

无论是英文还是法文，“摩洛哥”这个字都是“皮革”的意思。无论是该城市，还是以这个城市为古代首都的国家，其所以闻名，都是由于它们所生产的产品。自从安达卢西亚的手工业者在流经非斯的这条河的南岸定居下来之后，非斯便一直以它的手工业品而闻名。穆斯林在西班牙的统治摇摇欲坠期间，仍从科尔多瓦、塞维利亚和格拉纳达流入一些难民。他们这些爱好艺术而又勤劳的人民，带来了他们的技艺，赋予这座城市以优美的清真寺、拉毛粉饰和镶嵌工艺。

172 有些行当，比如贵金属加工（这是犹太社团的特长，他们也在1492年被从西班牙赶出）、纺织、皮革精加工等，只需要少量水或者不需要水，因而可以在该城的中心地区经营。但是其他一些行当，比如制陶和磨粉，首先是染色和鞣皮，则需要大量的水。因此它们都坐落在住宅区与商业区的下游，这使城市



非斯城的一个地方集市。这些小店主要出售食品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而紧邻卡拉维因清真大寺的盖伊萨瑞耶则是长途贸易中心。那里有珠宝专卖店、毛皮专卖店和香料专卖店等，还有一些货栈，在那里，批发商把货物批发给零售商。



非斯城的制革厂。这里对各种皮进行鞣制和染色。人们运用油料、矿物质、植物鞣料等制成各种颜色的皮革成品，其中包括红色、棕色、蓝色、橄榄绿、黄色和黑色。摩洛哥人给各种皮革都单独起了名字，正像穆斯林科尔多瓦给“科尔多瓦皮革”[②]所起的名字那样。

计划的范围明显扩大。利奥·阿弗里卡纳斯提到：“染色工在河边有他们自己的住所，每一住所都有最清澈的泉水或水池，用以洗涤他们的丝织品。”鞣皮场也坐落在下游，在大缸、大桶等各种大容器中对皮革进行处理与加工。仅加工即涉及 20 道不同的工序——有很充足的理由采用生产线方式。不过，这些鞣皮场与其说是工厂，不如说是公共作坊，手工业者带着他自己的一队学徒和帮工、自己的工具和材料，租用这里的地方和设备。在一个鞣皮场里，这样的团队，可以有上百个。

在进入现代以前，这些劳动力是怎么组织的，这一直是进行尖锐争论的话题。是不是例如每个鞣皮场所隶属的行业组织，即“行会”进行了这样的组织？无论如何，在非斯，这是重要的机构。它们的名称前头冠以“阿敏”[①]，它们规定每个行业的等级，执行入会制度，解决内部纠纷。每个“行会”都要赞助某些清真寺，并认同苏非派的某些教团。它们还向市场监督官提供每个行业内共同意见以及对行业实践的特别忠告。 173

① 亦译阿门，意为“真诚”——译者。
② 亦译“哥多华皮革制品”——译者。

市场监督官("马赫塔西卜")是公共道德的官方护卫者,因此负有许多责任。他负责要人们遵守星期五的聚礼以及斋戒,也密切注视公共举止,如澡堂与旅馆里的举止,是否符合规定。他关注对儿童、奴隶和动物的人道待遇,也关注街道与清真寺的清洁。但是他的主要职能是市场里的监督者与仲裁者。他控制度量衡,他那刻在非斯"盖伊萨瑞耶"的大理石上的标准腕尺至今仍依稀可见;他检查价格,执行质量管理,惩罚欺诈行为。重要的是,市场监督官的岗位被视为宗教机构。激励他人劝善戒恶是每个信徒基本的宗教义务,由官方履行这一义务是义不容辞的。这是说明伊斯兰如何进入日常生活,并为穆斯林社会提供团结一致意识的一个典型例子。

社区、国家与个人:希斯巴的义务

当我们谈及像穆斯林社会这样的特定社会时,如果我们的意思不是指伊斯兰法已经在可认知的范围内形成了它的社会制度(例如,结婚或继承安排这类事情也都打上了它的独特的印记),那就没有太多的含义。沙里亚是社会道德方面的理想的制度,这一社会道德一直推动着社会的塑造。但是它并不仅仅是立法律例的总和,因为它体现的是特定的总体看法或态度,它把真主赐予的真理应该指导个人的生活这种"必然",同下述这种"理解"结合起来了:即正确的举止首先依赖于个人的自觉和顺从需要。毫无疑义,沙里亚强调的是个人,依阿伯特·侯兰尼的话就是:"重点在于个人以其自己的方式在今世与来世寻求这些货品的自由,和随意加以处置的自由。"这一中世纪共同体对直接的高压统治的危险,或国家卷入宗教事务的危险是十分敏感的。同时它的合乎道德的统治坚定地遵循原则,并且明显地倾向于宽恕人的弱点和多样性。关键的注解是适度,或平衡,即中间道路,安萨里(1056~1111年)完全认同《古兰经》的"正道"。

当11世纪最后10年安萨里撰写他的《宗教学科的复兴》的时候,他已经在好几个重要城市里呆过,其中包括巴格达、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他的非凡的著作是最有影响的伊斯兰文献之一。他在书中用了一章的篇幅谴责触犯教法的行为,他说在街道、清真寺、市场、公共澡堂和私宅,这些触犯行为是司空见惯的。在这里可以很好地了解乌里玛居主导地位的态度以及沙里亚的主导地位。

174

在街道的触犯教法行为包括:在住宅加上伸出的阳台,或店铺摆出长凳等侵占公共地盘的行为;在街道上堆放大量木材与粮食等供应品阻碍交通(只允许堆放家庭消费所需数量的物资);在肉店外头屠宰牲畜,动物血污染了道路;在街上泼水,致使路滑,走路易发生危险;骑乘用牲畜,除上下牲畜所需的时间之外,拴在路边,阻塞、并以牲畜粪便污染道路;将装载有能刺破路

人衣服的锋利物品的驮畜牵入较窄的街道（如果可能，应使用较宽的大街）；成群的青少年男孩在妇女公共澡堂的外面闲逛，向进出澡堂的妇女送秋波。安萨里解释说，这类行为毁坏了公共的利益，大街本来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行人理所当然有权不受阻碍地做他们的事情，衣服也不能被撕破或是被弄脏。出于公共健康与安全的原因，但也出于审美的原因，大街不能有垃圾。他直截了当地说："憎恶污秽是人的本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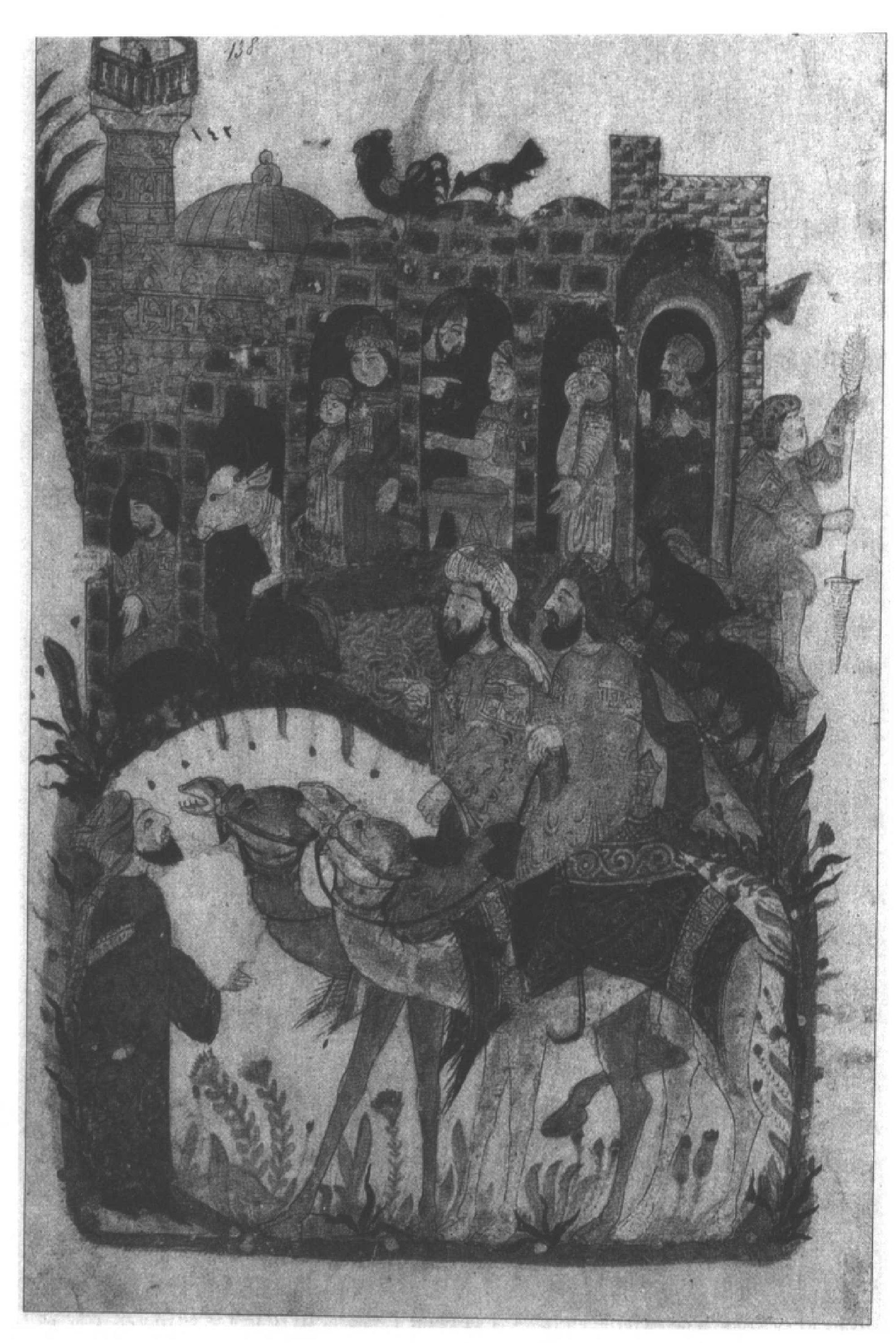
安萨里严厉批评做宗教礼拜仪式时的夸张或过分热切的举动，也严厉批评穆安津[1]加大和加长呼唤做礼拜的声音，或是在别的什么人没呼唤完的时候便开始呼唤。他说，此类热情过度会生出不和谐的刺耳的声音，这只能使在场的穆斯林感到慌乱。他把黎明时分同一个清真寺反复呼唤做礼拜的习俗称之为不管用的令人讨厌的事情，因为听觉所及的范围内的人不会在第一次呼唤之后即已放弃睡眠起床。还有许多做礼拜者因身着按仪式来说是不洁的服装，做礼拜的朝向不对，或未能正确引用《古兰经》里的话，而干扰了清真寺中别人的注意力。最后这种情况广泛存在，安萨里强调教人们正确引用《古兰经》的意义。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有礼貌地请求他们把声音放低一些。

尤其是星期五，清真寺内外挤满了叫卖药品、食品和护身符的商贩。江湖庸医与魔术般护身符的售卖者都是一些骗子，在清真寺内外应予以取缔。但是允许商人在清真寺内售卖服装、药品、书籍和食品则没有什么不对，只要他们不打扰礼拜或是把清真寺变成天天都有的市场。与此相类似，欢迎儿童前来及在清真寺内玩耍，但是不能把清真寺变成固定的游戏场所。精神病患者也应受到欢迎，但他们不能大声喧嚣，说猥亵的话，或裸露自己的身体。同样，醉酒者如果不呕吐，或未寻衅和无理取闹也可以呆在这里。安萨里反对那些想打他们和把他们赶走的人：他宁愿请醉汉留下来，直到他们清醒到能听取戒酒的忠告。但是他支持惩罚在公共场所东摇西晃的酒鬼，首要的 [175] 是制止这种罪恶的招摇。但是对秘密的触犯者不能追究，因为暗中侦察人们在他们自己家里的隐私是比酗酒更为严重的触犯。

对于触犯律例的讨论是安萨里对"希斯巴"非常宝贵的分析的一部分，"希斯巴"指的是每个穆斯林劝善戒恶这一首要职责。市场监督官的职责被设想为这一普遍职责的专门化，"马赫塔西卜"就是指执行"希斯巴"的人。对 [176] 安萨里来说，"希斯巴"的职责"是本宗教的主要支点，也是真主派遣其使者的崇高目的"。在他的下列论点中存在许多危险，即"希斯巴"是每个信徒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与义务，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自由民还是奴隶，是正直的人或者甚至是固执的罪人（"法希戈"）。只有精神病患者、未成年人、残

① 指清真寺按时呼唤穆斯林做礼拜的人——译者。

13世纪的旅行者到达一个小城镇。这一通过人性和幽默的视角展现出来的画面，让我们能够切实感受到当时都市生活的场景。当然，有清真寺和寺院的尖塔，同时还有一些鸡站在圆形的屋顶上（那里好像是集市）。一个妇女坐在城门外纺织，而站在城门口的卫兵则手持长矛。一对男女似乎正在争吵什么，各种动物自由自在地溜达着，旅行者受到了友好的接待。所有人的衣服，包括骆驼的鞍布，都装饰着一种被称为提拉子(tiraz)的布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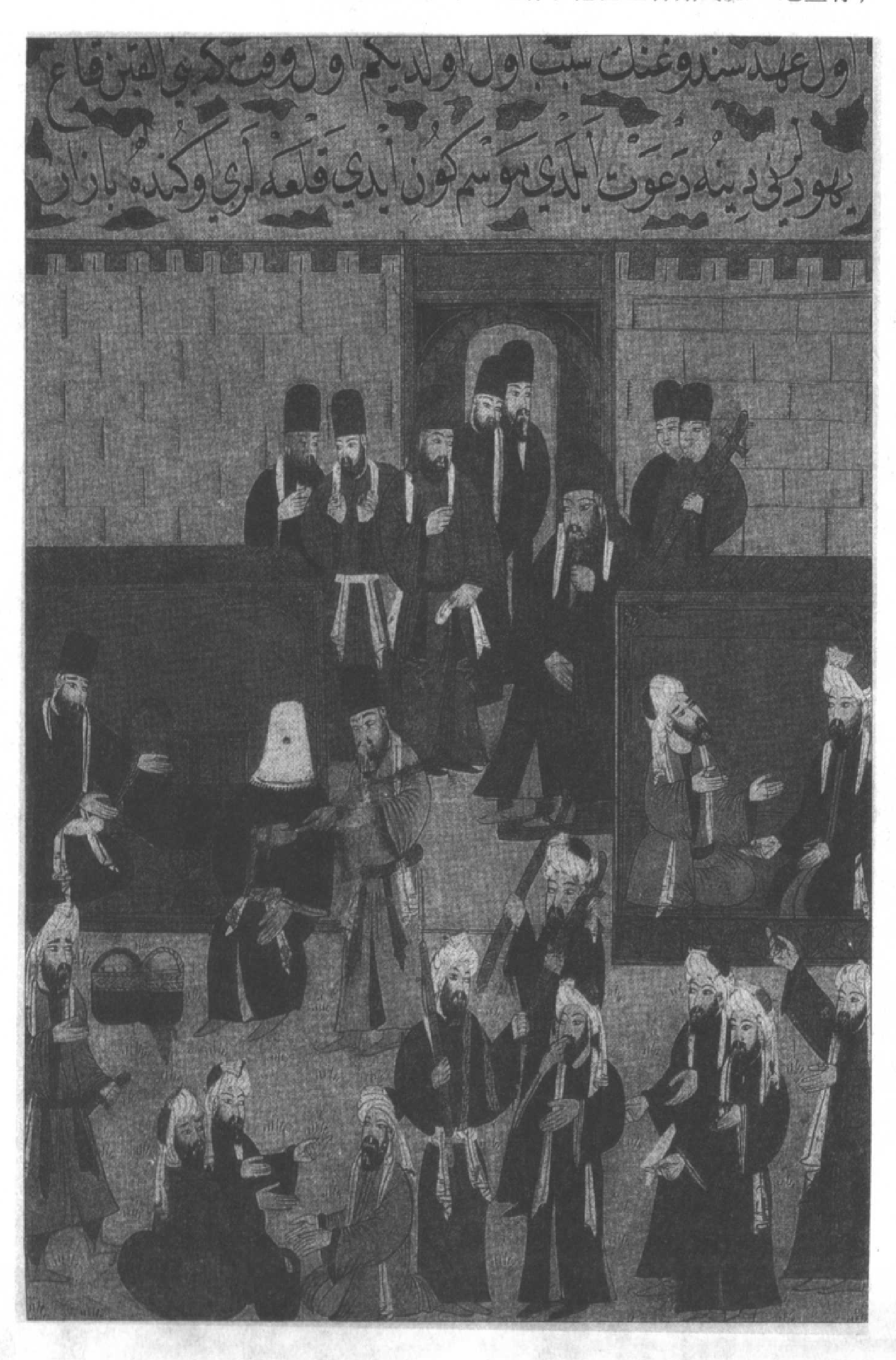


疾人和异教徒可予以免除或排除在外。他明确地拒绝下述相反的观点，即除非得到统治者（伊玛目、卧里[1]）的许可，个人无“希斯巴”之权利，他说在宗教资料中找不到这种说法的依据，这些资料教导说每一个信徒都应无条件地履行反对邪恶的责任，他或是她无需从任何其他人那里得到允许。

在穆斯林新生政体最初的两个世纪里，曾经历过严酷的斗争，以决定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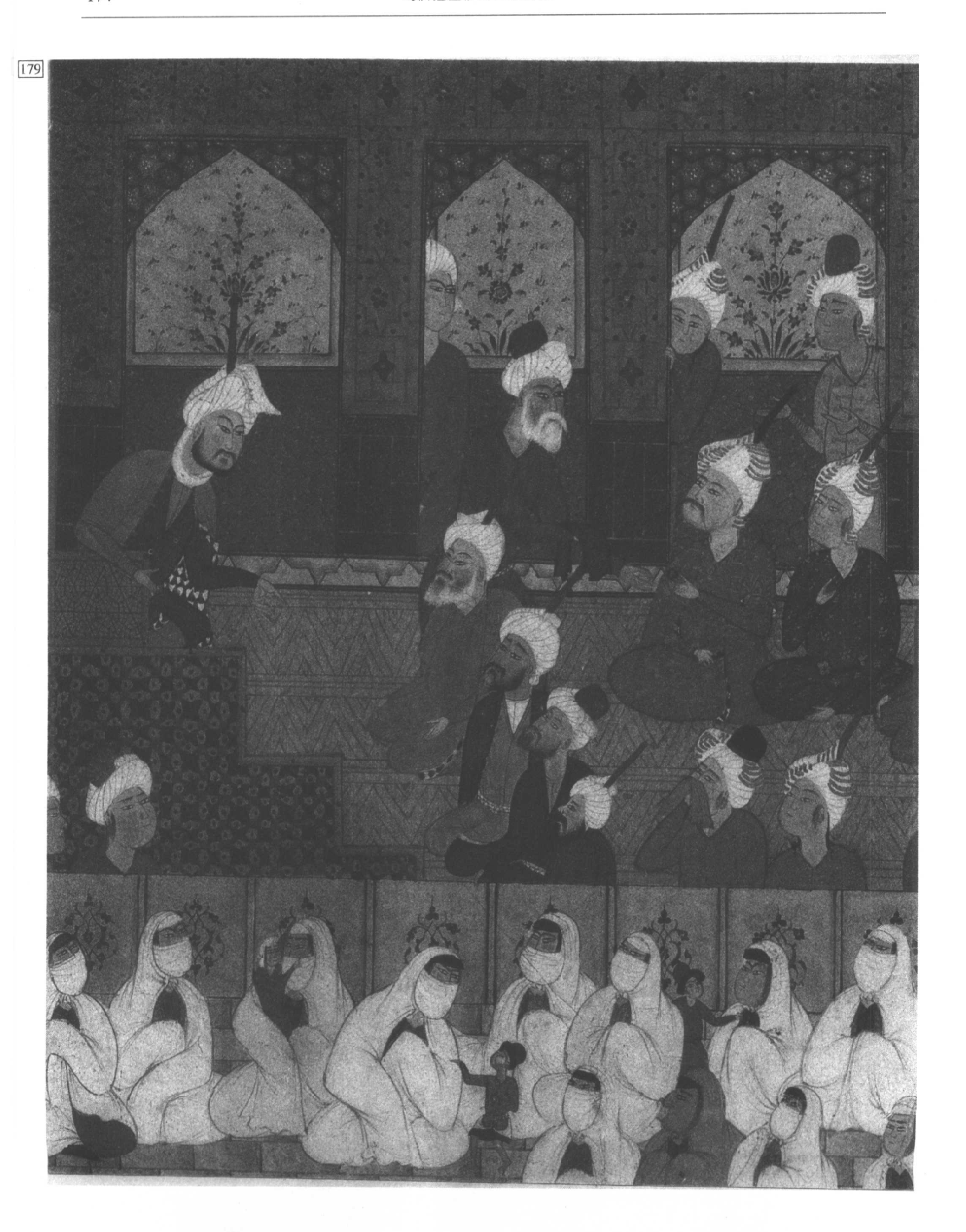
① 安拉的朋友与代理人——译者。

竟是谁对法和立法问题拥有主要的权力：是哈里发，还是乌里玛。到9世纪上半叶，这一冲突有了对乌里玛有利的结果，到安萨里那个时代，明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有很久了。马蒙哈里发（813～833年在位）曾给这场冲突定过调，他决定建立哈里发对宗教教义问题上最高的、独一无二的权威。马蒙也许过迟才绝望地意识到，没有对所有事务（包括宗教事务和尘世间的事务）公认的最高权威，这个哈里发国家难以生存。他甚至曾始终如一地宣称，



这一出自16世纪奥斯曼手稿的集市场景描绘了正在工作的市场监督官（muhtasibs，马赫塔西卜）。集市正在进行中，小贩高声叫卖他们的商品，男人们在讨价还价，一位妇女正商谈着卖掉或买进一只手镯。市场监督官是那些握有剑鞘的男子。

179



哈里发可以决定谁有资格传播圣训，谁没有资格传播圣训。有些自封的宗教领袖宣称能够对是非作出正确仲裁的公断人是他们，而不是哈里发。到他的统治的晚期，为了使那些自封的宗教领袖们屈服，他建立了对他们进行异端审判的制度（“米哈奈”）。

这些宗教领袖坚持说，《古兰经》与逊奈高于哈里发；对经训神圣命令的忠诚，应取代其他所有的忠诚；穆斯林共同体本身（经过自己的专家）负责解释这些命令；最后，不遵循，因而也不理解伊斯兰的哈里发不能命令共同体服从。十分有意义的是，作为被审判对象的乌里玛，在劝善的旗号下，发动首都巴格达市民共同体起而反对哈里发。他们提出要求的根据恰恰就是：他们代表所有信徒个人所组成的共同体。

马蒙下令对宗教领袖进行异端审判这一戏剧性事件，使他早些时候较为微妙的控制“希斯巴”革命潜能的策略黯然失色。是他发明了“马赫塔西卜”这一国家官职，把这个头衔加到古代市场监督官的职位上，并声称只有由他任命的“马赫塔西卜”才有资格“劝善戒恶”。对于拥有权力的人来说，有一种可以理解的需要，即软化“希斯巴”的革命潜能，而作为一种精确限定的工作将它委托给政府任命的官员也证明是成功的；它普及于伊斯兰世界每一个城市。然而很难超出作为市场监督官的“马赫塔西卜”的层面，去了解“希斯巴”的原初概念以及它深刻的“体制”上的含义。

两个世纪之后，有关伊斯兰政治思想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马沃尔迪（卒 177 于1058年）的《素丹律例》肯定了“马赫塔西卜”作为城市官员所取得的成功。然而晚一代的安萨里则根本就没有提到过这一官员，而是如往常一样，直奔原初问题的核心。他因列举一些事例的无情后果而引发了重大的体制斗争，在这些事例中，早先的乌里玛履行英雄般的“希斯巴”，说出了一些最具煽动性的政治话语（“在地狱里有一个叫做‘哈卜哈卜’的谷地，那是真主专门给 178 每一个残暴的伊玛目准备的”），这些话语的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伊斯兰历史上所有的哈里发的：从伍麦叶到马蒙。他对这一情况做了精彩的总结：“如果说伊玛目因进行压迫而受到指责是对的，那么请求他的允许怎么能是正确的呢？……如果当某个人实践‘劝善’时，卧里批准说就那样吧；而如果他要不高兴呢，那么他的不高兴就成了必须予以谴责的罪过了。”

有这样一个事例：一个自封的市场监督官被拖到马蒙面前，马蒙对他说：“当真主把劝善戒恶的权利委托给我们的时候……我听说你认为你自己能胜任‘劝善戒恶’，而无需经过我们的许可。”这个人回答说：“世界的统治权已经赋予给你，但是这里有《古兰经》和先知的榜样。如果你服从它们，你要向那些帮助你保护其尊严的人表示感谢。”另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刚刚捣毁穆塔迪德哈里发一整船最好的酒，他被带到哈里发面前，哈里发问：“你是谁？”答曰：“市场监督官。”哈里发问：“谁委任你执行‘希斯巴’？”答曰：“是委任你做伊玛

第174页图：一位统治者和他的随从出席一次清真寺活动。这幅图画的原稿来自16世纪的伊朗。清真寺是居民共同体聚集的重要场所，在那里，要求穆斯林们在做事时对别人都要给予应有的尊重。值得注意的是，坐在一个隔离空间中的那些妇女。在伊斯兰教早期，妇女有权到清真寺去祈祷。但后来，所有穆斯林社会中的妇女都不再拥有这样的权利。

目者委任我执行‘希斯巴’。”

哈里发的权威受到质疑，无法让他的直接继承者们长时间地规避灭亡。与此同时，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们继续狂热的搜寻，以便给他们的权力找到稳固的基础。穆尔台绥姆(833~842年在位)哈里发作出重大决定，将巴格达的居民迁往他决心在萨迈拉建立的新首都，同时在伊斯兰世界的边界以外的突厥奴隶中招募军队，这标志着这个国家对伊斯兰社会的致命疏离，并对这种疏离产生了重大作用。伊本·哈兹木(卒于1063年)以11世纪西班牙的眼光进行写作，对穆尔台绥姆政策的重要性毫不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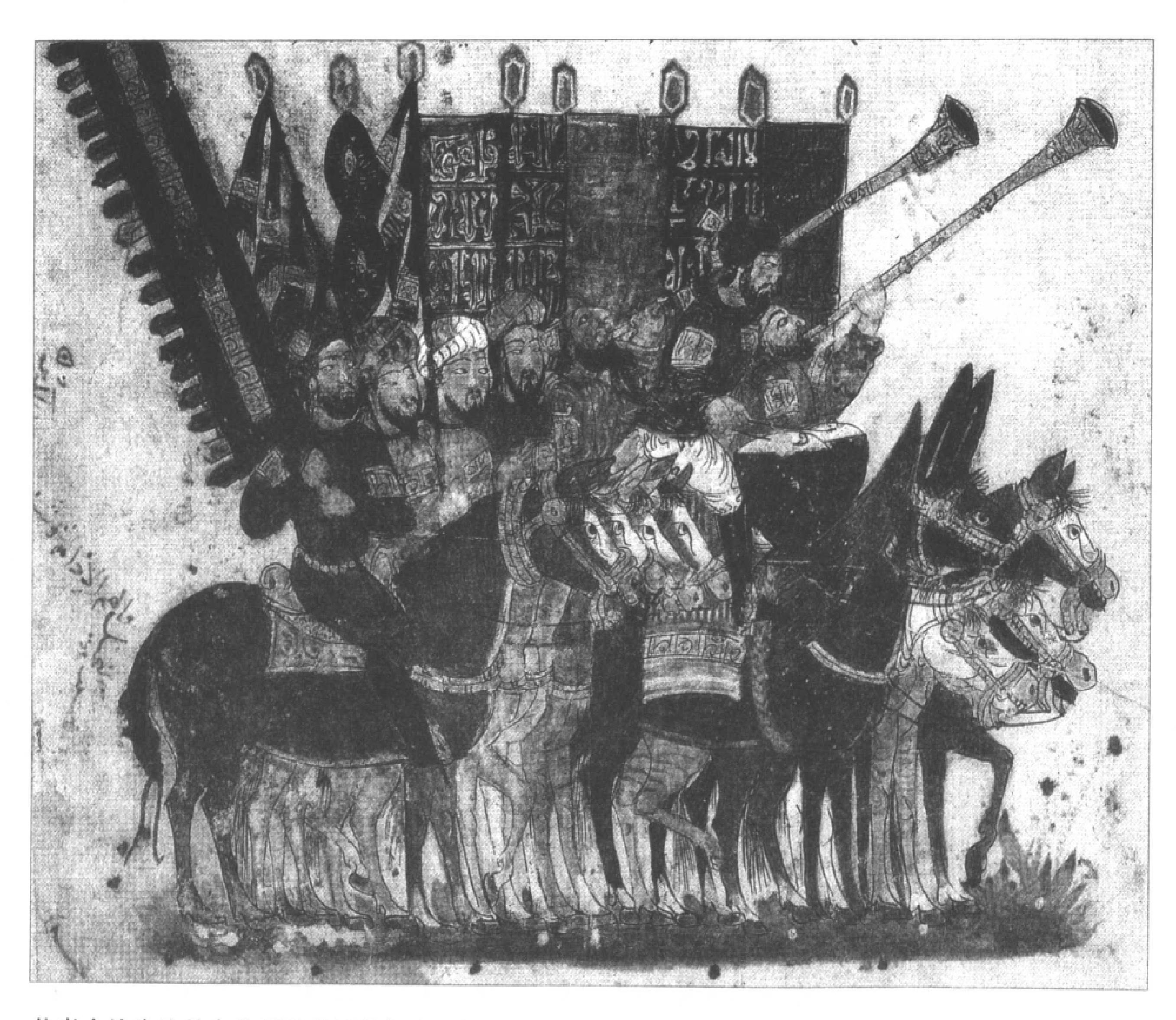
“穆尔台绥姆继他哥哥马蒙之后成为哈里发：他离开巴格达，以萨迈拉为首都；他降低呼罗珊人的地位，降低他父亲的军队的地位；他从突厥人那里寻找力量，他引进突厥人并编为军队。从那时起，这个伊斯兰国家日见式微，腐化之柱开始树起。”

突厥军队以及突厥将领被引进中东后，突厥将领不久就成了实际上的统治者。在11世纪中叶，这种引进由于大量说突厥语的游牧民的移入而增多。这些人以及他们留在中亚的堂表兄弟组成令人生畏的军事阶层，在进入现代以前，他们控制着中东大多数政府。

当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们丧失对这个伊斯兰帝国广大省份的实际控制的时候，对中央政府能保存乌玛的所有指望都宣告破灭；这个共同体开始主要依赖于它自身的资源。恰在此时，统一的穆斯林帝国分解为一些单独的政治单位，公民共同体本身尽管在政治上分崩离析、没有政治保护，但仍然建立[180]起传统的伊斯兰社会：它拥有伊斯兰社会所规定的全部机构，从教法学派到苏非派教团，一应俱全。各种类型的自我选择的兄弟会同时在11世纪开始出现。不管是宗教性的兄弟会还是像青年帮那样的半军事性集团，都不能理解为全社会性的组织，除非我们把它们也看做是一样的。

自此以后，乌玛建立在忠于宗教学者所规定的原则的基础上，它独立于国家。它希望政府坚持法与真理，但不要限定其内容。而是将这一基本的立法职能留给共同体自己，在穆斯林国家的心脏留下明显的空洞，在未来的世纪里缩小了国家的权力。如我们所说，中世纪穆斯林认为，穆斯林城市具有两个焦点：星期五聚礼清真寺与市场。它很能说明穆斯林对政体的这种看法：他们惹人注目地不把宫廷或政府机构列为城市的必要因素。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认为，政府是外部力量，个人生活领域要与之保持疏远。由于存在不安[181]全感，致使人们更加有力地强调社会生活中关系较为紧密的一些领域，转向住区、邻居、小集团、家庭和对个人的忠诚。

安萨里通过对“希斯巴”的论述，想同时做两件事情。其一是坚持“希斯巴”是个人的权利，无需经过国家允许，它是现存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其二是通过对“希斯巴”作出规定，对狂热者可能会误解的事情做一些限制（这些狂



穆斯林共同体每年欢庆的重大节日之一是斋月(Ramadan)的结束，即开斋节。这一天，穆斯林将身着新装，聚集到清真寺（许多清真寺都拥挤不堪），表达和分享他们混合着欣慰、愉悦和成就感的感情。本图所示的是一队人马前来参加庆祝。请注意他们旗帜上的宗教文辞。

热者会认为这是在公开地邀请他们去寻找和消除任何他们认为属于触犯律例的事情)，以保护个人的权利和避免社区冲突。第二个考量宽容地未将矛头指向国家本身，但指向了任何会侵犯个人隐私与良心的机构。安萨里在这里格外关心居民社区及其沙里亚的护卫者不要违法。因为他不希望他的论点，即“希斯巴”是个人的权利，被人曲解为只有“好”穆斯林才有权实践“希斯巴”。他公开拒绝将道德完善作为先决条件。那些要求以此为先决条件的人曾经问过道德败坏的人怎么能改造别人。(“如果棍是弯的，影子怎么会是直的呢？”)他认为他们的论点没有根据而予以拒绝：

“应当要求市场监督官不能有过失吗？这种先决条件会和社区‘公议’的一致意见相抵触，而且会终止‘希斯巴’的可能性，因为即使是先知的同伴都不会没有过失，何况是地位低的人呢，至于先知们自己——愿他们安息——是否能一直避免过失，仍存在不同看法。《古兰经》本身即将阿丹——愿他安息——及其他先知们与过失联系起来。这就是赛义德·伊本·朱拜尔之所

以这么说的原因：‘如果除了没有过错的人以外谁都不能指挥对的、控制错的，那么一个人就永远都指挥、控制不了任何事情。’”

一个有因饮酒或私通而犯有过失，甚至是累累犯有过失的穆斯林，仍然有义务制止别人做坏事。他的义务并不因他自己触犯律例而被取消。又是安萨里绝对坦率地说道：“穆斯林军队里从来都是既有好兵，也有饮酒或压迫寡妇那样不好的兵，但是无论是在先知那个时代，还是在那以后，都没有拒绝这些不好的兵去(为伊斯兰事业)战斗。”

所以，“希斯巴”的确是作为信士的穆斯林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同时这也是他或她最重要的宗教义务与居民义务。安萨里对忽视这一责任会产生的后果提出警告：这会破坏预言与宗教，使国家与社会遭到毁灭。如果说这是“启示”所强调的，那么他打算限制适用“希斯巴”的范围也是非凡的，这是出于对穆斯林个人权利的尊重以及对社区冲突的担忧。在一个分为两个宗教集团的城市，强迫实行正确信仰的任何尝试都会导致内战。一般来说，他 [182] 对这样的可能性感到烦恼：“支持者的聚集以及武器的挥舞会激起广泛的社区冲突。”于是他很直截了当地界定了“希斯巴”的目标。触犯律例的行为须由所有正统的法理学家毫无疑义地认定是应当予以反对的；对穆斯林不同意的事项不得干预。沙斐仪派的穆斯林无权反对哈乃斐(即哈尼法派)做该教法学派允许做的事情——喝“不会喝醉的”酒、在法定监护人未到场的情况下结婚等。这实际上把目标局限于诸如饮酒、私通、吃猪肉、不做祈祷等最普通的过失上。

而且，这种需要干预的过失须是“进行中”的过失。事后干预，例如干预已经喝完了酒的人，是不合法的；事前干预也不合法。最后一点，也是关键的一点，过失须是“公开”犯的。安萨里对“希斯巴”的论述中，最确定不移的特点是反复强调：寻找做坏事的证据是不合法的。任何人都无权侦察某个人的家庭，以发现被禁止的音乐和酒；只有在外界公共场所听到吵吵嚷嚷的声音或闻到呛鼻的酒味时才能进行干预。向人们打听他们邻居的行为同样也是不合法的。他赞同地引用聪颖的鲁格曼(古代阿拉伯半岛的贤人，《古兰经》第31章以此命名)的话：“对你所知道之事保持缄默比传播你纯粹是怀疑之事要好。”

不经居住者允许擅自进入别人家庭亦属非法。安萨里举了一个涉及第二位哈里发欧麦尔的生动例子，他爬过一个人家的墙头，发现这个人有酒和一个正在做禁止之事的女子。欧麦尔劝告他，他则对这位哈里发说：“就算我犯了一个过失，但是你犯了三个过失：真主说‘不要侦察’，而你侦察了；真主说进入房子要从门进，而你从房顶进入；真主说‘你们不要进他人的家去，直到你们请求许可，并向主人祝安’(《古兰经》第24章27节)，而你没有照着做。”

“希斯巴”只适用于公开犯的过失:“私下犯过失损害的仅是犯过失者;只有在公开犯过失而又未被制止时，才会损害一般公众”。但即使是对公开犯过失者也要格外仔细。街道上一个声名狼藉的酒鬼形迹可疑,衣服里像是藏着个酒瓶子,但即使是对这样的人也不允许拘押。他名声不好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正携带被禁的物质,因为即使是犯过失者也绝对需要像油或醋这样合法的东西。干预所需要的是显而易见的、主动提供的直接证据。市场监督官不能要求检查掩藏的瓶子,因为那属于明确禁止的侦察、调查。

马蒙进行的异端审判是对隐私和个人良心的大规模侵犯。在其布下的罗网里被捕的人都要被迫经受审问,这个审问不仅会决定他们生存的机会与生活的情况,而且会决定他们作为乌里玛成员的真正地位。这个异端审判失 [184] 败了,但是它在传统伊斯兰中产生了长久的影响:主流乌里玛中没有任何集团还想利用国家强化信仰。这是个经久不衰的教训,它说明侦察私人生活所产生的危险。15世纪末开罗苏尤蒂(卒于1505年)甚至谴责说,“问同伴:你到哪去了?你现在上哪去?成为某些人(令人厌恶)的新习惯”,因为这像侦察一样。

安萨里在对干预的探讨中强化了他提出的种种限制。“希斯巴”影响着生存权利、个人尊严、隐私、私人财产与社会和平等方面。侵犯这些价值的干预是不合法的。干预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程序,有8个阶段,他以高度的谨慎对这8个阶段加以区分。从一个阶段难得提升到下一个阶段,除非绝对需要。

干预的这8个阶段分为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组。前4个阶段靠道德说教,后4个阶段靠强制。跨过同“强制”隔开的“说服教育”这条线是很困难的,因此需要作出重要的限定。身体强制只对某些触犯律例者实施。属于口与心之事,以及各种心灵中的触犯者,只能进行道德上的规劝。重要的是,对一个人的长者不得使用武力。市场监督官对自己的父亲、教师或统治者不得使用武力，因为那样会损害社会秩序与社会和平。我们回想起安萨里曾雄辩论证:即使是累犯过失者也完全有权利实践“希斯巴”。他在这里承认,在道德干预中道德上的完善是必需的，因为如果市场监督官有众所周知的坏名声，那么他干预的效果会受到损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包含有武力的“希斯巴”不需要有这个“道德完善”的条件,一个犯过失者也有责任实践它:“难道饮酒的某个人就一直不该去制止谋杀吗？”

如果市场监督官能够说服触犯者自愿走开,则不允许他拖或拽触犯者。如果能够说服触犯者自己把酒倒掉,市场监督官就不应该自己动手。他应该避免打破酒壶。这是合法的私人财产，如果被市场监督官并非必要地破坏了，那么市场监督官可能要支付赔偿金。在脱去丝绸服装时，他只能解开缝口,而不准撕开!

而且,只有在一个人能够制服触犯者而不受严重伤害时,“希斯巴”才有

183



效。如果他或她担心受到报复，则没有进行干预的义务，如果一个人的朋友、伙伴或亲属有可能受到报复，那么实际上也禁止这个人去进行干预。还有一些禁止实践“希斯巴”的情况。例如，《古兰经》谴责自杀，这意味着对这样的恶棍完全没有进行干预的环境：这个恶棍一手拿着一杯酒，另一只手拿着剑（安萨里对政府军人的形象化比喻），因为这个恶棍会砍掉市场监督官的头，并喝掉手中的酒。但实行自我保护的原则并非禁止一切会导致死亡的行动。如果能确实阻止触犯律例的行为或能提升信士的道德水准，英雄“希斯巴”也是合法的，否则，冒死的危险去进行干预是无意义的，也是被禁止的。如果制止触犯者会直接导致某种更糟的事情，那么这种干预也是被禁止的。

第180页图：穆斯林的生活以敬重死者而闻名。墓地成了都市世界的一大特色。在这里，市民们可以进行朝觐、庆祝节日、举行集会或野炊。在大的墓区有一组建筑群，其中可能有饭店、医院、图书馆和免费厨房，这是王公贵族为显示他们对宗教的虔诚而建造的。现今留存的著名公墓中，以开罗的墓园和撒马尔罕的谢赫·静达陵墓最为有名。本图是来自13世纪阿拉伯手稿中的一幅葬礼图。注意，大墓的顶是圆形的，这是这些地方的典型特征，就像还有树木和猫一样。

185

干预的8个阶段是：(1)认定：触犯行为须是明确的公开违反伊斯兰法的行为。(2)教育：有时一个人做错事纯粹出于无知。(3)劝告：一个累犯者知道例如像嗜酒这样的行为是被禁止的，应该耐心地有礼貌地进行劝告。(4)训斥：耐心劝告失败时，市场监督官可以说非难时使用的糙话，但要避免夸大其词和说诲淫的话。

下一个阶段(5)是专门针对过失本身而不是犯过失者的，但它标志着将说服教育与强制隔开的临界线：如果强硬的训斥没有奏效，市场监督官可直接行动以制止被禁止的行为，或破坏被禁止的物质，例如可以把酒倒掉。(6)威胁：在对触犯者个人实际使用任何武力之前，须先进行武力威胁，但不得包括不可能的或不合法的威胁，比如说，“我要抢劫你们的家，或我要打你的孩子，或我要奴役你的妻子”。(7)强制：必要时允许有限制地使用武力，首先是限于徒手，而且限于制止触犯律例行为所必需的最低程度的武力。

“希斯巴”的最高阶段(8)要求在市场监督官不能单独履行职责时，配备武器与助手。在这种情况下，触犯律例者也可能集合帮手，可能会组成两个武装集团相互对峙，最终会爆发街头格斗。这是“希斯巴”问题最多的阶段，安萨里对此颇为不安。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给另一种意见提供了更有力的论据，即认为穆斯林个人无权在未获准的情况下实践“希斯巴”。但是对街头格斗危险极其敏感的安萨里仍然坚持，不应让这种危险损害“希斯巴”是个人绝对权利这一原则。他的解决办法是将干预严格限制在几种有象征性的事情（饮酒、私通、不做祈祷）上，这些对律例的公开违反会侵害整个共同体，干预成为在共同体内坚持伊斯兰法之所必需。这样，安萨里承认，如因试图制止普通的触犯者而引发骚动就会产生危险；所以这更加说明：他显然不愿意冒发生派别冲突的危险，这种冲突有可能随着对不同宗教的教徒或异教徒实施“希斯巴”而发生。这是他把单个信士的“希斯巴”绝对权利加以限制的惟一的也是必然出现的情况。

起初，安萨里是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一问题的：反对哈乃斐（哈尼发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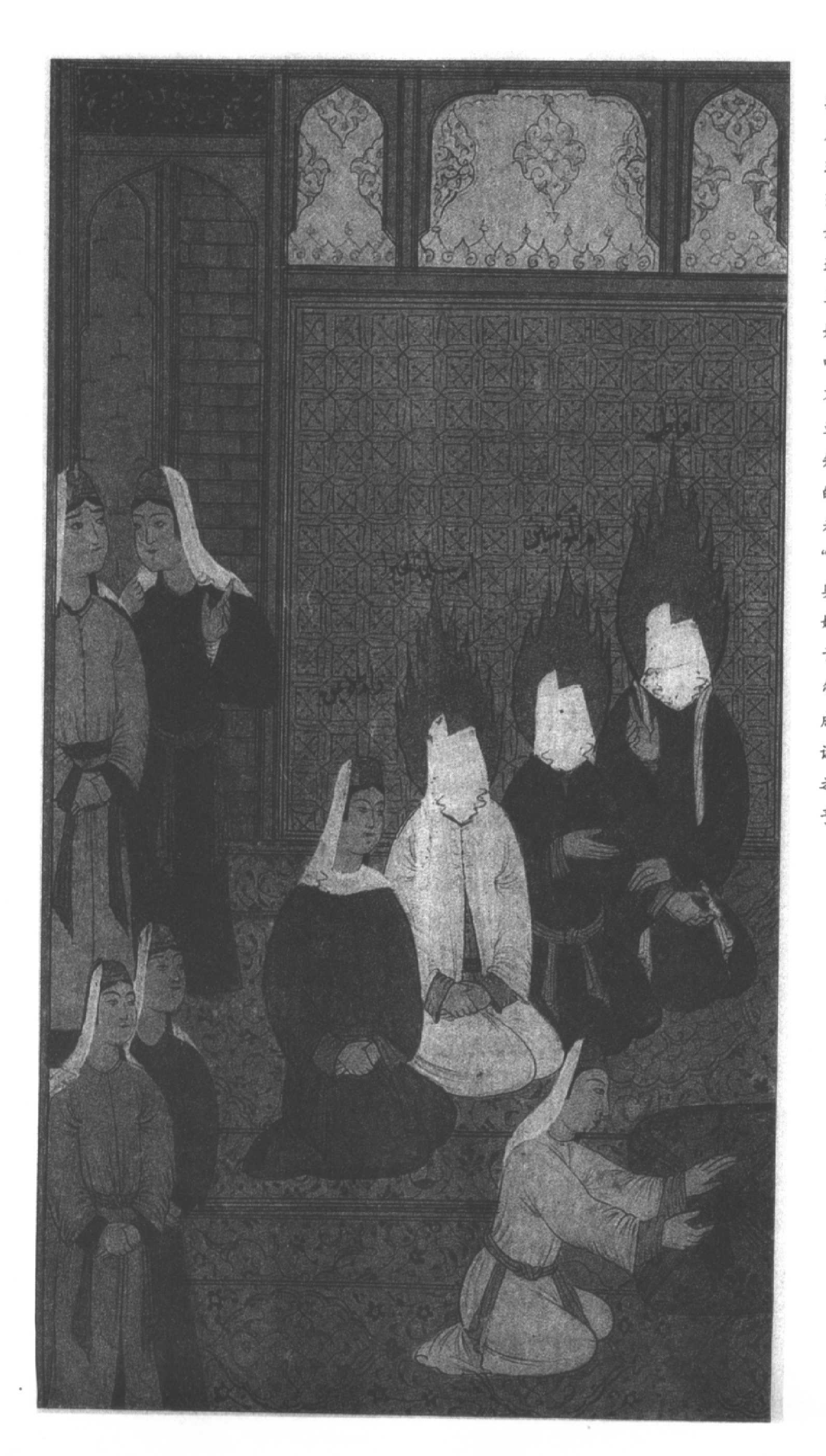
原因是由于哈乃斐同意在法定监护人未到场的情况下结婚，哈乃斐之所以如 [186] 此仅仅是由于它认为这么做是对的。如果说，制止反对哈乃斐是正确的，那么，一个人类似地制止反对穆尔太齐赖派（它宣称：真主是无法看到的；或者从真主传下的只有善，而不是恶；或者《古兰经》是被创造的），制止反对说只能使灵魂而不能使肉体复活的哲学家，制止反对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错误观点，难道就不应该了吗？首先，他们太相信他们是正确的了。安萨里对差别的两种类型做了基本的区分。穆斯林关于哪些行动是允许的或哪些行动是禁止的所存在的不同意见，是同等合法的，因为这是些细节问题；但是在本宗教信仰的基本条款上是不能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的。

所以，原则上，"希斯巴"反对异教徒的责任是明确的。但是安萨里的主要论点是：实行这一条也许不太可能，乃至是不需要的。一个人必须考虑本城市的条件：如果居民分为传统信士与异教徒，那么谴责异教徒有可能激起社区冲突，因而为了和平，应禁止穆斯林个人卷入。安萨里很理解产生困难的根源："异教徒认为他是对的，认为有正确信仰的人是错的；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对的，都否认自己是异教徒。"只有统治者能够动用可以维持居民和平的那种占绝对优势的力量来完成这一任务（但是政府应在服从乌里玛的看法的前提下，履行抑制异教徒的职责，乌里玛以社区的名义确定，谁被认为是传统信士，谁被认为不是）。个人为了同异教徒战斗需要得到许可的这一要求，是安萨里累加约束的最突出的一点，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社会不因轻易适用"希斯巴"而受到影响。穆斯林在混合社会（除了阿拉伯半岛的腹地，所有的穆斯林社会都是混合社会）中必须控制"希斯巴"的实施，以避免宗派暴力行为与内战。

"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也要实现社会和平"，这是中世纪后期穆斯林社会的指导原则。城市乌里玛和显贵中的精英们宣布了有条件接受任何政府的意向，条件是如果能够维持国内和平，他们对所有政权的更迭的态度（如果不一般地说是对所有统治者的态度的话）要起决定性作用。同样地，没有同这些城市精英之间的昂贵交易，政府也无法进行统治。素丹们对宗教公产的大量投资给乌里玛提供了许多社会权利。都市社会的这类机构基本上是依赖于统治者的，这就是现代历史学家常常使用"联盟"一词形容统治者与乌里玛关系的原因。

妇女的生活

在进入现代以前，乌里玛是穆斯林社会大部分书面文献的作者，他们的人物词典提供了他们当中数以千计的人的出身与所做贡献的详情。人物词典 [188] 是穆斯林社会的特殊创造；乌里玛在其中得以永垂青史。正如H.A.R.吉布



先知身边的女性是穆 [187] 斯林妇女中的完美典范。本图中有他的女儿法蒂玛、他最喜欢的妻子阿伊莎，以及他的来自马赫祖姆部落的妻子乌姆·赛莱迈。她们都跪着，脸被面纱罩住，灵光火一样环绕着她们的头部。法蒂玛在什叶派穆斯林心中的地位差不多类似于基督徒的玛利亚；阿伊莎的传述是与先知有关的圣训的最受尊重的来源之一，信徒们铭记着她在656年毅然参加“骆驼之战”（为被谋杀的奥斯曼哈里发复仇）；而乌姆·赛莱迈的名声则来自于，当傲慢的艾布·伯克尔和欧麦尔（这两人后来成为最早的两位哈里发）试图干预先知与其妻子们之间的关系时，她曾立即予以驳回。

所说的："人物词典所强调的理念是：伊斯兰共同体的历史本质上是单个的男人和女人在建构与传承它的独特文化上所做的贡献；这就是说，是这些人，而不是政治统治者，代表和反映了穆斯林社会在他们相关领域中的积极力量；因此，他们个人的贡献是值得为后辈们记载下来的。"由于乌里玛填补了哈里发逊位所造成的真空，人物词典蜂起。像哈提卜·巴格达迪（卒于1071年）、伊本·阿萨基尔（卒于1176年）和伊本·哈利坎（卒于1282年）等著名历史学家开始明确地认为，人物传记与历史是一致的。这种历史写作将乌玛的历史看做是它的所有的显要人物，主要是乌里玛生活的总和。

人物词典包含有智力生活的详细图景以及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重要资料。它们也是妇女史的弥足珍贵的资料来源。关于两组判然有别的妇女有足够的信息。一组是伊斯兰第一个世纪里的麦加与麦地那妇女；第二组是后来中世纪（14～15世纪）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的卓越妇女。两组总数约为3000条目代表了词典里所有妇女条目的绝大多数，这两组条目数目彼此接近。不过这两组信息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起初，需要编写关于先知穆罕默德同伴的传记，因为他们对先知生活与言辞所做的陈述是否真实要看他们自己生活的细节是怎样的。早年的妇女同男人一样也被选进了这一文献，因为她们接近先知，是与圣训有关的见证人。作为开端的是伊本·赛德（卒于845年）在伊斯兰第3世纪写的《第一批世代》，共有4250个条目，其中妇女条目有629个。达于顶点的是伊本·哈加尔（卒于1449年）于伊斯兰第9世纪写的《对圣门弟子的精确估量》，共有12043个条目，其中妇女有1551个条目。所有这类人物传记的收集都是历史性的，他们在其中回顾了遥远的过去。即使是伊本·赛德写的第一本也与他所讨论的妇女相隔了两个世纪。后来的作者们所写的多半是同一组妇女，他们是从先前的作者那里得到有关这些人物的材料的。这些早期伊斯兰妇女的总数，兴许就是伊本·哈加尔的那一本《对圣门弟子的精确估量》所确定的1551人。

人物传记具有双重意义：他们不仅告诉我们他们所说的这些人物的一些事实，而且他们在这样做时采用了这样的方式，这些人是能体现伊斯兰文化的价值的"理想的人物类型"。这里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第一位妻子赫蒂彻、他喜爱的年轻妻子阿伊莎和他的女儿法蒂玛。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法蒂玛在早期的一组妇女与后来的一组妇女之间提供了重要的跨世纪的联系。

[189] 法蒂玛有最著名的身后史。由于她在什叶派中的地位逐渐提高，因而越来越有声望：于是，有关的什叶派的资料在年代上越晚，有关她的生活的资料也越详细，她所具有的美德也越多。她成为"世界妇女的楷模"、"圣母"和"圣女"。她是从"真主伟大"的灵光中产生的，或从天堂的食物中产生的。她是"审

判日妇女的楷模”。她将是第一位进入天堂的人，如果罪人们爱她的家庭，她将会向真主求情以拯救罪人。

在《古兰经》里没有提到过法蒂玛，她没有得到耶稣母亲玛利亚曾经得到的那种在经书中被提到的荣幸，但什叶派的口传教义将玛利亚所有大家都知晓的那些属性都赋予了法蒂玛。马吉里西（1627～1698年）在《光的海洋》一书中有条理地论证法蒂玛具有玛利亚的荣耀。法蒂玛也被称做“伟大的玛利亚”。在大众的宗教中，虔诚的信徒信赖法蒂玛，在反对非正义的斗争中，她站在被压迫者一边，这一斗争是她的父亲开始进行的，她和她最著名的儿子、殉难者侯赛因继续进行了这一斗争。什叶派妇女拜谒圣陵，纪念她的诞生和辞世，她们把自己日常遇到的问题带给她：疾病、怀孕和分娩、歉收等。她将仍然是她的追随者的保护人、母亲和希望。

第二组包括1300位妇女，有关她们的传记多半是14和15世纪她们在世的时候写的，由她们的同时代人伊本·哈加尔及其学生萨哈维（卒于1497年）所写，收在两大百年词典之中。伊本·哈加尔《隐藏的珍珠》中有14世纪5204位显要人物，其中妇女有198位，占4%。萨哈维的在15世纪写的《卓越人物》中有11691名显要人物，其中妇女有1075名，占9%。在萨哈维12卷本词典中，妇女的一组算是最大的，它所介绍的情况比伊斯兰历史上任何其他资料都要详细。它纪念伊斯兰历9世纪（公元15世纪）在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重要城市开罗、麦加和麦地那、大马士革、耶路撒冷的显要人物，他们多半是乌里玛，但是也有马穆鲁克行政机构的高级官员。他的最后一卷用于介绍同一家族与阶层的妇女，其中也包括一些妾，以及女商人、女诗人、接生婆和演艺人员。

如果我们承认，由于我们不能理解的原因，在他之后的百年人物传记词典里实际上已不见妇女的踪影，那么萨哈维词典的独特重要性也就十分明显了。加兹（卒于1651年）描写了16世纪的情况，在1647个人物条目中，妇女只有12个；穆西比（卒于1699年）的词典里，在有关他那个世纪的1289个人物中没有一个妇女；穆拉迪（卒于1791年）在18世纪753名显要人物中只在一个地方找到一位妇女；在19世纪的人物传记中，拜塔尔（卒于1918年）在777个人只找到2个妇女。

萨哈维基本上遵循中世纪人物传记词典的标准版式。先是人物对象身份的认证和家系的评述，然后，如果可能，便列出其生日。再往后，如果是一位圣训传达者，那么便要介绍她的教育、传教凭证（伊加扎）的情况，以及她出游与朝觐的详细情况。补充的内容有关于健康、社会地位，或许作为轶事还有个人性格等。大部分条目都记载有去世的时间与地点，而且常常说明去世的原因。萨哈维决定提供妇女婚姻的完整记录，这是违背原来的标准版式的。每个人物条目的长短不一，真正简短的条目内容多半不够完整。萨哈维 [190]

乌姆·哈尼生平(1376~1466年)

生于:开罗,星期五,伊斯兰教历778年8月中旬

死于:开罗,星期六,伊斯兰教历871年2月30日

乌姆·哈尼,也被称为马里亚姆,有名的开罗人和沙斐仪派信士,是努尔丁·阿卜·哈桑·阿里(大法官阿卜杜·拉赫曼·伊本·阿卜杜·马里克之子)的女儿。从母亲家系来说,她是大法官穆罕默德·伊本·穆罕默德·卡亚提的外孙女。

她于伊斯兰教历778年8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五夜里在开罗出生,在外祖父大法官卡亚提的养育下长大。伊斯兰教历785年,他把她带到麦加直接聆听4位经师(有他们的名单)讲授圣训;在开罗她师从于祖父和其他许多经师(我们知道其中6人的名字)。她从许多高级经师(现知晓13个人的名字)那里获得了听课证明。

她嫁给穆罕默德·伊本·乌马尔·伊本·库特鲁卜迦·巴克塔穆里,并同他生养了几个子女:舒贾丁·穆罕默德·沙斐仪,赛伊夫丁·穆罕默德·哈纳斐,法蒂玛,尤尼斯·马利基和曼苏尔·罕百里。她的儿子们学习并追随这些教法学派,通过这些他们逐渐了解了这些教法学派,其中对哈乃斐(哈尼法教法学派)的了解尤为突出。他的儿子,信奉罕百勒教法学派的曼苏尔天聪明,可惜幼年夭折,据说他的早夭是由于天妒异禀。

在第一个丈夫去世以后,她改嫁给哈桑·伊本·苏韦德·马利基,并生育了两个孩子:艾哈迈德和阿齐扎。她的外祖父大法官卡亚提去世时,她的丈夫接管了属于她的那份遗产并自由挥霍,但很快就命丧黄泉,乌姆·哈尼又得到了全部的遗产。

利用这些钱,乌姆·哈尼购买了菲尔湖附近一家以其规模庞大和拥有许多手纺车著称的工场——印沙阿克拉姆。这家工场老主人的子孙中有一个人向法庭提出质疑,认为这种购买是不合法的,但是罕百勒派法官纳斯尔·阿拉裁决,这宗买卖是合法的,由此确认了乌姆·哈尼对这家工场的所有权。

乌姆·哈尼长期从事逊奈的教学,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曾经师从于她;就我自己而言,通过她而学到了可从她的老师那里学来的一切。然而我认为,她所知道的远远多于我所能够学到的。她的祖父给她讲授了逊尼派六大圣训集中其余的部分,还有纳沙威里版本的《布哈里圣训实录》。

她是一个好女人,当提及真主和先知的名字时,她总是泪流满面;她严格把斋,夜夜做功,对宗教极为虔信,尤其关注仪式的纯净。她擅长写作,是一个天才诗人,能够出口成章。在年轻时,她就已经把《古兰经》、阿卜·沙贾的《教法摘录》以及哈利里论言词曲折变化的《韵文》等著作都铭记于心。我听过她用美丽的声调复述《古兰经》的"列阵"一章(第61章,开头是:"凡在天地间的,都赞颂真主超绝万物")。

她一生朝觐13次,朝觐期间通常在麦加和麦地那停留数月进行研究和讲学。

年老时,她视力减弱,但她依然平和,后来她的双腿瘫痪了,便只能呆在家里。她的儿子哈纳菲陪伴着她,直到伊斯兰教历871年2月30日(星期六)她走完了人生旅程,当时我正在麦加。她安葬于卡拉发的伊玛目沙斐仪陵墓附近、她的外祖父大法官卡亚提的墓地里。愿安拉降福于她,也保佑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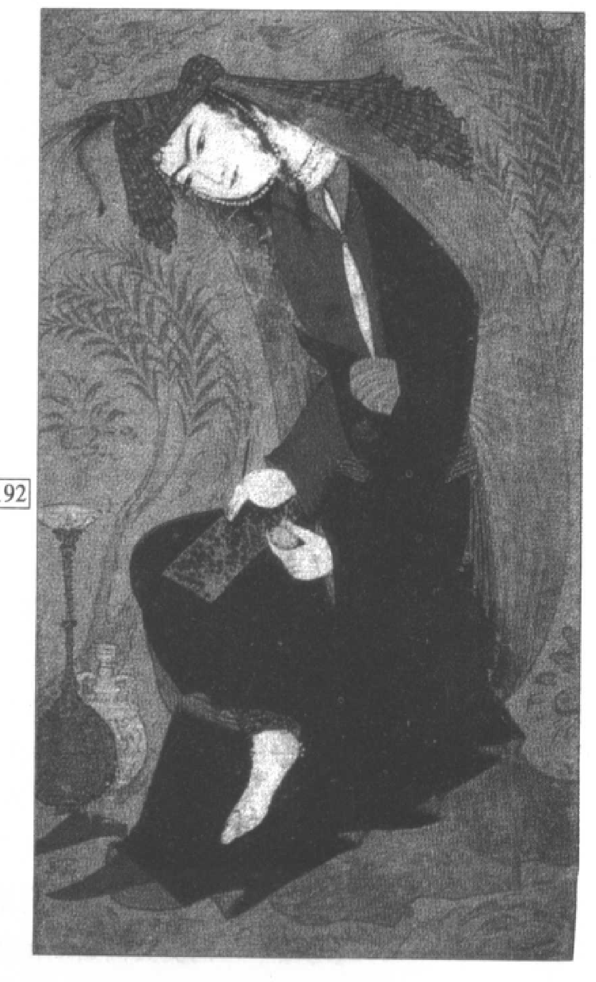
[191] 搞人物传记搞了几十年,到去世时还未完成。他去世时,许多女性著名人物还活在世上,所以有关这些妇女的条目便没有注明去世时间,也不见他在世时未注意到的情况。

乌姆·哈尼这个条目(第980条,见《乌姆·哈尼生平》文件框)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完整的人物条目,只是略去了有关她老师的长名单。条目中列举了她出生与去世的确切日期;她受教育的情况,她的外祖父,一位著名的法官,从她7岁起即精心照管她的成长;她的两次婚姻,她的7个孩子和他们的名字;她作为教师在传播伊斯兰学问方面所做的工作,她是萨哈维所敬重的圣训老师之一;她作为纺织工场的所有者,对市场的参与;她和她的儿子之间的

亲密关系，她的这个儿子在她漫长而又艰难的老年生活中照顾着她。这位乌里玛最为突出的出行是她对麦加和麦地那的13次朝觐。

14与15世纪声名显赫的妇女多是著名男学者的教师。乌姆·哈尼只是68位女专家中的一位，萨哈维得到她们的准许，当众背诵圣训。伊本·哈加尔列举了给予这一许可的53位女专家，苏尤蒂列举了33位。在伊斯兰第一个世纪之后，女圣训专家越来越少，直到伊本·哈加尔和萨哈维时期她们才又一展风采，享有盛名。这种妇女宗教学问的复兴不可能只是提供消息者搞的把戏。这是与叙利亚和埃及的乌里玛再次斩钉截铁地提升阿伊莎的地位同时发生的，阿伊莎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妻子、第一位哈里发艾布·伯克尔的女儿，是妇女传述圣训的首要来源，也是与妇女相关的圣训的至高无上的来源。尤其是，她在仪式纯洁方面是一位公认的专家，根据萨哈维的说法，这是一件特别能引起乌姆·哈尼与其他女乌里玛兴趣的事情。

当时的妇女不仅因为她们的学识而著名，而且还有一些妇女由于她们的书写艺术而流芳百世。这幅约1600年创作的、来自伊斯法罕的图画描绘的是一位正在写信的时髦女郎。她的字体和思想会同她的举止着装一样优雅。



阿伊莎是伊斯兰历史上一位最有争议的女人。她与法蒂玛不同，她在先知穆罕默德归真之后还在世上生活了关系重大的50年（她卒于678年），并作为领导人积极参与了第一次内战（菲特纳），这次内战使穆斯林共同体宣告分裂。有关她非常公开的生活的各种事件大家都很熟悉，后来的多少代人几乎无法捏造或是隐瞒。在先知去世后她的漫长生活中责难与荣誉并存。她积极卷入反对第四位哈里发、法蒂玛的丈夫阿里的斗争，达到在第一次内战中开启战端的程度，这使她在什叶派（起源于阿里的一派）的初始剧里落得个邪恶的角色，受到他们的恣意谴责。什叶派强调她在与先知穆罕默德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谴责她与别人有染，逊尼派则坚持说她是清白无辜的，予以反击，并说这一点在《古兰经》的语句中已经做了神圣的担保，什叶派则反过来拒绝承认这些语句都是关于她的。当逊尼派强调她在先知穆罕默德较喜欢的妻子中居首位时，什叶派则把另一位妻子乌姆·赛莱迈提升为先知最喜欢的 [192] 妻子。

出于对内战的厌恶，中世纪的穆斯林共同体拒绝用武装反对某一政治权力，这意味着阿伊莎参与内战这一点会受到逊尼派本身始终如一的谴责。她卷入政治使逊尼派难以证明她的行为是完全正确的。减轻她应受谴责的程度的尝试也仅限于强调她在656年进行“骆驼之战”时是犹豫的（她输掉了这场战争），同时谴责她的同事的坏影响。与她刚愎自用正好相反的迹象也有不少。

但是在伊斯兰形成的年代，阿伊莎是有关先知穆罕

默德的许多口传信息的来源，后来这些传述发展成为圣训，这是逊尼派忠诚信仰的持久的根基，因为她是先知穆罕默德6个最有创造力的同伴之一。当中世纪稍后时期她最终得到她应得的东西，成为逊尼派共同体中最受尊敬的女子时，她之所以居于首位的无可争辩的基础是她的宗教知识。无疑，也无须辩解，阿伊莎之所以能胜过所有其他妇女，要归于知识。由于"信士之母"不是圣徒，而是学者，于是她成为女学者的实际楷模，也是对她们所从事的职业的一种权威性的认可。

人物传记词典提供的信息，是理解中世纪末期妇女在穆斯林研习中的作用所需要的。词典里关于妇女直接参与经济生活、房地产以及宗教公产的种种迹象还仅仅是"冰山的一角"；例如，幸存下来的奥斯曼宗教慈善公产(卧各夫)说明，这一卷人的规模比这些传记里所说的要大。有时妇女建立的宗教公产占全部宗教公产的将近40%。

这是萨哈维人物传记中的个人信息，迄今为止已经证明这些信息是不易收集的。然而，萨哈维还是完成了他的条目中501位妇女的婚姻记录。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465名人物的传记提供了结婚次数的全部细节以及她们所有丈夫的名字(其余36位属序列式婚姻，其一位或几位丈夫的名字从略)。对这一抽样的分析得出关于结婚、离婚、再婚和多配偶的发生率，即主要的婚姻模式的重要信息。很明显，这一分析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妇女的背景、所处的历史时期、社会与政治条件都是相同的。

婚姻	全部妇女	乌里玛	马穆鲁克行政机构
一次	334	296	38
一次以上	167(33.3%)	138(32%)	29(43%)
两次	86	72	14
三次	57	51	6
三次以上	24	15	9
总计	501	434	67

[193] 所有这些妇女中，有1/3，即501位中有167位结婚多于一次，有时间隔时间还较短。有一位叫法拉吉的妇女(第696条)创下至少结婚8次的记录。自然，造成这种婚姻频繁的决定性因素是离婚的频繁。萨哈维有时谈到，小孩成长需要和双亲在一起。很明显，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双亲都能与小孩在一起：作者克服困难才能把它们记录下来。乌里玛与商人这些城市精英极易流动，也使家庭生活受到影响。有条件的离婚较为普通：如果丈夫在一定的时间内不回来，妻子将不再受婚姻关系的约束，例如沙瑞法这个人物(第409条)便是这样。萨哈维自己的侄女(甥女)施加家庭压力以影响其丈夫，直至其丈夫最终同意她的离婚要求(第407条)。一个经济上自立的妇女可以与她不喜欢的丈夫离婚(第291条)，而另一个妇女将丈夫赶出家庭，甚至拒不接受麦加

谢里夫[①]让他回家的请求(第 388 条)。丈夫，尤其是马穆鲁克丈夫的高死亡率也是许多婚姻宣告终止的原因。这样，在以一般婚姻为标准的社会里，许多妇女便出现了二次或三次婚姻的问题。

离婚与多配偶是传统穆斯林婚姻法的两个特点，但迄今为止，在实践上最普通的是离婚。在这 501 位妇女的记录中，只有 9 个清晰的案例(占 2%)属于丈夫同时娶，或打算娶第二位妻子。所有这些多配偶的家庭都是很成问题的，萨哈维做了仔细的记录：元配要么迫使丈夫与别的女子离婚，要么促成自己与丈夫离婚，要么两者都未能如愿，她自己精神失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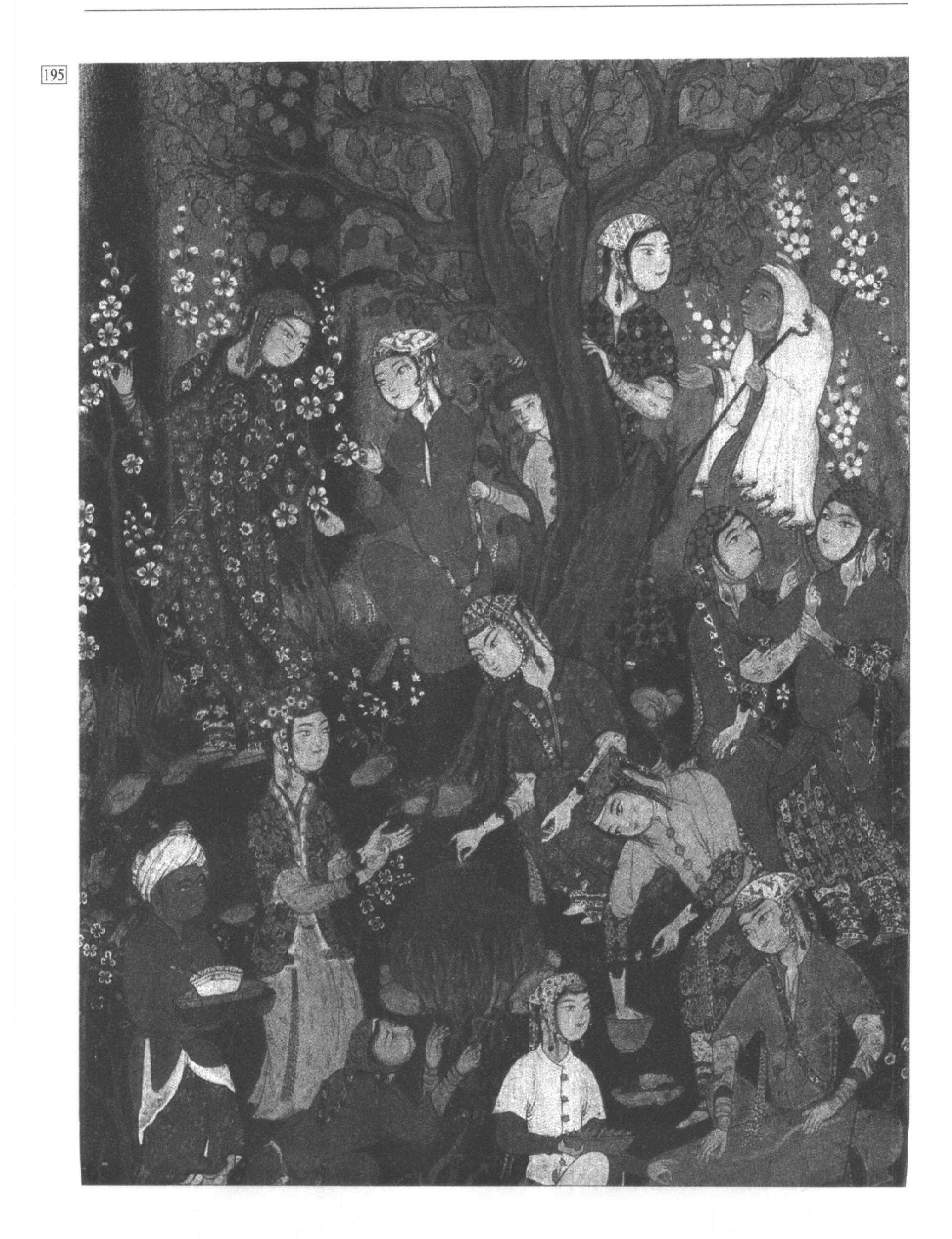
法蒂玛(第 629 条)的丈夫伊本・哈吉吉爱上了她，并因为她而和另一位妻子离了婚，离婚的这位妻子是他的一个亲戚。与此类似的是乌姆・侯赛因(第 861 条)的丈夫艾哈麦德为了她而不得不与前妻卡玛利亚离婚。然而没有多久，乌姆・侯赛因和他们年幼的儿子因他们家墙壁倒塌而被压死。我们在卡玛利亚(第 726 条)传记里可以看到这一故事的另一面，卡玛利亚拒绝接受艾哈麦德的第二次婚姻，他们尽管已经有了几个孩子，但她自己仍然坚持离了婚。但是乌姆・侯赛因突然去世后，卡玛利亚又再次与艾哈麦德结婚。然而在那之后也不幸福，因为艾哈麦德不久便去世了，她在两个月零 3 天之后也随他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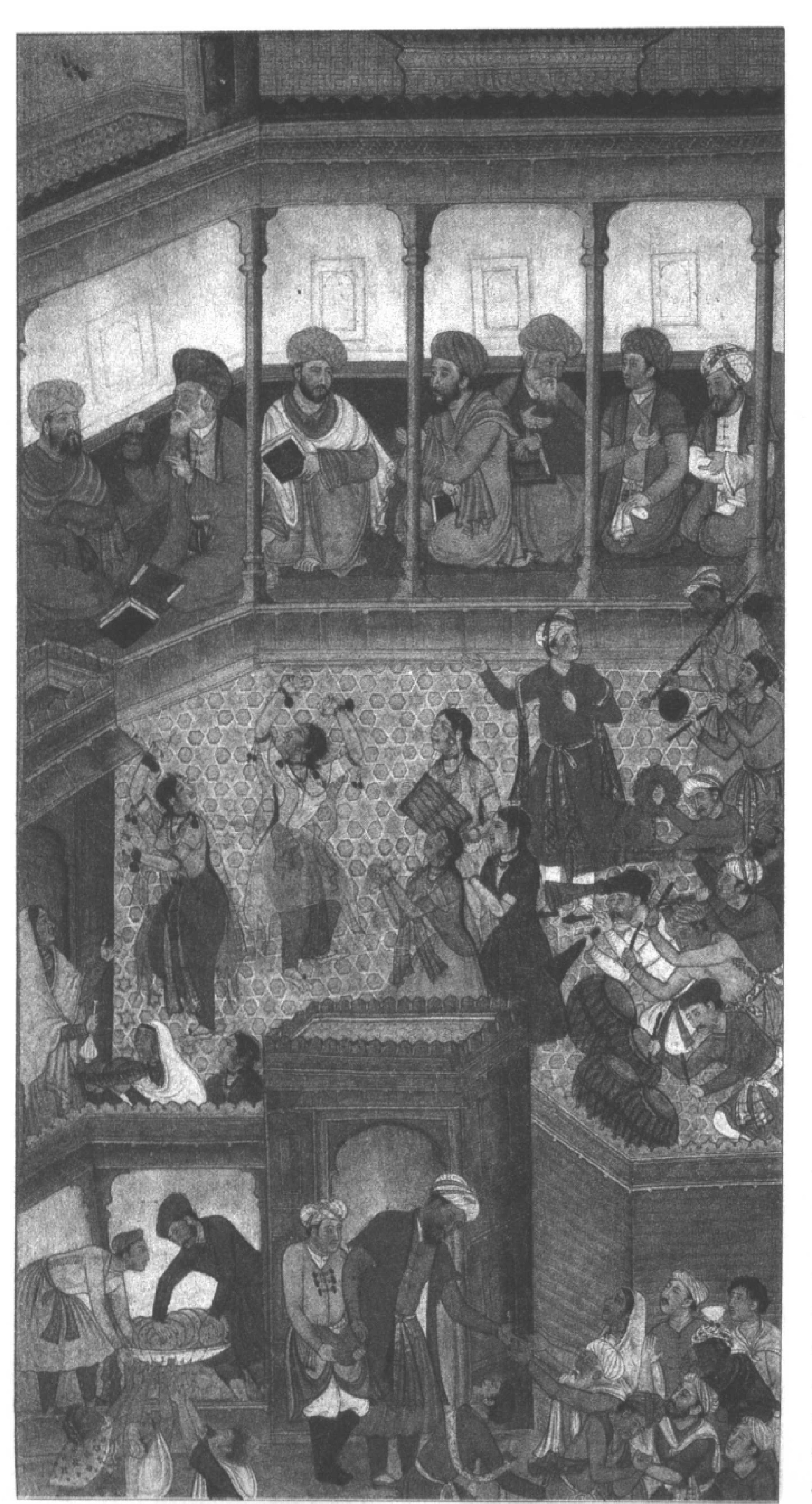


一对夫妇正在一名教法执行官(卡迪，qadi)面前相互指责。注意正在记录他俩怨言的书记员。离婚常常并不需要听取法官的意见。一个男人要离弃他的妻子并不需要任何理由；而女性的离婚权利则受到诸多限制。但是，事情在实践中远不是这么简单，正像萨哈维的传记向我们展现的那样。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双方)都必须履行原来婚约所订立的条件。

① 原意贵人，指圣裔(哈桑后裔)，是对麦加谢里夫国统治者的称谓——译者。

195





对于一个年轻的妻子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养育几个孩子（尤其是儿子）。首先，因为孩子们能够给她一种地位——《古兰经》要求儿子要尊重他们的母亲，而且先知的圣训要求他们要服从她们。其次，这样便可以减少她的丈夫娶第二个妻子的借口。在这幅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莫卧儿皇帝阿克巴的王宫内，人们正在举行盛大的庆典，欢庆其长子塞利姆的诞生。虽然阿克巴有很多妻子，但他的继承人却很难活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他求助于苏菲派导师萨里姆·奇什蒂——当他的一个妻子怀孕时，便送她到这位苏菲派人士的家里以确保孩子的安全。因此这个成为王子的人的名字后来被称为贾汗季。 196

第190页图：妇女获准离家外出的程度在穆斯林不同社会之间不仅因时地而异，还由于她们的阶层不同而各不相同。在10世纪的巴格达，严格的穆斯林坚持妇女绝对不能上街。但一名在18世纪访问阿勒颇的英国人却发现，妇女可以在各个城市花园里野炊、唱歌和嬉笑取乐。这幅来自16世纪伊朗的迷人彩饰画描绘了妇女准备野炊的情景。



男女之间的爱情广为人们称颂；阿拉伯关于莱拉和迈吉农之间的爱情故事，在穆斯林中间影响之广甚至要超过欧洲人中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故事的影响。在这幅取自16世纪伊朗的温柔的爱情场景中，一个少男正向少女呈送一碗葡萄酒。文人查希慈在19世纪宣称："女性在许多事情上要优越于男性，是她们受到(男子的)恳求、讨好、爱慕以及渴望，(男子)为了她们而牺牲自己，使她们得到保护。"

哈比巴特·阿拉(第102条)同她的堂兄弟穆罕默德结婚已有很长时间，当他秘密地迎娶另一个女子时，他和元配已经有了好几个孩子。当他的元配发现之后，他因慑于哈比巴特·阿拉的盛怒，很快即与其新欢离婚。阿齐扎(第505条)与已婚的阿拉·伊本·阿菲夫丁缔结了一项被延迟的婚约。她和她的两个兄弟一起旅行以便能和阿拉·伊本·阿菲夫丁相伴，但是阿拉·伊本·阿菲夫丁还是离开了她，因为他的另一个妻子已经发现个中原委，而"他对付不了她的怒火"。后来(或许是他妻子辞世以后)，阿齐扎与他终成眷属，他们的婚姻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穆罕默德是乌姆·卡尔修姆(第923条)的第三位丈夫(他也是她第一位[194]丈夫的兄弟)。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诞生以后，他又娶了另一位妻子乌姆·哈桑(第831条)，"于是乌姆·卡尔修姆精神失常，直到临终她没有再婚"。至于乌姆·哈桑，尽管她与穆罕默德结婚后生了几个孩子，但他们的婚姻仍然以离婚告终。不过她再次结婚，并又生了孩子。她的余生是很忧伤的：她离婚了，没有再结婚，她活到80岁，在她所有的孩子都先她而去之后，因过度伤心而死。乌姆·侯赛因(第866条)是"因其丈夫与另一女人结婚而精神失常"的又一位妻子。最后他与她离了婚，她也没有再婚。

15世纪卓越妇女中较普通的婚姻模式是系列式的单配偶婚姻（与现代西方结婚与离婚模式惊人的相似）。伊斯兰法允许多配偶，对离婚也较宽容。一个男子如果能满足一定的条件，可同时与4个女子结婚。离婚的程序至少对男人来说是不复杂的。萨哈维时代妇女的生活表明，15世纪埃及与叙利亚都市社会的婚姻模式受离婚宽松的影响较大，实际上未受到多配偶的影响。11~13世纪埃及较早的文献也显示了类似的但又较为极端的模式：在273名妇女的抽样调查中，118名妇女(占45%)结婚2次或3次。爱德华·莱恩对19世纪初埃及都市的仔细观察表明，在传统社会最后这些日子里，仍然通行同样的离婚较为经常而多配偶则较为少见的制度。

多配偶的发生率较低，以及在所涉及的人的生活中或许会遇到的极度痛苦与分崩离析说明，社会实际上不准许这种多配偶。在某些人物传记中，强烈而又清晰地传播着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单配偶与持久婚姻的观念。例如，当阿麦姆(第518条)故去时，她的丈夫深切地悼念她，并拒绝再娶别的女人[197]为妻，哪怕是妾。萨哈维说，"所有的妇女都羡慕她"。

照看孩子的祖父、父亲或母亲对女童教育格外努力，乌姆·哈尼并不是得此关爱的惟一女童。在萨哈维"人物传记"中包含有39名女童作为幼儿或在早期童年时代即不幸夭折的内容，条目虽短但至关重要，儿童的价值问题使我们受到刻骨铭心的震撼。不管对这一人物传记词典的意图做何种公认的界定，这些事例都是罕见的。其中有两个儿童是萨哈维自己的女儿(第275条和第98条)："栽乃卜，她双亲的第一个孩子，她是本文的作者穆罕默德·

伊本·阿卜杜勒·拉赫曼·萨哈维的女儿，她不到一个月便于教历849年11月夭亡了。”28年以后，“本书作者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拉赫曼·萨哈维的女儿珠维瑞耶出生以后仅几个月就在教历877年12月4日亡故了，她被埋葬在她的哥哥姐姐们的旁边。祈望真主以天堂补偿他们。”在萨哈维妻子及毕生的伙伴乌姆·哈伊尔（第895条）的传记中，我们得知她们至少失去了10个幼儿。

从过去到现在

伊本·赫勒敦说：“此时我们听到关于开罗与埃及情况的令人惊讶的事情，是关于那里居民奢侈与富有的习俗的。诚然，马格里布有很多穷人因此而想迁到埃及，而且由于他们听说埃及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更加繁荣。”

尼罗河三角洲富饶的农田是埃及财富的源泉。它使开罗成为一个大都市，并且在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地方为埃及赢得了繁荣富饶的声誉。



伊本·赫勒敦

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居住在今阿尔及利亚境内的奥兰附近时，给他的《世界历史》写了《绪论》。那时他刚刚从非斯马林王朝的庇护中退下来，在屈从于开罗的挽留之前，作为插曲，享受了一段学者生活的乐趣。他对埃及的富有有他自己的解释："其原因是埃及和开罗的人口比我们所能想到的其他任何城市都多。"他称开罗是"宇宙的大都会、世界的公园、人种云集的核心。"赫勒敦用于"人口"的词是"乌木兰"。这个词原意是"增长"或"发展"，他也将这个词用于"文明"。他认为，人口的增长与开化生活的概念是不可分的。人越多，也就越富有、越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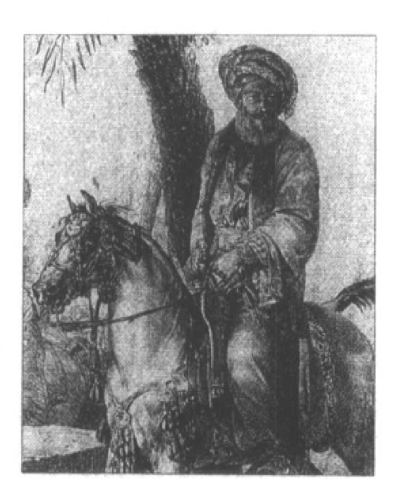
14世纪晚期，开罗并不像伊本·赫勒敦所听到的那样令人惊讶。1348年爆发的黑死病曾经席卷埃及，在那之后直到19世纪，流行病损害了每一代人 [198] 的健康。伊本·赫勒敦将这一瘟疫视为产生了世界性后果的世界性现象："伊斯兰历8世纪（公元14世纪）中叶，东方和西方的文明都受到了毁灭性瘟疫的侵袭，它使国家荒芜，人口消失……人少了，文明也少了。城市与建筑物被废弃，道路也不见了，居住地和宅第成为空壳，王朝与部落衰微。整个世界都改变了。"黑死病激起伊本·赫勒敦生活在世界末日的惶恐意识，特别要说明的是，这也促使他形成有关历史学家使命的重要概念："在存在着'环境的普遍改变'的时候，仿佛全部创造物都已改变，而且整个世界都变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需要的是，某个人应当系统地记下世界各地区和各种族的情况，以及习俗与宗派信仰，这些习俗与宗派信仰因其追随者的变化而已有所改变。这 [199] 一点应当成为未来历史学家遵循的模式。"伊本·赫勒敦赞叹转瞬即逝的历史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有一点过早，因为中世纪的世界还要继续艰难地跋涉3个世纪，其间奥斯曼、萨法维和莫卧儿等帝国还展示出令人难忘的活力。

继瘟疫之后，西方来了，而且由此发生了伊本·赫勒敦预见到的"环境的普遍改变"。确实，这一次整个世界真的是变样了。18世纪末，在西北欧开始加快的深刻变革，即工业革命与法国革命(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把它称为"双重革命")启动了"自古代人们发明农耕和冶金术、书写文字、城市、国家以来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这一革命已经改变，并会继续改变整个世界"。

在首先发生现代革命的西欧，获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文化与军事的力量，这个力量凌驾于世界所有既存的文明、国家、地区和民族之上。它多半采取英国率领欧洲进行征服的形式。穆斯林曾经创造了他们在其中已经统治了1000年的世界，但现在发现他们处于一个正在由别人建立统治的世界，而且多半是以鲁莽的的方式实行这种统治。在19世纪以前，伊斯兰社会对于世界已经知晓的国际文化是闭关自守的，19世纪整个伊斯兰社会降到边缘的地位，在实际上已被破坏。非斯与开罗已不再互相指望，而是要指望巴黎和伦

敦，巴黎和伦敦无论如何都要尽力切断非斯与开罗之间残存的联系。伊本·白图泰和伊本·赫勒敦的社会、安萨里和萨哈维以及乌姆·哈尼的社会都已不复存在，而是变成了别的什么东西，也就是阿拉伯人、伊朗人、突厥人及其他现代穆斯林的共同文化与历史遗产。

当然，事情还不仅限于此。伊斯兰与西方共同拥有地中海地区的地理环境与人种；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古老而又复杂的。在进入现代以前时期，伊斯兰强大的版图是对欧洲文化和人的巨大挑战，十分自然，伊斯兰在欧洲大多被看作异己的思想。无论如何，欧洲没有什么选择：它被伊斯兰和水包围着，在它征服穆斯林以前，很早就征服了大洋，也征服了大洋以外的一些地方。在过去 200 年间，尽管由于西方的崛起，条件已有很大改变，但是早些时代的担忧与憎恨仍然存在。即使是在今天，它仍然以惊呼“伊斯兰又回来了”的形式出现。



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8 年)。他是在法国入侵后，努力重新恢复奥斯曼在埃及的权威的军队中的一名阿尔巴尼亚军官，他关心的不仅是统治和管理这个国家，还关心它的改革。他给埃及带来了新的财富——棉花生产，还扭转了埃及人口衰减的局面。但是，他的政府是残忍而专制的。

现代革命虽然从欧洲开始蔓延开来，但它属于整个世界，同样，农业与都市革命、书写以及车轮起初也从中东普及开来，但它们也属于整个世界。19 世纪上半期在奥斯曼帝国，尤其是在 1805 年以后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早熟的埃及，采用现代技术与思想的过程业已开始。19 世纪伊斯坦布尔与开罗穆斯林政治家与思想家正确地认为，在现代世界这是图存与繁荣之所必需，他们看到这一点比欧洲以外其他地方早了两代。

200

埃及人把开罗叫做“米斯尔”，他们也这么称埃及①。今天比以往更是如此：开罗就是埃及，开罗是 1500 多万人的家乡，它的人口占埃及全部人口的 1/4。粗略地看一看埃及与开罗，会认为伟大的伊本·赫勒敦把人口问题整个都给搞错了。今天过多的人口不但不创造财富或维系文明，相反，它还使埃及人长期贫穷、拼命拥挤，以及狂乱地移居外国。

现代的开罗不再是法蒂玛王朝的首都，也不再是萨拉丁有城墙的大城市，而是一个现代的创造物。埃及现代的改革始于穆罕默德·阿里（1805～1848 年在位）统治时期。得益于他的有才能的儿子易卜拉欣的帮助，以及他长达 43 年的统治，他实施了现代化规划，这是最早和最雄心勃勃的规划之一。它包括改组整个政府，建立有效能的军事机器，组建技术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学院，以及制订工业发展政策，所有各项均有聘请的欧洲顾问的帮助。然而首要的是农业革命。穆罕默德·阿里懂得，埃及的繁荣乃至政府的兴旺皆依赖于土地。土地占有制度得到改革，废除了奥斯曼的制度，代之以国家对所有农用地的垄断。于是仅农业税即达到政府全部岁入的一半。



阿里·穆巴拉克，埃及公共事务部长。他在 1860 年代后期监督修建了克迪夫·伊斯玛仪版本的现代开罗。赫迪夫的灵感来自豪斯曼对巴黎的重新设计。

同样，在灌溉、运输、作物轮作以及种子等方面也有广泛的改进。尼罗河三角洲终年灌溉（一年可不仅种一茬作物）已成常规。这对于成功地进行最值得称赞的、最重大的改进，即引进长纤维棉花，是很重要的。埃及成为世界

① 米斯尔(Misr)在阿拉伯语中意指埃及。埃及是现代对该地区的称呼——译者。

主要棉花生产地之一，棉花也成了国家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棉花的种植属劳动密集型产业，它的发展在19世纪中叶以前造成劳动力的供不应求。妇女与儿童弥补了这种需求。

穆罕默德·阿里的统治是管制经济的典型例子。它也是专制的、权威主义的、有约束的和有效率的。如果说与别的做法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它运转得太好了。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在19世纪30年代成功地占领叙利亚，激起奥斯曼政府及其英国同盟者的敌意；棉花的成功最终使经济很危险地受世界市场波动的制约；国家垄断的制度以及固定价格，引起欧洲有影响的购买者与商号的反对。

19世纪40年代，奥斯曼帝国、英国、外国商号以及农村长老们结成可怕的同盟，迫使穆罕默德·阿里放弃他的垄断（在迫使他离开叙利亚之后）。新的大土地所有主阶级控制了埃及的农村，大部分农民不是当上了佃农，就是成了雇工。为了执行1838年英国与奥斯曼土耳其缔结的协定，这位做了大部分使埃及现代化工作的统治者，被迫让农村大地产，其中包括王族农村大地产合法化，这使后来到20世纪中叶以前的土地改革都归于失败，他还被迫向外国商界打开了直接控制农村经济的大门。他也被迫裁减军队，这一点导致[201]了使工业化失去刺激的致命后果。

开罗的新歌剧院。1869年11月，在这里上演了威尔第的《弄臣》，当时世界各地的人为庆祝苏伊士运河的通航涌到这里。



在穆罕默德·阿里之后，采取了将开罗与新的世界机械化运输体系连结起来的步骤。道路得到改进，第一条铁路——开罗与亚历山大之间的铁路于 1852 ~ 1854 年修建，同有的国家（比如瑞典或日本）相比，埃及修铁路的时间要早很多。铁路修成后，从首都到埃及在地中海港口的时间由以前的 4 天缩短为 4 个半小时。不过确定埃及在奥斯曼帝国体系中的地位的最重要的事件，还是克迪夫·赛义德（1854 ~ 1863 年在位）1854 年 11 月决定给予法国人以建设苏伊士运河的特许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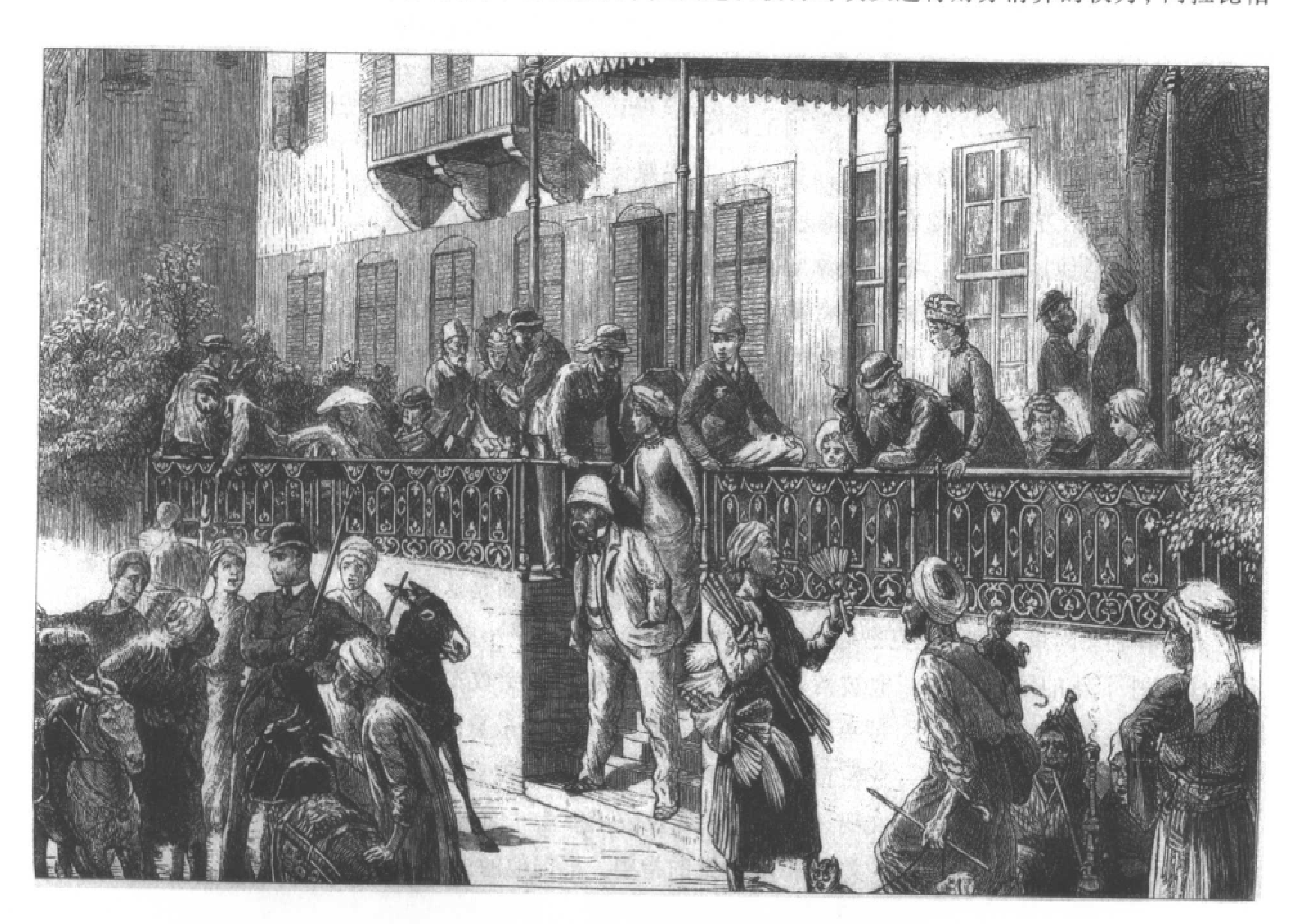
赛义德的继承者克迪夫·伊斯玛仪于 1863 年领受了建设开罗的使命。他统治的时期（1863 ~ 1879 年）对开罗现代城的诞生来说是决定性的时期。1867 年他和埃及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一起参观世界博览会，对他所看到的一切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这一博览会标志着巴荣·豪斯曼重新设计巴黎的颠峰之作。伊斯玛仪在两年的时间里设计了埃及自己的“博览会”——苏伊士运河开航。宣布埃及是“欧洲的一部分”，比起为开罗做一些类似豪斯曼为巴黎做过的事情来，是多么好啊！不管伊斯玛仪在别的事情上有哪些过失，他决不是一个怠惰者；该城市的大部分是在仅两年的时间里设计和建造起来的。他认为阿里·穆巴拉克（1824 ~ 1892 年）是担任他的公共工程部长的 [202] 合适人选。幸运的是，不需要大规模的拆毁。在以前的一些世纪里，尼罗河河床慢慢地西移。现在，一片荒地隔在开罗与尼罗河之间，穆巴拉克在这个地方朝西安排了大街、公园与名星建筑的宏大的正面，这就是伊斯玛仪的开罗。同埃及本身一样，新的开罗是“尼罗河的馈赠”。

苏伊士运河是 1869 年通航的。欧洲首脑们、世界媒体和企业家们涌向开罗，以一睹这一东方奇迹。他们见到的是新的歌剧院正在上演威尔第的《弄臣》。街道上的照明设备已经点亮，国家剧院已经投入使用，大片的荒地已经变成树木繁盛的公用场地，新的道路将来访者引向金字塔，还有，一桥飞架尼罗河，使开罗城开始扩大到尼罗河的西岸。伊斯玛仪本人，勋章、肩章闪烁着光芒，胡须下垂，看上去像是一个欧洲人。有一种看法让人感兴趣，即认为伊斯玛仪的开罗是对豪斯曼的巴黎的一种简单，甚至是肤浅的模仿。但是那时新的开罗仍相当于，或许更准确地说，就是阿里·穆巴拉克的开罗。这样，阿里·穆巴拉克的开罗也获得了新的含义。

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成果是可观的，而阿里·穆巴拉克则是这一成果的杰出样板。阿里·穆巴拉克是尼罗河三角洲一个穷人家里最小的儿子，家里让他进了新的国立学校，他被穆罕默德·阿里派到法国专攻军事工程。他回来后在 1850 ~ 1882 年（即英国占领的那一年）成为埃及最重要的文职人员。他常常担任教育部长、公共工程部长和铁路部长。穆巴拉克写的东西内容广泛，他相信科学、进步、文明、计划、机械以及公用事业。简言之，他是一个功利主义者、真正的乐观主义者和 19 世纪的指望。根据他的说法，科

学或知识是世界性与累积性的追求。它从古代埃及人传到希腊人，再到阿拉伯人，然后再到欧洲人。他们都依次借鉴于前人，正如穆斯林曾经一度掌握并扩展了希腊人的发现一样，现在他们也必须掌握欧洲人的发现。穆巴拉克是在 1882 年出版的 4 卷本著作《阿拉姆丁》中谈到这些的。出版的日子是一个痛苦的象征，因为这本书以及体现在书中的态度在英国占领埃及后都会遇到麻烦。阿拉伯和穆斯林对西方的态度反映了这种矛盾心理：赞扬西方的成就是一回事，利用这些成就反对你是另一回事。至今阿拉伯和穆斯林对西方的态度依然反映出这一矛盾的心态。

在埃及存在一种广泛的乐观主义情绪，因为这个国家明显地从中世纪跃进到 19 世纪进步的最前列。但是由于没有别的兴旺的工业基础，现代埃及的根基是脆弱的。19 世纪下半期，由于农业有剩余，人口翻了一番；在美国国内战争期间，棉花收成的价值实际增加了 3 倍。但是土地也在继续分散，等农业 203 收入到了国库，也就可怜巴巴地所剩无几了。随着每一轮经济上遭受挫折，随着每一轮加重对现代化的补贴，随着王族每一轮的奢侈铺张，国家都要加重债务负担。贷款多意味着要向欧洲银行家求援，而且对每次贷款都要付出对欧洲利益作出让步的代价。不久，为了旧贷款的还本付息，又要举借新贷款。埃及丧失了清偿能力，英法趁机获得对埃及进行财务清算的权力，阿拉比帕



开罗谢佩尔德饭店的平台。英国占领埃及期间，这里是英国人社交聚会的一个重要场所。因此，它自然也是民族主义反对派力量袭击的一个目标，1952 年 1 月，它被人纵火焚毁，使自由军官组织登上权力宝座的运动由此而加快发展。

夏领导的民族主义反抗运动使它们的这种权力受到威胁，英国于1882年对此做出反应，占领了埃及并实行殖民统治。

埃及与英帝国地图上任何其他红色板块之间的区别在于，埃及已经经历过现代化的创伤，这是在75年中在土地、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等领域所发生的根本性变革。在英国统治下，灌溉网在尼罗河三角洲得到延伸，建设了第一组阿斯旺水坝，在上埃及实现了终年灌溉，棉花行业继续繁荣，交通得到改善。但所有这些变化都是数量上的，而不是质量上的。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的是伊斯玛仪对开罗轰动一时的改造。在印度，直到1911年英国才决定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又过了20年新德里才算落成。在埃及，1882年"新开罗"即已处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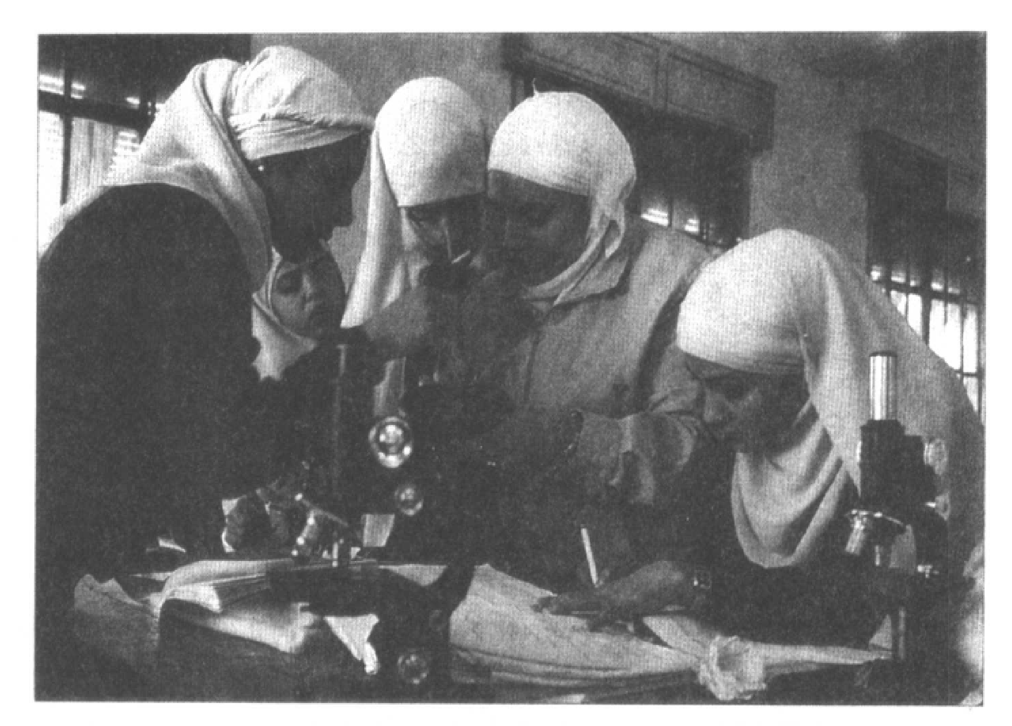
胡达·沙拉维（1879～1947年）。在1919年的埃及反英起义中，她领导妇女进行了几次示威运动，并于1923年创建了埃及妇女联合会。从政治上看，她的女权主义主张是民族主义和西方式的——她主张推翻英国的统治，采纳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建立世俗的国家。她摘除了面纱，以表明自己渴求解放社会、驱逐西方强权的愿望；在20世纪后期，埃及妇女开始重新戴上面纱，或穿上伊斯兰长袍，以抗议西方的影响。

英国占领埃及之后，不可能再有像阿里·穆巴拉克那样的人出现了，因为埃及人不可能担任享有实权的职位。如果说在尼罗河要建一个水坝，那么这要由英国人做出决定。埃及人有几代，而且是关键性的几代，被禁止在他[204]们自己的国家发挥真正负责的作用，这是帝国主义强加的沉重而隐蔽的代价。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某些困难，直接同帝国主义所造成的在承袭对本社会事务责任上的这种间断有关。

至少是在阿拉伯世界，在争取妇女权利道路上采取的首批步骤可以追溯到1919年，当时埃及存在着强大的反对英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胡达·沙拉维同她的丈夫（该运动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在运动中站在一起，她还领导妇女进行反英示威，赢得广泛的尊敬与称赞。有一天，她出席1923年在罗马举行的妇女会议后返回，在亚历山大码头，她在欢迎委员会的面前揭去了蒙头巾，使她们惊诧不已。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戴蒙头巾的现象越来越少了，除了阿拉伯半岛保守社会之外，只有少数穆斯林妇女还在戴它。

在20世纪，蒙头巾或头巾既是倒退的社会趋向的象征，也是进步的社会趋向的象征，因为无论是戴它还是不戴它，都体现着某种解放。自70年代以后许多年轻的穆斯林妇女已经回到传统的着装规则：将头发和脖子遮盖起来，但把脸露在外面。她们往往是已经摘下蒙头巾的母亲的女儿，或是在20年代把扔掉这些遮盖物当做解放的标志的胡达·沙拉维这样的妇女的孙女。这些孙女认为，她们穿上穆斯林的服装就可以回归本土文化，象征着她们已从被强加的外来文化中解脱出来。有关头巾的重要之点在于，它一直是可做各种解释的话题。在法国，曾因穆斯林着装问题发生了激烈冲突，这一事件始于1989年，当时克雷伊一所学校的校长不准3名戴蒙头巾的穆斯林女孩进学校，到1994年年初，这一冲突进入狂热阶段。法国教育部长禁止在学校炫耀宗教象征。出于某些原因，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图像和大卫王之星[1]不在此列。

[1] 犹太教六芒星形标志，意为"大卫王的盾牌"——译者。



开罗大学身着伊斯兰长袍的女生在实验室。现在，埃及相当多的女性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并加入劳动大军。伊斯兰着装使她们能为自己在公共场合开创出一个合法的区域，并对这一公共场合重新进行划分。它表明埃及社会中心区的女性加入现代生活的决心。

许多选择伊斯兰传统着装的妇女，其中包括大学生和研究生、医生和律师，在访谈时都做了文化上与政治上的解释。请看看在法国发生这一狂热事件以前很久，英国记者兼戏剧评论家萨菲纳兹·卡兹姆对此是怎么评论的：

“我们成为穆斯林并非由于追随先前的价值观，而是遵循我们自己新的价值观。我们也不强迫任何人遵循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不把它强加给基督教徒、强加于西方生活……我们说是对的，他们就会说是错的。我说这种着装是为了保护我作为妇女的尊严；西蒙·波伏娃[①]会说这是对妇女的攻击和对妇女尊严的亵渎。我并不想去强迫西蒙·波伏娃穿上穆斯林的服装。我也不愿让西蒙·波伏娃去无理地告诉霍梅尼伊玛目：‘不要对穆斯林妇女实行这项规则’。老天爷作证，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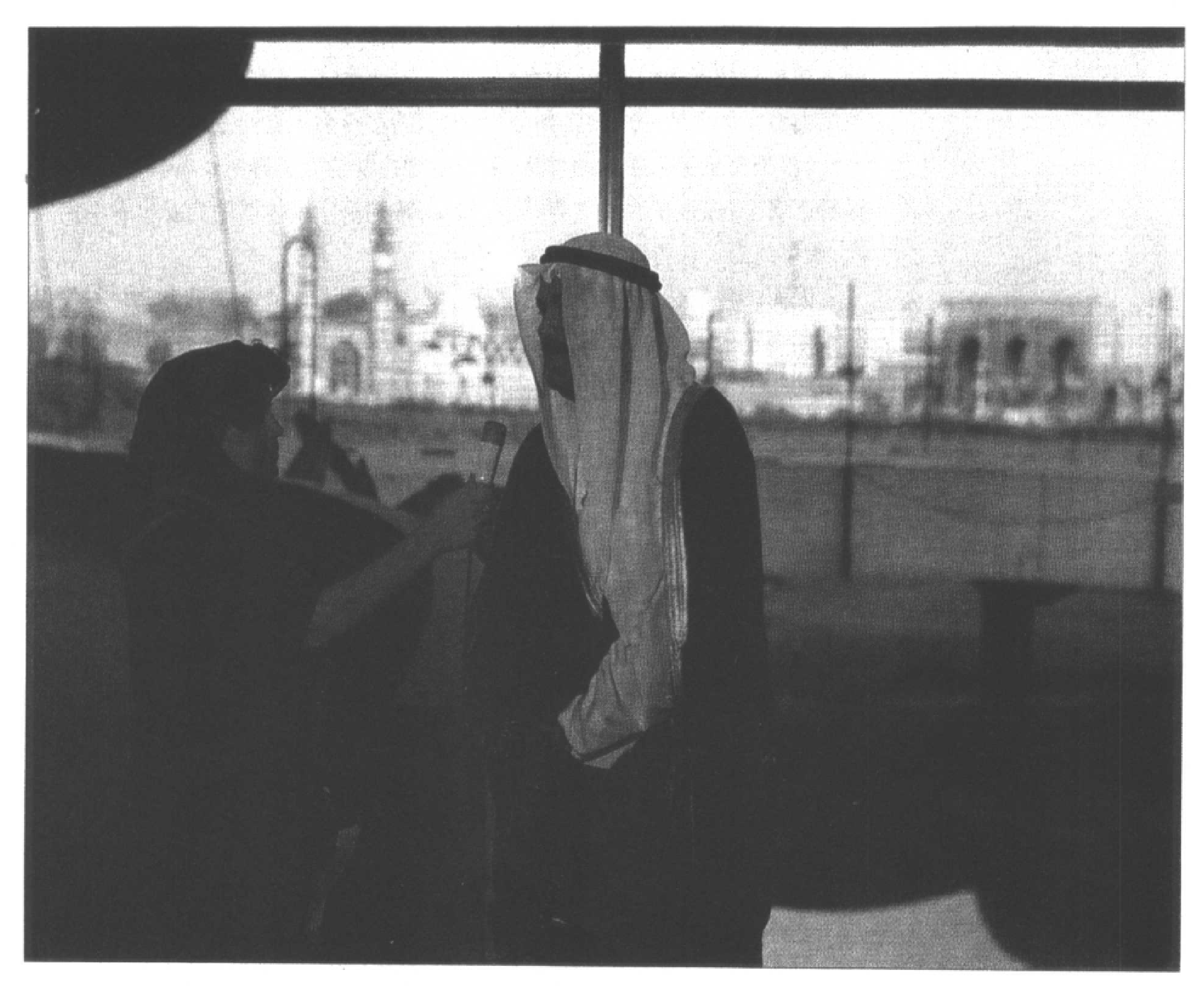
但是，文化与政治的界定可以被个人的界定所修正：

205 “我穿上穆斯林服装是由于这是伊斯兰的一部分，而我信仰伊斯兰。在伊斯兰中这不属于基本的义务、功修，但它恰是一个框架。我觉得我的这种方式会使真主感到满意。我认为我应当是一个完全的穆斯林，不是只遵守它的一些规则，而不遵守另一些规则。”

这是埃及一位学医的年轻学生的话。无论是她作为医科学生的身份，还是她对戴蒙头巾的选择，都是非同寻常的，这说明了一个两难推理：埃及这位医学院年轻的女生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如何根据她自主选择伊斯兰着装这件事，确定一个人对这一问题的答案？

胡达·沙拉维所领导的埃及早期女权主义者向官员和议员游说，争取妇

① 西蒙·波伏娃（1908～1986年），法国女哲学家、小说家和随笔作者——译者。



参加开罗人口与发展大会（1994年）的科威特代表团团长正在接受采访。这次大会发现，在生育控制和堕胎问题上，伊斯兰主义者的主张同罗马天主教的主张相近。伊斯兰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新近出现的现象。传统上，穆斯林医生一直在他们的著述中关注生育控制的方法，它的实践得到了伊斯兰法律的支持。

女受教育权、选举权以及其他领域的平等权利。但是对于后来像埃及纳瓦尔·萨达维博士那样的女权主义者来说，早先的女权主义者做得还远远不够。问题是在家庭能做些什么，这个问题依然既存在于穆斯林世界，又存在于世界的其他地方。还有，个人怎样去改变它？女权主义的改革者像大部分穆斯林改革者那样，认为伊斯兰法本身必须适应于现时代，因而有关妇女的法应变得更加宽松与进步。然而为适应现代的环境而重新解释伊斯兰法会碰到各种难以逆料的冷言冷语。

从10世纪到19世纪伊斯兰所有的教法学派都对避孕表示极大的关注。他们主要是论及最普通的避孕方法体外射精，一致同意：如果自由的妻子允许，这样做是正当的，因为妻子有受孕与得到性满足的权利，而中途撤 [206] 出会削弱这种权利。在法理学家写的文章中，介绍了另一种控制生育的方法，通常是用阴道塞，这也是前现代妇女所使用的，最普通的看法是：这只能在丈夫同意的情况下才能使用。

如果说，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口传教义都有认为避孕不合法的历史与事

实，那么穆斯林则对控制生育抱有显然是比较实际的态度，而且对可能采用的方法也有较老到的知识。中世纪像伊本·西拿(阿维森纳)这样的医生认为控制生育是医学的一个正常部分，在他们的教科书中有些章节还讲到避孕与流产。根据中世纪穆斯林的说法，采用生育控制是为了避免亲属数量过多；确保财产安全；保证子女受教育；避免妇女，特别是年少体弱的妇女生育中的风险；或单纯为了保持女子的健康与美丽。

因而，穆斯林在1994年夏举行开罗人口会议时谴责控制生育并不仅仅是重复多年的旧有态度，而是别的一些因素所使然。当控制生育作为20世纪[207]伊斯兰的一个问题被重新提出来的时候，它得到了正常的回应：现代的法理学家查阅古籍并重复着传统的许可。不过旧的伊斯兰法从未把生育控制看做国家的事务。宗教的许可适用于夫妇个体，他们根据自己所理解的经济利益、医疗利益或个人的利益，有权自行限制家庭的规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人口过剩"，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过剩"一直吸引着各国政府、国际机构，乃至西方国家的政府与机构的注意力。许多穆斯林在对政府卷入他们的个人生活，以及西方某些人士对计划生育的戒备性倡导作出反应的过程中，把这全部的努力视为外部对穆斯林社会的另一种干预。20世纪70年代官方的计划生育项目也引起相当多的担忧与不满，使某些宗教领袖直截了当地拒绝这一传统的许可。无论是这种态度，还是官方的人口政策都同样远离了传统伊斯兰法的精神以及它的这种看法：控制生育纯粹属于由个人作出选择的事情。

第七章 穆斯林社会的认知及其传承与发展

有一个同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其中一派的创建者沙斐仪有关的传说：208
有一天，他的学生给他带来一个奴隶女孩。女孩对着这位著名的法学家徒劳地坐等了一夜，有一种挫折感，她对奴隶商人抱怨说，他把她卖给了一个"古怪的男人"。沙斐仪听到这话以后宣布："古怪的人是那种懂得知识价值而又浪费它，或犹豫不决而让它从身边溜走的人。"这个故事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故事都强调寻求认知在穆斯林美满生活中的中心地位。

寻求这种认知的核心是，穆斯林对可从《古兰经》得知的所有指令、对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活，以及对体现社会效用的指导技能的关心。这是获得拯救所必须的认知。不过有较高学习价值的还包括能给世界带来力量的知识，如像理性科学、医学、技术学，当然始终存在这样的前提：即它们都不能违背伊斯兰的目的。

于是，对穆斯林来说，学习成了礼拜的行为。而且，这还是最重要的事情。有这样一种说法："学习一个小时抵得上一年以上的祈祷。"这一强调在伊斯兰历史上产生了两个有重要意义的结果。其一是，穆斯林无论走到世界什么地方，都有一个所有人能够分享的认知核心，尽管会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解释；同时，也有一个所有人都应当履行的宗教职责的核心，尽管会有一些小的差别。其二是，穆斯林自身，不管所处的境况是否能发挥作用，都有责任在当代保存这些认知，并把它传给下一代。

伊斯兰认知的形成

伊斯兰认知的核心是在伊斯兰最初 5 个世纪中形成的。在以后的时期，虽然对这一核心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但是没有重大的改变。直至今日，传统的穆斯林学者仍在使用中世纪大学者们写的文本，采取的方法也同其中世纪先辈没有太大的差别。导致这一最有影响的认知主体形成的各种因素，作为 7 世纪阿拉伯征服的结果而会聚在一起。正如早期伊斯兰世界的物质财富源自阿拉伯在统一地中海盆地与亚洲大经济区上的成功一样，它在认知上的财富也源自闪米特、希腊、伊朗与印度诸文化新综合体的相互融合。209

启示、圣训与法

伊斯兰认知的核心是《古兰经》,穆斯林认为这些真主的话是通过先知穆罕默德向男人与女人下达的启示。像基督教徒那样,信士们会把经书的开篇用做主祷文,《古兰经》从一开篇即让穆斯林们想起真主是在人类生活中的核心实在:

>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
> 至仁至慈的主,
> 报应日的主。
> 我们只崇拜你,只求你祐助,
> 求你引导我们上正路,
> 你所祐助者的路,不是受谴怒者的路,也不是迷误者的路。

人类有根本性的选择。他们可以服从主,遵守戒律;他们也可以离开主,[210] 遵循人的愿望,并承担其后果。在令人畏惧的末日、快乐的天堂以及恐怖的地狱这些问题上,男人和女人们都不会有所怀疑。对于他们应当信仰什么样的宗教、礼拜时应当有怎样的举止、对他们的门徒应当遵循什么样的规则以及对主的态度(这应当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去)等,都有许多的指导。

穆斯林提到《古兰经》时,说它是"尊贵的",或是"荣耀的";它的阿拉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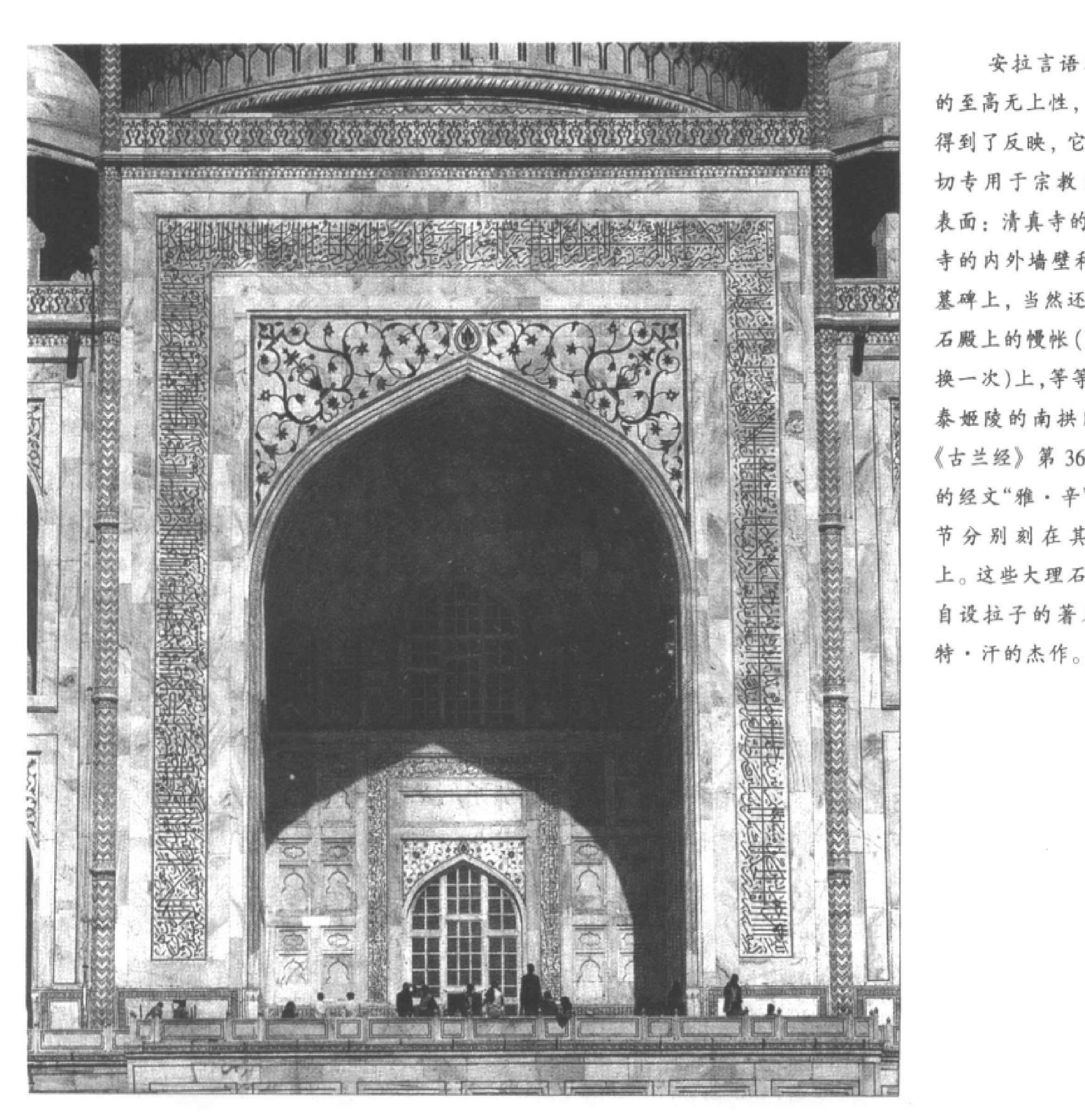


有时间记载的《古兰经》片段最早可上溯到公元8世纪的头25年。它们是用库法体书写的,库法体是穆斯林世界初期在礼拜仪式中最广泛使用的字体,而且常常是写在犊皮纸上。这页来自8世纪的《古兰经》经文用的是库法体的斜体形式,即称做"迈尔"的手抄体;它抄写于变音符号出现之前,所以加有元音标志以防止对神圣词句的误读。

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誊抄《古兰经》是虔诚的行为，富人可以做，穷人也可以做。学习《古兰经》是穆斯林教育的标准出发点，不管受教的小孩懂不懂它所使用的阿拉伯语。尽管所启示的话在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时期已完全写下来，并已把复本送到主要城市去，但是传统的传授方式仍然是口头传授。早期阿拉伯字母有不同的读法，最后有 7 种背诵的口传教义被视为规范，它们彼此之间只有很小的区别。由于《古兰经》有了书写的文本，于是解释与注解的工作得以开始。不可避免的是，作出的评注受到当时派别争论的影响。第一位试图贯穿起来进行评判研究的是历史学家兼宗教学家塔百里(卒于 923 年)，他写了 13 卷著述。3 个世纪之后，巴伊达维(卒于 1286 年)再次从事这项工作。时至今日，对穆斯林以及非穆斯林来说他的著作仍然是规范性的。

211

认知的第二来源是对先知穆罕默德言行的记载。如果说，先知是理想的



安拉言语对穆斯林来说的至高无上性，在这一点上也得到了反映，它被用来装饰一切专用于宗教目的的物体的表面：清真寺的尖塔上、清真寺的内外墙壁和家具设施上、墓碑上，当然还有麦加克尔白石殿上的幔帐(kiswah，每年更换一次)上，等等。图中是印度泰姬陵的南拱门，上面刻着《古兰经》第 36 章第 1－21 节的经文“雅·辛”。剩下还有 62 节分别刻在其他三个拱门上。这些大理石上的镌刻是来自设拉子的著名学者阿马纳特·汗的杰作。

穆斯林生活的样板的话，那么很自然，信士希望了解他都说过什么和做过什么。将对先知言行的回忆汇集起来，即成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逊奈”，它是先知“踏平的路”或先知的“习惯”。单项“逊奈”的陈述即大家所知的“哈迪斯”，它可以是这样的：“伊本·欧麦尔报告，真主的使者说：无论是谁，仿效人民的人，即属于人民。”随着时间的推移，“哈迪斯”数目增多，直至达到以数十万计；为了支持时下法律的、政治的和神学上的地位，它们开始被创造出来。所以在9世纪和10世纪，就有男人们在穆斯林世界云游，搜集“哈迪斯”。对它们进行分析，看一看从先知在世时起的一连串叙述是否合理，它们的内容是否与《古兰经》、已被证实的“哈迪斯”以及情理相符合，然后，将它们加以分类，有的属于“萨希赫”(合理)、“哈散”(可以接受)，有的属于“达伊夫”(较差)。六大圣训集成为规范，其中布哈里(卒于870年)和穆斯林(卒于875年)两本圣训集最受推崇。布哈里对庞杂的圣训加以筛选，得出2762条。后来，不同的宗教运动编纂不同的圣训集。例如，什叶派只接受阿里及其门徒所传出的圣训。

西方学者和某些穆斯林现代主义者，一直倾向于对某些长期被接受的圣训的权威性提出质疑。但是，在逊尼派世界大部分地区，圣训在形成穆斯林共同体特性，以及在形成共同的举止上，一直起着主导的作用。而且，当穆斯林共同体特别感觉到受到威胁时，为找到复兴的方向，他们常常要从圣训中寻找答案。

为了穆斯林在法规方面易于把握，《古兰经》与圣训的指导被浓缩成一种实际的形式。这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沙里亚”，它最初的阿拉伯字义是“走向水源之路”，也就是通向生命之源的路。早期穆斯林面临着急迫的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因而他们试图从真主的启示与先知的榜样中得出系统的行为法规，沙里亚就是在这种尝试中发展起来的。形成了4个解释教法的主要学派：哈乃斐(即哈尼法教法学派)，形成于阿拔斯王朝首都巴格达，由阿布·哈尼法(卒于769年)创立[①]；马立基(即马立克教法学派)，在麦地那法官马立克·伊本·艾奈斯(卒于795年)的实践中形成；沙斐仪(即沙斐仪教法学派)，在马立克的门徒沙斐仪领导下形成；罕百里(即罕百勒教法学派)，由艾哈迈德·[212]伊本·罕百勒(卒于855年)在巴格达建立。从表面看来，前三个教法学派在重点与技术上都有所区别；例如，哈乃斐(即哈尼法教法学派)同其他教法学派相比，对伊智提哈德(创制)，即凭借个人见解运用“择善”原则创制律例，留有较多余地。而沙斐仪教法学派则关注于他们对圣训的运用同马立克教法学派比较有限的实践之间的区别。然而，它们在重要事项上全都意见一致；各派相互承认彼此的体系同样都是正统的。在另一方面，罕百里(即罕百勒教法学派)反对它所说的早先建立的教法学派的理论创新，它是作为对它们的传统

① 该学派在他死后，由他的弟子创立——译者。

主义反应而发展起来的。但是，直至中世纪稍后的时期，它的影响所及，趋向于局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哈乃斐（即哈尼法教法学派）在亚洲大陆影响较强，沙斐仪教法学派则是在下埃及、希贾兹、东南亚和东非，马立克教法学派在穆斯林非洲的其他地方有较大的影响。

乌里玛，即学者，有知识的人，大致是这样来发展这些体系。他们认为《古兰经》包含有普遍原则，应据以对所有的事项都加以制约，而在《古兰经》不甚清晰时，则在圣训中寻求澄清。那么，沙里亚的基础，即是在这些法源可以找到的明确的指令与禁律。如果出现《古兰经》与圣训未曾给予确定指导的法的要点问题，那么大部分乌里玛就要转向“格亚斯”（类比），即通过类推进行论证，以过去就类似问题已作出的决定为基础，将该原则应用于现在所要解决的问题。随着岁月的流逝，乌里玛对法律要点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伊制玛尔”（公议）的原则，或社团协商一致的原则付诸实施。有一条很重要的圣训说：“我的社团永远不会赞同错误。”这样，如果教法专家所代表的社团赞同了某一点，那么这种赞同就取得了启示本身的典据，不允许对这一问题再形成新的想法。不断的有越来越多的法得到“公议”的支持，而凭借个人见解运用“择善”原则创制律例的余地则越来越少。到10世纪中叶，大部分学者已经宣布，“创制之门”关闭了。从那以后，如果对某个文本的重新解释，对由“公议”支持的谅解构成挑战，那么就要实行“比达阿”，这是一种标新立异的行动。伊斯兰在这一点上非常接近基督教的“异端”概念。

沙里亚是无所不包的，它囊括了人类的全部活动，界定了男人和女人同 213



卡迪是执行伊斯兰教法律的法官。从阿拔斯时代起，这些法官就可以要一个秘书坐在身旁以记录各种决定。一般而言，法官只接受名誉好的证人的口头证言，书面的证据也只有得到有声望的证人的支持才可接受。在进行裁判时，卡迪可以采纳穆夫提（即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mufti）的法律意见（法特瓦）。而且，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他拥有相当程度的弹性。比如，为了促进和保护社会的和谐，他可能选择成为两个派系之间的调解人，而不是单纯执行法律条文。本图中，一位卡迪正在为两名诉讼当事人解决问题。



亚里士多德在讲课。古希腊文化对伊斯兰文明的成长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最大的影响主要源于哲学，表现在一系列的理性研究方面，包括逻辑学、自然科学和物理学等。人们非常尊敬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影响，以至于直到20世纪，他在麦德莱赛都被尊奉为"第一老师"。

真主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同伴之间的关系。它的第一个作用是，规定了他们应当信奉什么，以及他们应当以什么样的仪式行动表达他们的信奉；它的第二个作用是，它涵盖了在欧洲法典中会被列为民法、商业法、刑法、个人法等的领域。此时，或其后，未制订任何正式的法典，沙里亚更多的是一种对于穆斯林应当有怎样举止的讨论。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行动被分为5个等级：义务性的行为、嘉许的行为、准许的或无关紧要的行为、受谴责但不受惩罚的行为、被禁止和受惩罚的行为。沙里亚告诫男人与女人所有他们需要知晓的事情：今世怎样正当地生活以及如何为来世做好准备。

沙里亚规定了穆斯林共同体的根本大法。这就是说，它永远不能全部得到实施。首先，实行一种既包括道德上的责任又包括不可违逆的规则的制度，是不可能的。其次，它总是受政治权力的现实的制约。让法律的解释者在法律领域完全自由行动，其风险统治者是担当不起的。即使他们有权力将沙里亚置于地方习惯法之上，也不可能认为这是明智之举。不过，沙里亚仍然是潜在的理想。接受伊斯兰的人原则上接受这样的思想：它所体现的认知应该尽可能地予以广泛的传播，这样，它会改变所有人的生活。

希腊与其他认知

伊斯兰认知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古代世界在科学、技术、人文学科以及管理艺术的伟大遗产，它们被纳入新的伊斯兰的文明。有的因素来自前萨珊王朝统治地区，这种因素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在巴拉维语[①]中看到。在阿达布[②]文学中存有伊朗大量的专门知识：管理指南、为官之道、在王子面前的礼仪等。有一些技术文献，其范围从武器、马术到农业与灌溉。还有一些科学文献，较著名的涉及医学、天文学和数学等领域；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印度的数字符号体系，它在阿拉伯人手中被转换成今天广泛使用的形式。当然，还有一些伊朗的文学作品，如动物生活的道德寓言《卡里拉与迪姆纳的故事》，以及后来被纳入《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这些遗产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在阿拔斯王朝时期，舒乌比耶（非阿拉伯各民族的信士，复数舒乌比斯）试图断言：伊朗文化优越于阿拉伯文化，伊朗帝王统治的思想优越于伊斯兰哈里发国的思想。到9世纪末，这一特殊的宗教上的威胁已经受到宗教学者的

214

① 约在公元3世纪至8世纪的伊朗语——译者。

② 阿达布是苏美尔的城市国家，苏美尔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最南部地区，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发祥地之一——译者。

对抗,但像查希慈(卒于869年)和伊本·库泰巴(卒于889年)这样的作家则应对了伊朗文化的更为普遍的挑战，他们培育出在阿拉伯与伊斯兰价值构架内,反映伊朗方面的主题与伊朗体裁的文学。

更重要的是希腊文化的影响，它并非是以它古典的形式来到伊斯兰世界的,而是以古代世界末期已被精心改换过的形式。在萨珊王朝庇护下,在伊朗南部的朱迪沙普尔教育中心工作的聂斯托里基督教徒保持了雅典的希腊传统。在叙利亚的安条克、呼罗珊的谋夫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哈兰,成功地保留了亚历山大城的希腊传统。8世纪与9世纪的神学辩论导致对希腊思想的好奇,两种传统传到了巴格达。许多希腊文著作已翻译成古叙利亚文。在胡纳因·伊本·伊沙克主持下，为翻译希腊文和古叙利亚文著作的巨大项目打下了根基,在出版精确可靠版本上也保持着高标准。到11世纪,翻译了至少80位希腊作者的著作,有几部著作描述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格林和欧几里得等许多重要人物。翻译著作的主题有哲学、医学、数学、物理学、光学、天文学、地理学,以及占星术、炼丹术和巫术等神秘技术。像后来的希腊人一样,穆斯林也不喜欢希腊的文学与历史。

从希腊传统中得到认知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哲学,因为它强调理性、逻辑和自然规律。穆尔太齐赖派,即"分离者",将这些认知应用于神学目的。面对着异教徒——摩尼教二元的上帝概念、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概念,穆尔太齐赖派决心坚持,真主绝对是独一的、超然存在的。他们集中于以下一些问题上:在《古兰经》中所说的真主的属性,是真主自身的一部分,还是纯粹的隐喻?《古兰经》本来是真主本体的一部分,还是被创造出来的?人的生活是前定的,还是说人对自己的行动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许多穆斯林相信《古兰经》文字的真实性,采取前一种立场;穆尔太齐赖派则展开哲学上的透视,持后一种立场。这样,在8世纪和9世纪形成了两种神学立场:一种立场主张通过启示理解真主,另一种则主张通过理性理解真主。

艾什尔里(卒于935年)在对立的立场之间建立了十分重要的桥梁。艾什尔里是巴士拉穆尔太齐赖派最主要的神学家的学生，他是因在斋戒期间做的梦而转到相反的立场上去的。他从此确信,《古兰经》的文字是真实的,但是他以他那种"建立桥梁"的方式,用理性论证其立场的正确性。然而,理性只能在某一限度之内运作,超过了限度,便要让位于宗教信仰了。所以真主是惟一的,他有永恒的属性,但这些属性并不就是他，也不能同他脱离。所以,《古兰经》不是被创造出来的，但当传授给人的时候，又会成为被创造的。所以,真主对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善的还是恶的,都可作出决定;但是男人和女人作为这些行动的载体,负有责任。艾什尔里透过历史对理性与启示所做的综合,依旧是传统逊尼派的神学立场。 [215]

艾什尔里的成果在伊斯兰主流思想中规定了理性主义事业的限界，但



一名苏菲派信徒带着一只猫。猫至少在阿拉伯的穆斯林中倍受珍爱，这源于埃及，猫曾长期被看做神圣的动物。苏菲派的许多传记中都提到，先知喜欢猫，他认为猫很干净。据说这些虔诚的信徒们宣称自己通过模仿猫在鼠洞前专心等候的样子，学会了如何安静而聚精会神地思考和默想。

他绝不是要终止哲学的思索。的确，作为早些世纪对希腊思想的回应，伊斯兰文明造就了一系列成就辉煌的哲学家：被称为“阿拉伯人的哲学家”的肯迪(卒于870年)、来自突厥斯坦的法拉比(卒于950年)、哲学家兼官员的伊本·西拿(阿维森纳，卒于1037年)、医生兼穆瓦希德王朝宫廷高官伊本·图斐利(卒于1185年)以及继承伊本·图斐利的伊本·鲁什德(阿威罗伊，卒于1198年)等。在他们所论证的思想中有：哲学真理是普遍有效的，宗教象征主义是传播真理的等而下之的方法，理性是通往真理的最可靠的途径，以及真主是原动力（其中本质与存在是一体的）。这些思想肯定不为多数信士所接受。哲学认知注定会继续存在于穆斯林文明的边缘，而且同传播这些思想的穆斯林世界相比，肯定会在中世纪的欧洲产生更大的影响。

神秘主义认知

认知的第3个组成部分是神秘主义，亦即常人所称的苏菲主义。鉴于沙里亚已经规定了穆斯林同真主以及同他们同伴之间的正式关系，苏菲主义则教导人们如何在他们的心中了解真主。苏菲派过着他们自己的生活，并依照他们所设计的方式规范思想，以便能够获得个人对真主的直接的体验。

苏菲主义是作为穆斯林虔诚信仰的一个独特部分而发展起来的，这种虔诚信仰是由《古兰经》、先知的宗教实践以及早期穆斯林社团所培育的。其所以如此，一部分的原因是阿拉伯穆斯林接触了他们所征服的地域上的基督教传统及其他神秘主义传统，另一部分原因是对大马士革伍麦叶王朝宫廷的道德松弛和世俗性质所做的回应。“苏菲”这个词，可能源于阿拉伯文中“羊毛”一词，用来表明神秘主义者所穿的简朴的羊毛衣着，同华丽的世俗衣着形成对照。

开始时，苏菲派的基本感觉是对真主以及末日审判的畏惧。著名的早期216神秘主义者哈桑·巴士里(卒于725年)宣称：“信士因悲痛而觉醒，又在悲痛中睡去。这就是环绕他的一切，因为他处在两种可畏的事情中间：一是他所经历过的罪恶，可是他不知道真主会对他怎么样；二是所规定的期限，它依然存在，但他不知道什么样的灾难会降临到他的头上。”然而，到伊斯兰的第二个世纪，爱的教义突起。女圣徒拉比亚(卒于801年)对真主说：“我以双重的爱爱你：我幸福的爱和完美的爱，爱你是因为这爱是属于你的。”不过，苏菲派并不满足于这种热切的爱的信条。到伊斯兰的第三个世纪，他们开始形成“内心方式”的教义，或向着真主进行精神旅行的教义。这条道路存在着不同的阶段，分别与苏菲派不同的修炼水平相对应。神秘主义者一般是男子，他们首先是探索者，然后是行者，然后才是入门者。他通过自我克制和增强对真主的意识的过程，沿此路前进。他离真主越近，真主便会越多地同他说话，控制他的肢体，从他的心中赶走种种欲望，直至达到最后阶段：自己已经消失，并被真

主完全吸收。

到此时，已形成两种态度：一种是陶醉，另一种是清醒。两种人都通过接受贫穷，而将自己交托于真主的意志。陶醉者在进入自己消失，并被真主完全吸收的最后阶段时，漠视《古兰经》和伊斯兰法。哈拉智（卒于922年）是持这种态度的典型，他带着他的苏非派的预言穿越印度北部和中亚。为了表示他与真主的一致，他宣称"我就是真理"，他虽费了很大的力气，还是在巴格达被残忍地处决了。被称为"贫穷的孔雀"的祝奈德（卒于911年）是清醒者态度的典型。他坚持说纯粹的自我消失是不够的。在现实世界仍然必须要保存自我，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生活中遵守《古兰经》和教法。

与这些接近真主的各种方式相并列，还有一些尝试，即形成对真主及其与人的关系的先验理解。苏非派提出，超越宇宙的真主的精神之光会在人类中被反映出来。人类要找到存在于他们中间的神的本体，必须克服他们的世俗本性。在希腊的学术著作被译成阿拉伯文以后，苏非派还提出深受新柏拉图神秘主义影响的方式。源自真主的宇宙先是处于精神体现阶段，然后是物质体现阶段。人类可以通过内省的认知，进入物质体现阶段，然后进入精神体现阶段，最后看到真主的显圣。

到10世纪与11世纪，社会与政治上的对立与伊斯兰各种不同部分的认知交汇在一起，表现为一系列的紧张。阿拔斯哈里发国的式微，导致中东什叶派政权的崛起。尽管什叶派中的十二伊玛目派大体上对传教不甚关心，但是伊斯玛仪派是庞大的传教者队伍：埃及伊斯玛仪派的法蒂玛王朝统治者

人们正在砍下哈拉智（卒于922年）的四肢。"当清晨来临时，"巴格达法庭文书赞吉的官方证言写道，"长官让人把哈拉智带到船桥西头警察局总部的空地上，下令刽子手执行鞭刑。过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难计其数。在对他抽打了1000鞭之后，他们砍去了他的一只手，然后一只脚；接着又砍掉了另一只手，另一只脚。（他当时被扯起来，绑在人们都能看得见的杆子上。）他的头被砍下，躯干被焚烧。我当时正在场，一动也不敢动；他的躯体在余烬中扭曲着，火焰仍在燃烧。"



217 在从北非到中亚和阿富汗的地区派遣了传教者。此外,什叶派政权不仅构成对逊尼派主导地位的挑战,构成对伊斯兰权威的理解的挑战,而且创造了希腊认知得以大行其道的环境。在巴格达,罕百里(即罕百勒教法学派)强有力地推进捍卫逊尼派伊斯兰的行动,他们不允许理性科学在他们形成对伊斯兰理解的过程中有任何位置。在第二种紧张状态中,罕百里居于中心地位;他们对诸如艾什尔里这样的理性教派在逊尼派社区中的影响并非漠不关心。对他们来说,希腊的学问是必要的,它可以支撑启示以及先知的榜样。然而这一次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因为艾什尔里派神学家在他们检验哲学影响的斗争中,在展示其神学时,越来越多地使用哲学方法。于是,苏非派某些人,尤其是那些陶醉者,要求通过直接的个人体验获得对真主的认知,便成为局势紧张的又一根源。他们对沙里亚的支持者、法学家和宗教学者进行挑战。这一要求贬低了法在穆斯林社会中的作用。而且,他们应用希腊诡辩的先验论证明自己;他们常常拥有一种信念:圣徒的超自然的本领是真主意志的载体,或者两者都信仰;他们在穆斯林一般居民中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这些紧张局面在沉浸于认知的不同部分的人之间,并没有出现不可逾越的鸿沟,其所以如此,同一个人的成就有很大关系,这个人就是中世纪伊斯兰最伟大的人物,确实也是穆罕默德以后最有影响的人物——阿布·哈米德·安萨里(卒于1111年)。他在年轻的时候即被委任巴格达尼扎米亚(法庭)学218 院高级教授职务。他才华横溢,但是,像他在他动人的自传《救迷者》中告诉我们的那样:"我所教的是认知中不重要、没有价值的那些部分……我教学的动机……不是为真主服务的神圣愿望,而是我想得到有影响的地位和广泛的承认。"他将肉体与精神分开,离开他的职位,过一种苏非派的生活。安萨里在他的学术生涯中,考察了他那个时代思想的各主要部分,并加以综合,它至今一直被置于逊尼派伊斯兰中心的地位。他揭示了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的论点,并一一加以驳斥。他揭示了理性科学对宗教理解的潜在贡献,特别是在抨击伊本·西拿的著作《哲学家的矛盾》中做了这种揭示,同时他论证说,尽管它们在数学与逻辑方面很有价值,但是它们永远都不能让穆斯林了解超越宇宙的真主。于是,安萨里再次肯定艾什尔里的理性神学,在这一神学中理性严格地服从于启示。最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本人发生重大转折的结果,他揭示了在苏非主义与沙里亚伊斯兰之间搭桥的可能性。在搭桥的过程中,他说明:要找到真主只靠智力是不行的,要通过个人体验。穆斯林肯定期望了解的,不仅仅是真主已启示于他们的那些认知,而且还要在他的心中了解真主。安萨里在他的最重要的著作《宗教学科的复兴》中发表了他对宗教的看法。人们称他为"伊斯兰的复兴者"。

到12世纪初安萨里去世时,规范的伊斯兰认知的基本轮廓业已形成,它的形成是真主向人揭示的认知、先知的行动,同源自伊斯兰以前中东伟大的

认知遗产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古兰经》与哈迪斯居于伊斯兰认知的顶点，它们的指引体现于沙里亚之中。为它们服务的是理性认知与神秘认知这一对相关组成部分，他们的洞察有助于增强沙里亚对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但是超越启示所规定的界限则是不被允许的。这就是美国研究伊斯兰的学者伊拉・拉皮多斯所说的"逊尼派－沙里亚－苏非派"一致。不过这个一致本身是一个很大的"教派"，他指出了围绕这一"一致"出现的伊斯兰别的可能性。存在着由苏非主义、伊斯玛仪什叶主义以及哲学所表达的神秘直觉的观点，认为生活的目的不是在地球上履行真主的话，而是使灵魂变得纯洁，并与地球上的事物分离。存在着大众伊斯兰，最常见的是对圣徒的崇拜，认为圣徒可以在人与真主之间进行调节，对圣徒的迷信常常搀杂有伊斯兰产生以前的信仰与习俗。存在着什叶派，他们的习惯只在很少的方面与逊尼派有所不同，不过对他们来说，忠于阿里家族是一关键问题。伊拉・拉皮多斯的说法，这些在伊斯兰认知与理解上的不同传统，代表着"今日在伊斯兰各地仍在起作用的整套文化与宗教思想"。

1800年以前认知的传承

乌里玛和苏非派使社会能够获得伊斯兰认知，并把它传给未来的各代 219 人。对非穆斯林背景的人来说，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些传授者并不是教士，也不履行僧侣的职能；至少在理论上，规范的伊斯兰不允许在人与真主之间有中介。在大多数穆斯林社会，乌里玛的存在主要是由于社会重视他们所担当的职能，而不是由于国家愿意让他们存在。我们现在认为乌里玛与苏非派是认知的传授者，在欧洲于19世纪入侵之前，这些认知既形成了穆斯林社会的外在形式，又形成了它的内在本质。

乌里玛：正规认知的传播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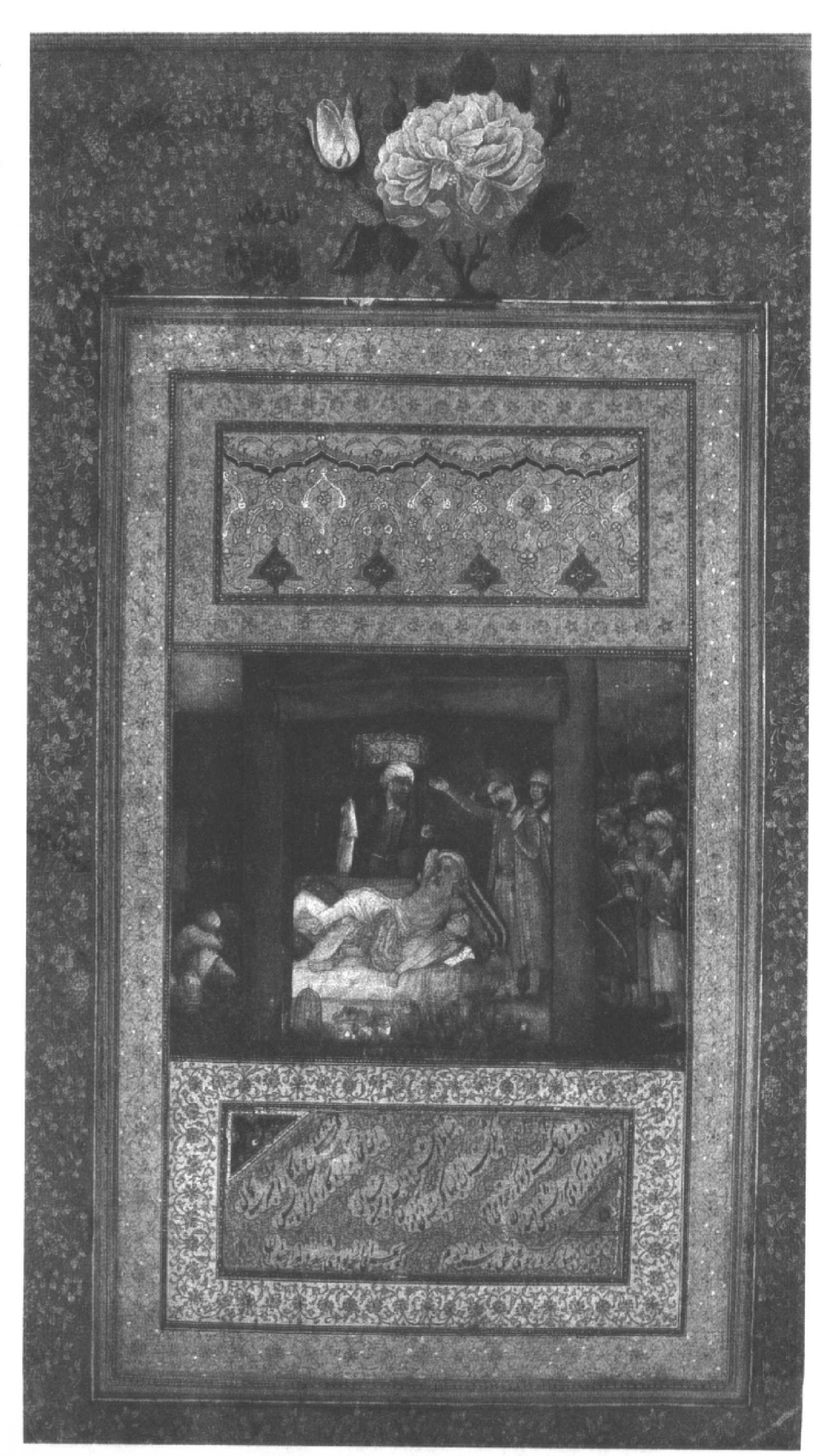
在伊斯兰世界的几乎每个角落，都能找到乌里玛。在不同的地区他们有不同的头衔：在伊朗、中亚和印度北部说波斯语的地区，称毛拉；在说阿拉伯语的伊斯兰中心地区，称谢赫；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称吉雅伊；在西非，称麦拉姆，或卡拉莫口。他们履行的职能很广泛。他们可以管理清真寺、学校、医院和孤儿院；他们也可以是朝臣、外交官，或主要官吏。但是他们的首要职责还是维护与传授沙里亚。作为学者，他们维护自己对沙里亚的理解；作为"卡迪"，他们以国家的名义管理沙里亚庭；作为"穆夫提"，他们以社区名义解释沙里亚，为社区发布不受指控的"法特瓦"（教令，教法决定）。他们在他们举行的仪式中让穆斯林记住其履行沙里亚的责任，在学校里对儿童进行沙里亚的教育。

220 卡迪是那些想要引起公众注意乌里玛伪善言行的人的特殊受害者。比如，匿名诗人们这样“赞扬”马穆鲁克大法官伊本·纳基卜：

一位卡迪，
当双方寻求和解时，
他却用具有约束力的话重新激起他们的争端。
他好像
对这个世界及其奢华毫无感觉，
但是私底下，
他对骆驼的粪便也不会拒绝。

喔，人们请停下脚步
倾听关于我们卡迪的美好品质，
（他是一个）同性恋者、醉汉、通奸者和受贿者，
（他还是一个）搬弄是非的说谎者，
他的判决端赖于心血来潮。

设拉子的谢赫·萨阿迪在他的《玫瑰园》一书的故事中也体现了类似主题。在这个从《玫瑰园》复制来的精致插图中，莫卧儿皇帝沙杰汗任命的以谦恭和受尊敬而享有盛名的一个卡迪，被国王发现正跟一个小男孩厮混在一起，两人在一整夜的寻欢作乐之后精疲力竭。无论这幅图画揭示了这名卡迪多么丑恶的特性，但书中的故事结局依然是非常圆满：这名教法官最终以其机智和诙谐的辩解赢得了国王的原谅。



乌里玛可以有一系列的生活来源。有些乌里玛不靠国家的土地赠予或薪金过活，但多数得到社区的支持：虔诚信士的捐赠；感谢者的赠予；他们从事手工业或商业的收益。在国家有强大力量的某些地区，如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大量的乌里玛可以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形成某种官僚机构。在另一些地区，即国家力量常常衰弱的地区，如印度尼西亚和西非，他们的存在基本上不受国家控制。当然，在这么长的时期里，在乌里玛与特定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会有大的变化。萨法维王朝统治的伊朗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明显：为了支撑萨法维王朝的统治，什叶派乌里玛被移植过来，但结果它在伊朗社会中的力量膨胀，以致对国家的权力构成挑战。这说明，乌里玛的特性与职能范围很广，从开罗、大马士革和巴格达显贵家族的乌里玛，或西非大教士家族的乌里玛（如塞内冈比亚[1]的杰克汉克家族，其历史可追溯到13世纪），或历史可追溯到14世纪的萨噶那努古家族的乌里玛，到小镇清真寺的领拜人或农村学校教师。

在本社区里的重要的、且往往居于主导地位的人物，不可避免会成为评论的焦点。在14世纪的开罗，他们的自负受到戴特大头巾与套袖的街头演员的讽刺。在奥斯曼统治时期，人们指责苏莱曼大帝的伊斯兰教大长老胡加·切列比“对政府人员过度殷勤和软弱”。腐败的“卡迪”成为诗歌与绘画的主题。此类评论之所以会出现，充分表明乌里玛普遍受到珍重。先知说：“毫无疑问，有知识的人是先知们的继承者。” 221

乌里玛在他们住宅的接待室、清真寺与陵墓的院子里，也在“麦德莱赛”（宗教学校），或特别构筑的经学院里传经布道。确实，在中世纪穆斯林世界的许多地方，“麦德莱赛”直接源于动词“学习”，它是教育的聚焦之地。“麦德莱赛”似乎是首先在呼罗珊形成为特殊机构的。在11世纪和12世纪，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也打下了根基，这是在长期受什叶派政权威胁的地区，为维护逊尼派传统而采取的措施的一部分。12世纪末在大马士革至少有30所“麦德莱赛”，在开罗这一数字也不相上下。

到这个时候，“麦德莱赛”已成为伊斯兰的主要机构。这一中世纪时期创办的学校有一些一直存在到现在，如开罗972年建立的爱资哈尔，或是14世纪中期在非斯建立的布依南尼亚。同样，在安排院子周围的师生房间时，“麦德莱赛”要体现伊斯兰建筑的经典形式，以便能够同清真寺和陵墓并排在一起。在大的“麦德莱赛”可以看到这种形式的宏伟遗址，在撒马尔罕雷吉斯坦广场，“麦德莱赛”占了3面；在伊斯坦布尔，4行壮观的“麦德莱赛”成为苏莱曼建筑群的一部分。但是，不能根据穆斯林世界许多地方“麦德莱赛”的数量，以及有些“麦德莱赛”的宏伟，就认为教和学都是十分正规的，或者已成为制度化的过程。入学时不经过考试，离开时也没有学位。而且，正如中世纪

① 欧洲人对冈比亚河南岸与塞内加尔河北岸之间，由海岸与河湾围起来的地区的称呼——译者。

传统上，穆斯林一直非常推崇认知。“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比认知更加强大有力”，传统认为，“国王统领着人民，但学者则统领着国王。”由于同样原因，认知的传承成为一种重要的虔敬行为，它是一种个人对个人的行为。本图中的学生可能一直在有意追寻这位作为研究特定经文专家的老师。他将向他们口述这篇经文，并就其内容进行分析。他们将记住经文的内容并进行复述。当他们能够流利地背诵整篇经文并令老师感到满意时，老师将颁发给他们一个可传承本经文的证书(ijaza)。在这种资格证书上面，将列出所有曾经传授宣讲过这篇经文的人们的名字，一直追溯到它的原创作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教学是在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里进行的。



开罗研究所揭示的，在募集捐赠方面，教师的薪金和学生的津贴通常在优先次序上较为靠后。“麦德莱赛”主要定位为可进行传授之地。安排通常都是不怎么正规的；它们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事情。

这种个人对个人进行传授的性质的核心在于：传授基本上都是口头上的。这是先知最初向他的门徒传达他从真主那里得到的启示时所采用的方式。穆斯林男孩和女孩的首要任务是用心学习《古兰经》，然后大声背诵。这一学习方式和传授《古兰经》的方法给所有其他认知的传授都打上了印记。14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在他的《绪论》一书中论述传授艺术的杰出篇章时说：“《古兰经》已成为教育的根基，成为后来可能会养成的所有习惯的基础。”于是，当教师在“麦德莱赛”课程中讲授经文时，向他的学生(一般是男孩)口述课文，学生们会把它写下来，通常还要把它背下来，教师写的课文是押韵的，这样便于学生记忆。随后，视课文的情况可能会做一些解释。学生复述课文并对之进行解释以后，对该书的学习就算完成了。如果教师对学生的表现感到满意，就给学生一个“伊加扎”(意为获得合法资格)，这是讲授该

222

课文的许可证。10世纪一个从课文作者处获得此合法资格的人说的话，揭示了这一传授过程的个人性质与口述性质："我把我的书交给你，还有我写的东西也都从我的手交到你的手。我把这诗体文授权给你，你可以从我这里传走。这一传接一直是在听过和读过之后才完成的。"这个学生也可以在他的"伊加扎"上看到一个名单，上面有所有传接该课文的人的名字，可以一直追溯到最初的那位作者。他可以知道，在持续进行口头传授的链条里，他只不过是一个最近的链节。



米尔·赛义德·沙里夫·朱尔贾尼阅读库特布丁·马哈茂德·拉齐·塔赫坦尼的著作《〈阿拉伯人的逻辑〉①一书逻辑基础详解》时批注中的一页。后者是塔赫坦尼对纳吉姆丁·阿卜勒·哈桑·阿里·本·乌玛尔（一位影响深远的沙斐仪学者和逻辑学家，卒于1276年）《阿拉伯人的逻辑》一书的评论。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塔赫坦尼的评论和他的学生朱尔贾尼的批注在从伊朗到印度广大地域内的"麦德莱赛"中广泛使用。许多穆斯林学术都是以这种评论和批注的形式作为载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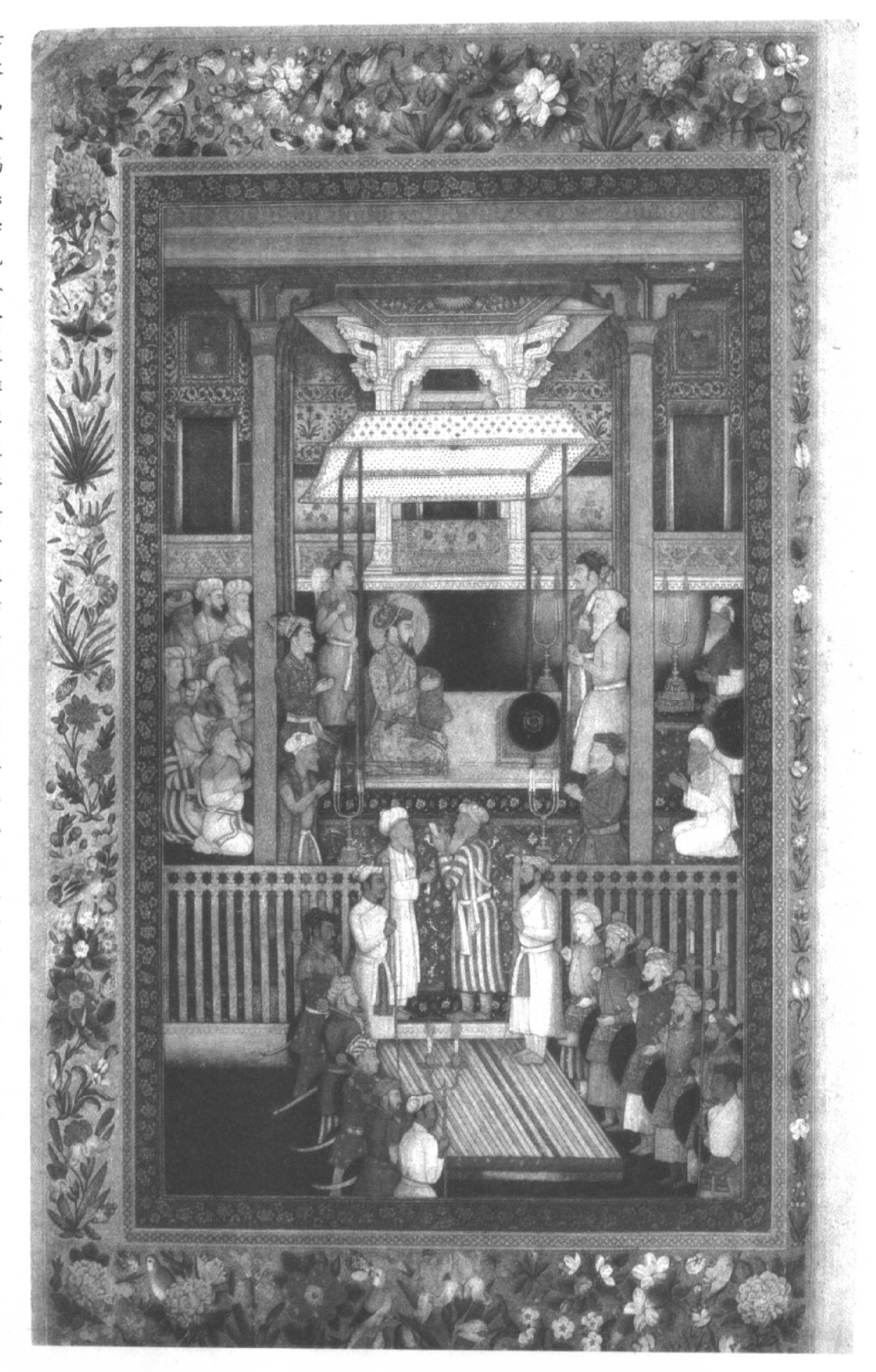
人们有理由问：这样一种高度重视书籍的文化为什么会如此看重口头传承——这一文化积累了大量 223 藏书，促使学生去买书，而且存在着许多默读的机会。其原因是穆斯林从根本上怀疑写下来的话可以作为交往的可靠手段，尤其是不经监督而学来的那些写下来的话。伊本·赫勒敦说："当一个学生不得不依靠书本与书写材料的学习，必须从书本里书写的文字形式中理解科学问题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种）遮蔽物……它把手写稿和书写的文字形式，同想像中的口头语分割开了。"课文作者是通过大声朗读而首次发表其课文的，为了了解作者在课文中想要表达的真正含义，学生必须朗读课文。学生为了得到传授该课文的权力必须大声朗读，以使对课文享有讲授权威的教师本人感到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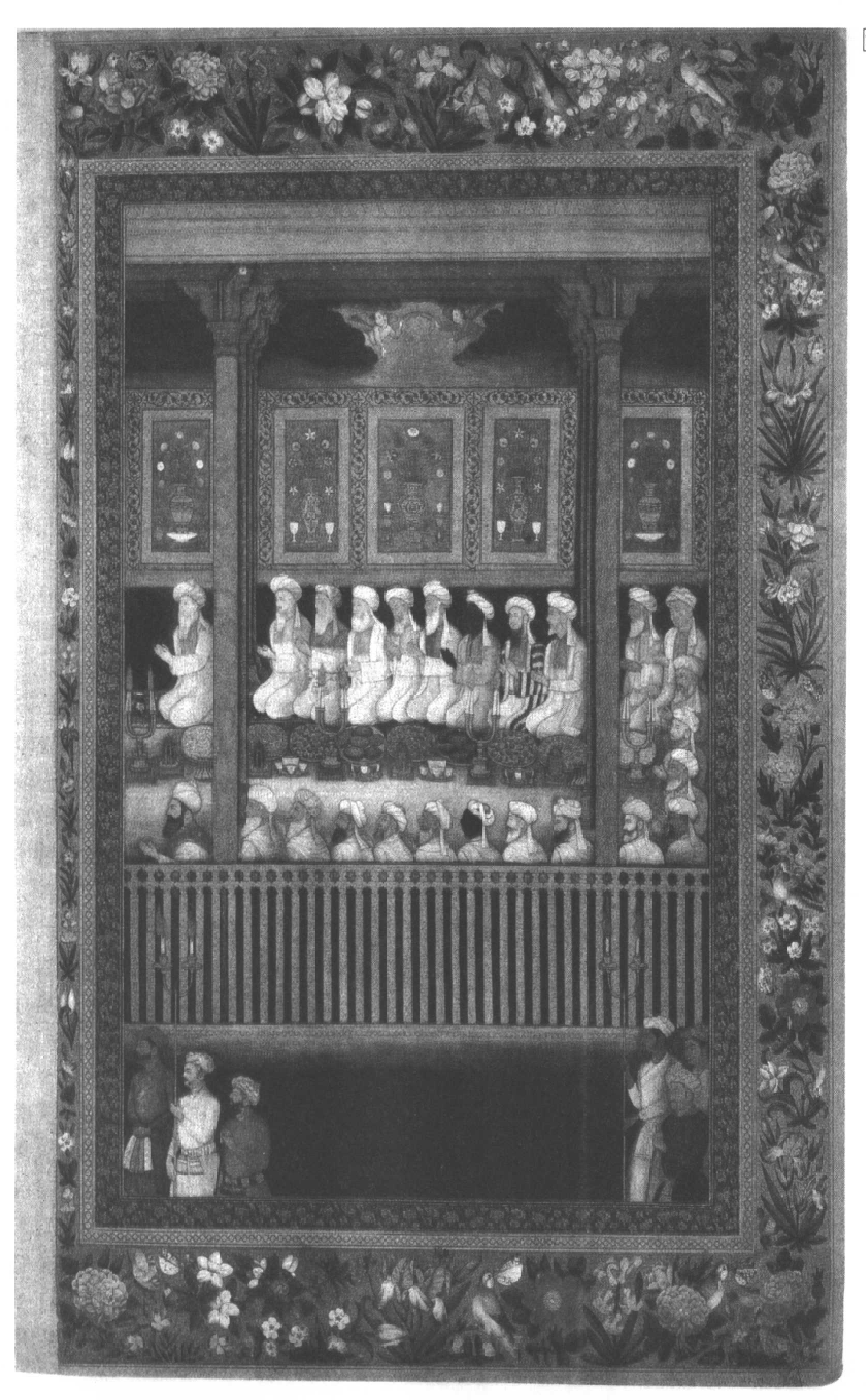
伊斯兰文化中两个持久存在的特征，可以解释这种个人对个人传授的重要性。一个是"塔兹基拉赫"（集体传记）的写作形式。它可以包含特定时间、地域或家族的学者。传记中在记载家庭的详细情况后，可以记载该学者的老师是谁，该学者学习过什么，该学者都教过谁。记述能表明该学者作为认知传授者可靠性的轶事，同时列出他在认知上的贡献。这种记录个人对个人传授伊斯兰中心教义的传记一直持续到今天。第二个特征是在伊斯兰传统中，对教师给予很大的尊重。13世纪一本教育手册上说："要知道……一个人除非掌握受尊重的认知，受教于掌握这一认知的人，否则不能获得认知，也不能从中获益。一个人（也必须）歌颂和尊敬教师。"在20世纪初，情况没有什么不同。印度北部一位重要的学者说："学生应当走在教师后面几步远的地方，他应该力求成为第一个执行他老师吩咐的人……如果师生意见相左，教师的话是起决定作用的。"

学生在进"麦德莱赛"开始学习以前，对阿拉伯语要有一些了解，如有

① 此书名系作者的意译，原书名为 At-Risara at-Shansiyya——译者。

224 在穆斯林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找到学者，即乌里玛（拥有认知的人）。乌里玛的作用极为广泛：管理清真寺、学校、医院和孤儿院，充当侍臣、外交官和政府官员。然而，他们最重要的功用是，维护和传承伊斯兰教法律，使其能通用于本时代的社会。尽管有一重要的教义认为学者们应该回避掌权者——“最差的学者才拜访统治者”，人们常常引用这样的圣训，“最好的统治者则拜访学者”——但是，只要乌里玛维护和支持法律，他们一般就很容易成为统治者的支持者。在这幅描绘1640年场景的精致细腻的图画中，莫卧儿皇帝沙杰汗正为乌里玛举行招待宴会。可以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学者尊重他们世俗的统治者。





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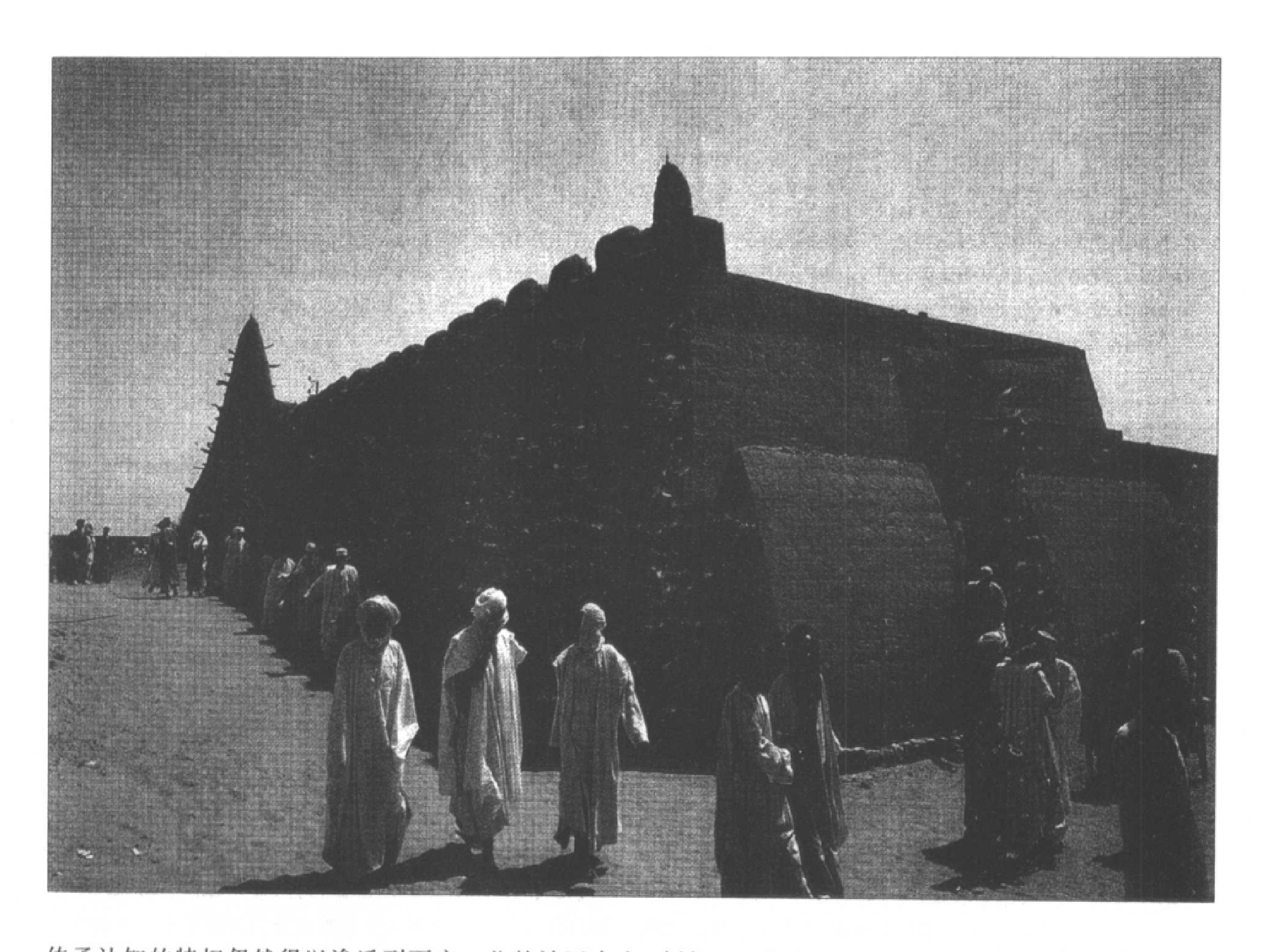
幸，要能记住《古兰经》。然后学生要学习阿拉伯语法与句法、圣训、《古兰经》评注、修辞学、法和审判等书。偶尔有少量的算术，这是乌里玛在发布教令时需要用的；也许还有医学或苏菲主义方面的课程。神学，以及支持性科目逻辑与哲学，不为所有的人接受：在罕百勒、马立克和沙斐仪等教法学派的“麦226德莱赛”要么全都禁止，要么只容忍一阵；只有在哈乃斐（哈尼法教法学派）和什叶派“麦德莱赛”普遍接受。

到1500年，在“麦德莱赛”认知的大多数领域，都有名副其实的经典文本流传。例如，有谢赫·布尔汉丁·马尔基纳尼（卒于1196年）撰写的哈乃斐教法学派的基本著作《希大亚教法经》。还有巴伊达维撰写的被广泛接受的《古兰经》评注。随着时间的推移，像这样的经典之作成为权威性的著作，没有什么新的著作出现。在注家几乎占了压倒之势以前，乌里玛倾向于将自己限定为撰写对经典版本的一般评注与高级评注。在有的时候，如像帖木儿宫廷萨阿德丁·塔夫塔扎尼（卒于1389年）和米尔·赛义德·沙里夫·朱尔贾尼（卒于1413年）这两大对手进行评注的情况，这类著作有助于“麦德莱赛”学生深刻理解经典文本。的确，这些著作到20世纪仍在使用。

这种教育制度的趋向是保守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乌里玛知道，他们通过《古兰经》和先知的生活，已经从真主那里得到最珍贵的恩惠；他们也知道，到审判日之前，对人类不会再有进一步的指引了。为了共同体的利益，以尽可能纯粹的形式尽力将真主的这一馈赠，以及解释它的才能传下去，是他们的首要职责。他们距离先知时代越远，真主珍贵的恩惠被部分败坏或丢失的机会也就越多。不存在穆斯林发现更多真理的可能，只存在他们对真理的维护减少的危险。死记硬背的学习在这一保护与传承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尽管在较高层次上的学者致力于强调理解的重要性。认知倾向于规范化：穆斯林在学习事情应当是怎样的。

这种教育制度往往是精英主义的。例如，在中世纪末期开罗的乌里玛中，似乎一直存在着这种由来已久的担忧：教育的民主化会导致标准的降低。他们抨击那些炫耀其华美服装和庞大头巾的同事，担心他们追求时髦而不注重学问会导致愚昧无知，只知炫耀自己是学者。他们还抨击这样一些人：他们不学无术，只是在重复自己；在课堂上睡觉；犯十分简单的错误。表现得这么差，让人很难区分完全是出于懒惰，还是根本不够格。而且还有这样的乌里玛，他们认为所有的穆斯林都应该进入“麦德莱赛”学习。伊本·哈吉（卒于1336/1337年）说：“锁上‘麦德莱赛’的大门，也就把群众关在了门外，阻止他们听取（背诵）认知……不让他们得到认知本身以及了解认知的人（即乌里玛）给他们带来的福祉。”如果乌里玛不让普通大众了解认知，他们自己也就不能从中获益。

227 很明显，尽管某些乌里玛担心他们作为精英的职业名望，但是认知以及



传承认知的特权仍然得以渗透到更广一些的社区中去。例如，16世纪的廷巴克图不仅是大的学习中心，而且有理由相信那里已经是男人全都识字的地方；那里有150多所《古兰经》学校，为大约7万居民服务。在14世纪和15世纪的开罗，许多"麦德莱赛"都能和当地社区很好地结合在一起。"麦德莱赛"的工作人员，如诵经者、"穆安津"、守门人等，和学生一起上课，城镇的普通居民也上课。然而，人们没有别的地方像当众背诵圣训那样参与认知的传承。在这些表现虔诚及学习的场合，普通穆斯林可以获得"伊加扎"（意为获得合法资格），并成为传播珍贵认知的人，这些认知可以通过先知的同伴而达于穆罕默德本人。在这里妇女也可以发挥其作用。萨哈维（卒于1497年）收集了他那个时代大约11000位显贵的传记，其中有1075位妇女的传记。其中受过某种形式的宗教教育的有400位。在认知的各个领域中，妇女最为杰出的是圣训，在这方面妇女可以比得上男子。其中大马士革的艾沙在这方面尤为卓越。她的学识是如此的渊博，以致圣训的著名学者伊本·哈吉尔·阿斯噶拉尼（1372～1449年）将她列为值得他骄傲的教师之中。大马士革的艾沙是如此地受尊敬，以致17世纪的一位历史学家认为她是她那个时代最可信赖的认知传承者。 230

桑科尔清真寺[①]，始建于14～15世纪，是廷巴克图两座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16世纪，在阿基特家族的庇护和支持下，该清真寺成为该城的主要学习中心，以其在"麦德莱赛"中讲解和评述《治疗之书》而闻名。这本由卡迪·伊亚德（卒于1149年）写的书，因论证了先知的使命及其对圣训和沙里亚的含义，而得以流行于整个北非与苏丹。

① 今马里境内——译者。

228

科 学

伊斯兰科学是建立在前人，特别是古希腊人、伊朗人和印度人成就的基础之上的。以伊斯兰教诞生后第一个百年的速度打造的伊斯兰世界体系使科学家们能够在从中亚、印度到西班牙和北非的广大世界中相互交流和影响科学开始形成相当程度的国际性。在此后大约600年或更长时间里，阿拉伯语成为世界主要的科学交流语言，它给欧洲各国语言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种影响至今在代数和算法中依然清晰可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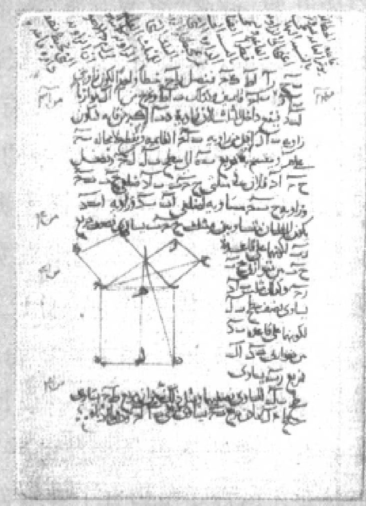
穆斯林对于科学的贡献是巨大而广泛的，其程度至今尚未被完全了解。数学就是这类成就的例证之一。例如，在数字理论和计算法方面，中亚的比鲁尼（卒于1046年）就曾经做过一系列的研究。当代伊斯兰科学史学家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这样描述比鲁尼著名的西洋象棋盘问题：

按要求得给出与在象棋盘上的子粒总数相符的子粒，在象棋盘上按照这样的方法布局：第一个方格中有一个子，第二个方格中有两个子，第三个方格有四个子，如此类推直到摆满64个方格。"王"起先接受了这一规则，但很快却发现在它的整个王国里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子粒。

比鲁尼发现，这一问题的答案是18，446，744，073，709，551，615，用现代数学的形式表达出来是$\sum^{64}2^{n-1}=2^{64}-1$。公元950年，乌克里德西已经发现了小数，这是用来约略计算那些没有确切答案的数字的方法。这一发现被15世纪伊朗数学家贾姆西德·卡沙尼（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发明了一种计算工具）纳入这一学科的主流。这成为数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几何学方面，穆斯林沿着古希腊数学家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解决了许多以前未能解决的问题。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以作品《鲁拜集》闻名于世的欧玛尔·海亚姆①(1048～1131年)，而伟大的什叶派科学家纳绥尔丁·图西（卒于1274年）则重新验证了欧几里得几何定理的真实基础。今天仍在研究的三角学也是由穆斯林数学家建立和发展起来的；"sine"一词便是直接译自于阿拉伯语的"jayb"，意为"曲线"。因此，穆斯林同样也是代数学的奠基者，"代数"也来自阿拉伯语"al-jabr"，意为"恢复"。这一学科是由穆罕默德·伊本·穆萨·花拉子密（约卒于846年）创立起来的，"算法"便以他的名字命名②。欧玛尔·海亚姆（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同时更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则把它推向了顶点。在伊斯兰文明中，数学的影响随处可见，特别是它的建筑和装饰艺术，更是集中地体现了这一影响。

另一项伟大的成就是天文学领域。穆斯林天文学家继承了古希腊、伊朗和印度的成就。从公元9世纪起，随着托勒密和其他古希腊天文学家著作被翻译成阿拉伯文，他们的研究开始获得飞跃，天文台做了很多改进，取得许多重大成就，其中包括对摩苏尔附近的子午线进行测量。在11世纪，比鲁尼吸收了前人的所有成就，写成一部伊斯兰天文学的概要《麦斯欧德天文学和星占学原理》，这部著作在天文学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等同于伊本·西拿的《医典》在医学上的地位。同样在11世纪，伊本·海伊撒姆（拉丁语称之为阿勒哈臻，卒于1039年）也因其光学著作而扬名天下，他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测量空气密度的方法，同时指出空气密度对于天文观测的影响。在11～12世纪，西班牙和马格里布的科学家们开始以一种批评的态度分析研究托勒密的天文学。在13世纪，纳绥尔丁·图西和他的研究小组经过在伊朗西北部马拉盖他所建立的著名天文观象台的认真工作，以确凿的论据对托勒密的星际运动理论提出批评。这一著作被拜占廷翻译成希腊文，最终影响到哥白尼和其他欧洲天文学家，他们运用图西的这一重大发现提出了日心说理论。

医药是伊斯兰科学取得重大成就并对人类产生深刻影响的第三个领域。许多学者投身于伊斯兰医药实践中，因为这样做使他们能够保持健康以坚持其他研究。伊斯兰初期的医生们继承了古希腊—亚历山大、近东、伊朗和印度的各种医学传统。这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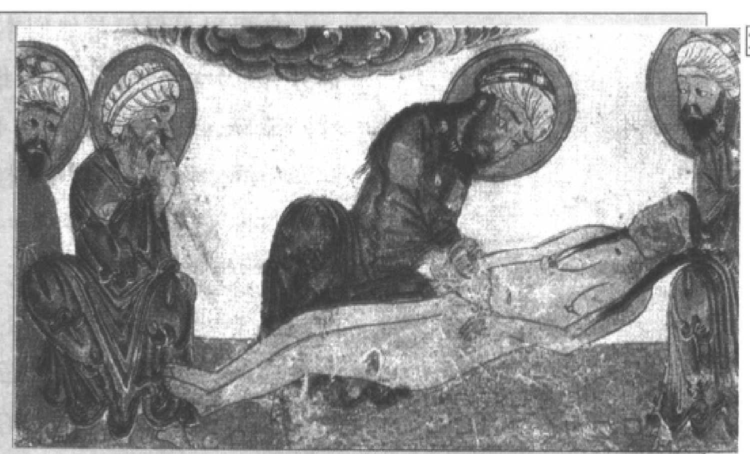


纳绥尔丁·图西依据先前的阿拉伯译文，对欧几里得论证毕达哥拉斯定理发表见解。

① 旧译莪默·伽亚谟，古波斯诗人，所写的《鲁拜集》为每节四行的长诗——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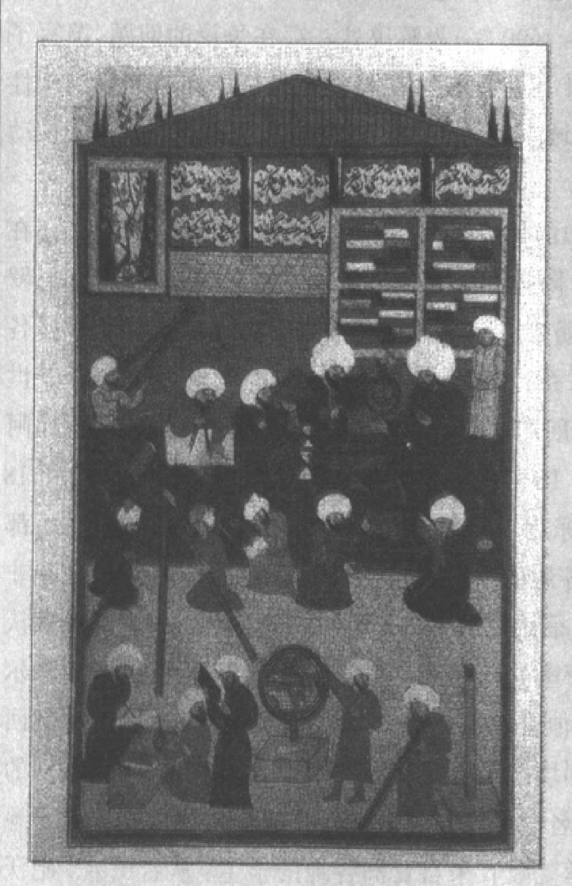
② "算法"的拼写"algorithm"即从他的名字"al Khwarazmi"演化而来——译者。

面第一位伟大人物名叫穆罕默德·伊本·扎卡里亚·拉齐（西方人称拉齐斯，卒于公元925年）。比鲁尼列出了他的184部著作，其中现在还存在的有50部，他最重要的著作是一部关于医药的大百科全书《医学集成》，西方称之为《医学大百科全书》。它对每一种病兆，都列出了希腊人、叙利亚人、印度人、伊朗人和阿拉伯人的看法，并根据自己日常的临床观察加以注解，然后提出他自己的看法。然而，医药领域最伟大的著作家是伊本·西拿，他的《医典》无疑是医药史上最有影响的著作。该书在12世纪被翻译成拉丁语，至少到16世纪一直主导着欧洲的医学教学。还有其他一些著名的医药学家，比如安卢西亚人伊本·祖赫尔（即安文佐尔，卒于1161年），他撰写了关于饮食的著作；伊本·鲁什德（阿威罗伊，1121～1198年）撰写了关于医疗普遍原则的著作；以及叙利亚人伊本·纳菲斯（卒于1288年），他发现了血液微循环。在19～20世纪，在穆斯林世界的许多地方，伊斯兰医药体系已让位于西医。然而，它们至今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仍方兴未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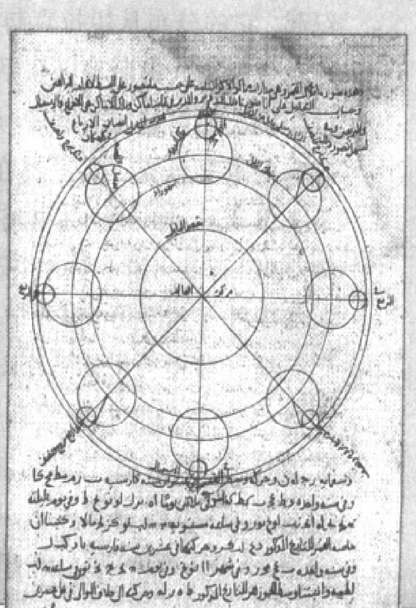


就像希波克拉底和格林等前辈一样，穆斯林医学也是基于对血、痰、黄疸和黑疸四种体液的和谐的理解之上的。这种和谐不同于个体之间的和谐；诊断是为了发现这种和谐是怎样被打破的；治疗则专注于恢复和谐。治疗基本上是以保守治疗为主，穆斯林医生不赞成手术。然而，就像比鲁尼一本书中这个剖腹插图所展示的那样，人们承认，在迫不得已的个别情况下，进行手术也不可避免。

穆斯林科学这颗明星曾经如此璀璨，其星光所及之广，以致今天人们总是禁不住有许多疑惑：为什么它止步不前了？为什么它的研究没有能够导引出逻辑的结果，就像图西的星际运动理论那样?究其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主要的障碍是，穆斯林科学家的世界观认为，衡量知识的标准是它是否符合于伊斯兰教。可以说，中国和印度文明在促进其科学和数学发展和发现方面不如穆斯林成功。最后，这一问题应该归结为：为什么欧洲取得了如此大的进步，而其他地区都落后了？



1575年在塔吉丁建立于伊斯坦布尔的观象台工作的奥斯曼天文学家：注意所显示的仪器不少，这个地方似乎呈现着一片繁忙景象。



伊本·沙提尔著作中的一页。伊本·沙提尔是14世纪大马士革的天文学家，他提出几种非托勒密的太阳、月亮和行星运动模型。他继续了纳绥尔丁·图西的探索之路，质疑地心说的星际运动理论。

乌里玛不仅仅是他们本社会中的精英。许多乌里玛成为国际精英的一部分,因为学问是伊斯兰各地共同分享的真正的国际事务。正如人们可以想像的那样,许多书在各个由不同的教法学派占主导地位的地区是为人们所共同享用的。例如,廷巴克图的马立克教法学派的乌里玛使用的许多书,同摩洛哥与埃及所使用的书是一样的。奥斯曼帝国、中亚与南亚哈乃斐(哈尼法教法学派)的乌里玛也是这么做的,在这些地方塔夫塔扎尼和朱尔贾尼有益的文本尤其受欢迎。由于哈乃斐(哈尼法派)和什叶派对理性学科较为开放,所以在这一领域,萨法维帝国的什叶派乌里玛的文本同莫卧儿帝国的逊尼派乌里玛的文本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于是有一些书在逊尼派世界通用,而不管他们是属于其中的哪一教法学派。六大经典圣训集自然是这样,一些综合性巨著也是如此。例如从西班牙到东南亚,安萨里的《宗教学科的复兴》被广泛使用;再如苏尤蒂评注《古兰经》的《加拉雷恩》,在印度北部、西非都受到欢迎。

分享典籍的世界意味着分享辩论与参照的世界。1637年当苏门答腊的亚齐素丹国的乌里玛们,就应该对伊本·阿拉比(卒于1240年)的著作采取何种态度进行争吵之时,在麦地那对争论产生反响,那时麦地那主要的学者之一易卜拉欣·库拉尼(1615~1690年)为解决这一存在争议的问题,撰写了一本权威性著作。在17世纪和18世纪较为明显的是从伊朗向印度输出理性科学的认知与理解,然后该领域杰出的印度学者又输出到埃及与西亚,推动了当地该领域的研究。

乌里玛们在这一分享认知的世界具有广泛的联系。在一个地区内存在着家族的联系:比如古拉姆·阿拉的后裔至少从15世纪起即分布于上尼罗河谷地区;再如勒克瑙的法朗吉·马哈勒家族从17世纪起分布于印度各地。同时也有跨地区的家族联系:比如马吉里西家族的跨地区联系,从17世纪起,它的分布从伊拉克与伊朗的城市直到穆尔希达巴德和孟加拉;再如阿伊达鲁斯家族的跨地区联系,16世纪它要分布在阿拉伯半岛南部,而到18世纪则扩展到这样的程度:从东南亚经印度到东非,在整个印度洋的边缘,都有它的重要分支。乌里玛在各地的周游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师生关系也并非是不重要的。的确,乌里玛们很认真地看待圣训中的这一告诫:为了寻求认知,他们应该出游。例如,安萨里先是在家乡呼罗珊的图斯学习,然后到朱尔兼和内沙布尔学习,作为学者他去过巴格达、麦加、大马士革和埃及,后又回[231]到图斯。乌里玛从廷巴克图到埃及与西亚大的学习中心进修,但是还有别的同等的选择,比如特莱姆森著名学者马吉利认为去西苏丹是值得的。像麦地那的易卜拉欣·库兰尼圣训学院吸收来自亚洲各地的学生:从希贾兹、肥沃的新月地带、安纳托利亚、印度到印度尼西亚群岛。伟大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04~1369年)在1325~1354年走过的地方,其长度与广度相当于40

多个现代国家,他有时作为“卡迪”进行工作,生活舒适,但有危险,他留下了关于他的高尚而迷人的风险经历的口述游记。在鲜明地揭示出有多少东西为整个伊斯兰世界所分享这一点上,还没有哪一个传记能够超过它。

苏菲派:精神认知的传播者

苏菲派,或人们所说的“真主之友”,同乌里玛相比,更是无所不在的。乌里玛倾向于在城市和存在着愿意支持教法的国家权力的地区发展。在另一端的苏菲派则活跃于社会的各个层面,以及有穆斯林居住的所有地方。而且他们的风格和方法特别能适应于血缘与部落组织至高无上的地区,通常是伊斯兰的边境地区。

从 10 世纪起,就有一些门徒集团开始聚集在苏菲派特定的导师的周围,学习如何效仿他(偶而也有女导师)特定的“塔里格”,即“旅行”[①]寻道,以获得对真主认知的直接体验。有的时候他们聚集在“罕卡”(苏菲派的道堂),在其中过一种规范的虔诚的生活。“罕卡”常常用于进行救济与传教事宜。所有的门徒,不管是不是“罕卡”社团的一部分,都要履行他们“塔里格”的主要仪式,这是他们导师的“齐克尔”——赞念真主的一种特殊方法。这可以包括诵念安拉之名,以使精神集中,摆脱世俗事务,或是利用气息技巧,以加强注意力的集中。通常举行集体仪式,一些能手通过唱歌、音乐和舞蹈寻求出神入迷的宗教体验。门徒一旦将自己置于导师的掌控之中,那么他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服从导师,即使这样做会背离沙里亚;如同俗话所说的,他到头来“犹如洗尸人手中的尸体”。

传承跨越时空的神秘认知的主要一环是导师与门徒的关系。尤为重要的是导师的“哈里发”,即继承者、有天才的门徒,他们受命传授导师的教导,并训练自己的门徒。他们成为他们导师“道统”,即传承链条的一部分,这个链条可以通过他和他的前辈追溯到建立他们神秘之道的圣徒。“哈里发”往往就成了圣徒本人。

门徒在被引进神秘之道的时候,要宣誓效忠于导师,从导师手中接过“基尔噶”,即斗篷,还被告知该道创建者特别的保护性的祈求(“希兹布巴赫尔”)。该门徒也会得到一份表明精神认知的传承链条的证书,这个链条从先 [233] 知开始,通过他的同伴,通常是阿里下传,然后通过早期阿拔斯王朝一两位神秘主义者,传至创建该道的圣徒,然后再到他的导师。新入道的神秘主义者,像获得传授圣训的“伊加扎”的宗教学校学生一样,也要知道,他已经成为珍贵的认知的贮藏者,这一认知可以回溯到伊斯兰共同体的创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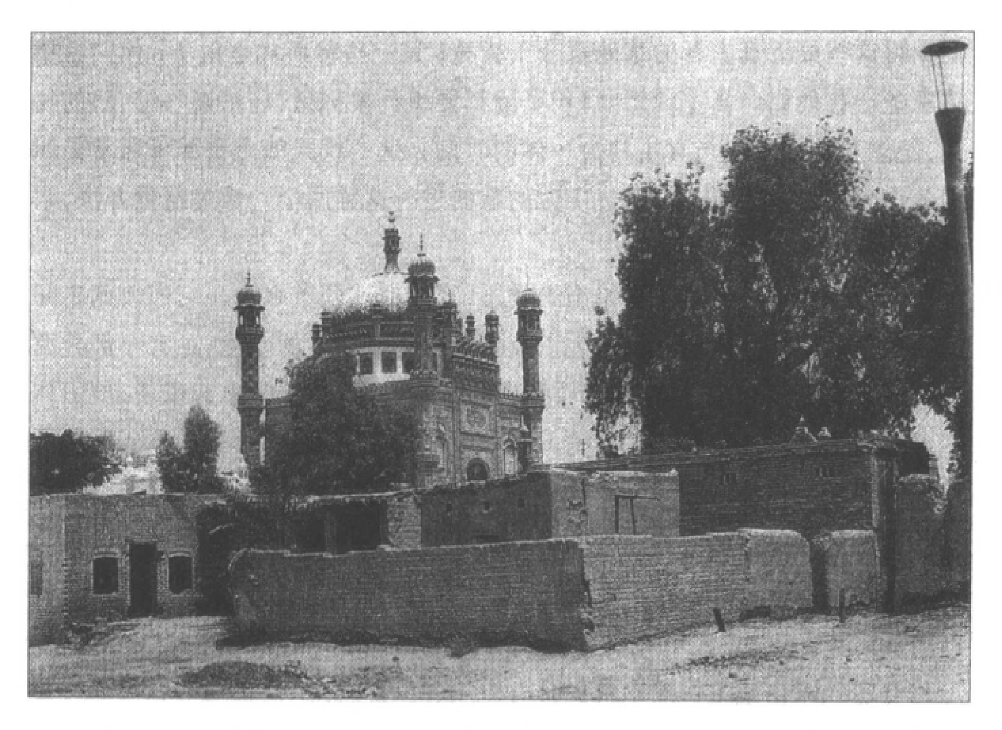
对特定的苏菲派之道的追随者来说,焦点在于创立者圣徒的陵墓。这一

---

① 苏菲派认为,人生在世,犹如寄在旅途——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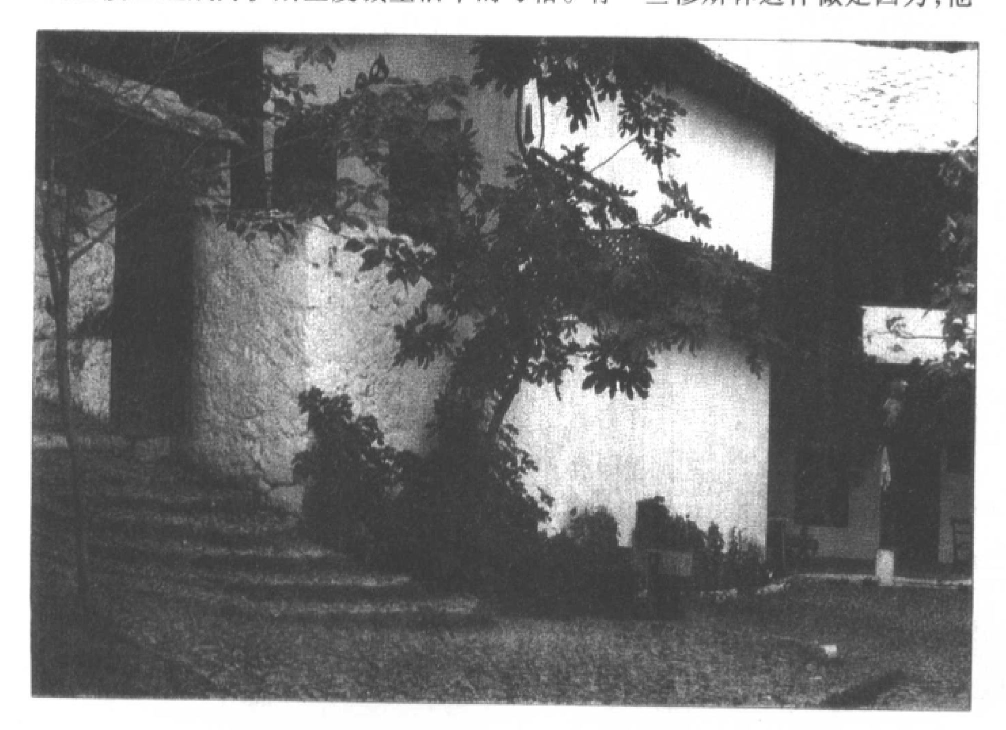
232

苏菲派每一位谢赫（导师）都将仔细认真地监督和指导他的门徒们的精神发展，并传授给他们独特的“齐克尔”（赞念真主），即纪念真主的方式。在这幅17世纪中叶的莫卧儿绘画中，门徒们正在6位谢赫面前演练舞蹈“齐克尔”。一些舞者已经进入迷睡状态。门上方的铭文是用波斯文刻成的：“多么不同寻常的聚会啊：他们把华丽的珠宝和千顶王冠都给了一位募捐者。”



穆斯林世界到处都有圣陵，那里是虔诚的穆斯林可以靠近那些接近真主者之地。在前现代时期，绝大多数穆斯林都请求一位圣徒在真主面前为他们说情或美言。这里我们看到的是18世纪西莱基语诗人萨卡尔·萨尔马斯特的圣陵，位于信德省凯浦尔附近的达拉扎。这个印度河河谷省份里的圣陵以其壮丽的瓦工建筑而闻名。今天，在信德人中，萨卡尔·萨尔马斯特成为仅次于比特的沙·阿卜杜·拉蒂夫的第二大认同标志和象征。

陵墓通常由与该圣徒有血缘关系的后裔进行管理，其职能已经演化成主要是仪式上的，而不是精神上的。他们管理圣陵的建筑物、它的苏菲社区、它的捐赠物以及它的慈善事业。苏菲派主要教团创立者的陵墓，比如阿布杜勒·卡迪尔·吉拉尼(卒于1166年)在巴格达的陵墓，是国际朝觐的中心，他的继承链条遍及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地区。还有不多的圣陵是地区的、当地的崇拜中心。同“麦德莱赛”的情况一样，陵墓为长方形，通常装有圆顶，周围环绕着门徒可以居住的“罕卡”和房舍等建筑，这是伊斯兰建筑的一大特征。而且，拜谒圣陵已经成为伊斯兰虔诚生活中的习俗。有一些穆斯林这样做是因为，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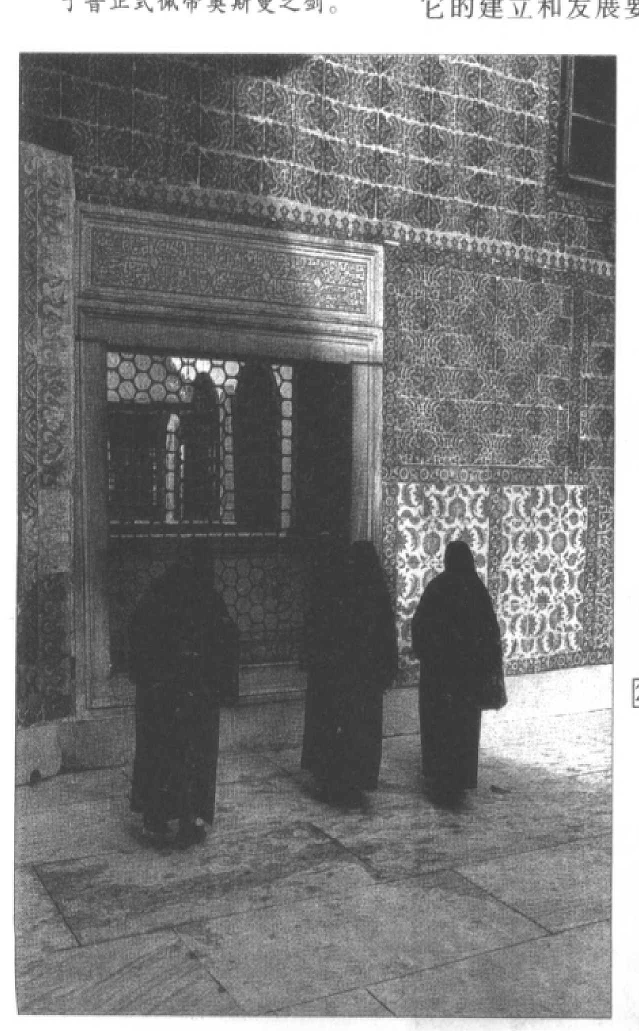
一座苏菲派的旅客招待所，位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莫斯塔尔南6英里的布拉嘎吉村。注意墙壁上用阿拉伯文写的苏菲派赞念真主的字符“hu”。巴尔干地区的苏菲兄弟会认为自己同中亚具有历史渊源。其中包括比克塔什、卡迪里、毛拉维、哈尔瓦提、纳格什班迪耶和马拉米亚等教团。比克塔什教团在阿尔巴尼亚就有着特别强大的根基。

们觉得这些接近真主者的墓地适合于祈祷；另一些穆斯林是由于，他们希望请求圣徒替他们向真主说情。每年圣陵都要举行被称做“乌尔斯”(结合)的仪式，纪念圣徒的灵魂与真主结为一体的时刻。这一仪式的主要部分通常是回忆各个时期(依某些传统，通过虔诚的歌曲进行这种回忆)，通过这种办法，宗教认知得以从先知传至圣徒。

三名妇女走向位于埃于普(Eyup，土耳其语为阿尤布，Ayyub)的阿尤布·安萨里陵墓，它位于金角湾，紧靠伊斯坦布尔城墙外围。阿尤布·安萨里是先知的朋友和旗手，相传死于674～678年间的第一次阿拉伯攻城战役。埃于普是伊斯兰世界最神圣的朝觐地之一。1453年素丹穆罕默德·法提赫在征服君士坦丁堡以后，在阿尤布·安萨里的陵墓周围修建了一组建筑。后来的奥斯曼素丹在掌权以后，都要到埃于普正式佩带奥斯曼之剑。

234 从13世纪起，苏菲派开始组织教团，其数目达到数百个。它们彼此之间的区别一部分源于它们在仪式上以及赞念真主方式上的变化，还有一部分源于它们遵循沙里亚的程度，或允许偏离沙里亚的程度不同。总起来说，他们体现着比较松散的隶属关系。的确，这一部分纳格什班迪耶教团的苏菲派们所奉行的习惯做法，在另一部分纳格什班迪耶教团的苏菲派中深受责难。然而，穆斯林各地宗教兄弟会的这种联系仍然是关键性的渠道，沿着这一渠道伊斯兰的认知得以传播，靠这一渠道，当需要之时伊斯兰认知会得到重塑和获得新的活力。

有些教团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都有影响。例如，苏哈拉瓦迪耶教团即将它们的影响从西亚扩大到印度东部的孟加拉。它在遵守沙里亚方面格外小心，它的建立和发展要回溯到巴格达的苏菲派人士艾布·纳吉布·苏哈拉瓦迪(卒于1168年)，以及他的侄子希哈布丁(卒于1234年)。沙兹里教团不仅从摩洛哥经北非到西亚传播其教义，而且激励着现代的几种复兴运动，同时还是欧洲与美国新加入苏菲派者所喜爱的活动中心。沙兹里教团从西班牙苏菲派人士艾布·麦得彦·舒阿伊卜(卒于1197年)那里找到自己传统之根。纳格什班迪耶教团从谢赫·白哈丁·纳格什班迪(卒于1389年)得名，而不是得其特殊的“道”，纳格什班迪的陵墓位于布哈拉郊外。纳格什班迪耶教团在亚洲各地扩展。从18世纪起，它们既是维护伊斯兰主张的最强有力运动的激励者，也是该运动的系统。而卡迪里教团成为分布最广的教团，它是从巴格达圣徒阿卜杜勒·卡迪尔·吉拉尼传下来的。在西非，最近几个世纪他们也一直同维护伊斯



235 兰主张的运动联系在一起。

许多教团尽管仍很重要，但一直局限于特定的地区。在印度，最有影响的教团是契斯提教团，它决心避开那些有政治权力的人。不过印度也有许多如马拉麦提斯教团和海兰达里耶教团那样的非正规的教团，他们尊奉当地的许多习俗，也不受沙里亚的制约。在西亚，里法伊教团以其大声、刺耳的“齐克尔”(赞念)闻

名，由此获得“嚎叫的苦行者”的绰号，它还以吞火和生吃活蛇头的奇异习俗闻名。在安纳托利亚和奥斯曼帝国有近卫军所喜爱的比克塔什教团，他们向他们的导师忏悔，使用面包、酒和乳酪举行类似基督教的仪式，他们是真主、穆罕默德和阿里准三位一体论者。此外还有毛拉维教团，它是受神秘主义大诗人哲拉鲁丁·鲁米的激励而发展起来的，由于他们在赞念时不停地旋转跳舞，因而在西方被称为“旋转的苦行者”。

在苏非派教团得到巩固的同时，对于伊斯兰发展有极大重要性的神秘主义理解也在滋长。其始作俑者是在塞维利亚受教育的西班牙苏非派人士伊本·阿拉比。他在麦加朝觐时产生了神圣宝座的幻象，在那里他被告知：在圣徒中，他站在最前边。这激励他撰写了名著《麦加的启示》，他在书中提出了“存在单一论”。真主是超越宇宙的。而且由于所有的创造物都是真主的显现，所以它在本质上与真主是同一的。因而，对男人与女人的存在来说，真主是必需的，但是，同样，对真主的显现来说，男人与女人也是必需的。伊本·阿拉比在阐释他的学说时，常常求助于这一著名的口传教义——真主传达下来但未写入《古兰经》的启示：“我处于隐的状态，但想要大家知晓，于是我创造了我可以被知晓的世界。”而且，阿拉比在表达这一意像时，创造了丰富的、象征性的词汇，苏非派的思想、哲学思想和新柏拉图主义思想被进行了巧妙的综合。

若干世纪以来，伊本·阿拉比一直被学者（既包括穆斯林学者，也包括基督教学者）谴责为泛神论，在伊斯兰世界的一些地方被禁。然而，西方学者已开始承认：他总是坚持真主是超越宇宙的，他的意像是坚定地以《古兰经》为依据的。但是我们所关心的是他对苏非派后来的发展以及穆斯林对宗教的理解所产生的影响。

伊本·阿拉比的成就与权威在于，他为苏非派的话语规定了实际的做法，从此以后苏非派的话语便集中在他的“存在单一论”的概念上，集中于调和他的两种意象的问题上：他对真主与物质世界相互关系的意象与他对《古兰经》的想像。诗歌在他的思想的诸载体中并非是最不重要的。而且阿拉伯 [236] 语和非洲语诗歌同具有较高的波斯传统的诗歌、亚洲语言的诗歌一样多。在波斯诗歌方面有哲拉鲁丁·鲁米，他的《玛斯纳维》被说成是波斯的《古兰经》；设拉子的哈菲兹（1325/1326～1389/1390年）的《诗集》中有一些世界上最卓越的诗篇；或者是赫拉特的贾米（1414～1492年），许多人认为他是最后一位神秘主义大诗人。在亚洲语言的诗歌方面，有安纳托利亚的尤努斯·埃姆雷（卒于1321年）的诗歌、印度旁遮普的布勒赫·沙（卒于1754）的诗歌和印度信德的沙·阿卜杜·拉提夫（卒于1752年）的诗歌。如此广泛地吸收“存在单一论”思想的结果是，降低了遵守沙里亚的重要性。如果每一件事都是真主所使然，那么奋力将真主的启示在地球上付诸实施也就不那么重要

了。一心一意地与真主结为一体也就万事大吉了。但是,如果有人把这一点看做是伊本·阿拉比对伊斯兰历史消极影响的一面,那么他们不可能看不到它也有积极的一面。不管是否他始料所及,伊本·阿拉比的意象使穆斯林对非穆斯林传统的态度变得更宽容与灵活,这有助于世界各地的苏菲派在穆斯林与无数的地方宗教传统之间建立起桥梁。

苏菲派在将伊斯兰启示传入乌里玛不能自信或从容地加以推动的某些地区与社会这方面具有关键的作用。确实,在广袤的伊斯兰世界,他们常常是本宗教的第一个负荷者。他们在伊斯兰中心地区的作用我们知之较少,但是他们在北非、安纳托利亚、巴尔干、中亚与南亚的成就我们知道得很多。在这些地方他们渗入到新近被穆斯林军队征服的地区,沿着国际商道取得一席之地,打下巩固伊斯兰的基础。如果不把苏菲派的作用考虑在内,便无法思考伊斯兰在中亚或在印度的信德与孟加拉地区的牢固立足。离家乡更远的苏菲派也是很重要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地区,伊斯兰的开创神话要回溯到漫游圣人的抵达。在爪哇,他们提到9位圣徒的工作;在苏门答腊,他们提到苏菲派人士的到达,这些人是坐着"麦加国王"派遣的船来的。

苏菲派在将他们的教义传入非穆斯林社会时,得到伊本·阿拉比明显的不拘泥于教条的思想的支撑,不坚持一定要严格地实施沙里亚。首先,他们没有这样做的权力;其次,他们总是想减少同当地宗教传统的冲突。实际上,他们的政策通常是在客居的共同体中寻找接触点以及社会角色。他们同具有其他宗教传统的人分享他们对宗教体验的认知。他们在人民和他们所不能控制的所有人生无常者之间充当中间人和缓冲者。他们由于使自己适应了当地的需要与习俗,因而逐渐确立起一种地位,能够将他们的当事人吸引到伊斯兰的环境中来,并以伊斯兰的举止教导这些人。他们将他们的思想潜移默化地渗入人的日常生活,如同一位苏菲派人士为印度德干妇女所写的诗句所表明的那样,她们在磨谷物时唱道:

237

> "石磨的把手像是'阿利夫'①,
> 它意味着安拉,
> 轴是穆罕默德,被选定在那。
> 真理的探寻者以这种方式看这种关系
> 啊,奉安拉之名,自在者安拉。
> 我们把谷物放进石磨,
> 我们的手可以证明它。
> 身体的石磨会井井有条,

① 阿拉伯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形竖直。

如果你遵循沙里亚。

啊，奉安拉之名，自在者安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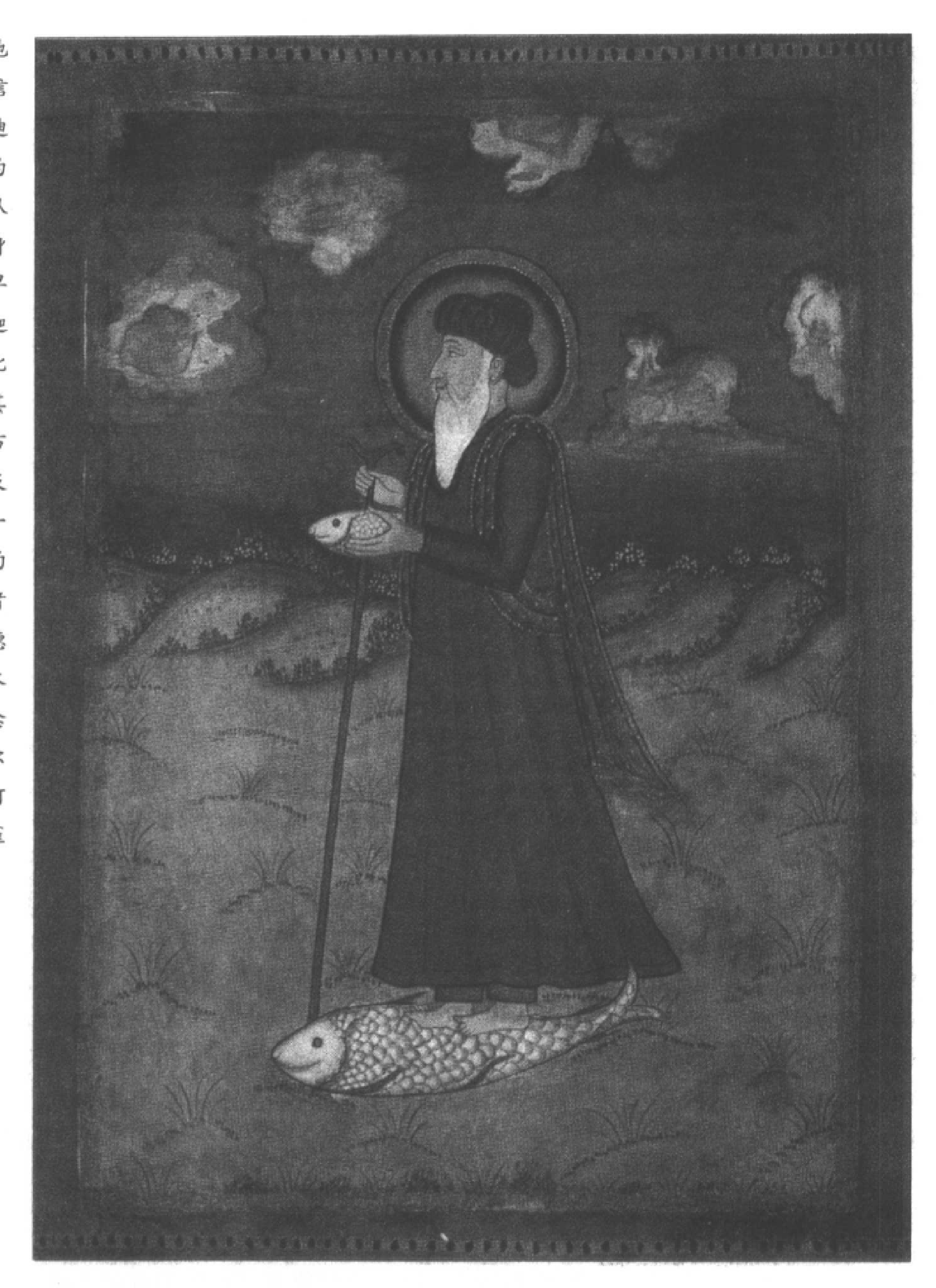
无论是对长期征服的社会的群众来说，还是就基本上是非穆斯林的社会整体来说，苏菲派在传承伊斯兰认知上都居于领先地位。在圣陵的前沿是堡垒和前哨。苏菲派在这里向人们举行宗教仪式，以促进大家所说的“大众伊斯兰”的多样性表现的进程。对树、鱼或鳄鱼的崇拜可以和特定的圣陵联系起来，伊斯兰产生前与圣乔治或“胡瓦加希迪尔”（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孟加拉所崇拜的生与重生之魂）相关的迷信也可以合并到当地穆斯林的信仰中去；圣陵，乃至清真寺常常建在先前基督教或印度教圣地的前边。一系列的仪式习俗也会被容忍：点蜡烛、扫墓，或在圣陵上系一块布以向圣徒提示某种请求。遗物有很多。大部分圣陵都有某一圣徒的遗物：斗篷、念珠或头巾等。一两处地方未必要有圣徒的陵墓，它们有先知的遗物：胡须的髯毛或脚印的模型。在这些地方，伊斯兰的习俗在反映它所包容的社会的信仰与习惯方面，往往比沙里亚所规定的举止与态度要宽松一些。

苏菲派在伊斯兰世界许多地方允许有这样的习俗，这会成为与乌里玛关系紧张的重要根源。当乌里玛看到沙里亚竟然如此地被藐视，肯定会感到不安。罕百勒教法学派的某些乌里玛拒绝与苏菲派有任何交往。其中最著名的是大马士革的艾哈迈德·伊本·泰米叶（卒于1328年）。伊本·白图泰接受了苏菲派的大部分习俗，1326年在听前者的讲道时认为，他“头脑里有奇异的想法”。而且不久马穆鲁克政府似乎同意这一看法，并将艾哈迈德·伊本·泰米叶监禁起来，他因心脏病而死于狱中。但是从17世纪起，人们越来越同情他对苏菲主义所采取的不调和的态度。现在，人们认为他体现了穆斯林复兴的精神，他的著作也一再被重印。这说明，对伊斯兰这两大塑造力量的承载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应估计过于严重。许多乌里玛是苏菲派，许多苏 [238] 菲派人士沙里亚的造诣颇深。有一种较普遍的看法认为，造诣至深的圣人是那些能在两种认知形式之间取得明智的平衡的人。

伊斯兰两大认知传统的传承者同政治权力的行使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未必就轻。苏菲派与乌里玛的不同集团对君主们的态度都是对立的。契斯提教团大圣徒尼扎木丁·奥利亚的教团特别强调要避开君主，他说：“我的房子有两个门，如果素丹从一个门进来，我将从另一个门离开。”而苏菲派的其他一些教团，像苏哈拉瓦迪耶教团和纳格什班迪耶教团等，则对政治权力有特殊的兴趣，至少在它们历史上的某些时期是如此。但是，乌里玛总是趋向于 [239] 支持政治秩序，尽管他们对个别君主一直有许多非难，这是因为这种秩序是实施沙里亚所必须的。

伊斯兰认知的传承者与君主的关系间或也有实际决裂的时候。这种决

苏菲派的作品把许多地方上的教前习俗同穆斯林信仰融合到一起。有关和卓希迪尔的作品就是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例证之一，这里可以从18世纪晚期孟加拉人的化身中看到。图中的这个人物最早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吉迦美斯史诗》[①]中，它后来在巴比伦时期进一步展开。从土耳其到孟加拉，人们将他同春天万物复苏、富足、幸福快乐以及（象征生命的）绿色联系在一起。他帮助那些处于困苦中的人，尤其是那些溺于大海或者在沙漠中迷失方向的人。在德里，洗衣工过去常常用在朱木拿河上放流草船的方式纪念他的诞辰；而在孟加拉的穆尔希达巴德，人们则每年在恒河上放流纸船（船首通常为孔雀形状）来纪念他。



裂导致莫卧儿皇帝贾汗季在父皇阿克巴辞世即皇位之后，将纳格什班迪耶教团的一位导师艾哈迈德·希尔信迪(1564~1624年)投入监狱，希尔信迪在阿克巴统治时期说过："指导的阳光被邪恶遮挡住了。"也是由于这种决裂，伊朗17世纪末一位重要学者穆罕默德·巴奇尔·马吉里西(1627~1698年)让人当众砸碎国王酒窖里数以万计的酒瓶。然而，最终双方在很大程度上要相互依赖；穆斯林君主往往需要苏菲派和乌里玛在合法性上予以支持，这些

① 吉迦美斯是大约公元前2675年，传说中的乌鲁克王国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英雄——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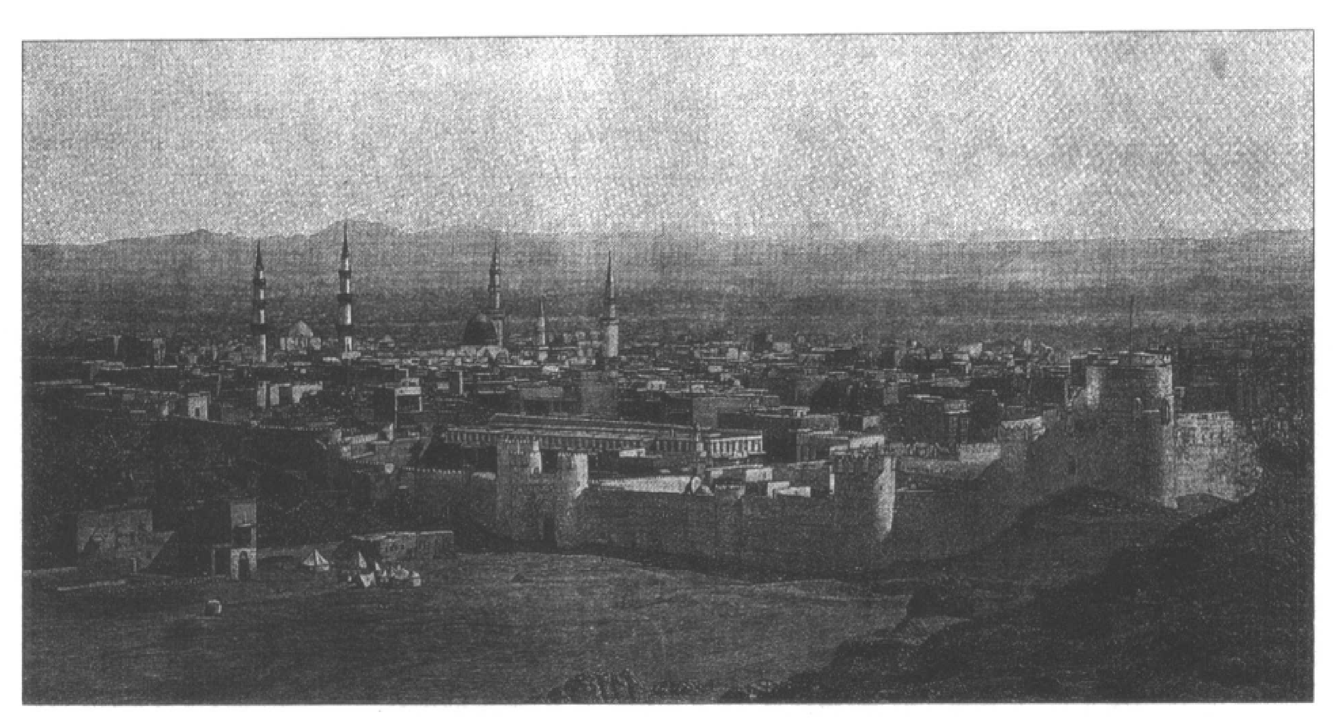
传承者也需要国家权力支持他们的认知,前者未必逊于后者。

乌里玛与苏菲派复兴伊斯兰

当18世纪穆斯林权力开始衰落的时候，认知的传承者与政治权力行使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作为回应,宗教学者与神秘主义者对认知重新加以确定,以使它能够适合于他们的社会。此时出现了对首要原则——《古兰经》与圣训的回归;对理性科学的怀疑日益增加,到19世纪,它已延伸到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经院遗产的许多方面。对苏菲派在圣陵的活动的批评,特别是对圣徒崇拜的批评，以及对任何认为圣徒或先知会为男人和女人而向真主说情的想法的批评增多了。与此同时,正像可以预期的那样,伊本·阿拉比的苏菲派的意像越来越受到质疑，尽管他的词汇依旧强有力地胜过所有的话语。艾哈迈德·希尔信迪一直反对伊本·阿拉比的“存在单一论”,主张“证明单一论”。他关于以“一切源于真主”概念取代“一切都是真主”概念的论点已被更为广泛地接受。与这一进程相联系的是那些将自己的权威之源限定于《古兰经》与圣训的学者,其中罕百勒教法学派的拥护者相当重要,他们历来既抵制苏菲主义,也抵制理性科学。在那些受伊本·泰米叶著作影响,采取这一新立场的人中，阿拉伯半岛的改革者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瓦哈卜(1703~1787年)是一极端的样板,他的名字已成为清教主义的隐喻。伊斯兰认知各个组成部分中这些新的侧重点是十分重要的。它意味着包容的伊斯兰转向越来越排斥的伊斯兰，从彼世的伊斯兰转向专注于将真主的指引在尘世间付诸实施的伊斯兰。

苏菲派将认知与行动上的新侧重点传播到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地方。这看起来好像很奇特,因为这一新立场抨击苏菲派的许多习俗,它的极端表现则抨击苏菲主义本身。然而,苏菲派对改革的挑战做了创造性的回应;他们 [240] 把对《古兰经》与圣训的强调吸收进来,作为他们苏菲派框架内的权威,贬低出神入迷习俗的意义,重新考察他们信仰中先验的倾向。改革后的苏菲主义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是重新注意先知的生平,这表现在纪念先知生日的仪式和先知生平传记的日益增多。有些人为了强调他们如何地遵循先知的道路,给自己戴上“穆罕默德之路”的头衔。并非所有的苏菲派都卷进这些新型的思想与行为的形式之中。但是从18世纪起,总的结果是苏菲派的复兴:旧的教团恢复了活力,同时又有新的教团诞生。

纳格什班迪耶教团将苏菲派新的精神带到亚洲许多地区，在印度尼西亚、中国、中亚和高加索激起著名的运动。而且纳格什班迪耶教团学者们的网状系统在印度与中东的许多地方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非洲传播新苏菲主义的是直接或间接源自哈尔瓦提教团的一些教团，哈尔瓦提教团在埃及,



19世纪的麦地那，尖塔旁边的两座圆形屋顶的建筑是先知的圣陵和先知清真寺。从公元8世纪开始，麦地那就是一个重要的知识中心。在17～18世纪，这里是穆斯林世界各地的学者向往的著名的圣训派基地。

尤其是在开罗爱资哈尔的乌里玛中富有影响的教团。在非洲还有一些教团，例如提加尼教团，其影响所及，有马格里布，苏丹的尼罗河流域和中部地区；萨曼教团的影响也达于苏丹的尼罗河流域，以及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赛努西教团的影响由在利比亚沙漠的总部而达于撒哈拉沙漠的许多地区；萨希利教团在索马里成为主导力量。苏菲派的这些运动以及苏菲派其他的运动并不经常提出圣战的号召。偶尔，此种圣战也可以导致成功地建立伊斯兰国家，例如奥斯曼·丹·福迪奥19世纪初在尼日利亚北部建立了索科多素丹国；19世纪末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在苏丹尼罗河流域建立了马赫迪国家。[241]

乌里玛与苏菲派之间的许多联系有助于支撑伊斯兰广大世界复兴与改革，近年已揭示出一些这方面的联系，例如：麦地那像易卜拉欣·库拉尼、谢赫·阿布·穆罕默德·库尔迪、塔吉丁·哈纳菲与穆罕默德·哈雅·信德西这样重要的圣训学者的这类联系。他们的学生中有许多是18世纪的复兴中的有影响的人物，其中有苏门答腊的阿卜杜·饶夫·辛吉利（1617～1690年）、德里的沙·瓦里·阿拉、开罗的穆斯塔法·巴克瑞（卒于1749年）、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瓦哈卜、谢赫·穆罕默德·萨曼（1717～1795年）以及隔一代的奥斯曼·丹·福迪奥。也门米斯加吉家族的师生联系与麦地那圣训教师及其学生之间的那种联系有重合之处，其中包括上述人物中的几个人，以及穆罕默德·穆尔塔达·扎比迪（卒于1791年）后者是18世纪末成为开罗大人物的沙·瓦里·阿拉的印度学生。许多复兴主义学者也是纳格什班迪耶教团的成员。马明心（卒于1781年）从1761年起在中国纳格什班迪耶教团中传播“新派”教义，他是在米斯加吉家族一成员的指导下学习苏菲派教义的。毛拉纳·哈立德·巴格达迪（1776～1827年）在叙利亚、伊拉克、库尔德斯

坦、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促进纳格什班迪耶教团的活动,有些地方至今仍在继续进行这种活动,他是在德里艾哈迈德·希尔信迪继承者的指导下学习苏菲派教义的。18世纪乌里玛与苏菲派之间世界范围的联系,恐怕比伊斯兰历史上以前的任何时期都多,都更有活力。然而,他们的相互作用是复杂的。人们忠告我们,在确定这类联系的内涵时要格外谨慎,同时不要忽视地方环境对促进发展方面的重要性。这就是说,伴随乌里玛与苏菲派联系而发生的思想以及心态的运动,确实说明了一种最为实际的途径,在这一途径中,这些联系是伊斯兰世界认知的"血液"与新的活力得以流动的"动脉"与"静脉"。

1800年以来对西方和西方学问挑战的回应

现时代西方的成功以及西方在穆斯林世界许多地方统治的扩张改变了伊斯兰认知存在的环境。令人怀疑的、起颠覆作用的西方认知年复一年地存在,逐渐变得更可接受了,于是它开始打算在穆斯林的心目中争得一席之地。欧洲科学的成就和世俗的启蒙运动哲学开始挑战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上帝创造世界"的思想、"他向人类展现自己"的思想、"男人和女人遵循他的启示便可以得到拯救"的思想。这一认知也开始向穆斯林多少世代以来一直十分珍视的学问大宝库中的许多方面提出挑战,这些学问宝库是穆斯林用以证明启示和服务于共同体的。

但是,在穆斯林世界,不仅是西方的认知日益成为可被广泛得到的东西,而且它还得到国家的支持:伊斯兰认知开始与权力脱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统治所造成的结果。英国、法国、荷兰和俄国在它们的帝国中形成了现代国家的结构,并使这一现代国家结构成为提供西方教育制度和用西方法典取代沙里亚许多内容的工具。其次,穆斯林国家之所以越来越多地支持西方的认知,也是抵制殖民统治这种可能性的结果。于是,19世纪奥斯曼 [243] 帝国"坦齐马特"[1]改革者,或20世纪伊朗的巴列维王朝,都力求使自己国家强大到足以让外国人难以染指。而且,从20世纪中叶起,穆斯林国家的独立与此也没有多大的区别。防止西方认知渗入穆斯林社会的过程在继续,穆斯林国家为做到这一点通常采取民族或世俗的认同,而不是伊斯兰认同的办法。大家公认,人们在获得伊斯兰专门知识方面会得到国家的某种象征性支持,但是如果说存在着某种力度的这类支持的话,那也是因为社会希望它这样做。

对伊斯兰认知构成挑战的环境中,还应该加上西方所发动的经济、社会

① 或译唐吉马特,意为"革新",指奥斯曼帝国1839~1876年改革时期——译者。

242

尼扎姆丁的课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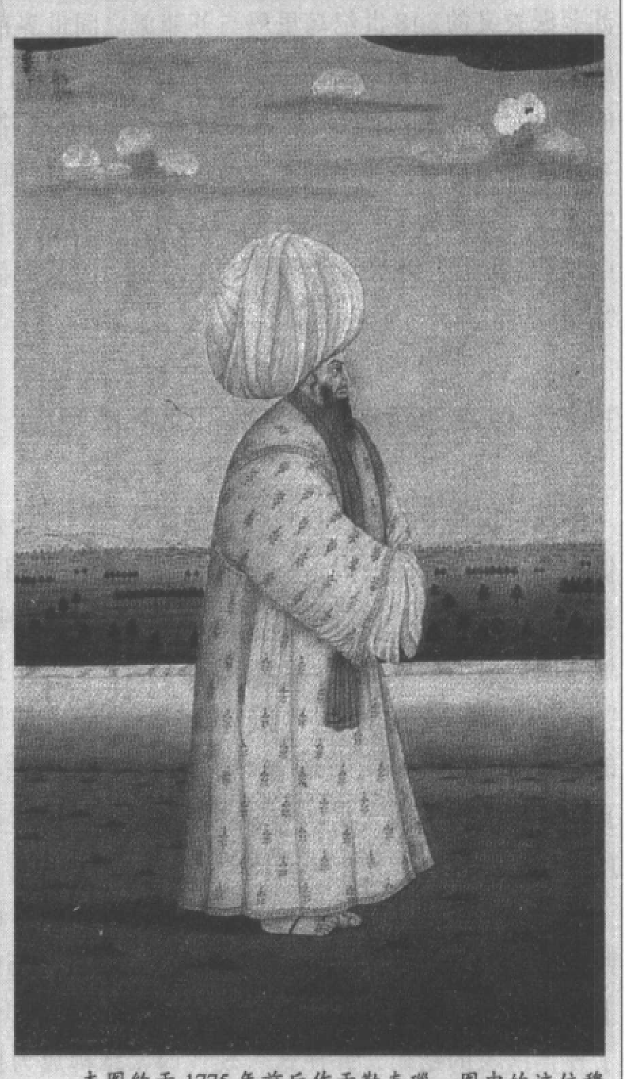
这张课程表是18世纪初来自印度北部勒克瑙法朗吉·马哈勒家族的穆拉·尼扎姆丁(卒于1748年)提出来的。尼扎姆丁主要吸收了过去150年里伊朗和印度北部地区学者在理性科学方面的重大成就。这张课程表与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帝国时代教授的课程结构类似,参考书也大致相同。它之所以在当时广为流传,首先是在于它强调理解和背诵在学习中同等重要,这样有能力的学生就可以比以前更快结束学业;其次还在于它被认为是培训政府管理人员的上佳培训方案。在穆斯林对西方知识和西方文化优势做出回应的过程中,这类课程表逐渐被人们淡忘和遗弃。

尼扎姆丁是这样划分课程表的:

解释科学	参考书数目	理性科学	参考书数目
语法和句子结构	1	逻辑学	11
修辞学	2	哲学	3
法律学	2	神学	3
法学原理	3	数学和天文学	5
逊奈	1		
《古兰经》注释	2		

这张课程表的一些主要课本一目了然地说明其受伊斯兰教中世纪的学术传统影响之深。在法律学课程中,学生学习的《教法护卫详解》一书,是乌巴伊德·阿拉·伊本·马哈茂德[①](卒于1346/1347年)对他祖父塔杰·沙里亚·马赫穆德所著《教法护卫》一书的注解。在逻辑学课程中,他们学习纳吉姆丁·乌玛尔(卒于1099年)所著的《阿拉伯人的逻辑》,同时辅以库特布丁·拉齐(卒于1364/1365年)和萨阿德丁·塔夫塔扎尼(卒于1398年)对该书的注解。在理性科学中,有很多教学内容都是伊朗和印度新的学术成就,印度人在18世纪为理性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① 亦译欧拜杜拉·本·麦斯欧德,他注释的《教法护卫》亦译《伟嘎业》、《卫道精解》、《维卡亚教法》等,是哈乃斐(哈尼法学派)著名教法经典——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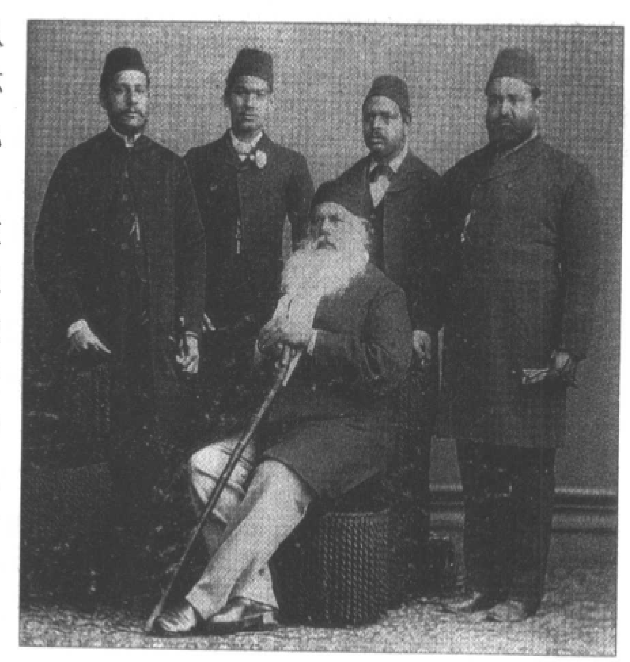


本图约于1775年前后作于勒克瑙。图中的这位穆夫提[mufti,在伊斯兰教法律中有权提出意见(即法特瓦)的学者],可能遵循尼扎姆丁的教学大纲,他甚至还有可能是法朗吉·马哈勒家族的一名成员。法朗吉·马哈勒家族在200多年的时间里,在勒克瑙的逊尼派穆斯林共同体中扮演着这一角色。理性和推理能力对一位穆夫提而言,是一种特别重要的品质。

与技术的变革。西方贸易与资本渗入穆斯林社会后,促进了大规模的商品交易,而在穆斯林学会购买西方的制成品以后,当地的工业便被破坏了。与之相关的社会变革是出现了管理新的经济与政治结构的精英:专家政治论者、官僚、银行家、知识分子、产业工人,所有这些人都属于旧的城市公有世界之外

的存在，旧的城市公有世界是手工作坊、巴扎商人、商队旅馆以及住区所组成的世界，它们长期支持乌里玛和苏菲派的活动。相应的技术变革带来了蒸汽机与电力，电报、电话、无线电收音机，以及电视通讯等。

穆斯林在这种急剧变革的环境中感到，他们需要重新审视从过去承袭下来的伊斯兰认知主体，并且想一想如何能够让它适合于今天的现实。他们发现，将技术应用于伊斯兰认知的传播可以让它变得较易于获得。而且他们开始注意到，乌里玛和苏菲派越来越脱离整个伊斯兰社会活动而被边缘化。每个社会对新环境的回应，依西方帝国主义的性质，以及该社会内部社会、经济与政治力量的特殊对比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19世纪印度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的领袖赛义德·阿赫默德·汗。注意他和他的追随者头上都带着土耳其式费兹小帽，这标志着他们认同于奥斯曼帝国的现代主义改革运动。赛义德·阿赫默德·汗出身于一个与莫卧儿朝廷有着长期密切联系的贵族家庭。在19世纪下半叶，他领导了一场包括教育、宗教思想和乌尔都语文学等在内的现代主义运动。位于德里东南部约80英里处阿利迦尔的穆罕默德盎格鲁—东方学院是他的核心成就。这所在1920年成为大学的高等学府后来培养了许多穆斯林领袖，其中包括巴基斯坦独立运动中的几个主要人物。

对西方认知的回应

在回应中，有3个主要支系：一是改革主义，它对从过去承袭下来的伊斯兰认知进行再评价，但不改变它的本质；二是现代主义，它的目标是依据西方的认知和新的经济与政治现实对伊斯兰认知进行再造；三是伊斯兰主义，它同样尊重新的经济与政治现实，但是希望让它们，以及西方的认知，服从于他们对“启示”的乌托邦式的理解。在这三大支系的内外，还有许多竞相争胜的声音。

改革主义将18世纪复兴运动的宗旨与原则带进欧洲统治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某种“新教”式伊斯兰的形式。在没有建立伊斯兰社会的世界性权力的情况下，实现此项任务的责任便转到单个穆斯林的良心上去了。改革主义者清楚，他们必须在尘世间实现真主的意图，这也常常是认知的沉重负担。传播对真主的话的认知以及对真主使者生平的认知，在改革主义者所做的努力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典型的载体有：1867年在印度北部建立的德奥班德运动，它在它那个世纪宣称，已经建立了8934所宗教学校；1912年在印度尼西亚建立的穆罕默德学会，到1938年已建立1700所宗教学校；“努尔库拉尔”组织[1]从土耳其纳格什班迪耶教团导师赛义德·贝迪乌扎曼·努尔西（1873～1960年）的著述中学习他们关于个人功修与道德责任的教义。改革主义者攻击在宗教学校课程中出现逻辑与哲学，他们不再满足于艾什尔里与安萨里的历史性胜利。只有在什叶派中间，尤其是在伊朗，伊斯兰化的希腊学问的火焰才继续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244

改革主义者关心人的良心的形成，他们攻击伊本·阿拉比的“存在单一

① 即“赛义德·努尔西追随者组织”——译者。



阿里·沙里亚提博士。20世纪下半叶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在传授伊斯兰认知传授方面确立了一种新型的方式和介质，人们在乌里玛的“麦德莱赛”之外受到教育和训练，同时常常积极参加伊斯兰主义运动。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就是沙里亚提：他在马什哈德和巴黎接受教育，在巴黎学习期间，他深受萨特、法农和马西尼翁的影响。1960~1970年代，他的传授和著述在伊朗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提出一个条理清晰、内容紧凑的伊斯兰世界观，其中包括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思想，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论”，攻击苏菲派认为可以替男人和女人向真主求情的习俗，攻击许多同伊斯兰习俗混杂在一起的当地习惯。他们成功地攻击苏菲派的同时，也给本宗教带来感情上与精神上的损失，为了弥补这一损失，他们对先知的生平更加注意。在20世纪，先知的传记成为虔诚文学多产的类型。因此改革主义者只允许清除从过去一直持续到现在的伊斯兰认知遗产中的不良部分。同时，他们对来自欧洲的新学问的影响给予不同程度的注意；“德奥班德”继续强调传统的学问，而穆罕默德协会已经给现代科学找到了一个位置。改革主义是典型的乌里玛的回应，他们多半会得到传统的商业精英们的支持。

现代主义所关心的是勇敢地面对西方认知与西方统治的现实。现代主义者起码是要穆斯林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他们认为这是西方力量的源泉。但他们至多是希望根据西方学问重新审视整个伊斯兰认知，其中包括它的支柱《古兰经》与圣训。现代主义者中的主要人物有印度的赛义德·阿赫默德·汗、土耳其的纳米克·凯末尔（1840~1888年）、埃及的谢赫·穆罕默德·阿布笃以及加马尔丁·阿富汗尼。并不是所有这些人对西方的认知和伊斯兰认知都采取同样的态度，但是他们知道，乌里玛的方法不足以对付当代的挑战。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许多现代主义者被吸引到泛伊斯兰对西方的回应中去，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统治进行决定性的打击之后，他们开始把注意力集中于民族－国家。对印度现代主义者穆罕默德·伊克巴尔来说，这就是要依据伊斯兰原则建立民族－国家巴基斯坦，但是对绝大多数来说，现代主义变成了世俗主义，将未来设想为世俗国家，即阿塔图尔克的土耳其和礼萨·汗国王的伊朗，在这样的国家，宗教属于私人的事情。所以现代主义者没有给中世纪伊斯兰认知遗产留下什么地盘。在他们创建的学校里，甚至是在世俗穆斯林国家鼓励建立的教育体系中，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开始学习西方的语言和西方的某些人文学科。现代主义是典型的穆斯林统治精英的回应。对许多人来说，这些精英在谋求西方物质力量的过程中，冒了重大的风险，即在倒洗澡水时，将伊斯兰这一婴儿也一起泼了出去。

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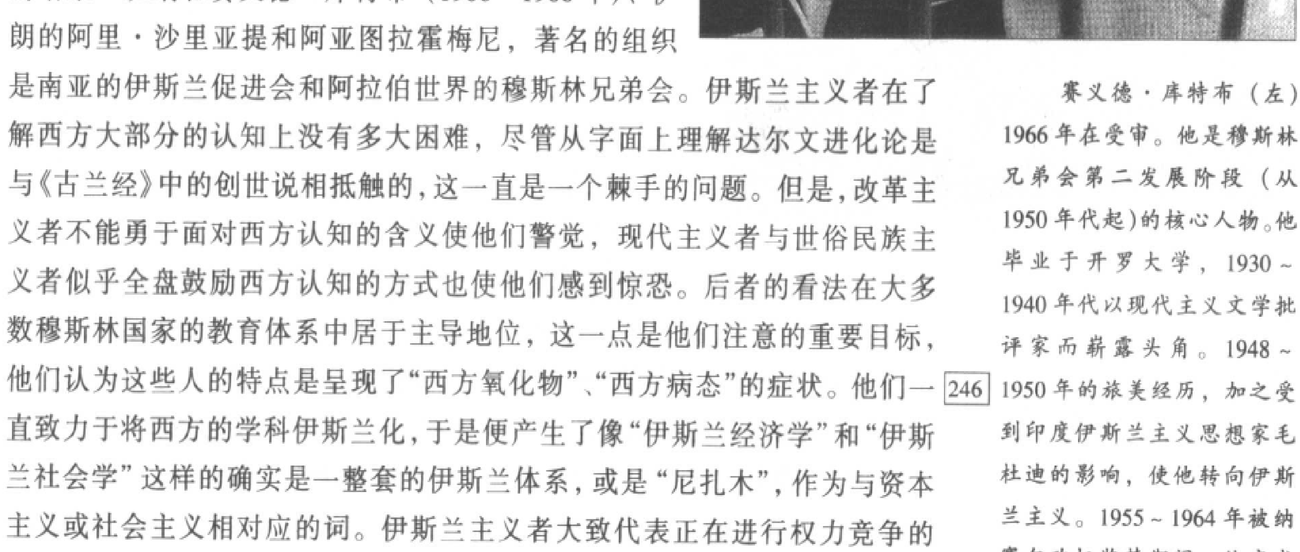
无需惊异，改革主义与现代主义引发了评论。伊克巴尔批评受宗教学校教育的人，他们被与当代生活毫不相干的事情缠住了，他抱怨说：“你们从一开始就已经被经院教师扼杀了，由此而呼唤‘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的口号。”印度讽刺诗人阿克巴尔·阿拉哈巴迪（1846~1921年）就世俗教育的结果挖苦说：“放弃你们的文学，忘记你们的历史，切断你们同导师与清真寺的联系——这无关弘旨。生命是短暂的。最好是不要过虑。吃英国面包，拿起你的笔来写，幸福得趾高气扬。”

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无论是改革主义还是现代主义，对这样的问题都



赛义德·库特布（左）1966年在受审。他是穆斯林兄弟会第二发展阶段（从1950年代起）的核心人物。他毕业于开罗大学，1930～1940年代以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家而崭露头角。1948～1950年的旅美经历，加之受到印度伊斯兰主义思想家毛杜迪的影响，使他转向伊斯兰主义。1955～1964年被纳赛尔政权监禁期间，他完成了其代表作《路标》。在这本书中，他呼吁大举进攻，进行一场圣战，以反对充斥着“人造假神当道”（从不可知论到资本主义）的世俗社会。他提出，斗争的目标是在地球上建立伊斯兰体制。从穆斯林兄弟会中分裂出去的集团和穆斯林世界许多地方的其他组织一直在进行这一斗争。1966年8月27日，库特布被埃及政府处以绞刑，罪名是：阴谋推翻政权。

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究竟什么是适合穆斯林社会的认知，而伊斯兰主义提出了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伊斯兰主义者从这一原则出发：所有人的生活，所有的认知，都必须要服从真主对人类的指引。正如一位伊斯兰主义者对这一指引的本质所说的，沙里亚提供了生活的完整的计划：“在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多余的，也没有任何东西是缺少的。”伊斯兰主义的著名领导人是：巴基斯坦的赛义德·阿卜杜勒·阿拉·毛杜迪、埃及的哈桑·班纳和赛义德·库特布（1906～1966年）、伊朗的阿里·沙里亚提和阿亚图拉霍梅尼，著名的组织是南亚的伊斯兰促进会和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主义者在了解西方大部分的认知上没有多大困难，尽管从字面上理解达尔文进化论是与《古兰经》中的创世说相抵触的，这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改革主义者不能勇于面对西方认知的含义使他们警觉，现代主义者与世俗民族主义者似乎全盘鼓励西方认知的方式也使他们感到惊恐。后者的看法在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这一点是他们注意的重要目标，他们认为这些人的特点是呈现了“西方氧化物”、“西方病态”的症状。他们一 [246] 直致力于将西方的学科伊斯兰化，于是便产生了像“伊斯兰经济学”和“伊斯兰社会学”这样的确实是一整套的伊斯兰体系，或是“尼扎木”，作为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相对应的词。伊斯兰主义者大致代表正在进行权力竞争的新的精英。他们不想重新采用过去的伊斯兰的学问，而是要把西方的学问铸进伊斯兰的模子中来，并指导它让它服务于伊斯兰的目的。



过去200年来，天启的认知同穆斯林社会可获得的所有认知之间的关系应当怎样才恰当，一直是个热烈争论的话题。如果说，在这一时期的许多时间里的趋势一直是：西方的学问控制着中心舞台，那么近年来这一地位受到伊斯兰新的运动的挑战。然而在这一革命的时代有一个明显的失败者：这就是对宗教的神秘主义的理解。改革主义者已使苏菲主义的许多方面遭受摧毁性的打击。现代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已经培育起后启蒙运动认知的萧索气候。对伊斯兰主义者来说，苏菲派是落后于潮流的。过去两个世纪穆斯林新的理解，穆斯林对自身以及对环境的把握，已使世界变得不太令人“着迷”；伊斯兰精神认知能够繁荣发展的地盘已经萎缩了。

认知的民主化

与许多社会伊斯兰认知同权力脱钩同时存在的是伊斯兰认知传输方面的革命。这一革命是从19世纪采用印刷术开始的。在某些社会，比如在埃及，



在过去200年中，穆斯林社会印刷术的采用已经改变了伊斯兰认知的传播途径。它不仅帮助打破了乌里玛对于宗教知识的垄断，而且还被大多数的运动（包括改革主义运动、现代主义运动和伊斯兰主义运动）用来传播它们的思想主张。土耳其改革家赛义德·贝迪乌扎曼·努尔西曾经派他的追随者背着成袋的书在安纳托利亚走村串乡。图中所示的这样一些小册子(其中绝大多数是伊斯兰主义者的著述)，在穆斯林世界许多地方的书报摊上都可见到。

这一过程是尝试性的；主要的学者将印刷视为对宗教与社会秩序的威胁。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穆斯林强烈地感受到殖民统治对本宗教的威胁的地方，比如印度，推进这一过程是较为积极的。改革主义的乌里玛抓住印刷技术，将它当作在整个社会广泛传播他们对伊斯兰认知的理解的关键性手段，这样既可以反对地方崇拜中的腐化现象，又可以抵制西方学问的诱惑。到19世纪末，在印度北部已创办700多家乌尔都文（当地穆斯林的主要语言）的报纸和杂志；每年出版400~500种图书，其中有许多书是关于宗教的。

采用印刷术仅仅是伊斯兰认知民主化的第一阶段。在随后的一些阶段，《古兰经》、圣训和伊斯兰其他重要文献被译成世界穆斯林各民族的多种语言。许多穆斯林第一次能够用自己懂得的语言阅读这些文献。与这一发展同时存在的是采用了其他媒介技术与大众通讯工具——收音机、电视、电影、磁带；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在1979年伊朗革命以前的那些月份，在把霍梅尼的声音传给伊朗人民方面，电话与磁带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些新的通讯技术打开了穆斯林相互影响的新论坛和互相接触的新形式：这是对认知问题进行大辩论的场所；这是伊斯兰新的理解，尤其是乌里玛的新理解，被推到伊斯兰世界边缘的载体；这是在伊斯兰再次与权力结盟的国家，向人民广播其官方观点的工具。 247

印刷文化的迅速普及导致对伊斯兰文献进行口头传承的衰落，削弱了对本宗教的中心教义进行个人对个人传承这一可以回溯到先知时代的传统。19世纪80年代这一变革过程在麦加业已大大地被推向前进了。荷兰东方学专家斯诺克·赫尔格荣杰在1884~1885年进行访问时看到：“所有的学生都带着所探讨的文献的印刷本来听讲，这一环境已经完全改变了教育的方式。”可以探讨的是，随着印刷文本渗入信士的世界，对宗教的理解改变了；在手稿时代不易领悟的过程被大大强化了。穆斯林社会的现代变革的其他方面也是有影响的，但是新的技术鼓励新的认识形式：穆斯林开始不太把自己的宗教看做是自先知时代以来持续衰落的宗教了，而是认为，它是还可以在尘世间达到更完美阶段的宗教；他们开始把伊斯兰理解为信仰与习俗的体系，可以信奉它，也可以不信奉它，而不是把它理解为生命的天然经纬的一部分；他们倾向于不大认为《古兰经》是仪式性的对象，而是把它看成是进行当代研究的主题；而且他们开始把他们对先知的意象由字头大写的“完美的人”，变成穆斯林的不同集团都可以对他进行理想想像的字头小写的“完美的人”。这就是说，口传宗教指引对穆斯林来说，仍然具有比对基督教徒来说更为重大的意

义。在所有的穆斯林社会,对《古兰经》的记忆与背诵仍然是受到高度称赞的功修。

印刷对穆斯林社会的这一影响未必会像它对西方的影响那么大;而电子传媒则有助于保持某种口传的形式,它创造了快速传递信息的通道。20世纪20年代在印度建立的“传教会”是穆斯林世界追随者最广泛的组织,它坚持要它的传教者用心学习文献,并以个人对个人的方式传播这些文献。

印刷的产生以及翻译的扩展给接近宗教认知带来很大的自由。穆斯林现在可以在宗教学校的框架之外、在乌里玛的权威解释之外比较宽松地学习重要的宗教文献。而且他们越来越可以在学习西方学问的基础教育中这样去做。毫不奇怪,这一新的接近的自由导致新的解释的自由,其代表有现代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这两大支系,其中有许多持各种派别立场的人。但 248 是,如果说印刷与翻译有助于使穆斯林从乌里玛的垄断下解放出来,那么,它也有助于削弱宗教权威。现在有许多声称要为伊斯兰代言的新的声音,他们承认西方在认知与权力上的力量,并从这一现实中汲取力量。控制数百年的解释文献的这种权威已经大大地弱化了。

不可避免的是,伊斯兰认知在穆斯林社会日益变化的地位与性质导致传统的学问传承者的变化。苏非派的地位随苏非主义一起衰落了。有些苏非派人士依然从虔诚中得到安慰,但是其他人与其说被看做享有对伊斯兰传统的核心进行精神解读的天福的人,不如说被看做是榨取无知者钱财、哄骗轻信者的骗子。他们虔诚的习俗与其说是展现对真主的礼拜(土耳其毛拉维教团的旋转舞,或南亚苏非派神秘主义歌唱——“高瓦里”),不如说是表演电视节目或为旅游公司服务。只有在苏非派能为现代穆斯林社会提供某种重要功能的地方,他们才能保持让人们感兴趣的地位。穆里德教团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他们由于在塞内加尔花生业中居于优势,因而仍能维持其主导的地位。还有,高加索的纳格什班迪耶教团和卡迪里教团也能在苏维埃统治下使伊斯兰的火焰保持不灭。

乌里玛也被推向社会的边缘,因为他们原有的教师与法官的职能已被现代国家的世俗制度所取代。对20世纪许多穆斯林来说,乌里玛仍旧是穆斯林落后的象征,他们希望逃避这种落后。但是他们的衰落与苏非派不可同日而语,在许多社会中仍然残留着对他们的尊重。他们可以享受国家雇员待遇,像在土耳其那样。或者在国事场合给予他们以荣誉地位,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1981年在正式检阅中被刺时,爱资哈尔校长正同他坐在一起。但是,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乌里玛一直沿着边缘化的道路走,这是西方世界基督教教士自启蒙运动时起所走过的路。不过,对苏非派来说,存在着这样特殊的环境:乌里玛仍能处于中心的地位,这在黎巴嫩、伊拉克和伊朗比较明显,那里的什叶派乌里玛一直领导着反对国家压迫的抵抗运动,在伊



通过现代国家世俗体系传播的现代知识的兴起，在许多社会导致了乌里玛的边缘化。人们认为，乌里玛和他们的主张对社会越来越不中用，他们越来越成为其反对者们嘲笑和讥讽的对象，这幅漫画就是其中一例。它于1907年10月7日发表于高加索地区第比利斯的一份讽刺性周刊《毛拉纳斯茹丁》上面。

朗他们终于控制了国家本身。

由于乌里玛被推到一旁，他们对其社会所充当的伊斯兰传承者与解释者的角色，如果不说是被取代的[249]话，那么受到宗教学校世界以外的学者的挑战则是无疑的。有许多这样的穆斯林思想家，他们的著述是他们社会伊斯兰认知的主要来源，其中有巴基斯坦的伊克巴尔和毛杜迪，埃及的班纳和赛义德·库特布，巴基斯坦经济学家胡尔希德·艾哈迈德，苏丹律师哈桑·图拉比，突尼斯教师拉希德·哈诺希，伊朗工程师马赫迪·巴扎尔甘等。在20世纪下半期，推进比较著名的伊斯兰组织（如世界性的传教会、大众的穆斯林兄弟会、精英的伊斯兰促进会、突尼斯的伊斯兰倾向运动或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的传教与教育项目的人，几乎全都受的世俗教育。而且，他们与近年诞生的其他许多伊斯兰集团一样，得到学生的有力支持。

从1800年起，西方学问让伊斯兰世界一直面对的问题，同希腊学问在9～11世纪向它提出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不过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艾什尔里与安萨里所遇到的希腊理性与哲学的挑战是对穆斯林统治的挑战，而现代穆斯林所遇到的西方科学的挑战是对它弱势地位的挑战。即使如此，他们在作出的回应中仍然表现出很大的创造力。他们尽力在世界上推进伊斯兰文明，同时始终尽力让它植根于真主的启示之中。由于乌里玛和苏菲派似乎都未能应付这一挑战，共同体中出现了能提供答案的新型学者。伊斯兰世界所有这些学者，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一直在相互影响着，比如，穆罕默德·阿布笃即受到加马尔丁·阿富汗尼的影响，赛义德·库特布受到毛杜迪的影响。但是迄今为止还不存在能够使穆斯林再次把追求学问当成礼拜行动的被广泛接受的共识。启示的认知与尘世的认知之间的恰当关系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重要的是，它依旧是热烈争辩的主题。

第八章　穆斯林社会的艺术表现

自从伊斯兰兴起以来，在穆斯林保护人的鼓励下，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有 250 显著的成就，其中包括文学、音乐和视觉艺术。当我们考虑到伊斯兰疆域内各地的艺术常常具有十分独特的性质，那么这一成果的雄浑与博大就更为明显。伊斯兰文化一直是，而且继续是多方面的，幸运的是，这使那种头脑简单的分析难以得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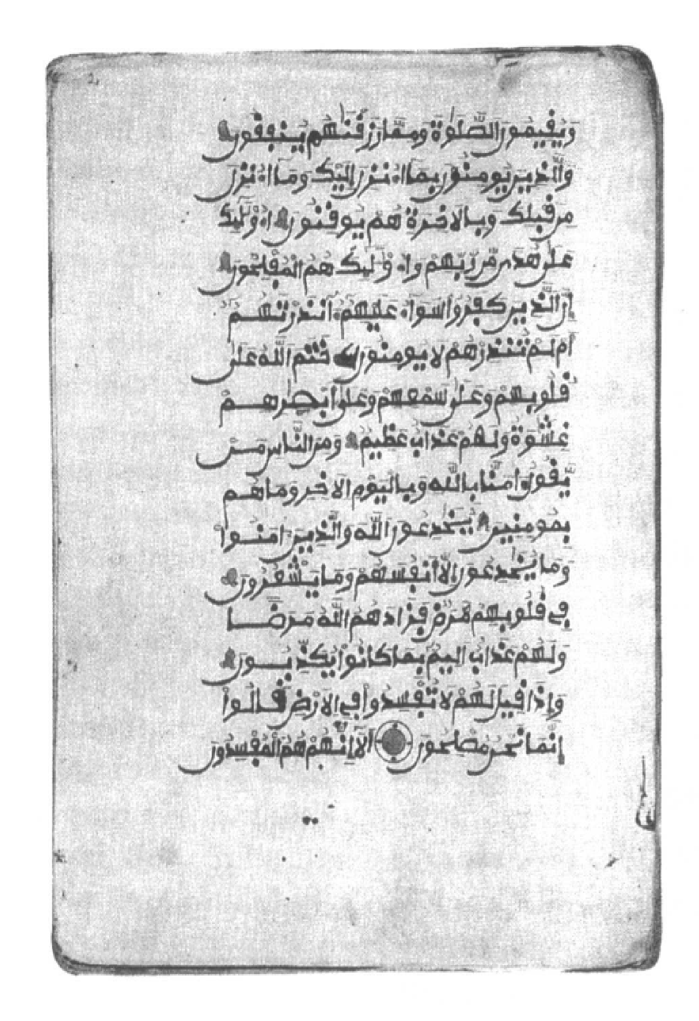
艺术在伊斯兰中的用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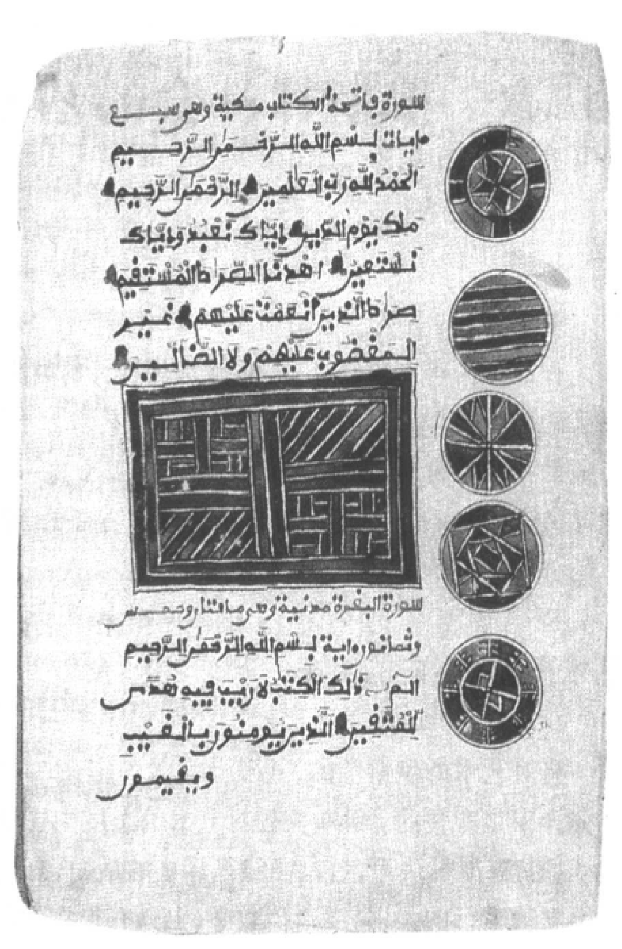
将对艺术的伊斯兰的，也就是宗教的定义，同穆斯林世界的艺术这二者区分开来是有益的。伊斯兰教对艺术的态度主要植根于两个源头：《古兰经》与圣训。穆斯林认为，《古兰经》是真主的话，具有最高的权威，但是记录先知穆罕默德言行的圣训，或口传教义，也具有很大的效力。圣训，至少在内容上被认为是出自天赐的启示。它们是在穆罕默德归真以后收集起来的，它们使《古兰经》里未明言的一些事情清楚明白地显示出来。例如，《古兰经》包含有一些毫无保留地提到诗歌的内容，但里面很少提到音乐与视觉艺术。这一重点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在穆罕默德时代的阿拉伯半岛社会，音乐与视觉艺术的创造力问题还不像诗歌创造力问题那么重要。

诗歌

在伊斯兰产生以前的阿拉伯半岛社会，诗歌在政治生活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诗人是本部落的宣传者，据说他们受到神灵的感悟。所以，穆罕默德知道，他必须将诗歌的力量用到伊斯兰的事业上来。在阿拉伯诗歌中，"格绥达"(颂诗)这一诗歌形式价值最高。这是一种比较长的诗，用许多可接受的韵律中的一种写成，属同一音韵，由三部分组成：序诗，表达诗人在离开他所热爱的部落的营地时那种惆怅的心情，以及回忆他和她共同度过的时光；叙述在沙漠中的经历；颂扬或谴责作为出行所奔目标的部落、家族或个人。由于"格绥达"(颂诗)有意要供诗人或吟诵者当众吟诵，因此或许有即席创作的余地，而且也许一直就没有一个单独的诗的版本。

随着伊斯兰的对外征服，阿拉伯语扩展到广大的地区。它既是一种受以





西非的伊斯兰艺术近年来才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开始对其进行细致的研究。一本19世纪的《古兰经》里的这两页当中，包含着经文的第一章"开端"（法谛海）以及第二章"黄牛"（百格勒）中1~11节。文本是用苏丹手写体写成的，元音用红笔标出。节与节之间用3个黄色的小圈分隔，而每10节就用一个大的黄色圆圈做标记。长方形板则表明一章的结束。这种《古兰经》通常用皮背包或皮箱子携带。

前本地语影响，因而成为有各种方言的口语，又是一种书面语，由于它是真主在《古兰经》中所使用的语言，因而被神圣化了。这赋予阿拉伯语以新的无可 251 匹敌的权利与意义。同时，伊斯兰产生以前的诗歌尽管在理念上常常与伊斯兰的信条发生冲撞，但由于在文学上独放异彩，所以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并受到称赞。在伊斯兰产生以前的诗歌中，像自命不凡和沉醉于酒色这类主题是与新的宗教相抵触的，但是仍然被后代人所接受，这很像是古代希腊、罗马的态度在基督教文明中被容纳的情形。

阿拉伯人对其语言的敬重以及这种语言富有表现意味的潜质使早期伊斯兰共同体有了内聚力；后来波斯语、突厥语和乌尔都语成为表达深奥的神秘主义的工具。然而书面语除了诸如《古兰经》注解、祈祷文等同本宗教直接有关的主题以外，还通过诸如"王子指导"这样的文学形式，以及在阿拔斯王朝时代通行的扩充朝臣手册的途径，保留着教学的作用。

音乐

在伊斯兰时代的早期，音乐与诸如朝觐、嫁娶和战争等事件相伴随。这种 252 音乐由于没有写下来，所以难以再现它的初始状态。不过重点还是放在歌唱

音乐上；确实，看来很可能在伊斯兰产生以前，诗是供人们唱的，或是供人们在音乐伴奏下吟诵的。7世纪使用的乐器有诗琴、三弦琴、索特里尔琴、竖琴、长笛、牧笛、号角、狭长形鼓、响板和鼓等；《古兰经》指出，到最后审判日，喇叭将会响起（第6章第73节、第74章第8节[①]）。在阿拔斯时期之前，器乐从歌唱独立出来的想法可能尚未出现。

紧随伊斯兰的征服运动，阿拉伯音乐迅速扩展到整个伊斯兰地域，尽管种族的和地区的风格仍然继续存在。幸运的是，关于伊斯兰世纪早期音乐与乐师的很多信息都被艾布·法拉吉·伊斯法哈尼（897～967年）搜集在《诗歌集》之中。音乐理论也得到发展，它常常涉及短颈的诗琴，它是最受大众欢迎的乐器之一。

穆斯林世界的音乐是有旋律的，而且使用的音程的范围比西方标准的音程范围更大，也更精致。西方所理解的和声这个词还不为人们知晓。在《诗歌集》的年代，存在着8种调式，但是，汲取伊朗文化后调式的数目增加到18个，乃至更多。音乐服务于各种宗教用途。对《古兰经》的吟唱强调真主讲话的规范意义，因而要把这些话传达给信士。在阿拔斯时期，各文化中心显然也用世俗的曲调吟唱《古兰经》。招祷[②]也要吟唱或歌唱，从10世纪起，军乐队也加入其中，它们使用诸如鼓和铜鼓一类的乐器。像朝觐、斋月、纪念先知穆罕默德诞辰这样大的宗教事件也都要伴之以歌唱。

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同其他地方一样，音乐被理解为更广范围的对应。在9世纪阿拉伯哲学家肯迪（790～874年）的著作中，诗琴的4根弦可以同要素（土水气火等）、情绪、季节、罗盘上的主方位联系起来。其他乐器也这样按照弦的数进行安排，每根弦都和一特定的东西联系起来。然而，法拉比（卒于950年）和伊本·西拿（阿维森纳，980～1037年）考察音乐更像是考察我们所理解的科学，而不理会宇宙论和数字命理学。

音乐、歌唱、吟唱、有韵律的当众吟诵作为苏菲主义的一个方面，被用来鼓动宗教情绪和使听者入神。起初苏菲派音乐想避开世俗的声调，只用牧笛、长笛和鼓，但后来变得复杂一些了。的确，在诸如毛拉维教团这样的苏菲派教团的影响下，土耳其的清真寺接受了音乐。伊斯兰教历1月间，什叶派演出关于侯赛因及其追随者生与死的"塔齐亚"（受难剧）[③]时伴有音乐。

世俗音乐受到许多宫廷的保护，王子由乐师陪伴是各个时代王室肖像画的重要主题。尽管乐师的地位使他们处在社会的边缘，但也有一些乐师成为哈里发及其他统治者的密友。　253

① 《古兰经》第6章第8节提到"吹号角之日"，第74章第8节提到"当号角被吹响的时候"——译者。

② 即呼唤穆斯林做礼拜——译者。

③ 什叶派以侯赛因被害日为纪念侯赛因的哀悼日，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一些地方演出圣徒受难剧，或称宗教神秘剧，举行街头哀悼游行，人们歌唱、哭嚎，甚至鞭打和折磨自己——译者。

建筑与视觉艺术

《古兰经》里居中心地位的神学启示，即真主拥有全权并且是独一无二的这一启示，意味着真主独自进行创造。由于偶像崇拜放弃了真主，自然，它被认为是特别应受到谴责的。然而，据圣训中的传说，当穆罕默德破坏"克尔白"(天房)里被盲目崇拜的偶像时，他伸出手保护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画像，这显示出从他对信仰的理解来说，像这样的艺术品并没有构成威胁。提到这一点是很有趣的：据传说，欧麦尔哈里发(634～644年在位)曾经使用在叙利亚得到的一只香炉装饰麦地那的清真寺，香炉上边有画像。这个香炉是欧麦尔赠给清真寺的，但是783年麦地那的总督把上头的画像擦去了。在伊斯兰历史上，清真寺里一直不放画有栩栩如生的生物的艺术品。

在马格里布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的著作中，可以见到对建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些有价值的透视，他强调城市及其他纪念物所反映的是建造它们的那些朝代。我们从尚存的建筑物中可以推断出：数学与几何学常常被看做是中世纪建筑美学的一部分。随着伊斯兰社会的发展，出现了用以表现特殊需要的各种类型的建筑。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些不同类型的建筑从一开始就存在于清真寺中，清真寺不仅具有礼拜场所的功能，而且可以提供庇护、食品、教育设施、管理以及丧葬。然而，商队旅馆、宗教学校、陵墓以及其他有特殊功能建筑的出现，是与历史上不同时期有关当事人的特别集团联系在一起的，其结果，这些建筑的命运也与那些集团的命运捆在一起。建筑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扩大统治者的权力。例如，在阿拔斯王朝早期，当哈里发们采用古代伊朗的宫廷仪式时，他们建造了圆顶的用于私下接见的觐见室，在它的前面有供公开接见用的一个伊万(拱顶大厅)或4个辐射式的伊万。轴状设计是阿拔斯王朝宫殿的显著特点。

受宣传真主启示这一职责的驱使，书法被置于首位，它很快在伊斯兰艺术中获得最崇高的地位。书法家的职业是很尊贵的，因为他从事《古兰经》的抄写工作。在穆罕默德归真时，《古兰经》的一些部分已经写下来了。经文写在枣椰树叶、平展的石头以及其他材料上头。口传教义与搜集的这些材料结合在一起，再加上信士记忆的内容，有第一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632～634年在位)，或他的继任者欧麦尔参与其中，但欧麦尔大事未了身先卒。《古兰经》核准的版本与编排或许是在奥斯曼(644～656年在位)统治期间才完成的。

254 最早的阿拉伯铭文，是用阿拉米语手写体写的，其时间可能是在4世纪。在以后的一些世纪中，阿拉伯手写体得到发展。历史资料提到被人们称做"马基里"的有棱角的手写体，据传说它是被先知伊德里斯发明的。人们认为阿里(656～661年在位)从这种手写体发展为所谓的库法字体，用这种字体书写，5/6行是直的，1/6行是弯的。库法字体在各个中心形成不同的形式，但是

与阿里有联系的库法或许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中心之一。最初写《古兰经》的手写体没有元音的发音符号与元音记号;这些是在伍麦叶王朝哈里发阿卜杜勒·马麦利(685~705年在位)统治时期,为避免读错用彩色墨水加上去的。

铭文成为建筑物与人工制品装饰的一个组成部分,穆斯林世界照明艺术与图书装订艺术之所以居于较高的地位,或许是因为它们在使真主的启示永世长存方面起的独特作用使然。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从事书法这门艺术的人的名字会被人们铭记。与书法家不同,绘画者得不到宗教的首肯,因而在社会上的地位较低。

伊斯兰艺术更深一层的特征是,常把日常使用的物体改造成艺术品,赋予其审美意义。除书法以外,在伊斯兰的绘画中也形成一种特质,即让它们能够比较容易转移:例如阿拉伯式图案,由于可以无限制的重复,常被应用于一系列媒介物。

19世纪对伊斯兰建筑与艺术的历史性考察得到开展,这首先是西方全神贯注的事情。那时关于视觉艺术有一种错误看法,西方关于"人的变化是一个历史进化过程"的看法促使学者们设想,欧洲的绘画"美"术与雕刻当列人最高的精神成就之中。不可避免,伊斯兰艺术无法适应这种观点,后者尽管在20世纪受到挑战,但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于是,伊斯兰绘画比书法更为引人注意,尽管所谓的人种论项目仍然被看做是与历史无关的,是静态文化的代表。依照"思想与感觉应体现在艺术品之中"这一现代信念,对使用珍贵材料的艺术意义也就常常难以理解。而且,对伊斯兰艺术与建筑的研究还仍然被大致理解为中世纪的教规,因为对它的历史性考察在17世纪已经结束。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和东南亚的广大地区是伊斯兰具有强大影响的地区,但也趋向于将它们排除在这一主题之外。

一个君主或统治者聆听音乐是伊斯兰艺术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但是,本图中在盒(可能产自科尔多瓦)表面雕刻的这一情景,则因其不拘礼仪而很不寻常:两名坐姿相同的年轻男子坐在御座上,而一个琵琶演奏者却站在中间。左边的人握着一个酒杯(或一只瓶子),植物的茎上有一朵花,而右边的人则拿着一把扇子。御座下面的两头狮子象征着他们的王权。上面的铭文表明这个容器是968年敬献给阿卜杜·拉赫曼三世(912~961年在位)的小儿子穆吉拉的礼物。

在许多伊斯兰艺术中明显地贯穿着共同的思路,然而打算对现代世界 255 (不管是按"伊斯兰"边界,还是按"国家"边界)文化加以界定这种企图,导致一些学者想从过去寻找一些能支持其主张的某种模糊不清的本质。但是,最好的界定是把穆斯林世界的艺术描绘为,是为穆斯林庇护者和人民而创作的艺术,或是由他们创作的艺术。

7~10世纪胜利的艺术

随着伊斯兰帝国的扩张,穆斯林控制了富有的拜占庭的一些省,以及他们希腊-罗马艺术与文化的遗产,而在东边,穆斯林遇到的是萨珊帝国的艺

术传统。661年叙利亚的统治者穆阿维叶打败了阿里，并建立了伍麦叶王朝，它从大马士革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但是随着750年阿拔斯王朝的兴起，权力由叙利亚转到伊拉克，而且更靠近萨珊王朝的心脏地带。762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曼苏尔(754~775年在位)定巴格达圆城为他的新首都，城中心是王室的宫殿和清真寺。直到该王朝逊位，巴格达仍旧是它的首都，只是836~883年这一时期除外，这一时期在萨迈拉建立了新首都，新首都从巴格达往北，沿底格里斯河走60英里。萨迈拉成为一个无计划延伸的大城市，绵延30多英里。所以，在获胜初期那些年，伊斯兰文明在大马士革、巴格达和萨迈拉等首都呈现了繁荣，它的成就也在亚洲、北非和西班牙等地其他许多城镇得到了反映。

伊斯兰最初的诗歌与散文

阿拉伯语因《古兰经》而被传到帝国的广大地区，《古兰经》的非凡的语言使听者入迷，它为书写的阿拉伯文以及不断涌现文学灵感提供了基础。贝都因诗歌继续繁荣，伍麦叶时代的长期不和与政治争吵也为一些最著名的诗人的作品所捕捉，他们是法赖兹得格(卒于728年)①、哲利尔(卒于728年)②和艾赫泰勒(卒于710年)，全都活跃于大马士革。法赖兹得格既是讽刺作家，又是颂诗作家，他的许多颂诗缩减成单是赞美哈里发的颂扬成分。哲利尔写一些颂诗，也写一些挽歌，但写得最多的还是讽刺诗。虽然艾赫泰勒是一位基督教徒，但是他成了耶济德一世(680~683年在位)的亲密伙伴，他在他的颂诗中赞扬了这位君主。他也继承了伊斯兰产生以前诗歌赞美酒与爱情生活的传统，就像伍麦叶王朝哈里发瓦利德二世(743~744年在位)所做的那样。但是，反映贝都因生活的这一主题越来越转向反映城市生活了。

与此同时，在麦加与麦地那出现了比较轻快的诗歌形式，它或许是从颂诗的序诗演化而来的。欧麦尔·伊本·艾比·拉比阿(卒于718/719年)是这种风格的大师，后来巴士拉、库法以及巴格达都有人仿效。在伊斯兰帝国的其他地区，常见的阿拉伯诗歌是一些比较简朴的作品，表达为伊斯兰胜利而自豪的心情，以及在边远地方征战者思乡的情愫。

256 在阿拔斯王朝时期，从颂歌发展出一种新的风格。盲诗人白沙尔·伊本·布尔德(卒于784/785年)即创作出传统样式的颂诗，又有革新的描写爱情的作品，同机智的短诗、模仿滑稽作品相比，胜出一筹。艾布·努瓦斯(卒于813/815年)因创作情诗和酒神的作品而成为巴格达阿拔斯王朝早期最著名的诗人：

① 一说卒于732年——译者。

② 一说卒于733年——译者。

当她离开我、不再给我写便条的时候，
我的心受到了伤害。
对她的想念如此折磨着我，
我几乎都要死去。
我要把魔鬼逼向绝路，
还要像小孩一样对他哭诉：
“她一直吸引着我：
眼泪不住地淌，夜里也难眠，
使我的眼睛看上去像是生了溃疡。
除非你能让那个女孩爱我
——你能够做到，
否则，我不会再作诗，
我也不会再听人唱歌，
我也不会再用酒浸泡我的骨头。
日日夜夜
我将斋戒、祈祷、读《古兰经》。
我要追寻真主指引的路。”
刹那间，她羞涩地归来。

在阿勒颇的哈姆丹王朝的宫廷，伟大的诗人名家穆台奈比（915～965年）在传统的颂诗方面十分杰出，他为了寻找庇护者，花了9年时间，到处漫游。在同一宫廷，还有一批年纪较小的诗人，他们用对大自然的描写点缀他们的颂诗，这是一种被广泛模仿的形式。该宫廷文化生活的繁荣说明，在巴格达以外的中心庇护者此时正在如何地发展。伍麦叶王朝统治西班牙时期（756～1031年），出现了“穆瓦舍赫”体诗，这是一种有诗节的诗，不拘泥于传统的韵律，融入了拉丁系语言的因素，随后向东传播。阿拔斯王朝时期的文学散文的作者可大致归于政府的抄写员和把外文译成阿拉伯文的人：例如伊朗的伊本·穆卡发（卒于756年）翻译了著名的动物寓言集，即大家所知道的《卡里莱和笛木乃》，它常常作为例证被引用。阿拉伯文学技巧受到新的显贵社会的高度称赞，查希慈（卒于868/869年）活跃于巴格达和萨迈拉，他把一种具有特殊风格的、爱谈奇闻轶事的、说教的形式提高到新的艺术水平。由于散文写作日多，作者们用诗歌的手段，如韵脚和比喻，来装饰他们的作品。

音乐和早期伊斯兰世界

在伊斯兰的第一个世纪，阿拉伯音乐，尤其是在麦加和麦地那的音乐，

体现了伊朗以及前拜占庭一些行省的影响。在奥斯曼哈里发统治时期，出现了新类型的乐师，他们柔弱，但很熟练，首先成为著名歌唱者之一的突维斯 257 (“小孔雀”)从伊朗旋律中获得灵感，自己用方形手鼓伴奏。在伍麦叶王朝时期，音乐中心转移到它的首都所在地大马士革。耶济德一世把歌唱者和乐师引入宫廷，他爱好音乐，本人也是一位诗人。瓦利德一世统治期间，将麦加和麦地那的主要乐师都召集起来。在瓦利德二世时期，尤奴斯·卡提卜（卒于765年）汇编了早期的阿拉伯歌曲集《旋律集》。

在阿拔斯王朝的庇护下，音乐也得到繁荣发展。易卜拉欣·毛希里（742~804年）作为歌唱者、乐器演奏者和作曲者是无与伦比的，他是哈伦·拉希德的伙伴，十分富有。他的儿子伊沙克·毛希里（767~850年）继承了他。扎勒扎勒（卒于791年）引进了一种新类型的诗琴，取代了较早时候的伊朗诗琴，兹尔雅布（卒于850年）给诗琴加上了第5根弦，兹尔雅布离开了巴格达，前往伍麦叶王朝在西班牙的宫廷，821年抵达西班牙。兹尔雅布在科尔多瓦成为主要的乐师和阿卜杜·拉赫曼二世（822~852年在位）的陪伴，在西班牙哈里发国被废除之前，他的音乐流派得以幸存。

在马蒙哈里发（813~833年在位）和穆尔台绥姆（833~842年在位）的鼓励下，从拜占庭获得关于希腊音乐理论的论文，并把它们翻译成阿拉伯文，对音乐文化来说，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哲学家肯迪写的几篇短论文，成为几个世纪乐师的教科书。肯迪是第一位受希腊影响的理论家，他的论文包含有描述的材料、科学的本质，以及宇宙论溯源和数字命理学。

随后一个世纪法拉比在《音乐巨著》中探究了音乐理论，伊本·西拿11世纪初在《矫正集》中抓住了这一主题。这些著作标志着音乐理论，特别是在诸如发声物理学以及对音程和音阶的分析等领域的巅峰。10世纪精诚兄弟社[①]关于音乐的书信中论述过宇宙论与数字命理学，它涉及韵律以及诗琴上的弦及其对应物（包括季节、颜色和气味），在这些对应物后面，是宇宙和声的概念，它为数字的相互关系所控制，它们也通报对音乐的医疗效果的讨论。在整个这一时期，一直在持续搜集歌曲，也汇编了著名乐师的人物传记，最著名的是《诗歌集》。

早期伊斯兰建筑

供公众礼拜用的清真寺的形成是伊斯兰早期世纪主要的建筑成就。早期阿拉伯半岛异教的建筑物看来一直是另一种类型的比较简单的建筑，像原来麦加的克尔白，最早的清真寺好像是建在别的源头，也许是先知穆罕默德 258 在麦地那居住的地方，穆罕默德在世时，该地用于祈祷。这个地方有一个用土砖砌成的方形院落，靠东墙有一些小房间，在南北两侧有短柱廊，它们是用

① 是10世纪在巴士拉进行活动的一个哲学家集团——译者。

椰枣树干支撑椰枣树枝做成的。南墙是“吉布拉”(礼拜的朝向),即向着克尔白祈祷的方向,穆罕默德在一个简朴的“敏拜尔”(布道坛)布道。这一设计或许影响了早期伊拉克巴士拉的清真寺(建于635年,665年重建)、库法清真寺(建于637年,670年重建)以及瓦西特清真寺(建于702年)的设计,这些清真寺的庭院都有一个小的结构,作穆斯林社团的库房。统治者的宫殿建在清真寺的一侧,一般在南侧。在叙利亚、伊朗,或许还有埃及,有时把教堂和其他礼拜用建筑改造为清真寺。清真寺的尖塔或许起源于叙利亚或埃及,或许是从叙利亚供隐士居住的方塔演化而来的。耶路撒冷盘石上的圆顶寺(691年建成)是留存下来的伊斯兰最早的纪念建筑,它坐落在莫瑞阿赫山,该山在传统上也是犹太圣殿的所在地。磐石上的圆顶寺意在强调伊斯兰的胜利,并与在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堂抗衡。这种意图通过它的建筑形式、规模、建造技术、装饰,以及使用《古兰经》铭文(还有基督学的一些段落)等表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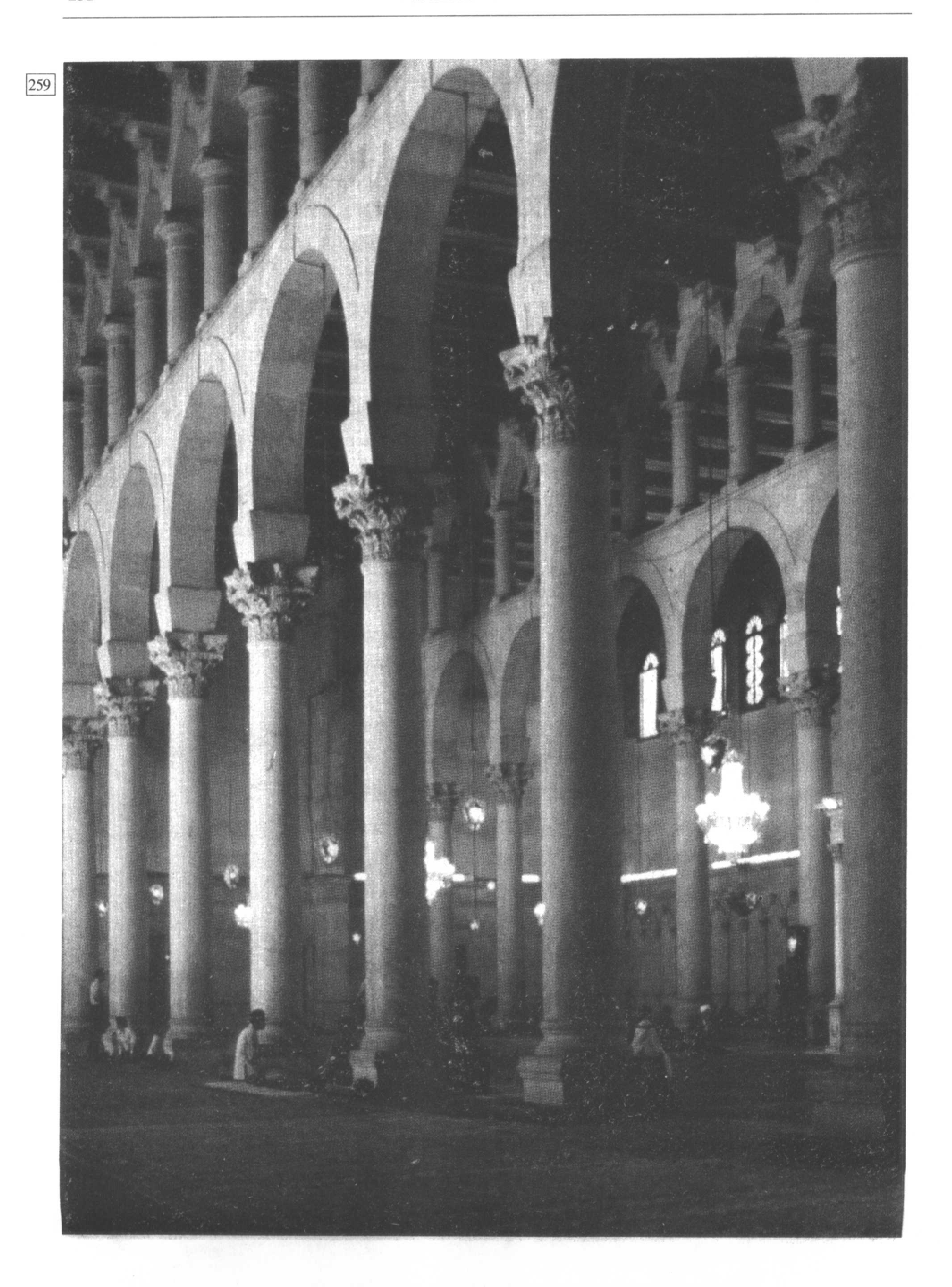
伊斯兰新获得的权力在大马士革瓦利德一世聚礼用清真寺[①](建于706~714/715年)上得到体现,大马士革大寺是在原罗马教堂的场地上改建的,并采用了原有的一些被抢救下来的建筑成分。祈祷厅有3个与吉布拉(朝向)墙平行的通道,这或许是模仿了基督教长方形教堂,它还别致地加上了与吉布拉墙成直角的带有圆顶的中殿。后面的这些特点在麦地那清真寺(建于706~710年)、耶路撒冷清真寺(建于709~715年)中也能见到。像磐石上的圆顶寺一样,主要装饰材料是镶嵌砖。尽管大马士革清真寺是不使用偶像的,但是它所体现的建筑形象象征着伍麦叶王朝的征服。

在大马士革大寺一侧的伍麦叶王室宫殿已不复存在,但伍麦叶的故土或荒芜的住处有许多还存在,其中包括赛伊斯山、茹萨发、希尔巴特米尼阿、东盖斯尔哈伊尔、西盖斯尔哈伊尔以及姆沙塔。它们的石头建筑遵循的是叙利亚的传统,具有某些美索不达米亚的特点;澡堂具有共同的面貌,使用罗马加热系统。在古塞伊尔阿姆拉、希尔巴特马夫加尔看到有重大的创新,即扩大了门厅,这或许是伍麦叶王子们接见客人的地方。许多宫殿是按希腊传统的象征性镶嵌图案、绘画、粉饰雕刻以及雕刻石造物进行装饰的。在古塞伊尔阿姆拉,象征性绘画表现了肖像画琳琅满目的宫廷中的生活,其中有乐师、酒徒、杂技演员、王室礼物搬运者、打猎、摔跤以及洗浴等形象,以及圆顶星座。

阿拔斯王朝早期留存下来的建筑说明有些不太相同的情况。尽管曼苏尔的巴格达圆城什么也没有留存下来,但是还有其他城市的废墟,以及在乌克海伊迪尔孤零零的大宫殿(建于778年)的废墟,它们说明伊朗的建筑方法 260 与材料被保留着。萨迈拉有大宫殿群的废墟。它包括清真寺和澡堂、接待区与居住区,周围是广阔的花园。萨迈拉宫殿与住房的主要装饰是拉毛粉饰,

① 即大马士革清真寺,亦译大马士革大寺、伍麦叶清真寺——译者。

259





留存下来的阿拔斯绘画现已极为罕见，尽管众所周知，阿拔斯的宫殿饰有各种壁画，制作出了有插图说明的手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人在伊拉克萨迈拉的发掘找到了一些壁画的残片，它们是用来装饰昭萨克赫加尼王宫的后宫的，该王宫修建于穆尔台绥姆哈里发（833～841年在位）时期。这幅刻画两名舞女正在倒葡萄酒情景的壁画是根据在萨珊王朝器皿上发现的类似风格而仿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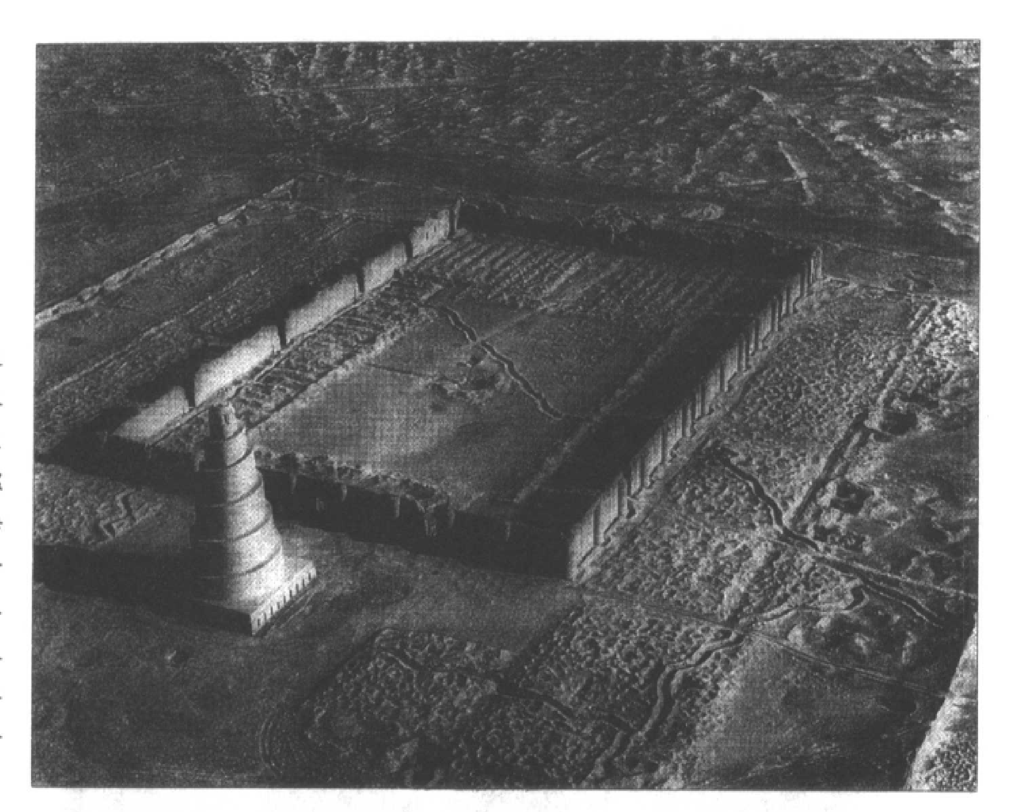
第252页图：位于伍麦叶帝国首都大马士革的伍麦叶清真寺(即大马士革大寺)修建于706～714/715年，当时是瓦利德一世统治时期，这是早期伊斯兰建筑的奇迹之一。该清真寺极尽奢华，它有一个庭院，三面环绕着柱廊，在第四面（南面）坐落着大殿，由与南墙（或礼拜朝向）平行的3个连拱廊组成，中间它与一条同礼拜朝向墙垂直的交叉甬道交叉。这座清真寺到处镶嵌着大理石板和马赛克，大部分柱子取自更加古老的建筑物。尽管这个礼拜大殿给人以内在空间感，但是它的大部分是在1893年被焚以后修补和重建的。

它一直分为3种类型，从最自然主义的(以蔓藤叶为特征)到最抽象化的(设计成深浮雕，并使它成斜角)。后面这种类型有无限复制的潜能，对伊斯兰设计具有新的广泛的影响。在焦萨克哈噶尼（穆尔台绥姆的宫殿）发现有宫廷生活的壁画，在风格上与萨珊王朝时期的艺术类似。

在萨迈拉有两个著名的已成废墟的清真寺，它们都是在穆泰瓦基勒哈里发(847～861年在位)时期建造的。萨迈拉大寺(长261码，宽170码)是所有中世纪清真寺中最大的一个，它有一个多柱式祈祷厅、一个庭院和一些门廊。墙外在“米哈拉布”的中轴线上有一个大的螺旋形尖塔，其渊源尚不得而知。第二个清真寺，即大家所知道的阿卜杜拉夫清真寺，也有一个类似的尖[261]塔。它比萨迈拉大寺稍微小一些(233码长，147码宽[①])，采用“T”形平面图，有较宽的中殿和吉布拉侧廊，然后进入祈祷大厅。

在伊拉克以外，曾在萨迈拉生活了多年的埃及统治者伊本·图伦在开罗建造了一座清真寺(建于879年)，在它的平面图、螺旋形尖塔、砌砖方法以

① 约合213米长，134米宽——译者。



萨迈拉大清真寺（848～852年）遗址奇观。它的四周是一个围墙，清真寺的北面在米哈拉布的中轴线上，有一座巨大的圆锥形尖塔，外面装有螺旋式的阶梯。这座用烧制的砖建造起来的清真寺有一个开阔的庭院，南面是礼拜堂，其顶是由24行柱子支撑起来的。清真寺的外墙可能用马赛克进行了装饰，但是没有留存下来。

及粉刷装饰等方面都明显地注意到萨迈拉清真寺的做法。这一清真寺以它的匀称著名。在突尼斯，凯鲁万大寺（建于670、836、862和875年）用石头建成，并用了从当地希腊－罗马废墟中充裕的柱与柱头。"米哈拉布"地区得到很好的保护，有光彩夺目的瓷砖，还有雕刻大理石镶板。

西班牙科尔多瓦大寺历经多次扩建（784～786、833～852、961～976以及987年），包含有重大的创新：屋顶由双重弓形结构支撑，在柱与柱之间有高高在上的砖砌块拱墩。米哈拉布地区也因有各种精心装饰的圆屋顶和弓形结构、为米哈拉布单建了一间屋、以及由拜占庭工匠做的辉煌壮丽的镶嵌而著名。西班牙伍麦叶王朝时期的世俗建筑主要因阿卜杜·拉赫曼三世在科尔多瓦附近的麦地纳特载赫拉被部分发掘而闻名。

在阿拔斯王朝形成时期，从西班牙到中亚出现了其他建筑物的类型：从所谓的九圆顶清真寺（一种朝三面或四面开的小清真寺，其确切的功能尚不清楚）、里巴特（设防的道堂）到陵墓。这一时期希腊－罗马和萨珊王朝时期的传统被吸收到独特的伊斯兰形式与功能中去，并输出到穆斯林世界的边远地区。

伍麦叶与阿拔斯王朝时期的书法与艺术

262

正在兴起的伊斯兰世界最别具特色的艺术是书法。人们最早知晓《古兰经》片断的时间或许是在8世纪初。早期《古兰经》的手写本是用库法手写体在羊皮纸或精制犊皮纸上写的，便于装订成差不多是正方形的横开本。最引

人注意的装饰形式是卷首插画和卷尾插画，放在单页，或放在双页。

有棱角的库法手写体逐渐被正楷字体所取代。到9世纪末使用的这种手写体有20多种。采用使草写体得以书写的规则，是书法家、阿拔斯王朝的高官伊本·穆格拉（885/886～940年）的一大成就，尽管这种字体的作品看来没有存留下来。

中东除了书法的采用之外，物质文化的性质还是比较稳定的。总起来看，伍麦叶王朝时期的金属制品同伊斯兰产生以前的金属制品很难区分，萨珊时期的形式与装饰依旧存在，像青铜香炉仍然采用鸟的形状。贵金属在阿拔斯王朝巴格达宫殿与萨迈拉宫殿中已广泛采用，但是没有存留下来，因此我们只能转而指望同布韦希王朝（932～1062年）这样的地方性王朝有关的金银物体，以获得对本时期金属制品的较为完整的印象。

9世纪的历史学家亚古比报告说，陶工被从巴士拉与库法带到萨迈拉，在萨迈拉已经发现有关陶器金属光泽技术的最早的事例。对伊斯兰陶器业有较大推动力的是8世纪中叶开始传至中东的中国陶器。阿拔斯王朝时期的陶器产品有模仿唐朝陶器的绿、黄、棕"飞溅样"陶器；"五彩拉毛陶瓷"，是这样的一种技术：在陶器表面刻上图案，以露出花纹里面陶器本身的红色；最重要的是，这是一种模仿中国白瓷器的陶器。阿拔斯王朝时期这些白陶器在制作时，在用铅擦过的陶器上加上锡，在图案和铭文上还创造性地加上一些钴蓝色。

阿拔斯时期的陶工用有金属光泽的图案装饰陶器的技术已取得相当突出的成就。装饰的内容包括一些高度格式化了的形式，就像这幅来自萨迈拉的样品一样。在这幅样品中，鸟与棕叶的装饰合而为一，而以影线、蜷线和圆点充填其间。

伊朗地方性中心及其他地方迅速地承继了阿拔斯王朝时期的一些东西：尤其是撒马尔罕和内沙布尔成为制陶业的主要所在地。在不属于阿拔斯模式的陶器中，有一种装饰有醒目的库法铭文，或转为动物形状的库法字体。

凯鲁万大寺的敏拜尔（布道坛）是伍麦叶朝时期和阿拔斯朝时期几个尚存的也是最古老的木雕作品之一。它有许多基本花纹是仿效建筑中的拉毛粉饰和石刻。出自10世纪和11世纪伍麦叶朝时期西班牙的一组象牙盒中，[263] 有一些根据铭文被鉴定为是为王室或宫廷要人做的，上面有抽象的装饰，也有象征性的装饰，它们以其精美的雕刻抓住了本时期庇护者的高雅取向。

11～15世纪的宫廷与百姓

10世纪以后阿拔斯帝国的解体以及一些地方性王朝的兴起，标志着艺

术制作以及庇护者的改变。在这些统治者宫廷的周围兴起了一些地区性中心，其中有一些有游牧的渊源，其他一些则宣传异端的或清教主义的教义。经院哲学和苏菲主义成为指导性的运动，而模仿宫廷庇护者的城镇商人背景的出现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这一时期是伊斯兰历史上最丰富多彩和最多产的时期之一。

阿拉伯、波斯与突厥的诗歌与散文

只有受过教育的精英才能理解古典阿拉伯的诗歌传统，诗人们终于开始使用方言诗句的形式。阿拉伯散文方面，白迪阿·宰曼·海麦达尼（968～1008年）创立了一种叫做“麦嘎麦”（成段）的新风格。“麦嘎麦”是虚构的作品，描写两个人物，一个英雄和一个讲述者，后者用押韵的散文详细描述前者的风险事业。这些讲述者用来展示阿拉伯词汇的丰富以及作者遣词造句的技巧。诗人兼哲学家哈利里（1054～1122年）在12世纪初以这种风格写出了他的“麦嘎麦”，它大受欢迎的程度，许多有插图说明的抄本可资证明。

著名的《一千零一夜》故事集此时通过说书人而得以流传，尽管阿拉伯人从来不认为这是古典文学。这些故事源于印度、波斯和阿拉伯世界。这本故事集对西方人极具吸引力。

在西班牙，本地的（塔伊法）王子写诗，对诗人也进行鼓励。其中最重要的诗人是伊本·扎伊敦（1003～1070年）。在穆拉比特王朝（1056～1147年）统治时期，安达卢西亚口语在伊本·古兹曼（卒于1160年）的诗中得到表现。到伊本·萨赫勒（卒于1251年）写作他的“穆瓦舍赫”时，那已是行将就木的形式了。诗人阿卜杜－巴噶·伊本·谢里夫（卒于1285年）对“复地运动”[①]的提出表示悲伤，奈斯尔王朝的高官伊本·哈提卜（1313～1374年）以他的选集《杰伊石·陶什赫》（Jaysh al－tawshih）标志着“穆瓦舍赫”的终结。伊本·哈提卜和他的继承者，如高官伊本·扎姆拉克（卒于1393年），都有诗铭刻在格拉纳达阿尔罕布拉宫殿的墙上。

在阿拉伯文学传统的活力开始消退时，波斯文学却在茁壮成长。它兴起于伊朗东北一些自治国家，特别是在布哈拉萨曼王朝的宫廷（819～1005年）。伽色尼王朝继承了这一遗产，它的首都加兹尼成为知识界和文学生活的中心，它因费尔道西（卒于1020年）而增光，他的史诗《列王纪》涉及古代伊朗神话国王及其后继王朝的历史。

264

大家所知道的“茹拜”[②]这种诗的形式受到欢迎，为欧玛尔·海亚姆（1048～1131年）和其他诗人所采用。但是在蒙古人侵以前，颂诗仍然是抒情诗的主要形式，它激励着像穆伊兹（1084～1124年）、安瓦里（卒于1190年）这

① 8世纪摩尔人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后当地人掀起的运动——译者。

② 四行诗，每行四行，韵律为aaba——译者。

样的塞尔柱宫廷诗人，以及阿塞拜疆哈噶尼（卒于1199年）的作品。蒙古人结束了波斯文学在东北各省的主导地位。新的中心有鲁米[①]塞尔柱人首都科尼亚，以及伊朗南部的设拉子等。从13世纪起，“噶扎尔”体诗（ghazal）兴起，成为抒情诗的主要形式。无论是浪漫主义的诗歌，还是说教式的诗歌，都采用押韵两行诗形式的“玛斯纳维”体[②]。尼扎米（卒于1209年）创作了宏大的浪漫主义诗歌，是有关诸如《蕾莉和马杰农》和《霍斯鲁与熙琳》这样的民间故事的。而法瑞德丁·阿塔尔的《鸟的聚会》（写于1177年）则属于神秘的“玛斯纳维”体。

1206年德里素丹国建立以后，波斯文学在印度次大陆也得到诸如阿米尔·胡斯饶（1253～1325年）这样的诗人的栽培。神秘诗盛行，其最重要的代表是哲拉鲁丁·鲁米（卒于1273年）。设拉子是萨阿迪（卒于1292年）和哈菲兹（1319/1320～1389/1390年）的故乡。萨阿迪精美的说教式“玛斯纳维”《花园》、他的散文与韵文诗《玫瑰园》很受赞许，在后来一些年出现了很多为它们做的插图。哈菲兹在一系列卓越的“噶扎尔”中展现了世界的图景，它是与有神秘思想的世俗意象结合在一起的：

> 玫瑰花已经钻出新芽，这芽已经绽开，
> 陶醉的酒鬼是夜间鸣叫的鸟——
> 好啊，苏菲派！酒的爱好者，都好啊！
> 因为酒被说成是渴望的世界。

伊朗文学这一有活力的时期随着赫拉特[③]的贾米（1414～1492年）神秘诗歌的出现而告结束。

13世纪以后在安纳托利亚出现了突厥语文学作品，到15世纪奥斯曼宫廷鼓励学者与诗人时，优美的突厥语诗歌正在进行创作。在赫拉特，帖木儿帝国统治者侯赛因·拜哈拉（1469～1506年在位）的大臣米尔·阿里·施尔·纳维（卒于1501年）以察哈台突厥文和波斯文进行写作，突厥文在埃及塞卡西亚马穆鲁克[④]王朝（1382～1517年）时期也得到提倡。到15世纪末，突厥文已经成为文学界所喜好的媒介。

音乐理论与实践

同样，世俗意象在诗歌中也是用来表现宗教体验的一种手段，于是，伊

① 塞尔柱突厥人最初对锡瓦斯和开塞利地区的称谓——译者。

② 波斯文的音译，原意为双行诗体，是波斯古典诗歌的一种格律。英译为“Spiritual Couplets”，即两行式圣诗——译者。

③ 今阿富汗境内——译者。

④ 塞卡西亚亦称布尔吉（碉楼）系马穆鲁克——译者。

斯兰教义学家阿布・哈米德・安萨里(1056~1111年)论证说,世俗的音乐艺术可以反映神圣的领域。曾为阿拔斯王朝最后一位哈里发穆斯泰尔绥姆(1242~1258年在位)以及蒙古的旭烈兀(1256~1265年在位)服务的萨菲丁(卒于1294年)在音乐理论方面是位超群的人物。他的论文集《调式篇》和《Al-sharafiyyeh 关于音程关系的论文》提供了理论框架,随后两个世纪几乎所有的主要音乐作家都要使用这一框架。萨菲丁最有影响的继承者是作曲兼演奏家阿卜杜勒・噶迪尔・马拉吉(卒于1435年),他活跃于巴格达和撒马尔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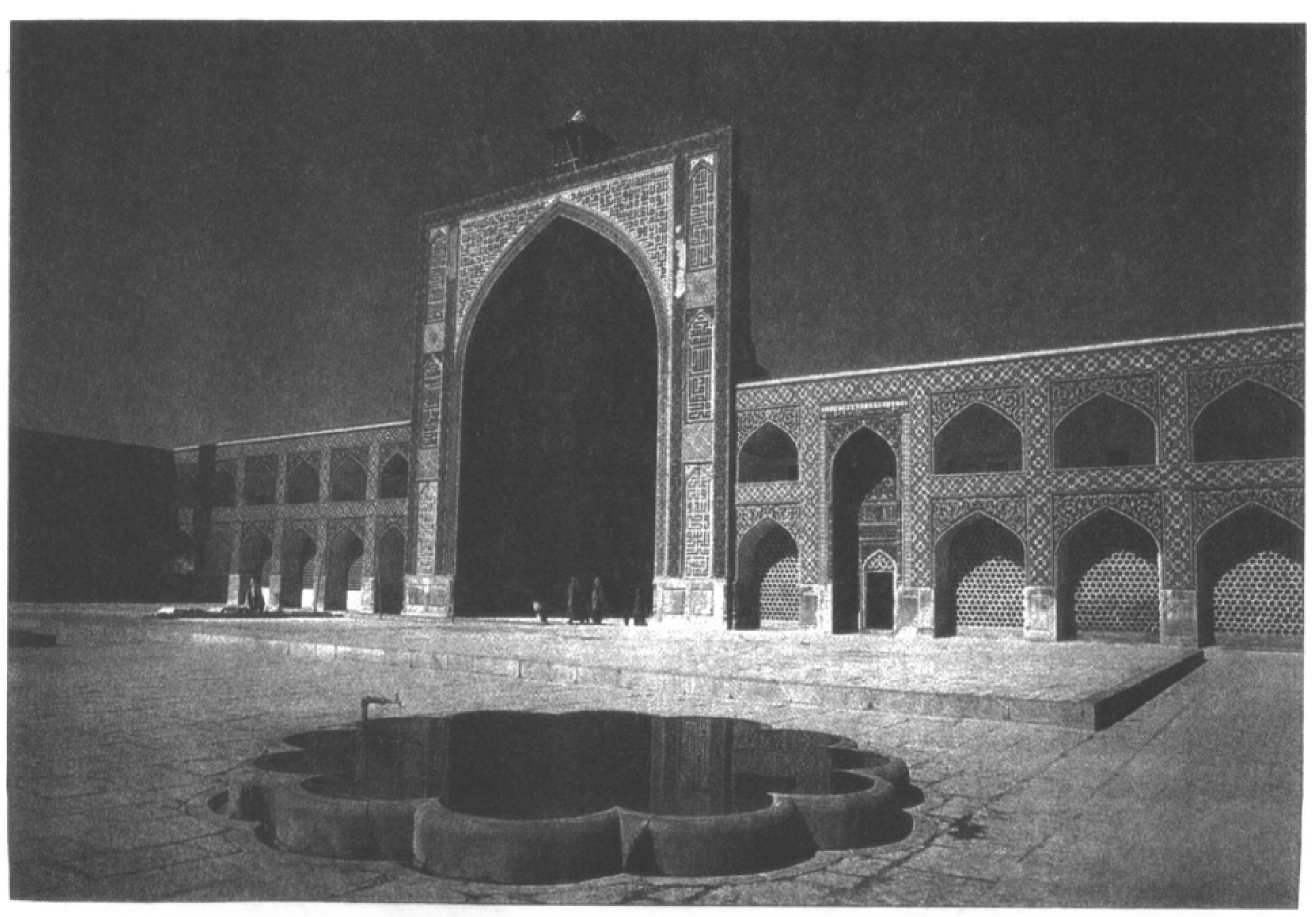
2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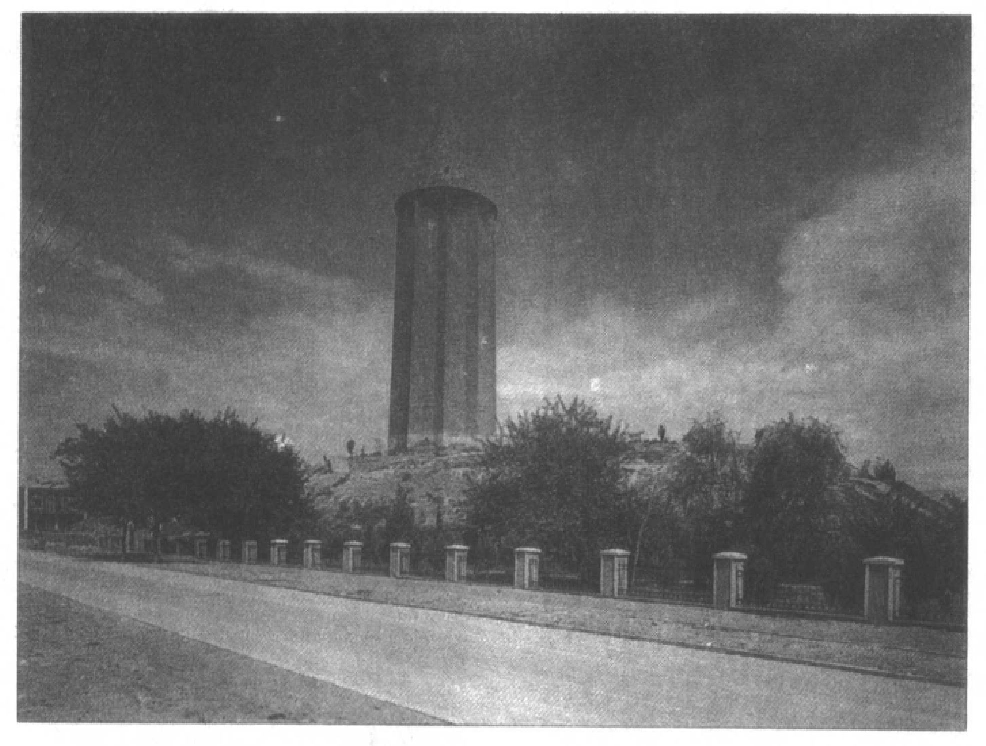
到13世纪中叶,阿拉伯音乐和伊朗音乐的融合形成伊斯兰世界东部大部分地区共同的风格。在北非和西班牙的音乐中,继续形成为安达卢西亚风格,而在土耳其,至少从鲁米的儿子素尔丹・瓦拉德(1226~1312年)的时候起,毛拉维教团便开始在他们的仪式中利用音乐。在印度,伊斯兰音乐与地区音乐开始富有成效地交汇在一起。印度各位穆斯林统治者也开始成为热心的庇护者——穆罕默德・伊本・图格鲁克素丹(1325~1351年在位)有1200名乐师为他服务,另外还有1000名奴隶乐师。

伊斯法罕清真大寺在1121/1122年被一场大火烧毁以后,重建时四个门面每一面的中间都建了拱形大厅。南面的拱形大厅可能是最早修建的,接着是东面和西面的拱形大厅,最后是北面的拱形大厅。然而,自从12世纪以来,它的庭院已经被数次改建和重修。本图是庭院西侧的拱形大厅,在萨法维王朝晚期做了重大修缮,图中的砖瓦制品和铭文表明了这一点。

穆斯林各帝国新的建筑类型

从10世纪起,突厥部落进入伊朗,在建筑物类型、设计与建造上带来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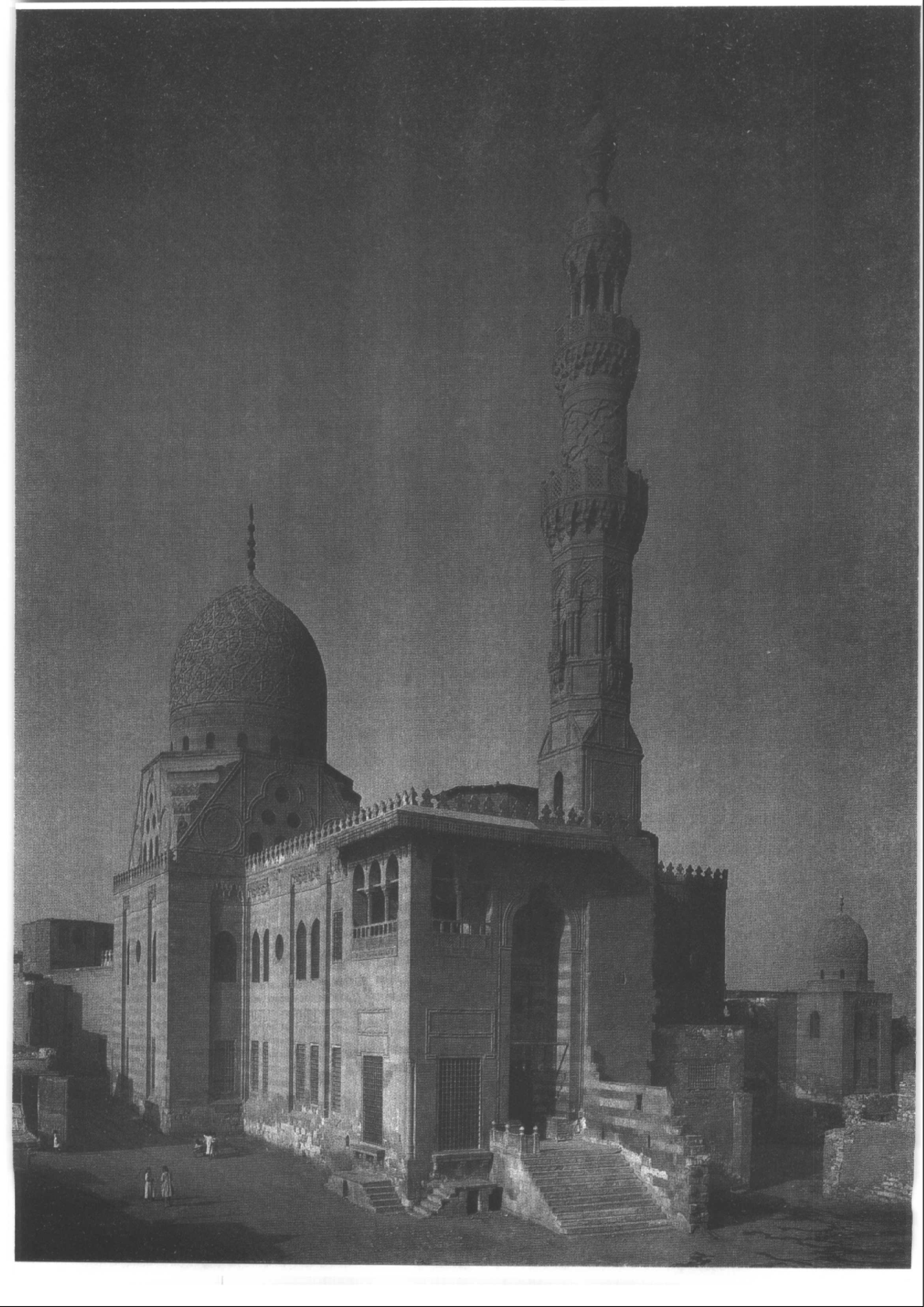
这个壮观的塔式卡布斯陵墓是1006～1007年齐亚里德王卡布斯·伊本·瓦什姆吉尔在里海东南戈尔甘附近修建的。它坐落在人工堆成的台地上，平面呈圆形，在四周有10个三角形的凸缘，非常醒目。由于在塔内并没有发现有陵墓，中世纪的一位编年史家猜测，可能灵柩已经停止使用。两小条带状铭文刻在砖结构上。卡布斯家族是从袄教皈依伊斯兰教的，在纪念物上同时使用阳历和阴历来表示时间，进一步说明了他们继续保持着一些前伊斯兰的传统。

新。塞尔柱最重要的集会用清真寺——在其首都伊斯法罕的大寺有两次大 266 的改动。第一次是分别在1072 ～1075年和1088年加上两个拱顶，一个装在凹壁的前面，另一个装在清真寺的北边。对其功能不太了解，后者也许是为了王室礼拜或做接待用。第二次变动是在1121/1122年以后，当时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放火烧了作为逊尼主义中心的伊斯法罕大寺。这一次的变动包括在每个院落正面的中间加盖一个拱顶大厅。这4个大厅的设计创立了新的横穿中轴的空间意识，并成为塞尔柱以及后来伊朗清真寺的一大特征，也是那时出现的其他建筑类型，如宗教学校和医院的一大特征。一直有一种看法认为，不管是单独的拱顶，还是4个拱顶大厅的设计，体现在其中的偏好，都是伊斯兰以前伊朗建筑的复活。

尽管塞尔柱的兴趣在于用良好的烧砖技术建造拱顶和圆屋顶上，这种兴趣体现在伊斯法罕大寺的两个圆顶上的成绩也值得称赞，但是，从10世纪以后建造的大量陵墓上，也可以看到塞尔柱在建筑创新以及砖房装饰上的兴趣。在布哈拉的萨曼王朝的埃米尔伊斯玛仪的陵墓（10世纪初）是由有圆顶的立方体组成的“拱顶墓”的一个范例，而里海东南戈尔甘附近贡巴德卡布斯的墓塔（建于1006/1007年）是最为壮观的。后来，装有翼缘的塔加上圆锥形的塔顶，高达165英尺。在伊朗地域内，11世纪和12世纪也有一些孤立的尖塔或塔，一般都比较高，呈圆锥－圆桶形。其中有一些塔可能是用来纪念伊斯兰的胜利，或是用作沙漠商队的“明亮的住房”。 268

在安纳托利亚，塞尔柱人以石头为他们主要的建筑材料，石头的切割可塑性是很特别的。安纳托利亚独特的创新是在装圆顶时用穹隅而不是用突

第260页图：马穆鲁克素丹卡伊特贝伊（1468～1496年在位）是一个富于创造力的庇护者，他治下最杰出的建筑成就是为他自己在开罗北公墓修建的陵墓建筑群。整个建筑在突前位置的高高的正门左侧有一个配水处（它的底层是一个《古兰经》学院）；后面是“麦德莱赛”和陵墓。建筑的外表装饰着水平的砖石条纹，而圆顶和尖塔则展现了马穆鲁克完美的石雕艺术。



角拱。由于气候寒冷，后来的塞尔柱清真寺院落较小，有些院落有圆顶，这一集中化的设计预示着奥斯曼时期单个圆顶清真寺的模式。塞尔柱安纳托利亚有大量的陵墓、医院、商队客店以及宗教学校留存下来。

蒙古在伊朗西北部的大不里士建都之后，加赞伊尔汗（1295～1304 年在位）和他的大高官赖世德丁在该城建造了一个全新的区，其中惟一流传下来 269 的蒙古主要纪念物是阿里·沙（1310～1320 年在位）清真寺遗址庞大的拱顶大厅。完泽笃（1304～1317 年在位）在苏尔坦尼亚[①]建立蒙古新都，该城除他

伊本·巴瓦卜

书法家和启蒙者伊本·巴瓦卜（阿卜－哈桑·阿里·伊本·希拉勒，卒于 1022 年）继承了伊本·穆格拉（卒于 940 年）开创的书法流派，在伊本·穆格拉女儿的帮助下研究书法。伊本·巴瓦卜的伟大成就在于把伊本·穆格拉的 6 种"匀称的手写体"变得更加精细而优雅。他擅长于所有这 6 种书法艺术，尤其精通其中的纳斯赫体和穆哈加格体。他活跃于巴格达，同时还作为图书管理者效力于设拉子的布韦希王朝统治者巴哈·达拉（998～1012 年在位），在设拉子期间，伊本·巴瓦卜誊抄了《古兰经》的 1/30——这是伊本·穆格拉誊写的《古兰经》中缺失的部分。伊本·巴瓦卜的作品与伊本·穆格拉的原作非常神似，很难看出是出自两个人的手笔。据说，伊本·巴瓦卜一生共誊抄了 64 份《古兰经》，还有一些堪称书法佳作的书信和诗歌。作为一名虔诚的信徒，精通神学和法学、并以其长胡子著称的伊本·巴瓦卜在生前已誉满天下。在他死后，他所创立的书法流派在巴格达由他众多的学生继承下来，其中包括一名女性——扎伊纳布·舒赫达·卡蒂巴（卒于 1178 年）。通过她，伊本·巴瓦卜的流派得以传承和延续到中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书法家雅古特·穆斯塔缕姆（1298 年卒）。

伊本·巴瓦卜誊抄的《古兰经》看来至今只有一本流传下来。这本《古兰经》于 1000～1001 年在巴格达誊抄完成，共有 286 对折页，高 6.75 英寸，宽 5.25 英寸，其中每一页都有 15 行，用纳斯赫体写成，这些字母都用笔直的芦苇杆笔书写，自始至终写得都很密。优美的字体绵延盘曲流畅，间以深棕色、蓝色和金黄色的注释，使这部《古兰经》成为书法中的极品。这是已知现存最早的用盘曲体写在纸上的《古兰经》，更早时候的样品已经失传。



伊本·巴瓦卜誊抄的《古兰经》文本中，正文用纳斯赫体，标题则用苏勒斯体。本图中的这一页（对折页 9 之左页）从"法谛海"（"开端"，即第一章）开始，这一章右边空白处有一个圆形图案（在正文中用一个水滴状图案标出），表明第 5 节的开始。第二个标题表明第二章"百格勒"（"黄牛"）的开始。

① 今赞兼——译者。

的大陵墓(建于1307~1317年)之外也被毁坏。该陵墓为双壳拱顶,基础为八边形,覆盖有蓝瓦,周围有8个尖塔。帖木儿王朝发展了所有这些特征。帖木儿时期独特的拱顶陵墓可以在帖木儿首都撒马尔罕看到:一个是古尔阿米尔陵墓(建于1404年),帖木儿本人于1405年被埋葬在那里;另一个是在城外的沙·金达陵墓。在古尔阿米尔陵墓,以及在赫拉特的沙鲁哈(帖木儿素丹,1405~1447年在位)妻子高哈尔·沙德的陵墓,拱顶外面呈鳞茎状,表面有罗纹。在所有这些例举的陵墓中,拱顶都装有明亮的上釉陶瓷外壳,一般为绿松石色。无论是这些陵墓,还是帖木儿王朝时期在撒马尔罕、赫拉特、马什哈德以及大不里士的清真寺建筑群,各种结构都覆盖有美丽的多种颜色的瓷砖,这在建筑颜色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在埃及,同样独特的建筑在法蒂玛哈里发国时期(909~1171年)也得到发展,该王朝所遵循的什叶派教义以及王室仪式在他们清真寺的设计与装饰上得到了反映。在他们的首都开罗,有两个大的集会用清真寺被保留下来了:爱资哈尔清真寺(建于970年)和哈基姆清真寺(建于990~1013年)。有一些陵墓可以追溯到法蒂玛王朝的初期,这或许可以归因于法蒂玛王朝宣称为哈里发国家,以及他们对阿里后裔陵墓的崇敬。法蒂玛人从11世纪中叶起在开罗建造了规模较小的清真寺,正面为精心设计的石刻结构。他们遗留下来的最壮观的世俗建筑当属开罗城墙的3个石门,它们显示出与叙利亚以及北美索不达米亚军事建筑的密切关系。

在马穆鲁克王朝(1250~1517年)早期一些朝代,建筑形式与装饰取得很高水平的成就。马穆鲁克建筑大部分是陵墓综合体,通常在庇护人陵墓周围有一组建筑,其中包括有清真寺、宗教学校、医院等。开罗素丹哈桑(建于1354~1362年)建筑群因其规模以及石刻装饰的力度给人留下的印象最深。15世纪的实例规模普遍较小,但是有独特的马穆鲁克石刻拱顶和多边的尖塔,例如,开罗卡伊特贝伊建筑群(建于1472~1475年)。尽管埃及马穆鲁克时期有这些特点,但是,许多特征,诸如陵墓建筑群的设计、圆顶的形式、宏伟的大门,以及石刻装饰等,可以与同时代伊朗以及安纳托利亚的建筑联系起来。

如同文学与音乐,马格里布与安达卢斯较早地有了自己的建筑风格。穆拉比特帝国与穆瓦希德帝国的新兴城市都有新的集会用清真寺,或将已有的清真寺进行改建,如穆拉比特帝国阿尔及尔清真寺(建于1096年)、特莱姆森清真寺(建于1136年)和在非斯的凯鲁万清真寺(主要建于1135年),或穆瓦希德帝国在马拉喀什(建于1146~1196年)、塞维利亚(建于1171年)和拉巴特(建于1196/1197年)的集会用清真寺。这些清真寺遵循的是凯鲁万和科尔多瓦确定的模式,有宏大的"T"形平面多柱式祈祷大厅,还有典型的方形平面的尖塔。从奈斯尔王朝时期(1232~1492年)起,闻名遐迩的纪念物是格拉纳

270

达的阿尔罕布拉宫殿，这是惟一保存较好的伊斯兰宫殿，它由于装饰得富丽堂皇而又精美异常，在多少个世纪里都一直令人赞叹不已。有一系列多半属于14世纪中叶的私人庭院，装饰有上釉瓷砖镶嵌、雕梁画栋与拉毛粉饰，对于穆拉比特帝国与穆瓦希德帝国来说，这都是首次得到发展的建筑成分。最复杂的形式是壁龛的粉饰圆顶或钟乳石状圆顶，在伊朗塞尔柱时期这首次是以砖结构表现出来的特色，在这里只起纯装饰的作用。

视觉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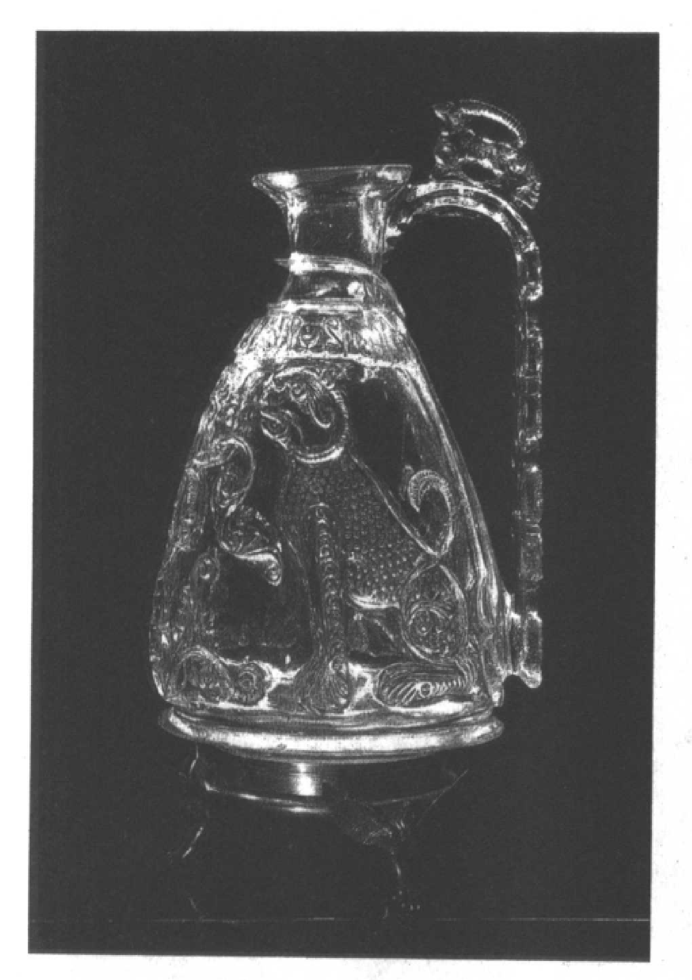
在10世纪和11世纪初，“纳斯赫”、“萨鲁斯”、“穆哈加格”、“拉伊汉”、“陶基”和“瑞噶”等手写体被规范化。“纳斯赫”手写体用于抄写原稿和小《古兰经》；“萨鲁斯”手写体常用于《古兰经》各章标题，以及建筑铭文；“穆哈加格”和“拉伊汉”手写体用于大《古兰经》；较为流畅的“陶基”和“瑞噶”手写体用于大臣的文件和原稿末页的题署。伊本·穆格拉关于使书法手写体均衡的体系，经伊本·巴瓦卜（卒于1022年）的推敲，后来雅库特·穆斯塔希米（卒于1298年）又加以改进。从14世纪起，书法家越来越多地在自己的著作上署名，于是他们的名字得以在其他书面资料上保存下来。在埃及与叙利亚，亚古特及其学生创立的书写风格在马穆鲁克的庇护下得到发扬。为马穆鲁克素丹舍尔班二世（1363～1376年在位）及其母亲以“穆哈加格”手写体所写的《古兰经》抄本，是写得最好的。

从12世纪末起，在穆斯林地域内的各种媒体里，形象化图象增加了，其中包括底稿上的插图，到13世纪与14世纪各种类型的绘画也出现了。在塞 [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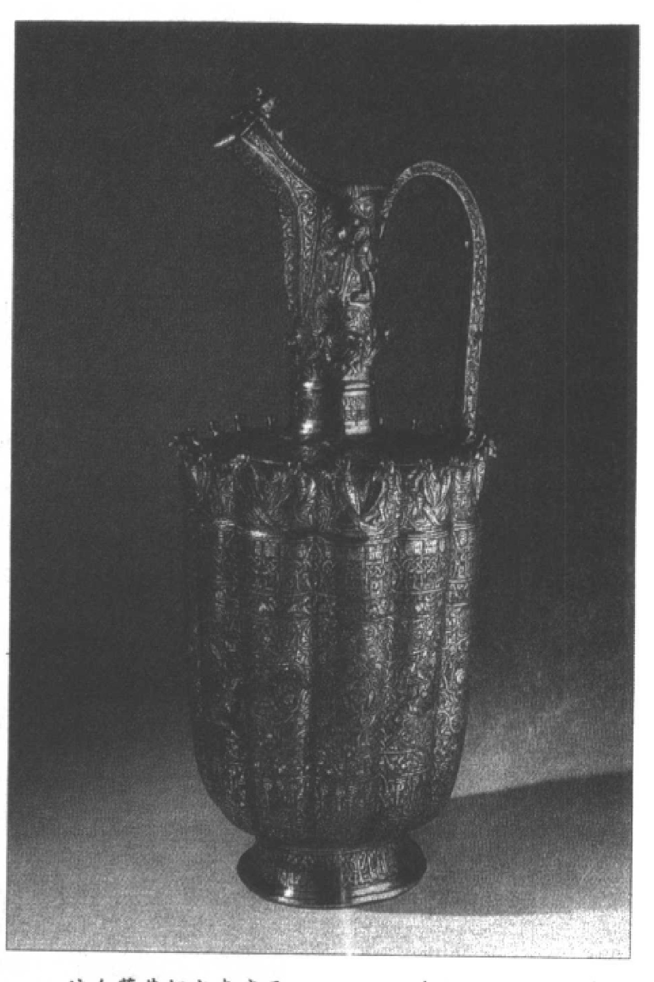
受伤的鲁斯塔姆瞄准沙格哈德发箭。这幅画摘自费尔道西创作的伟大叙事史诗《列王纪》中的插图。这是关于伊朗国王与英雄的史诗。在此，濒临死亡的英雄鲁斯塔姆（他的坐骑拉克什掉进了一个陷阱而被尖桩刺穿）正在向一个叛徒——他的同父异母兄弟沙格哈德发箭，利箭穿透了树干。



273



在法蒂玛时期，水晶石是一种很珍贵的贡品和礼物。这个饰有狮子雕刻的大口水壶上载有关于法蒂玛王朝哈里发阿齐兹(975~996年在位)的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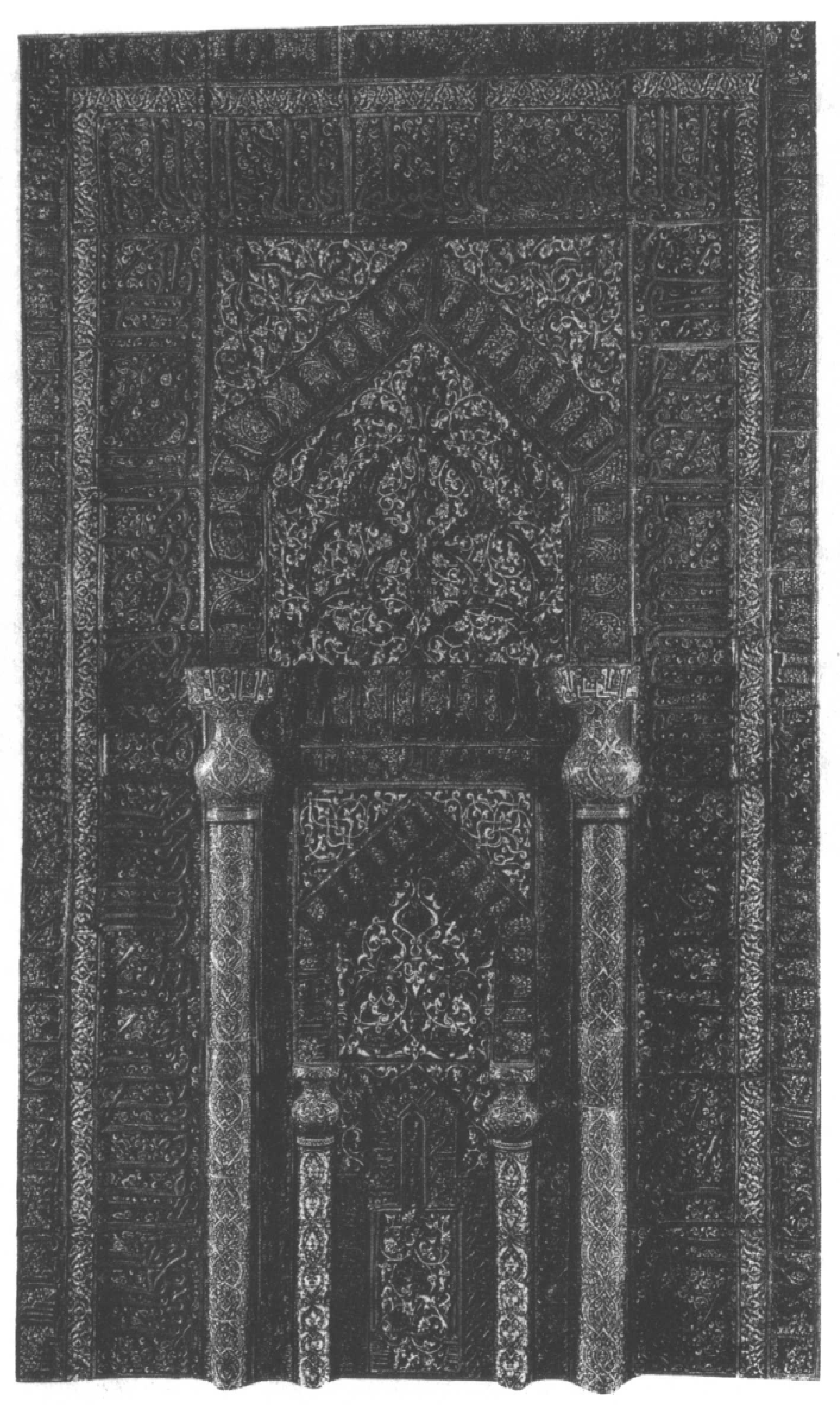


这个薄黄铜水壶产于1180~1200年间。12面体，壶嘴很高，壶体外表刻有祝福的语句、星相学的图画，以及凸纹形的漩涡图案和银质的镶嵌物，这些突出来的小鸟都有铜质的眼睛。这个水壶可能产自赫拉特，即塞尔柱人时期镶嵌金属制品的主要制造中心。

尔柱统治下比较流行的绘画是矫揉造作的、装饰性的，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为阿拉伯庇护者所做的则展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的意识。叙利亚一些绘画稿表现了该地希腊传统的成分。波斯的绘画从14世纪起也开始繁荣；几种风格，其中包括中国的影响，逐渐融合，建立了这一新的风格。名为《大蒙古"沙赫纳马"》的绘画可能画于14世纪第二个1/4世纪，地点在大不里士，它描绘了情绪紧张、行动激烈的气氛。然而到14世纪末，在扎拉伊尔王朝时期和穆扎法尔王朝时期出现了新的、较柔和的有复杂空间构图的绘画风格，它是15世纪帖木儿王朝时期绘画风格的先导。帖木儿王朝时期的绘画是为王室各庇护者制作的，尤其是在赫拉特，在巴伊森古尔王子（卒于1433年）治下，绘画得以兴盛。在该世纪末，当著名画家比赫扎德活跃之时，赫拉特这一极其精致的艺术的最后盛时也就宣告结束了。

第264页图：这幅由比赫扎德于1494~1495年在赫拉特创作的小型彩饰画描绘了马蒙哈里发在一间突厥浴室的情景。比赫扎德展示了他高超的构思和布局技巧，画面具有内在的韵律，颜色搭配十分得当。这幅画还显示了他在塑造形象方面的天赋。

这一时期，吸引穆斯林艺术家的艺术形式很多。在开罗，法蒂玛王朝时 274



除了各种各样的容器和砖瓦以外，卡尚[①]的陶工还生产制作各种精美的米哈拉布。他们的装饰风格严肃庄重，主要靠铭文和无图像的花纹。本图这幅釉底绘制和光瓷绘制的陶瓷米哈拉布产自1226年的卡尚，上面有用纳斯赫体和库法体铭文环绕的一套壁龛。

期的水晶石雕刻留存下来，上面铭刻有哈里发或高官的名字。法蒂玛王朝时期切割玻璃的实例也保存下来了，而在马穆鲁克王朝时期，玻璃涂釉与镀金技术在清真寺灯的制作上达到顶峰，这些灯装饰有书法与纹章图案。在帖木儿帝国时期制作了精美的玉刻物品。自塞尔柱人统治安纳托利亚以后，即存

① 今伊朗境内——译者。

在着打结织的小地毯，或许是突厥部落将这一技术带到西亚的。与此同时，西班牙成为丝绸业居主导地位的制造者。伊斯兰世界的金属制品是无与匹敌的，主要是镶嵌有金银的青铜与黄铜制品，如水壶、盆、盘、烛台和香炉等，上面有抽象的、书法的、形象的图案。这一传统制品首先出现于塞尔柱人统治的呼罗珊，13世纪在伊拉克得到发展，在埃及马穆鲁克宫廷再次兴盛起来。与伊朗和安纳托利亚建筑用砖瓦制品兴起的同时，各种陶瓷技术从12世纪起也宣告诞生，最普通的是多色釉底的绘画陶器，但是后来也出现了涂釉的绘画陶器。最引人注目的技术是金属光泽方面的技术，首先见于阿拔斯王朝统治的伊拉克，法蒂玛王朝统治的埃及，后来在伊朗的呼罗珊扎下了根，在这些地方大量制造有光泽的砖瓦与器皿。在这类器皿上肖像画包括登基的场面、饮酒、打猎以及运动等，属宫廷生活的肖像画，它们是在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时期确立下来的，但是现在装饰性器皿则越来越为商人消费而生产。

16～18世纪各黑色火药帝国的艺术

16世纪穆斯林世界3个主要的帝国——奥斯曼帝国、萨法维帝国和莫卧儿帝国中的每一个都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这最终导致它们在文化上分道扬镳。与此同时，在它们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共享的文化与互动：例如，许多艺术家由于萨法维王朝宫廷里的庇护人势力衰退，而旅居印度，到莫卧儿王朝那里去碰运气。到18世纪，每个地区也存在着政治上的混乱，其原因要么是内部的冲突，要么是欧洲国家日益增多的干涉。

奥斯曼、萨法维与莫卧儿帝国的诗歌与散文

在奥斯曼统治下，颂诗与“噶扎尔”（抒情诗的一种形式）须改写为奥斯曼土耳其文。卓越的语言大师福祖里（卒于1556年）虽然从未离开过他的出生地伊拉克，但他用土耳其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写作。而在伊斯坦布尔，素丹及权贵们热切地提供庇护。苏莱曼大帝（1520～1566年在位）承认诗人巴基（1526～1600年）的才干，大高官易卜拉欣帕夏是哈雅里（卒于1556年）的庇护者。在鲁米的影响下，土耳其的神秘诗歌也有所发展。所谓“郁金香时代”最著名的诗人是内迪姆（卒于1730年）： 275

请求你母亲允许，对她说这是为了这个星期五神圣的祈祷，
不合时宜的痛苦的紧要关头，让我们俩都占去一天，
通过秘密的通道和小径溜向码头，
让我们到游乐园去，来啊，我逍遥自在的柏树，

只有你和我，还有一位唱着高雅曲调的歌手——可是
另一个：在你仁慈许可的情况下，内迪姆，狂烈的诗人；
今天让我们忘记我们的好友，我那快乐的蜂鸟——
让我们到游乐园去，来啊，我逍遥自在的柏树。

内迪姆之后，奥斯曼诗歌趋向于进一步脱离波斯的诗歌传统，而且试图使语言简明易懂。

土耳其散文在16世纪备受欢迎，其特征是语言矫揉造作加上复杂的形象化的比喻。历史著作居于前列，尤其是颂扬素丹们的成就与美德的编年史著作。基于阿拉伯模式的地理著作、游记以及人物词典也很受欢迎。17世纪卡提卜·切列比（哈吉·哈利法，卒于1657年）用了大约20年编辑他的《释疑》，这是一部大百科全书与文献目录，而尤里亚·切列比（1611～1684年）的《希雅哈内姆》(Siyahatname)由于评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显得十分重要。

在萨法维王朝统治下的伊朗，许多作家的创作被引导到宗教宣传著作与宗教行动指南上去了。宗教诗歌也很突出，其主题取自什叶派伊玛目与殉教者的故事。在前几个世纪曾经鼓励过诗歌发展的苏菲主义现在已不多见，传统的宫廷庇护也已同样衰落，而萨法维宫廷的日常用语是土耳其语，而不是波斯语。

在16世纪下半叶，伊朗许多诗人被吸引到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帝王们是慷慨的庇护者。乌尔菲(1555/1556～1590年)出生于设拉子，到莫卧儿王朝这里寻求庇护，在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宫廷有51位来自伊朗的诗人。人才的流动也在印度与伊朗促进了新的诗歌风格的形成。大家所知道的印度风格，其特征是：偏爱“嘎扎尔”（抒情诗的一种形式），使用繁多的形象化比喻和新颖的隐喻。以印度风格进行创作的伊朗最有才华的诗人是大不里士的塞伊卜(1601/1602～1676/1677年)，他在印度很受欢迎。

在贾汗季（1605～1627年在位）和沙杰汗（1627～1658年在位）统治时期，伊朗诗人持续不断地流入印度。贾汗季皇帝统治时期最杰出的诗人是塔里卜·阿穆里（卒于1626/1627年），在沙杰汗统治时期较活跃的诗人中有卡里木（卒于1651年）和塞伊卜。但是在奥朗则布统治时期（1658～1707年），官方对诗歌的庇护宣告结束，尽管他的宫廷里的某些人在一定程度上还在继续给予庇护。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诗人是贝迪尔(1644/1645～1720年)，在他的[276]诗行里印度风格的伊朗诗歌达到它的极致。从18世纪起，作为文学表达的工具，乌尔都文平稳地得到重要地位，并开始取代波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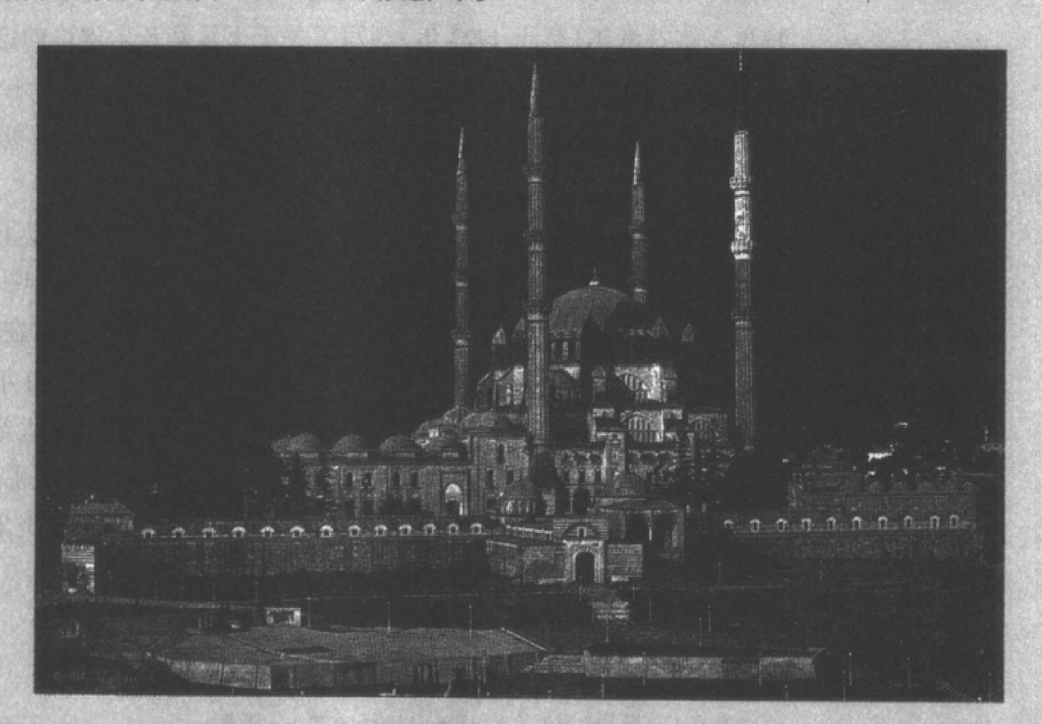
莫卧儿时期的散文有追求文体华美的趋向，较为著名的是历史著作和人物传记，如巴布尔[①]写的回忆录《巴布尔篇》，用察哈台突厥语记录了他的

息　南

息南（卒于1588年）于1521年进入近卫军，在1538年被任命为宫廷建筑师以前，已是一个成功的军人。伊斯坦布尔塞赫扎德清真寺是为纪念苏莱曼大帝的儿子穆罕默德（1543年死于天花，时年22岁）而设计建造的，他称之为自己"学徒时期的作品"。为了给该清真寺建造一个大的圆顶祈祷屋，息南在中央圆顶周围设计了4个半圆形的顶，这使该清真寺的设计显得较为集中。他的另一个杰作是伊斯坦布尔的苏莱曼清真大寺（1550～1557年）。在设计这个清真寺时他回归到奥斯曼初期清真寺的建筑风格，即用2个半圆形的顶支撑起中心的圆顶，而他设计的这个圆顶高度（174英尺）还两倍于其直径（87英尺）。该清真寺的结构从其外形轮廓可以看出来，它以伊斯坦布尔的整个天空为背景。在4个角分别矗立着尖尖的"铅笔形状的"尖塔。它的米哈拉布装饰着伊兹尼克的瓷砖和艾哈迈德·卡拉希萨里（1469～1566年）设计的书法体圆牌。苏莱曼的陵墓紧靠着该清真寺的南面，而息南自己最终也被后人安葬于此。

被息南视为自己代表作的建筑物是位于埃迪尔内的赛利姆清真寺，该清真寺建成（1569～1575年修建）时息南已年近八旬。该清真寺的设计包括广场上八角形的环状区域。它的圆顶直径达到102英尺，是奥斯曼建筑中的顶级之作，整个圆顶由8个巨大的墩台支撑着，这种结构使得建筑师不必再使用初期清真寺那样的半圆形屋顶拼凑而成。米哈拉布的侧面是用陶瓷材料砌成的护墙，讲台是用马尔马拉大理石精雕的。位于该清真寺中央的讲坛是用来礼赞的；在它下面是一个小喷泉。在清真寺的外围，有4座高耸入云的尖塔环着圆顶。

息南还设计了伊斯坦布尔、埃迪尔内以及这两座城市之间沿线的其他许多建筑。其中在伊斯坦布尔的有鲁斯特姆帕夏（卒于1561年）清真寺、米瑞玛（Mihrimah）素丹建筑群（1562～1565年）、索科鲁·穆哈默德帕夏清真寺（1571年）、赛利姆二世陵墓（1577年）、科里克·阿里帕夏建筑群（1580年），以及扎尔·穆哈默德帕夏建筑群（1580年）。此外他还负责设计了其他许多工程项目。他总共设计了477座建筑物，至今仍保存下来的有196座。他的这一伟业构成了伊斯坦布尔的城市蓝图，也确保了他生前和身后的英名。



赛利姆清真寺的壮观展现在其结构的清爽和明晰之中。它的巨大圆顶（其宽度相当于伊斯坦布尔哈吉亚·索菲亚的圆顶）由8个墩台支撑着，这8个墩台的顶部表现为8个外凸的柱子，而大圆顶下面的4个半圆形屋顶则是从一个八角形到一个广场的过渡标志。而映衬整个建筑的则是4座直插云霄的、高达230英尺的尖塔。

第271页图：国王清真大寺（现更名为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始建于阿拔斯一世时期（1588～1629年在位），位于伊斯法罕迈丹[3]南侧。虽然它的大门对着迈丹，但是该清真寺本身是朝向麦加的。该清真寺环绕着院子有4个拱顶大厅。这幅图展示的是有一对尖塔的清真寺拱顶大厅，尖塔后面是清真寺的圆形大顶，这个圆形屋顶有双重外壳，内层和外部有不同的轮廓。该清真寺到处装饰着多种彩色的瓷砖，其中大多数在20世纪已被更换。

生活。属于这类风格的还有贾汗季写的《贾汗季回忆录》，该书以朴实无华的风格显示了皇帝对艺术和自然史的兴趣。

奥斯曼与莫卧儿帝国统治下的音乐

几个苏非派教团创立了奥斯曼礼拜仪式音乐，它具有独特的风格与可以演出的全部节目。在依教规举行礼拜仪式时，在伊斯兰节日期间，尤其是在苏非派低声赞念时，演奏这些乐曲。低声赞念涉及一种与呼吸有关的技法，允许有节奏地诵念真主之名和他超绝万物的品格。在17世纪和18世纪，其中的某些流派被允许参加公开的清真寺宗教仪式。在苏非派教团中，毛拉维教团举行纪念圣裔仪式时表演旋转舞，有歌唱者和大合奏，乐器有长笛、铜鼓、架子鼓、小提琴和长颈的诗琴等。

在奥斯曼各医院会演奏音乐，因为音乐具有治疗的作用。例如，在埃迪尔内，在巴耶济德二世综合设施内即演奏过音乐。奥斯曼军乐队也演奏音乐，它兴起于14世纪，使用低音鼓和芦笛。至迟到17世纪，又加上了其他乐器：小号、一对小铜鼓、铙钹和"土耳其新月"[2]。后者在西方被称做"丁丁当当的家伙"，是一个棍状打击乐器，具有标准的装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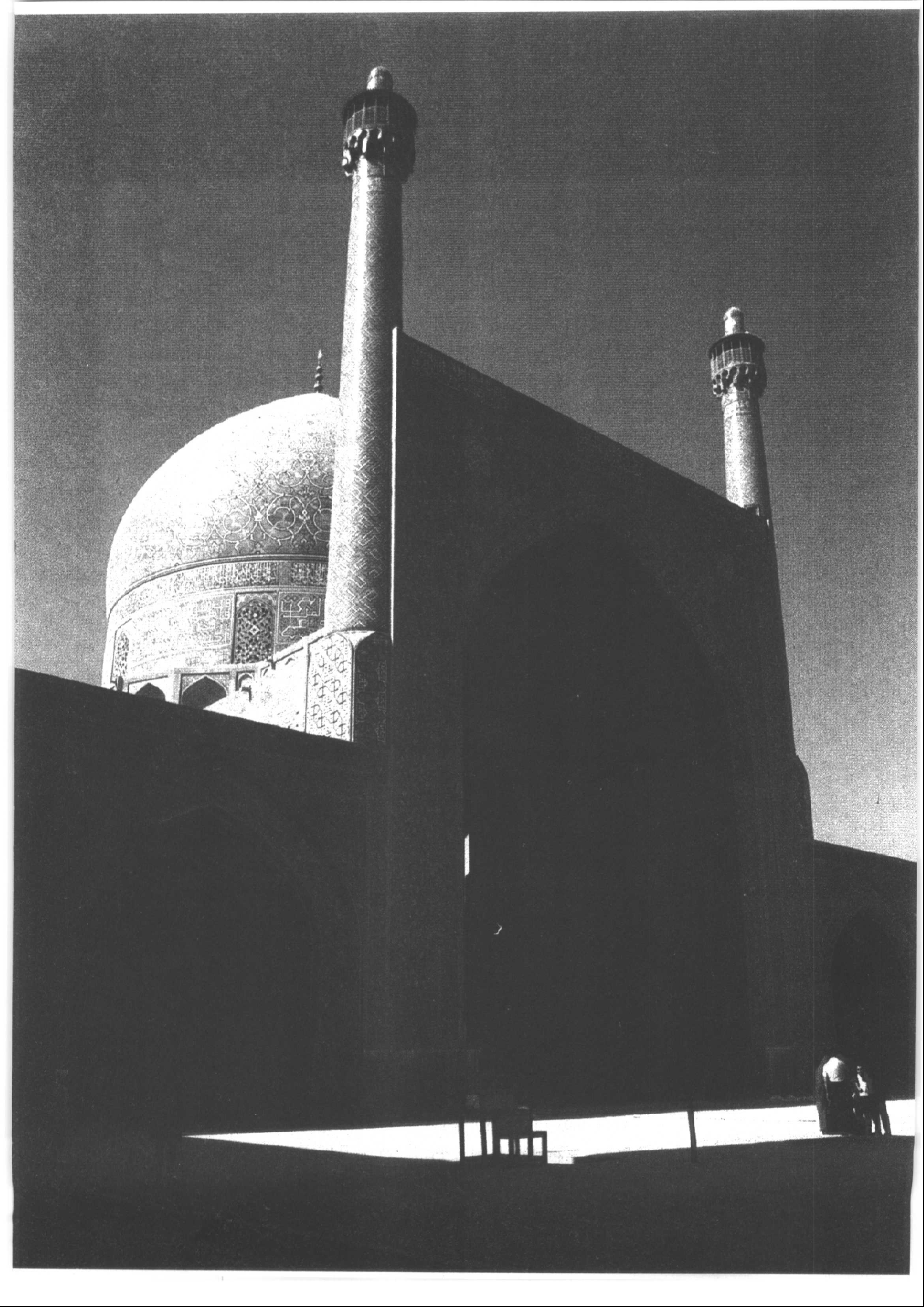
由于穆斯林音乐几乎全部是通过传说流传下来的，所以难以判断它是否受到过欧洲音乐的影响。但是，当尤里亚·切列比访问维也纳的时候，他说这里的音乐与土耳其音乐有很大的不同。18世纪初，罗马尼亚王子德米特里·坎特米尔（卒于1723年）撰写了关于土耳其音乐理论的论文，他曾在伊斯坦布尔居住了一段时间，并以土耳其的风格作曲。坎特米尔分析了奥斯曼音乐的结构，留下许多器乐曲乐谱的记载，描述了声乐演唱和流行的器乐形式。

我们从阿布尔·法德尔的《艾尼阿克巴》（1597年）中可以了解，阿克巴宫廷中几乎所有的声乐乐师都可能是印度人，而许多乐器演奏者则是外国人，其中有些人来自赫拉特、马什哈德和大不里士。17世纪末在奥朗则布统治时期，音乐发展遭到挫折，但是在巴哈杜尔·沙（1707～1712年在位）和穆罕默德·沙（1719～1748年在位）统治时期又有所恢复。从18世纪中叶起，音乐文化越来越在地方性宫廷中得到保持，但是规模不算很大，那时许多莫卧儿帝国的乐师分散在拉贾斯坦的一些宫廷，还有大量的乐师聚集在勒克瑙，为奥德的行政长官效劳。

① 印度莫卧儿帝国创始者，1526～1530年在位——译者。

② 属击节拍的乐器，该乐器有一根华美的棍，上面装有黄铜或银制的铃铛，在演奏时通过摇动击节——译者。

③ 阿巴斯国王广场，现改名为伊玛目广场——译者。



宗教建筑与宫廷建筑

279 奥斯曼人统治下清真寺建筑的特点是，在使用圆顶覆盖大的地面空间方面逐步进行实验。这一过程始于伊斯坦布尔法蒂赫清真寺建筑群（建于1463~1470年，1766年），这里有一个大圆顶，在南部凹壁地区有一个半圆顶,侧面是有圆顶的支柱,这是正方形平面的中央部分。在伊斯坦布尔,巴耶济德二世清真寺建筑群（建于1501~1506年）第二个半圆顶加在北部，即院落的旁边,而中央圆顶有4根大柱支撑,该圆顶于1766年倒塌。这一设计明显受到了拜占庭的哈吉亚·索菲亚教堂的影响，穆罕默德二世把它改成清真寺。16世纪建筑师息南在圆顶形式方面做进一步的实验，在他的设计中，这一清真寺风格达到它的巅峰。在他之后,穆罕默德·阿噶将伊斯坦布尔艾哈迈德一世清真寺(兰寺)(建于1609~1617年)改成4个半圆顶的设计。从艾哈迈德三世(1703~1730年在位)时起,形成了新的建筑风格,即大家都知道的"奥斯曼巴罗克建筑风格"。尽管起初受欧洲建筑的影响,然而土耳其的建筑也有自己的特点,其典型代表是下垂檐水和装饰线条,正如我们在伊斯坦布尔艾哈迈德三世喷水池(建于1738年)所见到的那样。伊斯坦布尔努鲁奥斯曼尼耶清真寺（建于1755年）以其圆形的院落、雕刻的扶壁和此种风格的门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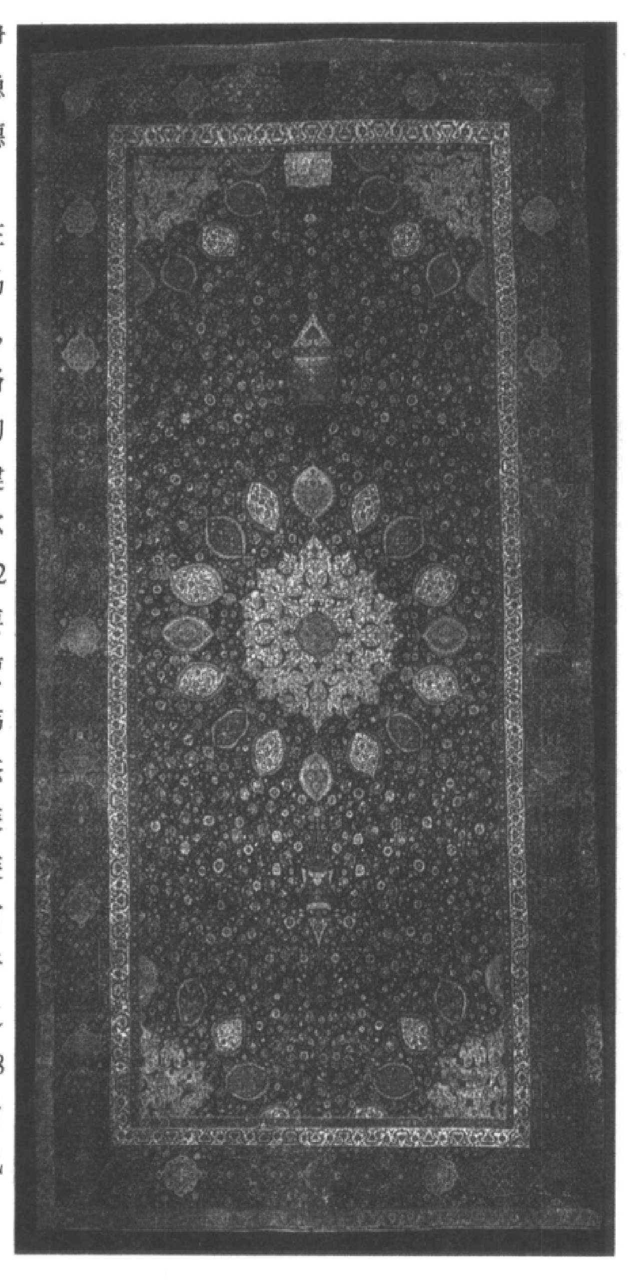
托普卡珀宫是16~19世纪奥斯曼素丹的居住地和政府所在地，它始建于穆罕默德二世统治时期,后经一些世纪的增建与修缮。该宫殿有一系列的院落,周围有回廊和亭台楼阁,院落之间有端丽的大门相隔。还有一个被称做"哈拉姆利克"的禁地,这是一个包含有素丹及其后宫私邸的小院体系。各个楼台亭阁具有不同的风格,其中包括瓦亭(建于1465~1472年)。奥斯曼人在帝国各地还建造了其他各种类型的建筑物:清真寺、水坝、桥梁、澡堂和喷水池等。

萨法维王朝时期的建筑在阿拔斯一世国王统治时期（1588~1629年）达到其巅峰,该国王在1598年以后不惜花费重金重建了首都伊斯法罕。他以建设查哈尔巴花园长街为开端,沿长街中间有水道,水道两侧建有亭台。在查哈尔巴以东巨大的开阔地区建设了马伊丹沙，它有560码长174码宽，是当时最大的公共广场之一。马伊丹沙成为新城的心脏地区,也是市场、阅兵、马球比赛和执行死刑的所在地。周围是上下两层的围墙,下面一层有店铺。马伊丹沙较短的一侧可通往巴扎的入口，对面是国王清真大寺（建于1612/1613~1630年）的入口。马伊丹沙较长的一侧是谢赫·路特福拉清真寺（建

280 于1602/1603~1618/1619年),在另一个较长的一侧是宫殿的阿里卡普宫,这个宫是王室花园的门,国王在此能看到在马伊丹沙发生的事件,也可以在此接见外国使节。这两个清真寺都装有很壮观的圆顶与大门,侧面是尖塔,全

都贴着瓷砖。萨法维王朝后来的一些国王继续进行在伊斯法罕的建设工程。在萨法维王朝垮台之后，伊朗不稳定，进一步的建设受阻，只有设拉子的凯里木·桑德（1750～1779年在位）的宫廷算是个例外。

莫卧儿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巴布尔（1526～1530年在位）因建筑花园而给人们留下美名。与他的继任者胡马雍相关的最值得纪念的建筑，是胡马雍在德里的陵墓，它的周围是花园。16世纪60年代，阿克巴整修了在阿格拉的“红色堡垒”，1571年建立了他在法特普尔希克瑞的宫殿城。他也在亚格拉附近的西坎德拉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最后由贾汗季予以完成，也坐落在花园之中。努尔·贾汗在亚格拉为她父亲伊提迈德·稻拉赫（卒于1622年）建造陵墓，以较小的规模将西坎德拉陵墓的一些要素集中在一起，收到了精巧的效果；她也在拉合尔为贾汗季建造了陵墓。然而莫卧儿时期最著名的陵墓是雄伟的泰姬·玛哈尔陵（建于1632～1647年），它成为沙杰汗的坟墓。泰姬·玛哈尔陵把匀称和谐与豪华的表面装饰结合起来，它的表面是用切割与镶嵌的大理石进行装饰的。沙杰汗对建筑的偏好也表现在亚格拉与拉合尔宫殿堡垒的工程上，而拉合尔的沙拉马尔公园（建于1641～1642年）属于莫卧儿帝国设计的最精致的工程之一。在德里的新宫殿城沙贾汗阿巴德（建于1639～1648年），包括有已成为莫卧儿帝国中心的“红色堡垒”。此后在18世纪，在地方性宫廷，主要是在勒克瑙，地方性风格也开始形成。



16世纪波斯生产的宫廷毛毯是在已有同类产品中最优美的产品之一。本图所示为所谓的阿尔达比勒毛毯，它实际上可能来自马什哈德的伊玛目礼萨圣陵。一块牌匾上写着这样的文字：“天堂是这个世界我惟一的庇护所；舍此再无他处可以安放我的思想和灵魂。”

三个帝国的视觉艺术

16世纪初在奥斯曼书法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谢赫·哈木德·阿拉（1436～1520年），巴耶济德二世曾对他大加称赞，他也是个运动员一类的人物：据说他用牙咬着书写用具横渡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哈木德·阿拉改编了雅库特·穆斯塔希米推崇的6种手写体，并对“笛瓦尼”手写体进行推敲，使它应用于奥斯曼大臣的文件。他训练了许多门徒，其中包括艾哈迈德·卡拉希萨里（1469～1566年）。 281

在伊朗，优美的草写体，即“纳斯塔里克”，是书写诗文的理想媒介，对它加以发挥的有这样一些书法家：马什哈德的苏尔坦·阿里（1442～1519年）、米尔·阿里（卒于1556年）、穆罕默德·尼沙普瑞（卒于1564年）和米尔·伊



本图是17世纪初萨法维宫廷最著名的艺术家礼萨·阿拔斯的署名作品，它用清淡的色彩刻画出一名正在吹风笛的男子。该图是礼萨众多单人画作之一，这些人物刻画集中体现了他以精湛的艺术技巧表现自己对生活的讽刺性观察的特点。在他的同时代人眼里，礼萨以沉溺于社会下层生活、喜好观看摔跤活动而著称。本图中的这名风笛吹奏者显然不是宫廷乐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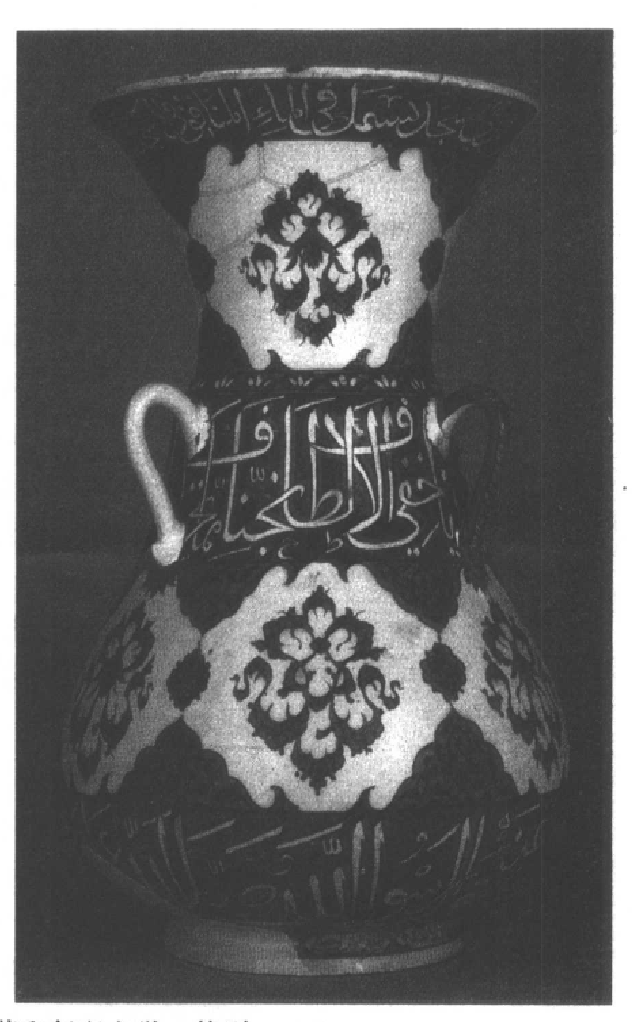
迈德(卒于1615年)。阿拔斯一世国王所喜爱的书法家大不里士的阿里·瑞扎(卒于1627年),以“萨鲁斯”手写体见长,为伊斯法罕建筑物写了许多铭文。在印度“纳斯塔里克”草写体也很时兴，这是在伊朗塔赫马斯普国王统治(1524~1576年)末期,伊朗移居印度的书法家带来的。其他书法家去了土耳其,“纳斯塔里克”草写体也受到欢迎,后来在奥斯曼统治下得到提高。

土耳其的绘画之所以著名,是由于它以一种与伊朗作品迥然不同的风格描绘了当代历史事件,特别是趋向于对世界进行较为如实的观察。另一方面,萨法维王朝是赫拉特帖木儿王朝传统的直接继承者,是伊朗西部土库曼风格的直接继承者。主要的庇护者是塔赫马斯普国王，在16世纪20年代，为他制作了或许是（现在流传的)所有图解国王专集中最精美的专集。到阿拔斯一世统治时期,绘画集中于在散放的对折纸上画单个的或成双的图像。瑞扎是这种绘画风格方面最杰出的艺术家,他的门徒穆因·穆萨维尔继续以这种风格绘画。此后波斯的绘画越来越多地吸收了欧洲艺术风格的技巧。

在印度,从1549年起形成了莫卧儿绘画流派,当时曾经为塔赫马斯普国王服务的画家米尔·萨伊德·阿里与阿卜杜拉·萨迈德,投靠到当时统治喀布尔的胡马雍的旗下。16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阿克巴的作坊里的主要项目是《哈木扎集》,其中包括有1400幅插图说明。阿克巴也委托他为《巴布尔集》和《阿克巴集》这样的著作制作插图说明。在阿克巴的作坊里约有百名画家,其中许多画家是印度人。贾汗季雇佣的画家少些,但他对艺术有浓厚的兴趣,鼓励较为静态的绘画风格,委托制作寓言作品。像在伊朗一样,绘画单独制作并被收集在有书法样本的画集中。贾汗季对自然史饶有兴趣,因而对植物与动物也有很好的研究。18世纪莫卧儿帝国解体，于是绘画依托于各地方宫廷，莫卧儿的风格同地方传统结合在一起。

从这一时期起,留存下来的还有范围广泛的宫廷艺术的其他各种表现手段,其中包括镶嵌的家具和纺织品,尤其是供宫廷消费的丝绸锦缎。在萨法维 [282] 王朝时期,制造出美妙绝伦的地毯,在欧洲得到很高的评价。奥斯曼的金属制品通行的有两种风格,于是,在制造装饰精良、饰有珠宝的器皿的同时,也制造不加装饰的器皿,这取决于它们的轮廓与体积的效果。莫卧儿镶嵌有宝石的玉刻和水晶石刻从17世纪起被留存下来，拼接各种奇形怪状动物外形的象牙火药桶也被留存下来。奥斯曼因伊兹尼克陶器作坊产量多多而在16世

纪与17世纪的陶器中居于突出地位。陶器、纺织品以及奥斯曼的其他艺术在设计上的类同，说明本时期土耳其宫廷有一个中心设计机构。



精美的陶瓷清真寺用灯，釉底用黑钴颜料和青绿色颜料绘制。它是一批所谓的大马士革伊兹尼克器皿的一个样板。在底部有零散的铭文，标明生产日期为“1549年”，另外还有给伊兹尼克的埃斯莱夫扎德（阿卜杜拉·鲁米）圣陵的献词。19世纪，这盏灯被耶路撒冷的圆顶岩石清真寺收藏。

1800年至今的现代艺术

有两种趋向体现了现代穆斯林世界艺术的特征。其一是，一直存在着穆斯林传统的再发现与复兴；其二是，以吸收西方文化作为促进穆斯林世界发展的手段。构成两种趋向的基础的是新的历史性觉醒，而由世俗机构组成的受教育的穆斯林阶层的出现对这些趋向的发展一直是重要的。两种趋向对本时期民族主义运动与宗教运动的发展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在艺术的各个领域都会感觉到，需要保护传统的习俗，不管是在音乐领域，还是在建筑领域。在音乐领域，口头传统的承继有赖于对后继的每一代都要进行足够的音乐教育。在建筑领域，城市大量的重建项目破坏了传统的建筑以及维护传统建筑的工艺。



文学的复兴

从19世纪起，穆斯林各地进行种种努力从内部改革和复兴文学。特别是在阿拉伯世界，存在着持续推进复兴传统的阿拉伯文及阿拉伯文学风格的运动。例如，“麦噶麦”文体即得到黎巴嫩作家纳希夫·亚兹吉（1800～1871年）的推崇。在伊朗，波斯诗歌得到卡扎尔王朝宫廷的庇护。在法塔赫·阿里·沙统治时期（1797～1835年），出现了一个诗人圈子，他们竭力仿效传统的波斯诗歌，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卡尚的萨巴（卒于1822/ 1823年）。这一对传统主义的修习在噶阿尼（卒于1854年）的著作中达于巅峰。与此同时，卡伊姆·马卡姆·法拉哈尼（1779～1835年）开始了改革波斯散文的艰难工作，19世纪这一工作仍在继续。在此期间，波斯语作为文学表现的媒介，在印度继续让位于乌尔都语。莫卧儿时代最后一位大诗人噶里卜（1797～1869年）用这两种语言写作。

在穆斯林世界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在努力创作，以使他们的语言适应于表现新的思想，这些新的思想是他们近年在翻译欧洲语言的文学与科学著作时遇到的。在土耳其，想复兴奥斯曼文化的中心人物是纳米克·凯末尔（1840～1888年）。他和他的学生阿卜杜勒·哈克·哈米德通过他们的 诗歌以纳米克·凯末尔的小说、戏剧及其他作品，发挥了深刻的影响。像穆阿利

283

姆·纳吉、图菲克·费克瑞特和哈立德·齐亚这样的诗人与作家,也试图在他们的作品中引进现代的习俗。20世纪初,文学全神贯注于民族问题。在土耳其,当1928年以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文字母时,似乎完成了同先前奥斯曼文学的决裂,尽管有些过去的文本用新的字母再版。

新的思想也开始渗入阿拉伯诗歌,尽管像哈利勒·吉布然(1883~1931年)这样的诗人是个例外,他在初期宣布抛弃传统主义;他生活在西方,比较多地面对西方的诗歌。在阿拉伯世界,艾哈迈德·邵基(1868~1932年)使用高水平语言纪念公共事件和赞美统治者,他也是埃及民族主义的发言人。哈利勒·马特然(1871~1949年)和后来的艾哈迈德·扎基·阿布·沙迪试图使阿拉伯诗歌现代化。同时,本身属西方风格的小说,在寻求现代形式过程中经历了几个阶段:历史的、浪漫的、现实主义的与象征派的阶段。在侯赛因·海卡尔的《扎伊纳卜》(1914年)中表现了对埃及生活的新的看法。20世纪20年代,关于现代生活的现实主义的短篇小说成果越来越多。塔哈·侯赛因是较好地表现他那一代人抱负的作家,他的自传《日子》(1926年)是散文的杰作。

在伊朗,政治变革使宫廷庇护不复存在,作家们更多地卷入政治以及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20世纪初历史性小说获得好评,它们常常带有民族主义的感情。许多作家更喜欢短篇小说;穆罕默德·阿里·杰末尔扎达的讽刺小说《从前》(1921年)尤其有影响。尽管杰末尔扎达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欧洲,但他从未失去对波斯口语的兴趣。萨迪克·希达雅特将《弗朗茨·卡夫卡》翻译成波斯文,在他自己的著作中汲取了西方超现实主义的一些成分,他的小说《瞎猫头鹰》(1937年)赢得了国际声誉。

在印度,"噶扎尔"和"玛斯纳维"被应用于乌尔都文,用以表达新的社会与意识形态概念,在诗人阿尔塔夫·侯赛因·哈里(1837~1914年)的著作中开启了这一过程,在诗人穆罕默德·伊克巴尔(1877~1938年)的诗歌中继续推进了这一过程。在伊克巴尔的诗歌中,对过去伊斯兰成就的回忆与对改革的恳求是结合在一起的,为了扩大穆斯林读者群,他用波斯语写作,同时也用乌尔都语。他被推崇为20世纪最伟大的乌尔都诗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诗人领导了阿拉伯世界的诗歌革命,其目标是以新现实主义与新的约定取代早先诗人们的主观主义。在这一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诗人是叙利亚的艾哈迈德·赛义德(生于1929年),即大家都知道的阿多尼斯。纳吉布·马赫福兹(生于1911年)的一系列小说描绘了开罗的小资产阶级。妇女作家显得更为重要,而使用通俗易懂语言的新的戏剧形式超过了使用传统语言的诗剧,后者在陶菲克·哈基姆(1899~1987年)的著作中曾经盛极一时。

2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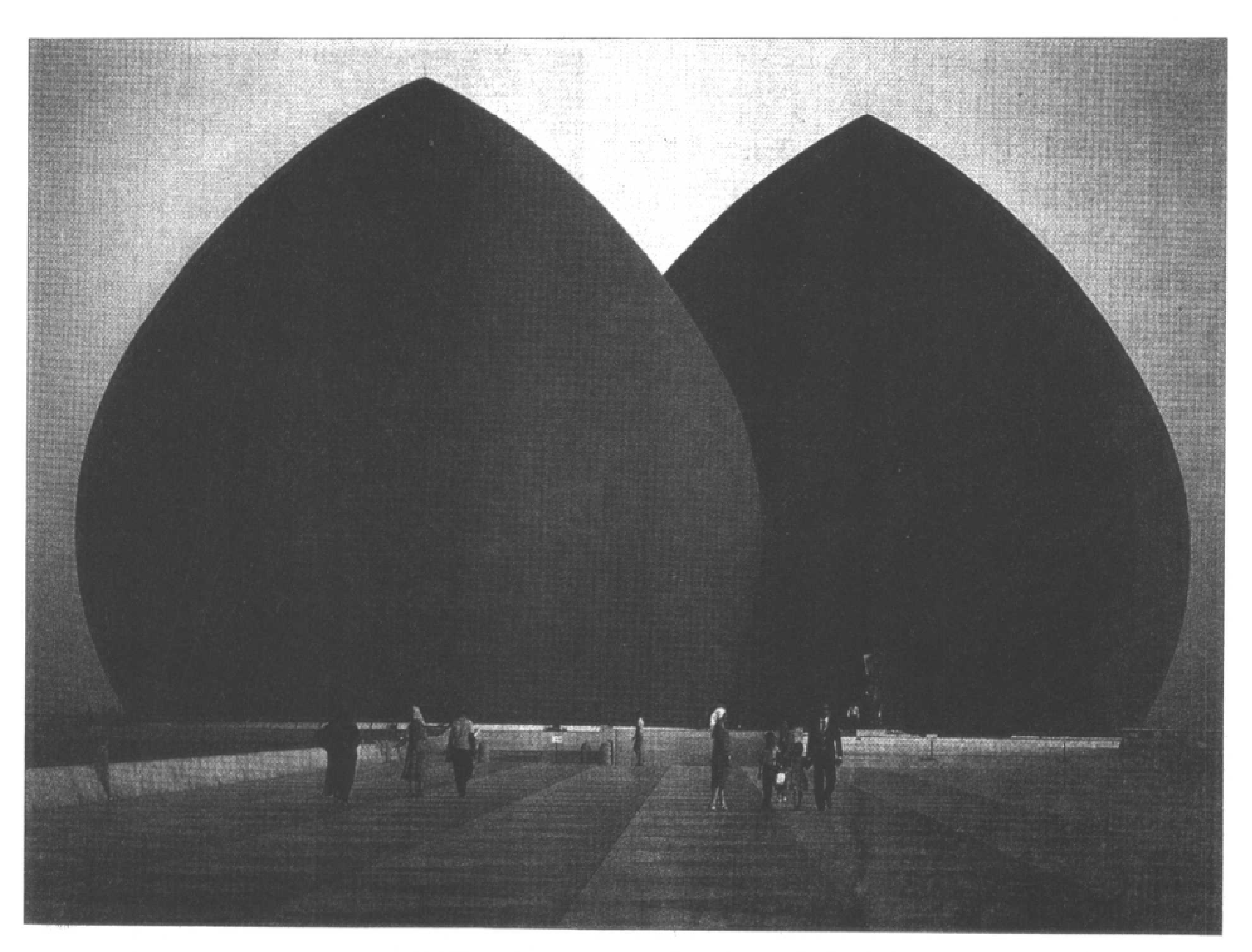
乌姆·库勒苏姆在孩提时代就开始在她的父亲(埃及三角洲地区一个村庄里的谢赫)的指导下唱歌。1920年代初，她在当时埃及最著名的伊斯兰传统音乐演奏者谢赫·阿卜·伊拉的指导下，在开罗形成了具有个人风格的宗教乐曲，同时她也演唱一些世俗歌曲。她的名声鹊起，特别是当她在一些流行电影中亮相以后，更是名声大噪，从1940年代开始，直到1975年去世，她始终是一个传奇人物。乌姆·库勒苏姆在阿拉伯世界受到广泛追随的事实表现在这幅相片中：她的头部被一轮白光所围绕。

现代音乐

在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于1826年摧毁了禁卫军的权力之后，作为军队改革的一部分，他们由牧笛、小号、铙钹和铜鼓组成的军乐队也被西方风格的乐队所取代。1828年乐队作曲家盖耶塔诺·多尼泽提的兄弟吉塞佩·多尼泽提（1788～1856年）应邀到伊斯坦布尔指挥奥斯曼帝国乐队，他也负责向土耳其音乐界介绍欧洲的记谱法。在这之前，亚美尼亚音乐家哈姆帕尔素姆·利毛尼克延（1768～1839年）曾经介绍过乐谱体系，使土耳其许多传统音乐，主要是宗教乐曲得以记录下来。但是从19世纪末起，土耳其传统音乐在音乐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每况愈下。由于土耳其1925年关闭了寺院，苏菲派教团的音乐亦告衰败。音乐表演与教育更加集中于西方的形式。20世纪的某些作曲家，如乌尔维·凯末尔·埃尔金(1906～1973年)和阿德南·赛伊根(生于1907年)，被夹在两种同样正当的传统之间，他们试图在土耳其音乐与西方音乐之间进行融合。

1869年开罗歌剧院的建造是西方音乐文化入侵的鲜明象征。由于存在着西方化，阿拉伯传统音乐受欢迎的程度减弱了。20世纪开罗阿拉伯音乐代表大会(1932年)曾试图界定阿拉伯音乐的方位，以确保它能够存在下去。像赛义德·达尔维什（1892～1923年)、穆罕默德·阿卜杜勒·瓦哈卜(生于1910年)和法瑞德·阿特拉什(卒于1974年)这样的作曲家所采用的阿拉伯音乐新的大众风格取得成功，原因是他们既植根于传统，又借鉴了西方音乐的特征。乌姆·库尔修姆（1908～1975年)是一位杰出的表演者，她因悦耳的发声而赢得国际声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埃及新的艺术音乐采用了西方作曲的样式与技巧。其第一代主要作曲家有优素福·格瑞斯（1899～1961年）和阿布·巴克尔·哈伊拉特(1910～1963年)，随后有阿布德·拉希姆(卒于1924年)及其他人。

伊朗传统音乐在以前的一些世纪遵循的是比较独立的途径，在19世纪 [285] 形成了一种称做“达斯特噶哈”的概念：音乐调式分组使用，每一组形成一个“达斯特噶哈”。而在19世纪下半期，欧洲音乐开始进入伊朗，特别是法国音乐家当时受雇负责建立帝国军乐队和组织音乐教育。随着欧洲影响的日益增长，伊朗音乐家受到合奏音乐思想的吸引，结果采用了旋律与韵律混合的形式。20世纪，与先前音乐的即兴表演性质相对抗，对“展示”成段作品的兴趣日益增加，这也是西方化的成果。在这一世纪，欧洲的一些乐器，特别是小



巴格达纪念在两伊战争（1980～1988年）中牺牲将士的烈士纪念碑。该纪念碑由伊拉克艺术家伊斯迈尔·法塔赫（生于1934年）设计，在1981～1983年间由三菱公司根据奥韦·阿茹普伙伴公司的计划书建造。巨大的青绿色的圆顶分为两半，共处于一个圆形的平台上。整个建筑位于一个人工湖的中央。伊斯迈尔·法塔赫由于这个颇有影响的设计而赢得了国际同行的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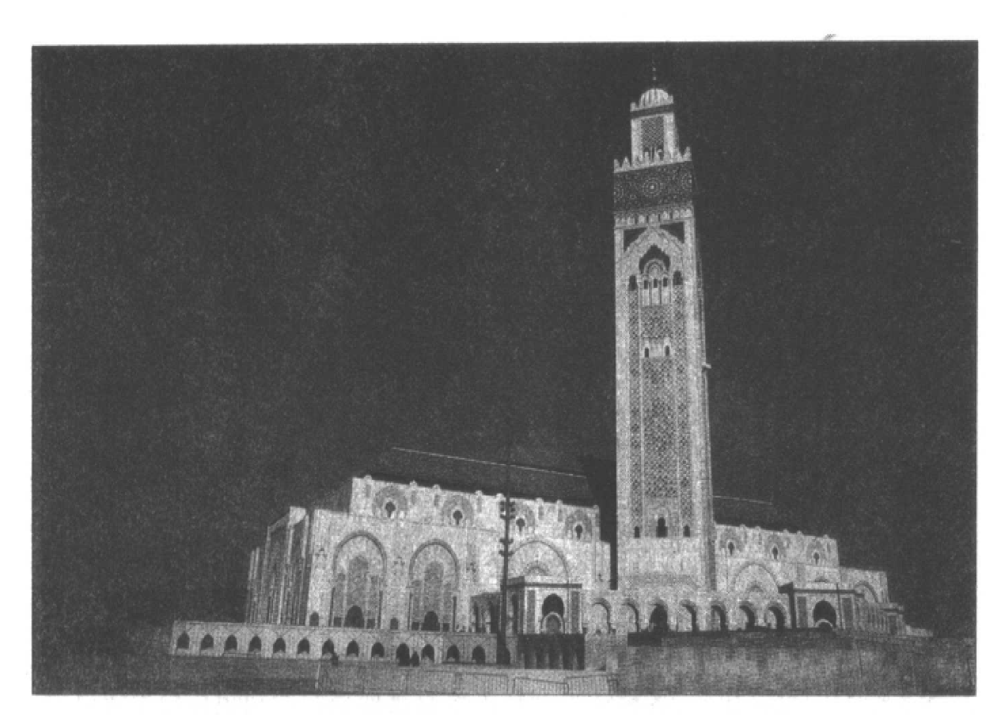
提琴，在伊朗音乐中被广泛使用，而乌德（诗琴）、噶农（一种古代弦乐器）以及伊朗的发声技巧则用得较少。在波斯传统音乐中仍旧广泛使用的乐器是“希塔尔”（长颈诗琴）、“塔尔”（另一种长颈诗琴）、“散图尔”（洋琴）、“卡曼恰”（下端如钉状提琴）、“纳伊”（长笛）和“图姆巴克”（高脚酒杯状鼓）等。

在印度，从18世纪末起，勒克瑙成为主要音乐中心，直到1857年印度起286义。在那以后，其他王子宫廷提供庇护。由于印度音乐总起来说为英国所忽视，所以在印度独立之前，宫廷庇护仍然是音乐的传统生命线。但是，包括收音机以及印度兴旺的电影业在内的新的技术形式的出现，对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穆斯林世界，大部分影片是音乐片，它们的歌曲有广大的听众。

建筑中的复兴主义与现代主义

穆斯林建筑与艺术的历史复兴主义的滋生，和制作艺术作品的愿望（穆斯林认为西方意义上的“美学”艺术是可以接受的）是两个过程，它反映了穆斯林文化在现代世界应该如何体现的问题。两者也填补了由先前庇护形式瓦解所造成的真空。

在19世纪，穆斯林各地引进了欧洲的建筑思想。在伊斯坦布尔，亚美尼



哈桑二世清真大寺。它位于摩洛哥卡萨布兰卡海岸，由米歇尔·平索和皇家建筑室共同负责建造，1993年竣工。它有一个可同时容纳2.5万人的礼拜殿，还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宣礼塔。阳光能够透射装饰有大理石、马赛克和拉毛粉饰的屋顶。该清真寺是一组建筑群的一部分，该建筑群还包括数间公共浴室、一个"麦德莱赛"、一座图书馆以及圆形剧场。

亚巴尔延建筑师家族在为奥斯曼素丹设计的建筑中宣传了这些思想；而且，到20世纪初，出现一种用电的建筑风格，在这些建筑中，奥斯曼的特征被嫁接上欧洲的形式，这一点在维达特的建筑（1873～1942年）和凯末拉廷建筑（1870～1927年）中尤为明显。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土耳其共和国政府领导下，欧洲现代主义风格受到鼓励，不过在30年代重点有所转移：建筑师尽管没有全盘拒绝现代主义，但开始在他们的设计中表现出对土耳其本土文化的新意识，出现了在维护本土风格胜于国际风格的地位方面较有影响的人物——塞戴德·哈基·埃尔戴姆。

在埃及，19世纪开罗的重建承担着拆毁中世纪建筑的使命，在被拆毁的地方建造了欧洲风格的大道与广场。到20世纪初，流行复兴主义的建筑风格，依此风格，在建筑物的表面体现出"伊斯兰的"——通常是马穆鲁克的特征。穆罕默德·法赫米（1856～1925年）依伊斯兰复兴主义风格设计了瓦克夫部建筑（1915年），而穆斯塔法（1886～1972年）对他父亲萨阿德·扎格鲁勒[1]的陵墓采用了"新法老"风格，借以追忆埃及的古代文明。这两种复兴主义风格都提出了植根于民族主义感情的要求。到20世纪中叶，埃及哈桑·法特希（1900～1989年）及其他建筑师开始从泥砖村庄建筑的本土传统中，获取灵感和学习经验。 287

伊朗的建筑在纳绥尔丁统治期间（1848～1896年）受到欧洲思想的影响，当时对首都德黑兰进行了扩建与改建。在巴拉维统治期间（1925～1979年），新的重点凸显，各种旧建筑为现代结构所代替。像纳迪尔·阿尔达兰和

① 萨阿德·扎格鲁勒（约1857～1927年），埃及律师、政治家，1923年任埃及首相——译者。

卡姆然·迪巴这样的建筑师因认识到传统价值观的错位，而使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设计中，不得不正视这些问题。

在现代伊斯兰世界，传统的建筑形式已经得到各种方式的利用。例如，伊拉克艺术家伊斯玛仪·法塔赫（生于1934年）所构想的巴格达的烈士纪念碑，即吸取了大家都熟悉的圆顶形式的长处，但在这里分做两半，取得深深打动人心的效果。卡萨布兰卡哈桑二世大寺（1993年完工）是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它保留了传统的设计与形式，但是要让它规模恢弘，只有靠现代技术才能做到。

视觉艺术中的革新与传统

在20世纪末，书法艺术仍然是很有活力的，也一直能使画家从中获得感悟。在19世纪，奥斯曼的书法在穆斯塔法·伊泽特(1801～1876年)及其门徒的作品中大放异彩。而在土耳其，由于1928年采用拉丁字母，使书法立即受到重大影响。尽管如此，各种艺术大师仍然设法把他们的知识传授给年轻的爱好者，而且埃及和伊拉克的书法家也在设法让土耳其的传统保持其活力。在20世纪的阿拉伯书法家中，伊拉克的哈希姆·穆罕默德·巴格达迪(1917～1973年)一直是最伟大的书法家之一。如同我们在沙姆斯·安瓦瑞·阿尔胡塞伊尼（生于1937年）及其他人的作品中所看到的那样，书法在伊朗以及在国外的伊朗人中也一直是很兴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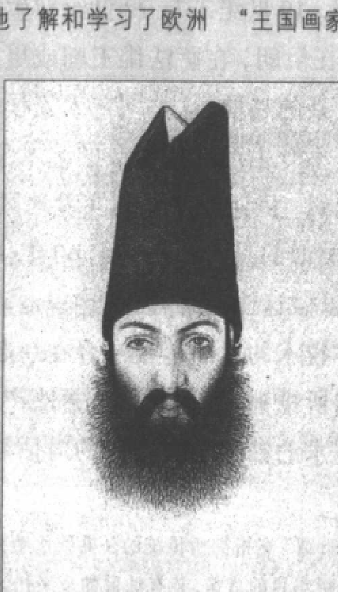
在19世纪，伊斯坦布尔的军事学院设有绘画课程作为训练军官们制作军事所需的地形图与技术图纸能力的途径，于是吸收了一些欧洲在绘画方面的价值观。土耳其与埃及的学生被派往欧洲以完成其学业，其中有些人学习绘画，这里面包括有土耳其的军事画家艾哈迈德·阿里(1841～1907年)和苏[288]莱曼·赛义德（1842～1913年），他们都曾就读于巴黎美术学院（Ecole des Beaux - Arts)。他们的作品大都是以风景与静物为主题的油画。1883年伊斯坦布尔美术专科学校成立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西方风格绘画在土耳其得到提倡。学校由曾在巴黎学习绘画的欧斯曼·哈姆迪(1842～1910年)领导。欧斯曼·哈姆迪在他的著作中介绍了西方风格图像的构成，它采用精细的现实主义的方式，为了精确地得到它，他对它们进行了拍照。到20世纪初土耳其形成了东方绘画学派。埃及1908年在开罗开办了美术学校。在其首批学生中有画家穆罕默德·纳基(1888～1956年)、穆罕默德·赛义德(1897～1964年)和拉吉布·阿雅德(1892～1980年)以及雕塑家穆罕默德·穆赫塔尔，他们奠定了埃及现代艺术运动的根基。到20世纪中叶，土耳其和埃及的艺术家从大众、民间形象以及超现实主义中吸取灵感。在伊拉克也形成了重要的艺术运动，从20世纪40年代起，即在巴格达美术学院开设绘画与雕塑课程。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最重要的人物是画家兼雕塑家加瓦德·萨利姆（1920～

196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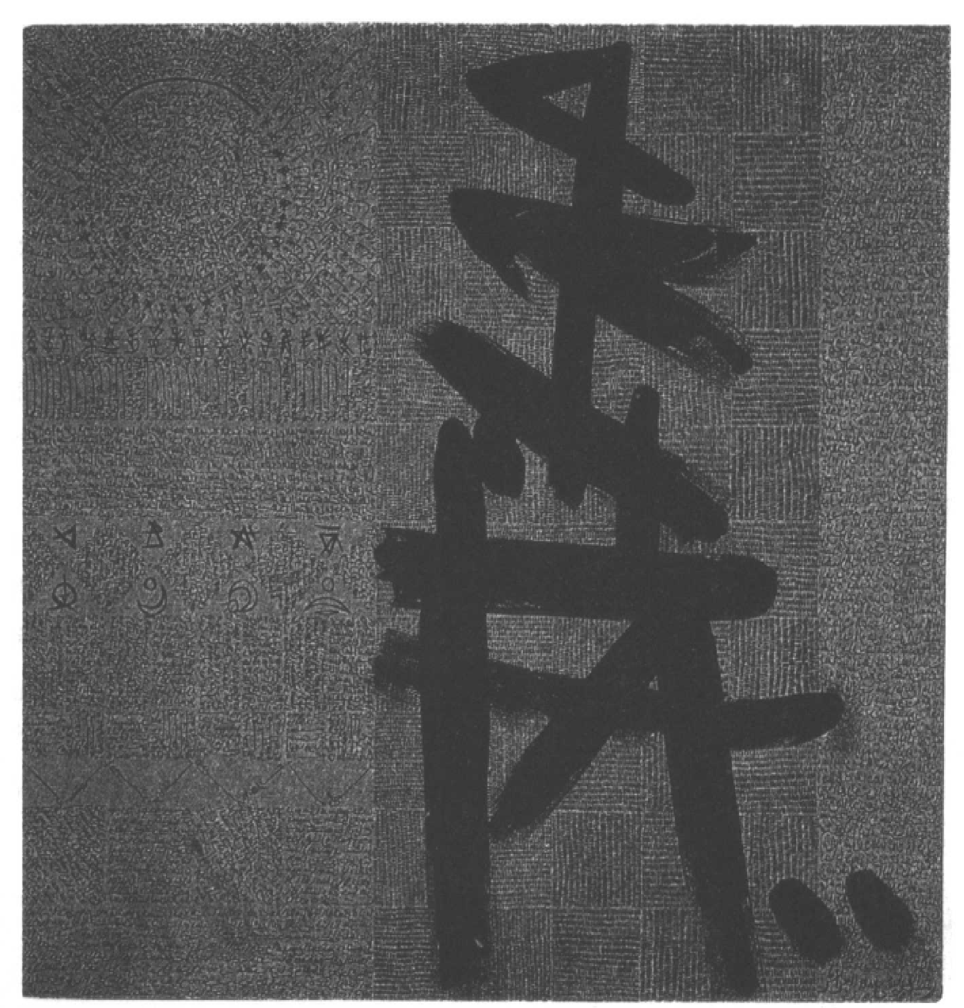
在19世纪初,伊朗卡扎尔王朝宫廷一直在雇佣艺术家,他们以大量的国王肖像赞颂法塔赫·阿里·沙的统治,其中包括标准尺寸的油画与壁画。较突出的宫廷画家是米尔扎·巴巴(在世期:1785~1830年)、米赫尔·阿里(在世期:1795~1830年)和阿卜杜·阿拉·汗(在世期:1810~1850年),而其他艺术家则专攻瓷釉画或漆画。在19世纪中叶,曾在欧洲留学的阿布-哈桑·289加法里(1814~1866年)介绍了一种新风格的心理现实主义。从19世纪50年代起,德黑兰的达尔·福农学院讲授绘画。19世纪末,卡扎尔王朝时期绘画的代表作是卡扎尔桂冠诗人穆罕默德·汗(1813~1893年)的作品和被任命为宫廷画家的穆罕默德·加法里(1848~1940年)的作品。穆罕默德·加法里在19世纪末期赴巴黎留学,他在那里能熟练地使用透视、光线与浓淡。1911年他在德黑兰开设了他自己的艺术学校,主持这所学校至1928年。这在伊朗提高了西方风格学院派绘画的地位。1938年在德黑兰大学开办了美术学院时,穆罕默德·加法里的几个学生都担任了重要职务。他自己成熟的风格完全是欧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伊朗有更多的画家在西方留学,到20世纪50年代形成现代主义运动,这一运动的重要拥护者是画家杰里尔·吉阿浦尔(生于1928年)。

阿布-哈桑·加法里

阿布-哈桑·加法里(公元1814~1866年)是伊朗的一名宫廷画家,主要在德黑兰生活。他出生于卡尚的一个绘画世家,1829年师从于画家米尔·阿里。1842年,穆罕默德·沙(1834~1848年在位)任命他为宫廷画家,1846~1850年赴意大利学习,此间他了解和学习了欧洲绘画艺术。回到伊朗以后,他被任命为桂冠画家(naqqashbashi),同时负责为伊朗版的《一千零一夜》(6卷本)创作插图画。为完成这一历史性的任务,他带领34名画家辛勤工作,于1855年最后完成,其中包括他自己创作的一些精美的小型画。这些小型插多姿多彩,各不相同,全书共计有1134页图画,平均每页约2~6幅小型画。1856年,阿布-哈桑·加法里又领导着这批队伍开始了另一项任务:为纳绥尔丁在德黑兰的尼扎姆王宫制作一套7幅巨型油画,要求刻画出纳绥尔丁在政府加冕,周围站着他的儿子、王公大臣和外国使节们的情景。画中的每个人物都是一个活生生的肖像,阿布-哈桑把绝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表现人物的面部神态。1861年,他获得了"王国画家"(Sani al-Mulk)的头衔。他的主要成就是开创了伊朗肖像绘画中的心理写实主义手法。他的侄子穆罕默德·加法里(1848~1940年),即著名的"王国才俊"(Kamal al-Mulk),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伊朗绘画艺术中的核心人物。



胡斯诺汗·基尔马尼(约1850~1860年)的肖像。阿布-哈桑·加法里擅长于人物肖像画,在创作时他用一种新的透视和还原的手法表现同时代的人。



阿尔及利亚艺术家拉齐德·科莱齐（生于1947年）是伊斯兰绘画书法领域中现代书法学派富有影响力的人物。他能充分表达出抽象书法中蕴涵的表现力，着色较少。自1970年以来，他在欧洲、日本、南美洲和美国，以及伊斯兰世界各国举办了多场书法作品展示会。

在19世纪与20世纪，穆斯林各地的手工技艺一直受到西方机制品进口的挑战。在许多情况下，手工技艺衰败了，因为它们在西方遭遇了工业化，或290者说它们找到了复兴的活计，不过那常常是为欧洲市场制作的。例如，在开罗和大马士革，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生产马穆鲁克风格的镶嵌金属制品和其他产品，而在伊朗，在萨法维王朝或更早的时候制造漆器与陶器。伊朗绘画也出现过复兴的趋向，这是同艺术家侯赛因·比赫扎德（1894～1968年）联系在一起的。不管生产这些产品的艺术家的看法如何，他们意在在政治领域加强这样的思想：伊斯兰艺术存在着地区的流派，这些地区与现代国家边界相接近。与此类似的是，像20世纪60年代伊朗"萨噶克哈纳"[①]流派这样的艺术运动，也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在这一运动中，艺术家们将什叶派肖像画的主题与应用西方技术的民间传说结合在一起了。然而，20世纪末，这一前景开始为下述趋向所抵消：表达泛伊斯兰遗产的书法式绘画的崛起。地区流派与整个伊斯兰艺术的独特语言之间的对话看来还要继续下去。

① "萨噶克哈纳"意指街角传统的公共饮水喷头设施，其中包括壁龛、储水罐、金属碗状物等，通常还有一位伊玛目的肖像、装有烛台的金属托盘、小的锁头或系着一些象征着虔诚希望的碎布——译者。

结束语

伊斯兰文明史是人类显著的业绩之一，我们一直在想用插图说明的方 [291] 式介绍这一成就。在穆罕默德辞世后的一个世纪里，穆斯林即已统治了当时世界上所见到过的最辽阔的帝国。他们以西亚为心脏地带，吸收了希腊的、伊朗的和闪米特的传统，创建了阿拉伯哈里发国家丰饶而又有些混杂的世界。这一文明的高级文化被传播至西班牙、北非与西非，传播到中亚、南亚、东南亚；在与当地传统融合之后，产生了独具特色的地区的形式。其中有三种这样的地区形式在 16 和 17 世纪分别在奥斯曼帝国、萨法维帝国和莫卧儿帝国达于非同寻常的巅峰。在 1000 年中，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思想、人员、货物以及技能经由穆斯林世界而得到广泛的分布，商人寻找货物与市场，学者寻找知识与工作，有技能的人寻找机会与庇护。但同样的是，穆斯林也与他们文明边界之外的世界相互产生影响。他们利用中国纸和火药等关键性的发明，反过来又把许多哲学与科学的知识传至西方。

为了能够正确评价穆斯林的失落意识，弄清穆斯林在世界事务上取得成功的持续时间和程度是重要的，因为欧洲列强在 1800 至 1920 年几乎包围了他们全部的土地，同时也因为，他们开始反思已经成为过去的种种荣耀。他们世界性的成功证明了《古兰经》里所说的他们是为人类而确立的最好的社团是正确的。他们的失利意味着对信仰与信心的打击，这会妨碍他们对西方的挑战做出回应。而且，西方形式上的强国的撤退也未能使情况得到缓解。在某些地方，比如在埃及和伊朗，它被美国和苏联的影响所取代，这两个大国谋求建立他们自己的冷战联盟。不过，更重要的是，在伊斯兰历史上很长时期都存在的，打乱城市与乡村生活的世界范围的进程仍在加速推进。国际经济的增长侵蚀着城乡旧有的生产方式和支撑它们的社会；现代国家的发展使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大为紧张，城市社团和游牧部落找不到多少自治的余地；文化与通讯的国际化不仅意味着公共空间越来越受到西方影响的威胁，而且意味着神圣而又神圣的东西，家庭的私人世界也越来越受到西方影响的威胁。20 世纪下半期穆斯林文明的外来威胁好像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和更可怕。

伊斯兰史不单纯地是关于物质进步或缺乏物质进步的历史，它也是关于人类在寻求应对挑战的答案时，所走过的一条重要道路的历史。在《古兰

292 经》和先知生活的指引下，在有学问的圣人传导下，穆斯林一直在寻求过合乎道德的生活，趋正避邪。他们在这些引导之下，建立起人类的社区，在这些社区里男人和女人力求能融洽相处，在公共利益与单个的自我之间维持一种切实可行的平衡。同样，在这些引导之下，他们很想理解表明真主意志的迹象，更好地认识真主，他们始终认为他们永远都不会最终地理解他。正像神秘主义者鲁米所说："如果哪个人能够理解真主，那么他理解的就不是真主。"本书中许多插图都是用于做这方面的研究的：从穆斯林聚在一起向真主祷告的清真寺的神圣空间，到穆斯林期望能接近真主的圣殿，再到以真主名义创造的艺术品。如果说，伊斯兰在给人的生活赋予意义以及在形成人类历史中都取得了成就，那么在当代穆斯林的条件下，有几个问题是需要思考的。

宗教的复兴

自18世纪以来，宗教复兴的强大运动一直鼓舞着整个的穆斯林世界。从西非、阿拉伯半岛和中亚的圣战到北非、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教育运动，它们在不同的社会与政治的背景下，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它抨击的内容通常包括地方伊斯兰迷信、大量的迷信习俗，以及赋予圣徒以调解人与真主关系的不适当权力的各种想法；它一直在要求穆斯林严格地遵循沙里亚的指导，



谢赫·阿拔斯·迈达尼在1990年6月的地方性选举中投票。阿拔斯·迈达尼是阿尔及利亚伊斯兰主义政党——伊斯兰拯救阵线（F·I·S·）的领袖。在这次选举中，伊斯兰拯救阵线赢得了55%的选票，在地方政府部门控制了800个职位。在1991年的全国大选中，该党赢得了竞选的全部228席中的188个席位，阿尔及利亚军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随即终止了第二轮投票选举，以防止伊斯兰拯救阵线夺取国家权力。

沙里亚即包含在众所周知的《古兰经》与哈迪斯(圣训)中的内容。这一运动一直由有学问的受尊敬的领袖们推动,他们通过讲经、培养读写能力、采用印刷品,以及将《古兰经》和其他指导文献译成人们能懂的语言等途径,设法向所有的穆斯林伸出援助之手。正如理查德·布里耶特所指出的,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已经被卷入这一有各种不同称呼(改革、复兴、呼唤或圣战)的运动。我们已经提到一种这样的运动,即南亚的传教会,人们认为这是在今日的穆斯林世界受到广泛追随的运动。

促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伊斯兰的要求,更充分地实现这些要求,其结果有助于国家的形成,如苏丹的马赫迪运动、利比亚的赛努西教团,或者沙特阿拉伯的瓦哈卜派运动即是如此;同时这也有助于穆斯林形成应付殖民统治的战略,如印度的德奥班德运动,或印度尼西亚的穆罕默德协会。而且,由于主导的穆斯林脱离地方迷信与地方认同、趋向一套大家都赞同的伊斯兰原则,这一运动可在塑造穆斯林认同方面起一定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伊斯兰复兴使穆斯林得以帮助现代大众政治——民族主义运动、民族国家以及伊斯兰反对党和集团等的形成。同样,由于使伊斯兰社会的建设变得更像是关于个人成就与责任的事情,而不仅仅是遵守流行的习惯与公共的习俗,这 [293] 有助于穆斯林对现代工业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平等性与纪律要求做好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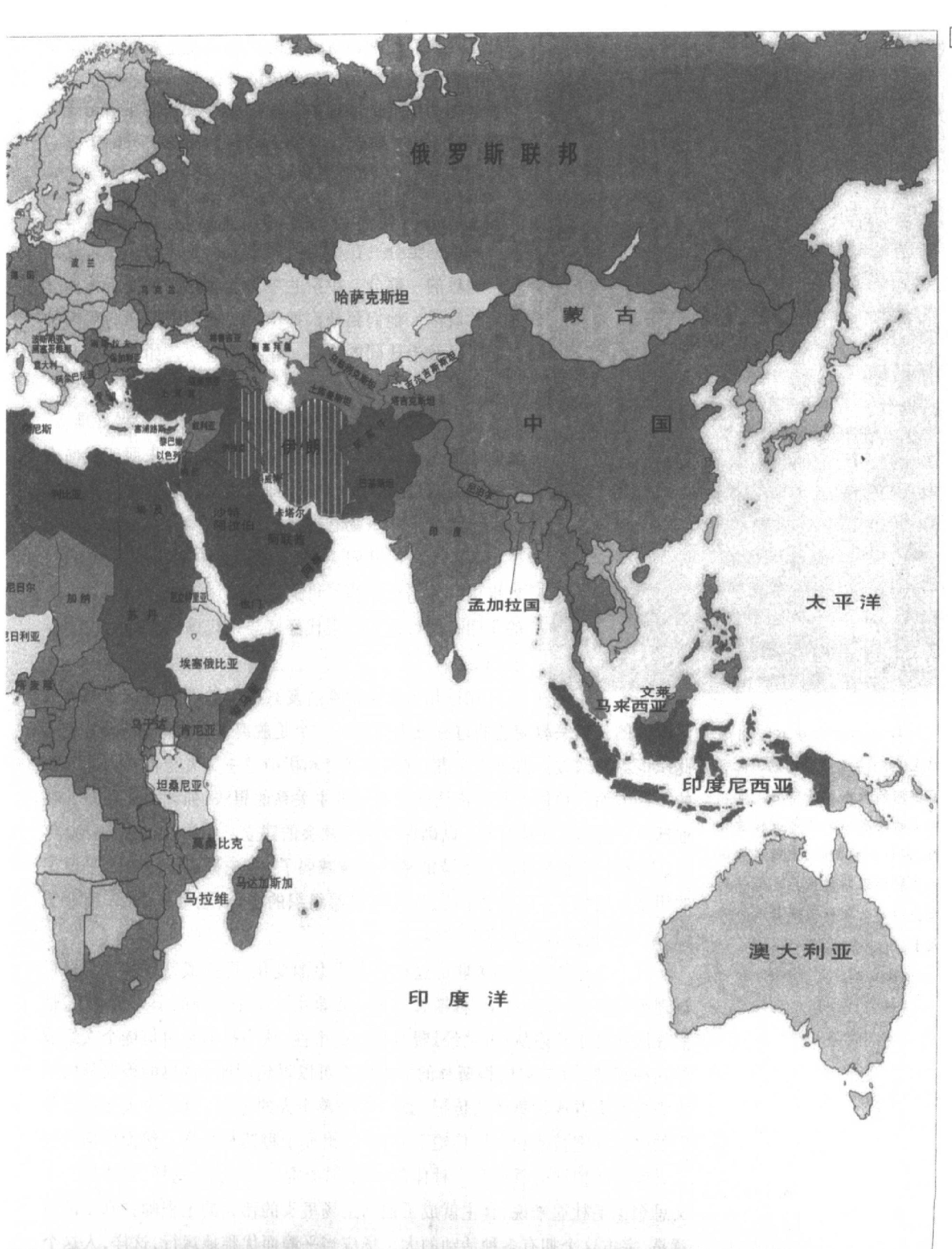
实现伊斯兰复兴的愿望不仅局限于乌里玛与相关人员反对地方迷信的传教运动:它也被另一些人表现出来,他们一直与西方进行强烈的互动,也在很多方面为西方所塑造。穆斯林现代主义者,如穆罕默德·阿布笃、赛义德·阿赫默德·汗和穆罕默德·伊克巴尔,他们的目标是在伊斯兰与西方知识之间建立起桥梁,并最终在伊斯兰与现代民族 - 国家之间建立起桥梁。现代主义者在抓住穆斯林的想像方面只取得部分的成效。他们的政治继承者们,作为穆斯林民族 - 国家的领导人,一直倾向于弱化伊斯兰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有时仅把它局限于象征性的地位。而且,这些政策还一直同经济与社会计划连在一起,这些计划在许多场合都不能满足本国人民对物质的渴望。如果在许多穆斯林社会教育水平很低,现代主义永远都不可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但是世俗领导人在满足这种物质渴望方面所遇到的问题已经减弱了它作为穆斯林前进道路的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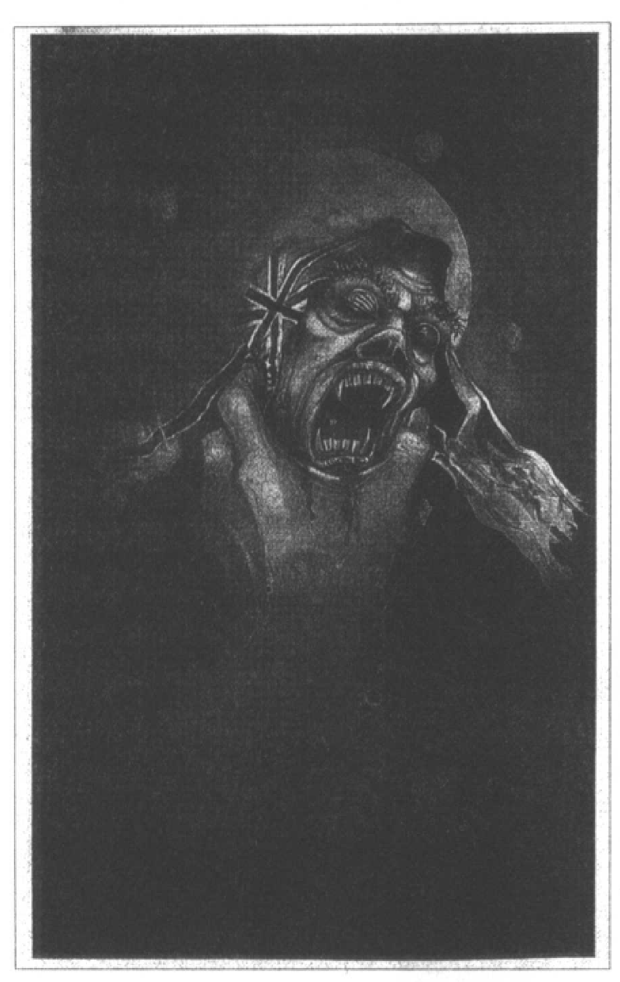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伊斯兰主义运动中一直比较强烈地表现出这种实现复兴的愿望。这些运动常常由受过西方教育的专业人员领导,由大学生推动,运动的目标是填补由穆斯林世界大量出现的、因国家无力控制城镇 [296] 而产生的地方权力真空失误所造成的真空。他们通过提供学校、门诊所、福利事业以及心理支持,为城市社区的需要服务,这些社区因现代国家以及国际经济的渗入而受到破坏。他们也吸引近几十年从农村聚集到城市的数以百万计的人。这些运动所用的言辞同西方文化与西方政权之间存在着深刻

294

1993年世界穆斯林人口的国家分布

295


俄罗斯联邦
哈萨克斯坦
蒙古
中国
孟加拉国
太平洋
文莱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埃塞俄比亚
乌干达
肯尼亚
坦桑尼亚
莫桑比克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澳大利亚
印度洋



的对立。他们的纲领所确定的目标是建立能够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制度相抗衡的伊斯兰体制，他们的纲领是以如下的前提为出发点的，即《古兰经》和教法适用于人类所有的境况。他们计划通过夺取现代民族－国家政权实现这些纲领。这种把伊斯兰理解为一种体制、一种意识形态的情况，在伊斯兰历史上是新出现的。这种宗教与政治权力的完全合一在伊斯兰历史上也是新的，尽管这是古典理想的一部分。伊斯兰主义运动已经改变了穆斯林社会的政治。他们到处都把伊斯兰更紧密地靠向穆斯林各国人民政治认同的核心。在有些地方，如在伊朗和苏丹，他们已经取得政权。在另一些地方，如在阿尔及利亚、埃及或土耳其，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做好准备，真的企图获得政权。还有一些地方，如在马来西亚或前南斯拉夫，仅仅是他们的存在，即可扰乱脆弱的种族平衡。以上每种政治斗争都有自己的班底、它的特殊模式，但是许多政治斗争的共同主题是，伊斯兰主义提供一种语言，也提供各种组织结构，可通过这些城市中处于相对劣势的集团，即就他们在现代经济与现代国家中的地位进行谈判。

这幅由伊朗伊斯兰指导部在1985年发布的招贴，说明了伊朗的敌人及其命运。帝国主义的恶魔似的头部披挂着英国、以色列的国旗，它透过美国和苏联的眼睛看世界。扼住这颗头颅的是伊斯兰强壮有力的大手。

在近几个世纪伊斯兰复兴的各种表现中，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长期宗教变迁的过程较为突出。一个是脱离彼岸世界的宗教，趋向此岸世界的宗教。改革主义者、现代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全都抨击苏菲派的一些方面。他们尤其抨击调解人类与真主关系的想法，强调需要穆斯林在地球上，在此时此地行动，以确保伊斯兰社会的建立。结果在过去的200年间，聚焦于苏菲派导师与圣陵的精神虔诚减弱了，在它减弱的地方合乎道德的伊斯兰增强了，它集中于研究小组、自愿组织的协会、运动俱乐部、商业组织、准军事集团以及政党等载体。

另一个也是与此相关联的过程是方式上的变化，即换成穆斯林社会可以被理解的方式。在传统上，穆斯林社会一直是由一个个单独的个人组成的，他们靠服从真主和遵从《古兰经》塑造自己的个性。认为社会是由信徒个人组成的这种理解，在古典的穆斯林的历史观中可以得到例证，古典的穆斯林的历史观把历史看成是集体的传记，即一个个单个人的记录，这些个人支撑了他 297 们的时代并把技能和知识传给下一代，并组成了穆斯林社会。然而伊斯兰主义者倾向于把社会看做是一种体制，或者甚至是一台机器。这样，对伊斯兰主义思想家毛杜迪来说，真主就成了他的工场里头的伟大的工程师："真主的旨意是，宇宙这个拥有多种活动的大工场应当平静而优雅地运行，这样，人这个

创造的杠杆应当最好地最多产地利用其所有的能量与资源，利用地球上和高高的天上每一样已为他所用的东西……沙里亚意味着指导人在这方面的进程”。

探询一下过去两个世纪规模宏大的宗教运动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宗教变革的因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指向了世俗化进程，是很重要的。很清楚，脱离苏非派关于调解人类与真主关系的思想体现了世界的“觉醒”、巫术信仰的衰落，以及对科学解释人类状况、对人类控制这些状况的能力的信心的增长。同样可以论证的是，把重心放在个人对建立伊斯兰社会的责任上体现了穆斯林形式的“新教伦理”，特别是在改革主义者中间存在着这种主张，在其他运动中也存在。而且，现代主义由于支持世俗的民族认同，导致宗教的私人化，土耳其现代主义或阿拉伯现代主义很少有或者没有伊斯兰认同的地盘。信仰变成纯粹是个人的事情；许多受教育的穆斯林仅仅是由于文化才成为穆斯林的。乍看起来似乎是伊斯兰主义可能倾向于相反的方向。但是，伊斯兰主义者由于把整个政治世界都吸收到宗教领域中来，它有可能会激起政治浪潮：比以前更严格地将宗教局限于私人领域，更坚定地建立世俗的公共舞台。如果伊斯兰主义在政治上失败了，如像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失败那样，肯定会引起对伊斯兰主义思想的怀疑。

伊斯兰与西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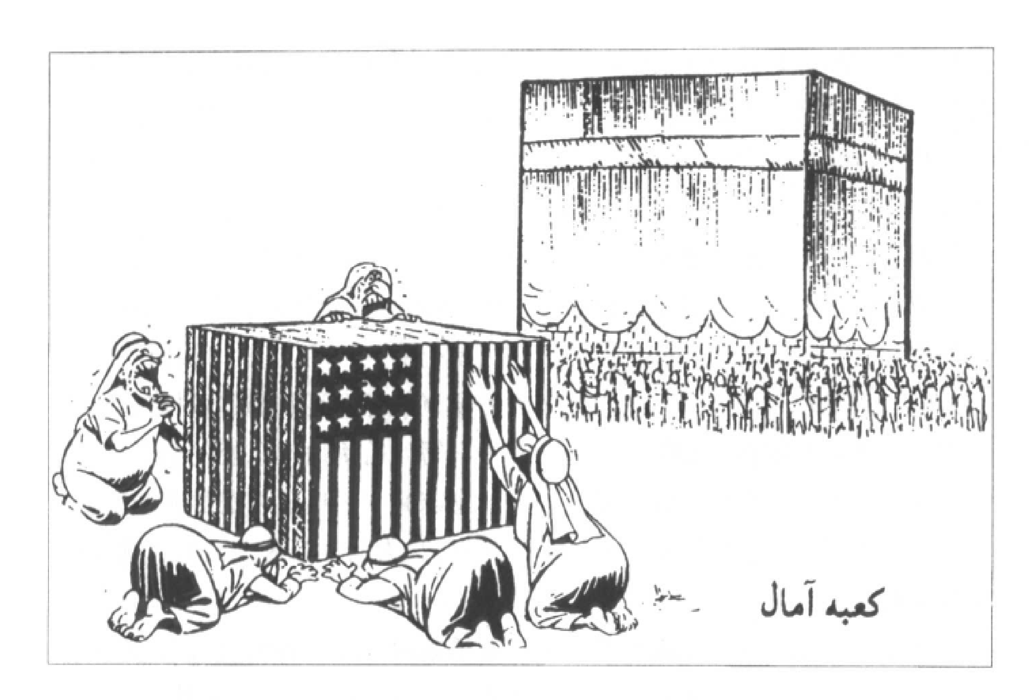
伊斯兰在穆斯林国家政治中的苏醒已引起一种担心：认为这会威胁到西方的安全和西方各国人民的安全。乍一看，这种担心不无道理。许多人都受到过由伊朗革命的言词、派给美国“大撒旦”角色以及明显由于大量民众对西方的敌视所引起的冲击。几乎没有哪个西方人会对穆斯林兄弟会的下述理念感到欣慰，在赛义德·库特布手中这一理念发展成这样：所有的文化，如不能成为植根于伊斯兰世界观基本要义的文化的一部分，便被斥责为“贾希利亚”(愚昧)文化，而同这种文化进行斗争，“直到所有的宗教都从 [298] 属于真主”，是正直的穆斯林的职责。野蛮袭击穆斯林社会中那些世界观倾向于西方的人，像 1981 年枪杀埃及总统萨达特，或者 1991 年以来切开阿尔及利亚报纸编辑、公职人员与年轻女子的喉咙（尽管阿尔及利亚军政权进行了同样残酷的镇压），使西方人的信心一直在下降。真正惹起人们担心的是谋求处死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的教令，以及 1993 年破坏纽约未遂的日子——是埃及盲人谢赫·乌玛尔·阿卜杜·拉赫曼及其追随者涉嫌计划在伊斯兰圣战中实施这一破坏的。当西方人听到伊朗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有核野心时，也不会不担心。我们一定要问：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过去哪一方都有过它的圣战时期，它能不能不再走向新的军事对抗阶段。确实，美

国杰出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1993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著名文章中提出，民族－国家的时代已走向终结，它将被文明的冲突所取代：在这一冲突中，儒家与伊斯兰世界是同西方竞争的对手，但伊斯兰世界是仅存的意识形态竞争对手。

这种担心是被极度地夸大了。伊斯兰主义者正在为能执掌他们自己国家的政权而斗争；就他们所有的言辞来说，他们是在同他们本国人而不是同外国人进行战斗。他们的敌人是他们国家的统治者：开罗和伊斯坦布尔西方化的精英和国际商业阶级、沙特阿拉伯的王族、海湾的埃米尔及其支持者。在国际的层面上，他们的敌人是以色列国，它在这么长时间里一直阻挠巴勒斯坦国实现为建国而进行斗争的意图，而且这作为西方投在伊斯兰心脏地带的赌注，似乎成了世界范围穆斯林问题的象征。如果伊斯兰主义者抨击了西方（包括苏联和后继的俄罗斯），那么这是因为西方的政治与经济权力被看做是伊斯兰危机的根源。是西方常常支持伊斯兰主义者希望推翻的政权，是西方，尤其是美国，被看做是以色列得以存在的主要原因，也是以色列不妥协的主要原因。当然，在各个共同体相互联系日益增强的时代，穆斯林社会夺取政权的斗争有可能影响到西方，正像欧洲在19世纪很大一部分时间以及在20世纪"溢出"，涌入穆斯林世界一样。但是关键的斗争是国内斗争，而不是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斗争。据此，西方对穆斯林国家获得核武器的担忧，应主要基于担心核危险扩散，而不是基于它们属于穆斯林国家这一事实。伊朗与巴基斯坦在这方面同北朝鲜与印度没有什么区别。

伊斯兰主义运动本质上是以国家为基础的，这一性质之所以被凸显出来，是由于运动的超国家的本性，以及在做出决定时将国内政治背景下的需[299]要放在意识形态前面所致。正如奥利维尔·罗伊所说，除了穆斯林兄弟会是个例外，国际伊斯兰主义联盟（设在吉达的世界穆斯林联盟[①]、设在库姆的伊斯兰宣传局和设在喀土穆的阿拉伯－伊斯兰人民会议）的一切尝试都源自单个国家针对其在穆斯林世界的对手的政策。穆斯林兄弟会的不同分支一直不得不受国内政治条件的约束而采取不同的策略：在约旦和科威特进入政治进程，在埃及做和平的反对派，但在叙利亚和利比亚做武装的反对派。穆斯林兄弟会不同分支对海湾保守国家——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在海湾战争中同西方建立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的联盟一事的反应，也只能突出地说明这一点。苏丹、突尼斯和约旦都支持伊拉克；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和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在群众迫使他们进入伊拉克阵营以前曾打算持中立态度；受沙特阿拉伯资助、反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哈马斯，像海湾各国穆斯林兄弟会组织所做的那样，支持反伊拉克的联盟。美国在20世纪整个80年代，因

① 伊斯兰世界联盟，总部设在麦加。设在吉达的是伊斯兰会议组织——译者。



这幅在伦敦出版的伊朗讽刺性杂志《阿斯迦尔·阿迦》1990年12月号刊登的漫画，讽刺了海湾保守的阿拉伯君主国和沙特阿拉伯在困境之中向美国——而不是向真主——求救的情景。

力求遏制苏联在阿富汗的扩张、遏制伊朗输出其革命的企图，对伊斯兰主义一些集团持支持的态度。这说明伊斯兰主义者和西方这二者采取非意识形态立场所达到的程度。

伊斯兰主义集团在民族－国家内部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一直不得不重视政治规则，他们一旦取得政权，也会受到政治规则的约束。而且，这些约束不仅仅在国内事务中起作用，也在国际事务中起作用。伊朗1979年革命以来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它把革命扩张到西方的可能性受到邻国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这两个对手的利益的限制，正如在阿富汗争夺影响的冷战斗争



尽管阿拉伯世界保守国家的政府在海湾战争中站到了西方一边，萨达姆·侯赛因在阿拉伯世界民众中却依然享有很高的威望。本图是1990年10月阿尔及利亚民众举行游行示威支持伊拉克独裁者的场景。这类游行示威活动迫使伊斯兰拯救阵线站出来支持一个完全违背自己利益的政权。

限制了它向东方扩张一样。伊朗革命政权也仍然是原国王政权先前曾经加入的几乎所有外交、社会与经济组织(欧佩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的成 [300] 员。在经济领域,实行了10年国有化和扩大社会福利的革命政策之后,着手实行放松国家控制的自由化政策,把工商业重新交给私营部门,将外国资本在伊朗企业中投资的限额由国王时期规定的35%,提高到49%,恢复德黑兰股票市场的活力。除了将美国撵出局以外,伊朗对外贸易的整个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例如,20世纪80年代整个贸易仍有40%是与欧洲共同体进行的。在政治领域,由于有通过基本立法的需要,促使阿亚图拉霍梅尼修改了他对伊斯兰政府的解释。他在1988年1月6日写给哈梅内伊总统的信中,坚持一种新的解释,它导致了议会在立法中的意志高于伊斯兰教法学家的后果,这封信是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权力已经朝着人民的当选议员方向转移。

伊斯兰主义的统治在取得政权以后要受政治与经济规则的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会引起其他社会的愤怒;他们国内政治斗争的紧张局势会在难民的流动中,或者在矛头指向特定的外国政权或外国人的运动中得到充分的反映。这说明,在他们已经取得或将要取得的成功中存在着明显的讽刺。他们声称要恢复过去理想的伊斯兰,但实际上他们乌托邦式的幻想在伊斯兰历史上没有什么先例可循。他们以深刻的反西方的语言说话,但他们的思想同样受到了西方深刻的影响;萨特、法农和马西尼翁影响了伊朗革命的思想家阿里·沙里亚提;同样我们也可以指出法国法西斯主义思想家阿列克 [301] 谢·卡雷尔对赛义德·库特布的影响,或者甚至指出在经文学校里已被研究了1000多年的柏拉图对霍梅尼伊斯兰政府理论挥之不去的影响,在霍梅尼的这一理论中伊斯兰法学家只不过是哲学家君主的别名而已。伊斯兰主义者希冀恢复伊斯兰的荣耀,但是他们又拒绝伊斯兰文明的很大一部分成就,不管是音乐、哲学、诗歌、视觉艺术方面的,还是精神修炼方面的,本书列举了这些成就。

穆斯林社会中的妇女与社会变革

在过去伊斯兰复兴以及西方列强扩张的两个世纪中,占人类1/10的穆斯林妇女的正当地位与操守的问题,一直是斗争激烈的领域。在传统上妇女是家庭和家族这一完全属于私人世界的居民,但她们发现自己处于穆斯林社会控制社会改革斗争的前线,在这一社会中,穆斯林的公共世界受到西方列强与西方文化的侵袭,他们一直在尽力保护私人的伊斯兰世界;在这一社会中,穆斯林精英渴望建立起国家政权,他们努力扩大政府对社会的影响,减少对亲属、部落和共同体的忠诚;在这一社会中,伊斯兰主义者很想从世俗精英

们的手中夺取政权，他们一直在推进反对腐朽的西方价值观与西方文化存在的运动。对妇女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例如，是否应当鼓励她们不戴蒙头巾走来走去，或者鼓励她们在公共场合不戴蒙头巾)往往取决于支持者的社会地位，如同这一辩论的结果取决于权力游戏一样。如果阿塔图尔克领导的土耳其的精英们把戴着蒙头巾的妇女嘲笑为“甲虫”，那么国王领导的伊朗的伊斯兰主义反对派便把不戴蒙头巾的妇女嘲笑为“着色的玩偶”。妇女自己在这种受侮辱的困境中越来越成为公共领域重要的社会角色。

从19世纪起，改革主义影响是与西方列强促使城市妇女地位的转变混杂在一起的。在这之前，与沙里亚主宰的公共领域相比，家庭一直被视为弱者、奴隶、少年与妇女的地盘。在这里，可以继续说与“伊斯兰语言”相对立的方言。在这里，可以遵守许多异教的习俗，信仰巫术也会得到支持。在这里，大多数人进行性吸引，这也许会在男人对真主的虔诚方面构成挑战。而且，人们认为同穆斯林健全生活本身的维持者相比，在改革主义世界里的城市妇女在穆斯林健全生活中对性爱的分心要少。这样，在印度改革主义文学名著之一，毛拉纳·阿什拉夫·阿里·撒纳维(1864~1943年)的《天堂的宝石》中，期许妇女具有所有伊斯兰的知识，这使她们能够维护伊斯兰对自己及其家庭的作用。这样撒纳维便在维护伊斯兰社会方面赋予妇女与其男人同等的责任。伊斯兰主义者毛杜迪还更进一步，让她们承担更多的责任。他在20世纪30年代说：“穆斯林闺房是伊斯兰文明最强大的堡垒，建立这些闺 302 房的原因是：如果遭受了挫折，就在里边避难。”

对于关心建立穆斯林民族-国家的穆斯林现代主义者与世俗精英们来说，妇女在公共场合不再戴蒙头巾一事一直是进步的象征，也是国家将民族意识形态凌驾于内部宗教势力之上的象征。例如，在土耳其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中出现了被一位妇女访问者形容为“土耳其女权主义政府”的政府。对妇女来说，土耳其主义代表了一个泛伊斯兰的黄金时代；而自1912年以后，空前数量的妇女因战争被抛入了劳动大军。阿塔图尔克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他在20世纪20年代抨击蒙头巾，并在1934年解放了妇女。1937年有18位妇女被选进国民议会，占议员总数的4.5%。阿塔图尔克建构世俗民族国家计划要求妇女拥有现代国家完全的公民权，而将伊斯兰归为私人领域的事情。出于类似的原因，伊朗礼萨·汗国王1936年1月8日下令要求妇女不再戴蒙头巾，并参加到国家机构中来。20世纪60与70年代，他的儿子做了许多尝试，以赢得妇女对国家的忠诚，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对他个人的忠诚。他给妇女以选举权，允许她们代表政府的高级机关，并通过许多有利于她们的立法。不用说，现代化的计划以及国家权力的建立始终是比妇女问题本身更为重要的事情。

巴基斯坦和印度近来的一些事件很好地说明了：妇女地位究竟要在多

大程度上服从于政治势力的摆布。在巴基斯坦，伊斯兰被归入到国家这一地位层次上来，齐亚·哈克将军急于确立自己的权力，他宣布从1979年起实行伊斯兰体制。他以妇女作为他伊斯兰化计划的焦点，把一系列歧视性法律加到妇女的头上；要妇女为他的把新意识形态力量注入巴基斯坦国家这一指令付出代价。在那以后这个国家有了一位女总理贝娜齐尔·布托，但这件事也没有带来多少差异；导致伊斯兰化立法的政治势力依然强大。在印度，一亿以上穆斯林的共同体约占总人口的1/8，他们具有在穆斯林个人法而不是在印度共同的民法制约下生活的能力，这已成为他们维系自我认同能力的象征。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问题到了重要关头，当时一位离异的穆斯林妇女沙赫·巴诺迫切要求按印度刑事诉讼法享有得到其生活费的权利，从而避开按穆斯林个人法会陷入的贫困的地位。这一问题将穆斯林妇女推到了就穆斯林共同体的未来，实际上是印度自身的未来进行辩论的前沿。穆斯林宗教领袖呼吁维护穆斯林个人法的完整性，印度教右翼领袖借此问题攻击印度国家的世俗基础，因为它承认少数人的特权，而不承认居多数的印度教徒的特权。随之而来的是印度社团政治的强化。这一过程预示印度教右翼也会303像以前从未得到过政权的情况一样，在这一过程中穆斯林妇女注定要成为穆斯林认同的关键界标的承载者，这一界标既适用于穆斯林男人，也适用于印度教徒。

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使妇女承受了额外的压力。如果说，在20世纪中期，建构世俗民族国家的高峰期，在大多数穆斯林的城市处于边缘地位的好像是戴着蒙头巾的妇女，而现在则是不戴蒙头巾的妇女。这一变化，如同伊斯兰主义本身，一直被解释为是对传统的回归和对西方的抗议。最近对采用蒙头巾的埃及妇女进行的研究揭示出，除了对文化本真性的肯定以外，还有别的一



在1990年代初，女总统统领着3亿多的穆斯林：其中有孟加拉国的卡莉达·齐亚，巴基斯坦的贝娜齐尔·布托，以及土耳其的坦苏·奇莱尔。本图是布托和奇莱尔1994年2月在波斯尼亚总统府外向拥挤的人群问候致意的情景。她们勇敢地面对各种危险访问萨拉热窝（当时重兵包围萨拉热窝的塞尔维亚人正在进行射击），是为了引起人们对波斯尼亚局势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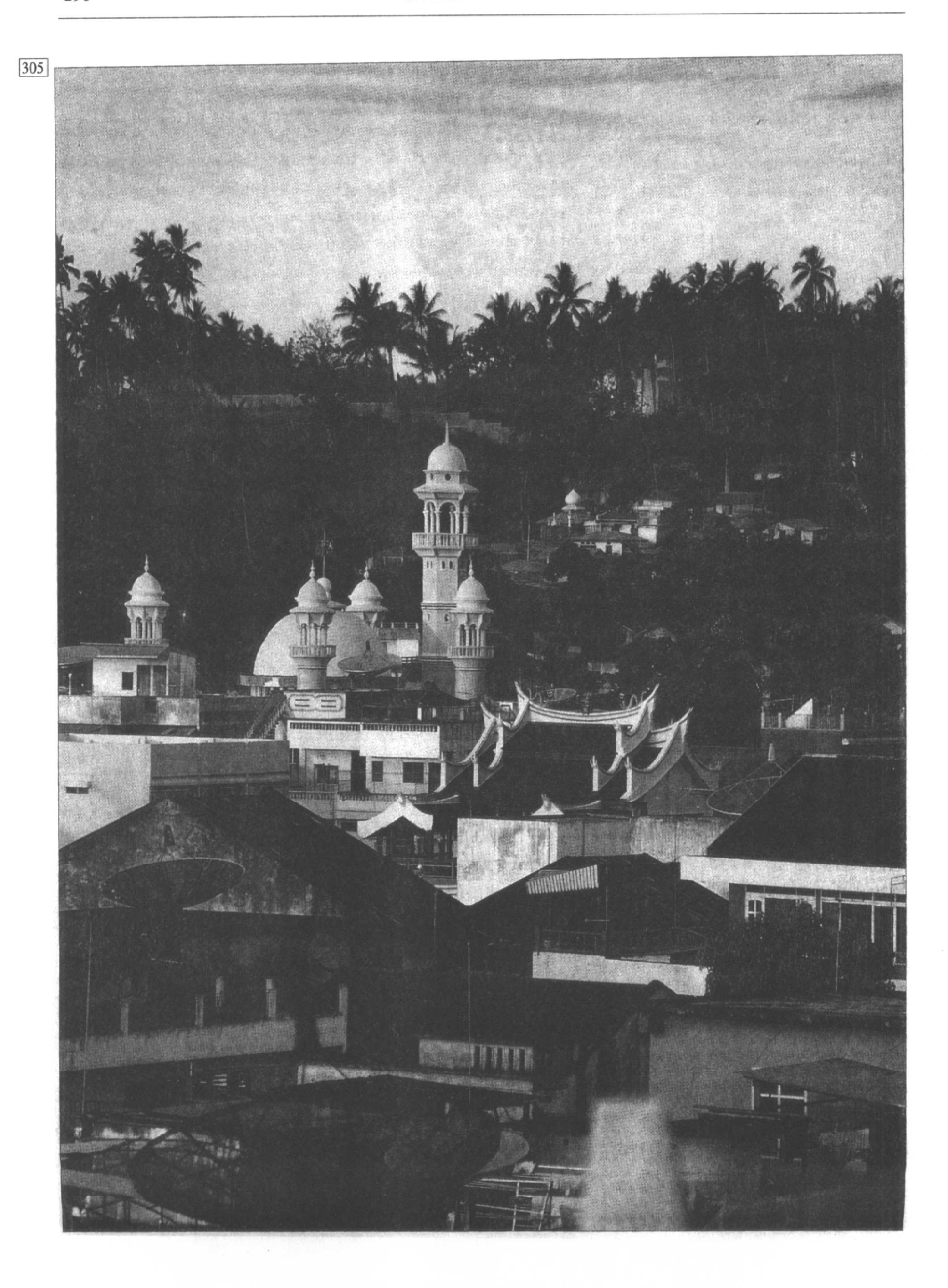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加渣玛达大学[1]的一名女生正在停放她的机动脚踏车。身着伊斯兰教传统服饰（就像这个学生一样）也许代表着一种自由的要素。这个女生因此可以在大学的环境里自由行动。

些事情正在发生。正如穆萨拉姆所已经指出的那样，主要之点也许并非一定在于蒙头巾本身，它只是能体现伊斯兰行为规范的一种着装形式。现在所采用的着装与传统着装有所不同。做这种着装的常常是第一代移入城市的居民的孩子。在教育方面获得成就是她们的特征。她们是向上发展的，目标是在她们社会的先锋队里占一席之地。伊斯兰的着装使这些妇女能心安理得地进入公共场合，并与男子互相接触，而不用担心被人指指戳戳诬为淫荡，因为这种着装提供了伊斯兰的"凭证"。这种着装使她们能够在公共场合合法活动。对这些妇女的观点进行的分析说明，她们根本就不保守；多数人要求受教育、希望得到工作和享有政治权利，只是在婚姻平等的问题上有些分歧。大量戴蒙头巾的妇女又出现在穆斯林城市的大街小巷，所代表的主要不是对传统的回归和对文化本真性的肯定，而是如雷拉·艾哈迈德所已经指出的那样，蒙头巾是"抵达、显眼地进入现代性的一种制服，也是决心向现代性迈进的制服"。

令人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男性伊斯兰主义者都赞同这种观点。结果，正在就自己的前进道路进行磋商的戴蒙头巾的妇女，很可能正在支持认 304

① 加渣玛达大学位于日惹——译者。

305



定这些道路全都走不通的运动。伊朗革命立即导致非伊斯兰立法的废除、禁止妇女参加司法审判工作、在公共场合与男子隔离，以及以74下鞭打的处罚强制妇女戴蒙头巾。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在存在大量失业的情况下进行军事活动，它反对妇女享有工作权，以限制妇女的选举权为目标，而且妇女在它所组织的游行示威中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它主张关闭伊斯兰主义在其他地方所打开的所有的道路。但是长期来看，正如我们上面指出的那样，伊斯兰主义政权不得不尊重政治与经济的规律。在伊朗，这种情况很快就出现了。同伊拉克打仗，参与作战的男子大批地牺牲，在军事支持活动以及在政府办公室等方面给妇女提供了许多效力的机会。着装法仍在严格地执行，但是现在妇女已能够更多地参与公共生活。与此相似的是，伊斯兰主义政权由于努力于经济进步，它们将会发现，它们同样不能忽视占其一半人口的妇女所体现的经济能量。结果，穆斯林社会将不能避免最近几世纪最深刻的社会革命——重新规范男女之间的关系。可以论证的是，这是他们当今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第296页图：电子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传媒体系全球化，意味着穆斯林同非穆斯林文化影响的相互作用空前强化。本图中，点缀于印度尼西亚一个小城镇上空的几座卫星接收器与清真寺和寺庙屋顶的交相辉映，说明了这一发展。

全球化与伊斯兰世界

当代的穆斯林世界，从它在地图上的形态到它思想的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它与西方之间痛苦的交互作用的结果。西方列强留给它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界；西方影响、帮助、造就了统治这些国家的精英们。而且，在这些社会中，从城市里传统的学者到庄稼地里的农民，尚未被这一方面的或那一方面的西方文明所触及者寥寥无几。这个世界是一个有多种声音的世界：不同民族的声音，民族内不同的声音，运动内部不同的声音。穆斯林同西方人一样，也不可能都像一个人那样说话和做事。这说明，存在着大家都能理解的表达感受的方式。每年在大的宗教场所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如在斋月进行斋戒、赴麦加朝觐等，仍然是在宗教的层面上对穆斯林团结的一种昭然肯定。而且，对西方被视为双重标准的东西存在着挥之不去的怨恨。当西方的利益在海湾受到挑战的时候，它准备站在“正义”的一边进行干预，但是，它要么只是以有限度的和拖宕的方式去做，要么在它认为没有涉及自己利益的时候（如对穆斯林在巴勒斯坦、波斯尼亚、车臣或克什米尔的事业）根本不去做。广泛存在着一种感觉，即对穆斯林没有给予其应当享有的尊重。 306

在将来，穆斯林世界可能会与外部力量更有力地啮合，并在与外部力量的互动中更全面地塑造自己。现代穆斯林共同体组成为世界共同体，离散在外的人能同它的心脏地带一直保持着联系。借助于新的电子的联系手段，电话、传真机、卫星电视、互联网，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率与强度交流思想与文化。而且，这种交流不可能因为伊斯兰主义运动影响的上升而长时间地中

断；正如本书第六章作者穆萨拉姆已经指出的那样，这是从一开始即在穆斯林的发祥地经过沙里亚检验过的。伊斯兰主义者可以把外来的影响从公共空间赶走，但是他们阻止外来的东西影响家庭的能力是有限的。

历史表明，穆斯林有能力在创造非凡的人类成就方面对许多文化做出贡献。他们在做这些贡献的时候，已经积累起不仅有利于自己而且有利于整个人类的财富。正如本书一直尽力指明的，《古兰经》、先知的生活，以及他们奉献给人类及其共同体的道德观，是永不枯竭的感召的源泉。有鉴于此，以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对穆斯林的未来寄予希望。

附　录

(一)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

哈里发

正统或正确指导的哈里发

632年　艾布·伯克尔
634年　欧麦尔·本·哈嗒布
644年　奥斯曼·本·阿凡
656年　阿里·本·艾比·塔里布

伍麦叶王朝哈里发

661年　穆阿维叶一世·本·阿比·苏富扬
680年　耶济德一世
683年　穆阿维叶二世
684年　麦尔旺一世·本·哈凯姆
685年　阿卜杜勒·麦利克
705年　瓦利德一世
715年　苏莱曼
717年　欧麦尔·本·阿齐兹
720年　耶济德二世
724年　希沙姆
743年　瓦利德二世
744年　耶济德三世
744年　易卜拉欣
750年　麦尔旺二世

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在伊拉克和巴格达)

749年　萨法
754年　曼苏尔
775年　马赫迪
785年　哈迪
786年　哈伦·拉希德
809年　阿明
813年　马蒙
871~819年　易卜拉欣·本·马赫迪(在巴格达)
833年　穆尔台绥姆
842年　瓦西格
847年　穆塔瓦基勒
861年　蒙塔绥尔
862年　穆斯坦
866年　穆塔兹
869年　塔赫塔迪
870年　穆塔米德
892年　穆塔迪德
902年　穆克塔斐
908年　穆克塔迪尔
932年　卡希尔
934年　拉迪
940年　穆塔齐
944年　穆斯塔克斐
946年　穆提
974年　太伊
991年　卡迪尔
1031年　卡伊姆
1075年　穆克塔迪
1094年　穆斯塔茨希尔
1118年　穆斯塔尔希德
1135年　拉希德
1136年　穆克塔斐
1160年　穆斯坦吉德
1170年　穆斯塔迪
1180年　纳绥尔
1225年　扎希尔
1226年　穆斯坦绥尔
1242~1258年　穆斯泰尔绥姆

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开罗)

1261~1517年

西班牙和北非

西班牙伍麦叶王朝

756～976年

穆拉比特王朝(北非和西班牙)

11世纪初～1147年

穆瓦希德王朝(北非和西班牙)

穆罕默德·伊本·突麦尔特(卒于1130年)～1269年

萨阿德王朝(摩洛哥)

1511～1659年

菲拉利王朝[1](摩洛哥)

1631～1927年

1927年 穆罕默德五世(第一次掌权)

1953年 穆罕默德

1955年 穆罕默德五世(第二次掌权)

1962年 哈桑二世

西非

索科多素丹国(尼日利亚)

1754～1938年(哈里发连续继位)

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

图伦王朝(埃及和叙利亚)

868～905年

伊赫什德王朝(埃及和叙利亚)

935～969年

法蒂玛王朝(北非,然后是埃及和叙利亚)

909～1171年

阿尤布王朝(埃及)

1169～1252年

马穆鲁克王朝(埃及和叙利亚)

1. 伯海里系 1250～1389年
2. 布吉尔系 1382～1516年

穆罕默德·阿里统治(埃及)

1850年 穆罕默德·阿里帕夏

1848年 易卜拉欣帕夏

1848年 阿巴斯一世帕夏

1854年 赛义德帕夏

1863年 伊斯梅尔(1867年起为赫迪夫)

1879年 陶菲克

1892年 阿巴斯二世·希勒米

1914年 侯赛因·卡米勒(素丹)

1917年 艾哈迈德·福阿德一世(1922起为国王)

1936年 法鲁克

1952～1953年 福阿德二世总统(埃及)

1953～1954年 纳吉布

1956年 纳赛尔

1970年 萨达特

1981年 穆巴拉克

塞尔柱王朝

1. 大塞尔柱帝国(伊拉克和波斯) 1038～1194年
2. 叙利亚塞尔柱王国 1078～1117年
3. 克尔曼塞尔柱王国 1041～1186年

安纳托利亚和突厥人

鲁姆塞尔柱素丹国(安纳托利亚) 1077～1307年

丹尼什门兹素丹国(中部和东部安纳托利亚)

1. 斯拉夫分支 1071～1174年
2. 马拉特亚分支 1142～1178年

卡拉曼尼德王朝(安纳托利亚中部) 1256～1483年

奥斯曼帝国(安纳托利亚、巴尔干、阿拉伯地区)

1281年 奥斯曼一世·本·艾尔托格赫瑞勒

1324年 奥尔汗

1360年 穆拉德一世

1389年 巴耶济德一世

1420年 帖木儿入侵

1403年 穆罕默德一世·切列比(最初仅在安纳托利亚,1413年以后还包括鲁米利亚)

1403年 苏莱曼一世(1410年以前仅在鲁米利亚)

[1] 即阿拉维王朝

1421年　穆拉德二世(第一次掌权)
1444年　穆罕默德二世·法迪赫("征服者",第一次掌权)
1446年　穆拉德二世(第二次掌权)
1451年　穆罕默德二世(第二次掌权)
1481年　巴耶济德二世
1512年　赛利姆·亚沃兹
1520年　苏莱曼二世·卡努尼("法律制定者",在西方称为苏莱曼大帝)
1566年　赛利姆二世
1574年　穆拉德三世
1595年　穆罕默德三世
1603年　艾哈迈德一世
1617年　穆斯塔法一世(第一次掌权)
1618年　奥斯曼二世
1622年　穆斯塔法一世(第二次掌权)
1623年　穆拉德四世
1640年　易卜拉欣
1648年　穆罕默德四世
1687年　苏莱曼三世
1691年　艾哈迈德二世
1659年　穆斯塔法二世
1703年　艾哈迈德三世
1730年　马哈穆德一世
1754年　奥斯曼三世
1757年　穆斯塔法三世
1774年　阿布杜·哈米德一世
1789年　赛利姆三世
1807年　穆斯塔法四世
1808年　马哈穆德二世
1839年　阿布杜·马吉德一世
1861年　阿布杜·阿齐兹
1876年　穆拉德五世
1876年　阿布杜·哈米德二世
1876年　穆拉杜·哈米德二世
1909年　穆罕默德五世·拉萨德
1918年　穆罕默德六世·瓦利德丁
1922～1924年　阿布杜·马吉德二世

土耳其

1923年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
1938年　伊斯梅特·伊诺努
1950年　瑟拉尔·贝雅尔
1961年　古尔塞勒将军
1966年　塞维德特·苏奈参议员
1973年　法赫瑞·柯洛图尔克参议员
1980年　凯南·埃维王将军
1989年　图尔古特·奥扎尔
1993年　苏莱曼·德雷尔

现代西亚

黎巴嫩

1920年　法国委任统治
1926年　共和国
总统
1026年　查尔斯·达巴斯
1934年　哈比卜·萨阿德
1936年　艾尔勒·埃迪
1941年　独立
1941年　阿尔弗雷德·纳卡彻
1943年　扈利
1952年　卡米勒·夏蒙
1958年　法乌德·谢哈卜
1964年　查尔斯·赫拉维
1970年　苏莱曼·弗朗吉亚
1976年　埃里阿斯·萨尔科斯
1982年　巴齐尔·格迈耶尔
1982～1988年　阿明·格迈耶尔
1989年　勒内·莫阿瓦德
1989年　艾利亚斯·赫拉维

叙利亚

1981年　费萨尔(埃米尔侯赛因之子,领导大马士革自治政府)
1920年　法国委任统治
1941年　独立
1943年　共和国
总统
1943年　舒克瑞·库阿特利
1949年　哈希姆·阿塔西
1951年　法维兹·塞洛将军
1953～1954年　史沙克里将军

1955年 舒克瑞·库瓦特里
1958年 纳赛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1961年 纳兹姆·库德西
1963年 阿明·哈菲兹大将军
1966年 努尔·丁·阿塔西
1970年 艾哈迈德·卡提卜
1971年 阿萨德将军

希贾兹

哈希姆家族
1908年 埃米尔侯赛因(麦加的谢里夫,1916年开始用国王称号)
1924年 阿里
1925年 沙特家族征服希贾兹

外约旦

1920年 英国委任统治
哈希姆家族
1921年 埃米尔阿卜杜拉(1946年起称国王,1949年起改国名为约旦)
1951年 塔拉尔
1952年 侯赛因

伊拉克

1920年 英国委任统治
哈希姆家族
1921年 费萨尔一世·本·侯赛因
1933年 加齐
1939年 费萨尔二世
1958年 共和国
总统
1958年 纳吉布·鲁拜大将军
1963年 菲尔德·马歇尔·阿卜杜·萨利姆·穆罕默德·阿里夫
1966年 阿卜杜·拉赫曼·穆罕默德·阿里夫将军
1968年 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将军
1979年 萨达姆·侯赛因·提克里特

阿拉伯半岛

也门

扎子德伊玛目
1. 拉仁德系 9世纪~1281年
2. 卡希姆系 1592~1962年
1962年 共和国
总统
1962年 阿卜杜·阿勒·萨拉勒上校
1968年 阿卜杜·拉赫曼·伊里安尼
1974年 宪法暂时中止
1977年 艾哈迈德·本·侯赛因上校
1978年 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上校(1990年起统领北也和也门共和国)

阿曼和桑给巴尔

1. 统一的素丹国 1741~1856年(素丹国分裂)
2. 桑给巴尔 1856~1964年(革命,与坦桑尼亚合并)
3. 阿曼 1856~1932
1932年 赛义德·本·泰穆尔
1970年 卡布斯·本·赛义德

沙特王朝

1764年 穆罕默德·本·沙特
1765年 阿卜杜·阿齐兹
1803年 沙特·本·阿卜杜·阿齐兹
1814年 阿卜杜拉·伊本·沙特
1818~1822年 奥斯曼帝国占领
1823年 图尔基
1834年 费萨尔一世(第一次掌权)
1865年 阿卜杜拉三世·本·费萨尔(第一次掌权)
1871年 沙特·本·费萨尔
1874年 阿卜杜拉三世(第二次掌权)
1887年 被沙马尔国的拉西德征报,阿卜杜拉仍然是利雅得统领,直到1889年
1889年 阿卜杜·拉赫曼·本·费萨尔
1891年 穆罕默德·本·费萨尔(傀儡政府)
1902年 阿卜杜·阿齐兹
1853年 沙特
1964年 费萨尔二世
1975年 哈立德
1982年 法赫德

伊朗地区

布韦希王朝

法尔斯和胡泽斯坦 934～1062年

克尔曼 936～1048年

吉巴勒 932～977年

伊拉克 945～1055年

萨曼王朝(呼罗珊和河中地区) 819～1005年

萨法里王朝(锡斯坦) 867～1480

帖木儿王朝(河中地区和波斯)

1. 撒马尔罕的最高统治者

1370年 帖木儿

1405年 哈利勒(直到1409年)

1405年 沙赫鲁(最初只在呼罗珊地区)

1447年 兀鲁伯

1449年 阿卜杜勒·纳迪夫

1450年 阿卜杜·阿拉·米拉兹

1451年 阿布－赛义德

1469年 艾哈迈德

1494～1500年 马哈穆德·本·阿比－赛义德

2. 兀鲁伯死后呼罗珊地区的统治者 1449～1506年

3. 帖木儿死后伊朗西部和伊拉克地区的统治者 1404～1415年

黑羊王朝(阿塞拜疆和伊拉克) 1380～1468年

白羊王朝(迪亚尔巴克尔、东安纳托利亚、阿塞拜疆)

1378～1508年

伊朗

萨法维王朝

1501年 伊斯玛仪一世

1524年 塔赫马斯普一世

1576年 伊斯玛仪二世

1578年 穆罕默德·库达班达

1588年 阿拔斯一世

1629年 萨非一世

1642年 阿拔斯二世

1666年 苏莱曼一世(萨非二世)

1694年 胡赛因一世

1722年 塔赫马斯普二世

1732年 阿拔斯三世(只是波斯部分地区名义上的统治者)

1749年 苏莱曼二世(只是波斯部分地区名义上的统治者)

1750年 伊斯玛仪三世(只是波斯部分地区名义上的统治者)

1753年 胡赛因二世(只是波斯部分地区名义上的统治者)

1786年 穆罕默德(只是波斯部分地区名义上的统治者)

阿夫沙尔王朝 1736～1795年

桑德王朝 1750～1794年

恺加王朝 1721～1924年

巴列维王朝

1925年 礼萨汗

1941年 穆罕默德·礼萨汗

1979年 伊斯兰共和国

总统

1980年 阿波勒·哈桑·巴尼萨德尔

1981年 霍南贾特伊斯兰·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1989年以后伊斯兰革命领袖)

1989年 阿里·阿克巴尔·侯赛姆·拉夫桑贾尼

阿塞拜疆总统

1991年 阿雅兹·穆塔里波夫

1992年 阿布勒法兹·埃勒齐贝

1993年 盖达尔·阿里耶夫

阿富汗和印度

伽色尼王朝(呼罗珊、阿富汗和印度北部)

977～1186年

古尔王朝

1. 古尔和伽色尼系 10世纪末～1215年

2. 巴米扬和吐火罗斯坦系 1145～1215年

德里素丹国

1. 奴隶王朝 1206～1290年

2. 卡尔基王朝 1290～1320年

3. 图格鲁克王朝 1320～1414年

4. 赛义德王朝　1414 ~ 1451 年
5. 罗第王朝　1451 ~ 1426 年
6. 苏尔王朝　1540 ~ 1555 年

莫卧儿帝国

1526 年　扎希鲁丁·巴布尔
1530 年　胡马雍(第一次掌权)
1540 ~ 1555 年　苏尔王朝德里素丹国
1555 年　胡马雍(第二次掌权)
1556 年　贾拉尔丁·阿克巴一世
1605 年　努尔丁·加罕吉尔
1627 年　达瓦尔·巴克希
1628 年　希哈丁·沙杰汗一世
1657 年　穆拉德·巴克赫什(在古吉拉特)
1657 年　沙·舒贾(在孟加拉直到 1660 年)
1658 年　穆西丁·奥朗则布·阿拉姆吉尔一世
1707 年　(世系延续直到 1858 年)
1858 年　英国王室统治
1947 年　获得主权
统治者
1947 年　艾尔勒·蒙巴顿将军
1948 年　查克拉瓦尔提·拉加郭帕拉查里
1950 年　共和国
总统
1950 年　拉杰恩德拉·普拉萨德
1962 年　萨尔维帕里·拉德哈克里西曼
1967 年　扎齐尔·胡赛因
1969 年　瓦拉纳格里·文卡塔·吉里
1974 年　法赫鲁丁·阿里·尔哈迈德
1977 年　内拉姆·桑吉瓦·雷迪
1982 年　吉安尼·栽勒·辛哈
1987 年　文卡塔拉曼
1992 年　尚卡尔·达亚尔·沙尔玛

巴基斯坦

统治者
1947 年　穆罕默德·阿里·吉纳
1948 年　科瓦加·纳兹姆丁
1951 年　古拉姆·穆罕默德
1955 年　伊斯坎德尔·米尔扎将军
1956 年　伊斯兰共和国
总统
1956 年　伊斯坎德尔·米尔扎将军
1958 年　菲尔德·马歇尔·阿尤布·汗
1969 年　亚赫雅·汗大将军
1971 年　佐菲卡·阿里·布托
1973 年　法兹勒·艾拉西·乔德赫里
1978 年　齐亚·哈克将军
1988 年　吉拉姆·伊沙克·汗

孟加拉

1971 年　共和国
总统
1971 年　谢赫·穆吉布尔·拉赫曼
1972 年　阿布·赛义德·乔德胡里
1973 年　穆罕马杜拉
1975 年　谢赫·穆吉布尔·拉赫曼
1975 年　穆西塔克·艾哈迈德
1975 年　阿布萨达特·穆罕默德·赛叶姆
1977 年　齐亚·拉赫曼将军
1981 年　阿卜杜斯·萨塔尔
1982 年　阿卜勒·乔德胡里
1983 年　穆罕默德·侯赛因·艾尔沙德将军
1990 年　沙哈布丁·艾哈迈德(执行总统)
1991 年　阿布杜尔·拉赫曼·比斯瓦斯

阿富汗

杜兰尼王国　1747 ~ 1842 年
巴拉克查依王朝　1819 ~ 1973 年
总统
1973 年　萨达尔·穆罕默德·达乌德
1978 年　努尔·穆默德·塔拉齐
1979 年　哈菲兹·阿拉·阿明
1979 年　巴卜拉克·卡迈勒
1986 年　穆罕默德·查姆卡里(革命委员会执行总统)
1987 年　赛义德·穆罕默德·纳吉尔拉
1992 年　布罕努丁·拉巴尼

中亚

蒙古大汗国(蒙古和中国北部)

1206 年　成吉思汗

1227～1370年

察哈台汗国(河中地区,东突厥斯坦)
1227～1363年

伊尔汗国(波斯) 1256～1353年

昔班尼汗国(撒马尔罕) 1500～1599年

贾尼德汗国(布哈拉) 1559～1758年

曼吉特汗国 1785～1868年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1991年 伊斯兰·卡里莫夫
土库曼斯坦总统
1991年 萨佩穆拉德·尼亚佐夫
塔吉克斯坦总统
1991年 拉赫曼·纳比耶夫
1992年 伊玛马里·拉克曼诺夫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1991年 阿斯克尔·阿卡耶夫
哈萨克斯坦总统
1991年 努尔素丹·纳扎尔巴耶夫

印度尼西亚
素丹国
马打蓝国 1575～1748年(最后一位素丹即位)
苏加卡尔塔国 1788～1944(最后一位素丹即位)
尤加卡尔塔国 1755～1939年(最后一位素丹即位)
亚齐国 1496～1874年(最后一位素丹即位)
总统
1950年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苏加诺
1966年 普雷斯迪尤姆
1968年 苏哈托将军

(二)术语

amin “阿明”,意为值得信赖的:一个正式职位(如某协会或行会的负责人)拥有者的头衔。

Amir “埃米尔”,一个军事指挥官或者王国军事首脑的头衔,通常翻译为“emir”。

Calip “哈里发”,参见 Khalifa。

Dhikr “齐克尔”赞念真主,通过赞念者的存在来显示真主存在的一种精神修炼方式。

Fatwa “法特瓦”,一位穆夫提依据伊斯兰教法提出的正式见解或判断。

Ghazi “加齐”,捍卫伊斯兰信仰的前线战士。

Hadith “哈迪斯”,圣训,由先知的同伴传录的关于先知言行的关系。

Hajj “哈吉”,一年一度的麦加朝觐,有条件的穆斯林一生中至少要完成一次朝觐功课。

Hanafi 哈乃斐教法学派,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之一,由阿卜·哈乃斐创建[①](卒于767年)。

Hanbali 罕百勒教法学派,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之一,由艾哈迈德·伊本·罕百勒创建。

Hijra “希吉来”,先知穆罕默德率领早期穆斯林从麦加迁往麦地那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一年(622)因此成为伊斯兰教历纪元。

Hisba “希斯巴”,穆斯林的首要义务,即劝善戒恶的义务。

Ijaza “伊加扎”,老师授予学生的授业凭证,许可学生传授某篇课文。

Imam “伊玛目”,穆斯林共同体的最高领袖;先知的继任者,什叶派常用它来指代阿里及其后裔。[②]

Ilmiye “伊勒米耶”,即乌里玛,指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伊斯兰饱学之士。

Ismailis 伊斯玛仪派,什叶派的一个支派,该派承认伊玛目贾法尔之子伊斯玛仪及其后裔的领导权:它包括法蒂玛王朝,后该派又发生分裂;该派现存的主要支系是阿迦汗的信徒尼扎尔派。

Jami “加米”,专供穆斯林主麻日(聚礼日)和节日会礼用清真寺。

Jihad “吉哈德”,意为奋斗或斗争,包括同内心的邪恶

---

① 由阿卜·哈尼法的弟子在他去世后创建——译者。

② 在清真寺任职的“教长”、伊斯兰教法学法的创始人亦称伊玛目。

意念以及外在的异端邪说作斗争。

Kaaba “克尔白”,位于麦加禁寺中央的立方体状建筑,穆斯林相信此地是易卜拉欣建造的第一所朝拜真主的天房;是伊斯兰的中心,所有的穆斯林在朝拜时都应该面向它。

Khalifa “哈里发”,先知的继任者,因而是穆斯林共同体的领袖;对苏菲派而言,则是“谢赫”的继任者。

Khan “汗”,突厥称号,原指国家政府的首领;也指旅行商队住宿的旅馆。

Khanqa “罕卡”,苏菲派云游各地的成员的临时休息场所,谢赫可以在此生活并教授学生。

Madrasa “麦德莱赛”,首要任务是传授伊斯兰教认知的学校。

Maliki 马立克教法学派,逊尼派四大教派之一,由马立克·伊本·艾奈斯(卒于796年)创建。

Mamluk “马穆鲁克”,军队中的奴隶或自由人①。

Mihrab “米哈拉布”,礼拜殿的凹壁,以标志麦加的方向。

Mufti “穆夫提”,沙里亚说明人,对各类诉讼发布“法特瓦”。

Muhtasib “马赫塔西卜”,监督市场秩序和公共道德的官员。

Qadi “卡迪”,教法官,由哈里发任命②的官员,负责判决有关沙里亚基础的争议和纠纷。

Qasbah “卡斯巴赫”,一种堡垒式建筑,政府官员的任所,长官城。

Sayyid “赛义德”,王公、君主、首领;阿里之子侯赛因的后裔③。

Shafii “沙斐仪教法学派”,逊尼派四大教法学之一,由伊玛目沙斐仪(卒于820年)创建。

Sharia “沙里亚”,意为安拉诫命;穆斯林法律;是伊斯兰生活方式的总称。

Shaykh “谢赫”,字面意义为“长老”;部落首领,所有宗教领袖;尤其指一个独立的、用其苏菲方式引导学生的苏菲派“导师”。

Shayke al-Isaam “伊斯兰谢赫”,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最高宗教权威和伊斯坦布尔的穆夫提。

Shia “什叶派”,穆斯林的一个派别或“党派”,它反对正统的逊尼派观点,坚持承认阿里为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

Sufi “苏菲派”,一种穆斯林神秘主义派别。

Sultan “素丹”,意为“权力”或“权柄”,穆斯林统治者的称号。

Sunna “逊奈”,意为“道路”,习俗,先知和早期穆斯林共同体的实践,它是所有穆斯林社会过真正穆斯林生活的正确道路的权威榜样。

Sunnis “逊尼派”,遵循逊奈,主张哈里发职位的历史传承,与什叶派相对立;是穆斯林共同体的多数派别。

Sura “苏拉”或“苏赖”,《古兰经》编排的章。

Tanzimat “坦齐马特”,意为“重新组织”,19世纪奥斯曼改革运动的名称。

Ulama “乌里玛”,对伊斯兰学者的总称。

Umma “乌玛”,意为“民族或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的伊斯兰共同体。

(三)索引④

(说明:标注页码系英文原版使用,请参见中译本所缀边页码。)

A

《阿斯迦尔·阿迦》(杂志)299
《阿瓦德赫的笨拙》 98
阿八哈伊尔汗 49
阿巴丹油田 163
阿拔斯帝国 20,22~25,28~29,32,34,36,39,44,45,51,124,126,131,147,178,213~214,216,251
文学 251,256

① 马穆鲁克的原意是奴隶——译者。

② 有的并非由哈里发任命——译者。

③ 赛义德亦称先生,是对圣族(如穆罕默德、阿布·伯克尔、欧麦尔等的后裔)的尊称——译者。

④ 本索引里的页码为英文原著的页码。为方便索引,特在正文里以“□”标出了原著页码起止。

音乐 257,265
陶器 262
阿拔斯国王大帝 68,72,73~74,279,281
阿伯特·侯兰尼 173
阿卜德·阿拉·伊本·阿拔斯 20
阿卜杜·阿拉·汗二世 75~76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 105
阿卜杜·拉赫曼·伊本·穆阿维叶 26
阿卜杜·拉赫曼一世 27
阿卜杜·拉赫曼二世 257
阿卜杜·拉赫曼三世 26,261
阿卜杜·拉赫曼·伊本·穆罕默德·伊本·赫勒敦 33,35,35,36,61,71,73,127,142,165,166,253
《绪论》 35,35,197,221~223
阿卜杜·穆敏 37
阿卜杜·饶夫·辛吉利 241
阿卜杜-巴噶·伊本·谢里夫 263
阿卜杜拉·萨迈德 281
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 108
阿卜杜勒·噶迪尔·马拉吉 265
阿卜杜勒·哈克·哈米德 283
阿卜杜勒·卡迪尔·吉拉尼 41,233
阿卜杜勒·麦吉德一世 100,101
阿卜杜勒·麦利克哈里发 13,14,16,17
阿布·巴克尔·哈伊拉特 284
阿布·哈米德·安萨里 31,37,40,168,173,217~218,230,244,249,264
《救迷者》 218
《哲学家的矛盾》 218
《宗教科学的复兴》 40,173~178,181~182,184~186,218,230
阿布·哈尼法 211
阿布·穆斯林 21,22
阿布·赛义德 53
阿布·沙马 51
阿布德·拉希姆 284
阿布杜·阿里·汗 288
阿布尔·法德尔:《艾尼阿克巴》 276
阿布-哈桑·加法里 288,289
阿布扎比 99,163
阿达鲁斯家族 85,230
阿德南·赛伊根 284
阿尔巴尼亚 59,120
阿尔达比勒 41,71,72
阿尔罕布拉宫殿 57,263,270
阿尔及利亚 107,107,115,197,249,269,293,296,298,299,300
阿尔梅利亚 37
阿尔塔夫·侯赛因·哈里 283
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 129,135
阿富汗 X,37,63,74~75,80,96,109,116,154,299
阿格拉布王朝 28
阿赫默德·伊本·易卜拉欣·亚萨维 41
阿迦·汗 20
阿克巴尔·阿拉哈巴迪 245
阿拉比帕夏 203
阿拉比亚 x,2~3,11,81~82,108,124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 106,107,114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AR) 106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 108,158,163
阿拉伯联盟 106
阿拉伯语:字母 283
语言 xxi,63,86,119,127,250~251,254,255
阿拉伯人 x,2~5,10~11,16~17,24,104~105,124
民族主义 106~107
阿拉伯语 xxi,63,86,119
阿拉卜·易德里西 125
阿拉维 85,86~87,107
阿拉维世系 20,25,82
阿勒哈臻(伊本·海伊撒姆) 31,228
阿勒坡·阿尔斯兰 39,42~43
阿勒颇 44,56,130,161,194,256
阿里·哈克 20
阿里·里达 25
阿里·穆巴拉克 201,201~202
阿里·瑞扎 281
阿里·沙里亚提博士 xix,xxiii,117,244,245,300
阿里·伊本·阿比·塔里布(第四任哈里发) 12,13,18,20,41,191,211,245,255
阿里德支系 20,21,25,29

阿利迦尔:盎格鲁－东方学院:100,243
阿列克塞一世·科姆尼纳斯皇帝 43
阿列克谢·卡雷尔 301
阿马纳特·汗 210
阿曼·阿拉·汗 109
阿米尔·胡斯饶 264
阿敏 24
阿奴什尔旺国王 127
阿契美尼德王朝 9
阿萨辛支派 48
阿塞拜疆 17,21,41~42,71,95,264
阿什拉夫·哈利勒 45
阿斯法尔 29,31
阿威罗伊(伊本·鲁什德) xxi,24,215,229
阿维森纳 (伊本·西拿)xxi,31,206,215,229,252
《矫正集》 257
阿亚图拉·霍梅尼 xix,74,117,119,245,246,300,301
阿伊莎(先知的妻子) 13,187,188,191,192
阿尤布·汗将军 109
阿尤布王朝 44,45,49,51,133
埃迪尔内:塞利姆清真寺 277,277
埃及(参见“开罗”)9~10,12,16,17,29,30,31,34,44,49,49,52,60~61,65,101,105,106,113,114,121,126,131,135,136,158,159,202~203,291,296,299
农业 150,151,160,200,202
建筑 258,269,286
被英国占领 156~157
音乐 284~285
拿破仑入侵 x,xiii,xvii,88,93~94
绘画 124,288
妇女和女权主义 188,204,204~205
埃及马穆鲁克素丹白尔斯贝 134
埃及女权主义 204,204~205
埃塞俄比亚 3,6,11
艾布·伯克尔 8,18,187,191,253
艾布·哈桑·沙兹里 41
艾布·麦得彦·舒阿伊卜 234
艾布·纳吉布·苏哈拉瓦迪 234
艾布·努瓦斯 256
艾德哈卜 60,131
艾哈迈德·阿里 287~288
艾哈迈德·本·伊萨·穆哈吉尔 85
艾哈迈德·卡拉希萨里 277,280
艾哈迈德·赛义德 284
艾哈迈德·邵基 283
艾哈迈德·希尔信迪 239,241
艾哈迈德·伊本·罕百勒 211
艾哈迈德·伊本·马吉德·纳吉迪 124~125
艾哈迈德·伊本·泰米叶 42,237,239
艾哈迈德·扎基·阿布·沙迪 283
艾赫泰勒 255
艾米尔·纳绥尔·阿拉 102
艾什尔里 215,218,244,249
艾特西兹 45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的衰亡》 xv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 xv
安卡拉战役(1402年) 56
安纳托利亚 31,42,53,51,56,94,159,247,264,268
安条克 43,130,214
安瓦尔·萨达特 113,113,248,298
安瓦里 264
安文佐尔 (伊本·祖赫尔) 229
奥朗则布(莫卧儿皇帝) 77,80,81,275,276
奥斯曼·丹·福迪奥 83,89,240,241
奥斯曼帝国 x,28,56,58~60,61,62,63,64,65~71,77,94,96~97,100~101,101,104~105,135,159,199
建筑 277,279,参见伊斯坦布尔
军队 62,178
近卫军团 41,59,67,69,101,235,277,284
艺术和书法 281,287
陶器 282
金属制品 281~282
音乐 276
诗歌 274~275 参见土耳其
铁路 157
语言 13,23
奥斯曼皇帝马哈穆德二世 100
奥斯曼皇帝穆罕默德二世(征服者) 58,65,68,279
奥斯曼皇帝穆罕默德一世 58
奥斯曼家族 56

奥斯曼亲王杰姆　xvii

B

巴德利运动　89,92
巴尔干　59,60,120,234
巴尔干战争（1912～1913年）　94
巴尔延建筑师家族　286年
巴法基赫家族　85
巴哈杜尔・沙　81,276
巴基　274
巴拉维王朝　108,117,213,243,287
巴基斯坦　38,100,109,109,115～116,116,298,302
巴克蒂亚瑞　156
巴勒斯坦　43,106,113,113,119,283
巴林　108,126,132,162,163
巴努・蒙齐德　44
巴特洛梅乌・迪亚士　134
巴耶济德二世素丹　65,69,280
巴耶济德一世素丹　65,58,67
巴伊达维　221,226
巴伊森占尔王子　272
巴扎(集市)　138,147,148,148,149,170～171,171,177
白迪阿・宰曼・海麦达尼　263
白萨席里　34
白沙尔・伊本・布尔德　256
柏柏尔人　26,31,35,36,37,40,60,82,138,151,156
柏拉图　xx,214,300;参见　新柏拉图主义
拜塔尔　189
拜占庭帝国　x,xxi,2,3,5,5,8～9,11,13,14,18,27,29,32,34,42～43,56,228,255
拜朱(蒙古将军)　48
保加利亚　59,120
报纸　99,246
北京:牛街清真寺　52
北美伊斯兰协会　119
贝迪尔　275
贝都因人　124,142,155～156,255
贝鲁特　161
贝娜齐尔・布托　116,116,302,303
本・贝拉　107
比赫扎德　270,272
比克塔什教团　41,42,69,71,234,235
比鲁尼　31,228,229
避孕　205～207
别儿哥汗　49
波阿波迪尔　59
波斯彩饰画　51,194
波斯尼亚　59,111,121,234,303
波斯人　9
波斯湾　124,125,126,128,132,136
玻璃制造　xxi,274
伯明翰大会（1992年）　xvii,xxiii
博尔诺　82
布尔萨　56,65,161
布哈拉　x,41,56,62,75,76,96～97,98,102,141,263
布哈里:《圣训实录》　211
布勒赫・沙　236
布韦希人　29,31,33,37,38,40,262
布祖尔格・伊本・沙赫瑞亚尔　130

C

查格里・贝克　40
查希慈　38,197,214,256
查希尔・汗国王　109
察哈台蒙古汗国　53,54,56,76,88
朝觐(哈吉)　139,141,141,164
成吉思汗(铁木真)　46,47,,48,53
成吉思汗人　75
城市生活　参见穆斯林城市
传教会　247,249,292

D

D・B・麦克唐纳　xiii
达吉斯坦　95,95
鞑靼人　102
大不里士的塞伊卜　275

大高官易卜拉欣帕夏 274
大马士革 x,13,40~41,56,59,126,130,138,142,144,189,215,255,290
 清真大寺 18,19,144,145,145,147,165,258,258
大马士革的艾沙 277,230
代数学 228
戴夫舍梅 59
丹尼什门兹人 43
德奥班德运动 244,292
德黑兰 75,117,121,287,289,300
德鲁兹人 20,25
德米特里·坎特米尔 276
迪拜 163
底格里斯河 152,153
地毯和毯子 xxi,133,280,281
第二次世界大战 108,109
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 11,14,18,150,182,187,253
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 12,14,18,187,210,253,256
第一次世界大战 96~97
东印度公司(英国) 95,135
堕胎 206,206

E

《一千零一夜》 263
《伊玛目》(报纸) 99
俄罗斯(和苏联) xi,xii,68,76,95,95~96,97,102~103,110~111,119,242,248,291

F

"穆瓦舍赫" 256,263
法蒂玛 20,187,191
法蒂玛王朝 20,29,30,31,33~34,42,43,44,131,145,216
 艺术和建筑 269,272,272,274
法国 xviii,14,49,93,95,96,97,105,107,120,120,204,242
 石油工业 161~163
法拉比 215,252
法拉迪运动 92
法赖兹得格 255
法朗吉·马哈勒家族 230,242,242
法里德·布迪拉:《诗琴》 xviii
法律 参见沙里亚
法瑞德·阿特拉什 284
法瑞德丁·阿塔尔:《鸟的聚会》 264
法塔赫·阿里·沙 282
法塔赫布尔锡克瑞的宫殿 80
法特瓦 56,213
纺织品 xxi, 49,53,64,80,129,137,141
 也可参见 丝路贸易
菲利普(阿拉伯人,罗马皇帝) 3
菲律宾人 84,86,87,95
费尔道西 263~264
 《列王记》 31,33,264,270
费萨尔国王 105,121
丰吉王国 82
佛教 2,46
弗朗歇·德斯佩雷将军 96
弗朗兹·法农 107,301
福祖里 274
妇女 xv,xvi,169,178,191,194,196,197,300~304
 人物词典 188~194,197,227
 埃及女权主义 204,204~205,205
 穆斯林对西方妇女的印象 xviii
 政治领袖 116,303
 伊斯兰教前时代 3
 先知的妻子们 187
富斯塔特 128,130,133,145,165

G

"格绥达"(颂诗) 250,255,264
伽色尼的马苏德 38
伽色尼素丹马哈茂德 32,33,38
伽色尼王朝 32,37~38,40,263
噶阿尼 282
噶里卜 282
噶扎尔 264,283
盖什盖伊人 156
哥伦布 70

格拉纳达 36,37,59~60,61,165
阿尔罕布拉宫殿 57,263,270
格兰德·维泽尔·迈赫默德·寇坡茹卢 68
格林 xxi
格鲁布 105
格亚斯 212
共产主义 102~103
贡巴德卡布斯 266,266
古达阿部落 14,16
古尔的马哈茂德 52
古吉拉特 86,137
古莱什部落 5,8,128,155
古兰经 xii, xix~xx, 5, 10, 18, 19, 182, 189, 196, 208, 209, 209~211, 212, 214~215, 218, 235~236, 250, 251, 268, 296
吟唱 252
抄誊 210,253~254,265,268,270
学习 221~222,247
翻译 xii,xiii,246
古塞伊尔阿姆拉 258
古希腊文化:参见“希腊文化”
闺房 xv,67,74,169,279

H

《海军志》 70,70
哈比卜·布尔吉巴 107
哈布斯堡王朝 65,68
哈德拉毛赛义德人 85,86~87
哈尔瓦提教团 92,234,240
哈菲兹·阿萨德 114
哈嘴尼 264
哈基姆哈里发 34
哈吉·沙里阿特·阿拉 92
哈凯姆二世 26,27
哈拉维 43
哈拉智 40,216,217
哈里发 x~xi,8,18~19,22,23,25,32~33,176,178
哈里发 231
哈里发哈伦·拉希德 24,28,139,257
哈里发穆斯泰尔绥姆 265
哈里发穆斯坦绥尔 34
哈立德·齐亚 283
哈立德·伊本·瓦利德 8,9
哈立德·伊斯兰布利 113
哈利勒·吉布然 283
哈利里:“麦嘴麦”131,141,263
哈马斯 119,299
哈姆帕尔索姆·利毛尼克延 284
哈乃斐(哈尼法教法学派) 63, 66, 76, 182, 211, 212, 226, 230
哈尼发(绿洲) 8
哈萨克斯坦 95
哈桑·巴士里 215
哈桑·班纳 112~113,245,249
哈桑·法特希 287
哈桑·图拉比博士 112,249
哈桑 20,81
哈桑后裔 20
哈提卜·巴格达迪 188
哈瓦利吉派 13,16,18,19,21,25,138
哈希姆·穆罕默德·巴格达迪 287
哈希姆家族 20,21~22,105,106
哈雅里 274
海拜尔 6
海推布 40
海湾战争 (1990~1991年) xxiii,121,299,300
罕百里(罕百勒教法学派) 42,211,217,223,237,239
罕卡 40,41,51,231
汉密尔顿·A·R·吉布 xiii,xv,188
航海贸易 124,125,126,127
浩罕 75,76
和田 88
河中地区 28,34,38,45,46,49,53,56
荷兰 87,94,95,110,135,137,242
荷兰东印度公司 95,135
赫蒂彻(先知的妻子) 5,188
赫拉特 262,272,272,276,
高哈尔·沙德陵墓 269
赫拉特的贾米 236,264

赫斯特·斯坦霍普 xiii
赫汀战役(1187年) 45
黑死病 35,197~198
红海贸易 124~125,126,127~128,129,131,136
侯赛因·拜哈拉 264
侯赛因·比赫扎德 290
侯赛因·海卡尔:《扎伊纳卜》 283
侯赛因·霍斯罗杰迪:“地球上的腐化者”xix
侯赛因 12,16,20
侯赛因后裔 20
侯赛因素丹 74
呼罗珊 17,21,22,24,28,32,37,40,45,46,48,56,63,76,138,221
呼罗珊谋夫 214
胡达·沙拉维 204,204,205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 241
胡加·切列比 221
胡斯尼·穆巴拉克 114
胡斯诺汗·基尔马尼 288
胡斯饶二世 13
胡瓦加·乌拜伊德·阿拉·阿赫拉尔 41,76
胡瓦加希迪尔 237,238
花刺模子沙阿拉丁·穆罕默德 45
花刺子模帝国 45,46
回族 88
绘图学 70
霍尔木兹 132,135,136
霍尔木兹海峡 135

J

基督徒和基督教
  与拜占庭帝国 2
  与伊斯兰 xii,xiii,xvi~xvii,xix~xx,xxiii,42
  奥斯曼统治下 59
  在西班牙 26,36~37,61
基普察克突厥人 45,46
吉布拉(朝拜方向) 7,258
吉达 127,128,129,130,131,132,134
吉恩·德梅斯托 120
吉恩·列奥·杰柔姆:《阿尔迈赫》 xv
吉恩-巴普梯斯特·塔维尔尼尔 142
吉尔王朝 51,52
吉哈德(圣战) 10,32,92,240
吉拉姆·阿拉
吉塞佩·多尼泽提 284
计划生育 205~207
技术 126,213
  也可参见 灌溉
加波瑞尔·伊本·乌玛尔 83
加马尔丁·阿富汗尼 98,99,244,249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 105,105,113,245
加齐 42
加萨尼人 3,11
加瓦德·萨利姆 288
加赞伊尔汗 49,268
加兹 189
加兹尼 32,45,263
贾巴尔蒂 93
贾姆西德·卡沙尼 228
贾尼德王朝
建筑 147,169,253,254
  阿拔斯 258,261
  穆瓦希德 269,270
  穆拉比特 269,270
  现代 287
  法蒂玛 269
  马穆鲁克 269
  蒙古 268~269
  莫卧儿 80,280
  奥斯曼 277,279
  复兴主义 286~287
  萨法维 279~280
  萨珊 260
  塞尔柱 46,265~266,268
  伍麦叶 26,258,258,261
教皇乌尔班二世 43
教育 xxii,168,170,226
  尼扎姆课程表 242
  可参见“伊斯兰认知”、“麦德莱赛”

杰济拉 9,17,21
杰里尔·吉阿浦尔 289
金帐汗国 48,49
金属制品 xxi,48,172,262,272,274,281~282,290
近卫军团参见奥斯曼帝国
君士坦丁(皇帝) 2
君士坦丁堡(也可参见伊斯坦布尔) 42,43,58,59,65,126,138
喀什噶尔 76,88
喀什噶尔的马赫穆德 39

K

《库楚克－开纳吉条约》(1774年) 68
《光荣》(连环漫画杂志)99
卡迪·伊亚德:《治疗之书》 227
卡迪 43,69,213,220,221
卡尔巴拉 12,16
卡尔卜 14
卡拉莫口 219,参见乌里玛
卡莉达·齐亚 116,303
卡里姆商人 133~134
卡里木 275
卡利卡特 84,85,130,131,132,134
卡姆然·迪巴 287
卡诺 82
《皮影戏》(杂志) 98
卡萨布兰卡:哈桑二世清真大寺 286,287
卡尚的萨巴 282
卡尚陶瓷 273
卡塔尔 108,162
卡提卜·切列比 275
卡伊姆·马卡姆·法拉哈尼 282
卡扎尔人 75,282,288~289
开罗 32,35,51,57,61,86,93,101,113,131,138,139,143,144,145,165,189,197,198,199~200,221,226,261,286,290
爱资哈尔清真寺 30,99,221,240,269
哈基姆清真寺 269
毛毯手工场 133
墓地 182,266
阿米尔·萨尔基特米希斯经学院－陵墓 35
麦德莱赛 221,227
现代化 201~202,203
歌剧院 201,202,284
人口会议 (1994年) 206,206
卡伊特贝伊建筑群 269
谢佩尔德饭店 203
大学 205
开罗吉尼扎记录 133
开罗一亚历山大铁路 201
凯拉姆 18,23,24
凯鲁万 138,139,165
清真大寺 261,262,270
凯末拉廷 286
坎贝 132,135
坎大哈 63,74
坎儿井 154,154
考萨里 72
科尔内留斯·勒布鲁:世界典范广场 73
科尼亚 43,46,48,264
科普特人 34,126
科斯戴战役(1243年) 48
科威特 xxiii,xxiii,108,157~158,162,162,163
科学 xx~xxi,23,213,228~229
克迪夫·赛义德 201
克迪夫·伊斯玛仪 201,202,203
克尔白圣寺 5,8,30,139,210
克尔曼(伊朗商队贸易) 141
克里米亚吉拉汗国 95
肯迪 215,257
寇松勋爵 75
苦行者 41
库布拉维教团 41
库尔达巴德:奥朗则布墓 80
库尔德人 44,47
库法体 209,254,262
库特布丁·拉齐 242
库特布丁·马哈茂德·拉齐·塔赫坦尼 223
库特布丁 51
库特布丁 52

奎泽尔巴什部落 72,73,75,77

L

拉巴特:清真寺 269
拉达 137,143
拉合尔 280
拉赫米德人国王 3
拉吉布·阿雅德 288
拉卡 48
拉齐德·科莱齐 289
拉齐斯(穆罕默德·伊本·扎卡里亚·拉齐) 228~229
拉其普特王朝 69,79,80,81
拉西德丁 286
《世界历史》 32
拉希德·哈诺希 249
莱昂王国的阿方索六世 37
莱拉和迈吉农 197
勒克瑙 242,276,285
雷塞斯温特 11
黎巴嫩 105,119,248,283
礼萨·阿拔斯 281
里法伊教团 41,235
利奥·阿弗里卡纳斯 60,164,166,170
利比亚 94,115,158,292,299
利比亚的黎波里 138,139
列宁 102
刘智 88
六天战争(1967年) 106,113
鲁斯塔米茨王朝 138
鲁瓦拉(部落) 156
路易斯·法拉汉 120
路易斯·马斯戈农 xiii,300
罗马人 3,4,128,137,153,153,258
罗曼四世·狄奥根(拜占庭皇帝) 42
骆驼 2,3,137,138,141,155,175

M

M·M·格拉西莫夫
《毛拉纳斯茄丁》(周刊) 98,248
《玛斯纳维》 236
"玛斯纳维" 264,283
马打蓝王国 87
马尔达维奇 29,31
马尔科姆·艾克斯 120
马耳他 65
马赫迪·巴扎尔甘 249
马赫迪哈里发 139
马赫迪运动 292
马赫塔西卜 173,175~176,177,181,182,184
马吉里西家族 230
马吉利 231
马拉巴尔海岸 84,86,87,130
马拉喀什 82,269
马拉麦提斯教团 235
马拉米亚 234
马拉塔人 81
马来西亚 52,95,99~100,109~110,121,296
马里 60,83
马立克·伊本·艾奈斯 参见 马立克
马立克·伊本·艾奈斯 36,211
马立克教法学派 36,211,212,223,230
马林王朝 35,59,197
马六甲 52,87,132,134
马蒙哈里发 24~25,28,29,176,182,257
马明心 241
马穆鲁克人(奴隶士兵) 28,32
马穆鲁克素丹拜伯尔斯 48,49,51
马穆鲁克王朝 45,48,49,49,51,52,56,59,59,61,93,101,134,189,193,237,264,270
艺术和建筑 266,269,274,290
毛毯 133
马匹饲养 65,141,155
马什哈德 269,276,280,281
马什哈德的苏尔坦·阿里 281

马斯喀特 129,135,135,162
马歇尔·霍奇森 xiii,xv
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 xiii
麦德莱赛 40,51,68,76,170,221,223,226,227
麦地那 xi,6,6~7,8,12,51,84,91,124,143,188,189,230,231,240,241,255,258
麦尔旺二世 21
麦尔旺一世哈里发 16
麦嘎麦 参见 哈利里
麦嘎麦 263
麦格里奇 56
麦加 xi,5,6,7~8,10,12,51,84,92,124,124,132,138,139,141,143,188,189,255
麦拉姆 219 参见乌里玛
麦斯欧迪 130
麦素木达柏柏尔人 36,37
满清王朝 88,88
曼德海峡 135
曼齐卡特战役 42~43
曼萨·穆萨 60
曼苏尔哈里发 23,26,95,126,145,255
猫 216
毛拉 219,参见乌里玛
毛拉纳·阿什拉夫·阿里·撒拉维:《天堂的宝石》 301
毛拉纳·哈立德·巴格达迪 241
毛拉维教团 41,71,234,235,248,252,265,276
贸易组织 172~173
梅尔基奥尔·洛里克斯:"苏莱曼大帝" 68
美利坚合众国 xix,95,105,119,161~163,291,299
美索不达米亚的哈兰 214
蒙巴顿勋爵 109
蒙哥大汗 48
蒙古 41,45~49,51,53,54,56,76,264,268~269
　突厥-蒙古 62,63~65
蒙古将军速不台 47
蒙古将军哲别 47
蒙古完泽笃 269
孟加拉 95,238
孟加拉共和国 109,116,303
孟买宗教小册子和书籍出版会 xii
米尔·阿里·施尔·纳维 264
米尔·萨尔坦·加里耶夫 102
米尔·萨伊德·阿里 281
米尔·赛义德·沙里夫·朱尔贾尼 223,226,230
米尔·伊迈德 281
米尔扎·巴巴 288
米哈拉布 273
米赫尔·阿里 288,289
米南加保 89,92
米切尔·阿弗拉克 106
米斯加吉家族 241
明朝 88,134
摩洛哥 36,37,81~82,82,94,107,126,151
　还参见 卡萨布兰卡,非斯
摩洛哥非斯 82,138,139,164,165~166,167,168,168,169,170~173,170,171,171,173,197,199,221
　卡拉维因清真寺 168,170,170,269
摩尼教 2,214
摩萨台博士 108,108~109
摩苏尔 44,48
莫卧儿帝国 54,61,62,63~65,67,68,69,72~73,75,76,77~81,95,142,199,230
　建筑 80,280
　珠宝和玉石 282
　文学 276,282
　绘画 232,281
莫卧儿皇帝阿克巴 xx,54,77,77,79~80,196,239,275,276,280,281
莫卧儿皇帝胡马雍 77,280,281
莫卧儿皇帝贾汗季 239,275,280,281
　《贾汗季回忆录》 276
墓地 182,266
穆阿利姆·纳吉 283
穆阿玛尔·卡扎菲 115
穆阿维叶 13,14,16
穆安津 40
穆尔台绥姆哈里发 23,28,147,178,257,260
穆尔太齐赖派 186,214~215
穆尔图丁·穆罕默德·契斯提 41
穆夫提 40,242

穆格里 40
穆格台迪尔 29
穆罕默德·阿卜杜·阿拉·哈桑 92
穆罕默德·阿卜杜勒·瓦哈卜(作曲家) 284
穆罕默德·阿里·杰末尔扎达 283
穆罕默德·阿里·真纳 109,109
穆罕默德·阿里 84,94,101,199,200,200~201,202
胡尔希德·艾哈迈德 249
穆罕默德·巴奇尔·马吉里西 74,239
《光的海洋》 189
穆罕默德·法赫米 287
穆罕默德·哈雅·信德西 241
穆罕默德·加法里 288,289
穆罕默德·穆尔塔达·扎比迪 241
穆罕默德·穆赫塔尔 288
穆罕默德·纳基 288
穆罕默德·尼沙普瑞 281
穆罕默德·赛义德 288
穆罕默德·沙 276
穆罕默德·索科鲁 64
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 83,89,92,239,241
穆罕默德·伊本·穆萨·花拉子密 228
穆罕默德·伊本·图格鲁克素丹 265
穆罕默德·伊本·伊斯玛仪 20
穆罕默德·伊克巴尔 xix,xxiii,100,245,249,283,293
穆罕默德五世 57
穆罕默德协会 99,244,292
穆赫塔尔 16
穆卡达西 127,142,143~144
穆拉·尼扎姆丁 242
穆拉比特王朝 35,36,37,51,170,263,269,270
穆拉迪 189
穆里德教团 248
穆赛利迈 8
穆斯林城市 142~149,164~168,180
穆斯林城镇 参见 城市
穆斯林人口 65,119,120,159~160
穆斯林兄弟会 112, 112~114, 113, 245, 245, 249, 297, 298, 299
穆斯塔法·阿里 63
穆斯塔法·巴克瑞 241
穆斯塔法·法赫米 287
穆斯塔法·吉达尔齐 119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 xvii,xvix,96,104,104,245,302
穆斯塔法·伊泽特 287
穆塔米德 37
穆塔瓦基勒 25,28
穆台奈比 256
穆瓦法克 29
穆瓦希德王朝 35,37,38,44,51,269,270
穆西比 189
穆伊兹 264
穆因·穆萨维尔 281
穆扎法尔王朝绘画 272

N

拿破仑·波拿巴:入侵埃及 x,xiii,xvii,88,93~94
内迪姆 274~275
内萨纳阿拉伯人 5
内沙布尔 38,47,48,262
纳迪尔·阿尔达兰 287
纳迪尔·沙·阿富沙尔 81
纳迪尔·沙 75
纳哈尔旺水渠 153~154
纳吉布·马赫福兹 284
纳米克·凯末尔 244,283
纳绥尔·霍斯鲁 34
纳绥尔丁 102
纳绥尔丁·图西 228,229
纳瓦尔·萨达维博士 205
纳希夫·亚兹吉 282
奈季姆丁·库布拉 41
奈斯尔王朝 59
南斯拉夫 111,120,296
尼科戈斯·巴尔延:多尔马巴赫杰宫 101
尼罗河 70,112,152,153,198,201~202
尼罗计水器 154

尼迈里总统 114
尼日利亚 111,121,163,240
尼扎米 264
尼扎姆丁·乌玛尔 242
尼扎木·穆尔克 39,40
《政府之书》 39,40
尼扎木丁·奥利亚 238
尼扎木丁·沙米 56
聂斯托里基督教 46,214
牛车商队 136,138
农业 11~12,149~154,160,200,202
游牧经济 154~156
奴隶制 28~29,60,131
努尔·贾汗 280
努尔丁 44
努尔库拉尔组织 224
女奴 22

O

欧玛尔·海亚姆 228,264
《鲁拜集》 228
欧麦尔·伊本·艾比·拉比阿 255
欧佩克 121,163
欧斯曼·哈姆迪 287

P

《皮影戏》(杂志) 98
帕尔米拉 3
潘格里玛·波莱姆·穆罕默·达乌德 94
旁遮普的木尔坦 141
佩特拉的奈伯特人王国 3,4
皮柯·戴拉·米兰多拉:《人的尊严》 xxi
皮利·赖伊斯 70,135
葡萄牙人 61,70,81,84,86,87,129,131,134~135
普林尼 128
普塞多-盖伦:《防患集》 150
普瓦捷(732年) 14

Q

漆器 53,290
齐克尔 231,232,276
齐亚·哈克将军 116,302
迁徙(希吉来) 6
清净兄弟会 257
清真寺 168,174,178,253,257~258,260~261,262,266,268,269~270,277,279
全印穆斯林联盟 100

R

诺尔曼·斯瓦茨科普夫将军 xxiii
诺克拉西帕夏 113
诺瑞阿(戽水车) 153,153
人物词典,乌里玛 187,188~192,223,227
日本 xxiii

S

《素丹之律令》 32,33,177
撒马尔罕 x,41,48,56,69,75,76,141,262
古尔阿米尔 269
麦德莱赛 221
谢赫·静达 182,269
帖木儿陵墓 54
萨阿德丁·塔夫塔扎尼 226,230,242
萨阿德王朝 81~82,82,86
萨达姆·侯赛因 xxiii,299,300
萨迪克·希达雅特 283
萨尔贡二世 4
萨尔曼·拉什迪:《撒旦的诗篇》 xvi,117,119,298
萨法维帝国 41~42,61,62,63,64,65,67,68,71~75,76,77,81,199,219,230
农业 279~280
毛毯 281

绘画 281
诗歌 275
萨菲丁 72,265
萨菲纳兹·卡兹姆 204
萨噶克哈纳艺术运动 290
萨噶那努古家族 219
萨哈维:人物词典 189~191,192~194,197,227
萨卡尔·萨尔马斯特:圣灵 233
萨拉丁 30,44~45
萨拉戈萨 36
萨拉森人 3~4
萨迈拉 28,57,147,178,255,260
阿卜杜拉夫 260~261
大寺 260,261
焦萨克哈噶尼宫殿 260,260
清真寺 260~261
陶器 262,262
萨满教徒 46
萨曼教团 240
萨曼王朝 28,263
萨那 143
萨珊帝国 x,2,3,5,8,9,9,11,14,31,213,214,255,260,260,261
萨希利教团 240
塞戴德·哈基·埃尔戴姆 286
塞尔柱人 29,37,38~39,40,40,42,43,44,45,264
建筑 46,266,268
金属制品 272
绘画 272
塞缪尔·亨廷顿 298
塞内冈比亚 83,219
塞内冈比亚的杰克汉克家族 219
塞内加尔 60,121
赛努西教团 240,292
赛义德·阿赫默德·汗 100,243,244,293
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伊朗总统) 300
赛义德·贝迪乌扎曼·努尔西 244,247
赛义德·达尔维什 284
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 264
侯赛因 290
赛义德库特布 51
赛义德伊本·朱拜尔 40~41,44~45,138,139,140
桑哈贾柏柏尔人 36
桑海 60,82,83
沙·阿卜杜·拉提夫 236
沙杰汗 66,79,220,226,275,280
沙·瓦里·阿拉 89,241
沙斐仪 208,211
沙斐仪教法学派 86,182,211,212,226
沙里亚 173,211,212~213,218
沙利赫教团 92
沙鲁哈 56,58
沙玛尔(部落) 156
沙漠干河谷灌溉 152
沙漠绿洲 6,152~153,154
沙姆斯·安瓦瑞·阿尔胡塞伊尼 287
沙特阿拉伯 108,115,117,121,157~158,162,163,292,299,299
沙特阿拉拍国王法赫德 xxiii
沙兹里教团 41,234
商栈,商队贸易 46,125,128,130,136,137~139,143,144
舍扎尔堡 44
设菲尔德:穆斯林社会 xxii
设拉子 264,268,280
设拉子的哈菲兹 264
设拉子的萨阿迪 264
《花园》264
《玫瑰园》 220,264
神秘主义 参见 苏菲派和苏菲主义
审问调查(米哈奈) 25,176,182,184
牲畜的季节性迁移 151
圣徒拉比亚 216
圣训(哈迪斯) 18,19,23,211,212,218,230,231,250
诗歌
阿拔斯王朝时期 256
穆拉比特王朝时期 263
贝都因 255
印度(乌尔都语) 283
莫卧儿 282
波斯 264,282

伊斯兰教前时代 250~251,255
苏菲 236,274~276,282,283~284
突厥语 264,282~283
伍麦叶王朝时期 255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283
十字军 xii,xviii,29,34,43~44,44,45,49
什阿 18
什巴木 143,143
什叶派,什叶和什叶主义 18,19,21,24,25,25,29,34,38,42,49,61,63,189,191~192,211,216~217,218,226,244,252
石油工业 108,108~109,111,121,157~158,161~163
食大麻叶者 48
士兵 参见 马穆鲁克
世界穆斯林联盟 109,121
市场 参见 巴扎
书法 xv,57,210,253,262,268,270,280~281,287
书写体:
阿拉伯语 104,210,254
阿拉米语 254
迪瓦尼体 280
库法体 209,254,262,273
迈尔体 209
马基里体 254
穆哈加格体 270
纳斯赫体 273
纳斯塔里克体 280~281
拉伊汉体 270
瑞噶体 270
苏丹手写体 251
陶基体 270
萨鲁斯体 270,281
舒乌比耶 23~24,213~214
赎罪与迁徙组织 114
数学 xx,213,228
水车 153,153
顺民 13
丝路贸易 xxi,52,59,64,65,128,130,132~136,274,281
私人房屋 147,169
思吉尔马萨 138
斯米尔纳 161
斯诺克·赫尔格荣杰 xiii,94,247
松尼·阿里 60,61
苏丹 60,82,112,114~115,139,241,292,296,299
苏菲派哈拉瓦迪耶教团 41,52,234,238
苏菲派和苏菲主义 39,40~42,52,55,62,69,71,72,76,80,91,92,215~216,216,217,218,263
苏菲派卡迪里教团 41,42,76,234,234,248
苏菲派卡兰答尔 69,235
苏菲派库布林耶教团 76
苏菲派纳格什班迪教团(纳格什班迪耶) 41,76~77,89,92,95,234,234,238~239,240,241,248
苏菲派契斯提教团 41,52,69,80,235,238
苏菲派圣陵 233,233,237
苏菲派亚萨维教团 41,49
苏莱曼·赛义德 287~288
苏莱曼大帝 62,65,66,67,67~68,68,70,135,221,274
苏莱曼清真大寺 67,221,277
苏联 参见 俄罗斯
苏门答腊 52,84,85,86,87,92,94,130,136,236
苏门答腊亚齐 84,85,86,87,94,135,230
苏伊士运河 94,105,105,106,128,156,158,161,201,201,202
素丹卡伊特贝伊 266
素丹马哈茂德 44
素丹马立克·沙 39,43
素丹穆罕默德·法提赫 235
素丹穆拉德三世:“费尔曼” 69
素丹赛利姆 65,70
素丹散加尔 38
素尔丹·瓦拉德 265
隋芬战役(657年) 13
所罗门国王 xx
索科多素丹国 240
琐罗亚斯德教 2,13,29
琐罗亚斯德教徒(印度人口) 79

T

塔百里 139,211
塔哈·侯赛因:《日子》 283

塔赫马斯普国王 72,280,281
塔赫特 138
塔吉·丁·哈纳菲 89,241
塔吉丁 229
塔克鲁尔
塔里卜·阿穆里 275
塔里格 41
塔利比 53
塔什干 76
塔希尔王朝 28,29
太伊发国王 36~37
泰姬·玛哈尔陵 79,80,81,210,280
坦齐马特改革者 242,243
坦苏·奇莱尔 116,303
陶菲克·哈基姆 284
陶器 48,51,52,53,127,130,137,172,262,262,273,274,277,282,283,290
特莱姆森 138,139,269
提加尼教团 240
铁路 157,159,201
帖古迭尔·艾哈迈德 49
帖木儿 48,53,54,55,56,269
帖木儿兰 参见 帖木儿
帖木儿莫卧儿人 54,65,66,75,76,77~81,264,269,272,274
廷巴克图 60,82~83,85,227,230
铜匠亚库布 28,29
突厥-蒙古帝国 62,63~65,76
突厥斯坦 53,62,64,76,77
突尼斯 107,151,249,299
突维斯(歌唱者) 256~257
图菲克·费克瑞特 283
图格鲁勒·贝克 38,40
图拉 143
土耳其埃于普:阿尤布·安萨里陵墓 235
土耳其和突厥人(参见 奥斯曼帝国) x,xi,xvii,23,28,29,33,39,41,43,96,97,104,116,119
  建筑 286;参见奥斯曼帝国
  艺术和书法 287~288
  伊斯兰主义运动 296
  文学 264,282-283
  音乐 284
  青年土耳其运动 98,104,105,302
土库曼商人 141
托洛萨的拉斯纳瓦斯战役(1212年) 38
托马斯·霍洛韦 xv
托马斯·卡莱尔:《论英雄》 xv
脱勒哈 12,13
UAE 参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UAR 参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V·V· 巴托尔德 xiii

W

瓦哈卜运动 83~84,91,92,292
瓦利德二世哈里发 18,21,255,257
瓦利德一世哈里发 147,257,258,258
瓦斯科·达·伽马 84,134
瓦西特:清真寺 258
王朝法典 66,69
威尼斯人 59,65,70,131
维达特 286
维也纳 65,276
维也纳-伊斯坦布尔铁路 157
瘟疫 参见 黑死病
文学 256,263~264,276,282~284
乌巴伊德·阿拉·伊本·马哈茂德 242
乌尔都 276,282,283
乌尔菲 275
乌尔维·凯末尔·埃尔金 284
乌克海伊迪尔 258
乌克里德西 228
乌里玛(学者) 17~18,19,22~23,24,25,40,42,74,88~89,91~92,176,184,212,219,221,223,226,227,230~231,237~241,246~247
乌玛 7,164,180,188
乌姆·哈尼 190,191
乌姆·库勒苏姆 284,284
乌姆·赛莱迈 187,192
乌萨玛·伊本·蒙齐德 44
乌萨玛 xviii

乌兹别克汗 49
乌兹别克人 54,62,63,64,65,75,75~77,141
伍麦叶王朝 12,13~14,16~19,21,22,22,26,32,36,124,126~127,142,215,255
兀鲁伯 54,58,69

X

西班牙和西班牙人 x,xxi,11,14,24,36~37,59~60,84,126
西班牙科尔多瓦 x,26,32,257,270
西班牙塞维利亚 36,37,57,269
西班牙托莱多 viii,37,43
西海尔堡宫殿:壁画 23
西坎德拉:陵墓 280
西拉夫 129,130,132
西蒙·奥克雷:《1708~1718年阿拉伯人的历史》 xiii
西西里 xxi,34,125
西西里国王罗哲尔二世 125
希尔巴特马夫加尔宫殿 18,19,22,258
希哈布丁 234
希贾兹 34,65,71,87,89,108,124~125,136,143
希腊文化 xxxix
希斯巴 175~176,177~178,181~182,184~186
希瓦 75,76,96
班尼·汗 72,75,77
昔班尼·汗
息南 277,279
锡克人 81
先知 参见穆罕默德
先知穆罕默德 x,xii,xv,xvi,5~8,10~11,14,18,20,24,155,166,187,209,211,216,221,244,250
妻子们 187,188~189,191~192
香料 128,133
香料贸易 59,60,64,128,132,134,135
谢哈布·丁·马尔加尼 102
谢赫·阿拔斯·迈达尼 293
谢赫·阿布·穆罕默德·库尔迪 89,241
谢赫·艾哈迈德·亚萨维 55
谢赫·布尔汉丁·马尔基纳尼:《希大亚教法经》 226
谢赫·哈木德·阿拉 280
谢赫·里法阿·塔赫塔维 XVIII
谢赫·穆罕默德·萨曼 241
谢赫·乌玛尔·阿卜杜·拉赫曼 298
谢赫 219:参见 乌里玛
谢赫 82
谢赫穆罕默德·阿卜笃 99,100,244,249,293
新柏拉图主义 xx,xxi,216
新式学校 102,103
星盘 132
星相学 58
兄弟会:参见“穆斯林兄弟会”
旭烈兀 48~49,265
叙利亚奥龙特斯村庄 153,153
叙利亚 8~9,10,12,13,14,16,17,20,21,25,29,31,34,42,43,44,49,56,105,106,107,113,114,126,130,150,160,188,194,258,283,299
学者 参见 乌里玛
逊奈 211
逊尼派 18,19,20,24,29~30,30,34,38,39,40,41~42,49,71,72,192,208,217,218,230

Y

“茹拜” 264
雅加达 110,304
雅库特·穆斯塔希米 270,280
亚丁 108,130,131,136,156
亚格拉 62,280;亦见 泰姬陵
亚库比 139,262
亚里士多德 xx,xxi,214,214
亚历山大 xix,41,128,129,130,138,139,142,145,161,204,214
亚美尼亚 17,21,42,74,136
亚兹德 141
耶济德三世哈里发 21
耶济德一世哈里发 12,13,14,16,255,257
耶路撒冷 7,10,43,44,45,189,258
岩石清真寺 14,19,165,258
耶兹迪格德国王 9

也门 x,20,25,106,108,113,114,125,143,143,147,151
也门考卡班 25
叶尔羌 88
伊本·阿拉比 92,230,235~236,244
《麦加的启示》 235
伊本·阿萨基尔 188
伊本·嘎伊姆·昭兹叶 42
伊本·艾西尔 43,47
伊本·巴瓦卜 268,268,270
伊本·古兹曼 263
伊本·哈吉 226
伊本·哈吉尔·阿什噶拉尼 227
伊本·哈加尔 56
伊本·哈利坎 188
伊本·哈提卜:《杰伊石·陶什赫》 263
伊本·哈兹木 24,178
伊本·海伊撒姆:参见“阿勒哈臻”
伊本·库泰巴 214
伊本·鲁什德 参见 阿威罗伊
伊本·马吉德 124
伊本·穆格拉 262,268,270
伊本·穆卡发 23,256
伊本·纳菲斯 229
伊本·萨格希尔 138
伊本·萨赫勒 263
伊本·赛德:《第一批世代》 188
伊本·沙提尔 229
伊本·舒海伊德 36
伊本·突麦尔特 37,40
伊本·图斐利 215
伊本·图伦(埃及统治者) 28,261
伊本·西拿 参见 阿维森纳
伊本·希沙姆 10
伊本·亚辛 36
伊本·扎姆拉克 57,263
伊本·朱拜尔 181
伊本·祖白尔 16
伊德里斯·伊本·阿布杜·阿拉 165
伊德里斯国王 115
伊德里斯教团 92
伊德里斯王朝 28
伊尔汗 49
伊戈纳兹·戈德威厄 xiii
伊拉·拉皮多斯 218
伊拉克巴格达 x,23,28,29,38,40,41,48,126,130,135,138,144,145,147,147,149,161,165,176,214,217,255
烈士纪念碑 285,287
铁路 157,171
阿布杜·卡迪尔·吉拉尼的陵墓 233
伊拉克巴士拉 13,16,32,125~126,127,128,130,131,132,138,143,161,258
伊拉克库法 12,16,20,34,138,143,254,258
伊朗 x,9,20,29~31,37,38,40,48,49,96,101~102,108,108~109,117,119,126,219,248,291,296,296,297,298,299
农业 150,151
建筑 258,287
文学 275,282,283
音乐 285~286
石油工业 157~158 161~163
绘画 51,194,288~289
复兴 29~31,297
参见“萨珊帝国”
伊拉克 9,12,16,17,21,22,23,25,28~29,31,48,105,106,107,117,126,159,248,283,299
农业 150~151,160
艺术 288
石油工业 157~158,161~163
灌溉 150,151~154
伊斯法罕 x,38,54,56,62,74,75,141,161,281
阿里卡普宫 73,279~280
查哈尔巴 279
清真大寺 265,266
路特福拉清真寺 73,279
世界典范广场 73
马伊丹沙 279
国王清真寺(伊玛目清真寺) 279
艾布·法拉吉·伊斯法哈尼:《诗歌集》 252
伊本·伊沙克 10
胡纳因·伊本·伊沙克 214
阿布·伊沙克豪丹 165

伊斯干达尔・素丹　58
伊斯兰:
　及其对西方的态度　xvi ~ xvii, xix
　当代　119 ~ 121
　与西方的相互依存　xix ~ xxiii
　与犹太教　10
　现代主义者　98 ~ 102, 243, 244 ~ 245, 302
　与民族国家　103 ~ 111
　改革主义者　98, 243 ~ 244, 245, 246, 301
　兴起　5 ~ 11
　西方对伊斯兰的态度　xii ~ xvi
　和西方的扩张　x, 90 ~ 103, 199, 203, 241 ~ 245
　还可参见"伊斯兰主义,伊斯兰认知,古兰经,妇女"
伊朗阿拉木特　48
伊朗礼萨・汗　108, 117, 245, 302
伊利贾・穆罕默德　120
伊玛目　8, 18, 20, 21, 41, 74
伊玛目沙米尔　95
伊沙克・毛希里　257
伊斯兰促进会　115 ~ 116, 245, 249
伊斯兰会议组织　121
伊斯兰教联盟　99
伊斯兰民族(组织)　120
伊斯兰认知　208 ~ 209, 222
　承袭自传统世界　213 ~ 215
　民主化　246 ~ 249
　来自圣训　211, 212
　神秘主义　215, 参见苏菲派
　来自古兰经　208, 209 ~ 211, 参见《古兰经》
　传播　219
伊斯兰拯救阵线(阿尔及利亚)　249, 293, 299, 300
伊斯兰主义　xi ~ xii, 99, 111 ~ 119, 243, 245 ~ 246, 293, 296, 297, 298 ~ 300
　与妇女　xviii, 112, 116, 303 ~ 304
伊斯马仪・法塔赫　287
伊斯玛仪派　20, 25, 29, 30, 30, 31, 40, 48, 216, 218
伊斯兰倾向运动(突尼斯)　249
伊斯坦布尔　(参见"君士坦丁堡")　x, 62, 69, 96, 98, 159, 284, 286, 287
　美术专科学校　287
　巴耶济德二世清真寺建筑群　279
　巴扎(集市)　65, 148
　兰寺　279
　多尔马巴赫杰宫　101, 104
　法蒂赫清真寺　279
　艾哈迈德三世喷水池　279
　天文台　229
　阿尤布・安萨里陵墓(埃于普)　235
　苏莱曼清真大寺　67, 221, 277
　托普卡珀宫　279
伊沃・安德里奇:《德里纳河上的大桥》　64
伊制玛尔(会议)　212
伊兹尼克陶器　277, 283
医药　xxi, 213, 228 ~ 229, 229
以色列　106, 113, 121
易卜拉欣・库拉尼　230, 231, 241
易卜拉欣・毛希里　257
易卜拉欣　8, 10, 14
易司马仪一世国王　71 ~ 72, 73
意大利　94, 97
音乐　xi, 251 ~ 253, 256 ~ 257, 264 ~ 265, 276, 284 ~ 286
印度　x, 14, 38, 41, 45, 51, 51 ~ 52, 62, 100, 109, 126, 141, 160, 292
　农业　151
　英国人在印度　95
　与莫卧儿帝国　63 ~ 65, 67, 68, 69, 72 ~ 73, 75, 77 ~ 81, 95, 142, 199, 230
　音乐　286
　诗歌　283
　苏菲教团　235
　贸易　80, 135, 136, 141
　妇女　302 ~ 303
印度北部居民　69, 79, 79, 80, 87, 109
印度德里　x, 51, 51, 52, 69, 75, 81, 203, 264, 280
　赫瓦贾・海达尔诞辰　238
　沙贾汗阿巴德　280
印度尼西亚　89, 99, 110, 110, 119, 121, 163, 292, 304
　也可参见"爪哇;苏门答腊"
印度尼西亚总统艾哈迈德・苏加诺　110, 110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　110
印度洋贸易　130~133,135,136,156
英国　95,96,97,102,105,106,108,120,135,137,156~157,158,199,242
　石油工业　108,161~163
英国穆斯林议会　119
优素福·格瑞斯　284
优素福·伊本·塔什芬　37
尤里亚·切列比　xviii,148,275,276
尤奴斯·卡提布:《旋律集》　257
尤努斯·埃姆雷　236
尤兹贾尼　51
犹太教　2,7,10,14
犹太人　xix,xx,7~8,10,26,34,60,97,106,138,172
游牧社会　2,45,124,138,142~143,151,154~156
幼发拉底河　150,152,153
玉器　53,54,130,274
约旦　4,105,106,299
约旦国王侯赛因　105
约翰·弗瑞尔　137~138
约瑟夫·斯大林　110

Z

栽德·本·阿里　20
栽德派　20,25
赞吉　44
赞吉王朝　44,45
泽拉　60
泽诺比亚女王　3
扎拉伊尔绘画风格　272
扎勒扎勒(诗琴演奏者)　257
扎纳塔柏柏尔人　36,37
扎维拉　138
扎伊纳布·舒赫达·卡巴蒂　268
札维亚　40
札希鲁丁·穆罕默德·巴布尔　77,78,280
　《巴布尔自传》　78
哲拉鲁丁·鲁米　71,235,264,274,292
哲拉鲁丁·苏尤蒂　60,61,184,191,
《加拉雷恩》　230
哲利尔　255
哲学　214~215
真主党　119
征税　51,69,126,150~151
政治漫画　98~99,248,301
制革厂　172,172
中国　x,xxiii,14,48,49,51,52,52~53,76,87~88,88,127,127,130,134,134,141,164
中国泉州:清真寺　134
朱威因尼　48
祝奈德　40,216
铸造钱币　13,19,32
爪哇　84,87,95,130,136,236
砖瓦制品 274
兹尔雅布(音乐家)　257
自杀　184
祖白达　139
祖白达大道　139
祖白尔　12,13
佐勒菲卡尔·布托　116

译后记

伊斯兰文明是7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成果。本书采用以粗笔触描写概貌，对重点事件、问题做特写的方法，对这一千多年伊斯兰文明的产生、发展，现代西方文明对它的挑战以及它所做的回应做了多侧面、多方位、多角度的介绍与考察，是一部旁征博引，容量较大，且又深入浅出，主次分明，因而可拥有大量读者群的参考读物。本书的一大特点是，既提供了一个整体性的轮廓，又有对若干侧面的纵深开拓，一半的篇幅讲以宗教－政治为主的综合史，另一半篇幅讲若干专题史，其中包括经济、社会、文学艺术，还有一部分是讲穆斯林社会的认知问题的。这两大部分互相补充、互相依托，虽纵横交错，但条缕清晰，这种框架的设计独具匠心，使读者读来既感到轻松、流畅，易于把握，又能融会贯通，便于深入探讨。因此学者需要它，其他的读者也需要它。

近年，在国际政治中，伊斯兰问题较为突出。人们在关注这一问题时，希望对伊斯兰能够知道得更多些，其中包括伊斯兰的历史。有关伊斯兰历史的较有分量的书，在国内外都可以见到。比如，在国外有1977年出版的《剑桥伊斯兰历史》，1999年又有《牛津伊斯兰历史》出版；在国内有1990年出版的《伊斯兰教史》，1994年出版的《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这些大部头的书对于我们了解伊斯兰的历史都很有帮助。但是，插图的伊斯兰史并不多见。本书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开辟了一块新天地。它在介绍基本历史知识、进行一些理性思考的同时，还给读者铺开许多感性的东西，使读者读来不觉得过于抽象，一些叙述由于有画面说明，给人的印象越发深刻。

这本插图伊斯兰世界史是在西方出版的、由在西方学术机构任职的学者撰写的书。在展现伊斯兰历史画卷的过程中，不难发现西方人的独特视角与对宗教的体验。在了解一种宗教、一种文明的时候，是需要看看来自其他方面的人的看法的。

关于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是西方学者近年较为关注的问题之一。199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即出版了名为《伊斯兰与西方》的书（伯纳尔德·刘易斯主编）。“9·11”事件之后，特别是美国总统布什发出要进行“新的十字军东征”号召之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大增。尽管国际社会一再强调，反恐不应针

对特定的民族与宗教，但是，在这之后，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关系，特别是伊斯兰世界与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关系仍然出现了一些较为紧张的状态。其原因一是同美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中东政策有关。克林顿总统在中东推行“东遏两伊，西促和谈”的政策，试图在两者之间取得一些平衡。那时，一些穆斯林对美国历来偏袒以色列的某些做法十分不满，但是伊斯兰世界也有一些人需要借助美国的力量以达到自己在地缘政治中的目标。布什总统上台后，对巴以和谈不像克林顿那么重视，而且对以袒护有加，这在2000年9月以后巴以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引起一些穆斯林的强烈不满。而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在打击恐怖主义势力的同时，点了若干个伊斯兰国家的名，要他们对恐怖主义负责。美国的目标不仅是摧毁恐怖组织的网络，而且要打击伊斯兰世界其他反美势力，不仅如此，美国有的智囊机构还提出改变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制度，铲除产生恐怖主义的土壤的主张，就是说，要这些国家“全面改版”。一些民族宗教感情强烈的穆斯林认为美国在把矛头指向伊斯兰，于是产生反美情绪。美国在把“反恐”变成全世界的共同事业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在打击伊斯兰世界其他反美势力方面遇到不小的阻力。至于“全面改版”的主张更引起伊斯兰世界的深切关注，不少人反对“异教徒”主宰伊斯兰世界的企图。当前这种形势的出现，主要是国际政治斗争的逻辑使然。那么其中宗教的因素究竟有多少，很值得研究。把这一场“冲突”说成是纯“文明的冲突”未必恰当。美国领导人虽然说过要进行新的“十字军东征”，但是就迄今为止美国所采取的行动的宗教背景来说，与当年的十字军东征相去甚远。但是不容否认，这场冲突确有宗教的因素。对伊斯兰教与当代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作出恰当地估计，从而对伊斯兰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给予科学的分析，是当前社会科学学者的要务之一。

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也是本书导言与结束语中的重要话题，书中所谈的看法对人们探讨当代这一重大课题具有参考价值。作者对伊斯兰文明的态度是尊重的，对不少问题的看法还是客观、公正的。当然，它对伊斯兰世界的看法不能不受到西方一些流行看法的影响。对其中的有些看法，穆斯林，特别是信仰虔诚的穆斯林未必会完全赞成。有些看法，如伊斯兰有无“教士”、伊斯兰教义中有无“救世”的含义，带有探讨性质，属作者一家之言。

书中对中国伊斯兰史着墨不多，对中国读者来说，算是一个欠缺。文字过少，事情就不易说得清楚。再加上作者个人看法上的偏颇，会得出未必恰当的结论。例如作者对新疆的看法即有失准之处。不过不管怎么说，都改变不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事实。

书中引用或依据的史料很多，许多材料是公认较为权威的，但个别细节可能与其他书籍中的说法不尽相同，其中有一些还有待做进一步的考证。

本书在翻译时首先是力求精准,符合原意,同时也注意到文字的斟酌,力求好读,不拗口。对其中个别地方译者不能苟同之处,也原文照译,必要时插入译者注。名词术语的中文译法主要参照下列几部工具书:宛耀宾总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4 年版;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7 年版;杰拉尔德·豪厄特主编:《世界历史词典》,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中国地名委员会编:《外国地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另外,也参考了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0 年版),郭应德:《阿拉伯史纲:610~1945》(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1 年版),以及纳忠、朱凯、史希同著:《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等书。同一名词常有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中文译法,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常常感到莫衷一是、无所适从。只有从权威性、约定俗成以及合理性等方面反复权衡,择自认为更善者而从之。个别的译名也作了重新的斟酌。有一些英语发音在中文中找不到相对应的字,只能找"代用品",但是在中文资源中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字音更接近的字的。比如"Re"、"Ri"、"Ry"、"Rei"、"Rou"等,我们习惯译作"里"、"利"、"雷"、"罗"等,这在普通话推广之前,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些地区很少用卷舌音。但是,普通话已经推广半个世纪的今天,再因循下去,似值得斟酌。中文里音"瑞"的字可以找出一堆,如"锐"、"芮"、"蕊"、"睿"等,音"柔"的字也不是没有,将这些资源弃之不用,而"舍近求远",实在可惜。另外有一类习惯译法也值得再思考,即关于外国以人的姓氏命名的教派名称。在英文中,某某人名后头加一后缀,便成为某某派。如以瓦哈卜命名的教派,为"瓦哈比",即"瓦哈卜派"的意思。两种译法都可以。但是我们的习惯译法却是"瓦哈比派",在"比"之外又加上"派",给人以叠床架屋、添足画蛇之感。与此类似的还有以罕百勒命名的教派译作"罕百里派"、以哈尼法命名的教派译作"哈乃斐派"等,这些教派为什么不可以译为"罕百里"或"罕百勒派"、"哈乃斐"或"哈乃法派"呢。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伊斯兰史专家金宜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伊斯兰问题与阿拉伯语专家陈嘉厚教授的指导和帮助。金宜久研究员每有辞书、专著出版,均慨然赐赠译者,使译者受益匪浅。为了翻译时能准确地引用经文,陈嘉厚教授赠与了他所收藏的由沙特阿拉伯出版的中阿文对照的《古兰经》。世界知识出版社的相关编辑室和编辑张光勤、任红岩、赵凌云、侯奕萌为本书的翻译、出版花费了不少心血。

本书的正文部分由安维华译出;插图部分,其中包括文字框、地图与画片说明由钱雪梅译出。译后相互进行了校阅。最后,金宜久研究员又通篇做了阅改。

在翻译正文时,为了能集中精力按时完成所签合同规定之任务,译者移师境外,在女儿住的市郊小楼上,度过了一百多个日日夜夜。遇有个别难以查

到的生僻字,女儿还利用所掌握的计算机知识帮助查找。家人的帮忙为顺利完成任务起了重要作用,但妻子因承担了繁重的家务,致使身体不适,这是译者深感内疚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师、刚刚从以色列希伯莱大学归来的王锁劳博士不辞劳苦,欣然为本书中一些阿拉伯译音字的中文译法提出宝贵意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师、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陈建民工作繁忙,但每当译者就阿拉伯译音字的中文译法问题进行请教时,均细心斟酌,不吝赐教。在此谨向各位对本书翻译慨然相助过的亲朋好友们致以谢忱。对在百忙中阅改全书,给予点评的金宜久研究员更表示深切的谢意。

翻译这样一本涉猎广泛的书,难度较大。其中涉及历史学、宗教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诸多领域。写这本书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长分头去写,但翻译只要求由一两个人承担,而这一两个人不可能样样都是专长,因此,虽然作了一些努力,希望能坦然地将此译作奉献给读者,但是露怯之处怕是仍然在所难免,还希读者雅正。

安维华于圣迭戈市郊
2002年9月15日
钱雪梅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02年9月5日